

目 录

本卷前言	6-1
------------	-----

关于归还穆尔给布尔什维克党的借款问题

(1922年5月至1927年9月)

专题说明	6-1
No05201 雅·斯·加涅茨基致维·米·莫洛托夫 (1922年5月10日)	6-3
No05202 列宁致斯大林(1922年5月10日)	6-4
No05203 格·叶·季诺维也夫致斯大林 (1922年5月20日)	6-5
No05204 格·叶·季诺维也夫致斯大林 (1923年8月23日)	6-6
No05205 俄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摘抄 (1923年8月23日)	6-7
No05206 卡·穆尔致哥尔布诺夫(1925年9月23日)	6-8
No05207 尼·彼·哥尔布诺夫致雅·斯·加涅茨基 (1925年9月26日)	6-9
No05208 雅·斯·加涅茨基致安·谢·布勃诺夫 (1925年10月16日)	6-11

№05209	俄共（布）中央办公厅和财政部给布勃诺夫的关于 欠卡尔·穆尔款项的说明 (1925年11月15日)	6-13
№05210	关于卡尔·穆尔帮助俄国革命运动的资料 (1925年9月)	6-15
№05211	关于偿付卡尔·穆尔债款的资料 (1926年1月6日)	6-20
№05212	卡尔·穆尔致维·米·莫洛托夫 (1926年1月26日)	6-25
№05213	克·蔡特金致维·米·莫洛托夫 (1927年8月19日)	6-26
№05214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摘抄 (1927年9月9日)	6-28

列宁逝世后的党内斗争

(1924年1月至1929年12月)

专题说明	6-29	
№02739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托洛茨基 (1924年1月29日)	6-30
№02740	谢·梅德维捷夫致“巴库同志” (1924年1月下旬)	6-31
№03135	波克罗夫斯基：回忆列宁 (在红色教授学院的讲演速记记录) (1924年2月7日)	6-46
№02741	克拉辛和托洛茨基的来往便条（1924年）	6-64

- №04419** 失业者致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信
（不晚于1924年5月23日）…………… 6-74
- №02759** 托洛茨基致格拉兹曼（1924年7月26日）…… 6-76
- №02761** 俄共（布）中央全会讨论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
报告的速记记录（第二次会议）
（1924年10月26日）…………… 6-78
- №02762** 托洛茨基：我们的意见分歧（1924年11月）… 6-81
- №01105** 斯大林就经济问题致莫洛托夫
（1925年7月12日）…………… 6-125
- №10842** 斯大林就第聂伯工程致莫洛托夫
（1925年7月20日）…………… 6-127
- №10843** 斯大林就第聂伯工程致莫洛托夫
（1925年7月27日）…………… 6-129
- №10844** 斯大林就经济问题致莫洛托夫
（1925年7月28日）…………… 6-130
- №10845**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5年7月）…………… 6-132
- №10846** 莫洛托夫致捷尔任斯基（1925年8月7日）… 6-133
- №02765** 托洛茨基：《日常生活问题》日文版前言
（1925年8月13日）…………… 6-134
- №10847**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不早于1925年8月20日）…………… 6-136
- №02764** 拉狄克：关于共产国际政策的提纲草稿
（1925年8月）…………… 6-138
- №02766** 托洛茨基：同季诺维也夫的联盟（日记）
（1925年12月9日）…………… 6-150
- №02687** 托洛茨基：关于经济失败主义的指责
（1925年12月12日）…………… 6-157

- №02768** 托洛茨基：失败主义（1925年12月12日） … 6-159
- №02769** 托洛茨基：提纲（1925年12月） …… 6-160
- №02770** 托洛茨基：对口号和意见分歧的分析
（1925年12月14日） …… 6-164
- №02771** 托洛茨基：论列宁格勒反对派
（1925年12月22日） …… 6-167
- №02772** 托洛茨基对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所作的摘录（1925年12月18-31日） …… 6-171
- №02773** 托洛茨基：经济问题笔记
（1926年1月15日） …… 6-177
- №02774** 伏罗希洛夫在普梯洛夫工厂的讲话
（1926年1月20日） …… 6-180
- №02775** 托洛茨基：稳定和口号
（1926年2月13日） …… 6-183
- №02776** 托洛茨基：关于我们对中国和日本的政策问题
（1926年3月25日） …… 6-185
- №02779** 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四次
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的决议
（1926年3月27日） …… 6-199
- №02780** 托洛茨基致谢列布里亚科夫
（1926年4月2日） …… 6-202
- №02781** 弗·米·斯米尔诺夫：论我国的经济困难问题
（1926年4月2日） …… 6-204
- №02782** 托洛茨基为在中央四月全会上发言所作的礼记
（1926年4月7日） …… 6-224
- №02783** 托洛茨基在中央四月全会上的发言
（1926年4月6日） …… 6-226

- No02784** 托洛茨基对李可夫关于苏联经济状况的决议
草案的修改意见（不早于1926年4月） 6-235
- No02786** 埃利钦的便条（1926年4月） 6-247
- No02788** 托洛茨基：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计划原则、工业化
速度及无原则性（1926年5月2日） 6-248
- No0278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决议：关于国民党的
协定，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办法和在
国民党的工作问题（1926年5月15日） 6-251
- No10848**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6年5月24日） 6-252
- No02791** 托洛茨基就民主等问题致政治局
（1926年6月6日） 6-253
- No02792** 托洛茨基就速记记录发表的声明
（1926年6月9日） 6-263
- No10849**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
（1926年6月15日） 6-266
- No10850**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李可夫和布哈林等
（1926年6月25日） 6-268
- No02793** 共产国际的几个问题——托洛茨基致联共
（布）代表团（1926年6月28日） 6-271
- No02794** 马列茨基论热月（1926年6月） 6-280
- No02795** 托洛茨基：论平等（1926年7月11日） 6-282
- No02796**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声明
（1926年7月11日） 6-283
- No10851** 斯大林就解除加米涅夫职务问题致莫洛托夫
（1926年8月3日） 6-289
- No10852** 斯大林就解除季诺维也夫职务问题致莫洛托夫
（1926年8月30日） 6-291

№10853	斯大林就奥尔忠尼启则的任命问题致莫洛托夫 (1926年9月4日)	6-293
№10854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6年9月16日)	6-295
№10855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6年9月23日)	6-299
№10856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6年11月7日)	6-302
№10857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6年12月23日)	6-303
№10858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7年6月23日)	6-305
№10859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7年6月24日)	6-306
№10860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 (1927年6月27日)	6-307
№10861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7年7月初)	6-309
№10862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7年7月8日)	6-310
№10863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 (1927年7月9日)	6-311
№10864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7年7月11日)	6-316
№10865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7年7月16日)	6-317
№10866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9年7月29日)	6-318
№10867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9年8月9日)	6-321
№10868	斯大林就粮食收购问题致莫洛托夫 (1929年8月10日)	6-324
№10869	斯大林就经济等问题致莫洛托夫 (1929年8月21日)	6-327
№10870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9年8月23日)	6-332
№10871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9年8月29日)	6-334
№10872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9年9月1日)	6-337
№10873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9年9月6日)	6-339

No10874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9年9月9日)	6-341
No10875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9年9月9日)	6-344
No10876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和奥尔忠尼启则 (1929年9月13日)	6-345
No10877	斯大林就李可夫的讲话致莫洛托夫等 (1929年9月30日)	6-347
No10878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9年10月7日)	6-349
No10879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不晚于1929年11月17日)	6-351
No10880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9年12月5日)	6-352
No10881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9年12月25日)	6-354

伊斯特缅《列宁死后》一书引起的政治风波

(1925年6月至8月)

专题说明	6-357	
No11876	斯大林致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全体委员和 候补委员 (1925年6月17日)	6-358
No01105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5年8月1日)	6-365
No01106	斯大林致“七人小组” (不早于1925年8月1日)	6-368
No01107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5年8月9日)	6-369
No09641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 (1925年8月11日)	6-371
No09642	季诺维也夫致曼努伊尔斯基 (1925年8月12日)	6-372

№01108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5年8月18日) 6-373

对车臣的军事行动

(1925年7月至9月)

专题说明 6-374

№03244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约·斯·温什利希特
致俄共(布)中央 (1925年7月7日) 6-375

№03245 俄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书记阿·伊·米
高扬致俄共(布)中央
(1925年7月23日) 6-377

№03246 伊·巴·托夫斯图哈致尼·巴·布留哈诺夫
(1925年8月11日) 6-379

№03247 约·斯·温什利希特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5年9月5日) 6-380

№03248 约·斯·温什利希特致维·米·莫洛托夫
(1925年9月8日) 6-383

№03249 约·斯·温什利希特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5年9月8日) 6-384

№03250 约·斯·温什利希特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5年9月12日) 6-389

№03251 叶夫多基莫夫致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 (1925年9月10日) 6-391

№03252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亨·格·亚戈达致
维·米·莫洛托夫 (1925年9月11日) 6-393

№03253 约·斯·温什利希特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5年9月17日) 6-394

联共（布）与英国总罢工

(1926年3月至9月)

- 专题说明** 6 - 396
- №1088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向英国罢工矿工提供物质援助的决议（1926年3月4日） 6 - 397
- №1088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各组织为英国矿工罢工而采取措施的决议（1926年5月4日） 6 - 398
- №1088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向英国工会提供财政援助并使对罢工者的支持具有国际性的决议（1926年5月6日） 6 - 401
- №10885** 政治局英国问题小组会议记录（1926年5月5日） 6 - 404
- №10886**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代表团关于英国罢工问题的决议（1926年5月6日） 6 - 405
- №10887**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代表团会议记录第9号（1926年5月7日） 6 - 407
- №10888**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秘书处主任助理B. 波格丹致联共（布）中央秘书处处长伊·帕·托夫斯图哈（1926年5月7日） 6 - 409
- №1088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向英国罢工者提供补充拨款的决定（1926年5月7日） 6 - 410
- №10890** 斯大林致托姆斯基电报（1926年5月9日） ... 6 - 412
- №1089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否决的季诺维也夫的决议草案并表示不同意托姆斯基致英国工会总委员会电的决定（1926年5月14日） 6 - 413

- №1089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资金转交给英国矿工联合会的决定
（1926年5月15日） 6-416
- №02790** 托洛茨基：英国工人运动问题
（1926年5月18日） 6-417
- №10894**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6年5月26日） 6-419
- №1089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为英国罢工开展宣传
运动的决议（1926年5月27日） 6-421
- №10896** 征询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1926年5月27日） 6-422
- №1089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支持英国工人罢工的
措施的决定（1926年5月31日） 6-423
- №10898** 莫洛托夫和布哈林致斯大林
（1926年6月1日） 6-425
- №10899**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1926年6月1日） 6-426
- №10900**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6年6月2日） 6-427
- №10901**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6年6月3日） 6-428
- №10902**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6年6月3日） 6-431
- №10903** 托夫斯图哈致斯大林（1926年6月3日） 6-433
- №10904**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6年6月4日） 6-434
- №10905**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关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谈英国总罢工教训宣言内容的建议
（不晚于1926年6月4日） 6-435
- №10906** 托姆斯基关于为英国大罢工赴巴黎之行的报告
（不早于1926年6月5日） 6-436
- №1090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批准给苏联矿工工会
代表团的指示草案的决定
（1926年6月14日） 6-442

№10909	托洛茨基在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主席团代表团会议上就英国矿工罢工问题提出的建议 （1926年6月18日）	6-445
№1091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向英国矿工总罢工参加者提供补充财政援助的决议 （1926年7月8日）	6-447
№10911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6年8月27日）	6-448
№10912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6年9月8日）	6-451

农业集体化问题（一）

（1926年4月至1930年7月）

专题说明	6-453	
№05306	农民扎科特诺夫关于农村状况给《农民报》的信 （1926年4月7日）	6-454
№05307	农民库利科夫关于住疗养院给《农民报》的信 （1926年12月6日）	6-457
№05308	农民梅利尼钦科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词义给《农民报》的信 （1927年2月18日）	6-459
№10913	联共（布）中央全会讨论米·萨夫琴科来信速记纪录摘抄（1927年2月11日）	6-462
№02428	古巴诺夫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们 （1927年4月18日）	6-466
№02429	萨夫琴科致斯大林 （1927年5月10日）	6-469
№02380	亚·瓦·恰亚诺夫致莫洛托夫 （1927年10月6日）	6-486

- №02381** 亚·尼·恰亚诺夫关于苏联农业现状的报告
(1927年10月6日) 6-488
- №02450** 尼·德·康德拉季耶夫致莫洛托夫
(1927年10月8日) 6-501
- №02451** 尼·德·康德拉季耶夫：论苏联农业发展条件的特点
及其意义(1927年10月8日) 6-502
- №05309** 农民斯科罗霍德关于共产党员言行不一给
《农民报》的信
(1927年12月28日) 6-536
- №05310** 工人库兹涅佐夫关于自己对苏维埃国家的贡献
给《农民报》的信
(1928年3月15日) 6-538
- №12367** 农民库·马·马托夫致特维尔省工农检察院请求
恢复其选举权的申请书
(不早于1929年4月24日) 6-540
- №03133** 红岗区执行委员会关于纠正1930年5月15日
集体化过程中过火行为的材料
(1930年5月18日) 6-542
- №03134** 农民莫列夫被没收的财产清单
(1930年7月7日) 6-543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几个文件

(1922年10月至1935年11月)

- 专题说明** 6-544
- №04563** 远东共和国政治保卫总局关于东正教
活动的通报(1922年10月29日) 6-545
- №02364**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列宁格勒军区全权代表处关于
列宁格勒苏维埃工作总结运动的情况汇报(一)
(1926年4月12日) 6-552

- №02365**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列宁格勒军区全权代表处关于
列宁格勒苏维埃工作总结运动的情况汇报（二）
（1926年4月16日） 6-555
- №02366** 列宁格勒省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给列宁格勒苏维埃
主席团的1927年工作报告（1927年） 6-558
- №03148** 格鲁姆-格尔日迈洛的辞职书
（1928年9月23日） 6-568
- №03329** 亚戈达就斯拉晓夫将军被暗杀案致联共（布）中央
斯大林（不晚于1929年6月25日） 6-573
- №03360** 亚诺夫斯基就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死亡情况致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
（不早于1935年11月22日） 6-575

布尔采夫通信选

（1919年9月至1938年2月）

- 专题说明** 6-577
- №03117** 安德列也夫致布尔采夫
（1919年9月9日） 6-579
- №03118** 邓尼金致布尔采夫
（1920年5月12日） 6-584
- №03119** 布宁致布尔采夫
（1921年9月30日） 6-586
- №03120** 弗兰格尔致布尔采夫
（1922年6月27日） 6-587
- №03121** 邓尼金致布尔采夫
（1925年12月11日） 6-589
- №03122** 库斯柯娃致布尔采夫
（1936年9月29日） 6-590

- №03123 布尔采夫致邓尼金
(1938年2月25日) 6-595

关于作家索洛古勃的问题

(1920年6月至1921年5月)

- 专题说明 6-598
- №03208 索洛古勃致列宁(1920年6月5日) 6-599
- №03209 阿·尼·切博塔廖夫斯卡娅致柯伦泰
(1921年4月22日) 6-602
- №03210 索洛古勃致托洛茨基
(1921年4月25日) 6-604
- №03211 柯伦泰致卢那察尔斯基
(1921年4月22日~5月10日之间) 6-607
- №03212 卢那察尔斯基致俄共(布)中央
(1921年5月10日) 6-608

技校学员布洛欣和斯大林的通信

(1924年7月至9月)

- 专题说明 6-610
- №03336 布洛欣致斯大林(1924年7月29日) 6-611
- №03337 斯大林致布洛欣(1924年9月3日) 6-615
- №03338 布洛欣致斯大林(1924年9月12日) 6-616

【专题说明】

关于归还穆尔给布尔什维克党的 借款问题

(1922年5月至1927年9月)

布尔什维克党接受德国政府的津贴问题一直为历史学家所关注，但始终没有确切的材料能够证明此事。但20年代穆尔为收回借款所留下的文件证明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曾得到过德国人卡尔·穆尔的资助。穆尔1852年生于瑞士，从十九世纪70年代末起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1889年起住在伯尔尼，在这里穆尔给予俄国政治流亡者——从民意党到布尔什维克以大量帮助。1904年结识列宁。1913—1914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为接受莫斯科工厂主施米特遗产发生争执，问题被提交国际社会党执行局讨论，时任委员的穆尔支持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穆尔为被奥地利当局驱逐的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担保，使他们得以居留瑞士。1915年还为他们延长居留权支付保金（100瑞士法郎）。从1913年起至返回俄国，列宁同穆尔的联系通过住在伯尔尼的布尔什维克格·李·什克洛夫斯基。据说，1917年4月穆尔曾资助列宁等人从瑞士取道德国回俄。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从穆尔处得到113926瑞士法郎（相当于33214美元）。1917年8月17—30日列宁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问：“请来信告知，是否通过瑞典左派筹集到了一些钱？”“穆尔究竟是什么人？是否

已完全而绝对地证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同德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直接间接的勾结？如果穆尔真的在斯德哥尔摩，如果你们认识他，那么，我衷心地、恳切地、再三地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对此加以最严格、最有根据的审查。”（《列宁全集》第47卷第633、634页）9月24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曾讨论穆尔提供资助问题。会议纪录写道：“中央委员会听取了亚历山德洛夫〔谢马什柯〕关于瑞士社会党人卡·穆尔提议的提供一定数量的钱供中央使用的报告，鉴于无法核查所提供的资金的真正来源，……也无法核查穆尔建议的真正目的，中央决定：否决此建议，并认为继续就此进行谈判是不能允许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纪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70页）此书的注释说：“后来党史委员会的资料说，穆尔提供的资金来自他突然获得的一大笔遗产。”1918年头几个月穆尔留在彼得格勒，是列宁同德国和谈的特别顾问。布列斯特和约缔结后，穆尔回伯尔尼。7月赴柏林，8月初回到莫斯科。什克洛夫斯基对此激烈反对，1918年8月14日他给列宁去信道：“请您注意卡·穆尔。他是德国代理人，用钱收买的代理人。有足够的证据，无可置疑。我相信，他在俄国期间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危害（在签订不列斯特和约和德国人进攻中）。”列宁把此信转交给拉狄克，后者指责什克洛夫斯基散布针对穆尔的“诽谤”。穆尔在俄国待到1919年3月初，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曾向列宁提出归还他过去向流亡国外的布尔什维克提供的部分钱款。以后两年穆尔住在欧洲。在柏林他为被捕关押在监狱的拉狄克搞到特殊的条件，其狱室成为特殊的沙龙。1921年6月穆尔给列宁写信，要求列宁协助他取得赴苏俄的护照。列宁把信转给季诺维也夫，后者的结论是，“我认为暂时不让他和他的秘书来莫斯科。”1921年11月，穆尔到达莫斯科，立即提出归还他1917年在斯德哥尔摩付给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的钱款问题。然而此问题的解决前后花了6年时间。1927年秋穆尔离开苏联。1932年在柏林去世。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校注，
夏风翻译）

№05201

雅·斯·加涅茨基^① 致维·米·莫洛托夫^②

(1922年5月10日)

莫斯科，1922年5月10日

送中央委员会，莫洛托夫同志

尊敬的同志：

我至今尚未得到您的指示——如何处理那些从里加送来的83,513丹麦克朗。如果没有异议，我请求中央委员会的出纳从我这儿取走。

不过我提醒一下，有几次曾通过口头决定把钱交给穆尔。上述款项实际上是从穆尔那儿得到的钱的余款。老头装作等待关于钱的问题的答复老是呆在莫斯科。您是否认为最好是把这些钱还给他，同他清账，以此摆脱他。

等待您的紧急指示。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加涅茨基

① 加涅茨基，雅·斯·（1879～1937）——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国外局委员。十月革命后从事外交和经济工作。

② 文件上有一附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尼·彼·哥尔布诺夫告诉我，您主张把钱归还穆尔。无论如何，必须了结老头的这件事。加涅茨基。”

莫洛托夫，维·米·（1890～1986）——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21年起任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等职。1962年被开除出党。

№05202

列宁致斯大林

(1922年5月10日)

致斯大林同志

我模糊地记得，我是参加了对该问题的决定。但具体是怎么回事我忘记了。我知道季诺维也夫^①也参加了。在准确和详细地查明情况之前，我请求不要做决定，以免出错，务必问一下季诺维也夫。

列 宁

① 季诺维也夫，格·叶·（1883～1936）——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先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1925年是“新反对派”的组织者，1926年起是托季联盟领袖之一。1936年被判处死刑。后平反。

№05203

格·叶·季诺维也夫致斯大林

(1922年5月20日)

致斯大林同志

依我看，钱（大宗款项）应该交给共产国际。穆尔反正会把它们给喝掉的。我已同加涅茨基商妥在拉狄克^①来到之前不要作出决定。

格·季诺维也夫

① 拉狄克，卡·伯·（1885—1939）——1904年加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国外支部，190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德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1919—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1925年起任中山大学校长。1936年被捕，后平反。

№05204

格·叶·季诺维也夫致斯大林^①

(1923年8月23日)

把钱返还穆尔处是由政治局决定的。可否在莫洛托夫到来之前支付100切尔文卢布，要不然他会去挤拉狄克的钱的。

格·季诺维也夫

^① 文件上有斯大林（手书）的批语：“我主张同很了解此事的莫洛托夫一道解决全部问题。斯。”

№05205

俄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摘抄

（1923年8月23日）

第80条 格·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建议：

决定——见特别卷宗。^① 同意格·季诺维也夫的建议，预付给穆尔100切尔文卢布，但是，全部问题要在莫洛托夫到来之后共同议定。

^① 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各部的“特别卷宗”专门存放不收入会议一般纪录的特别机密的决定。

№05206

卡·穆尔致哥尔布诺夫^①

(1925年9月23日)

莫斯科，1925年9月23日

尊敬的哥尔布诺夫同志：

恳请您在动身去两个月的休假之前，尽量找到所需要的信函，以归还给我35,000美元。

如果您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就离开的话，那我将失去最后的希望，我在这里只有等死了。

为防万一，恳请您给我写几行字，说明伊里奇曾指示您将借款还给我，并且应在几天内完成，还要说明，以后您将传达这一指示。

为防万一，最恳切地请求您给我写这几行字。不要使我陷入困境。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您的卡尔·穆尔

① 文件上有一批语：“柯普佳克维奇同志：我向斯大林同志作了报告，他要求把这一问题交由莫洛托夫同志解决。9月26日。托夫斯图哈。”（手书）“送布勃诺夫同志（莫洛托夫）。9月28日。柯普佳克维奇。”（手书）“9月29日。[无法辨认]同志：问一下加涅茨基同志。布勃诺夫。”（手书）哥尔布诺夫，尼·彼·（1892～1936）——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20年起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

№05207

尼·彼·哥尔布诺夫致雅·斯·加涅茨基

(1925年9月26日)

绝密

抄送：米罗什尼科夫^①和托夫斯图哈^②同志

致加涅茨基同志

卡尔·穆尔找我并重提将钱交还给他的问题，这笔钱是他在1917年7月至8月期间借给党的。他要35,000美元。穆尔在1921年曾找过列宁同志，没有见着，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他写过一个短筒，对穆尔表示亲切关怀并指示，一切事务问题可以来找我。依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指示，当时我与您和拉狄克同志谈过，转达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即同穆尔清账的意见，并让卡尔·穆尔去找您。现在穆尔又来找我，说他至今没能收回钱，并说自己处于极其困难、有失尊严的境地，因为他需要这些钱，不能放弃。穆尔在与我的谈话中请求将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要同他清账的指示以书面形式提供给他。我拒绝提供这样的证明，借口说在我手中没有任何信件和文件，我不能根据记忆提供这样的证明。我在此向你们证实，实际上我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的指示。

① 米罗什尼科夫，伊·伊·（1894～1939）——1917年3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1～1937年任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和主任。1937年任苏联副财政人民委员。

② 托夫斯图哈，И.П.（1889～1935）——俄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的助理。

因为您清楚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并且拥有资料，可以据以核查穆尔所作的计算并确定他应从我们这里得到的钱数，鉴于我即将去休假，又不了解穆尔给我们钱的情况，我请您来处理这件事，在得到必需的指示后，通过米罗什尼科夫同志将这件事彻底解决。我不会让卡尔·穆尔去找您，我认为，最好通过米罗什尼科夫同志去谈判，我会预先通知他并把这封信的副本寄给他。

此外，我请俄共（布）书记处托夫斯图哈同志将该问题报告给斯大林同志并取得他的指导性的指示。这些指示将由托夫斯图哈同志告诉米罗什尼科夫同志，而米罗什尼科夫同志将通知您。

№05208

雅·斯·加涅茨基致安·谢·布勃诺夫^①

(1925年10月16日)

莫斯科，1925年10月16日

秘密

抄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致中央委员会委员布勃诺夫同志

米罗什尼科夫同志关于9月26日戈尔布诺夫同志涉及穆尔的信，我可以做如下通报。

政治局早已决定将钱归还穆尔（此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坚持这样做），只是根据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建议，指示不要将所有的钱立刻还给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时给了他几千卢布。所以我认为，目前还是应该付给他几千卢布，并在以后的几年里陆续付清这笔钱。

^① 文件上有批语：“古扎科夫同志：请查明〔无法辨认〕并告。A. 布勃诺夫。”（手书）以及说明：“古扎科夫同志。财政部于1924年给了穆尔一部分钱。他好像于1922年存了从加涅茨基那里取来的钱。麦赫里斯”（手书）

古扎科夫，И.В.——1924～1927年任俄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麦赫里斯，Л.З.（1889～1953）——1922～1925年为斯大林的书记处工作人员。

布勃诺夫，安·谢·（1883～1940）——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3年领导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1924年起任红军政治部主任，1925年任中央书记，1929～1937年任俄联邦教育人民委员。

从穆尔处收到的钱的准确数目，我在当时已呈报中央，大概放在中央的档案库中。据我的记忆，这笔钱数约为 70000 丹麦克朗。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加涅茨基

№05209

**俄共(布)中央办公厅和财政部给布勃诺夫的
关于欠卡尔·穆尔款项的说明^①**

(1925年11月15日)

莫斯科，1925年11月15日

致俄共(布)中央书记布勃诺夫同志

1917年及以后时期，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在不同时间曾向卡尔·穆尔借过钱，由加涅茨基、沃罗夫斯基^②和拉狄克三同志经手，总共32837美元。

从穆尔提交的说明和账单可以看出，列宁同志知道这一借款，但是我们没有文件资料，只有：1. 加涅茨基同志致您的信。2. 哥尔布诺夫同志致米罗什尼科夫和托夫斯图哈同志的信。从中可以看出，确实借了这一笔钱，需要还清穆尔的借款。

根据穆尔同志的说明弄清下列情况：由于这一债务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没有清还，穆尔不得不抵押了价值10万的有价证券，为此他要付出9%，不过这些证券超过票面价值4%。因此穆尔认为可按照5%支付，利息差额是5850美元。因此，全部借款是38,687美元。我们在不同时间已付给穆尔3,608美元。^③ 还应付给35,079美元。

① 文件上有批语：“送书记处。11月18日。布勃诺夫”（手书）。

② 沃罗夫斯基，瓦·瓦·（1871～1923）——189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1923年任苏俄驻意大利全权代表。

③ 1923年8月24日、1924年7月23日和1925年9月5日向穆尔偿还7000卢布，等于3608.46美元。

考虑到穆尔的要求，将按照下列程序偿还——现在付给22,000美元，他用20,000美元去购买有价证券，2,000美元用作生活费，还剩下一笔钱是13,079美元——在下一个预算年度的第一个月付清。穆尔对此表示同意。

古扎科夫^①

伊万诺夫^②

① 古扎科夫，П.В.——1924~1927年任俄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② 伊万诺夫，П.Н.——1924~1927年任俄共中央财政部部长。

№05210

关于卡尔·穆尔帮助俄国革命运动的资料^①

(1925年9月)

穆尔同志50年来从事俄国革命运动问题的研究，这一点在他的国家是无人能与他相比的。他借每一个机会——暴行，流血星期日，1905年事件，六位杜马代表的事件，战地法庭和沙皇制度的各种可耻的罪行——组织集会和游行示威。他激起工人和大众的同情，尽力支持俄国革命运动，尤其是它的左派。

同时他还在物质上广泛地支持运动及其代表人物。例如，1908年他一下子就拿出了150000多瑞士法郎。除此之外，他还为革命党的需要（德国、瑞士、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革命政党）拿出了数十万瑞士法郎。

穆尔同志是所有俄国革命者的保护人，在革命的整个年代，每到需要时，他都以建议和实际行动予以帮助。纳希姆松^②同志就曾在一张照片上这样写道：“献给可爱的老同志穆尔，您永远是处在困境中的俄国革命者的保护人。”有人说，穆尔同志早在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成立之前就在自己的活动中执行了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③的任务。

然而，这里所要谈的不是这一切。

① 作者不明。

② 纳希姆松，C.M.（1885～1918）——布尔什维克报纸《明星报》和《真理报》工作人员，北部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1918年任雅罗斯拉夫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③ 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建于1922年。

这里说的是沃罗夫斯基同志和加涅茨基同志从穆尔那儿要来的钱，明确地称之为贷款，当时答应在夺取政权之后将立即归还贷款。列宁同志知道这事，并为此对穆尔同志表示感谢。这是在1917年最艰苦时期的援助，是满足最必需的需求所要求的。

1919年初，列宁同志曾采取措施以归还这一贷款，但是事情搁下了。1921年12月，加涅茨基曾感到非常奇怪，这个问题还没得到解决。根据他的建议，穆尔同志写信给列宁，列宁于1921年12月11日给他写了一封非常友好的信，说事情即将解决。但是列宁的指示没有得到实施。在穆尔同志长时间的努力之后，拉狄克同志在1923年8月采取了一个措施。关于此事有了一个决议。1924年秋采取的一系列的尝试仍然毫无进展。1925年的努力仍然是毫无效果。尽管同这个或那个权威同志谈过这一问题。

1925年8月布哈林^①同志致函安德列耶夫^②同志说，应该彻底归还穆尔同志大约35,000美元的借款，不要时不时地用几个戈比去打发他。结果是在9月给了一笔不大的款子。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哥尔布诺夫同志在1925年9月23日得知那么长时间没有归还借款感到非常吃惊。问题在于，列宁同志在1921年12月曾给他明确的指示，在数天内应该偿清。哥尔布诺夫随后便转达了这个指示。

需要提一下，1923年8月向穆尔同志支付了1000卢布；1924

① 布哈林，尼·伊·（1888～1938）——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先后任《真理报》和《消息报》主编，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书记。1938年被判处死刑，1988年平反。

② 安德列耶夫，安·安·（1895～1971）——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0～1927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铁路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历任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书记；农业人民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等职。

年秋天支付了 5000 卢布，不久又是 1000 卢布（7000 卢布相当于 3608 美元）。

看来，8 年时间足以彻底完成列宁、沃罗夫斯基、加涅茨基的诺言了。

穆尔同志要求给的款项是根据他的紧急要求在不同时期分次给他的：

1. 瑞典克朗：

8000
9000
15000
8000
12000
6000
8000
7000

总共：73000 瑞典克朗

2. 瑞士法郎

35000 瑞士法郎 = 25926 瑞典克朗

3. 德国马克

30000 马克（2 马克 = 1 瑞典克朗） = 15000 瑞典克朗

总计：73000 + 25926 + 15000 = 113926 瑞典克朗

关于这一笔整数为 114000 瑞典克朗的欠款，是 1919 年 2 月报告列宁并得到他的认可的。

此外还要加上的 15000 马克的借款。当时多亏穆尔同志的极大努力，拉狄克同志得以被从柏林列尔捷斯基监狱中放出，在那里他

差一点被枪毙，为保证安全把他拘禁在一家私人住宅里。^①拉狄克同志请求穆尔同志借给他15000马克以便帮助被枪毙的莱维内^②同志的妻子。总共需要25000马克，柯普^③同志能提供的不过10000马克。拉狄克说等他回到莫斯科后立即向列宁提出归还这笔借款问题。拉狄克曾让莱维内的妻子去找穆尔，穆尔将15000马克交给了这位寡妇。拉狄克把这件事完全给忘了。

列宁同志只是到1921年才知道这一笔借款事，并认可了。因此，这笔借款从113926瑞典克朗加上7500瑞典克朗（即15000德国马克）变成了121426瑞典克朗（即32837美元）。由于迟迟不能归还穆尔同志，事情变得麻烦起来。因为穆尔同志为大宗借款所提供的担保和债务已经期满。1920年初，他不得不拿100000瑞士法郎的有价证券去抵押，为此他要付出9%的利息、手续费以及食物等等。由于他所抵押的有价证券平均超过了票面价值为4%，所以他还得支付5%。从1920年初到1925年底共6年， 6×5000 法郎 = 30000瑞士法郎（折合为5850美元。）

需要指出下列情况：穆尔同志认为9%还不够，这是因拖延他不得不支付的，但拖延不是他造成的，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损失的钱不止54000瑞士法郎（折合为10550美元），但是他请求只要还给他5%就行了，即30000瑞士法郎（折合为5850美元），这些钱他要用现金去支付抵押有价证券的超期利息。

让穆尔同志一个人独自承受这一笔钱，公平吗，像话吗？事情拖了8年不是穆尔的过错。相反，7年里他尽一切的可能设法了结

① 1918年德国11月革命开始后拉狄克秘密去柏林，参加组织德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2月15日被捕，1919年12月获释。

② 莱维内，埃·（1883—1919）——德国共产党人，1919年是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首脑。德国革命失败后被战地法庭判处死刑。

③ 柯普，维·列·（1880—1930）——1921年任苏俄驻柏林代表。

关于归还穆尔给布尔什维克党的借款问题

此事。但是枉然。如果伊里奇健康的话，这件极其折磨人的事早就解决了。这件事情的拖延不决，在最近四年里严重损害了穆尔同志的健康（心脏和神经）。除此之外，他不能进行系统治疗和改善自己那不利于健康的住房条件。在他的暮年这样多的时间处于忧愁之中是有很影响的。总之，正像列宁所说的那样，为了“他在党最困难的时候所给予的无私的的巨大帮助”，不应该在物质上损害他和妨碍他完成其大量的工作和整顿自己的财务状况。

应当指出，上述的一切均属实，是有事实和数字根据的。当然，核算是用当时使用的国家货币进行的，即瑞典克朗（而不是丹麦克朗）。

计算结果如下：

借款是 32837 美元（121426 瑞典克朗），5850 美元（30000 瑞士法郎）则是因拖延而造成的损失，总共应归还 38687 美元。已付清 3608 美元（7000 卢布），还剩 35039 美元未归还。

鉴于事情长期拖延，鉴于在今年 10 月举行的政治选举以及穆尔同志想积极参加选举活动，应在最短的期限内将上述款项付给穆尔同志，以便他能够在 10 月初返回他的祖国。

№05211

关于偿付卡尔·穆尔债款的资料^①

(1926年1月6日)^②

1925年9月23日，穆尔同志向苏联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哥尔布诺夫同志提出书面请求，请求中央委员会采取措施解决他的问题，别让他死在这里；要知道，他（哥尔布诺夫）在1921年12月得到列宁的指示，要立即，即在几天内，归还欠穆尔同志的钱款。

戈尔布诺夫同志向中央委员会传达了。在戈尔布诺夫传达之后过了5个星期，1925年10月30日，穆尔同志被邀请去中央委员会，在那里办公厅主任古扎科夫同志和财政部长伊万诺夫通知他说，他的事情原则上已经解决了，将立刻付给他25500美元，伊万诺夫同志补充说，也就是在一星期之内归还。剩余的9600美元将在以后付清，最迟不晚于1926年11月1日。关于此事的执行情况将会通知穆尔同志。从1925年10月30日到今天1926年1月6日，换句话说，几乎两个月，穆尔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现在建议：穆尔同志的事情应当按照列宁的意愿最终、立刻、彻底地予以解决，将所有的欠款马上还给他，不要再继续拖延了。

理由：

① 作者不明。

② 日期根据正文确定

关于归还穆尔给布尔什维克党的借款问题

1. 偿还贷款拖延了 7 年，尤其是在最近 4 年里。

2. 在此期间这件事本来是很容易处理完毕的，对金库来说也是轻而易举的。

3. 1921 年 12 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指示将所有的欠款立刻还给穆尔同志，而且说全部事情要在几天内进行完毕。

4. 对事情的拖延不决穆尔同志是没有任何过错的。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他发了无数的信件和电报，多少次试图同权威同志谈这个问题，但这一切都毫无结果（布哈林同志除外）。

5. 为此，在物质需要上穆尔同志经常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没法就医。如今他仍然住在一间没电话没有任何设备的小而潮湿的房子里。1921 年 11 月他在十月革命后第三次来到俄国，当时身体很好。最近的四年由于操心、苦恼、着急和失望损害了他的神经，使他得了心脏病。缺钱使他身体过分紧张，引发了严重的疝气。要知道，到 1925 年 12 月 11 日穆尔同志就满 73 岁了。

6. 由于事情从 1925 年 9 月 23 日（哥尔布诺夫同志过问）拖延到 1925 年的 10 月 30 日（由中央委员会发出通知）穆尔同志失去了参加瑞士十月大选以及在议会工作三年的机会。

7. 由于从 1925 年 10 月 30 日又拖到 26 年 1 月 (!)，穆尔同志不得不在莫斯科度过一个冬天，而这正是他无论从财务、政治、健康角度考虑都非常想避开的。他的担心不幸被证实了：他患了肺炎，现在正躺在沃兹德维任卡街 6 号的克里姆林宫医院里。幸运的是，他很快就会康复。这个病和其他痛苦都应归罪于那不负责的人这样长时间地拖延此事。

8. 再拖延下去会使穆尔同志失去参加州选举和为期四年的州议会工作的机会。

9. 由于问题的拖延致使穆尔同志为抵押的证券向银行支付利息 1250 瑞士法郎，也就是 245 美元。因此，借款总额从 35079 美

元增加到 35324 美元。

10. 同时应该指出：

100000 瑞士法郎是由于还债的拖延，穆尔同志不得不在 1920 年初借贷的，为此他向银行抵押了有价证券。这些证券每年要支付 4% 的利息。银行要求为这些债款提交 9% 的保证金。因此，穆尔同志除了抵押有价证券外，还必须支付 5% 的现款。6 年利息（到 25 年 12 月 31 日）按 9% 计算是 54000 瑞士法郎。穆尔同志只按 5% 的利息计算——30000 瑞士法郎即 5850 美元。因此，穆尔同志为这不计算在内的 4% 就为了中央委员会的利益丧失了 240000 瑞士法郎即 4706 美元。这已经使他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11. 自 1926 年 1 月 1 日起这些钱的总额又增加了：从 54000 瑞士法郎增加到 55225 瑞士法郎。其次，从 30000 瑞士法郎增加到 31250 瑞士法郎，等于 6095 美元，以及从 24000 瑞士法郎变成 25000 瑞士法郎等于 4902 美元。综上所述，穆尔同志没有计算在内的为中央委员会做出的巨大损失额为 4902 美元。

除了穆尔同志因无限期的拖延至今尚未得到给他的债款，他还不得不忍受不断的损失，因为银行不会为他抵押的有价证券支付利息。

结果是，穆尔同志得不断支付利息，并且因中央委员会不归还该他的欠款而不得不过贫困的生活。

根据以上所述，再重申如下建议：穆尔同志的事情应按照列宁的意愿立刻，最终，彻底地予以解决，现在就将全部总额为 35324 美元的钱毫不拖延地还给他。

二

穆尔同志决定不动用归还给他的钱，而是只把这些钱当作资

本。他想为自己的生活，为供养靠他养活的 6 个人，只使用这些钱的利息。

穆尔同志做了相应的安排，规定在他死后，这笔钱将用于他的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

这笔钱的年利约 1500 美元 = 7650 瑞士法郎。用这笔钱 7 个人可以过上非常俭朴的生活，甚至还不够。

对此还应加上穆尔同志因年岁和身体状况而增加的支出。穆尔同志刚刚得过的肺炎是因为事情拖延不决造成的，这场病花光了他在 1925 年 9 月得到的款项。目前他还面临着一笔不小的去疗养地的旅费、住疗养院、医药以及其他各种需要的开支。这都是他在最近病了之后所必需的。

如果这件事在 1925 年 9 月时就由中央委员会彻底解决的话，这些支出以及穆尔同志健康的严重恶化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穆尔同志曾不无根据地给哥尔布诺夫写道：“不要让我死在俄罗斯”。要知道，穆尔同志所担心的，正是他无法再在莫斯科经受一个冬天。

所以，穆尔同志认为自己必须得到所提及的那笔 25000 瑞士法郎，即 4902 美元的欠款。这笔钱是 10 万瑞士法郎 6 年期间 4% 的利息以及抵押的有价证券的利息，这些利息银行是不会给穆尔同志的，而是成为银行为提供贷款所收取的 9% 的一部分。

没有这 4% 会令穆尔同志和他的亲人十分难受。这 4% 应该成为债款的一部分。由于预支款额巨大，他不得不减少应由中央委员会付给他的钱。

迄今为止，这笔数目为 4902 美元的钱款，穆尔同志没有计算，而是让给中央委员会了。但是，肺炎以及病后的身体和物质状况使事情发生了变化，迫使穆尔将这笔钱计入账上。

不过，公正和正确的做法是向穆尔同志支付全部 9% 的款项，

这是并非由他引起的拖延所造成的后果。

因此提议：

应在 35324 美元的欠款上加上 4902 美元以补偿穆尔同志的损失。综上所述，应该支付给穆尔同志钱款的总额是 40226 美元。

№05212

卡尔·穆尔致维·米·莫洛托夫

(1926年1月26日)

莫斯科，1926年1月26日

尊敬的莫洛托夫同志：

恳请您关注我的事情的彻底解决。

最近的拖延是从9月23日到10月30日，又从10月30日到现在的1月底——请看，4个多月!! ——致使我得了肺炎。

我亲爱的老朋友伊里奇如果知道他在1921年12月21日^①所作的“在几天内立即将借款还清的”指示，在四年后还未执行的话，一定会感到惊讶的。所以请您指示立刻将40226美元交还给我。^②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卡尔·穆尔

如今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从下星期一起就住在以列宁名字命名的革命老战士休养所，沙博洛夫卡14号（卡卢加广场）

① 文件上“21日”被涂去。

② 1926年1月29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决定：“今年付给卡·穆尔22000美元，时间同财政人民委员部商定，余额在支付22000美元之后一年后付给。”

№05213

克·蔡特金^① 致维·米·莫洛托夫

(1927年8月19日)

阿尔罕格尔斯克，1927年8月19日

尊敬的莫洛托夫同志：

刚刚会见了功劳卓著的瑞士人卡尔·穆尔，我现在衷心地向您请求，在他的问题上给予帮助。首先，我请求您接见和听取他的代表意见，因为他本人还病着。

下面是我对您提出请求的理由：

年已75岁的卡尔·穆尔同志其一生都是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的无私的忠诚战士。尤其是在最艰苦的时期，他准备为我们俄国同志付出任何牺牲，在政治上物质上为他们服务。

我们念念不忘的列宁就称他为自己的朋友，而我们知道，这个词他是不轻易用的。

卡尔·穆尔同志等待最终解决他的事情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因为有病的身体已经不能继续忍受这样的气候了。他想在自己的祖国为我们的革命事业奉献自己最后的力量和钱财。

其实，在原则上他的问题早已应该解决了。

^① 蔡特金，克·（1857—1933）——187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89年参与第二国际的创建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联盟。1918年参加创建德国共产党，1919年当选中央委员。1921年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当选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兼妇女书记处书记。

关于归还穆尔给布尔什维克党的借款问题

为此，我希望您——尊敬的莫洛托夫同志帮一下穆尔同志，关心他一下。

为此希望，我先致谢意，并致真诚的敬意。

克拉拉·蔡特金

№05214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摘抄

（1927年9月9日）

关于卡尔·穆尔问题

决议见特别案卷：付给卡尔·穆尔剩余的 8254 美元，认为清偿穆尔债款的问题已解决。

【专题说明】

列宁逝世后的党内斗争

(1924年1月至1929年12月)

20年代联共(布)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党内斗争的历史。列宁逝世后党内斗争连绵不断,先有托洛茨基反对派反对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斗争(1923~1924年),接着是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反对斯大林的斗争(1925年),继而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组成的“联合反对派”(托季联盟)反对斯大林的斗争(1926~1927年),最后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联合反对斯大林的斗争(1928~1929年)。这一切如果加上列宁在最后的时日提出的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建议,那么围绕斯大林去留问题展开的党内斗争,是20年代联共党内斗争的一个主题。当然,争论还涉及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如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问题,阶级斗争和强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问题,对农民的估计和集体化问题,工业化的道路和速度问题,对十月革命等历史问题的评价问题,等等。本选题所收材料多数直接涉及党内斗争,少量同党内斗争没有直接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书信往往一信涉及几个问题,无法再作细分,因此有些涉及党内斗争问题的材料往往被分到其他专题。请注意参考其他专题的资料。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黄有自、王复士、邢艳琦、夏风翻译)

№02739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① 致托洛茨基^②

(1924年1月29日)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我给您写信是想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去世前约一个月翻阅了您的那本书，停在您评价马克思和列宁的那个地方，他请我再给他读了这一段，听得非常仔细，然后又亲自看了一遍。

我还想告诉您，弗·伊·在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找我们时形成的对您的态度，直到他去世为止始终没有变。

列夫·达维多维奇，我祝您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紧紧拥抱您！

娜·克鲁普斯卡娅

抄件经我核对过

列·托洛茨基

① 克鲁普斯卡娅，娜·康·（1869～1939）——列宁夫人。189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4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起任中央委员。1929年起任副教育人民委员。

② 托洛茨基（勃朗施坦），列·达·（1879～1940）——189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先后任俄共（布）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外交人民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境。

№02740

谢·梅德维捷夫^① 致“巴库同志”

(1924年1月下旬)

亲爱的 B. 同志：

您的来信和关于巴库争论的材料收到了。同科贝泽夫同志见过面并谈过。从来信和与科贝泽夫同志的谈话中得知，您迄今尚未看过1924年1月18日《真理报》上发表的我们的文章。文章早在12月20日写成并交给《真理报》编辑部，即甚至在我们莫斯科这里争论还在广泛展开的时候。这时大家立场都已经确定，我们在文章中对争论过程中提出的各种问题都明确表了态。非常遗憾的是您没有见到这篇文章。至少现在您将拿到这篇文章了——我们请科贝泽夫同志带给您，同时作为对我们总的论点的补充和说明，还请他带上施略普尼柯夫^②同志在哈莫夫尼基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他在会上作了报告）和一份我们主要在工人支部中提出的决议。请认真读一读，您将找到您的来信中提出的主要问题的答案。请您注意，我们在这些材料中只确定了党的政策的基本方向，没有涉及在不同领域中的一些具体细节。我在这封信中只涉及那些您在读了上述材料后也许仍不够清楚的方面。

① 梅德维捷夫，谢·巴·（1885～1937）——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在红军从事政治工作，1920—1922年任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后从事经济工作。1933年被开除出党。

② 施略普尼柯夫，亚·加·（1885～1937）——十月革命后任劳动人民委员、全俄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党中央委员。1933年被开除出党。

1. 关于您的决议，应该说它对中央委员会党内政策的作用和意义界定得不准确。千万别忽略了党的这方面的政策是派生的、从属的政策。它是由基本政策——党的指导一切的经济政策决定的。

而党的基本政策归根结底是我国各种阶级力量的对比、它们在我国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和经济实力的结果。它直接由我们党的社会构成所决定，在我们党内工人群众只占党员人数的 $1/6 \sim 1/7$ 。我们是这样确定党内政策的从属性的，在我们的文件中对此也作了解释。以为可以把党的政策的各个方面分成一个个完全独立的部门或部分，而且在赞同中央委员会的基本经济政策的同时可以成功地、合乎逻辑地批判它的政策的某些部分或要点（这些部分和要点其实是这一经济政策的内容、性质和方向的直接结果），是非常错误的想法。这一错误是您的决议的主要缺点。这个缺点变得更严重，因为您在试图为自己的决议作辩护时一再强调，您决不批评，或更确切些说，决不把您在党内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意见同中央委员会的总的政策联系起来。我们莫斯科这里的“九月反对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斯米尔诺夫等同志）就因持此观点而被击败，从此一蹶不振。您也免不了这个下场，要是巴库官方党有比较老练的政治家的话。

2. (1) 在经济政策问题上，我们同样不赞同中央委员会在其决议中赋予经济政策的以及这一政策实际具有的一般性质。我说“一般性质”，并不是因为我们拥护这一政策的各个部分。决非如此。但我在这封信中不得不谈得简单些，因此只涉及这一政策的基础，而不去触及它的各个部分。在中央委员会《关于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的决议中基本的、决定一切的一点是，这一决议实质上把各种门类的国有大工业变成小农户甚至极小农户的附属物和补充。对这一农户起不了作用的一切都要被精简，被所谓的“集中”，只有在这种精简可能引起不得不长期失业的工人群众的直接的愤怒的

地方，只有在这时这一精简式“集中”才会让位于政治上的考虑。当然这只是避免了精简本身，而一点也没有解决切实保存和发展我国工业基地和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问题。凡是了解或愿意了解我国工业的简史的人，很容易发现我国工业的重要部门（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采煤业和石油业以至整个燃料工业）在其产生和发展阶段都没有依靠过农户，而是以铁路和公路建设，以不断扩大国民经济中的各个工业部门为基础的（给这些部门提供材料、机器、工具等等），以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用于国防”的大量经费为基础的。与上面那些消费者比较，全体农民只花费了极少量的钱，甚至不是这些重工业部门的有分量的补贴来源。而现在中央委员会却宣称，这一农民市场对国有工业来说是它不能逾越的界线，中央委员会正是要按照这一方向来解决工业的全部问题，我们自然认为这一政策是对大工业和工人阶级存在本身的直接威胁。而与此同时，首先威胁到工人阶级通过十月革命取得的各种直接的成果。

我可以在这里给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例如巴库的石油工业由于这样的政策而处于什么样的境地。由于我们现在还有相当数量的煤油、汽油和矿物油的储备，也由于这方面的需求暂时极其有限，所以现在根据党的上述经济政策的一般性质，巴库和格罗兹尼的整个石油加工工业将紧缩，石油的开采将只集中于开采燃料用的石油。这就意味着我们必然要在上述石油工业部门精简工人骨干，同时也将收缩我们的物质基础。

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决议为我们执政的最近时期制定的党的经济政策的基本性质。依我们看，其中隐藏着威胁工人阶级利益和国有大工业今后前途的巨大危险。

(2)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党内政策的一个方面，看一下党即得到绝大多数党员支持的领导人对所谓的“新经济政策”的态度，那么这一危险就变得更加可怕了。

他们直到最近都把这个政策描绘成社会主义的迂回运动。

他们过去认为通过这一只是暂时的、由于严酷的需要压力作出的迂回运动来为农民的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冲击和与他们有着紧密联系的城乡商业资产阶级提供某些自由发展的可能，以便同时在这一时期以最大的努力去恢复和巩固我国国有大工业统治的物质基础，并借助已经获得加强的国有工业开始同新经济政策的必然发展和自由买卖市场上的私人资本作斗争。

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这样来谈问题了。相反，现在我们听到的几乎是对这一无产阶级的敌对势力强迫我们采取的政策的一片欢呼声，而这表明“这一政策现在从一种需要变成了最高的政治美德”，即这一政策不再是为了拯救我们的胜利成果而被迫作出的退却，它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我们惟一可行的经济政策，是巩固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中取得的全部成果的政策，是旨在巩固并且实质上包含着直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

因此，如果您注意到对所谓“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态度（新经济政策事实上是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利益的直接体现，宣布实行这一政策也是为了减轻他们在政治上的冲击），那么把国有大工业变成只是小农户的经济需求、他们的有限的日常家庭生活和农民群众的个人需要的附属物的方针，就变得对工人阶级的基本成果更大的危险了。

(3) 我们现在每有 100 万人工作，同时就有 100 多万人失业。

农业，首先是富农和较为殷实的所谓中农群众的进一步的加速发展，是我们衰败的经济的非常进步的现象，但必然会导致排挤经济上最少保障的农民群众，首先是过去的工人，使他们涌向各个城市。

现在这种蜂拥而来的现象已经规模越来越大。此外，在欧洲承认我们之后，我们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将更加密切，而这意味着我们

要在我们本国的国有经济中在经济及其发展水平上赶上欧洲。

至于我国农业（其大部分是小农农业）的发展，应在国际农产品销售市场上不仅赶上欧洲，而且赶上美国，而这将使我国农村中最弱的农户受到进一步的排挤，自我消失，也就是说越来越多地把这些破产群众推向城市。要是我们这时国有工业部门的情况比现在更糟，我们不能保证现有的失业者获得劳动的机会，那么一小撮波拿巴主义的坏蛋就有可能试图推翻我们，而且他们的这些尝试可能不会遇到那些饥寒交迫的广大城市失业群众的应有的反击，这些群众在这种境遇下可能不仅是消极的，而且其中受苦最多的一部分人甚至可能会对这样种种情况的凑合表示同情，指望私人资本的统治虽然使他们受到残酷的剥削，却有可能使他们不会饿死。这样的情绪不仅失业的工人群众有，而且始终提心吊胆怕被精简的那部分还在工作的工人也有。

要是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不幸，那么根据上述设想我们更难指望得到农村贫民的支持。

难怪在争论期间确凿无疑地得出结论：这些农村贫民正在从党的队伍中退出。

因此，我们不赞成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因为这一政策从内容来看近期基本上旨在保留、巩固甚至发展小农经济、它把整个工业政策只是放在当前小农经济的需求的基础之上。

我们认为，小农经济和极小农经济在国内实行新经济政策和依赖于国际市场的形势下注定只能在野蛮的条件下苟延残喘以至必然毁灭。

拯救小农经济、帮助它站稳脚跟并以目前的形式发展下去，这一切尝试都是反动的空想。

这些破了产的农民群众要摆脱这样的处境，只能指望正在发展起来、日益壮大的国有工业，在国有工业的舞台上这些农民群众才

能施展自己的身手，发挥自己的力量。

小农群众幻想苏维埃政权必然会拯救他们，也能拯救他们不致毁灭，条件是为他们保留资本主义的竞争和自由贸易，任何对这种幻想的支持都只能是在政治上腐蚀他们，使他们更加抱住这种幻想不放；使他们不断要求国家用国家经费对他们作各种施舍，以弥补根据世界市场确定的他们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和他们用以维持个人和经济生存的最低费用之间的差距。这些特点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至今还存在。今后，在中央委员会决议制定的经济政策断言可以更广泛地发展这一小农经济的条件下，这些特点必然将更加扩大，耗光本来就有赤字的国家预算，成为工人阶级更加沉重的负担，因为正如中央委员会决议所说，这些施舍国家主要是取自“国有企业和国有财产的收入”，即来自对国有工业工人的加倍剥削。

除了上述群众之外的乡下人是农村富农庄稼汉资产阶级，他们对我们的敌视并不亚于旧社会的资产阶级。

我们除了同他们作残酷的政治斗争，别无其他选择。

这就是我们在党的经济政策问题上意见分歧的基本实质。我们认为这一政策优先照顾占农村人口 6/7 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益，而不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针对这一政策提出了什么呢？这就是：

(1) 把经济政策的主要中心从农民经济转移到大工业，转移到恢复、扩大、发展大工业和将一切国有资源都用于这方面。这一政策将为城市无产阶级群众的迫切利益和农村由于上述原因日益破产的半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服务，而似乎是对这些农村半无产阶级群众的嘲弄，越是丰收，大工业的发展对他们的打击就越大，因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劳动产品将最不值钱。

这一政策还将为我们的共产主义目标服务。它是惟一正确的和现实可行的共产主义政策，能保证我们最少痛苦地解决小农问题和

巩固小农在我们共和国中同工人阶级结成的政治联盟。

(2) 在提出这样的建议时，通常引起恐慌的问题是：用于这方面的资金从哪里来？我们没有这些资金。对此我们的回答是：虽然我们并没有用于这方面的足够的资金，但我们在现在的预算中毕竟还有这样的资金，但它没有被用来发展国有大经济，而是用来支持殷实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和支持小农的上述空想（我们的党自己在加强这一农民阶层的空想）。

(3) 我们认为，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状态及其上述前景下，向愿意帮助我国萧条的工业区复苏的国际资本作出巨大的物质牺牲，与在最近几年中我们的工业和农业所处的和可能遇到的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状态相比，是一个较小的祸害。

以为在工人阶级目前在国家政治中所占的比重的条件下，我们可以通过财产所得税制度收集到振兴萧条的工业所需的资金，这是在用无谓的幻想来自我安慰。

以为我们只能比较长期地从工业自身中“一戈比又一戈比，五戈比又五戈比”地积累起这笔资金，这是小农的幻想加城市小资产阶级追随者的幻想。用这样的积累方法我们需要花上50年。我们还不知道大约要多久才能清除我们国家预算中的赤字——在这种情况下谈真正的积累只能是一派胡言。

这就是我们不同意党的经济政策和现行的与农民相互关系的体制的基本点。这一政策的结果目前已经沉重地压迫着工人群众，今后将更加沉重地压迫他们。

以为他们今后仍将服服帖帖地逆来顺受，那就是对周围的现象视若无睹或者是对这些现象的意义毫不理解。

3. 我们党的国际政策同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国际政策一样，是我们国内政策在国际舞台上的继续。

我们的政策在国内方面的特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表现在国际

方面。这一政策的主要缺点在于它总想把一切都说成是我国的繁荣。

取代“工人政府”的所谓“工农政府”，是以我国的方式方法去解决西欧工人运动基本问题的毫无希望的尝试的表露。这在事实上自觉不自觉地导致失败，但这一政策经常是贬低最有组织和觉悟的西欧无产阶级群众的作用，企图在西欧各国最缺少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和“农民”中寻求支持。但是西欧并没有我国革命爆发时的那种农民。这种农民在近东和远东有。但我们现在知道依靠农民的尝试，如在保加利亚，导致了什么结果。共产国际强加的这一政策导致了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崩溃。

我们同样还知道，甚至在农民的芬兰“工农政府”这一口号也比任何其他地方更难获得成功。

这就是我们的国际政策的主要方向。这一方向决定了共产国际企图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采取的策略的性质。在所有这些对国际革命举足轻重的中欧国家中，这一策略导致无产阶级中的共产主义力量脱离了整个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并作为最革命的一部分与其他无产阶级群众对立起来，因为后者似乎不能自觉地参加工人群众的革命行动，这就既瓦解了工人阶级总的运动，也瓦解了无产阶级中的共产主义力量，使他们脱离了全体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群众，从而失去了对其队伍中的这些群众不断施加影响的可能性。我们最坚决地反对这一政策。我们认为脱离绝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群众或与之相对立，就毫无可能加速西欧事态朝革命方向发展。我们主张共产主义工人群众仍然应该是工会、合作社、苏维埃、工厂委员会等等中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坚决拒绝任何试图违反这些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的意愿夺取这些组织中的权力或自绝于这些群众另立类似组织的尝试，因为这是瓦解工人运动的冒险行径。

这就是我们对国际政策问题的大致态度。

既然我们迄今仍需要西欧无产阶级的支持，那么现在当我们同欧洲的联系正在扩大和形成时，我们更百倍地需要这一支持。但是我们由于通过共产国际捍卫和推行了不断贬低最有组织最有觉悟的工人的政策，使我国的工人群众与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完全隔绝开来，使西欧无产阶级中的共产主义力量与西欧的无产阶级基本群众完全隔绝开来。

企图机械地把我们的工作方法搬到各西欧国家去，只会导致我们在挪威看到的那种情况。通过这个例子特别鲜明地看到，这些尝试简直使这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瓦解了；利用俄国工人群众的财富来扶植和养活物质力量不强的“共产主义”支部，而这些财富是俄国工人群众用血汗和牺牲换来的，他们在当前的条件下却不能把这些财富用于自己身上。

事实上形成了一群用俄国的资金养活的、装扮成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中的所谓“革命工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奴才。

共产国际试图用来争取西欧工人群众的方法是明显行不通的。这些方法不仅不能使我们与有组织的国际无产阶级群众接近，反而使我们与他们远离了。

无产阶级领导人即我们的党的领导人看到这些失败，就在这些群众之外寻求对自己的政策的支持，例如鼓吹美国租地农场主比美国有组织的工人群众更革命。

因此，只要再向这些农场主走一步，他们就自然成了美国共产党人的整个活动中应该基本指望的惟一的“共产主义”基础。类似的探索在其他所有的欧洲国家中也在进行。这些探索表明，在我们党的领导人的领导下，共产国际的政策由于在无产阶级中遭到失败而完全转向了小资产阶级、私有主阶级。这些阶级越来越经常地与工人的阶级联合组织对立，而后者最有能力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只

是还缺少有组织的领导。

既然共产党对它们保证实施这样的领导，那么它们将成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时的首要力量。这就是我们整个国际政策中的主要缺点。

产生这一缺点的原因在于对尚未追随共产主义口号的西欧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联合组织的不断攻击诽谤。这种做法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十分有害。

我们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评价与我国领导人所给予的评价相差很大。

他们把这些党所有领导骨干都看成是叛徒、变节者、资产阶级的奴仆，等等。这既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样也针对其他社会民主党。

光凭这一事实就完全可以摒弃对这些骨干的这类评价，因为这类评价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把他们说成是西欧迄今仍由资产阶级统治的基本原因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这种评价显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会使我们走进死胡同。

这样解释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使人看不到光明的前景，因为既然构成西欧社会党领导层的工人阶级最有觉悟、最有组织、最守纪律的骨干都是叛徒、变节者等等，那么还有谁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体现者呢？

其实，在西欧各国广大工人群众看来，这些人不仅丝毫没有出卖工人阶级的丝毫利益，相反，他们在无产阶级群众的眼里是最忠于他们利益的工作者。

正因为如此，社会民主党人才仍然如此强大而有力量。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仍然博得无产阶级群众如此深挚的信任。

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很容易就能解释广大工人群众对这些党和领袖的这一评价。同工人群众的紧密联系，工人群众对他们的深挚

信任，都是由于这些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从来不把全体工人群众的日常需求和个别类别工人的局部要求同他们的革命利益对立起来。相反，他们认为这一利益主要体现在对工人群众日常需求的满足上。

广大工人群众的这些局部需求的成功实现，不管是削减工作时间，提高工资，还是提高他们在国家或市政管理中的作用，他们有时都认为是一场革命。而由于国际无产阶级有着许许多多这类需求，所以他们信任那些巧妙地保护他们，帮他们战胜日常灾难的人，而不是那些一味许诺美好前景的红色幻想者，让前者来领导他们的斗争，就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了。

这就是我们至今见到的西欧各社会党同本国工人阶级的联系极其牢固的基础，尽管这些党的领导层在群众斗争的十分重要的时刻的行为有时确实是罪恶的。

我们从对社会党及其领袖的作用的这一评价出发，才认为为了争取西欧工人群众，共产国际没有必要不断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组织及其领袖斥责为变节者、叛徒，等等，这样做争取不到这些群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耐心等待，学会捍卫工人群众的日常需求，从而更有力地向他们揭示那种以为满足这些需求会从本质上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状况的假设是凭空虚构的。

除了争取西欧的无产阶级群众联合组织外，应该坚决抛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企图。

最后，应该坚决改变同目前形成的这些联合组织的相互关系。

我们根据实际情况认为，像“红色工会国际”^①这样的组织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把俄国工人群众和西欧共产主义群众同整个无产阶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群众分隔开的工具。这个组织是毫无道

^① 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领导的国际工会联合组织。1921年7月在莫斯科成立。由洛佐夫斯基任总书记。1937年停止活动。

理地妨碍建立各国和国际工人阶级真正统一战线的直接障碍。

这就是我们同目前党的领导人在国际政策问题上的主要分歧。

4. 现在来谈谈列宁同志的逝世。

列宁的去世当然是一件令人痛心的大事。但是世界上一切事都是相对的。我们决不会像我们党内某些人那样从此认为未来毫无希望，工人大批加入党的队伍这一事实更加强了我们这一看法。我们认为，工人大批入党从表面上看同列宁同志的逝世时间正好吻合。但决不应该把这件事看成是列宁同志去世的直接后果。这是俄国工人群众继8~9月为改善糟糕的生活状况而进行的群众性罢工之后第二个积极行动。我们认为这一行动是最积极的群众为在党内找到改变自己迄今为止的艰苦的物质状况的杠杆、迫使党在其日常政策和工作中站在工人群众利益的立场上而进行的尝试。我们认为这一点是我们工人阶级、我们党和我们本人都非常值得欣慰的。

看到这一现象，我们感到为把我党变成真正的工人政党所作的努力已经得到很大的满足。不管这一运动囊括了哪些工人，我们认为都是好的。

即使这些工人不是最有觉悟的人，我们也一点不感到担心。相反，这使我们更加相信，党在这些也许是最不觉悟，但是最广大的群众的压力下将更快地、被迫地采取使党和工人利益密切起来的政策，因为正是这些人的直接利益才是工人群众的利益，而他们的直接压力比这些群众中最有觉悟的人的压力更能保障今天的直接利益。

工人大批入党不能不对党的经济政策产生影响。例如，关闭500个工人中有10~15名共产党员的工厂，要比关闭同样数量工人中有150~200名党员，甚至有60~100名党员的工厂来得容易得多。光凭这一点就会使我们感到十分高兴。当然我们不应当由于这一现象而庸俗地认为，这些工人群众纷纷入党是“为了学习列宁

主义”，要为他们马上开办尽可能多的“党课、培训班、党校等等”，应该看到这样做有直接的危险，不仅会使刚入党的人，而且弄得不好还会使早就入党的人马上离开党的队伍。

现在来谈谈争论的结果。

关于“新方针”问题本身，以及争论及其结局基本上都与列宁的去世毫无关系。这一方针像争论过程本身一样，早在关于列宁可能去世的任何推测出现之前很久，甚至是在全俄代表会议之前就出现了。

因此，不能把这些事件都联系起来。对于你们的主要问题：“难道一切全完了”，我们的回答发表在1924年1月18日《真理报》刊登的我们的文章中。我们在文中明确地论述了由于什么原因决定了从第十次代表大会后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工人民主给彻底埋葬了。在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的报告的速记记录中还有进一步的阐述。

一切看来如此简单，如此明白，似乎没有必要对此再作专门的解释。

我们认为，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前我们的党的社会成分已经十分复杂，由于激烈的争论几乎分裂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代表大会上和会后，中央委员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千方百计建立党的统一，因为没有党的统一当然就有再一次爆发国内战争的危险。第三点，工人阶级中有前途的惟一派别是“工人反对派”^①，正因为如此，关于“统一”的决议的秘密条文所提出的种种指责和打击都是针对“工人反对派”的拥护者的，针对主张坚决保护我国无产阶级群众的直接利益的人们。

^① 工人反对派——1919~1922年俄共（布）党内出现的具有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派别。代表人物有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谢·巴·梅德维捷夫、亚·米·柯伦泰等。

第四点，中央委员会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在党内实行工人民主原则吗？当然不能。实行工人民主原则就会使中央委员会第二天就面对全党工人群众团结在“工人反对派”周围的事实，使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上制定的，后来至少在黄金债券、粮食债券等等问题上直接反对这些群众利益的经济政策绝对无法实施。

实行工人民主原则就不允许实行构成中央委员会从那时起的政策的基本内容的“集中”，即压缩经济。

一方面是上述这一切，另一方面是党本身的占压倒多数的小资产阶级成分，这些小资产阶级成分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的积极拥护者，而不会成为工人民主的积极拥护者，而工人民主不仅能保证每一个党员在党的活动中的积极参与，而且还要求使党的活动朝着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方向进行，使这一活动贯串着工人的精神和利益。正是这两个基本条件决定了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仍然无法实施，尽管决议对工人民主原则作了种种重大的限制。

请你们自问一下，这些条件中哪一条有了重大的改变？如果改变了，那么是朝哪一个方向改变？这样你们就能为你们的那个“难道”找到明确的答案。现在，这一情况使在某些地方十分积极支持“九月反对派”的工厂和大学的工人群众大吃一惊。目前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幻想感到大失所望，对在目前党的构成下实行工人民主的可能性、对“九月反对派”感到大失所望。但一切失望和苦恼都无非是他们幻想的结果。如果您也迷恋于这种幻想，并因此而大失所望，那是十分可悲的。

我们相信，您根据所有的材料将不难解决有关过去和目前时期的一切问题。

我的信就写到这里。

我本打算写得简单点，但结果正如您所看到的，写成了一整本小册子，但如果这一切能有助于弄清迄今不清楚的问题，那么我不

会为花了两整天给您写这封信而感到惋惜。

在结束这封信时，我强烈希望您能更牢固地保持同新的工人骨干的联系，因为他们在您的地区无疑也会以工人入党的行动来响应全国的这一行动。

如果读了这封信还有问题没有弄清楚，那请您不要放弃合适的机会进行联系，我们可以再向您补充介绍一些情况。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代表我们全体（签名） （梅德维捷夫）

还有一个最后的坚决的强烈的请求。

如果您需要保存这封信，哪怕只保存一段时间，那请您尽可能用打字机复制一份留下，千万把此信原件寄给我。我这封信不是一下子写成的。因此写得有些潦草，需要修改。在写信时我被打断不下上百次，因此您自己就可以发现哪些是添加的内容，应该加在什么地方。我不能重抄一遍。我再说一遍，请千万把信寄回给我，尽可能不要太久。

（1924年1月下旬）

№03135

波克罗夫斯基^①：回忆列宁

(在红色教授学院的讲演速记记录)

(1924年2月7日)

同志们，我提议起立悼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同志们，已经作过九次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报告，但从来也没有把他作为我所了解的有血有肉的人来谈论过。其原因很简单，即这些报告都是讲给文化水平不高的所谓广大听众的，给他们留下的关于列宁同志的印象，必须是一个政治伟人。临结束时，我通常还要讲上几句描述列宁本人的细节，但都是些纯属外表的东西，谈谈他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是什么样的，这通常都是听众很感兴趣的。不过我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为一个人，一个有个性的人，对他的性格特点的这种那种描述，你们都是不想听的。我想，你们自己读过大量材料，在以政治家伊里奇为题的报告中，我不想以此款待诸位。至于作为一个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么叫叶·〔甫盖尼〕·阿〔列克赛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②讲这个题目会更好些，因为他比我更接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允许我抛开这两个题目。

① 波克罗夫斯基，米·尼·（1868～1932）——历史学家。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5月起任副教育人民委员。

②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叶·阿·（1886～18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1921年任中央委员，1920～1921年任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1921年起先后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教育总局局长、《真理报》编辑等职。1937年被处死，后平反。

剩下的就是在两个题目中选一个。一是从西欧这个历史侧面讲列宁。可我记得，〔在红色教授学院〕就有西方历史部，我今天不讲这个，因为我不知道，也许我做的历史比较不很成功。〔不过〕，如果诸位想听，我也不妨讲讲。然后〔我〕就给你们讲我亲眼目睹的伊里奇。

正如我们已经开过的各种会议所表明的那样，我们有些讲列宁的人更多的是讲自己；我不讲自己，但出于历史准确性的需要，我将不得不根据我自身的感受来谈伊里奇。请允许我这样来回忆伊里奇，说说他在我的经历中的地位，我在这里简要地向你们介绍一下。你们当中有些人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工作时间还不很长，不可能看到最近18至20年间〔的党〕，所以对这些人来说，我讲的里边会有点新东西。

我们习惯于把列宁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化身。近些年流传着一个笑话，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列宁的，一般是针对党的首脑人物的，它也讲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笑话讲：马克思坐在那儿，以后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别的人，恩格斯坐下，以后很长很长时间再没有别人，然后是李卜克内西^①坐下。同样也可以说：列宁坐着这个位子，以后很长很长时间也不会再有别人。但列宁在党内的地位特殊，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化身，这是非常新鲜的现象，是在十月革命期间甚至十月以后形成的，甚至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情况还不是这样。

至于我开始回忆的更早一些时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诚然，列宁同志刚出现的头些年，即九十年代这一时期的历史画面，我无缘得见，我们当中也没有一个同志能讲出这一时期的列宁的情况。

^① 李卜克内西，威廉（1826—190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

我从1905年开始回忆起。可以说，当时他只是在同样的一群人中居首位，党中央那些最亲密和最有影响的委员和他十分接近。不能这样描绘：列宁一人坐在那里。立即来了波格丹诺夫^①，人们谑称他是大管家——这句话是从伊洛瓦伊斯基^②的教科书中借用来的。亚·亚·波格丹诺夫是这个〔布尔什维克〕王国的大宰相。因为他一直待在俄国并直接管事，而在1905年以前伊里奇侨居国外，因此波格丹诺夫对党的政策的影响比列宁大。当时党中央执行一条生硬的路线，其表现是：人们每走一步都要提出最后通牒——你是我们的人或者不是我们的人，并且不是我们的人大多是不了解阿芬那留斯^③和马赫^④等人的人。这条路线不是伊里奇的路线，它太不像他了；这是一条波格丹诺夫路线，1905年10月以前它一直占统治地位。他的最后表现是试图向彼得格勒苏维埃提出最后通牒。这表明，在多大程度上伊里奇是“同样一群人人中的为首者”。（紧跟在波格丹夫后边的）还有其他一些人，其代表人物是英诺肯基·杜勃洛文斯基^⑤，还

① 波格丹诺夫，亚·亚·（1873～1928）——俄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医生。1896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被选入多数派常务局，在党的第3、4、5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1905～1907年同克拉辛一起领导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技术小组。1909年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中央。1911年脱离政治活动。1928年因在自身做输血实验失败去世。

② 伊洛瓦伊斯基，Д.И.（1830～1920）——俄国历史学家，著有俄国史和世界史教科书。

③ 阿芬那留斯，理查（1843～1896）——德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经验批判主义创始人之一。

④ 马赫，恩斯特（1838～1916）——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经验批判主义创始人之一。

⑤ 杜勃洛文斯基，约·费·（1877～1913）——俄国革命活动家，布尔什维克。1903～1905、1907～1910年为中央委员。1913年死于流放地。

有半传奇性人物“尼基季奇”——地下的克拉辛^①，他是大人物之一，还有其他人。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伊里奇；我以十分好奇的目光观察他的专政，但不是作为业已完成的事实来观察，而是作为一个刚刚开始和正在形成的、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漫长过程来观察的。

1905年首次在日内瓦得到的有关伊里奇的印象，带有更多直观性质。伊里奇完全不修边幅。请看这副十分标准的画像，那上边画的列宁完全被欧化了，一点儿也不像1905年的伊里奇。根据党内同志们的回忆，他那时头发蓬乱，胡子根本不是欧式的，他穿的衣服不知是侧扣紧领衬衫，还是短上衣。我的印象是这样的：他扮演普加乔夫^②不用化妆。请原谅我出语不敬，这是一位典型的人民的、庄稼汉的领袖，与其说是无产阶级领袖，莫如说是农民领袖。假如把这一点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发现，即发现了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相提并论，这是可笑的。这个发现是他的不可磨灭的功绩。不管怎么说，他的外表更像农民，只有细看他的动作，他才更像无产阶级的样子了。

我从未见过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更明确坚定的动作。这个人从不做犹豫不决的手势。他走起路像飞驰的子弹，体型稍有不同的人，笨重的人，总免不了有与他相撞的危险。我还记得，在代表大会^③召开之前，他是怎么在伦敦赶我们的：一刻钟走三俄里。我

① 克拉辛，列·波·（1870～1926）——1890年加入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派。1905～1907年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战斗技术小组领导人。十月革命后历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交通人民委员。1920～1924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0～1923年兼任驻英国全权代表和商务代表。参加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此后先后任驻法国和英国全权代表。

② 普加乔夫，叶·伊·（1740～1775）——俄国农民起义领袖，顿河哥萨克。

③ 伦敦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5次代表大会，1907年5～6月在伦敦召开。波克罗夫斯基是大会代表。

一辈子没走过这么快。这种难以置信的速度，坚定的信心，明确的动作和毫不动摇，给人的印象是无产阶级的，但他的衣服和他的胡子却像个手艺人。这是一位典型的人民领袖，他和现在的标准像很少有共同之处。我在1905年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上看到的，几乎仅限于这种直观的印象。这位人物太伟大了，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认清和理解的。

我那时听过一个报告，这是一个有伊里奇特色的报告，那时他是我们之中处首位的人，但还不是左右局面的人。现在假如伊里奇随便作个什么报告，那它无疑会被奉为指示的。他那时是在日内瓦作报告，谈武装起义问题。这似乎应当被看成是表达全党的意见的报告，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见解虽然新奇有趣，但远远没有得到所有其他人的赞同。我记得，在我出境前参加的一次莫斯科委员会会议上，曾提出过一个问题，即如何利用我旅行的机会做些技术上的准备工作，在瑞士购买机关枪。这些枪是尚采尔假冒汽车部件买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化名马拉^①的著名莫斯科活动家，一个威严而干劲十足的人物，在谈到列宁的怪想法时说：“谁相信武装起义？这大概是10年以后的事，我们连像样的罢工都搞不起来，而你们却大谈武装起义。”当然也没给我任何有关机枪的指示。我本人记得，当勒柏辛斯基及其夫人^②将几本谢韦尔采夫的名为《巷战术^③》的几本小册子缝进我的衣服里时，我觉得这是多余地加重负担。在

① 尚采尔（马拉），维·列·（1867～1911）——布尔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领导人和1905年12月武装起义准备者之一。

② 潘·尼·勒柏辛斯基（1868～1944）和奥·波·勒柏辛斯卡娅（1871～1963），革命活动家。

③ 谢韦尔采夫，即菲拉托夫，弗·弗（1879年生）——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其小册子为《人民起义中策略和街垒之运用》。

愚昧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甚至连罢工都懒得参加，还会有什么巷战，有什么武装起义！但伊里奇讲了武装起义，论证了它的必然性，而只过了7个月，即到12月，莫斯科的街上就打起来了。武装起义已是既成事实，而我们甚至认为，起义迟了点儿，应当在10月，而不是在12月。这个人多么有远见。这是我在1905年夏的第一个印象。

下面我回忆1906年，那时伊里奇正在莫斯科筹备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①。这次我依稀记得的就是那双套鞋，我因没有经验而穿着它和伊里奇坐在一起。我们谈到了武装起义。我已经认可了武装起义策略，并有幸参加莫斯科委员会的战斗组织。有些人记得此事。我已不像1905年夏天那样看待武装起义，已有所不同，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搞革命。我说，这种事可以干，但不必去说它：干吗满世界地大叫大嚷？这件事应当搞，应当准备，而且我们也正在干着，我们满莫斯科转，寻找可以穿过的院子，而施特恩贝格则带着测量仪，量将来射击的角度。但为什么要把这些写出来？我还记得，伊里奇惊讶地盯着我说：“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我们既然要领导工人阶级，我们就应当向他们讲清楚，我们要把他们带领到哪儿去，不能瞒着工人阶级，不告诉他们我们准备领导他们搞武装起义。”而我在当时就连这些起码的东西都不理解。

关于伊里奇在II……协会处所几乎被捕这件事，人们写了许多东西，我就不再讲它了，我想把话题转向下一段，即伦敦代表大会前的一段时间，这次大会从另一个侧面向我展示了伊里奇。在同志们的回忆录（我也许会宣读）里谈到我们在伦敦代表大会

^①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4次代表大会，1906年4—5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的统一代表大会。

前召开的那次会议^①，会上为这次代表大会拟定了决议，还制定了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策略。那里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即当伊里奇拥有多数的时候却服从少数，原因是他觉得，从各种资料看，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站在这个少数一边。我不记得这件事，但那位同志讲得十分肯定，他说这使他大为震惊，因为伊里奇拥有8、9票，却和只有2票的工人妥协，其中一个托姆斯基^②，另一个我不记得了。这就是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得到充分展现的伊里奇式党内“外交”的开端。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我们的处境十分复杂。孟什维克则处于少数派地位，如果算上代表团中的无产阶级部分，情况就更是如此了。不过，还有一些中间集团。崩得分子^③中有相当多的人站在孟什维克一边。拉脱维亚人和我们站在一起，但这是个小组。最后，起初还有一个秘密因素——波兰人；从情绪上看，他们好像是布尔什维克，但一系列原因妨碍他们和我们联系。按情绪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但在组织上，他们和我们又没有联系，原来妨碍这样做的是波兰人的傲气，高傲自大使他们不愿服从俄罗斯佬。于是就在这个基础上演出了一场戏，我清楚地记得这情景，因为我也不得不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

① 波克罗夫斯基是指1907年2月15~18日召开的彼得堡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中部工业区区域局、《无产者报》编辑部代表会议，会上讨论和通过了列宁提交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

② 托姆斯基，米·巴·（1880~1936）——1904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当选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加创建红色工会国际，任总书记。历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等职。1936年自杀。

③ 崩得——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1897年在维尔诺成立，1921年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共（布）。

伊里奇打算把头把交椅让给梯什卡·约吉希斯^①，即罗莎·卢森堡^②的丈夫。我坚决反对这样做。我的发言激昂慷慨，有点夸夸其谈，在9~10个人里显得有点怪。我说：“伊里奇是我们的旗帜，大旗必须迎风招展，他应当成为我们的领袖。”他对我向来十分尊重，不管我讲了什么蠢话，他从来不说什么，但继续执行自己的路线。把头把交椅让给梯什卡这件事没办成。罗莎·卢森堡知道梯什卡不是当领袖的料。波兰人有组织地和我们一起投票，我们成了伦敦代表大会的多数。这就是第二件事，显示出伊里奇很会掌握党内的分寸。他自己没有毛遂自荐，但什么才是重要的呢？重要的是领导布尔什维克。他自己清楚地知道，如果说谁有资格坐头把交椅，那当然是罗莎·卢森堡，而不会是约吉希斯。但罗莎发表了精彩绝伦的长篇讲话，她和我们非常密切地联合起来了。而列宁则把位置让给梯什卡，说既然他是这么一位尊贵的先生，那就让他当一把手吧，有什么办法！

伦敦代表大会后，我常与伊里奇在芬兰碰头，次数很多。我是作为一个不存在的机关报的编辑部成员被派到那儿去的，是去充当一个近似和事佬的角色，并不特别光彩。^③伦敦代表大会后，中央委员会是联合性质的委员会。需要在中央机关报安插一个没棱角的人。我独具这种可悲的性格。虽然我们的中央机关报并不存在，也

① 梯什卡（约吉希斯），扬·（1867~1919）——波兰和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之一。1907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5次代表大会，当选中央委员。德国斯巴达克联盟组织者之一，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19年在狱中被杀害。

② 卢森堡，罗莎（1871~1919）——波兰、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和德国共产党创始人。著有《资本积累论》（1913）、《国民经济学入门》（1925）等。

③ 波克罗夫斯基是指根据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联合（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的定期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

未出版，但我却几乎天天和伊里奇接触，常到他的家里去，参与他的各种谈话。他有一个特点使我大为惊讶。我们时代的这位出色的革命家，同其他人相比是个出色的保守人物之一。当时他对我并不友善，而且我知道他对我的否定评价，这是亚·亚·波格丹诺夫好意告诉我的。他说：“您在伊里奇心目中会完蛋的。”我爱发表奇谈怪论，爱异想天开，我的这种习惯伊里奇不喜欢。他认为波克罗夫斯基喜欢标新立异，别出心裁。这对我来说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他是那么保守，巴扎罗夫^①来到库奥卡拉，向他证明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发生革命的时候会变成阻力，障碍，而不是领袖，它将妨碍运动。伊里奇激烈反对这一点。他说：在考验到来之前无论如何不能这么讲，等大战爆发了，那时再看。大战爆发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彻底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不会有更多的幻想了，但他坚持己见，说道：倍倍尔^②是位老革命家，我从不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认为他会背叛革命，会充当您所谓的绊脚石的角色。那时，波格丹诺夫极“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极右。我不想多讲他在库奥卡拉说了些什么，那些细小的，在家里说的话，这类东西俯拾皆是。这是最突出的。

现在我给你们讲讲 1909 年我们的分裂，然后再讲布列斯特和约^③。这两次我在政治场合，在非常严重的场合，就近看到了伊里奇。关于 1909 年的分裂，可以说这是伊里奇拼命要摆脱波格丹诺夫专政的尝试，因为后者虽不敢要求伊里奇向马克思宣誓效忠，但他却要求所有人这样做。当杜勃洛文斯基追随普列汉诺夫反对波格丹诺夫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布尔什维克中央

① 原文如此。这里应是波格丹诺夫。

② 倍倍尔，奥·（1840～1913）——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创建人和领袖之一。

③ 布列斯特和约——1918年苏俄同德国签订的和约，苏俄被迫割地赔款。

提出了一个问题，要给杜勃洛文斯基纪律处分。伊里奇表示反对并声称：党不需要经验一元论，它是有害的，这儿更需要马克思主义。这引起一片哗然。我曾收到波格丹诺夫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反对伊里奇这个疯子，伊里奇怎敢否定他那已被各级组织确认的布尔什维克的党的哲学？当时伊里奇干了一件巧妙的事。他研究哲学著作，而且十分认真，以致已经能够写出论经验一元论的小书。但他转向了政治方面，我怀疑，哲学策略正是反映了成熟的政治冲突。

伊里奇不可能不清楚，尖锐的革命时期，即革命的第一幕已经结束，我们面临的不是短短的暂停，而是长时间的幕间休息。这和现在西欧革命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我们这里的问题是什么？是暂停还是幕间休息？当时就我们的革命进行过这样的争论。波格丹诺夫和我这个喜欢激烈争论的人，都认为这是暂停。革命母亲躺下休息一会儿，但必定起来，开始左冲右突。伊里奇倾向于认为这是幕间休息，他开始研究当时他已感觉到的预期中的高潮的经济方面。

与波格丹诺夫彻底决裂发生在1909年夏。这是市场行情转折时期，确定无疑地显现出上升的势头，我国的工业在飞速前进。你们许多人都清楚，我国1907~1908年的持续危机，并不是与俄国的起义有关的俄本国的危机，而是阻碍俄国发展的整个欧洲危机的反映。但到1909年，这场危机已不能阻止俄国的发展了。对经济考察影响了伊里奇的决定，因此这场争论表面上是派别之争，实质上是政治争论。出现了一场布尔什维克的大争论。召开了会议，我得到了一份用密写墨水写成的通知书。这是一封内容天真的信，信中说，您对这封信要像对我一样热情。我在烛火上烤信，但遗憾的是信被烤焦了，字迹难以辨认。因为我派性十足，所以我认为这是有人故意干的，目的是不想让我了解会议的议题。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的。

我一到柏林就去找克拉辛，他对我讲述了一切，我做好了准备。^①我在政治上是和列宁完全一致的。我坚信，必须改用新的方法和手段的时刻会到来，因此，武装起义的口号虽然非常漂亮，但目前还不应作为当前政治口号提出，因为今天还不可能开展群众运动。列宁也持这种观点，他鼓动工人读《俄国报》附刊。我在政治上赞同列宁，但我对这件事又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我们确实离伊里奇所说的决定成败的阶段不远了。我说，再过三四年我们又将陷入极端危急的境地。俄国将再次出现革命形势，为这三四年是否值得毁掉战线，改变口号？我整天和伊里奇坐在一起，和他就此进行争论。我说，改变口号会在工人群众中引发改良主义情绪，以后过三四年又得重新准备武装起义，这必定会再次出现。我记得，伊里奇对我谈了他的想法，这个思想就是在这次革命进程中我向你们阐发的思想。他对我说：“请勿担心，阶级矛盾如此尖锐，资本主义发展速度如此迅速，这些矛盾的积聚如此之快，俄国工人如此具有革命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目前应当利用合法条件、合法出版物和国家杜马，因为您本人也同意，我们面对的是幕间休息期，革命不是停顿两年，可能要停顿五六年，若是我们在这三四年里睡大觉，那么孟什维克就可能真的成为垄断者，而且孟什维克的垄断有可能向民众扩展。”在这里伊里奇是正确的。当时存在种种情况，关于这些情况人们谈了很长时间，这些情况导致我这个列宁的拥护者加入了“前进”集团^②，但我很快确信，这是个人的集会。这个“前进”集团没干成任何事，它开始衰败并迅即消失了。波格丹诺夫不久也退出了这个集团，后来又离开了党。我不能赞同他那

① 波克罗夫斯基是在1909年4月出国的。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前进”集团建于1909年。其成员企图把宗教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否定布尔什维克的把合法形式同非法形式结合起来的斗争策略。

种脱离政治的纯文化传播立场。这些动摇和文化传播倾向极具特色，不过由于我是在谈列宁，而不是波格丹诺夫，所以我就不再详谈这个问题了。

这些事都发生在1909~1910年，此后六年直至1917年秋我一直未见过伊里奇。纯粹出于派性，我不再和伊里奇打招呼了，和他在国家图书馆碰面^①，他装作不认识我，我也装作不认识他。派别间的礼节就是这样。战争期间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有所改变。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使包括马尔托夫^②在内的所有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都成了兄弟。当时在巴黎出版了“最优秀的”社会民主党的报纸——马尔托夫的《呼声报》^③，我们全都在那儿争斗。我主要就文学问题和伊里奇进行论战。我在这方面持有自己的观点。我证明，战争不完全是帝国主义战争，其中也有非帝国主义因素，伊里奇用他的中央代表的职权对付我，我的文章没能在《民主党人报》^④上发表。我论证，战争不仅仅决定于帝国主义因素，这从历史上看可能是正确的，但从时评角度看却毫无意思，但对伊里奇来说，处首位的是政治因素。

1917年我返回俄国并立即开始了我和伊里奇的冲突，但这已不再是广泛的政治层面上的冲突，而仅限于较为狭窄的教育问题方面。这个范围是相当狭窄的，但却属于一般政治范围，由于我们在国内战争期间没有进行动员，所以我还不得不在更大的政治问题上和他打交道。当时伊里奇令我大为惊异，特别是现在，当我确知他那时是什么心情之后。

在彼得堡，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有一个关于德军情况

① 看来是指巴黎国家图书馆。

② 马尔托夫，尔·（1873~1923）——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

③ 《呼声报》（《我们的呼声报》）——孟什维克报纸，1914~1915年在巴黎出版。

④ 指《社会民主党人报》。

的报告。三万德兵起义；为镇压起义，德国不得不从前线撤走若干个师，因此报告称，在这种时刻同威廉^①媾和只会白白败坏自己名声，这是一步错着，我们应当利用和谈进一步瓦解德国军队，应当通过我们那些德国谈判的首脑向德国民众和德国士兵讲话；另一方面就是拖下去，因为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德国就会出现一个斯巴达克派的政府。这就是托洛茨基的说法。我带着特殊使命被派往布列斯特。当时怀疑加米涅夫^②同志执行现实政策，想和德国人签订和约，我受命监视加米涅夫，以防其执行现实政策。我因情况不明，不能提出异议。但是什么令我感到惊异呢？是伊里奇没有告诉我：您甭把这些嚷嚷当回事。无论如何必须签订和约？不。他也谈到加米涅夫的现实政策。他本人当时对此事作何看法？我以为，像1909年一样，他受制于波格丹诺夫，于是奋起反抗；1917年12月亦复如此，他受制于托洛茨基，于1月中旬起来反抗，但那时他认为反抗时机不成熟，因而重复了托洛茨基提出的政治路线。

到达布列斯特后，我受到现实政策的某种诱惑，因为事情很清楚，德国人迫切需要媾和，他们甚至打算在对我们有利的条件下签订和约。但越飞^③得到非常严格的指示，严禁实施任何现实政策，而我们则通过德国人的首脑进行交谈。而后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来了，做了一个极富鼓动性的演说，它使切尔宁伯爵^④非常兴奋，但德国人执行了现实政策，他们与乌克兰签订了现实的和约。只是到了后来，即在1月，并且是在我们一无所知的情况

① 威廉二世（1859～1941）——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

② 加米涅夫，列·波·（1883～1936）——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等职。1936年8月被判处死刑，后平反。

③ 越飞，阿·阿·（1883～1927）——1918年布列斯特和谈期间曾任苏俄代表团首席代表。后历任驻柏林、中国、奥地利全权代表。

④ 切尔宁伯爵（1872～1932）——时任奥匈帝国外交部长。

下，在1918年1月，伊里奇非常明确地表示：“革命空谈已经够了！”他开始论证，无论如何必须签订和约。如果我了解伊里奇的情绪，如果他能显示出这种情绪，那么不言而喻，二月份布列斯特和约的悲剧就决不会发生，革命的俄罗斯就不会跪在德国面前，处在自杀的境地。俄国甚至同意让出所掌握的部分俄国领土，只有个附加条件，即它要等战争完全结束后再让出来，因为那里有它还需要的工厂。此外，它还提出对利巴瓦和里加实行共管。剩下红色爱斯特兰和芬兰。由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芬兰苏维埃被扼杀了。我们本可以用便宜的代价换来和平，只因伊里奇没能坚持自己的意见，致使有利时机被错过了。

以上就是我能向你们讲述的有关伊里奇的支离破碎的回忆。

现在我把伊里奇和以往的革命领袖作一对比。

第一个对比是文学作品中早已写到的，即与克伦威尔^①对比。看起来伊里奇很像克伦威尔。这是我根据外表想到的。有什么相同之处呢？一方面，纯属治国之才，外表极端朴实，处事简洁明快。卢那察尔斯基^②对克伦威尔这个方面有很好的描述。他被描绘成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不拘小节的人，一看就是个经验丰富和理智健全的人。虽然这种比较似乎使伊里奇荣幸之至——拿他和17世纪的伟人相比，但这在两个方面终归是极不正确的。第一，在下述方面恐怕是不确切的，即克伦威尔是个士兵和军人。由于我们用阶级观点看待英国革命，克伦威尔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被掩饰了。使克伦威尔显得突出的首先是著名的突击，铁骑突击。这种突击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克伦威尔创建了议会重骑兵，即胸甲骑兵——这在那

① 克伦威尔，奥·（1599～1658）——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独立派领袖。1659年建立军事独裁统治，自任护国公。

② 卢那察尔斯基，阿·瓦·（1875～1933）——苏联教育家、艺术理论家。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后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时是决胜的武器。他成功地创建了议会重骑兵，证明可以击溃鲁普雷希特^①的胸甲骑兵。其次，克伦威尔是一个神秘论者。他是士兵又是神秘论者，他言必称上帝，而且是很虔诚的。很早以前就流传一个传说，它把克伦威尔描绘成一个狡诈的伪君子。此人坚信自己是个可怜的普通人，但上帝领着他，他的心灵能感受到上帝的呼声，我们大家都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人。

如就这些性质和特征而论，那么这就使〔克伦威尔〕成了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刚好相反的人，因为伊里奇是我们时代最先进的人士之一。伊里奇可以宣称，他能听到革命的声音。然而，克伦威尔生活的时代，他生活的世纪，是伽利略和牛顿的世纪，他们都是同代人，而在这时代出来一个人说，上帝领着我。在已证明上帝不存在的时代，克伦威尔却说上帝领着他。他是由加尔文^②开始的最后一个人，他是最后一个加尔文宗的信徒，这就说明了他的命运和英国清教徒运动的命运。

这种学说不可能有所成就，这样的领袖也不可能有所成就。最后克伦威尔还是一无所成。在他死后立刻开始了反动。统率一支身披盔甲的大军的领袖，如果从卢那察尔斯基的另一个剧本里找样板，那就是梅菲斯托费尔率领同另一支军队打仗的身穿锈甲的军队领袖，这样的领袖是不会有成就的。克伦威尔即是这样一支由死人（当然不是指肉体死亡）组成的大军的领袖，他们都很强悍，但却是落后的人们。他们不是其时代的先进分子，而是有神秘论情绪的人；他们更像是十六世纪上半叶的人，而不像十七世纪中叶的人。

如果在新教复兴时代寻找列宁的相似者，那最好是加尔文，尽

① 鲁普雷希特是英国国王卡尔一世的军事长官。

② 加尔文，J. C. (1509~1564)——法国人。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宗创始人。

管他根本不像列宁。他是个干巴巴的人、教条主义者，是个彻头彻尾的教授。但他站在运动的前列，他向前看，而不像克伦威尔那样向后看。奇怪的是，他在创建战斗的新教时，外表上使人想起伊里奇行动的日子。假如你们想想日内瓦时期的加尔文，你们就会立即感到某种相似的东西。首先，是城市，它首先是国际中心，这就是日内瓦。在这个城市里，一方面有市议会，新教牧师会议，而另一方面……它没有任何权力，但它说什么，市议会就必须听从。这又像是我们的宣传政治局。加尔文创建了未来的战斗的新教，而我们创立了战斗的共产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十六世纪的新教浪潮，形式上很像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浪潮。我请大家注意，有这样一种形态学的形式特征的社会学规律，它们在相同的客观形势下，能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给出相同的结果。在也许只在某种程度上相似，而不是就个人而言，把干巴巴的加尔文教授比作我们朝气蓬勃、风趣幽默的伊里奇是不合适的。

下面我谈较为熟悉的时期，因为你们不研究英国革命，而研究法国革命。我现在讲罗伯斯比尔^①。我认为，和伊里奇相比，如果可以比的话，优势也是在伊里奇一方。诚然，我从未专门研究过罗伯斯比尔，过去我研究过克伦威尔，但不管怎么说，我通过普通读物对罗伯斯比尔有足够的了解。罗伯斯比尔不具备伊里奇的基本特征——见多识广，博大精深，随机应变。

我要讲完了。伊里奇是个能从最广阔的角度看待一切现象的人。罗伯斯比尔没有这个特点：他这个人极端狭隘，是个宗教神秘主义者，有致命的弱点。罗伯斯比尔的敌人形容他是在巴黎圣母院作弥撒的反动分子。这个特点使伊里奇和罗伯斯比尔有天壤之别，

^① 罗伯斯比尔，马·（1758—1794）——法国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领袖，革命政府首脑（1793—1794）。

它向我们说明，伊里奇何以未遭遇热月，尽管马尔托夫等人也向他预言过。但是列宁避免了热月，也使我们免遭其难。这是个最为突出的特点，由于其政策极为博大和灵活，他从来未曾陷入罗伯斯比尔使自己陷入的境地，就连左派都参与了致罗伯斯比尔于死地的阴谋。因此，与克伦威尔和罗伯斯比尔相比较，优势无疑是在伊里奇一边。简而言之，作为历史事实，必须承认，在这三位革命领袖中，列宁无疑是最伟大的。即使做最坏的假设，即在列宁去世后我们没能坚持下去，但列宁主义作为一种着眼于未来的学说，它将一国接一国地蔓延下去，将在东方传播，掌握中国和印度，它将以其革命学说在西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沿神秘主义路线引导英国思想的过清教徒生活的克伦威尔能这样吗？神秘主义破灭了，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了胜利。神秘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了三百年的世纪性争论。因为不可能证明列宁的思想会遭受诸如失败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未来的数十年，数百年，历史将在列宁的旗帜下前进。值得我们骄傲的是，我们有列宁作为指引未来之路的典范。

这就是我过去在一个地方做过的历史对比，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些对比。

最后还要和俄国的历史做个比较。在俄国以往的历史中，有没有能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无产阶级革命相比美的细节。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商业资本主义曾凶猛地闯入俄国并取得了胜利。我们有比这更重大的东西，所以拿伊里奇和彼得时代相比是勉强的。如果我们硬要在这里对比这两位历史人物，那么用以和克伦威尔及罗伯斯比尔做比较的那类材料，这里根本没有。彼得不明白他在做什么。我们事后把他描绘成一位商业资本主义领袖，但如果当时有人对他说：“彼得·阿列克赛耶维奇陛下，你是商业资本主义的领袖。”他听了可能会说：“疯子，打他一百棍！”他把握的是外在方面——欧洲的衣服，欧洲的技术，超出这些他就不懂了。他

不理解他率先经历的过程本身。他经常在各种矛盾间打转儿。他一无所成，因为除了技术方案，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的计划。由于技术受经济支配，必须把技术置于经济计划的基础之上，所以彼得的各项改革都没有成功，而只是自发地把商业资本主义引进了俄国。但这并非出于彼得的本意。这位俄国历史上的伟人无法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相比，因为他不是新的意识形态缔造者，他只不过是盲目的历史的庞大工具。如果从意志方面看——这是正确的。彼得的改革事实上是彼得格勒的革命——这是巨大的努力。布尔什维主义不是这样，它并不仅仅局限于意志。光是彼得改革的这个方面，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以使它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及其领袖相提并论。

这就是我想对我个人关于列宁的回忆补充的几点简短的感想。

№02741

克拉辛和托洛茨基的来往便条

(1924年)

致克拉辛

您同支援化工建设志愿协会有联系吗？有联系的打算吗？

托洛茨基

致托洛茨基

我未正式参加，因为工作负担过重，绝对无法参加会议等活动。说实在的，我完全同情并准备在必要时予以帮助，况且我本人过去就是搞化学的。现在我不知道，哪些地方需要以哪种方法提供这种帮助。

我准备就此问题先商谈一下。

克拉辛

致托洛茨基

(1924年5月14日)

进一步扩大预计将为2000万。

整个问题是，棉花收购如何实际进行。收获季节正在结束，而市场上却棉花紧缺。最近的两、三周会显示出，棉花市场能否向我们提供 3000 万而不是 2000 万卢布的棉花。

* * *

现正在进行的毛纤维谈判应当查明，我们可获得的信贷到底有多少。

这关系到如何确定用于采购皮货、糖及可能还有电子技术材料需追加的款项。

尚需一至一个半月整个运动的情况才能搞清楚。

克拉辛

1924 年 5 月 14 日

于劳动国防委员会

致克拉辛

列·波·：

请就是否可能凭有经济保证的期票发放短期专项贷款的问题提出建议。

托洛茨基

1924 年 5 月 17 日

于劳动国防委员会

致托洛茨基

我想，皮达可夫可以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商银行里初步

地大致拟就这样一份清单。

通过经济会议的函询很可能会抓住类似波泽尔恩的黄金组合那样的机会。

用3至4周可以完成全部工作。

克拉辛

1924年5月17日

于劳动国防委员会

致托洛茨基

每一家外国公司均专营一项业务：黄金、毛皮、石油，等等。

从政治上讲，不能也没有必要让外国人加入综合商社董事会。

在经济上，每一个外国公司自己也不会什么都去关心，而只会关心某个特定行业。

〔克拉辛〕

1924年5月17日

于劳动国防委员会

致托洛茨基

我认为在最近一个时期，美英关系恶化是不太可能的。

您很难想象，美国人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的孤陋寡闻达到何种程度。他们在一个长时期内还不敢同英国争吵。

克拉辛

致克拉辛

列·波·：

您错误地以为美国近期内将追随英国。

恰恰相反，由于美国正重返世界市场，可以预期它和英国的关系将会严重恶化。

托洛茨基

1924年6月18日

致托洛茨基

是事实，然而却是：

(1) 此想法本身不是斯托 [莫尼亚科夫]^① 的，而是李维诺夫^② 的。

(2) 除了我和克列斯廷斯基^③ 之外，他未告诉过任何人。

(3) 克莱诺夫 (?) 本人在其信中证实，讹诈的图谋，即用这种威胁来暗中对斯托莫尼 (亚科夫) 施压，出自马尔察恩。

① 斯托莫尼亚科夫，波·斯· (1882~1941) ——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起历任苏俄驻柏林商务代表，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副外交人民委员。

② 李维诺夫，马·马· (1876--1951) ——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苏俄驻英国全权代表。1918年起先后任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副外交人民委员、外交人民委员，驻美大使等职。

③ 克列斯廷斯基，尼·尼· (1883~1938) ——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十月革命后任俄联邦财政人民委员、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等职。

整个这件事（全如马克思所言）都源于亚历山大远东银行的施莱辛格和马尔察恩集团利益。他们在睡大觉，以为担任大使或起码是商务代表的是柯普^①，而不是斯托莫〔尼亚科夫〕、斯塔尔科夫^②和克列〔斯廷斯基〕。

* * *

我由巴黎带回几个租让问题。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可以同您谈谈？

〔克拉辛〕

1924年6月18日

* * *

昨天人民委员会组建了消除旱灾后果特别紧急委员会。

〔克拉辛〕

1924年6月25日

于劳动国防委员会

* * *

我总的想法是，不应当组建特别（第1001个）委员会，而本应当：（1）责令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特别全权委员会承担起同歉收后果作斗争的职责。

① 柯普，维·列·（1880～1930）——1919～1930年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系统工作。

② 斯塔尔科夫，瓦·瓦·（1869～1925）——189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曾任苏联驻德国副商务代表。

(2) 为达此目的，加强特别全权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增派斯维杰尔斯基^①、哈拉托夫^②和波波夫^③参加三人小组。

(3) 利用特别全权委员会的整个组织，甚为重要的是，要利用同该组织挂钩的地方基层组织。

(4) 如事态发展确需要吸收军事部门参与，则可再增加第七名领导成员。

* * *

瞿鲁巴^④对此已同意，如果李可夫也赞同，我拟提出重新审议人民委员会决定的问题。

[克拉辛]

1924年6月26日

于劳动国防委员会

致克拉辛

我不理解，那笔拨给您用于采购的5000万卢布的外汇在这些

-
- ① 斯维杰尔斯基，阿·伊·（1878～1933）——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工农检察院院务委员。1923～1928年任俄联邦副农业人民委员。1929年起任苏联驻拉脱维亚全权代表。
- ② 哈拉托夫，阿·巴·（1896～1938）——苏共党员，十月革命后历任俄联邦粮食人民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主席、全苏发明家协会主席等职。
- ③ 波波夫，帕·伊·（1872～1950）——1924年加入俄共（布）。1918年起任中央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 ④ 瞿鲁巴，亚·德·（1870～1928）——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粮食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职。

交易中起什么作用。

托洛茨基

国家银行显然把这 5000 万卢布的外汇视为已花了的（作为计划外业务），即好像我们即已无这笔卢布，也无这笔外汇。

〔克拉辛〕

国家银行工作的帷幕正一步步地在揭开。

而在舍印曼^① 时期我们绝对得不到任何工作报告。

〔克拉辛〕

1924 年 7 月 2 日

于劳动国防委员会

* * *

今天关于斯托莫尼亚科夫的决定决定了他的命运：我们在失去一位比柯普更优秀的、第一流的并且极为忠诚的工作人员。

〔克拉辛〕

1924 年 7 月 3 日

于政治局

* * *

^① 舍印曼，李沃维奇（1886—1944）——1918年起任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副财政人民委员。

列宁逝世后的党内斗争

关于材料我还要考虑考虑；目前尚未考虑成熟，近日先送上札记。

[克拉辛]

1924年7月9日

于劳动国防委员会

* * *

昨天，在我这里召开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特别全权委员会会议。因为我是主席，怎么也无法脱身。

[克拉辛]

1924年7月12日

于劳动国防委员会

* * *

世界上最大的骗子当属英国的法学家和被交口称誉的英国法庭！

* * *

您见了这封信吗？我觉得，措辞不够谨慎，可能为曲解提供借口。

* * *

只有克列斯廷斯基的妻子突然患病才可能再成为一项借口。

[克拉辛]

1924年7月12日

于政治局

* * *

唇枪舌剑。

[克拉辛]

1924年7月18日

* * *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一个企业的资本额不大，其周转额却在逐年增加，赢得一笔又一笔新信贷，并成功地开拓新的出口领域，且从未卷入风险交易，这就意味着，这家企业是健全企业。这里的奥秘是，商业企业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组织和善于经商的人员。资产阶级的商业大厦就是这样组建起来的：常常由5戈比铜板起家，过了5年却掌握了几百万。在这一点上起首要作用的是个人首创性、能力和机敏的因素。

[克拉辛]

1924年7月18日
于劳动国防委员会

* * *

造纸厂的设备已老化，这运行很昂贵。化学纸浆和木材纸浆工厂还都没有。

* * *

石油设备（钻探、采油）不值一提。（有一蓝笔批注“不在格罗兹尼”。——托洛茨基注）。用我们的储存设备不能储油。不能收集油气。炼油厂简直是破铜烂铁。没有输油管线，也没有运油船队。这样怎么能低损耗运行，怎么能同美国竞争呢？

* * *

我们的锯木厂在技术上比瑞典差许多，而且几乎到处如此。

[克拉辛]

1924年7月21日
于劳动国防委员会

* * *

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一位和主要的任务是彻底更新几乎整个工业的设备的问题。

我们的工业设备已经不能生产出廉价产品，即使管理很好也是如此。

没有贷款，不根本改变租让政策，问题便不能解决。

克拉辛

这个说法不对。我们扩大并改善生产的贮备还相当多。

[某人附笔]

1924年7月24日
于劳动国防委员会

* * *

列·达·！

休假期间（M.R.）拉皮罗夫—斯科布洛同您联系过吗？我们想派他去伦敦，到商务代表处技术部任职，而他认为这取决于您是否同意。我想，他在那里还可以为科技处工作。在伦敦住上两年，他会学到很多东西的。

[克拉辛]

[1924年]

№04419

失业者致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信

（不晚于1924年5月23日）

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同志。

抄送：伊万诺夫同志（乌克兰）及同全体贫苦人民志同道合并同情他们的所有同志。

生活没有着落的工人和职员（真正的无产者），劳动者向你们致以问候。

我们十分理解并高度评价你们为改善工人和职员生活条件所作的一切工作和努力。

我们是生活没有着落的工人和职员，目前失去了工作和某些生存手段。我们恳求你们考虑这些，杜绝这些现象并履行自己的口号：“不劳动者不得食！”——我们请求给我们工作，我们要吃饭。

你们因“纪念列宁吸收党员运动”吸收了20万产业工人入党而沾沾自喜，但是，请你们相信，这些人入党只是因为每个人都清楚：“如果他不是党员，那么迟早要失去面包，即丢掉工资，因为工资对一个人来说就是面包。”同志们，你们中间谁也没有严肃地谈过百万失业大军的问题。然而这是事实，在苏联境内失去工作、忍饥挨饿和无家可归的人不在少数。

如果只从表面上看，以为人们有吃有喝，无忧无虑，那就会犯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样的大错误。失业大军——这是数以百万经常挨饿的群众，每个月加入失业大军队伍的劳动者都同仅仅为了自身的保障而入党的人一样多，达数十万人。如果你们提出

一个口号：谁不登记入党，谁就不会得到任何权利和职务，那么请你们相信，明天你们统计一下入党人数就不会是 20 万，而是几千万了。

同志们，为什么你们谁都不谈及这么多贫困挨饿的失业者，只为了纪念列宁吸收党员运动中有 20 万人入党而沾沾自喜呢？这样也好，我衷心的希望俄国共产党把你们的失业者都扩充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到那时，请你们相信，大大小小的协约国就会惊慌起来，争先恐后地向你们献媚，并且会先后“正式”承认苏联。到那时只有你们是最好的榜样，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内所有人都生活幸福，丰衣足食，被压迫的无产者这时将成为资产阶级。同志们，你们将成为“全世界的明灯”。我们斗胆告诉你们，同志们，失业——就是忍饥挨饿和无家可归，而这种人在生活中是什么事都不怕的。

我们对伊万诺夫同志（乌克兰）关于“必须考虑扩大工业规模”的建议表示衷心的祝愿，并且希望俄国共产党能拥有更多这样有思想的党员，从而使党有更多的保障。扎哈罗夫同志讲话，他建议，托洛茨基同志到工人中间去，不让任何人认出他来，这样一来，他可以了解到很多情况。这是对的。但是，同志们，如果你们到工人中间来，不让他们知道，你是党员，那你就会了解到很多情况，还会了解到在生活必需品比战前贵了 3~5 倍的情况下，一个有 7、8 口人，月收入仅 25~35 卢布的有家室的工人、职员的生活状况——对于那些对苏联忠心耿耿，而不只是表面忠诚的贫雇农们，你们要有信心。

请给我们一份工作，让我们赚到一块面包，以使家庭不至于饿死在那些“优雅”和“辉煌”的地方。

一群失业者

请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宣读。

No 02759

托洛茨基致格拉兹曼

(1924年7月26日)

抄送伦茨涅尔

我需下述资料：

(1) 布尔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① (1905年)曾在“报刊述评”栏刊登过对我有关十月罢工一文的简短评论，我记得，评价很高；

(2) 在《开端报》^② (1905年)的“报刊述评”栏，我曾就列宁与那些要求分裂圣彼得堡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争论作了评论。

托洛茨基

1924年7月26日

资 料

1905年11月15日《新生活报》第13号

俄 国 报 刊

《开端报》第一号已出版。我们欢迎这位战友。在第一号中托

① 《新生活报》——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份合法报纸，1905年10—12月在彼得堡出版。

② 《开端报》——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05年10—12月在彼得堡出版。

洛茨基同志对 11 月罢工所作的出色描述引人注目。

1905 年《开端报》第 3 号

报刊述评

列宁同志在《新生活报》上热情评析了工人代表苏维埃 11 月 14 日的决定。

“工人代表苏维埃遵循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指示，决定向工人揭穿反革命的阴谋，并且告诫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切勿上当。针对各个击破的企图，工人代表苏维埃号召把全俄各地的斗争联合起来，采取紧急措施巩固革命工人同革命农民、同在俄国各地开始起义的那些陆海军部队的联盟。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定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此。”^①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2 卷，第 100 页。

№02761

俄共（布）中央全会讨论加米涅夫和 索柯里尼柯夫^① 报告的速记记录

（第二次会议）

（1924年10月26日）

关于伏特加酒

托洛茨基：同志们，我完全不清楚该如何对待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即人民委员会决定把果酒的度数再提高10度的问题。党内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显而易见，这一通报如能获得通过，则将得到批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需要单列，最好把它单独列为一条，反正得加以讨论，因为这个问题意义重大。至少实质上这是实行酒类国家专卖的准备工作。尽管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说，这同酒类专卖的问题毫无联系，这只是把果酒度数由20度提高到30度。既然伏特加酒是40度，那么这种30度的果酒就正处于以前的果酒和早就议论要专卖的伏特加酒的中间值上了。我认为，这一问题必需讨论。这一问题当然可以从一般性辩论中分出来。我本来想就该问题登记发言，但又担心它会打乱其他问题的辩论，因为

① 索柯里尼柯夫，格·雅·（1888～1939）——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9月～1921年3月任克伦斯基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土耳其斯坦事务委员会主席。1921年11月起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2～1926年任俄联邦财政人民委员。1926年起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1928年起任石油章迪加主席。1929～1930年任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1922～1930年为中央委员。

这是一个专门问题。不过这个问题是不能绕过去的。

* * *

我只想作几点说明。我觉得，这个问题未按常规审议。这个触及到广大群众生活的问题至今未在党内讨论过。不错，它曾数次被提及，但一直悬而未决，而在苏维埃内这个问题却逐步有所进展。

我想，这种做法不对，因为不论中央委员们对这个问题态度如何，现在再要扭转难度很大，即使中央委员会决定这样做也是如此。这形成了置我们于既成事实之前的局面。很清楚，把30度果酒的问题和伏特加酒问题分开既不正确又不严肃。很明显，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种不露声色地逐步实行伏特加酒国家专卖的办法，而不是一下子解决这一问题。

即使从经济角度看这种办法也极为有害，因为一旦采取这一措施（我认为它是危险的、有害的），一旦真想这么办，那么，在实施时应当面对全国地图去设想一下，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办法一方面通过这一极为有害的措施来取得虚假的利益，另一方面尽可能使其不良倾向和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

譬如，在同几位可能拥护这一在我看来不能采取的有害措施的人个别谈话时，有人对我说，这一措施可以在农业地区——如西伯利亚——实行，而不在城市实行。我反对这种说法，其根据是，如果我们在小范围内——如在远东——实行，这不会带来多大利益；而如果我们在大范围内实施，由于在我国农业地区占主要地位，伏特加酒不可避免会流向城市地区。

总而言之，这一措施只有作为大范围的计划措施才可能进行讨论。

而现在我们的做法是手工业办法。

席上插话：应当制订限额。

托洛茨基：会上几位同志已指出过，甚至面包限额也难于实行。我不知道，果酒限额是否行得通？

起码我们今天面临的处境是我们的农村在喝私酿酒。有人对我们说，果酒是同私酒作斗争的手段。这一手段在多大程度上是现实的呢？

席上插话：是现实的。

托洛茨基：它在多大程度上现实，我对此根本不相信。两者必居其一：或者我们想真正增收，即生产得贵，还想卖得更贵——那么农民就宁可喝私酒；而倘若我们想同私酒竞争，那么我们就不会有能起激励作用的国库收入。当前我们正在异常激烈地开展意义重大的提高劳动生产率运动，不可能预先提高工资，而这时使相当于伏特加的果酒合法买卖就等于把工人的工资砍了一刀。当然，可以设想一下，再过三、四、五年，如果产量再增加，成本更降低，反私酒的机构更完善，那时我们才有可能去夺取农村的酒类市场，就是说，国家将出售，譬如说，占酒类消费50%的果酒。不过，要知道这一措施对我们不是再过五年，而是在现在这一紧张时期特别重要。况且，这一措施带来的国库收入在当前时期是微不足道的，而这种收入首先将取之于工人的工资。这个问题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党内都未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报刊上一度提出过，不过讨论却中断了。这一问题从未提交政治局讨论，从未提交过。至少我就从未参加过这种讨论。我认为，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是绝对不正确的。我想，应当中止这一措施，交由党内讨论；要知道，如果我们推行这个措施，党将不得不承担责任。在党内，在党代表会议上讨论这一措施是绝对必要的。

№02762

托洛茨基：我们的意见分歧^①

(1924年11月)

本说明的目的

现在就我的《1917年》一书进行的争论（争论过程表明，这本书仅仅是一个借口）提出了数不胜数的涉及事实、原则和个人的问题。我想在这里就那些按我的理解触及党的利益的最大的问题作出说明。

1. 说我打着隐蔽的“托洛茨基主义”旗号修正（修改、篡改）列宁主义，是这样吗？

2. 说我从特殊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视角为自己的《1917年》一书写了前言，甚至为了贬低列宁主义而错误地说明了一系列问题，是这样吗？

3. 说我的前言是一个“纲领”，说我总的来说把在党内组建“右翼”作为自己的任务，是这样吗？

不言而喻，问题不仅在于我想说些什么，而在于如何能说得明白。要知道，可以这样来看待这一问题：托洛茨基并没有有意识地

^① 在手稿左上角有托洛茨基手迹：“仅此一份。未付印。”1924年托洛茨基为他的文集《1917年》写了一篇前言《十月的教训》。该文发表后立即遭到格·季诺维也夫、列·加米涅夫、埃·克维林、奥·库西宁、格·索柯里尼柯夫、约·斯大林以及《真理报》编辑部（尼·布哈林）的猛烈批评。为回答这些批评托洛茨基写了《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但未发表。

力图用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对他的这种指责太没有根据了。不过，托洛茨基不理解列宁主义或者列宁主义的某些重要方面，因此，托洛茨基尽管并不愿意也并未使劲去做，实际上却歪曲了列宁主义，为与列宁主义势不两立的集团提供了思想纲领。另一方面，也可以作如下假设或设想：过去的条件，列宁逝世后形成的严峻形势，以及这样或那样的个人情况造成了一定的成见，以致在根本不存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地方，或者至多在出现不可避免的基于布尔什维主义共同基础的思想差异的地方发现了“托洛茨基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我对党作的说明可以和应当达到什么目的呢？

第一，我觉得应当把我想说的说清楚。第二，至少在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消除曲解，如果有这种曲解的话。通过这种办法至少可以设法消除出于误会或带成见的诠释所造成的凭空虚构的分歧。光是这一条就能带来巨大的好处，因为这有助于揭示，说我——有意无意地——用托洛茨基主义的特殊路线来对抗列宁主义这一主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指责，是否多少有一点儿严肃的切实的依据。倘若在消除各种误会、个别错误、带成见的诠释等等之后，仍然发现存在着这样两条不同的路线，那么，当然就不能掩饰这一极为重要的情况。党应当竭尽全力，采取严厉措施来保证自己的革命方法、自己的政治路线、自己传统的统一，即列宁主义的统一。如果这样，某些指责我在推行特殊的、非布尔什维主义路线的同志却发誓不予“惩处”，则是不正确的。然而我丝毫也不相信会有这种结局，尽管争论已扯得很远，尽管已经向全党就我的书和我的立场作出了一定的解释。

我这一说明的任务是，试图证明把“托洛茨基主义幽灵当作党的危险是没有根据的”。不言自明，我不可能全部涉及近来撰文谈“托洛茨基主义”和抨击“托洛茨基主义”的同志所引用的数不胜

数的论据、文字、语录和暗示。这样做既不合适也办不到。我想，如果我从解释我的前言的一些结论入手，对于问题的实质和对于读者将更为有利，因为正是这些结论被说成“托洛茨基主义”最为突出或最为明显的表现，并且恰恰因此成了当前整个这场运动的出发点。我希望就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来证明，我对十月革命的阐释不仅遵循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且与列宁就同一些问题的十分精确具体的评价和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也不能仅囿于这种解释。问题在于，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指责本身，如果其依据仅仅为近几年来我的声明、言论和文章，看起来也是相当缺乏说服力的。为了使这一指责能有分量，有作用，还把我过去的过去的政治经历即我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之前的革命活动也牵扯了进来。我认为有必要对这方面也作出说明。这就是本文的基本内容。

倘若我认为，我的说明会对争论火上浇油，——或者有权决定本文是否刊登的同志直接并公开对我说出这一点，——我会放弃刊登此文，尽管蒙受否定列宁主义的指责令我心情十分沉重。我会对自己说，我只有等待，党内生活较为平静的时刻会给我机会，哪怕是迟到的机会，来驳倒错误的指责。不过，我感到，公开的说明——即就对我的基本指责作出答复——在目前的时刻不会更加激化党内的气氛，相反会使之缓解，使问题适可而止。

确实如此。如果党内确实存在反对列宁主义路线的托洛茨基主义路线，这可能就意味，这是不同阶级倾向的初始斗争。那么，任何说明都无济于事。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清洗自身，才能存在。可是，如果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并不存在，如果托洛茨基主义幽灵，一方面是革命前的过去的反映，另一方面是列宁去世引发的多疑虑

的结果；如果不从档案中翻出托洛茨基致齐赫泽^①的信之类就无法真的再现托洛茨基主义幽灵——那么，公开的说明就有所助益，就可以消除积淀下来的旧成见，就可以驱散幽灵，就可以净化党内气氛。这就是本说明的目的。

过 去

上文业已述及：在争论中把我的《1917年》一书的前言同我的全部活动联系起来，把它说成是极力想取代列宁主义、成为党的学说和党的政治方法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表现。

这样来提出问题，就不得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党的注意力从现在和未来转向过去。党内经常引用旧的文献，旧时论争中说过的话，等等。在这些材料中，尤其是印发了1913年4月1日——即几乎12年前——我写给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杜马代表齐赫泽的一封信。这封信不能不使每一个党员产生甚为恶劣的印象，特别是对那些未曾经历战前侨居国外条件下派别斗争考验的党员来说更是如此，这封信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这封信是在派别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候写成的。现在再来谈写这封信的一些细节已经毫无意义。只要提一下造成写信这一事实本身的原则性原因就足够了。这种原则性原因就在于，我当时对孟什维克所持的立场大大有别于列宁的立场。我当时认为必须争取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在一个党内联合起来。列宁认为必须进一步同孟什维克决裂，以期从党内清除资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的基本根源。很久以后，我曾经写道：我的基本政治错误就在于，我未能及时看清

^① 齐赫泽，尼·谢·（1864~1926）——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918年起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首脑。后流亡国外。

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的原则性鸿沟。正因为如此，我未能理解列宁既反对孟什维主义又反对我本人所维护的调和主义路线的组织—政治斗争的意义。

那些使我在好些年中与布尔什维主义分道扬镳，在许多情况下同布尔什维主义尖锐对立，水火不相容的深刻分歧，体现得最为鲜明的恰恰是如何对待孟什维克派的态度。我根据的是一种根本错误的前景，即革命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群众的压力终究会迫使两个派别走上同一条道路。因此，我认为分裂是使革命力量毫无必要地在组织上瓦解。而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对分裂起了积极作用，因为列宁认为，只有通过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无情地划清界线，才可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质（后来的整个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政策是正确的），于是我的“调和主义”在许多剧烈的转折关头同布尔什维主义发生了敌对冲突。列宁反对孟什维主义的斗争必须再加上反对“调和主义”的斗争，后者常常被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所有读过列宁著作的同志都知道这一点。因此，说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有所隐瞒”，这很可笑。现在，在事过境迁之后，我当然不可能再想去否定列宁对俄国“调和主义”的批判所具有的原则正确性和巨大的历史远见。俄国“调和主义”的基本特征同国际中派主义思潮相似。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对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党员都是十分明确的和不容置疑的，况且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写了不少文章，有过很多体会，检验和证明了许多东西，在这之后还来争论这些问题，这一想法本身就是十分荒谬的。

如上所述，我反对“大分家”和分裂，于是就同列宁据以培养、创建并教育我们今天的党的那些思想和组织方法一再发生严重冲突。当时，“列宁主义”一词在布尔什维克派之中尚不存在。况且列宁也不会允许使用它。只是从列宁患病以后，特别是他逝世后，党像是一下子概括出了列宁一生所体现的巨大的创造，才使用

起“列宁主义”一词。这个词语当然并不同马克思主义对立，不过，它包括了在列宁的领导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世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切新贡献。至于革命前，只有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才用“列宁主义”一词来形容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政策中最反面最有害的东西。当时在我这样的“调和分子”看来，布尔什维主义最大的缺点是分裂活动、派别斗争、组织上的分家，等等。正是在这种含义上，我当时，在激烈论战之时，使用过“列宁主义”一词。现在，倘若问起一个没有经验、不了解情况的党员：“请问，什么是托洛茨基所说的列宁主义？”，随后再向他读一通对列宁主义进行派别攻击的旧文章或旧书信，他当然会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这种做法未必正确。这是拿不了解情况作文章。现在，引用的这些话我听了同其他每一位党员一样也觉得刺耳。只有看过过去的历史亦即布尔什维主义同调和派的斗争史才能理解引用的这些话。而在那场斗争中历史真理和胜利都完全属于布尔什维主义。况且，列宁的全部活动经历表明，只有接受他的历史观，他的目标，他的斗争方式和手段，才有可能理解他这个政治人物和有个性的人。评价列宁不能撇开列宁主义，评价列宁不能只说一半。列宁的政治形象排除任何模棱两可。他用自己的方式迫使所有人或者与他同行，或者与他对立。因此，很显然，对于意味着在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模棱两可的调和派，列宁的形象本身既格格不入，又在许多方面无法理解。为了工人运动虚幻的“统一”而去争取社会民主党各个派别的统一时（我当时认为是正确的），我本人就不止一次在这条道路上同作为政治人物的列宁发生过冲突。

一个革命者只要未能正确对待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及其工作方法，他就不可能正确、顽强并始终如一地参与工人运动。学说、口号、策略和党组织的工作之间不建立起正确的相互关系，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政策。列宁在自己的声

明中不止一次雄辩地表述的正是这一思想，即认为我的革命思想或建议只不过是“空谈”，因为我持调和主义立场，正在同构成无产阶级运动基本核心的布尔什维主义发生矛盾。列宁说得对吗？无疑是对的。

没有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既不可能实现也不可能巩固。因此，真正的革命事业只能是能够有助于这个党壮大、巩固的事业。任何其他离开这条康庄大道的革命工作，都不具备对本身可靠性、成功性的内在保证，在许多情况下对当时的主要革命工作造成了直接损害。在这种意义上，列宁是正确的。当时他说，调和派观点在为孟什维主义打掩护，从而往往会把革命口号、前景等等变成空谈。列宁对中派主义的这一基本评价是完全无可置疑的。现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就此问题掀起争论，是极其荒谬的。起码就我而言，没有看到有必要进行这场争论。

我在这一问题上的转变始于帝国主义大战开始之时。按照我从1907年开始不止一次发挥的整个估计，欧洲大战应当能促成革命形势。然而出乎我的预料，这种革命形势却导致了社会民主党的彻底背叛。我逐步地重新考虑了自己对政党和阶级、革命行动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相互关系所作的估计。在国际孟什维主义的社会爱国主义背叛行为的影响之下，我一步一步地得出结论：不但必须同孟什维主义进行思想斗争（的确，我过去也有所承认，但不甚彻底），而且必须不调和地同它在组织上决裂。这种转变并不是在瞬间完成的。大战期间我的文章和讲话之中还看得出有时不甚彻底，有时有所倒退。列宁在反对我的中派主义的种种表现时加以强调甚至故意加以夸大，他做得完全对。不过，如果把整个战争时期当作整体来看，则会一目了然：战争爆发时社会主义所遭受的惊人损害，成了我在一无例外的所有问题上由中派主义转向布尔什维主义的转折点。随着我得出关于阶级和政党、理论和政策、政治和组织相互关

系的越来越正确的即布尔什维主义的看法，对资产阶级社会总的革命立场自然就补上了更有生命力、更为现实的内容。从我明确必须无条件地同护国主义作殊死斗争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接受了列宁的立场。我曾视为“搞分裂”、“瓦解组织”的一切行为，都成了争取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独立性的力挽狂澜且颇有远见的斗争。我开始从新的视角，从布尔什维主义即从真正的列宁主义的视角来看列宁的政治方法和组织手段，以及他的政治个性和个人人格。只有成为布尔什维克，才能理解列宁并接受列宁学说。此后对我来说再也没有出现过作为特殊思潮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我再也没有从“托洛茨基主义”的特殊视角来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我入党就是想用托洛茨基主义取代或偷换列宁主义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而且是荒唐的。我是作为布尔什维克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有一次，列宁在谈到区联派同布尔什维克合并问题时问我，在我看来在我的志同道合者中还有谁可以进入中央委员会。我回答说，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对我并不存在，因为我认为没有任何能把我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分歧。

当然可以指责我过去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不正确。这意味着指责我未能自1903年就成为布尔什维克。然而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我经过漫长而又复杂的道路才接受布尔什维主义。我在走那段路时，除了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外，并没有其他利益。我曾经同列宁主义作过斗争，当时我确信列宁主义错误地分裂了工人阶级。许多年的经验使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我便走向列宁主义。对自己经历的这段复杂道路，我无疑负有政治责任。

然而当我1917年5月从美国回来并把自己交给布尔什维克党来安排时，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所有老党员对我整个的过去是完完全全清楚的。这一过去有过政治错误，可是却没有玷污我的革

命荣誉的一点点的污点。如果说我走向列宁主义比其他许多同志晚，但是还可以说相当早，因为我作为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参与了七月事件，参与了十月革命，参与了国内战争和苏维埃时期的其他工作。有一次，我曾经说过（而这被算作我的一项特别罪过），我认为我走向布尔什维主义之路的可靠程度未必低于其他道路，我这自然是指知识分子的个人道路，而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体道路。我这样说只是想说明，就一个人该对自己作出评价来看，我走过的道路使我永远不变地接受了布尔什维主义。为了说明自己的这一思想，我惟一想援引的是一个历史例子。弗兰茨·梅林^①，这位著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走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晚，而且是在经过重大斗争之后。不仅如此，梅林起初向社会民主党靠拢，后来又离开了它，只是最后才彻底参加了党。在旧档案中能找到梅林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粗暴言论和恩格斯对梅林的毁灭性评价。在党内斗争中人们不止一次向梅林提及他的过去。然而梅林接受马克思主义却是彻底的，终生不渝的。他去世时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加米涅夫同志十分细致地收集了列宁揭露我的立场错误的所有文字。加米涅夫同志把列宁在许多年论战中的抨击变成了对我的最终鉴定。然而读者却可能会产生这一鉴定是不完整的印象。例如，读者据此完全找不到对如下问题的答案：我的前期（1914年前和1917年前）革命活动是否只有错误，或者其中也有使我接近布尔什维主义，走向并接受布尔什维主义的某些方面呢？不回答这个问题，对我后来参与党的工作的性质就难以解释了。与此同时，加米涅夫的鉴定还必然引出另一个纯属事实性质的问题。难道列宁说过和写过的只有加米涅夫同志所收集到的这些吗？难道列宁根据革命

^① 梅林，弗·（1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历史学家、政论家和文艺学家。

年代的经验没有作过其他评价吗？难道现在，在1924年末，只向党通报革命前的评价而根本不提及通过共同工作、共同斗争所作出的评价，这种做法是正确的、诚实的吗？这就是每一位严肃的读者不可避免会提出的问题。引用过去的文字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些引文只能使人得出别有用心、充满偏见的结论。

党的作用

为了把我现在的某些观点或者文章说成“托洛茨基主义”，并为此把它们同过去的错误挂上钩，需要跳过很多事实，首先是跳过1917年。为此就需要事后再来证明，我不理解1917年的事态，我由于阴差阳错才毫无保留地赞同了列宁的四月提纲，我不理解党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我无视党此前全部历史的意义，等等，等等。而根据1917年的事件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在这些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无论当时还是以后都没有给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来指责我推行某种特殊路线。因此，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指责不能同这些事件以及我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挂上钩，而是同我评论这事件某些教训的文章挂上了钩。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指责我搞“托洛茨基主义”具有重大的，甚至可以说决定性意义的是如下问题：我在阐述1917年事件时曲解了列宁主义，用另一种同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特殊倾向来同它相对立，这个说法对不对？因此，说我的《十月的教训》搞“托洛茨基主义”的指责就成了基本的关键，由此把党内出现“托洛茨基主义”危险的种种编造都联系在一起了。然而（实质就在这里）这一把所有人为编造联系在一起的关键却是一个靠不住的关键。只要认真看一下这个关键，它顷刻间就会灰飞烟灭。只有刻意吹毛求疵再加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先人之见才能提供借口，把我的《十月的教训》说成是背离列宁主义的倾向，而不是认真老实地对

列宁主义的运用。这就是现在我就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想要表明的看法。

尤为令人惊诧，因此也就大错特错的是，竟然断言我在叙述十月革命时忽略了党的作用。然而前言的中心思想以及撰写前言的立意，却完全是承认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工具是党”（前言第14页）。我是以一系列国家战后革命的失败教训为背景来阐释这一思想的。我们的错误——我再说一遍，再重复一遍，由于我们过早地期待过大战结束时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到来——恰恰就在于，我们仍然未能充分估计党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德国工人们无论在1918年还是在1919年都未能获胜，因为他们没有获胜的基本武器——布尔什维克党。我在前言中两次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可以利用自己这个阶级的一系列优势，无产阶级则只有用革命政党来顶替这些优势。

如果说自德国革命失败后有过某种我一直在重复，在强调，并以十倍的执著在发挥的思想，那就是如下思想：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得到能保证胜利的真正革命政党的领导，那么哪怕最为有利的革命条件也不能使无产阶级取得胜利。这就是我的梯弗利斯报告《在欧洲革命的道路上》（1924年4月11日）以及我的报告《东方的前景和任务》（1924年4月21日）、《五一节在西方和东方》（1924年4月29日）、《新的转折》（《共产国际的五年》一书前言）、《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哪个阶段？》（1924年6月21日）等等的主要思想。例如，上面提到的梯弗利斯讲话在分析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我说：“为什么德国至今未能获胜？我认为，回答只能有一个：因为德国没有布尔什维克党，也没有我们在十月革命时所拥有的那样一位领袖……党也未经受我们党所经受过锤炼。同志们，这就是中心问题。欧洲各国的党都应当学习这一经验。我们大家都应当学会更明确、更深刻地领会并珍惜我们党的性质、意义和本质，它保证

了无产阶级在十月的胜利和十月革命后的一系列胜利”。（《西方和东方》，第11页），我再重复一遍，这是有关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尤其是去年德国革命失败后，我所有的报告和文章的基本观点，主导观点。我可以引用数十段文字来证明这一点。能设想我在写作《十月的教训》时会忽然忘掉、抹杀或者歪曲从全部历史经验，特别是近十年来的经验中得出的这一主要观点，主要结论吗？不，这是不可设想的。情况也不是这样。根本不是这样。恰恰相反，我通篇前言依据的就是我在梯弗利斯报告中所勾画的中心思想：“我们大家应当学会更明确、更深刻地领会并珍惜我们党的性质、意义和本质，因为是党保证了无产阶级在十月取得的胜利和十月革命后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当然，我没有重新去论证这一思想，因为我认为十月革命的这一“教训”是早就经过证明、经过检验了的，是毫无争议、无可置疑的。不过，恰恰是有关党及其领导的决定性作用的思想构成了我的前言的中心思想。为了证明这一点，就得把通篇前言再引述一遍，用黑体字把其主导思想标出来。很遗憾，不可能这样做。我只能恳请感兴趣的读者手握铅笔按上述视角去读一下或重读一下这篇前言，并且特别注意以下几页：第12、第13和第14页，第41、第43、第46页，“再论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苏维埃和党”一节（第57页）。这里，我仅举一例。在前言的结尾我批驳了近年来我国报刊出现的一个观点，即认为英国革命“不必通过政党，而可以通过工会”来进行。我就此在前言中写道：“如果没有党，离开党，绕过党，只通过党的代替物，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这是最近十年来的重要教训。不错，英国工会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例如，在一定时期的一定条件下它们甚至能够代替工人苏维埃，然而，它们之所以能够起这样的作用，不是由于把共产党放在一边，更不是由于与共产党对立，而恰恰是因为共产党的影响在工会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为了这个结论——关

于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所起的作用和意义的结论——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因而决不能随便地放弃它或者轻视它”（第9页）。对我的指责恰恰是，我放弃了或轻视了这个结论！经过上文说明，只举出这一段引文即足以证明，强加给我的名之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倾向不仅同我的前言的精神和行文直接对立，而且同我整个的无产阶级革命观直接对立。用这种观点来指出我忘记或有意不谈我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在革命中的作用，这完全是一种不恰当的挑剔。我的前言不是在叙述党的个别机构或组织的作用，也不是在阐释事态的发展，而是试图阐明党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的总的作用。我没有列举事实，我认为这些事实总的来说是众所周知的。我根据的基本论点是党（自然是指它的活生生的在起作用的组织）的领导作用。对于我在叙述时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事，我并没有忽视，我也没有避而不谈。任何牵强附会，任何诡辩都推翻不了这样的事实：对我的主要指责（即贬低党的意义）是根本错误的，是同我实际所说、所论证的一切完全矛盾的。

说我在评价党时不注意党内群众而只注意“上层”、注意领袖的断言也同样是不正确的。据此有人甚至扯到了什么“英雄”和“群氓”的理论。然而问题的整个实质在于，我在界定党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总的作用并且以一种未必可再增添一分的断然决然的态度来作出界定时，提出的是关于中央领导在革命时期的作用这个特殊的、局部的而又极为重要的问题。当然其中也包括所谓“领袖”的问题。在评述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的工作时，我曾两次指出，列宁在与一切动摇对抗时，其力量就在于他总是能在关键时刻依靠“做群众工作的党员”。如果我把整个革命问题或者哪怕把整个党的领导问题都归结为“领袖”问题，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当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论断为基础，作为一个专门的但又对革命极端重要的问题来提出

关于党的领导核心同全党和工人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那么，这样提出问题就完全是合理的，而在去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则更是双重必要的。顺便提一句，下文我还要谈到这一问题。

不过，人们对我说，需要党不仅是为了夺取政权，而且还为了保持政权，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在国际上纵横捭阖。难道我这一点也没有想到吗？然而实质是，欧洲各国的党面临的还是十分繁重的夺取政权的任务。它们应当集中精力于这一点，致力于这一点。在夺取政权后会出现新的困难。我在此就可以有把握地预言，由胜利的武装起义转为必须放慢速度的“有机”工作将不可避免地在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党内激发新的危机，即不满的左翼的分离。当然，在不同的国家里这种情况会各不相同。不过，这是下一阶段的危险和困难。共产主义运动能够对付得了。需要的只是夺取政权。

说我在阐释十月的教训时无视我党的过去即其大战前和革命前的历史，这一指责具有同样的性质，即明显不公正、十分牵强附会。不过我已经说过：我的行为必然导致如下结论：如果在前期，在准备阶段，无产阶级先锋队没有成为真正革命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无产阶级就利用不了最有利的革命形势。这就是十月的中心教训。其他所有教训都从属于这一教训。党不能为了应付一时之需而临时拼凑起来，也就是说不能为了武装起义才匆匆忙忙建立起来。战后欧洲无产阶级的经验十分确凿地表明了这一点。即使我一个字也未直接提及十月革命前的党史，但光凭这一点也就完全充分地确定了这段党史的意义。然而，我实际上已经十分具体而且确切地谈到了使党能在十月革命中和十月革命后发挥作用的发展条件。我在前言第62页是这样说的：“历史保证了我们党具有无可比拟的革命优越性。同沙皇制度进行英勇斗争的传统，在地下条件下养成的革命的自我牺牲习惯和方式，对全人类革命经验的广泛理论研究，反

对孟什维主义的斗争，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反对调和主义的斗争，1905年最丰富的革命经验，在反革命年代中对此经验的理论研究，从1905年革命教训出发来考虑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党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锻炼，具有高度的理论上的洞察力，空前的革命气魄。”这哪有“无视”党或者其十月前准备工作的意思呢？不但前言的整个思路是在阐明党的准备工作和锻炼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定性意义，而且对于使党成为现在的党的那些发展条件作出了完全准确、具体，尽管简短却几乎十分全面的概括。不言而喻，我未在前言中讲述党的整个历史。因为这本书的主题不是党史，而是十月革命，即党史中一个特定时期。不过，我不知道有什么能驳倒我对保证了党“具有完全无可比拟的革命优越性”的发展条件的概括。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指责我“避而不谈”布尔什维主义同我本人过去坚持的那种思潮的斗争，对于这种指责这一回完全可以加以拒绝，因为我考虑的毕竟不是在谈此前的党史，不是在谈革命前反对调和主义的斗争，而是在谈十月革命。然而连这个理由都没有必要去谈，因为列举出使我党经受异乎寻常的锻炼，具有高度的理论上的洞察力和空前的革命气魄的那些条件时，我指出的不仅有反对孟什维主义和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而且还有反对调和主义的斗争。

我从来都没有暗示过有这样的想法：即有过革命前那段历史的布尔什维主义需要借助“托洛茨基主义”来改变自己的本质，相反，我却直截了当地说过，布尔什维主义形成过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是反对那些被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而出了名的思潮的斗争。换言之，我说的与强加于我的截然相反。不说我贬低党的作用，不说我无视党在十月革命前空前的准备工作的意义和作用，编造再次出现托洛茨基主义危险就失去了其主要的根据。况且，我根本就

有贬低过，也没有无视过。上面已经引述了我的主要思想，而我的其他思想都是围绕这一主轴而展开的。这里，我要把这一思想再重复一遍：“我们大家都应当学会更明确、更深刻地领会并珍惜我们党的性质、意义和本质，因为它才保证了无产阶级在十月的胜利和十月革命后的一系列胜利。”（《东方和西方》第11页。）这是列宁主义的观点。我没有偷换它，也没有冲淡它。我是在捍卫它，鼓吹它。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我们已经看到“托洛茨基主义”的党的作用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不过，还采用了其他手法，而且是双重的办法来勾画我对列宁主义的批判。首先，凡是我对加米涅夫同志和其他反对起义同志的“十月”立场的评论，都被说成是我以批判列宁当时的对手为幌子来反对列宁本人。指责我批判列宁主义的第二个手法是，说我直接描绘了列宁在十月革命中的“错误”以及我对这些错误的纠正。这个问题应当认真谈一谈。

加米涅夫同志同列宁在十月革命时的分歧的实质表现在哪里呢？表现为加米涅夫同志主张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下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而列宁则根据已经展开的资产阶级革命准备和号召无产阶级率领农村下层群众去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这就是十月革命时期两种倾向的实质。列宁坚决反对加米涅夫的提法。他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公式已经过时了。他说：“不要向旧公式看齐，而要向新的现实看齐”。列宁问道：“加米涅夫同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一老布尔什维克的公式，有没有包括这种现实呢？”他回答说：“没有。这个公式已经过

时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已经僵死了。要使它复活是徒劳无益的。”^① 这是否意味着列宁简单地“放弃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一公式呢？不，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丝毫也未想把这一“放弃”强加于他。相反，我直截了当地说（第17页），列宁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从劳动解放社起就有的僵化的西欧派传统正相反，他使得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一公式在政治上体现出俄国历史和俄国革命的特殊性。而且对他来说，这一公式如同其他所有的政治策略公式一样具有能动的、有效的因而是具体制约的性质。它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在前言中问道：在1917年革命的条件下实施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吗？我坚持列宁的观点，回答说：它曾以不想完全掌权的半政权工兵苏维埃的形式实施过。列宁通过这瞬息万变的现实认清了自己的公式。他指出，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旧公式的实施只能这么半半拉拉。而反对夺取政权的人则认为，我们应当“完成”民主革命。列宁回答说，按照“二月革命”的路线所能做到的一切均已做了，均已实现了；旧公式已经过时了；应当从现实的发展中推导出新的行动公式。列宁指责自己的对手说，他们未能按照在二月革命的条件下业已实施的形式来认识“民主专政”。早从四月初起，列宁就不厌其烦地解释说：“现在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也可以叫做‘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上册第29页^②）。列宁坚持重复说，他的对手们用过时的公式来同革命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38、14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38页。

需要相对立，从而“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举手投降”。^①这就是列宁对问题的提法。我则是按照原样加以阐述。为什么在十月革命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我同列宁意见一致而未同加米涅夫同志意见一致，就成为对列宁主义的修正了呢？为什么在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上的列宁主义观点能容纳曾同列宁截然对立的加米涅夫，却要排斥曾追随列宁的我呢？在这方面列宁主义一词是否变得过于灵活，过于随心所欲了呢？

为了引导人们得出十月革命期间这样一种完全出人意料、令人难以思议的列宁主义和反列宁主义的对立，就需要把问题说成这样：是我把加米涅夫等人的布尔什维主义彻底性看成是他们的错误；是我说：“看，就是这些同志确实按列宁的公式一直坚持到底，才最终沦为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俘虏。”但我从来没有说过十月革命时反对列宁的人的错误是他们“彻底”运用了列宁的公式。不，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像列宁那样来对待列宁的公式；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公式在现实中的特殊矛盾；他们不理解1905年公式的过渡阶段性质；他们说的是列宁的话，却把背得烂熟的公式同对现实的研究对立了起来，换言之，他们没有像列宁那样来理解列宁的公式。列宁本人就是这么认为的，并且对这一错误作了透彻的分析。

同样为了达到把我（确切地说，是列宁）对加米涅夫同志等人的批评变成我对列宁主义的批评这一目的，需要从我1909年写的文章而不是1924年写的前言之中摘取引文。我在1909年写的文章中谈到过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这一公式在革命特定阶段有可能显露出自己的反革命特点。不错，1909年我曾在罗莎·卢森堡的杂志上这样写过。该文已收入我的《1905年》一书。1917年以后，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44页。

该书曾经用俄文和多种外文多次再版，从未见任何方面的人士提出过质疑或者反驳，因为大家都知道，看该文应当考虑到撰写文章的时代条件。不过，不能把1909年一篇论战文章中的一段话硬塞进1924年写的一篇前言中去。关于这段1909年写的文字完全可以说，我撰写的时候并不清楚我对之提出质疑的这一公式对列宁只具有阶段性、准备性的意义，而不具有独立的意义。这样指责我是对的，我接受这种指责。然而要知道，恰恰是加米涅夫同志等人试图——违反列宁的意愿——把这一能动的公式变成教条，并把它同正在发展的革命需要对立起来。恰恰是列宁对他们解释说，他们的这种立场阻碍了革命的必要发展。我仅仅是扼要地且用十分缓和的形式复述了列宁的批评和评价。怎么能由此得出修正列宁主义的结论呢？既然非要把“托洛茨基主义”同这一件历史早已勾销的事扯到一起，那就只能说：托洛茨基在前言中赞同列宁关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提法；然而托洛茨基根本不提他放弃不断革命这一老公式；由此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托洛茨基根据1917年革命的经验按列宁的精神来阐释自己的老公式。这就是在这一问题上所能得出的惟一结论，即使如此，也不是根据未提及历史已勾销了的不断革命问题的那篇前言，而是通过把这篇前言同我反映不同政治发展阶级的旧著作比较才得出的。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对我来说，所谓不断革命这一公式的根本是，深信俄国革命以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将不可避免地以社会主义专政而告终。正如我上文论及的，如果说中派策略倾向使我离开了布尔什维主义并同它对立，那么，俄国革命必然将政权交给无产阶级这一根本政治信念又使我同孟什维克对立，并使我历经所有阶段投入布尔什维主义阵营。不过，这与我们现在所谈的问题不是一回事。无论怎么说，我反对那种说列宁或者布尔什维克党在深信自己的公式错了之后接受了“我的”革命公式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十分可笑，是强加于

我的。

然而，我不得不预先承认，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引用20年来不同时期的文字，随心所欲地把它们拼凑在一起，特别是把我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强加给我，那么只要愿意，就可以在用托洛茨基主义偷换列宁主义这一点上得出任何结论。众所周知，在这场争论中“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一公式最吃香。我认为，不下十位作者（发言者就更多了！）一个接一个地把这一错误的政治公式算到了我的头上。然而我不得不说明，题为《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那份著名传单是1905年夏由侨居国外的帕尔乌斯^①撰写的。当时我匿居在彼得堡，同他根本没有联系。这份传单由帕尔乌斯个人署名在国外印刷，在俄国没有任何人翻印过。我任何时候对帕尔乌斯这一简单化的公式都不负任何责任。正是在这一时期我撰写过一系列传单，其中较为重要的都是在巴库布尔什维克秘密印刷厂印制的（1905年夏）。此类传单中有一份是专门写给农民的。在现在大都能查找得到的我的这些传单中，没有一份要“跳越”民主革命阶段。它们都提出了立宪会议和土地革命的口号。诸如此类的错误在批判我的文章中不胜枚举。然而没有必要就此再多费笔墨。要知道，问题并不在于我个人在自己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如何表述革命的前景和任务的，而在于我现在，在1924年，对列宁依据与十月革命进程的内在联系对基本策略问题的提法所作的分析是否正确。

在这一方面，没有人指出过我有任何错误。在对十月革命进行理论阐释时我完全依据列宁主义，正如在实施十月革命时我始终同

^① 帕尔乌斯，亚·李·（1869—1924）——19世纪90年代末至20世纪初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作，接近左翼。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在俄国，同托洛茨基一起提出“不断革命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军火生意。

列宁走在一起一样。

某一位作者竟然想得出说我是……按照苏汉诺夫^①的提法来评价十月革命的，与此相矛盾的是他却援引了列宁那篇评论苏汉诺夫著作的著名文章。一清二楚：托洛茨基主义在反对列宁主义！这位可敬的作者却大错特错了。1923年2月5日，即在我们得知列宁的评价之前很久，我就曾致函《真理报》编辑部，其中是这样评论苏汉诺夫那本书的：“最近我翻阅了已出版的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的一卷。我感到应当给予这本书以毁灭性的评价。很难设想还有更厚颜无耻的知识分子自我中心主义的丑恶表现……他（苏汉诺夫）起先拜倒在克伦斯基^②脚下，在左边又抓着策列铁里^③和唐恩^④的胳膊肘，向他们灌输高尚得不得了的生活方式，而后来……又向布尔什维克灌输正确的革命行动方式。当七月事变后列宁隐蔽起来时，苏汉诺夫为自己的高尚简直伤心得不得了。他苏汉诺夫从来也没有这样过”……等等，等等。当时，在《真理报》上曾出现过按我这封信的精神写成的书评，甚至把信的一部分也引进了书评中。读者由此可以看出，我能在多大程度上倾向于“按照苏汉诺夫的提法”来评价革命。

① 苏汉诺夫，尼·（1882～1940）——俄经济学家和政论家。1903年起是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起是孟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是《新生活报》主编之一，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经济机关工作。著有多卷本《革命札记》。

② 克伦斯基，亚·费·（1881～1970）——俄社会革命党人。二月革命后任司法部长、陆海军部长、临时政府总理、最高司令等职。后流亡国外。

③ 策列铁里，伊·格·（1881～1959）——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任临时政府邮电部长和内务部长。1918年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首脑之一。后流亡国外。

④ 唐恩，费·依（1871～1947）——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被驱逐出境。

列宁主义和“布朗基主义”

现在，我们必须来谈一谈一项既用心险恶，又论证拙劣的指责：我竟然把列宁描绘成“布朗基^①主义者”（!!!），而把自己几乎描绘成从列宁的布朗基主义手中拯救革命的人。只有由于争论而一叶障目才能说得出这样一种指责。

然而是什么成了引起这种关于“布朗基主义”的无稽之谈的由头呢？

9月召开民主会议的时候，列宁从他藏身的芬兰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包围正在举行民主会议的亚历山大剧院，逮捕会议参加者，占领彼得保罗要塞，等等。在9月还不能以彼得堡苏维埃的名义实施这一计划，因为苏维埃组织还未真正布尔什维克化，还不适应这一计划，因为军事革命委员会尚不存在。我在自己那本书中有关列宁的九月建议是这样写的：“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本来打算通过党的途径并以党的名义来准备和完成起义，随后由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总结这一胜利。”某些同志不知为什么却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我把列宁的九月建议看成布朗基主义（!!!）。我完全不明白，这跟布朗基主义有什么相干？布朗基主义应当是极力想以不依靠工人阶级的革命少数派的名义去夺取政权的主张。然而要知道，1917年9、10月间形势的根本实质是，劳动人民的多数站在我们党的一边，而且这一多数还明显地在不断增加。因此，当时的问题是，使多数人拥护的党中央委员会承担起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夺取政

^① 布朗基，路·奥·（1805～1881）——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政治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革命专政。但把希望寄托在少数革命家的密谋上。

权，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从而使已发生的革命合法化。就这一建议侈谈什么布朗基主义，这就是荒谬绝伦地歪曲基本政治概念的含义。起义是一门艺术：起义的任务允许有几个解决方案，其中一些可能是较为成功的，另一些则是不那么成功的。列宁的9月建议无疑有其长处：可以使敌人措手不及，不可能组织起可靠的部队转入反攻。9月建议的缺陷就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不仅使敌人措手不及，而且也使部分工人和卫戍部队也措手不及，引起他们的惶惑，从而削弱我们的攻击力。这个问题很重要，但纯属实际问题，同布朗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原则矛盾没有任何关系。众所周知，中央委员会没有采纳列宁的9月建议，在就该问题表决时我同所有的人持同样立场。这里的问题并不涉及对整个发展方针的总的确定，并不涉及布朗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涉及对起义完全实际的、在相当程度上是技术性的条件的具体估计，而起义的政治前提则确已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提到，列宁当时不得不“从地下”来估计彼得堡形势的纯粹实际条件。我的这句话激起了完全出乎预料的抗议。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也只不过是重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就此说过和写过的话而已。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他曾“安慰”某些在大会前夕因立场极“左”而遭到他严厉痛斥的匈牙利同志。他写道：“当我自己流亡国外时，我曾几次采取‘过左’的立场。1917年8月，我也流亡国外，曾向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过一个过‘左’的建议。这个建议幸而遭到断然拒绝。流亡国外的同志常常采取‘过左’的立场，这是很自然的。”^① 我们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自己的建议称为过“左”的，并且用他流亡国外来解释他的“左”倾。因此，我

^① 行文有误：此处所说建议是9月而不是8月提出的。《列宁全集》第2版第51卷第28页。

在这个问题上仅仅是阐述了列宁的看法。

况且这一被中央断然拒绝的建议对事态的发展起了正面作用。列宁懂得，当时缺少的不是小心翼翼，谨慎从事以至横加阻拦的态度，因此他尽量施加压力，要求每一个和所有的党的负责工作人员都把武装起义当作刻不容缓的实际任务。列宁的9月来信同布朗基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是他影响党的整套措施的一部分，是适当的，它促使大家更具体、更坚定、更勇敢地对待起义问题。

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一段十月革命时非常重要的插曲，这就是克伦斯基调走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图谋，我提及这段插曲并不是因为对此又有什么新的补充，而完全是因为，我对这段往事的叙述使加米涅夫同志有借口把事情说成是当时我用自己的“正确”政策对抗了列宁的“错误”（布朗基主义的）政策。我不想再去重复所有那些针对这一问题作出的令人厌恶透顶的结论和暗示。我重新读了一遍自己前言的相应部分，当然，我早就确信，文中丝毫也没有强加于我的那些东西。不过，我在前言中却找到了重要得多的东西：文中有一处完全明确、断然地排除了就我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一事上有“特殊”战略计划问题进行胡编乱造的可能性。请看，前言是这样说的：“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掌权以后，只是继续并加深了两个政权并存的方式。我们主动地检查了关于调走卫戍部队的命令。这样一来，我们就利用合法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和方式掩护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实际起义。不仅如此，我们在宣传中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形式上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展和加深了已经形成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从而明确了苏维埃的合法地位以便在整个俄国举行布尔什维克起义。”（第50页）因此，这段话无论如何也不是以个人名义，而是以党的名义（“我们布尔什维克”）说的。况且后来围绕卫戍部队的斗争发展也决不是出于哪一个人的计划，而是由于我们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

里承袭下来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制度。克伦斯基想调走卫戍部队；而按照惯例未经苏维埃士兵部同意就不能这么做。司令部提请士兵部主席团审议，而布尔什维克已经牢牢掌握了士兵部，于是出现冲突；冲突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对十月革命十分重要的后果。因此，我所描绘的有关卫戍部队的情况完全符合实际的事态发展。然而还不仅如此。我好像有意要排除加米涅夫同志编造谎言的可能性，在下文又直截了当地说：“如果说我们那次‘诡计’百分之百地成功了，那并不是因为这种诡计是一些要避免国内战争的自作聪明的战略家故意想出来的，而是因为它是妥协主义制度解体的条件及其出现的严重矛盾自然造成的。”（第51页）因此，此处的“诡计”一词被加上引号，是为了表明这不是某个人的主观的诡计，而是由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所造成的关系客观发展的结果。前言直截了当地说，这并不是“自作聪明的战略家故意想出来的”。因此。不但上述说明是用党即其在苏维埃的代表的名义作出的，而且还直接而明确地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个人的计谋或者个人的花招。那种说我在这个问题上贬低列宁来抬高自己的政策的断言到底有什么根据呢？一点根据也没有。列宁身处芬兰，当然不能在这一事件刚发生时就发现和了解它，并且在事态发展的所有阶段都跟踪研究它。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列宁能及时而详尽（即依据个人的观察）了解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事件，他对革命进程的担心可能会小一些。然而不言而喻的是，即使这样也丝毫不妨碍他不断增强他已经施加的压力。他要求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夺取政权无疑是对的。而且正是多亏他的这一压力，这一点才真的实现了。

“配合形式的国家”

十月革命期间分歧的焦点是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不能彻

底理解列宁对这一问题的提法，自然就无法理解十月革命期间的分歧。然而我现在想通过一个目前在争论中起首要作用的例子来揭示，许多同志指责我背离列宁主义，其实他们对列宁所知甚少，对列宁关于夺取政权问题的提法也不甚了了。

在前言中我顺便提及，《论时局》一信的作者们反对夺取政权，因为不得不持类似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当时的领袖希法亭在1918~1919年德国革命时所持的立场。希法亭曾建议，把苏维埃纳入民主宪法。我的这一对比，曾遭到格外严厉的批判。对我的指责首先是，说我完全错误、甚至“居心不良地”把加米涅夫同志的立场同希法亭的立场扯到了一起；与此同时，还向我一再论证说，列宁也主张过把苏维埃同立宪会议结合起来，因此，我又修正了列宁主义。还指责我说，我不理解当时那个过渡关头，当时党在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但同时并没有摒弃立宪会议。最后，还揭发我说，我本人在鼓吹争取苏维埃政权的同时也说过要召开立宪会议。然而如同在其他所有问题上一样，主要的指责是，我把列宁的立场同希法亭的立场扯到了一起，因此就是修正列宁主义，贬低列宁主义。让我们看看是否是这么一回事吧！弄清这一极为重要的情况将有助于澄清1917年的分歧问题。

其实，党当时既争取苏维埃政权，又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当时一个最为普及的宣传口号就说，苏维埃不夺取政权，立宪会议就召开不了，即使召开了，也会成为反革命工具。列宁和党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通向立宪会议之路不是通过临时政府和预备议会，而是通过无产阶级和贫农的专政。立宪会议不应是预备议会的扩大版，而应是工农国家的组成部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反对夺取政权的人把对立宪会议的期望与列宁的起义道路对立起来。他们一再论证说（见《论时局》一信），资产阶级“不敢”破坏立宪会议，没有能力在立宪会议选举中作弊。他们还论证说，我们党将在立宪

会议中成为拥有将近三分之一席位的强大反对派。这使他们设想出这样的前景：“苏维埃已经根深蒂固(?)，不会被消灭……就连立宪会议在自己革命(?)工作中也只能依靠苏维埃。立宪会议加苏维埃——这就是我们所要走向的配合形式的国家机关。”因此，这种配合形式国家就是，政权通过临时政府、预备议会和由其召开的立宪会议仍旧留在资产阶级手中。我们在立宪会议中起反对派作用，同时仍然是苏维埃的领导政党。换言之，这是一种继续两个政权并存的前景。而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在一定时期内在存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职业跨阶级妥协主义分子时才可能出现。而当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占多数，而在立宪会议中占少数的条件下，则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不言自明，列宁的立场与此毫无共同之处。他曾经说过：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再召开立宪会议，如果有必要，再把它同苏维埃配合在一起。列宁的立场同《论时局》一信作者们的立场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在列宁看来，立宪会议也好，苏维埃也好，都是同一个阶级或者非有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村贫民）联盟的机关，立宪会议同苏维埃配合的问题对列宁来说具有组织—技术性质。在反对列宁的人眼里，苏维埃代表着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贫民），而立宪会议却是各有产阶级的机关。只有出于某种幻想，即指望无权的苏维埃会成为“一支对准资产阶级的太阳穴的手枪”，认为资产阶级将使其政策“配合”苏维埃，才可能采取这种实行配合形式的方针。这就是同希法亭立场的相似之处。希法亭在其最为“左”倾的时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提出将苏维埃作为向有产阶级施压的工具即作为不开枪的手枪而纳入宪法！

或者所有上述这一切还不清楚？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对于我们大家最具权威的见证人和阐释者是怎么说的。让我们看看列宁是怎么说的。如果批评我的人能及时而认真地这样做，他们就可以不完

全地把读者弄糊涂。让我们打开第14卷^①，在《给同志们的信》（10月16~17日）中找到以下一段充满真知灼见的话：“我们可悲的悲观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永远不能自圆其说。拒绝起义就是拒绝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而把一切希望和期待都‘交给’‘答应’召开立宪会议的善心的资产阶级。惟有在苏维埃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才能保证立宪会议会召开，才能保证它的成功，难道这还难以理解吗？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已经说过几千遍。从来没有人试图驳倒它。这种‘配合形式’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现在有人以‘配合形式’为托词拒绝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而且偷偷摸摸地干，不敢公开否认我们的口号，这是什么行为呢？能找得出议会用语来形容这种行为吗？有人一针见血地回答我们那位悲观主义者说：‘是一支没有子弹的手枪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公然投奔了李伯尔^②、唐恩之流，因为他们千百次地宣称苏维埃是‘手枪’并且千百次地欺骗了人民，因为苏维埃在他们的统治下简直等于零。如果是‘有子弹的’手枪，那这也就是起义的技术准备，因为子弹要弄到手，手枪要装上子弹，而且光有子弹是不够的。或者是投奔李伯尔、唐恩之流，公开拒绝‘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或者是起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第271~276页）读到这段振聋发聩的文字，使人感到列宁简直像是对当前这场争论在发表自己的见解。列宁没有等到任何人再就此作出解释就指出，在配合形式的提法下有人“偷偷摸摸地”推出同列宁他所捍卫的思想截然相反的政治思想。可是，当我在自己的前言中用极为温和的形式重复列宁对在两个政权并存的基础上“配合形式的国家”的评述时，批评家们却提出，我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95页。

② 李伯尔，米·伊·（1880~1937）——崩得领袖之一，孟什维克。1917年任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帜在偷偷摸摸地推行……“托洛茨基主义”。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难道这不正是揭露了在党内制造“托洛茨基主义”危险的全部奥秘? 如果“托洛茨基主义”一词(就其旧的、战前的含义而言)是指调和本质上无法调和的倾向,那么,无疑理论上可以把不夺取政权的配合形式的国家归结为上述含义的“托洛茨基主义”。只不过推行这种“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是我。现在也不是我在事过境迁之后以它来反对列宁。

我想并且希望,现在问题一清二楚了。至少我不能讲得再清楚了。谁也不能替列宁讲得比列宁本人更清楚。要知道,有人指责我说,连共青团员都发现了我的错误。唉! 共青团员们紧随某些老同志之后发现的只是,在十月革命的基本问题即政权问题上对列宁著述研读得很差或者领会得很差。

能结束我们整个争论的列宁这段关于“配合形式”的文字,是10月中旬即起义10天之前写出的。列宁后来回过头来还谈过这一问题。1917年12月26日,即在我们引用的《给同志们的信》发表两个半月之后,十月起义早已过去,列宁以彻底的理论透析力表述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政权已经由苏维埃执掌了。列宁如果没有绝对的必要性,从来不愿人为地挑起业已平息的分歧。然而,12月26日,即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列宁却认为有必要再来谈一谈这一有争议的问题。列宁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凡是直接或间接想从形式上即法律上,想在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内来考虑立宪会议问题,而不考虑到阶级斗争和内战,那都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和转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布尔什维克党的少数领导人因为不能正确评价十月起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犯了这种错误。革命社会民主党应尽的责任就是警告所有的人不要犯这种错误。”(《列宁全集》第15卷第53

页^①)。

如上所引，列宁认为，警告所有的人不要犯恰恰是在有关“配合”形式国家的争论中暴露出的错误，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在起义胜利两个月以后，他认为有必要用相当严厉的语调作出这样的提醒。然而，我们却看到，对于某些同志，这一提醒的含义却有一半被忘却了，一半被歪曲了。可是，在国际范围内——因而也包括我们——时至今日这一提醒仍有着十足的威力。要知道，所有的共产党要经历的都还只是实际推翻民主国家的阶段。这一任务是极端艰巨的；老的民主国家则要比我国更困难一千倍。在形式上所有共产党人都站在“否定”形式民主制的基点上。然而要知道，这还未能解决问题。还有最主要的一点：用革命方式来推翻已经化作民族习性的民主制，切实推翻它。资产阶级民主舆论的压力在这条道路上会作出最猛烈的反抗。这一点应当事先就明白并估计到。这种反抗不可避免地也会进入共产党的内部，导致其内部出现相应的集团。毋庸置疑，同资产阶级民主制“妥协”的最流行、最标准、最典型的形式正是如下思想：“配合形式的国家”——绕开起义并绕开夺取政权。这自然是由于整个形势，全部传统，阶级间各种相互关系所导致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警告所有的人”都要提防这种不可避免的危险，对于缺乏锻炼的党来说这一危险可能是致命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告诫欧洲同志：“看，在我们俄国，尽管我们的党是卓越的党，民主制的幻想虽然有所克服，但在关键时刻仍然控制了优秀革命家的意识；在你们那里这种危险还要大得难以估量；对此应有所准备；要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要思考十月革命的经验及其全部革命的具体细节，把它化作自己的血肉！”作出这种警告并不意味着要取代列宁主义。不，这将意味着全心全意地为列宁主义服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66页。

务。

季诺维也夫同志发问说：反对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前和革命时的反对派是右的集团，右倾思潮或者右翼吗？对这么一个看来根本不成其问题的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的回答完全是形式主义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坚如磐石，所以它在十月革命时就不可能有右翼。可是十分明显，说布尔什维克党坚如磐石并不是说其内部从未出现过右倾思潮，而是说它一直能成功地克服右倾思潮：有时同它们一刀两断，有时加以化解。十月革命时期亦然如此。看来，这一点无可争议：既然在革命时机已成熟时党内发现有反对革命的反对派，那么，这是右翼反对派而不是左翼反对派。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仅限于对反对派作心理评述，说“动摇”、“怀疑”、“犹豫不决”等等。要知道，这种动摇具有政治性质，而不是其他别的性质。要知道，这种动摇是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相对立的。要知道，这种对立是经过理论论证，打着政治口号的。对在关键时刻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党内反对派怎么能不作政治鉴定呢？为什么必须放弃政治定性？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当然，可以从心理角度和个人角度来提出问题。譬如，某一位同志是偶然地还是非偶然地置身于反对夺取政权的反对派之列？我根本不想涉及这一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与对党的发展的各种倾向的评价无关。一些同志参加反对派几个月，另一些同志则参加几个星期，这一事实只具有个人履历意义，它不影响对立场本身的政治评价。这一立场反映了当资产阶级社会上空密布致命危险的那个时期资产阶级舆论对党的压力。列宁斥责反对派代表人物，说他们对资产阶级“必然”表现出乐观主义，而对革命力量和无产阶级的能力却表现出“悲观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下册第276页^①）。只要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95页。

大致翻阅一下这一时期列宁的书信、文章和讲话，任何人都能毫不困难地得出结论：贯穿这些著述的一条红线是，把反对派定性为右倾，它反映了在夺取政权之前时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压力。而且这一定性还不仅仅局限于同右倾反对派作直接尖锐斗争的时期，许久之列后列宁还重申过这一点。例如，1918年2月末，即十月革命已过4个月之后，在同左派共产主义者“残酷”斗争时，列宁把十月反对派称作“十月的机会主义者”。当然可以攻击这一评价：难道在坚如磐石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中还可能有机会主义？然而既然是政治评价，这样一种形式主义的理山自然落空了。这一政治评价是列宁作出的，是经列宁论证的，而且是全党公认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要对它打上问号？

为什么对十月反对派作正确的政治评价很重要？因为它具有国际意义；它在将来才会充分显示其意义。这里我们遇到我国十月的一个主要的教训，现在，在取得德国十月的反面教训之后，这一教训又有了新的、巨大的分量。在每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中我们都将遇到这一教训。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许多困难中有一个完全特定的、具体的特殊困难：它是由党的革命领导的任务所产生的。在斗争急剧转折之际，正如列宁多次说过，即使是最革命的政党也可能落后，把昨日的口号或斗争手段来与新的任务和新的需要对立。然而再也没有比导致无产阶级必须武装起义的转折更为急剧的转折了。这时才出现了党的领导之间、党的整个政策之间和阶级的作为之间不相符合的危险。在“正常”条件下，即在政治生活进程相对缓慢的时候，这种不符合尽管会造成损失，但不会造成灾难。而在出现尖锐的革命危机时期，恰恰没有时间去消除这种不相符合，或者说，冒着炮火去取齐战线。革命危机最为尖锐的时期，就其本质而言，常常是转瞬即逝的。革命领导（犹豫、动摇、等待时机……）同革命客观任

务间的不相符合有时会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之间导致一场灾难，导致丧失掉多年工作准备好的成果。不言而喻，领导同政党（阶级、整个形势）间的不相符合还可能具有相反的性质：这就是领导超越了革命发展，把怀孕4个多月当成了十月怀胎。1921年3月德国提供了这种不相符合的最为明显的例证。当时党内的“左派幼稚病”表现得淋漓尽致，其结果是盲动主义（革命冒险主义）。在将来，这种危险也完全是现实的。因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总结的教训将一直保持其效力。不过，去年德国的经验却极其直观地向我们展示出完全相反的一种危险：时机成熟了，而领导却落在后面。领导刚刚赶上形势，而形势又发生了变化：群众纷纷后退，力量对比已急剧恶化了。去年德国的失败当然存在其本国的许多特点，但是，也存在表明普遍危险的深刻的典型特点。这一危险可以称之为革命领导的危机。无产阶级政党的下层接受资产阶级民主舆论的压力要少得多，但是党的上层和中间的一些人士将不可避免地在此关键时刻或多或少地屈服于资产阶级的物质恐怖和思想恐怖。对这一危险不能视而不见。当然也不存在对付这一危险的万能的解救办法。不过，同这一危险斗争的第一步——是弄清它的根源和实质。每一个共产党内，在“十月”时期都出现了右倾集团（或有所发展），一方面反映了极大的客观困难和危险，另一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舆论的疯狂压力。右倾集团的本质和含义即在于此。正因为如此，各国共产党内恰恰在动摇和犹豫最为危险的关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种动摇和犹豫。在我们这里，这种动摇和摩擦性质最轻。这才使我们有可能实现十月革命。德国共产党的情况却截然相反。它们那里的革命时机已经被错过，而党内危机十分尖锐，以致必须全面更新党的整个领导机构。各个共产党在自己的“十月”时期大概会处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使革命领导的必然危机变得最小，这是每个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要达到这一

点，就只有领会我们的十月经验，领会我们党内十月反对派的政治含义。

现今的问题

为了从对过去的估价和教训转到现今的问题，我首先谈一谈一项具体的但格外猛烈而尖锐的指责。这项指责简直出乎我的意料。

某一位批评者甚至说，我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把红色恐怖的“责任”（?!）推给了列宁。说实在的，这种想法意味着什么呢？看来，这种想法认为，有某种必要推卸对作为革命斗争工具的恐怖手段的责任。然而怎么会出现这种必要的呢？我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心理上对此都无法理解。不错，通过革命、宫廷政变、阴谋等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政府总是感到有必要用忘却的帷幕遮盖住自己取得政权的条件。用暴力手段攫取了政权的资产阶级政府在站稳脚跟，有所巩固并且自身培育出必要的保守素养之后，总是把粉饰、伪造自己“不合法”的过去，抹掉对所采用的血腥暴力的回忆当作自己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可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怎么竟然也会有这种需要呢？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存在7年多了，我们甚至同最保守的英国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接待有爵位称号的大使们，但是我们丝毫不放弃那些使得我们党执掌政权并且作为十月革命的经验已被纳入世界革命运动武库的方法。我们现在如同在为了拯救革命而不得不采用革命暴力方法时一样，也很少有理由放弃或避而不提我们曾经采用过的这些方法。不错，我们接待有爵位称号的大使，我们允许私人资本流通，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出现了苏哈列夫卡^①

^① 苏哈列夫卡——莫斯科苏哈列夫卡广场上的市场，在国内战争期间是投机商和粮贩进行黑市活动的中心，1920年12月13日封闭。

舆论。当然，全俄苏哈列夫卡虽然不得不服从于苏维埃政权却总是在向往用极端“非法的”、“野蛮的”手段夺取政权的苏维埃政府能有所改观，能变成真正“文明的”、“可敬的”的民主政权亦即保守的资产阶级政权。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仅我国尚未成熟的资产阶级，而且还有国际资产阶级，都将很乐意宽恕苏维埃政权的“非法”出身，因为他们相信我们自己也不会再加以提及。然而既然我们丝毫也不想改变自己的阶级本质，既然我们仍毫不动摇地以革命的态度对资产阶级舆论嗤之以鼻，我们就没有任何必要否认自己的过去，去“推卸”自己对红色恐怖的责任。那种想把这一责任推卸给……列宁的想法是非常不光彩的。谁能把这一责任“推卸”给列宁？列宁本来就承担着这一责任。对十月革命，对变革，对革命，对红色恐怖，对国内战争，——对所有这一切列宁在工人阶级面前，在历史面前都承担着责任，而且将“永生永世”承担着它。或许这里说的是过分措施和过火行为？可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革命会没有“过分措施”和“过火行为”呢？这个简单的道理列宁曾经对那些因为4月、7月和10月的过火行为而大惊失色的凡夫俗子讲过多少遍啊！是的，什么也不能解除列宁对红色恐怖的“责任”，什么都不行，谁也做不到。即使那些过于巴结的“捍卫者”们也做不到。红色恐怖是革命的必要手段。没有红色恐怖，革命就可能夭折。有多少次革命由于劳动群众的意志薄弱、犹豫不决和心慈手软而夭折了。即使我们的党，尽管经受过以前的锻炼，也保留着心慈手软和革命麻痹大意这些因素。任何人也没有像列宁那样事先就深思过革命的难以置信的困难，其内在和外部的危险。任何人在革命前也未曾那样明确地认识到，不镇压有产阶级，不采取历史上最严厉的恐怖措施，无产阶级政权在被敌人四面包围的情况下就永远无法坚持下去。列宁一点一滴地灌输给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们，再通过他们并同他们一起灌输给全党和劳动群众的，正是自己的这

一认识和由此而产生的顽强斗志。我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谈到的正是这一点。我描绘了列宁如何在革命初期观察到处存在的漫不经心、麻痹大意和面对重重危险和灾祸的盲目自信，时刻教导自己的战友们，只有改变自己的性格使之变得更为严厉，并且用红色恐怖之剑武装自己，革命才能得救。我在回忆文章中谈的就是这一点。就是列宁伟大的洞察力，就是伟大的精神力量，就是毫不留情的革命精神——同时他有着个人的伟大人性。想从我的话里找出另外的意思，想从中发现有把对恐怖的责任“推给”列宁的意愿，这只能是政治上的愚蠢和心理上的龌龊。

如果我也像某些批判我的人那样无端恶毒怀疑，我满可以说：不应当在我这里寻找“新经济政策”倾向，而恰恰应当在那些竟然想要否定红色恐怖的人那里去寻找。倘若苏哈列夫卡那帮家伙中有谁真的相信了诸如此类的指责，并且因此想入非非，那么，这只能说明，是指责我的人造出了苏哈列夫卡问题上的托洛茨基主义幽灵——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我同这一幽灵有什么共同之处。

* * *

对待苏哈列夫卡——国内的也好，侨居国外的也好——提出的证据总的说来应当慎之又慎。当然，形形色色的敌人都对我们的每一个分歧、每一场争论悲剧兴高采烈，都竭力扩大每一丝裂缝。不过为了从他们的评价中得出某些结论，就需要验证：首先，他们是否明白他们所说的事，因为只有有头脑的敌人的严肃、务实、确凿的评价才具有对症的作用；其次，他们是否是为了煽起我们的分歧、对争论火上浇油才专门炮制自己的评价？对待侨民出版物尤应如此，因为侨民出版物没有自己的直接政治任务，没有大量读者，主要利用苏联报刊上对它们见解的反响投机。

我举一个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我们的报刊曾经报道

说，在去年争论期间孟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通报》^①杂志把极大希望寄托在“反对派”或其个别人士身上。我未核对过这种消息，不过完全可以设想，像唐恩一伙那种毕生寄希望于资产阶级民主化的、有洞察力的现实主义者，现在把满怀希望都寄托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孟什维克化上。不过我完全偶然地翻阅了孟什维克右翼的《曙光》^②杂志第7期，看到斯捷·伊万诺维奇^③的文章对唐恩一伙寄希望于布尔什维克党蜕变所作的如下批评：“或许他们（唐恩一伙人）对这个反对派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情况。然而倘若他们知道的只是众所周知的情况，那么他们不会不知道，正是在俄共内的反对派中有最空想的专政拥护者，最死硬的正统专政派。其影响才表现为最近的左派疯狂大爆发、反新经济政策路线等等。单凭行动纲领的字句，如何才能恰恰从这种‘十月’正统派中区分出‘由于自己的地位，对准备民主地取消专政事业能……起相当大作用的人士’呢？行动纲领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并导致阶级觉悟的压力之下’实现。然而这完全是不着边际的假设，而且未待它被纳入行动纲领就已被生活所推翻。在一连串有时甚至提出政治要求的罢工风潮的影响下，俄共反对派要的是强化专政、资产者的血和实行新方针。生活表明，反对派是专政的最死心塌地的煽动者，而行动纲领却要从中区分出民主分子来。与行动纲领大相径庭的生活是多么不合理啊！”（第197页）

我满怀正常的厌恶才在探讨我党内部问题的著述中引用了这个孟什维克白匪骗子文章的一段文字。我决没有想从上述引文之中得出什么政治结论；只有一点除外：对境外侨民的反响和议论要多加

① 《社会主义通报》是马尔托夫在国外办的孟什维克杂志，1921年起在柏林—巴黎—纽约出版。

② 《曙光》——孟什维克的出版物，1922—1925年在柏林出版。

③ 波尔土盖斯（伊万诺维奇），斯捷·（1880—1944）——俄孟什维克，政论家。

小心！对信手拈来的欧洲资产阶级报刊的议论要多加小心！考虑敌人的见解从来都是有益的。然而这要批判地做，不能赋予敌人以超出他们实际所有的洞察力。我们不会忘记，资产阶级总是在盲目议论他们根本理解不了的、构成我们工作主要内容的问题。我们不会忘记，世界资本主义报刊在整个苏维埃制度时期不止一次地宣称，列宁在努力把俄国重新纳入民族保守主义轨道，但是“左翼”在阻挠列宁，被点出姓名的“左翼”分子有时是布哈林，有时是季诺维也夫，有时是本文作者。除了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专政任务一窍不通，这种议论难道还能显示出别的什么吗？决不能这么办：我们先是用自己有失公允、牵强附会的指责把望眼欲穿的资产阶级报刊引入歧途，然后再把其中对我们言论的歪曲反映当作颇有说服力的资产阶级评价。我们这样做就是把我们自己炮制的那个幽灵的幻影当成了现实！

* * *

批判家们，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同志为了使引用旧著的文字拼凑而成的“托洛茨基主义”幽灵多少具有某种现实性（轰动性），提出了——诚然，采取的是最为泛泛而且模棱两可的形式——现行国内政策问题。我从未就此类问题挑起过任何争议。季诺维也夫同志就此类问题也未能提得出任何具体的意见冲突。我的前言根本未给讨论此类问题提供任何口实。我在任何场合都未对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提出过异议，而且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严格加以贯彻。然而总是把我的前言的背景说成是去年的争论，而不是德国革命的失败。正因为如此，我的前言才成了提出我的整个“路线”问题的借口。

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在他看来可以把我的路线说成是反党路线的罪状。

我似乎极力想削弱党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我决不能接受这一

指责。为了使这一笼统的问题能谈得十分具体，我想提一下，近来中央通过一系列决定重新断然决然地反对由党的机关来替代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这一决定是否削弱党的作用呢？不，正确执行这一路线只能加强并且强化党的作用。不言而喻，在这一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实际的意见分歧。然而就是对这样的纯实际的意见分歧季诺维也夫同志也没有举出任何新的例证，因为在我们的工作实践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分歧。

我还根本不能接受另一项指责：说我极力想把党变成派别和集团的总和——就像英国工党那样。这种断言的似是而非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不论我对十月教训的理解正确与否，根本不可能把我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看成派别集团的工具。我没有给自己提出也不可能提出这样的目标。以为在一个群众性的执政党里根据历史评价就能组织起“集团”来，这种想法十分荒谬！

我不想去谈诸如“专家”、财政、国家计划等等问题，因为我完全没有发现这方面有什么可供“争论”的材料，而且从未为重新提出这些问题提供任何借口。

最后，还有我对农民估计不足的问题，据说这是我的错误——真实的和虚构的——的主要根源。我不想再谈过去，因为这会让我们钻进死胡同。我不想多说我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错误是由于期望德国革命运动能更快地发展，而不是由于“忽视”农民（我没有估计到农民会参加革命战争而造成的）。然而对于现在和未来，我认为必须谈一谈这一基本指责，模糊不清却一再提出的指责。

不过我在这里不能不指出，库西宁^①完全随心所欲地歪曲布

^① 库西宁，奥·威·（1881-1964）——芬兰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苏共中央书记、主席团委员等职。

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史实。照他的说法是：我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带了党的指示（一旦提出最后通牒就签约），却自作主张地违背这一指示并拒绝签字。这一谎言简直不着边际。我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只带有一个指示：尽量拖延谈判，而一旦提出最后通牒，就争取缓期并返回莫斯科参加中央决策。只有季诺维也夫同志一人提出给我立即签约的指示。但是这一建议被其他所有人投票否定了，其中包括列宁的一票。当然，大家都同意，继续拖延谈判会使条约的条件更为不利，但是都认为，宣传上的所得会大于所失。我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是怎么做的呢？在真的提出最后通牒时，我争取到了暂时休会，回到了莫斯科，然后由中央来作出决策。不是我自作主张，而是根据我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决定不签署和约。全俄党的会议多数与会者的决定也是如此。我最后一次回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带有党的完全明确的决定：不签署条约。这一切完全可以根据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加以核实。库西宁粗暴地歪曲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史实。不过我还是认为，他并非出于恶意，而是由于不明底细，又不知就里。

首先需要驳斥一个似是而非的想法，即认为“不断革命”这一公式对我来说是某种偶像或信仰的象征，我由此推导出自己的一切政治判断和结论，而同农民有关的问题则更是如此。这种说法根本没有丝毫真理可言。自从我为了弄清未来革命事态发展进程而写了关于不断革命的文章以来，业已过去许多岁月，革命也发生过了，苏维埃国家也已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认为我现在对待农民的态度是由对某一年我关于俄国革命发展设想的理论回忆所决定的，而不是由我党的集体经验和我个人的经验来决定的，这种想法难道是严肃的吗？要知道，后来有了——而且我们都得到了教益——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克伦斯基政府统治、土地委员会、农民代表大会、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作斗争的时期；有了在斯莫尔尼宫不断举行土

兵代表集会，我们在会上为争取影响武装起来的农民而斗争的时期；还有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经验，当时老布尔什维克们虽然同“不断革命”毫无关系，他们领导的党的相当一部分人却指望打一场革命战争，他们使得全党通过错误汲取了颇多教训；有了红军建军的时期，当时党以一系列经验为基础创建了工农军事联盟；有了余粮收集制并由此出现严重阶级对抗的时期……后来党又奉行针对中农的方针，这一方针逐步导致党的方针发生相当大的变化——这自然还在同一个原则基础之上；后来又完成了向粮食自由买卖和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并且造成了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难道可以在天平的一头放上我们大家共同享有的这一宏大的历史经验，另一头放上不断革命这一老公式，把这个公式说成是处处、时时、在一切条件下都使我对农民估计不足？这样做不对，也不符合实际。我断然决然地反对这种对不断革命公式的神学式态度。这一公式本身反映了早已过去了的一个发展阶段。重又搬出并夸大这一公式无非是因为否则就难于论证今天的“对农民估计不足”并炮制出“托洛茨基主义”的幽灵。

列宁在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中写道，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成为党的分裂根源的主要政治危险，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基本阶级分裂的危险，它们的合作无疑是保持并发展十月成果的绝对必要条件。如果从两个基本阶级利益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危险性，那么可以这样说：只有保持工人和农民物质利益的一定平衡，才能保障苏维埃国家的政治稳定。执政党要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来建立这一平衡，因为国家的经济水平在变化，两个股东各自对共同事业的投资在变化，私人资本从他们手中窃取的份额在变化，两位盟友各自从共同劳动中获取的股金在变化。在这种条件下，对农民的实际估计不足或轻视农民究竟表现在哪里呢？这表现在：在两位盟友中起领导作用的无产阶级通过党极力尽可能快地确保自己的基础，工业，

或者提高文化，却过分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就可能导致政治分裂，其首先发难者则可能是农民。我们不止一次把这样一种急躁的狭隘倾向——它已经有所表现——概括为行会倾向、工联主义倾向，而不是共产主义倾向。不能把今天无产阶级在总的国民经济中的份额问题——这一问题当然极端重要——置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条件的保持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之上。应当认为，我们大家都赞同这一点，而且不是自昨日始。

然而我们大家都完全明白的还有另一点。这就是这一分裂的历史危险有可能从相反的方向出现。倘若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即无产阶级为了保持联盟而不得不承受过大的牺牲，如果工人阶级在几年内得出结论，认为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专政它不得不作出过多的阶级自我牺牲，那么，这也会从另一端来动摇苏维埃国家。

我们现在谈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分裂这一历史危险的两个结果，当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一危险是现实的，迫在眉睫的。不是的，我们之中没有谁会这样认为。我们是从历史前景上来探讨这一危险的，其目的在于更正确地确定今天的政策。完全无可置疑的是：这一政策只能是灵活的，需要十分谨慎地探查河底，留心浅滩，不敢旁鹜地观察两岸——右岸和左岸。同样完全无可置疑的还有，在现今阶段，利益平衡被破坏首先会有损于农村，对此在经济上在政治上都要严肃考虑。

上述一般设想都首先关系到发展工业的问题及这一发展的速度。

如果说苏维埃国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那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则以国家工业和运输业为基础。苏维埃国家没有社会主义专政，就是没有“灵魂”的躯体。它不可避免会发生资产阶级蜕化。然而工业作为社会主义专政的基础依赖于农民经济。不过这一联系是相互的。反之，农民经济也依赖于工业。在这两个组成部分

之中，工业是较为能动的（向前运动的、推动的）因素。苏维埃政权能向农村施加的最强大的影响是通过工业和运输业的渠道进行的。其他影响方法本身也很重要，但仍然是第二位和第三位的。不正确增强国家工业的作用，不强化它对农村的组织影响，其他所有措施都终将无能为力。

城市和农村都在关心工业的加速发展。不言自明，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取决于我们的美好愿望。这存在客观制约：农民经济的水平、工业本身的装备、流动资金、国家的文化水平，等等。试图人为地跨越这种制约，当然会遭受严酷的报复，遭受打击的。一头是无产阶级，另一头是农民。然而工业滞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危险也并不会更小，因为由此不可避免会造成商品紧缺和零售物价高昂，而这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私人资本大发横财。社会主义积累和工业发展的速度不是任意的，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不仅受到已知的最大值而且也受到已知的最小值的限制。这一最小值直接由国内的私人资本的竞赛和国外的世界资本的压力所决定。

我们整个发展中出现的危险具有两面性。工业不能过于冒进，否则工业可能会缺乏国民经济基础。然而滞后也同样危险。工业发展迟缓，丧失时机，每一次都意味着同它竞争的私人资本的增长，农村富农的增多及其对农村经济、政治影响的增强。工业的滞后意味着力量对比变化由城市向农村倾斜，而在农村内部，则贫苦农民向新苏维埃型富农倾斜。这种重心的偏移削弱了无产阶级，必然会使无产阶级今后为了维持工农联盟而不得不进一步在经济上、政治上作出让步。然而非常明显，倘若如此，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内容就会丧失殆尽。

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在千百万小商品生产者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出现的所有困难和危险，我们所有困难合在一起和其中的每一个，都总是如上文所述具有两面

性，而不是一面性的。过分追求工业发展高速度如同工业发展速度过慢一样是危险的。

我希望，这些想法都完全无可争议。或许可以指责说这些想法过于空泛。不过那种说对农民估计不足的指责要更为空泛、模糊，而且极端片面。“估计”农民不能对其本身就事论事，而应当放在阶级动态平衡的框架内进行。世界上不存在事先设定的数学公式，说协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可以直走到哪一条界线，在哪里必须止步。需要通过经常的、积极的机动来确定方针并且摸清形势。然而这种机动对我们党来说过去和将来都不是无原则的随波逐流（如同孟什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设想的）。我们的机动，经济的也好，政治的也好，都属于这样一整套措施：借助它们，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得以保障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也能保障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的最高标准。

一而再，再而三地片面提出关于“对农民估计不足”的指责尤其有害，因为它必然会造成完全毫无根据（这不言而喻！）的担心，以为这仅仅是改变方针——由社会主义专政转向农民工人民主——的理论准备。这当然是胡说八道！我们的党保持着实行机动的完全自由，并且自上而下地由对社会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团结在一起。这是我们大家必须万众一心、彻底履行的列宁的一条主要遗训。我们也一定能加以履行！

1924年11月

№01105

斯大林就经济问题致莫洛托夫

(1925年7月12日)

7月12日于罗斯托夫

莫洛托夫同志：

此信阅后望转七人小组。

(1) 我有一些罗斯托夫朋友。据了解，今年的收成总量将近5亿普特，也就是说接近1914年的历史最高数字（我说的是东南部）。大约富余2.7~3亿普特。罗斯托夫的朋友们认为，我们的出口部门（东南部的）能够完成1.5~1.7亿普特。这样一来，就可以有1.5~1.7亿普特的粮食从东南部地区运到国外去。挺不错。应当注意到这一事实。

(2) 从报上看到，全苏经济管理部门已经拟定出建设新工厂的计划。我担心，他们会不考虑在边境地区搞建设的诸多不利因素就干起来，而且一旦错过时机将无法纠正所犯的错误。例如，他们想在彼得格勒、罗斯托夫建新工厂，这是不合适的。我认为，在制定建设计划时，除了要考虑工厂靠近原料和燃料产地这一原则外，还应注意两点：同农村的结合和新工厂所在地区的战略地理位置。我们的大后方是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黑土区南部（坦波夫、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奥廖尔等等）。现在缺乏工业的正是这些地区（如果不算乌拉尔的话）。而在战局恶化的情况下对我们最有利的后方也正是这些地区。所以，恰恰应当在这些地区发展工业建设。就这方面来看，彼得格勒是绝对不合适的。地方当然会施加压力，但

应当顶住。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甚至应当把它提交中央全会，如果为了顶住地方压力而需要这样做的话。很想知道七人小组对此有何看法。

握手！

约·斯大林

附言：我今天动身去索契。

№10842

斯大林就第聂伯工程致莫洛托夫

(1925年7月20日)

1925年7月20日

莫洛托夫同志：

我在《经济生活报》^①第159号(7月15日)上读到一篇题为《对第聂伯工程方案的检查》的短评，从该短评中看得出，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的话，党(还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就会不知不觉地陷入耗资2亿卢布的第聂伯工程之中。原来捷尔任斯基^②同志已经下了“命令”，责成托洛茨基同志“在10月中旬之前”提交一份工程的经济技术及财务计划，以便“也能将准备工作所必需的贷款纳入1925~1926年预算”。已拨给托洛茨基同志3万卢布用于草拟计划。短评还提出要谨慎行事，等等。但是，既然拨了3万卢布并规定了提交计划的期限，这件事就算是干起来了，因而具有严重性质。

我认为，就我们的财政状况来看，无论今年还是明年我们都不能去搞第聂伯工程。昨天，外高加索的输油管道计划也被否决

^① 《经济生活报》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经济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1918—1937年在莫斯科出版。

^② 捷尔任斯基，费·埃·(1877~1926)——1895年加入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十月革命后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俄共中央委员、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

了，^① 尽管它在当前看来更加现实而且费用低四分之三。试问，我们凭什么非要采纳并不太切合今天的实际而且费用高出三倍的第聂伯工程计划呢？难道我们有那么多钱吗？难道顿巴斯（第聂伯工程所在地区）的燃料现在不是充足而是紧缺吗？干吗这样急着去搞第聂伯工程？

我们需要的首先是为我们的那些破旧的工厂提供新的设备。难道这一需求已得到满足了吗？

其次，我们需要扩建一批农业机械制造厂，因为我们现在仍需在国外购买价值几千万卢布的最普通的农机具。

再次，我们需要至少建造一个拖拉机制造厂，一个新型的大工厂，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或者这样一批工厂，我们就不可能继续发展。

此外，我们还需要建立炼铜业，发展铅的生产，改进我们的军事工业，因为没有这些别人赤手空拳也会打败我们。

难道所有这一切都已得到满足了吗？

我们怎么能在缺少资金的情况下忘掉这一切呢？

我认为，除了种种危险之外，我们还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把那些一点点积攒起来的钱拿来乱花，轻率地将它们白白浪费掉，从而给我们的建设工作造成困难。一个月以前捷尔任斯基同志还明白这一切，可现在他显然已热衷于……

莫洛托夫同志，务请给捷尔任斯基同志读一下这封信。鉴于问题很重要，请在七人小组中读一下并将他们的意见简告我。

握手！

约·斯大林

^① 1925年7月8日中央政治局审议了财政人民委员部对人民委员会关于输油管道问题的决定的反对意见，决定停止输油管道建设，明年再议。

№ 10843

斯大林就第聂伯工程致莫洛托夫

(1925年7月27日)

莫洛托夫同志：

一个星期前我给你本人发了一封信，对第聂伯河石滩电气化工程立刻上马的计划提出了反对意见。还没有收到回信。莫非信在路上丢失了，你收到了吗？不管这封信是否丢失，如果手不懒的话就请写上三言两语。

握手！

约·斯大林

№10844

斯大林就经济问题致莫洛托夫

(1925年7月28日)

1925年7月28日于索契

莫洛托夫同志：

应当考虑一下组织分配部^①的问题。格伊^②大概不适合这项工作。他年轻，没有什么名气，资历也浅，不会有威信的。不论问到谁，都这样说。克里尼茨基^③也不合适，或者更确切说，还不如格伊合适（理由是同样的）。是否该任用柯秀尔^④而把格伊派往

① 俄共中央组织分配部成立于1924年，是中央书记处的组成部分，其任务是建立和加强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为中央和地方党的机关选拔和分配党的下部，等等。

② 格伊，K.B.（1896—1939）——191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4年任彼尔姆边疆区区委书记，1925—1926年任中央组织分配部部长。1926年8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任乌拉尔区委书记。1924—1934年为联共中央候补委员。

③ 克里尼茨基，A.H.（1894—1937）——191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4年起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27—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部长。1930年起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24—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④ 柯秀尔，斯·维·（1889—1939）——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年起历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和联共（布）中央书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西伯利亚呢？也许，还可以任用什维尔尼克^①或者扬松^②？鲍曼^③怎么样？他不会太嫩吧？好像他也嫩。总之，组织分配部是件棘手的事，要在代表大会之前解决好。

近日我看到报纸说，纺织辛迪加已作出决定，说是由于缺乏原料——主要是土耳其斯坦的棉花供应不足——明年的生产不会扩大得太大。如果这是真的，如果原因确实在于原料，那么在我看来，辛迪加的决定是极为错误的。对我们来说，在美国多买些原料（顺便提一下，美国的棉花现在便宜），然后在我们这里加工要比在网外购买纺织品合算得多。从各方面来看都更合算。这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大事。辛迪加的情性不难理解：它不愿扩大生产，是因为扩大生产会带来一些麻烦，既然辛迪加已经如此兴旺发达，何必自找麻烦。这种由于垄断而滋生起来的情性极为有害，无论如何必须加以克服。请你同捷尔任斯基谈谈这个问题，给他看看我的信，让他促一促辛迪加。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大问题。要么是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对国家、对工人、对那些可以通过扩大生产而得到安置的失业者都有利；要么是我们解决不好，到那时别的不说，光是我们在这方面让外国布匹商赚去的钱就得几千万。

紧紧握手！

约·斯大林

-
- ① 什维尔尼克，H.M.（1888～1970）——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4年起任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5～1926年任列宁格勒区委书记和联共（布）西北局书记。1925年起为中央委员。
- ② 扬松，H.M.（1882～1941）——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5年起任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3～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 ③ 鲍曼，K.Я.（1892～1937）——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8～1930年任莫斯科委员会第二、第一书记。1929～1934年任中央书记。1925年起任中央委员，1929～1930年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0845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5年7月)

莫洛托夫同志：

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事的确不妙。捷尔任斯基干着急，他太累了，^① 不过无火毕竟不会生烟。就连政治局现在也很为难，因为它脱离经济事务。仔细看看《经济生活报》，你就会明白，我们的各项基金是由斯米尔加、斯特鲁米林再加上格罗曼来分配的，而政治局……政治局正从一个领导机构变为一个受理上诉的机构，一个类似“元老院”的机构。有时甚至更糟——管事的不是国家计划委员会，而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各专家“组”。可见，捷尔任斯基真该不满意。而工作当然也因此必不可免地受到损害。除了改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并有政治局委员参加该委员会外，我想不出别的解决办法。

敬礼！

你的斯大林

① 1925年7月25日斯大林给捷尔任斯基发去如下的一封信：“7月25日于索契亲爱的费利克斯：

我从莫洛托夫那里得知您已申请辞职。恳请您别这样做。您没有理由这样做：（1）您那里的工作开展得不错；（2）有中央的支持；（3）我们将改组劳动国防委员会，使个别人民委员部无法结伙来损害国家利益；（4）我们将把国家计划委员会及其各部门的工作纳入正轨。请再忍耐两个月吧，我们会使情况好转起来，真的。紧紧握手！

您的斯大林

附言：身体怎样？”

№ 10846

莫洛托夫致捷尔任斯基

(1925年8月7日)

捷尔任斯基同志：寄上斯大林同志的两封信（在7月28日写的第二封信中，请注意用红笔所划的地方）。我知道你在病榻上反正要处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事务（可以理解，这样不好，最近我要就休假问题同你严肃地谈谈），所以请您就斯大林同志的问题提供资料。我本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我不怀疑，您也是这样。等待您关于第聂伯工程和纺织辛迪加的报告。斯大林问过我这些事的情况。祝您康复和即将休假！握手！

维·莫洛托夫 8月7日

又及：所附斯大林同志的信，请退还。维·莫·

№02765

托洛茨基：《日常生活问题》日文版前言^①

(1925年8月13日)

获悉我的小书《日常生活问题》将用日文出版，非常高兴。这本小书当然远不是在各方面都能符合日本读者需要的。社会条件的差异实在太大了。我的这些有关日常生活问题的随笔是在我们的革命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和需要的直接压力下写出的，因此，涉及到的不仅有日常生活中的大问题，还有日常生活的琐碎问题。对我的小册子讲到的许多问题日本读者可能不太感兴趣，对有些问题他们也不会明白。不过我仍然希望，这本小书对日常生活问题所持的一般见解即使在日本生活的条件下也能得到运用。

在旧日封建社会里，日常生活问题不成为问题。封建主义的社会条件和生活条件是数百年间形成的。在日本，这一历史时期从封建军事帝国——幕府将军——算起前后近千年。无论日本的社会结构还是个人同家庭的关系在这个时期当然都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很慢，一代一代人都难以觉察，生活方式代代相传，不容违抗，就如同蜂房组织由一代蜜蜂传给另一代蜜蜂一样。在这种条件下，作为个性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它完全同等级的传统、规矩、戒条联系在一起。这种社会环境非常保守，因而完全敌视任何外来影响。坚强、完整、保守的日本对美、欧思想和关系入侵的抵御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

① 未完成的前言。

1868年被认为是大转折的一年。那场政治危机是同欧、美生活中的时代转折同步的。在北美合众国，北方和南方为取消奴隶制发生了战争（1861至1865年）。在俄国，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意大利为自己的民族统一高举起佩剑。因此，日本的大转折把日本纳入新的、资产阶级关系和思想的世界。日本的社会生活是沿着旧的封建关系同新的资产阶级关系相妥协的路线发展的。在经济关系中，在国家制度上，在个人生活里，我们都能观察到这种妥协。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在摧毁旧的封建等级关系，唤醒了人的个性意识。这种觉醒在不同的阶级采取了不同的形式。然而，在一定程度上，资产阶级社会不同阶级的共性则是，个人在极力抛弃传统的束缚，为自己提出独立的目标和任务。对日常生活关系的批判，和在新的、更理性的基础上将其重新建立起来的努力，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资本主义在产生出这种努力之后就取消了其实现的可能性。

列·托洛茨基

1925年8月13日

№10847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不早于1925年8月20日)

莫洛托夫同志：

你8月20日的来信收到了。今天我同布哈林交换了意见。

(1) 你建议全会^① 议程包括5个问题：1. 外贸，2. 工会，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4. 工资，5. 中亚的土地改革。对这个议程我没有异议。对工资问题（有计划地提高工资等）作好准备很重要。这件事是七人小组提出来的，未经政治局讨论将准备工作委托给了施米特。勤催着他点儿。在对这个问题作准备时应事先通过政治局。最好再加上工业建设问题，由费利克斯或皮达可夫作个报告（这里没有斯米尔加什么事，他领导经济是个冒牌货，况且要谈的是工业而不是整个经济）。但如果费利克斯目前作不了报告，可以推迟到下次全会，但要作出坚决保证，即不经政治局批准在这一时期不开工兴建任何一个全苏规模的工厂。

(2) 关于乌克兰贫苦农民委员会问题没有必要形成文件。乌共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同俄共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定完全一致。最好在中央全会上将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提出来，而且报告中要谈贫苦农民委员会、农民委员会等。这也将

^① 1925年10月3~10日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下列问题：1. 对外贸易。2. 工会工作。3. 工资问题。4.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5. 当前经济政策问题。6. 外国共产党状况。7. 俄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的日程、地点和日期。8. 关于撤销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委工资委员会问题。

是对乌共中央决定的肯定。这个报告应由你来作。一定由你来作。^①

(3) 如有必要，可在下次全会上提出经济计划，报告不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来作，而是由李可夫（人民委员会）或加米涅夫（劳动国防委员会）并吸收中央监察委员会来作。

(4) 关于代表大会议程我们以后再谈。

(5) 你如有时间，信请写得勤些，——我将及时复信（我时间有的是）。

(6) 布哈林说你现在工作严重超负荷。我力争 10 月或更早些回到莫斯科，以减轻你的负担。

我很健康。身体恢复得相当好。

握手！

你的约·斯大林

附言：关于工会的提纲总的来看是可以接受的，但由于个别提法有毛病和不够明确，还需要进行修改。必须根据安德列耶夫的著名讲话的精神进行修改。

约·斯·

^① 莫洛托夫在农村工作委员会上作了报告，赞同乌共中央的决定。

No 02764

拉狄克：关于共产国际政策的提纲草稿

(1925年8月)

1. 自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①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十分清楚地证明，第五次代表大会就共产国际的策略及其组织政策问题所奉行的基本路线不符合工人运动的利益，这一路线不仅不能使西欧各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相反，却导致了“左的”召回派的产生，进而割断了共产国际同广大工人群众的联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扩大〔全会〕和在其召开之后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都不得不采取措施来挽救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局面。这些措施纯属凭经验采取的，无论就其前提而言还是就其效果而言，都未经过深思熟虑，因此，既没有能使有关各党的党内生活真正健全化，也没有能在共产国际尚未来得及阻止有关同志“左”的冲动的国家里停止继续贯彻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错误政策。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的这段时期里所发生的事件都证明，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断发出的必须实行集中领导的号召并不符合实际。只要没有发生大灾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忙于各党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而不是它们的政策。对于那些共产国际所面临的，西欧各共产党不能独立解决，而只能由共产国际的优秀分子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基本问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既没有提出过也没有研究过。这些问题任

^① 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1924年6~7月在莫斯科举行，主要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和策略的报告；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俄共（布）党内的争论；法西斯主义；工会运动的策略等等问题。

由各议会党团去随便解决，而且解决时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共同路线。尽管如此，如果在一系列国家里共产党的处境重新有所改善，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仅仅是由于资本主义稳定政策的压迫加强，从而把工人群众推向左转。很说明问题的是，在共产党相当弱小的英国出现了最为激烈的左倾；这种左倾是按照英、苏两国工会接近的路线，而不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轨道进行的。

2.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政治路线是以下列前提为依据的：由于资本主义有可能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稳定下来，必须把各个共产党的领导权交给年轻的左派分子执掌，因为他们没有受过社会民主主义的熏陶，因此较易进行反对作为法西斯主义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他们能更坚决地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去动员工人群众。作为防止这些左派分子脱离群众的保证，业已嘱咐他们要为争取工会而斗争。德国和波兰的货币稳定，信贷体系开始恢复以及专家们所撰写的报告，都反映了资本主义稳定的趋势，面对这一趋势，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不仅不打算把有关纲领的争论进行到底，而且甚至未制订出与行动纲领有关的要求，来反对国际资本主义把稳定资本主义的全部重担转嫁给无产阶级的企图。

根据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德国斯巴达克小组、波兰的基本领导核心（瓦尔斯基^①、瓦列茨基^②、科斯特尔热娃、普鲁赫尼亚克^③）被排除出党的领导之外，捷克党中同群众联系最密

① 瓦尔斯基，阿·（1868～1937）——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和波兰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波共中央委员（1919～1929）和政治局委员（1923～1929）。

② 瓦列茨基，马·亨·（1877～1938）——波兰社会党左派领导人之一。波兰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1921年起是波兰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1925年转成联共（布）的党员。

③ 普鲁赫尼亚克，爱·（1888～1937）——波兰和俄国革命活动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1935）。

切的同志——什麦拉尔^①、穆纳、萨波托斯基^②、克赖比赫——实际上被排斥于党的领导之外，荷兰共产党的缔造者——怀恩科普^③、拉维斯泰因^④和塞通——也被排斥于领导工作之外；在挪威，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之前发生了分裂，此后同群众联系最密切的舍夫洛同志实际上也被解除了领导职务。在美国的“工人党”内，就在其他国家发生政策转向的时刻，其为数不多的同群众保持联系的领导成员之一、美国一系列大罢工的领导人、广大群众中十著名的福斯特^⑤同志也被排斥于领导工作之外。尽管他的志同道合者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占多数，但党不再由他掌舵了。

在共产国际各党中掌权的共产国际左翼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直接压力下丝毫也承担不了共产国际的宣传任务。左翼时时处处都反复提出要布尔什维克化和列宁主义，但他们由于过去未受过任何马克思主义的训练，甚至不能安排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倘要为之辩解，只能说他们未能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任何帮助。在宣传列宁主义上共产国际惟一做到的，就是出版了一卷德文版的列宁选集。如果说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前各国共产党还出版了一

① 什麦拉尔，博·（1880～1941）——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922～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

② 萨波托斯基，安·（1884～1957）——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1921年当选中央委员，1922～1929年任捷共中央书记。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1948年起先后任政府副总理和总理、共和国总统。

③ 怀恩科普，戴·（1877～1941）——荷兰工人运动活动家。1918年参与创建荷兰共产党，任主席，1920年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6年被开除出荷兰共产党，1930年恢复党籍。

④ 拉维斯泰因，威·万·（1876～？）——荷兰社会党人。曾创建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和荷兰共产党，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机关报《论坛报》的创办人和编辑之一。

⑤ 福斯特，威·（1881～1961）——1921年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2年当选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4年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1957～1961年任美国共产党名誉主席。

些普及性的宣传读物或者翻译了一些有关的俄文著作，那么现在连这一工作也停止了。本该宣传列宁主义的惟一的“独立”著作即马斯洛夫^①的《1917年》一书，在借助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闻所未闻的广告宣传而风行数月之后，被共产国际正确地宣布为招摇撞骗、错误百出的修正列宁主义的企图。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半径空前地缩短了，因为它们不会在无产阶级所经历的全世界的异常复杂的形势下所提出的日常要求的基础上从事这一工作。到目前为止，各个共产党还不会充分利用议会讲坛来进行明确而又清楚的共产主义鼓动，在那些“左”派分子已经从党团里清除了所谓右派分子的地方，议会讲坛成了“左派分子”诋毁共产主义的工具。自第五次代表大会至今，共产国际第一次可以作为宣传小册子来翻印议会演说稿，但这是克拉拉·蔡特金的演说。各议会党团在最紧迫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庸俗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纳税问题），而最坏的则是自由主义立场（左派分子罗森贝格^②关于海关税问题的发言）。惟一的亮点是法国同志就摩洛哥问题头头是道的发言或者什麦拉尔和克雷比赫^③在捷克斯洛伐克议会里的发言。由于在资本主义稳定时期议会讲坛鼓动的作用增大了，这种不善于利用议会讲坛的所起的消极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大了。

在工会中“左倾”方针的破产表现得极为明显。除英国之外，在所有国家都可以看到共产党人对工会的影响在缩小，或至少已非常不景气了。造成这一无庸置疑的事实的原因并不是左派领导者们的恶意，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才迫使他们明白工会的意义。左派未能争取影响工会而斗争，这是因为：（1）在依靠工人阶级最缺乏耐

① 马斯洛夫，阿·（1891～1941）——德国共产党内极左派的领袖之一。

② 罗森贝格，阿·（1889～1943）——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任德共中央委员会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7年脱离德共。

③ 克雷比赫，卡·（1883～1966）——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心的青年时，未能通过他们来深入工人群众之中（在某些国家，如在德国，我们整个一批有经验的工会工作者都被作为“右派”而从工会运动和党的工作岗位上撤掉了）；（2）他们认为为赋税方面的要求等等而斗争是改良主义，两手空空地加入工会；（3）他们在宣传鼓动上未区分社会民主党群众和社会民主党领袖，把整个社会民主党斥为法西斯主义的左翼，自然就把工人群众从自己身边推开了。

法国的选举表明了共产党人在最为工业化的选区力量很弱小。在德国，如同近来《红旗报》^①所承认那样，我们恰恰在大型工厂里丧失了根基，而曾几何时我们在那里的力量曾相当强大。《红旗报》公开声明，其原因不仅在于企业主们对共产党人的迫害，而且在于共产党人不善于接近基本工人群众。这一切使得德国共产党人所获选票减少，自1924年春至1925年5月他们至少失去了250万张选票。法国的市政选举也表明选票减少或停滞。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的对手们未能摧毁党，这是由于左派分子在前一次代表大会上虽然排斥了党的领导层中同工人群众联系最紧密的人，却没有别的人能在基层群众组织中取代他们，党因此才得以通过所谓“右派”同群众保持联系。加之，所谓“左派”同所谓“右派”一致反对真正的共产主义叛徒（布勃尼克集团），重新建立起符合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人员构成的领导机构弥补了已造成的损失。

各个共产党举行任何超出集会和街头示威的群众运动的能力业已大大减弱了。只要指出以下情况就足够了：经过一年来的法国财政危机、物价腾飞、摩洛哥危机和叙利亚危机之后，法国共产党1923年10月12日组织抗议罢工的尝试以彻底失败告终。

3. 共产国际的左的方针不仅意味着脱离社会民主党群众，脱离同情共产主义的群众，而且它还会导致脱离共产党的党员群众。

^① 《红旗报》——德国斯巴达克联盟和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1918年创刊。

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左派领导在党内只占少数的国家里，甚至还出现在像德国这样的国家里，德国的左派领导是在党员群众因 1923 年 10 月的失败而对旧领导深感失望急剧向左转的背景下才掌了权的。由于党的“左派”领袖们宣布整个旧的领导层均已沾染了机会主义，由于他们懂得党的多数积极分子都跟随旧的领导层，由于他们毕竟不能把广大“左派”阶层置于同党的历史和经验相对立的位置上，于是他们不得不冻结所在基层党组织的活动。任何一个党员只要在党的会议上敢于批评新领导人哪怕是在党员群众众目睽睽之下所犯的错误，均被他们解除职务，作为受机会主义沾染了的人而遭到迫害。他们使得大家在党的会议上都噤若寒蝉，党的会议变成了最终作出官僚主义决定的场所。这种状况的结果是，党员群众对党的生活完全失去兴趣，言不及义的会议保持了“思想一致”。几个月以前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这种状况。现在在法国也是如此。那些使党与群众接近的人，那些争取现实的鼓动纲领的人在德国都被开除出党（亚纳克集团其实就是因为提出把纳税制度等作为动员工人群众反对专家报告的手段而遭开除的）。

为了在短时间内就组织起新的“左派”的党的积极分子队伍，左派们提拔任何一个“激进的夸夸其谈者”，既不问他关于党的问题，也不问他的个人历史。这样，一些品质不端分子在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混进了党的领导机构，后来不得不把他们清除出去。在德国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一连串匆忙吸收的“左派”的党的官吏们盗窃公款事件。结果，在那些即使不了解丑闻内幕也能识别这些人的道德面貌的共产党人和非党人士眼里，党的信誉扫了地。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但不抵制驱逐所谓右派的行动，而且解除了他们所有与共产国际直接有关的职务，即使他们为了党的利益同意去做非领导工作也不行。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甚至禁止翻印《真理报》刊登过的或者党的中央出版机构发表过的托洛茨

基、拉狄克、塔尔海默^①的文章和小册子，德国党中央委员会还订购了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宣传小册子。当德国党内驱逐了近百名具有地下斗争和军事斗争经历的优秀工人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却不加干涉，而这些人即使在被开除后的所作所为也表明，他们是共产国际中最为坚定、最有觉悟的分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允许法国共产党开除像罗斯梅尔和莫纳特^②这样宝贵的工团主义分子。本来可以同化他们的，相反，却又把他们重新推向工团主义了。即使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得不对捷克党和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化提纲作出组织改变，在纸面上对共产国际各党的党内压制作出判决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以告密为由炮制了布兰德勒、拉狄克及其同志案件，批准了禁止他们“干预”共产国际事务的骇人听闻的判决，这就实际上表明赞同整个全面压制的制度。

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直接组建各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各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整个人事政策的同时，从未向共产国际发出过最起码的指示。我们已经说过，共产国际未能帮助任何一个党就所有当前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确定立场。这种缺乏政治领导的状况在保加利亚事件和爱沙尼亚事件以及德国的总统选举中表现得尤为严重。我们不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同保加利亚事件，同爱沙尼亚事件的真正关系，我们不仅不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同这些事件的实际关系，甚至不知道它对这些事件的政治态度，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拒绝对这些事件作出任何明确的公开评价。这只能有三种可能性：或者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这些事件负有责任，这就意味着纯粹政治冒险主义；或者共产国际执委会不知道这些事件的酝酿过程，

① 塔尔海默，奥·（1884—194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18—1923年任德共中央委员，曾领导德共内的右翼，1929年被开除出党。

② 莫纳特，皮·（1881—1960）——法国工会活动家。1904—1914年是法国劳动总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这就表明完全缺乏政治领导；最后，或许共产国际执委会参与过最初的几个准备步骤，确信这些步骤毫无希望之后没有勇气和决心中止这些准备工作，挽救党不让它遭到多年一蹶不振的下场。这又将是闻所未闻的缺乏领导的明证。我们认为，可以排除的只有第一种可能。德国总统选举时的事态发展充分展现出完全缺乏领导。尽管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时候将进行总统选举，共产国际执委会却未对德国共产党作出任何指示。该党进行的是符合第五次代表大会路线的运动，这条路线使该党不能在改选时采用统一战线策略。结果共产党遭受重大失败，而共产国际执委会只是按照被这一失败吓破了胆的马斯洛夫的建议，决定建议共产党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但连这一决定都为时已晚，传到柏林时该党已独立推出台尔曼^①作候选人。这并未妨碍共产国际执委会攻击德国党的领导。后者则公开声明，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采用统一战线策略是由它最先提出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缺乏领导造成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下属各党的混乱。

说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缺乏对各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不能不提共产国际执委会对驻外代表的选派工作。派作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某些人不但在1923年10月表明完全缺乏任何党的责任感，而且向各个群众性大党派去的同志既没有组织工人群众的经验，也没有党的政治工作经验。一些同志在俄共内从未起过任何政治作用，被派出的甚至还有早在大战时期曾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报刊充当过领导角色的人。

5. 共产国际执委会只是在面临各个党瓦解的危险时才开始改变政策，向绝对必需的压力让了步。例如，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

^① 台尔曼，恩·（1883—1944）——1903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8年成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1920年底成立德国统一共产党时当选中央委员，属“左派”。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维护“进攻理论”。1923年10月领导汉堡工人武装起义。1925年当选德共中央主席。1933年被捕，1944年在集中营遇害。

会在捷克问题上就作了转变，采取了依靠什麦拉尔派同左翼联盟的方针，正是这一联盟在最后关头使党避免了必然的分裂。在德国，需要有总统选举时的大失败，（思想一致的）党代表大会完全陷入死气沉沉，以及出现有关“左派”开始用国际协议来同在他们看来还不够激进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作斗争的尝试的传闻，只是在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才发表了那封声名狼藉的公开信，这封信说明不仅鲁特·费舍和马斯洛夫，而且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整个“左”倾方针都已破产。当季诺维也夫在俄共中央十月全会作的专题报告试图把问题说成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选错了两名领导人的时候，曼努伊尔斯基^①在《真理报》上公开承认，共产国际执委会选错了它赋予领导各共产党责任的整个党内一层人。在波兰，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参与下选出的领导人根本没有任何政治工作能力，相反，却能够参与组建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左翼”阵线。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尝试使党的领导职位空缺之后，又不得不恢复了刚刚被它清除并遭谴责的所谓右派领导人对党的领导。

6. 这一转变是否是认真的，使人们能相信共产国际的危机正在消失？不是的。这一危机只是采取了较为慢性的形式。压制的放松，在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波兰执行使较健康的左翼分子同老领导人相接近的方针，在挪威尝试转向统一战线策略，这一切或许会延缓西欧各共产党灾难性的瓦解。然而所有这些转变都缺乏动力、明确的思想、对所犯错误的明确认识。时至今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仍未在组织上决定为被开除的德共党员恢复党籍，它在自己的信中指出，德国党的代表大会完全是弄虚作假的结果，却并未去争取，更未争取到召开另一次代表大会并且改选中央委员会，而把党的领

^① 曼努伊尔斯基，德·扎·（1883—1959）——1924—1943年先后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1923—1952年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

导权仍然留在由弄虚作假的代表大会选出的破了产的中央委员会手里，仅仅解除了其政治领导人的职务。反对派分子只有在递交了虚假的悔过声明之后才被允许从事党的工作。部分反对派分子至今仍遭封杀。法国党的压制做法仍然未停止。美国党也如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政治上试图转而采取统一战线策略，却并未为此排除意识形态干扰。在德国，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任务提出要促进在工会中、在社会民主党内组建左翼并且争取同它结盟。可是这一政策要求取消“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主义的左翼”这一口号。共产国际执委会现在建议在德国实行的，而《红旗报》也公开说它符合1921至1923年策略的统一战线策略，却毫无前途。如若像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说的，工人政府只是一个宣传口号，那么，在萨克森、图林根实行统一战线策略就应当是或者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不可能通过民主途径争取到大多数并且利用它来作为实行革命政策的跳板，——这样的设想，不言自明，是不能使我们大张旗鼓地进行鼓动的；或者这种鼓动工作是指望社会民主党人不接受我们的建议，最后一切对他们的成功揭露而告终——而这种出发点无疑是不能促进我们和社会民主党群众接近的。只有说服社会民主党群众相信我们愿意实际上同他们结盟并接受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才能够有声有色地开展运动，使我们接近群众，使我们能争取相当大的工人阶层脱离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的运动在法国能指望的也同样是上述问题，因为法国的财政危机和殖民地危机可能会发展成大规模的政治危机。

缺乏政治纲领，统一战线运动是不可能持久的。这一纲领不是告诉群众，无产阶级专政具体会是什么样的，而是告诉他们，现在，在资本主义稳定时期该为什么而奋斗，尽管谁都不知道这一时期虽然有种种波动究竟会持续多久。

7. 因此，共产国际的现状要求作根本转变。转变大致如下。必须改变共产国际的组织政策。应当赋予共产党以从自身错误中学习的自

由，以取代领袖自行其是、不断进行人员组合和中央委员会改组。同直接革命斗争时期相比较，在由稳定时期各种复杂过程所造成的革命徘徊时期，同样需要共产国际的集中化。如果说在直接革命斗争时期，任何错误都会立即带来往往是灾难性的后果，那么现在，党已经有时间去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且能自行彻底加以纠正。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只能起到旁观者的作用。共产国际应当就某党的错误发表意见，向它作出指示，但应当使该党的优秀分子通过党内斗争的途径，通过耐心向党阐明所犯错误的途径来执行这一政策。共产国际的中心任务则是，对各共产党研究由生活提出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思想帮助。创办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下科学研究这种问题的国际中心小组，系统刊印解答国际运动当前问题的共产主义出版物，创办国际党校——这就是近期国际性的组织任务。停止把共产国际的优秀分子说成是“右派”的指责，吸收他们参与工作，这不仅会加强共产党，还可以切实纠正健康的无产阶级左派分子的错误并且更新各党的领导，使得年轻的革命一代同最有经验、久经考验的人结合在一起，还可以吸收诸如法国的罗斯梅尔—莫纳特集团这样的人，把他们重新接纳到党内来，并且纠正类似洛里欧集团这样的错误。共产国际组织工作的转变要求停止执行资助各党的政策，特别对那些党已合法化、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更是如此。在存在直接革命可能性的时期，这种资助是必需的，当时党不得不试图争取广大群众，而形势又不允许党为进行这一争取工作而去建立自己的物质基础。现在去资助某党，就是资助独立于党的官僚组织。这种官僚组织不允许党去发展自身的党内生活，担心会被取而代之。然而它在出色地履行扼杀党内生活的功能的同时，却不能成为哪怕是共产国际决议的贯彻者，因为这要求密切联系群众。不取消对这种官僚组织的资助，所有其他改革都将是空想。这一点不适用于没有合法地位的各党，给它们资助是必要的。也不涉及党对出版社、杂志以及能提高党员群众觉悟水平的工作措施的支持。勿庸赘言，

组织政策的这种根本改变不可能立刻进行，它需要分阶段进行。共产国际在最近时期的中心政治任务是制订纲领。纲领应当构筑得相当广泛、灵活，以期做到既能为已夺得政权的党的纲领，又能为正处于夺取政权的征途上的党的纲领，也能为目前只面临争取民主改革斗争的党纲领提供基础和框架。

对共产国际的东方工作的现状应当予以特殊关注。除了中国，这一工作在所有地方才刚刚起步。我们更不必说像伊斯兰东方和中亚这样的未开化地区。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印度，在拥有大工业和革命前景的国家里，共产国际的工作至今都没有做到可以说它在当地已建立起基本组织的程度。

8. 共产国际正历经的危机的意义，克服危机的必要性都是不容置疑的，不能像人们经常所做的那样，把目前的欧洲的形势同1907年至1912年的俄国形势相比。无论对西欧的直接革命前景持多么悲观的态度，毋庸置疑的是，欧洲的群众性工人运动从未被摧毁过，它正在发展，可以期待群众性的大规模厮杀，尤其是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在这样的时期脱离群众，不能服务于群众运动的需要，这就等于死亡。脱离群众就创建不了共产党。因此，即使在由于反革命猖獗一时而使得争取群众的可能性客观上特别小的时候，列宁仍然推动布尔什维克去做群众工作。

在存在群众运动的环境里，在存在群众性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下，缺乏能使我们争取这些群众的政策，这就使共产国际面临全面瓦解的危险。这种瓦解没有任何客观必然性。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都将国际化、尖锐化。共产国际有能力通过组建群众性的革命的共产党来履行自己为未来革命作准备这一伟大任务。

卡·拉狄克

1925年8月

№02766

托洛茨基：同季诺维也夫的联盟^①（日记）

（1925年12月9日）

一、目前争论的根源和方法

1. 目前在列宁格勒组织和中央之间正在展开争论，而且其性质越来越尖锐，这场党内争论的社会基础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相互关系。到目前为止，任何一方均未提出应能改变无产阶级和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力量对比的任何明确的实际建议。党可以断定，租赁制和劳动力雇佣制均未经党内斗争即取得合法地位。降低农业税也是如此。在研究有关粮食采购运动措施时未发现中央委员会分成主张提高价格和降低价格的人。在确定提高工资幅度问题上也是如此。党可以断定在确定1925—1926年度国家预算时同样未见分歧。换言之，在直接或者间接与确定工业及其各部门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促进农业（体现为农民各阶层）的幅度，或者确定工人在国民经济产品中的份额（工资等）有关的所有问题上，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和受到列宁格勒组织支持的少数派之间并没有发现有分歧。最后，对上述所有工作作了总结、并且构成中央向党代表大会提交决议的基础的十月全会决议是一致通过的。

^① 1925年在俄共（布）内部出现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这个反对派没有统一的纲领，共同之处就是反对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要求撤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当时季诺维也夫是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因此列宁格勒就成了“新反对派”的基地。

2. 然而围绕着一致通过的各项决议展开的斗争却越来越具有尖锐的，主要是组织斗争的性质，它只是部分地而且相当不定型地在报刊上和各种辩论中得到反映。党，或者确切些说，其较了解情况的高层，成了围绕无产阶级和农民相互关系问题展开的极其激烈的机关斗争的见证人和半被动的参与者，但双方并未提出彼此对立的一定的立法提案或原则纲领。

3. 至于分歧实质，那么如上所述，分歧无疑是由于各基本阶级所确定的方向，由于它们力求在新的发展阶段确定或明确自己的相互关系，由于他们对未来的担心等所造成的。至于分歧的形式和方法，则它们完全是由近两三年来所形成的党的制度条件所造成的。

4. 至少在目前阶段，确定分歧的实际阶级实质极为困难，这完全是因为党的机关起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在这一方面它甚至已比一年前更加落后了。列宁格勒一致或几乎一致通过反对中央的决议，同时，莫斯科组织也一致——竟无一人持异议——通过反对列宁格勒的决议，仅这一事实就足以令人深思了。显然，在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基于党的书记处机关人员构成和工作，而不是基于群众本身生活的地方因素。一定的群众情绪已经不可能通过群众组织、各级工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正确的反映，只能暗中拐弯抹角地或者通过社会动荡（罢工）的途径传到党的最高层，对思想起到一定的推动，然后凭某个部门机关主管人的意愿才能得到落实。

二、分歧的实质

5. 然而列宁格勒成了反中央的机关反对派的阵地并不是偶然的。党对农村长期采取的种种复杂策略，农村在国家整个生活中经

济上和政治上比重的增大，农村内部分化的加剧，工业对有支付能力市场的滞后，经济中这种或那种失调的暴露，工资增长相对缓慢，来自农村的失业者的压力——所有这一切综合在一起恰恰不能不激起无产阶级中最善于思考的分子对未来的担心。是否出现了由于预见失误和领导错误，或者出于客观原因（实际上自然两者都有）造成的某种失调，事实总归是事实，这些事实由于未经全党舆论有步骤地进行研究，不时引起担心情绪，这一情绪又导致机关张皇失措情绪的爆发。列宁格勒的情况无疑就是如此。

6. 如果抛开蛊惑宣传、流行口号的探索、机关自卫手段等等不说，那么应该说列宁格勒上层所持立场是官僚主义地扭曲地反映了无产阶级最先进分子在政治上对我国整个经济发展前途、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担心。

附注：同列宁格勒组织领导人结盟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总是把他错误理解的农村和私人经济流通的利益同工业的切身利益对立起来，提及这一点决不是否定上文所引用的对列宁格勒反对派作用和意义的评述。机关暗中的斗争不可避免地造成几种相互矛盾的思想倾向互相纠结在一起，乱作一团。这些思想倾向显然会在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中找到自己的真正位置。然而十分显然的是，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为了搞活整个商品流通而准备牺牲工业利益和外贸垄断的这一立场，并未改变列宁格勒反对派的意义。后者是机关上层分子以官僚主义蛊惑宣传的手段去迎合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对我国发展整个进程的担心。

不言而喻，以上所述并不意味着，国内其他地区的工人没有这种担心，或者列宁格勒所有工人都有这种担心。问题在于，这种情绪表现在什么地方，是如何表现的，这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书记处机关。

7. 斗争暂时具有在上层暗中进行的性质，使得它的思想反映

具有极端公式化、教条化，甚至烦琐哲学的性质。党的思想受到机关意见一致的压制，遇到新问题或者新危险的时候，总是绕道而行，总是纠缠于抽象议论、回忆往事和没完没了地引经据典。现在，党的注意力似乎都被报刊上对我国整个制度下理论定义的讨论所吸引。

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8. 1921年，在改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特别坚持把我国形成中的整个经济体制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当工业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时，人们有很多根据认为，工业将主要通过建立合营公司、引进外国资本、实行租让制、租赁制等等的途径来发展，即采用由无产阶级国家监督、指导的资本主义和半资本主义形式来发展。在这种条件下，合作社应成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商品的销售者，因而应是把工业同农民联系起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实际发展却更为妥当。国有工业已占据决定性地位。同国有工业相比，不仅合营公司、租让企业和租赁企业，而且手工业生产所占据的市场份额都很小。合作社向下销售的商品主要来自国营托拉斯，即建设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机构。赋予合作社本身另一种属性，尽管其基层分支机构依托于分散的私人商品农民经济。合作社成为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机构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机构的组成部分，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机构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的舞台。

显而易见的是，对我国经济制度的“国家资本主义”一般定义此刻已失去意义，因为这一定义既不适合国有工业也不适合农民经济；用最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合营公司、租让企业、租赁企业

等)来称呼整个经济体系,这就荒唐地破坏了整个比例关系。

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在1923年争论期间,“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被笼统地用于我们的整个体制,其中包括用于国营托拉斯,明显地违反了列宁对这一概念所赋予的含义。当时,列宁所描述的是不甚理想的前景,即初期纯国有工业的作用很小,而私人资本主义特别是外国资本的作用很大。

9.然而如果把围绕这一问题出现过的混乱——这是由于用不加批判的引章摘句取代了列宁的活生生的分析所造成的——先置之一旁,则无疑可以说,围绕“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形式上的学理主义斗争,反映了由于近几年来农产品供应不足、党的思想极力想重新审视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

10.1923年秋,党的官方思想确定,主要危险似乎在于工业发展过快,这一发展还不具备真正的市场。工业上的主要口号曾经是:不要冒进。是通过静态而不是动态来理解和阐释工农业的相互关系的,即根本没有提出过如下设想:工业是主导因素,正因为如此,工业应当“超过”农业,引导农业前进,而在正确的领导下,这样一种相互关系会前所未有地加快经济发展的整个速度。整个经济方针具有最低纲领的性质。工业的五年计划和其他纲要、运输业、信贷等由于这样的处理都被缩减到可笑的程度。整个经济政治发展空间都被涂抹上对农村市场现状消极膜拜的色彩,每一具体时刻都未充分估计到或者领悟到工业作为经济基础的作用,而工业不应消极地去适应市场现状,而应动态地去形成和扩大市场。

现在,事后再谈1923年在农业和工业领域提出的告诫和教训似乎已经应验了,这同近两年半以来的实际发展情况完全相矛盾。由于逐季度有时是逐月的需要的直接压力,预测和计划,报刊所说的畏缩和舍本逐末的做法总是在不断地修改,同时不仅预测,而且

还有直接领导都不可避免会遭受破坏。^①

11. 现在，我们正处于收尾时期。工业商品的不足对出口工作造成极为严重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反过来又冲击着工业。不言而喻，当前的收尾工作根本不同于苏维埃政权开头几年的收尾工作。当时是经济逐步下滑的结果，现在是增长造成的。然而收尾工作极为鲜明地反映出，在评估经济发展前景时，领导思路令人吃惊地犹豫不决，奉行最低纲领主义，对现实可能性估计不足。

12. 这种预见和现实令人吃惊的背离不能不引起工人阶级最能思考问题的那部分人的担心和疑虑。预测说，不能冒进，不能赶速度，否则会脱离农村。而现实表明工业到处都十分危险地滞后，在工业计划方面必需匆忙作出临时安排。除此之外，又是收尾工作。

13. 在所谓商品干涉的问题上也同样如此。商品干涉的口号——即建议不能忘记国际劳动分工和世界市场，不能忘记必须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来调节国内市场并加速本国经济发展——被宣布为对富农的让步。这一方针包含着对国外市场的消极恐惧，其结论会导致封闭的民族经济理论。现实完全推翻了这种提法。商品干涉是由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促成的。它表明，什么能成为加速国有工业发展的强有力的工具。它出现消极后果，是由于它违背了预测和计划，匆忙加以修改。

14. 越来越清楚，计划工作并不是把受到财政人民委员部限制的部门计划，同预测的或者通过统计所确定的私人经济活动消极地挂钩。国家计划工作依靠强有力的工业、运输业、商业和信贷业的联合体，表现为有意识地提出大规模经济任务并且创造完成这些任务的条件。最低纲领主义或孟什维主义作为对待任务和可能性的态

^① 按准确的时间顺序提供修改各种生产计划的图景，包括揭示向国外订购机车问题是如何处理的。——托洛茨基注

度、方法，不仅存在于政治中而且也存在于经济工作中，况且现在的政治十分之九在于完成经济任务。生产上的最低纲领主义一方面是对国有工业主导作用估计不足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对工人国家所拥有的潜力和方法估计不足的产物。

党需要有对这一基本问题的新方针。国有工业应当成为经济计划工作的中心环节。其基础在于，既在其内部相互关系上，也在其同私人经济的相互关系上，把国有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坚实、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列·托洛茨基

1925年12月9日

No 02687

托洛茨基：关于经济失败主义的指责^①

(1925年12月12日)

有人不止一次地企图把对党的经济领导方法的批评和失败主义，即和对经济危机、对国家经济形势恶化及由此产生的群众不满的估计等同起来。很难设想更为荒谬的污蔑了。只有根据生产力的增长、工业的发展和总体经济成就，才能发现有必要实行有步骤的、深思熟虑的、坚定不移的计划领导。由经济挫折、发展迟缓或者生产力下滑所造成的困难只能动摇苏维埃制度，引发不满情绪或者对未来丧失信心。只有振兴经济，提出的新的、更为复杂的任务才能培育党的思想，使它受到锤炼，把它提到更高的水平。在马克思主义者眼里，这种基本思想是无需证明的。

党内制度问题也完全如此。只有以振兴经济为基础才能设想使党内制度朝真正民主制的方向发展。经济生活的健康搏动，工业的增长，工资的提高，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是团结工人群众、提高其积极性和自主性的必要前提。毋庸置疑，近几年来熟练工人阶层出现失业现象，是机关官僚制度有所发展、有所强化的前提。工人作为生产者，其脚下的基础越牢固，他在苏维埃组织里，在工会里，在党内越感到自己有较大的独立性。因此应该宣布，凡是把争取对经济实行真正社会主义领导和党内真正布尔什维克制度的斗争混同为指望经济挫折和失败的企图都是极端荒唐的。经济管理中或者党

^① 本文件第1页左侧有托洛茨基手写的一句话：“亟应予以发挥。”

的领导工作中的进步趋势只能依靠愈来愈新的经济和文化成就，依靠工农业的增长，依靠工人觉悟的提高及其在全国普遍振兴基础上的文明性和积极性。反对派的方针自始至终即是如此。

附注：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应当看到实行伏特加酒国家专卖制是一个严重的、十分原则性的错误。应当预见到，这一工作在发挥排挤农村酿私酒的作用之前，在城市中就会占领广大的阵地。它会破坏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降低他们的教养，降低国家在他们眼里的威信。它的虚假利益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它对经济所造成的打击，即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摧毁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力量——工人阶级。

列·托洛茨基

1925年12月12日

№02768

托洛茨基：失败主义

(1925年12月12日)

我们坚决、彻底地否认失败主义的指责。

只有经济成就的积累和发展，工业在经济中的作用提高，无产阶级在生产中的作用提高，才能成为彻底纠正国家的阶级路线，使其机关工人化并克服官僚主义的保障。

指望挫折和失败同时就是背叛和愚蠢。

列·托洛茨基

1925年12月12日

No02769

托洛茨基：提纲

(1925年12月)

引言：投票赞成国民经济提纲决不意味这些提纲已经够了。在目前情况下这意味着，提纲十分空泛，可以对其作正确的具体阐释。尽管不想提出其他提纲来替代这一提纲是自然的，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必要说明：代表大会讨论中央工作报告的情况完全清楚地表明这一提纲模糊不清，论证不充分。无论如何应当对这一提纲加以补充，使之变得具体准确，否则，这一提纲仍然是争论之前时期的产物。

1. 对争论的预先总结：对工业的态度是确定政策的试金石。

2. 由于把对基本路线的确定同对具体国家机关（劳动国防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等）政策的辩解和指责联系在一起，问题给搅乱了。

3. 基本路线决定着所有机关——苏维埃机关和包括政治局在内的党的机关——的政策。这一基本路线是由加米涅夫同志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为对抗关于工业的报告而提出的。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争论期间这一路线又有所深化，等等。这一对待工业的基本指导路线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放慢脚步！”

4. 根据“放慢脚步！”的口号制订的工业计划的实际历史。其结果是商品荒。

5. 断言我们可以用乌龟爬行速度来建设社会主义（布哈林），这是胡说。不理解速度问题。世界市场不等待。庄稼汉不想等待。

6. 数量和质量的比较系数问题不是工业统计和会计学问题，而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命运问题。在目前条件下，速度不仅决定着运动速度，还决定着运动方向。

7. 零售价和批发价之间骇人的剪刀差是工业发展速度不足的结果。这种剪刀差意味着，一部分剩余价值落入私人资本手里，换言之，国有工业不但成为社会主义积累而且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来源。这一事实不能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纯粹绝对的对立来掩盖。国有工业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是因为它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国有工业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为资本主义腾出地盘，而且直接滋养了资本主义。

应当补充对价格政策的评价以及私人资本是靠牺牲什么积累的：（1）削减工业增长；（2）削减工资。

7a. 对工业、市场、财政资金等必须相互适应的问题泛泛而谈是可笑的。问题不在于消极适应，而在于在当前客观条件下积极配置资金。应当明白，工业是名副其实的遭受世界资本冲击的战斗前线，其后方即农村市场，并不牢靠。

8. 列宁曾经撰文说，我们必须在所有领域实行最为严格的节约，做到每一枚闲置的戈比都投入到工业中去。在国内战争时期，为了集中人力和财力于前线，曾经关闭了一系列人民委员部。现在当然不可能再实行这种体制。然而只要正确理解工业发展速度和社会主义命运的关系，可以并且应当在40亿的预算中大胆坚决地按列宁方式重新分配资金，对工业再追加3至4个亿。

9. 应当充分提出计划领导问题。应当最终抛弃说某人想把严格计划强加于人之类的愚蠢说法。问题不在这一点上，而是在于要明白，发展速度取决于消除多余的杂项支出，即取决于计划领导的

正确性，而为此需要把经济视野最为广阔并且有专业知识的、最通晓业务的优秀力量都集中到计划司令部之中。

10. 应当一劳永逸地弄清楚，劳动国防委员会、政治局等的领导完完全全地取决于预先能内行而权威地研究计划领导工作的基本问题。苏维埃体制实行8年多了，在业已开始的争论过程中附带暴露出中央统计局不称职，这一情况也证明了我们整个计划领导的不胜任。

11. “面向农村”，如同“面向战争危险”和“面向世界革命”一样，首先意味着“面向工业”。应当根本抛弃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工业是我国经济的从属要素之一，以为计划工作就在于（从财政上、商业上、行政上及任何其他方面）把工业和农业挂起钩来。计划工作只能通过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来实施。

12. 应当结束三年来实际上是通过财政人民委员部来领导经济的传统。对于财政人民委员部，只要能支撑切尔文纸币，一切办法就都是好的。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财政人民委员部不会十分注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

13. 应当从一开始就划定界限，制止商业人民委员部在作用上仿效财政人民委员部。

14. 应当坚定地认识到，国家计划不能如同仲裁法官那样置身于工业、运输业等为一方，农业为另一方的中间。国家首先通过工业来作出计划。必需实行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双重领导。应作为国家计委工作基础的不是抽象的计划经济思想、“挂钩”、“核算”等，而是工业符合国内外一切条件的具体发展。在计划工作这一乐队中工业起着首席小提琴手作用。这表现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应当兼任国家计委主席。

15. 出口的压缩和财政信贷困难的增大是直接由工业落后造成的，即由于不能正确配置人力和资金造成的，而其出路不是靠“放

慢脚步”的口号，即积累工业落后所产生的危险，而是靠采取广泛措施，大胆地、大刀阔斧地修改预算；在于采取实际步骤来引进外国技术；在于从消除由于平行结构、地方主义和不良竞争等产生的极为严重的杂项开支入手，坚决、毫不动摇地使工业本身合理化。

16. 需要保障真正的经济司令部，需要保障真正的经济领导。口号不是“放慢脚步”，而是“步伐更坚定”。

列·托洛茨基

1925年12月

№02770

托洛茨基：对口号和意见分歧的分析

(1925年12月14日)

判断阶级也好，判断政党也好，都不能单凭它们本身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单凭它们在目前提出什么口号。这也完全适用于政党内部的派别。不能就口号论口号，而要同整个形势联系起来看，特别是同某一派别的昨天、同其传统、同其所选拔的人才等等、等等联系起来看。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口号不具有任何意义。如果说它们不能界定某一派别的整个面目，那么，它们就是这种界定的组成因素之一。且让我们就事论事地分析一下某些基本口号，然后根据已出现的政治形势对它们作出评价。

尖锐地提出农民分化的问题无疑是一件具有积极意义的事，单凭这一问题的提出使我们由关于中农合作化的纯粹抽象概念重新回到经济发展的现实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党对农民分化问题的重视使我们明白，单靠农村本身的内部手段没有也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加米涅夫的立场由此出现变化，现在他提出如下想法来反对布哈林：社会主义不是苏维埃政权加合作化，而是某种更为复杂的过程，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再加合作化，而所谓电气化应理解为整个工业技术。这样提出问题同成为工业不断落后的原因之一的1923年的立场相比，无疑是前进了一步。如果把这一想法说透了，大致应当是：合作化可以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也可以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即如果让农村经济发展放任自流，则合作化无疑会走

上资本主义道路，亦即成为富农手中的工具；只有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即在工业对农业的优势日益增大的基础上，贫农和中农的合作化才能保证朝社会主义发展；工业的发展速度越快，工业超过农业越快，就越能有把握地指望抑制农民分化过程，防止中农群众无产阶级化，等等。

然而，就在加米涅夫提出工业是推动力以此来反对布哈林的农业合作化前景的时候，布哈林就评价工业本身的社会性质问题发表了反对加米涅夫的意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继续认为工业是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在两、三年前曾经相当普遍，在1923~1924年争论时期更是一再被提出来过。这种观点的实质在于认为工业是整个体系的从属部分之一，这一体系的其他部分还包括农民经济、财政、合作社、由国家调控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等等。所有这些由国家调节并监控的经济过程构成了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它经过一系列阶段应当走向社会主义。在这一构想中工业的领导作用完全消失了。计划原则几乎完全被财政信贷调控排挤了，财政信贷调节具有了农民经济和国有工业之间的中介者的作用，把工农业看做论争的两造。正是由这一构想产生了农业合作社会主义的构想，加米涅夫反对这一构想是正确的。然而，这一构想还产生了对国有工业的如下估计，即不把它看做社会主义的基本杠杆，而看做国家资本主义的从属部分，现在，布哈林反对这种看法，这也是正确的。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双方如何部分地否定了他们在1923年的共同立场，正是这种立场一方面导致了工业落后于农业，另一方面导致了布哈林的中农合作社构想——它表现为“发财吧”的口号决不是偶然的。

1923年的立场不应当部分地加以否定，而应当完全否定。应当坚定、明确地说明，问题实质不在于今天农村分化的程度，甚至不在于分化的速度，而在于工业的发展速度，只有工业才能够使农

村经济发展基本进程发生质变。由此可推导出，“面向农村”意味着首先“面向工业”。由此还可推导出，计划工作并不是工农业间的中介活动，而是国家首先而且主要通过工业来实施的目标明确的经济方针。计划工作的核心可以而且应当是发展工业的规划。脱离工业的计划工作不可避免会造成舍本求末，造成不断提出各种修订，不时就要协商一番。这既适用于国家计委，也适用于劳动国防委员会。既然计划工作已变成在滞后于市场的国有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半消极的中介工作，那么，财政人民委员部自然就把国家计委推到一旁，因为比起国家计委的统计数据来，财政是中介性调节的更根本、更现实的手段。不过财政和信贷调节就其实质而言本身不包含任何计划原则，它虽促进全部经济过程，但本身不包含也不可能包含向社会主义发展的保证。

在我们经济工作伊始之时，列宁提出了电气化思想作为经济计划的基础。电气化是工业因素的最高反映。电气化思想在形式上仍然被列为主导思想。实际上，它在经济发展全局中相对地占有愈来愈小的地位。电气化同经济计划思想联系得最为密切。在这里，社会主义经济只有通过工业技术才能实施计划管理这一思想第一次得到了反映。如果国家计委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没有最紧密的联系，我们就既不会有正确、完整的工业发展规划，也不会有首先通过工业实施的、现实且目标明确的积极的经济计划工作。这是因为农业、运输业，还有切尔文纸币的坚挺都取决于工业发展的性质和速度。在整个经济链条之中工业是基本的、决定性的环节。

列·托洛茨基

1925年12月14日

№02771

托洛茨基：论列宁格勒反对派

(1925年12月22日)

《真理报》和代表大会多数派的发言者们都把列宁格勒反对派说成是1923~1924年反对派的继续和发展。应当坦率承认，这种类比不仅是一种论战手段，而且还包含着部分真理。要做的只是正确地加以阐明，这是什么样的真理。

列宁格勒反对派的实质可归结成指责官方方针或者指责其右翼使农民开始压倒无产阶级，而在农民内部使富农排挤中农，中农排挤贫农。

现在，完全无可置疑的是，所谓富农倾向从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尤其是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来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最大推动力。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主要是指责它对农民估计不足。这种指责的关键何在？就在于反对派把工业及其发展放在首位，要求工业发展加快速度，即相应地重新分配资金，要求把计划原则引入工业，等等。这种立场被宣布为对列宁主义的修正，而后者的主要条件是：工人和农民的结合、工农联盟，等等。在未曾忘记过去数十年经验的老一代人看来，这种简化的提法至少是立足于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而同民粹派斗争所积累的经验之上的。至于说到缺乏阶级锻炼的广大青年，除去所有的积淀和歪曲，近几年来的争论在他们眼里成了这样一幅景象：一方面，承认“工业专政”和世界革命的不断发

同中农结盟，合作社，等等。其实，缺乏阶级斗争锻炼的年轻一代就是在这种论战中形成的。完全可以有把握地断言，正是这种情况为农民倾向的发展创造了最为广泛、最易于滋生的土壤。至于我国的整个社会生活，由于世界革命迟迟没有爆发，由于工业落后，为这种倾向造成了良好的物质前提，——对这一点是不可能有任何疑问的。因此，在同反对派斗争的旗号下，尤其在党内较为年轻的几代人之中，在共青团中形成了苏维埃民粹主义的因素。这种因素在理论上还有待定形。布哈林学派使之定形了，尽管是十分羞羞答答的，半遮半掩。

（列宁格勒组织对于警告声最为敏感，这完全不是偶然的，正如反对派的首领们在为自我保存而进行的斗争中不得不去迁就列宁格勒无产阶级的阶级敏感性不是偶然的一样。结果，就出现了表面上十分荒唐，但当时完全合乎规律的怪现象：列宁格勒组织同反对派斗争得最坚决、对农民估计不足抨击得最猛烈、叫喊“面向农村”的口号嗓门最高，却率先避开已出现的党的转折的后果，这一转折的思想根源就是同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对于对农民估计不足的无休止的叫嚷，“面向农村”的要求，闭关自守的民族经济和闭关自守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提出，反对派早在1923~1924年就曾指出存在一种危险，即党内的这种思想方针可能为慢慢滑向庄稼汉的热月作准备并为此提供方便。我们现在已经听到，列宁格勒人指名道姓所说的危险正是在其思想准备过程中其领导人曾起过领导作用的那种危险。）

列宁格勒党的和经济的领导方法、宣传鼓动上的大吹大擂、地方自大狂等在党内造成了对列宁格勒上层领导十分强烈的不满情绪；除了这种不满情绪，又加上成千上万在不同时期被逐出列宁格勒、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人对列宁格勒制度的强烈愤慨——这些事实都完全无可置疑，其意义也是不容低估的。在这一意义上，更新列

宁格勒的上层领导，让列宁格勒组织学会少对全党打政委的腔调，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事。

然而，不能视而不见这样的事实：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在敌视列宁格勒上层领导特点和作风的心态后面，还暴露出了敌视城市对农村地区的思想专政的情绪。各中心城市的预算都太大。它们都有工业，有报刊，有十分强大的组织，有思想优势，但有利于农村的事做得太少，而只提供响亮的空泛口号——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许多发言不过是这一思潮大大减弱了的余波。今天是列宁格勒，明天可能该轮到莫斯科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相互攻讦使这种可能性更容易实现。外省抓住列宁格勒反对莫斯科的立场，是在为普遍打击城市作准备。现在当然仅仅有一些这种现象的初步征兆，发展下去却可能危及无产阶级的作用。（下面这一事实是个人纯粹无原则性的例证，同时又是最大的笑柄：今天，索柯里尼柯夫充当了列宁格勒反对派的一名领袖，而他过去和现在都是鼓吹从经济上解除无产阶级对农村武装的理论家。）

无论坦波夫省、沃罗涅日省，还是格鲁吉亚都不能一笔抹煞。出现农民倾向是因为党在客观上必须关注农民。问题在于程度，在于积极的抗衡。最为积极的抗衡可以是工业中心城市即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活跃而又强大的无产阶级组织。这些组织内部生活的民主化是它们积极、有效地抵御农民倾向的必要条件。实际上，我们还观察到相反的现象。机关制度使这两地的组织失去作用。任何削弱这种制度的要求都被污蔑成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投降，等等，等等。完全受机关制度束缚的列宁格勒曾经百分之百地在“面向农村”的口号下为反对反对派的斗争出过力，从而助长了民族—农村局限性倾向的发展，使其在本次党代表大会上得到了足够鲜明的反映。尽管在形式上

没有任何人赞同布哈林学派的“极端性”，但实际上全部“火力”都对准了列宁格勒。

列·托洛茨基

1925年12月22日

№02772

托洛茨基对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速记记录所作的摘录

（1925年12月18～31日）

加米涅夫

“同志们，如果连布哈林同志在他想作成纯属政治性的发言里也认为有必要再次采用党已熟悉的手段，就是再次提起我们在十月的错误……（插话：“是季诺维也夫首先提起的”。）让我们约定：如果你们有打断我的讲话的任务，那么请你们直截了当地讲出来。（插话：“谁也没有给过任务——我们自己有头脑”。）我们当然预先感到，如果尼占拉·伊万诺维奇^①走上这条道路，那么今后这种话题和这种办法可能将被广泛采用。好吧，反正我们的脸皮已老了……。”（第244～245页）

“我们最为坚决地认定，党内业已形成的理论、学派、路线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受到足够的反击。这种理论，学派、路线对党极端危险。因此，我们的义务是警告党……”（第246页）。

“是的，同志们，我可以肯定，这样一种讨论原则问题的气氛在我们党内还从来没有过。我认为我们的发言是被迫的，因为早先未让我们发言。”（第248页）

“在中央十月全会期间大多数列宁主义者都说：‘不许再争论’。大多数列宁主义者禁止发表克鲁普斯卡娅的文章和我的文章。大多

^① 布哈林。

数列宁主义者都保证共同筹备代表大会。(彼得罗夫斯基^①：“政治局的大多数”。) 政治局的大多数也把对我们犯失败主义和取消主义错误的指责推给代表大会。”(第249页)

“我在一些会议上责备过斯大林同志，我对代表大会把这种责备重复一遍：你未必赞同这条路线，但是你加以掩饰，作为党的领导人，这就是你的错误；你是一个坚决的人，但是你没有使党坚决否定这条党内大多数人认为不正确的路线。我对斯大林同志说：如果‘发财吧’的口号能在党内泛滥达半年之久，那是谁的过错？是斯大林同志的过错。我问他：你赞同这一口号吗？——不，不赞同。那么，你为什么妨碍党鲜明、明确地摒弃这一口号呢？现在我看到，同志们，斯大林同志完全沦为这条不正确的政治路线的俘虏(笑声)，这条路线的泡制者和真正的代表就是布哈林同志”。(第255页)

当他抱怨克鲁普斯卡娅、他本人和其他人的文章未被刊发时，有人插话(座中有人插话：“在我们参与下连伊里奇的文章也有未刊印的，你们却妄想会让你们得到著述的垄断权”)。(第255页)

“……我们反对制造‘领袖’理论，我们反对制造‘领袖’。我们反对书记处实际上把政治和组织合在一起而凌驾于政治机关之上。我们主张，在内部，我们的最高领导这样来组成，即把我党所有政治家团结在一起的政治局确实享有全权，同时，设立从属于它的、在技术上执行其决定的书记处。”(第274页)

“如果书记处把政治和组织合在一起，并且实际上事先决定政策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我们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并且认为，这对党

^① 彼得罗夫斯基，格·伊·(1878~1958)——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任内务人民委员，长期领导乌克兰的工作，1919~1938年任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任俄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是有害的。(喧哗声。)同志们，这就是需要做的。每一个不同意我的看法的人都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座上插话：“需要从这一点做起”。)发言者有权从他想讲的问题开始。看来，你们也该从我所谈的问题开始，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总书记不是能把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人。我不认为这是根本的政治问题。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比理论路线问题更重要。我认为，如果党通过了(喧哗声)明确的政治路线，能明确地与现在部分中央委员支持的那些倾向划清界线，那么，这个问题现在就不会摆在日程上。不过我应当把话说完。正是因为我不止一次地同斯大林同志本人谈过这一点，正因为我不止一次地同一些志同道合的列宁主义者谈过，我在代表大会上要再说一下：**我已经确信，斯大林同志不能履行团结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使命**”(第 274 至 275 页)

“我这部分发言的开头是：我们反对独裁理论，我们反对制造领袖！我还用这句话来结束自己的发言。”(第 275 页)

托姆斯基

“什么叫我们的人很多？什么叫我们都丧失理智了？排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什么？从何说起？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别再扯这些闲话啦。”(第 288 页)

“……不，加米涅夫同志，如果您提出领袖独裁制度不能存在的问题，我们说：我们从来都为反对它而斗争，领袖独裁制度不能存在，也不会存在，是的，不会存在……。”(第 289 页)

“季诺维也夫同志、加米涅夫同志，请你们说说，什么时候中央委员会的路线不好？什么时候你们提出过什么实际建议却遭到否定？”

我们同托洛茨基同志辩论的时候，他就直接说出：“这就是不正确的策略路线”。

“哪一天我提出过某项实际建议，它却被否定了”。

“哪一天我提出过某项实际建议，它也同样被否定了”。

“你们能否向我们提供文件，证明你们什么时候对党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提出过修改意见，是哪些修改意见，它们怎么被否决了？你们提不出……”（第290页）。

“……我们珍惜党的财富，因为党不可能每一天都造就出像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样的人来。我们懂得这一点。我们珍惜党所造就的……”（第291页）

安德列耶夫

“加米涅夫同志改变中央委员会结构的要求会导致什么？不，同志们，这背后还潜藏着另一点，这背后还潜藏着不愿承认斯大林同志身为总书记的权威日益增大……”（第298页）

“……我们大家都对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有足够高的评价。拉舍维奇同志毫无道理地要我们相信，我们主张抹煞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要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不再置身于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机关——政治局，这我们连想也没有想过……。”（第298页）

加里宁

“……我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分歧起始于有关托洛茨基同志的事。这是第一次实际分歧。这一分歧的实质是什么呢？我觉得，托洛茨基同志个人所拥有的那种积累起来的权威，是党所积累的资本；花费这一资本应当慎之又慎；因此，同他作斗争的形式应当既达到最大的效果，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党积累的托洛茨基权威所受的损失……”（第318页）。

“……后来，在一次会上他脱口而出：‘发财吧’。唉，还是多少，哪怕只有百分之一，做一个不偏不倚的人吧。在我们这个苏维埃共和国，在我们的条件下，难道这个口号比起譬如说‘在撒哈拉

大沙漠痛饮一番吧’的叫喊更有实际意义吗？

不会的，同志们。你们挑剔这个口号，是因为布哈林同志过于迅速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而你们利用这一点，想消灭我们党的一个最具影响的权威。（掌声。）你们想要布哈林的血。（笑声。插话：‘这完全是徒劳的’。）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认为，布哈林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被当作牺牲品。我认为，代表大会应该坚决制止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的这种政策。”（第 320 至 321 页）

索柯里尼柯夫

“……对我来说，这个事实（对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不正确路线）就在于，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没有提供任何口实，斯大林同志就刊发了他在县委书记讲习班上所作的报告，即首次在报刊上刊发报告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在我党是没有先例的……”（第 333 页）

“……我绝对没有对斯大林同志的任何恶感，无论个人的还是政治上的，都绝对没有。我应当谈到这一点，因为有人断言，说我们的全部关系都由个人好恶等决定。不是这样的。我丝毫也不曾怀疑，斯大林同志承担的工作对全党具有极其巨大的益处。”（第 334 页）

“有人说只要在政治局，或者在中央委员会，或者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书记处应当如何组建，某一位同志是否应当成为书记处成员的问题，我们就应当把这种情况看成企图搞党内政变，我不能赞同这种说法。对此我不能同意。同志们，我个人深信：我认为，斯大林同志的影响和权威，即使他不担任我党的总书记……（喧哗、喊叫声）。同志们，难道我们果真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都不能讨论任何一个省级组织都能够讨论的问题，即谁将出任它的书记等等吗？……无论如何都应该理顺书记处和政治局的关系，不管斯大林同志是否还在其中担任工作。不过，我要问，如果斯大林同志担任政治

局委员，他的权威为什么就会发生动摇？在何种程度上发生动摇？难道因此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每句话的政治领导作用吗？不会削弱的。（喧哗、喊叫声）

我想，关于谁应担任我党总书记、需不需要总书记职位的问题，我们是在白费力气，这是个能使我们分裂的问题……

是的，我们有过列宁。列宁既不是政治局主席也不是总书记，然而列宁同志在我们党内起了决定性的政治作用。如果我们要同他争论，就要三思而行。这就是我要说的话：要是斯大林同志想赢得列宁同志那样的威信，那就让他去争取吧……”（第335页）。

日丹诺夫^①

“同志们，现在会上有人说，如果有人修正列宁主义，那么，这不是‘四人集团’，不是季诺维也夫同志，不是加米涅夫同志，而是布哈林同志在修正。不言而喻的是，为什么所有火力都对准了布哈林。因为布哈林同志，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是我们党最优秀的理论家之一。摧毁布哈林同志，在全党眼里使这位理论家声誉扫地——很明显，这是新的争论、新反对派的政治手法之一。”（第369页）

^① 日丹诺夫，安·亚·（1896—1948）——191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从事地方工作，1925年起为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起为中央委员，1934年起任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12月兼任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书记，1935年起先后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宣传鼓动部部长等职。

No02773

托洛茨基：经济问题笔记

(1926年1月15日)

1. 每一种社会制度及该社会制度的每个发展阶段基本上都以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为特征。

2.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不适应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这对欧洲来说是绝对的，对美国来说是相对的。欧洲的生产已停滞不前，美国生产增长的速度也比在社会主义组织下缓慢的得多。

3.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依靠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国家低。不存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社会障碍。整个任务就是要发展技术、正确组织劳动，使生产合理化。

4. 显然，只有使我国的劳动生产率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得到发展和巩固。

5. 通过我国经济的工业化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这样的经济完全能够保障我国的日用工业和军事工业。

6. 然而如果认为只有政治经济保持整个国家经济的闭关自守才能在高度工业化基础上取得经济独立，那是错误的。相反，只有利用世界的各种资源，才能赶上并超过它。

7. 国际分工的出现出于自然原因和历史原因。在别的国家尚处于资本主义条件时我国向社会主义经济组织过渡，这一情况根本不会改变国际分工由此产生的各种联系和依存关系。封锁是造成我国革命最初几年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摆脱封锁就意味着恢复由于

世界分工，即首先由于各国经济水平的差距而产生的各种经济联系。

8. 对外贸易的性质和规模也是我们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流转来加速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体现。

9. 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频繁的商品流转，这就使我国的经济以世界市场的劳动生产率和成本作为评判的标准。

10. 对外贸易垄断制是一种强大的武器，它直接保护我们不受资本主义富国经济冲击并保证我们有相当长的时间来提高自身的技术和经济水平。

11. 但认为对外贸易垄断制是绝对的保证也是不正确的。其有效程度取决于我国经济劳动生产率同世界经济劳动生产率靠近的速度。

12. 在我国外汇紧缺的情况下，世界市场的监督作用表现得最明显、最直接：我们出口量不足就不能及时进口我国经济继续增长所必需的一切。

13. 阻碍出口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对国家来说出口没有赢利，或者说，对农民生产者来说不合算。没有赢利有其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如果没有赢利是由贸易费用、运输费用及其他一些附加费用超支引起的话，对外贸易垄断制所依靠的国家贸易机构是否合理就要在这方面通过世界市场受到检验。主要原因就是工农业价格的剪刀差。农民用于出口的产品得到世界市场和出口条件所允许的最高价格。但农民得到价格在折算成工业品价格时就不够数了。如果是封闭经济，那么农业价格会在一定程度上与工业价格保持一致。但由于出口是我们前进的条件，所以农产品价格就要承受世界市场价格的压力。

对外贸易垄断制可能会在一个长时间内保护国内价格高昂的工业不与国外竞争，但垄断制不能提高世界市场的粮价。

14. 从我国出口需求来看，世界市场的资源实际上是无限的。这与工业化方针没有任何矛盾，相反完全是这个方针的结果。

事实上进口的幅度完全取决于出口的幅度。

15. 所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出口是关键，要向农业调拨尽可能多的追加资金，以便通过进口来扩大出口资源，加速工业发展。

16. 这个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工农业产品比例失调是出口出现困难的根本原因所在。这并不是说农村生产出的东西太多，而是说城市生产出的东西太少。工业品成本高与它的数量不足有密切关系。

17. 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找到理论上可以设想的出路：第一，^①

列·托洛茨基

1926年1月15日

^① 文件至此中断。

№02774

伏罗希洛夫在普梯洛夫工厂的讲话

(1926年1月20日)

伏罗希洛夫^①：同志们，我就中央委员会关于托洛茨基同志的决定说两句。格列博夫^②同志在这里认为，说得委婉些，可以作些保留。1925年1月我们同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派进行了十分严肃的争论，并决定托洛茨基同志保留各个机构的职务，看他在党给他极为严厉地教训之后怎么工作，怎么表现，会得出什么结论。然后到10月份，到可以下结论说托洛茨基表现不错，在改正，认真负责地，按照布尔什维克方式不无成效地完成交给他的工作，有望彻底改正错误的时候，再提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少数派的同志在中央委员会里又提出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和长时间的对话之后决定把托洛茨基同志留下来以观后效：如果托洛茨基同志（像少数派说的那样）依然故我，工作很糟、不按照布尔什维克方式行事，那就采取将其开除出政治局的方针。我们终于等到了代表大会召开。在第14次代表大会之后，在1月上旬召开的由64人组成的中

① 伏罗希洛夫，克·叶·（1881～1969）——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联元帅。1921年起任党的中央委员，1926年起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25年起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国防人民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② 阿维洛夫（格列博夫），尼·巴·（1887～1942）——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邮电人民委员，1918年起任军政、工会、苏维埃和党的负责工作。1925年追随“新反对派”。

央委员会全会上提出了政治局名单，格列博夫—阿维洛夫同志，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叶夫多基莫夫^①在内，大家一致投票赞同这个名单。

阿维洛夫（在座位上）：大家希望团结。

伏罗希洛夫：我们为此非常感谢你们。托洛茨基同志被选入政治局（鼓掌）。（喧闹声）。为什么一致选举他呢？同志们，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在列宁格勒人打起来的时候再制造新的麻烦，那就太愚蠢了，太错误了，我可以说太荒唐了。托洛茨基同志在代表大会上表现得十分得体。他没参加争斗，尽管他本来可以参加（喧闹声。主席的铃声），也可以制造许多麻烦。要知道，同情托洛茨基同志的人不少，主要不是党内的人，而是党外的人。有许多人同情他，这些人在我们国内起的作用不小（喧闹声。主席的铃声），而格列博夫—阿维洛夫同志在这儿喋喋不休是白费力气。

格列博夫说，我们承认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彻底的社会主义企业。但我们能建成社会主义吗？咱们别谈这一点了。我们要建设，但先别说。我们这样什么也建不成。我们什么也建不成。（鼓掌）建设嘛，我们也许要建设，可是我们能建成什么那只有天晓得。（鼓掌）这不，同志们你们是怎样的人也真相大白了（喧闹声。主席的铃声。）我尊敬的朋友表现了对西方是否会发生革命的怀疑，不信任。难道托洛茨基不是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了吗？他说：没有什么农民，只世界无产阶级。（插话：“够了！”“请继续往下讲”。鼓掌。喧闹声。主席的铃声。）

伏罗希罗夫：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喊声：“够了！”。喧闹

^① 叶夫多基莫夫，Г.Е.（1884—1936）——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7—1928年任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乌里扬诺夫斯克省计委副主席。1929—1934年任萨马拉州农业合作社联社主席。

声。)

主席：请安静。(喧闹声。铃声。座位中有人喊道：“马秋申，劝劝你们的人。他喝多了……”)

伏罗希洛夫：无论建什么，你在打地基时必须知道，你们要建什么：是棚子、教堂还是装甲舰，也许还是大炮。这得先搞清楚。

No02775

托洛茨基：稳定和口号

(1926年2月13日)

关于提纲

1924~1925年“联邦与欧洲”这一口号被取消了，因为政策走的是国内稳定的轨道。这是正确的。

因为同样的原因，〔口号〕被工农政府取消了。

提纲现在提出了“社会主义欧洲联邦”这一口号是十分及时的。内部稳定进程结束了并已转向其反面。美国的压力已不再是预言，而是沉重的事实。但如果我们提出“社会主义欧洲联邦”这一口号，那我们就应该至少对某些国家，首先是对法国提出“工农政府”这一口号。这完全是由议会制危机产生的。

关于提纲第21页

只要社会民主党人还参加或表示同意参加联合政府或容忍其党内那些宣传与资产阶级联合的人，只要社会民主党人还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资产阶级的国家、投票赞成军事预算、捍卫帝国主义祖国或容许其党内存在爱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只要社会民主党人还向工人们鼓吹不能拒绝服从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资产阶级议会制，等等，只要社会民主党人还不公开声明说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只要社会民主党人还不

号召工人群众为反对各国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统治而与苏维埃共和国结成紧密联盟进行共同的斗争，一切就无从谈起，等等，等等。

列·托洛茨基

1926年2月13日

№02776

托洛茨基：关于我们对中国和日本的政策问题

(1926年3月25日)

第13份
发文第1643/C号

绝密
副本

委员会决定全文^①

列·托洛茨基

1. 对中国的局势需考虑三类因素：

- (1) 中国的内部势力；
- (2) 以某种形式反映中国内部力量的军阀组织极其依赖外国；
- (3) 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为一方，苏联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力量为另一方。

确定方针时存在的困难全在于协调这三类因素的相互关系，其中每一个因素都有其内在逻辑及其发展速度。

在这个觉醒了的拥有4亿人口的国家的发展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内部因素。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发展这些内部力量，首先是

^① 左侧页边有托洛茨基的附言：“委员会的决定。主席托洛茨基。委员有契切林、伏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第1页上方有托洛茨基秘书的附言：本件经列·达·修正。1926年4月3日送托夫斯图哈同志交政治局。”下面还有两个可能彼此有联系的附言：“外交上的重新组合——两周后。”

吸引农民参加革命、保证无产阶级组织的领导权。我们决定性的优势在于我们有可能在中国执行具有巨大历史规模的政策。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忽视各军阀集团的斗争及其一时的胜利和失败，决不应允许这些短暂的插曲使我们放弃我们政策的基本方针。

一、中国革命的国际方针与苏联

2. 没有资料使人认为，中国革命内部力量的发展有片刻的停顿。相反地，倒有充分理由认为，最近一个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工人和农民——的运动将会得到巩固和发展。我们应竭尽全力使这一个运动达到最大的规模。但由于欧洲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洛迦诺公约^①的签订，尤其是帝国主义者把中国问题充分提了出来，国际形势变得极其困难。在这些条件下，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尤其是苏维埃国家应该竭尽全力阻止帝国主义建立反对中国的统一战线。目前，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及其经济上和政治上与满洲有切身利益关系，可能对中国革命构成最大的危险。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了中日关系对其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阶段。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设法争取喘息时机，就是把满洲的国家命运问题“放一放”，即实际上容忍近期内南满仍由日本掌握，当然并不停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总的政治斗争。

3. 这个政治方针当然绝对不意味着停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总的政治斗争，应该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完全协调一致。同时要

^① 洛迦诺公约——1925年10月经洛迦诺会议讨论并草签，于12月在伦敦签订的条约。主要文件有关于德法和德比边界不受侵犯以及维持莱茵河地区非军事化的保证条约等。

事先估计到中国革命分子和广泛的舆论很难接受这个方针，因为他们极端仇视日本。不过这个方针出于中国革命的内在要求，在欧洲和亚洲新的革命浪潮到来之前中国革命顶不住帝国主义的联合强攻。苏维埃国家的利益与中国革命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是完全一致的，因为苏维埃国家需要延长喘息时机，而中国革命运动则需要争得喘息时机。

4. 因此十分清楚，为了使不大了解情况的人不致误解这个政策，以为是要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搞好苏日两国关系，要使中国革命力量的舆论对加剧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在远东矛盾的方针，首先是和日本达成某种妥协的方针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5. 认为为了对中国舆论作必要的引导，需要通过创办新的报刊以及影响现有的报刊的办法来对中国报刊施加革命的和反帝国主义的影响。

6. 一旦实现日本所向往的满洲自治，就要求张作霖放弃对南方的征伐，不再插手中国其他地区的内部事务。我们在这件事上当然决不主动采取行动，也决不承担哪怕是间接的责任，但是对现有条件下满洲自治意义的明确认识为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和我们规定了必要的行动路线。

7. 由于以上制定的政策的总方向，对我们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消除一切能刺激中国舆论的不必要的、附加的次要的因素。毋庸置疑，各部门代表在对中国的活动中存在不能容许的败坏苏维埃政权声誉，给人以苏维埃政权是帝国主义印象的大国主义作风。

要使有关机构和有关人士认识到我们十分有必要对中国采取这种政策，甚至这种政策的外在形式，以消除对我们有大国主义意图的怀疑。要事事处处执行立足于极其关注中国权利、强调其主权的方针。破坏这一政策，即使情节轻微，都应逐一惩治有关肇事者并

将此事通告中国舆论。

8. 要以各种方式公开声明：我们的政策是完全建立在同情中国人民大众争取国家统一独立和争取民主的斗争基础上的，要消除我国会进行军事干涉的看法，中国的问题只能由而且只应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苏联政府在中国实现统一以前仍致力于同中国所有现存政府（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省政府）建立和保持正常的关系。

9. 在满洲要把外交工作从哈尔滨完全转到奉天。

10. 我们和张作霖谈判的基础是：我们很清楚，满洲当局在现有条件下应与日本保持良好稳定的关系；我们无意破坏这种关系；但对满洲当局来说同时与我国保持稳定的和平关系从而保证对东京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是有好处的。

谈判中要向张作霖指出，日本某些集团同意用另一个起缓冲作用的将军来取代张作霖，而我们认为只要建立正常关系就没有理由用另外的人取代张作霖。

11. 制定中东铁路严格的办事制度是与满洲达成协议的基本要素：

(1) 对解决一切有争议的或存在冲突的问题规定明确的调解程序（按对等原则）；

(2) 如出现麻烦，可将问题提交奉天解决。

(3) 与此同时，我国铁路局负责人、驻哈尔滨领事和驻奉天总领事会收到如下指令：铁路当局如试图越过中国当局单方面解决问题，甚至向中国当局提出最后通牒，则定予严惩不贷。

12. 与张作霖达成协议并将该协议向北京备案后，应争取召开中日苏三方铁路会议，会议的任务是在充分尊重各自权益的基础上制定出三方共同执行的经营和建设满洲铁路以及有关满洲经济协议的计划。

13. 只有中东铁路仍严格由苏维埃政权继续掌握，才能防止帝国主义分子在最近时期侵占中东铁路，所以现在必须采取广泛的政治文化措施，使铁路中国化。

(1) 用两种文字处理公文。车站及车厢内的站牌和告示等均应用两种文字书写。

(2) 成立中国铁路工人学校，对他们进行技术教育和政治教育。

(3) 在铁路沿线相应的站点为中国工人和路局与有关的居民设立必要的文化教育机构。

14. 有必要查验一下（让谢列布里亚科夫^①去办），中方是否会把铁路直接交给交通人民委员部这件事视为我国单方面夺取铁路的一个步骤。

要和中国有关人士一起仔细斟酌和研究如何改变铁路制度的一切细节。

15. 要利用现在我们在路局行动有充分自由的时机，根据政治局的决定用一个月的时间对中东铁路进行认真清洗，把不称职的和名声不佳的行政人员和工人调回苏联铁路并代之以从中央铁路调来满洲的一些绝对可靠和有政治素养的铁路工人。

16. 另外一方面，现在还必须认真收集（并进一步查明）中国军警和俄国白卫分子对中东铁路的俄籍员工胡作非为、施加暴力的情况，以及俄国人和中国人发生的各种民族冲突和生活冲突的材料。要采取各种办法维护俄国工人的个人尊严和民族尊严，不要让由此产生冲突点燃双方的沙文主义情绪，相反地应该起到政治教育

^① 谢列布里亚科夫，列·彼（1888～1937）——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1921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1919～192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22年起任副交通人民委员。1937年被处死，后平反。

作用。必须在工会下面建立调解委员会或荣誉法庭，由双方在对等基础上参加，由懂得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尖锐性的认真负责的共产党员来担任领导。

应以相应的条约形式（与奉天和北京签订）制定一些措施以防止中国地方当局对铁路员工横行霸道并加以一切必要的组织上的保证。

应使用俄汉两种文字逐项印成告示和号召书在铁路沿线散发，在车站及类似的场所和车厢内张贴。

17. 根据上面提出的政策改组驻哈尔滨的总领事机构。

18. 与张作霖签订的协议（以后还要和日本签订）的条款之一是应防止人民革命的蒙古受到张作霖的骚扰。

19. 现在不要开始和日本的全面谈判，而是要集中注意力通过实行上面提出的措施并对日本的舆论施加相应的影响来切实改善关系，因此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制定相应的一套措施。不预先决定三方（苏、日、中）可能达成的协议的形式，要从政治上和外交上作好准备，使中国决不会把它被迫向日本暂时作出的让步说成是我们也参与其中的对势力范围的瓜分。中国的舆论界，尤其是左翼舆论界应该明确地认识到，我们只容许中国为防止帝国主义分子进攻的统一战线而向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为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所必需的那些让步。从这一前景来看可能举行的全面谈判应以作出让步为代价来达到离间日本和英国的目的。

20. 一旦得知国民军队的阵地将由吴佩孚长期占领，合理的办法是与吴佩孚寻求妥协以削减其对英国的依赖，同时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英国这个阻挠中国独立的不共戴天的主要敌人的斗争。

21. 必须对国民军队进行全面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国民党、共产党），从而使他们成为不受某些个人操纵的、真正的人民革命运动的中流砥柱。

22. 广州。由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发展缓慢，广州被看成不仅是革命的临时据点，而且是拥有 3700 万人口而迫于经济和政治原因同外国签订各类临时协定的大国。广州在得到我们从远方给予支持的同时，被法国领地从南边和英国势力范围从北边和东边即从海上紧紧包围起来。如果英法两国一旦采取一致的敌对行动，广州的局势就会变得十分严峻。广州政府方面必须在作出一定让步的基础上寻求与法国签订临时协定。

附 注

问一下拉柯夫斯基同志，广州政府是否有某种可能与法国签订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某种临时协定；为了探听法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虚实，派广州政府的代表去巴黎是否合适。

政府应集中全力采取以下措施来巩固共和国的内部广州：进行农业、财政、行政和政治方面的改革；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华南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巩固共和国的内部防御能力。

广州政府现阶段应坚决避免采取进攻性军事讨伐的打算和能使帝国主义者发动武装干涉的一切行动。（斯大林所改——列·托·）

23. 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出的一系列决定中有些因素会促使国民党领导变得行事谨慎、善于退让，为避免在某些严格限定的问题上出现偏离总政策的任何作法，必须态度坚决地作出解释，这种迫于情势而作出的让步决不应削弱革命运动的规模或者减少旨在促进周边受压迫的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而在中国境内外进行的广泛宣传的力度，等等。

24. 鉴于中国反对派在帝国主义挑拨下要求我们召回卡拉汉^①同志，必须在中国（也可能在其他国家，首先是英国和日本）展开

^① 卡拉汉，列·米·（1889～1937）——1904年参加革命运动。十月革命后历任副外交人民委员、驻中国全权代表、驻土耳其大使。

反对这个狂妄要求的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阐明作为苏联代表的卡拉汉同志所执行的解放政策的意义和内容。

二、满洲铁路问题

1. 在中东铁路的各种关系得到改善之前最好延期召开满洲铁路会议。

2. 应事先就中东铁路建设事宜与奉天达成协议，这就是说，苏联不可能在满洲单独进行铁路建设。

3. 为了发展中东铁路建设，应减少其公用设施的开支，以使全部闲置资金均用到铁路建设上。

4. 采用交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中东铁路建设计划。

5. 为建设单独的铁路支线，最好吸收中国地方资本成立股份制公司，此事尽可能由中方发起。

6. 中东铁路的任务不应局限于建设支线，而应致力于建设用于汽车运输的公路，发展航运。

7. 要设法利用一切现有手段阻止日本的铁路线从中东铁路向北及向海拉尔延伸，斯吉村以东的铁路线同中东铁路连接。

8. 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我国从赤塔修建贯通内蒙古东部铁路的消息以向日本施加压力。

9. 一旦有可能就着手建设从上乌金斯克到库伦—张家口和从哈巴罗夫斯克到苏维埃港的铁路。

10. 责成交通人民委员部查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之间在货物运价、返运和分配问题上存在的哪些分歧要提交有关国家政府会议讨论。

11. 告诉杰布奇，说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一旦抵达，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将就地解决，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还将亲自去东京，此

后我方将在互相尊重当事三方利益的基础上提出旨在调解有争议的问题的消除摩擦的具体意义。

三、关于日本移民

解决苏联远东的日本移民问题时要看到日本舆论界对此极其关注。在注意日本在远东的殖民危险时，采取的措施要小心谨慎，循序渐进。限定日本向苏联移民的人数为时尚早，但日本移民人数决不能太多。应严格管理和监督日本移民，应在专门为此成立的协会的帮助下利用日本的资金分期分批地进行移民工作。应按照棋盘格式安置日本移民，同时要加强从俄罗斯中部地区向远东移民的工作。应该让日本农民对所提供的地块感到满意，而且应考虑到日本农业的特点。在哈巴罗夫斯克及其以南地区，而不是在西伯利亚腹地才有适合日本移民的地块。不允许朝鲜移民冒充日本移民进入。朝鲜移民问题要单独研究，而且可以把西伯利亚腹地提供给朝鲜移民。

附件：1919年文件摘录

致俄共（布）中央

由于匈牙利共和国覆亡，我们在乌克兰的失利以及我们有可能丢掉黑海沿岸地区，这一切加上我们在东部战线所取得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国际方针，昨天尚处于次要地位的东西也因此提到了主要地位。

当然现在这个时候西方不会很快爆发重大事件。但是总罢工示威的失败、匈牙利共和国被扼杀以及继续公开支持讨伐俄国——所有这一切都显示，西方革命的潜伏期和准备期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

间。

这就是说，法英军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仍保存着生命力和实力，而我们红军在世界政治的欧洲舞台上无论就进攻还是防御来说，力量都还相当小。这种情况下，西部边界的一些白卫小国暂时可能为我们提供“掩护”。

如果我们往东看看，形势就大不一样了。诚然，东方面军的侦察和作战简报过于笼统，实际上是十分马虎，以致我到现在对这方面的情况还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概念：我们是不是彻底击败了高尔察克^①，还是只打击了他，使他还能把相当一部分兵力拉到鄂木斯克一带。这里至少打开一扇通向亚洲的大门，所以，如果设想得更糟，也就是说，高尔察克根本没有被击败，那么仍然与我们抗衡的是一支势力不太强大的孤军，而且其交通线漫长而无保障。

当然还存在一个驻扎在西伯利亚的日本军队的问题，这支部队共有几万人。这个数字对幅员辽阔的西伯利亚来说并不算大。此外，现有情报证实，日本人并没有推进到伊尔库茨克以西。完全有理由推测，美国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反对日本向西伯利亚推进。高尔察克是美国的直接代理人。日本借口必须防止高尔察克推行的美国化，派几个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现在事情结局发生了变化。高尔察克完蛋了，日本由于等待我们继续东进，不得不大量增派其占领部队或者滚蛋。高尔察克被消灭之时，日本却在西伯利亚扩张势力，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西伯利亚日本化，美国当然不能不予以抵制。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我们甚至可以指望这帮华盛顿混蛋直接支持我们反对日本。我们向西伯利亚推进，日本与美国

^① 高尔察克，亚·瓦·（1873～1920）——沙皇海军上将。1918～1919年俄国白卫军主要首领之一，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1920年被枪决。

产生对抗至少会为我们创造有利的局面。

毫无疑问，我们的红军在世界政治的亚洲舞台上是一支比在欧洲舞台上强大得多的力量。我们在这里无疑不仅能长期等待欧洲事态的发展，而且能在亚洲方向采取积极行动。现在对我们来说通向印度之路要比通向苏维埃匈牙利之路更畅通且路程更短。目前在欧洲的天平上还不够分量的一支军队却能打破亚洲殖民依附关系这种不稳定的平衡，直接推动受压迫群众举行起义并保证起义取得胜利。

显然，在东方采取这样的行动就要求我们在乌拉尔建立和巩固强大的基地。不论我们在近几个月或近几年内面对哪个方向——面对西方还是东方——这个基地无论如何都是必需的。必须千方百计地振兴乌拉尔。现在必须把我们派往或准备派往顿河州工人新村、征粮队等等去的全部劳动力都集中到乌拉尔去。要把我国优秀的科技力量、优秀的组织人员和行政人员派到那里去。要恢复去年春天德国进攻我们时产生的想法：要把工业集中在乌拉尔及其周边地区。现在同样要重视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已清剿地区的苏维埃工作。要把乌克兰目前由于“其无法左右的原因”而脱离苏维埃的工作的优秀党员派到那里去。如果他们失去乌克兰，就让他们为苏维埃革命而去夺取西伯利亚。随着夺得乌拉尔地区或外乌拉尔辽阔的草原，我们就有可能大规模地组建骑兵，兹拉托乌斯特将会为此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在此以前我们缺乏骑兵。经验表明，在机动作战的国内战争中骑兵的作用很大，而在亚洲作战中其作用则无疑是决定性的。一位重要的军事干部早在几个月前就提出了组建骑兵军的计划（有30000~40000骑兵），以便把他们派往印度。

这个计划显然要求我们认真作好物质上和政治上的准备。我们迄今为止对在亚洲进行宣传鼓动太不重视。同时看来国际局势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就是去巴黎和伦敦之路要经过阿富汗、旁遮普和

孟加拉的城市。

我们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战绩应极大地提高苏维埃革命在整个被压迫的亚洲的威信。要利用这个因素并把革命学院、亚洲革命的政治和军事司令部集中在乌拉尔或土耳其斯坦的某地，后者在近期可能会比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更起作用。现在就要用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和方法更认真地进行这方面的组织工作，集中必要的人力，集中语言学家、书本的翻译家，吸收当地的革命者。

我们以前当然也曾注意到有必要促进亚洲革命，而且从未拒绝过进行进攻性的革命战争。但我们不久前还出于充足的理由全神贯注于西方。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曾在我们手里。波兰革命发展的速度似乎很快。匈牙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苏维埃乌克兰已经向罗马尼亚宣战，正准备向西推进，与苏维埃匈牙利连成一片。占领敖德萨可以使我们与巴尔干革命的策源地以及英国和法国的某些港口建立直接可靠的联系，我们向这些地方发送了大量共产主义读物。我再重复一遍，目前局势急剧变化，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第一个狂飙突进时期后收缩了，而且这种状况也许会持续许多个月。一切迹象表明，苏维埃匈牙利的失败延缓了一些小国家（像保加利亚、波兰、加里西亚、罗马尼亚及巴尔干国家）的革命。这个阶段要持续多长时间呢？这显然是难以预测的，也可能持续1年、2年、5年。当今残酷剥削的资本主义多存在哪怕几年，都意味着殖民剥削的程度不可避免地要加深，另一方面起义也不可避免地要爆发。亚洲可能会成为近期爆发起义的舞台。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及时把我国国际方针的重心作必要的转移。

现在当然还说不上削弱我们在南方战线的斗争。但就像去年镇压西伯利亚农民起义的不是苏维埃政权而是高尔察克一样，乌克兰的农民起义在最近一年中将不会被我们，而是被邓尼金镇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总之，欧洲革命似乎推迟了。但毋庸置疑，我们由西向东推进了。我们失去了里加、维尔纳，还有失去敖德萨、彼得格勒的危险。我们收复了叶卡捷琳堡、兹拉托乌斯特和车里雅宾斯克。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局势改变方针。最近一个阶段为亚洲方针的“因素”作的准备工作，主要是为从军事上打击印度、援助印度革命作准备工作可能只是预备性的。首先要积极地制定计划，研究计划的实施，吸收必需的训练有素的人员，建立十分内行的组织。

本报告旨在引起中央对上面提出的问题的重视。

列·托洛茨基

1919年8月5日于卢布内

致俄共中央

副本

绝密

我认为有必要对我8月5日的报告补充以下问题：

有资料表明，阿富汗与英国媾和可能会完全转过来反对我们。据我们在土耳其斯坦的人士称，英国正积极联合波斯、布哈拉、希瓦和阿富汗来反对苏维埃土耳其斯坦。假如英国不这样做那倒是不可思议的。现在英国打算在东方建立像它在我国西部边境上建立的那样的国家链条。在那边做这种工作的困难要比在西边少得多。现在问题就在于谁能赢得速度。

我们成功地向土耳其斯坦推进及粉碎高尔察克的南路部队为我们赢得速度创造了条件。但由此可得出结论：我们在西方执行完全正确的等待、适应、躲避和退让政策的同时，应在东方采取坚决果断的政策。

我们只有在土耳其斯坦建立重要的军事基地（这样做已有足够的条件），现在才能破坏英国联合亚洲国家反对我们的活动。要立即选择一条可行的打击路线，要从英国用来反对我们的国家链条中选出一个国家使之处于我们的直接打击之下，在事先提出和解的最后通牒之后，使之听命于我们并进行打击。

由此得出结论：（1）有必要派拥有广泛特命全权的人去土耳其斯坦并下达指示，保证该同志不会在东方采取我们在西方被迫采取的传统防御避让战术；（2）指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土耳其斯坦为我方可能从土耳其斯坦南进集中人力和物力。

列·托洛茨基

1919年9月20日

No02779

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的决议

(1926年3月27日)

1. 从“美利坚合众国的作用空前增长，几乎掌握了世界金融的领导权”和“美利坚合众国与欧洲之间存在的矛盾”的角度来看国际关系。

2. 在经济方面，代表大会指出了反对把苏联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道威斯化）、在社会主义基础上争取经济独立发展的纲领。

3. 代表大会重申了列宁的思想，即我国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列宁）。

4. 代表大会认为，出现了“无产阶级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发动经济进攻”和“苏联经济向社会主义方向推进”的局面。

5. 代表大会认为必须：

“加强对外贸易垄断制”。

“发展社会主义国有工业”并“在国有工业的领导下依靠合作社将越来越多的农户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轨道”。

6. 代表大会尤其认为必需“坚持国家工业化的方针”，因而要“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

7. 大会指出了限制国家工业化的东西：

(1) 市场的容量；

(2) 国家的财力。

8. 代表大会认为农业必须工业化并在此基础上实行集体化。

9. 代表大会认为把“彻底社会主义型的”国有工业看做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是不正确的。

10. 代表大会澄清了对国有工业性质的错误认识并指出，“目前阶级斗争的主形式之一是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争取掌握基本农民群众的斗争”。

11. 根据上述情况代表大会认为，“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道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有工业、国家信用机关和无产阶级所掌握的其他经济命脉的经济领导作用日益加强的条件下，吸收基本农民群众参加合作社组织，并保证这一组织循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同时利用、克服并排挤其中的资本主义成分”。

12. 代表大会确认并赞同四月代表会议规定的在农村扩大商品流转的范围以发展生产力的决定以及十月中央全会提出的关于必须在贫农中寻找支柱，与中农结成联盟（不要避开贫农，而是在贫农的积极参与下，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贫农的中介）的补充决定。

13. 代表大会强调指出了农村分化加剧的问题。

14. 代表大会指出，尽管存在分化，但中农仍然是农村中占多数的类型。

15. 代表大会指出了农村问题上的两种倾向：

(1) 低估农村分化和富农危险。

(2) 低估中农的作用和意义以及与中农结成联盟的必要性。

代表大会特别强调指出必须同低估中农、高估分化和富农危险的倾向作斗争。

火力集中打击谁呢？

16. 代表大会指出群众积极性的增长以及提高所有群众组织的主动性的必要性，同时指出：“这些组织的领导力量即联共在其一

切组成部分中都应走彻底的党内民主的道路”。

17. 代表大会在党的构成问题上反对“那种过分扩大党的队伍、使未经工会和各级无产阶级组织锻炼的半无产阶级分子充斥党内的政策”。

关于工会工作和共青团工作的决议基本上也应发挥这些观点。

18. 关于共产国际问题的决议应确定通过集体参与各兄弟共产党的领导工作使共产国际的制度民主化的方针。

(1) 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共产国际扩大执行委员会提纲表明，对国际局势的总评价上存在的分歧事实上已为发展过程所消除。

(2) 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趋势、方法和形式问题，对社会主义建设基本力量的估计，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确定问题上，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均未引起原则分歧。

问题在于对决议的解释及其实际运用上。

提交中央四月全会批准的经济问题决议在这方面的意义是重大的。应根据决议制定党对经济机构在预算方面的指令。

(3) 有关经济政策上的两种倾向的问题。列宁格勒和库班。

关于党内民主的问题。

理论与实践。

列·托洛茨基

1926年3月27日

№02780

托洛茨基致谢列布里亚科夫

(1926年4月2日)

绝 密

亲爱的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

匆匆给您写这封信。您和我及其他几位同志就斯大林的建议和与之协商问题所进行的那次谈话产生了完全出人意料的、简直是惊人的进展。您走后过了两天左右，机关就盛传谢列布里亚科夫在动身去满洲之前组织了……一个派别，其代表人物是……托洛茨基、皮达可夫^①和拉狄克，并且皮达可夫留下搞联络。由于不知何故把传言一事与古比雪夫^②的名字联系起来，因而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他关于此事他知道些什么。他答复的大意是，他没听说过什么派别，但从斯大林的话来看（好像是这样）他觉得这件事是这样的：斯大林曾要求“无条件地承认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但谢列布里亚科夫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要求停止造谣中伤”，等等。我尽力向古比雪夫解释这件事的实际情况，或者至少根据我本人同斯大林的谈话及斯大林同您谈话所了解的情况来解释。把事情说成

① 皮达可夫，格·列·（1890～1937）——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起从事经济工作和苏维埃工作，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驻法国商务代表、苏联国家银行董事长、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被处决，后平反。

② 古比雪夫，瓦·弗·（1888～1935）——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2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7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是您的便条就是对斯大林提出的某一要求的答复，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因为据我所知，在您那儿说的是由斯大林约定见面谈话的时间。斯大林与您进行私人谈话提到无条件承认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这种个人要求简直无法理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相当清楚党章及其决定，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完全对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负责。乌格拉诺夫不知为什么要打电话（就我给纺织工人作的报告）说，我们不知道您对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观点。我回答说：“我作为一名党员或中央委员不捍卫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还能做什么？您有什么权利猜疑？”我对这件事是这么看的，私人谈话的目的是消除种种指责和造谣诬蔑，创造一种较为和谐的工作条件，当然是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和我一起在政治局工作的斯大林在我们谈过这些问题以后会绕这种弯子，我的确感到有些奇怪。但我认为因组织形式上的原因拒绝斯大林以政治局一部分人（好像是4位政治局委员）的名义建议进行的谈话是毫无道理的。可我真弄不懂，为什么进行这次谈话，为什么赋予另一种方向，不是使今后的工作变得容易，而是变得更难。为什么斯大林要在您动身去满洲的前夕跟您谈话，使得在这里难以确定您和斯大林谈话的真实内容和您与这些谈话有关的那封信的含意。

我认为必须匆匆写这封信向您通报此事，以防他们通过比如电报要求您就这件莫名其妙的事向政治局作出解释。

紧紧地拥抱您并祝您精神愉快，身体健康！

您的列·托洛茨基

1926年4月2日

No02781

弗·米·斯米尔诺夫^①：
论我国的经济困难问题^②

(1926年4月2日)

近期我国经济明显出现了一些病态现象，以致引起人们对可能发生危机和通货膨胀的担心。毋庸置疑，在这些担心里惊慌失措因素起的作用不小。不过对此应作仔细的分析。

试列举这些现象。首先是国内切尔文纸币的购买力略有下降。从附表1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现有的1924~1925年国家计委的批发指数，行情研究所的零售、生活费和零售指数，总的来说均高于1923~1924年的相应指数。国家计委1924~1925年的平均指数比1923~1924年的高6.5%，零售生活费指数高8.5%，行情研究所的零售指数高6%。从1924年1月1日到1925年1月1日国家计委的指数提高了6.5%，零售生活费指数提高了6%，行情研究所的指数提高了10%。因此，我国卢布购买力在这一年里的降幅应在5.5~9%的范围内。购买力下降这一情况是显而易见的，但仍然应该指出，第一，只有1925年1月的行情研究所的指数创了纪录，超过了年指数最高点即5月指数的2.3%，国家计委的1月

① 斯米尔诺夫，弗·米·（1887~1937）——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1~1922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

② 《论我国的经济困难问题》一文首次作为“争论”文章发表在《红色处女地》杂志1926年第5期第156~173页。现根据存档手稿发表。档案里没有的图表及（档案里有的）表格均是从杂志的文章里转印的。

指数和零售生活费指数分别比5月指数低6.5%和4%；第二，上年所有指数的增长也并不小。^①

表(1) 总体指数

国家计委批发指数		零售预算指数		市场行情研究所的零售指数		
	1923年	1924年	1923年	1924年	1923年	1924年
10.1	1565	1643	1721	1918	1670	2060
11.1	1492	1636	1618	1948	1690	2030
12.1	1573	1682	1679	1978	1720	2050
	1924年	1925年	1924年	1925年	1924年	1925年
1.1	1690	1720	1819	1976	1800	2050
2.1	1865	1780	1989	1988	2100	2080
3.1	1930	1833	2064	2044	2030	2110
4.1	1803	1945	2081	2136	2070	2170
5.1	1752	1966	2121	2189	2130	2210
6.1	1658	1914	2024	2141	2060	2190
7.1	1690	1880	2074	2110	2100	2180
8.1	1754	1751	2136	1935	2250	2100
	1725	1727	1915	1867	2190	2080
10.1	1643	1742	1918	1923	2060	2150
11.1	1636	1753	1948	2010	2030	2170
12.1	1682	1793	1978	2053	2050	2240
	1925年	1926年	1925年	1926年	1925年	1926年
1.1	1720	1833	1976	2099	2050	2260
2.1	1780	1902	1988	2190	2080	2300
3.1	1833	1940	2044	2250	2110	2340

^① 从1923年1月1日到1924年1月1日国家计委的指数增长了1.7%，零售生活费指数增长8.5%，而行情研究所的指数整整增加14%。——斯米尔诺夫注

表(2) 工业指数

	国家计委批发指数		行情研究所的零售指数		二种指数比例 关系变化
	绝对值	以百分比计 1923年10月1日止	绝对值	以百分比计 1923年10月1日止	
1923年	2757	100.0	2	100.0	100
11.1	2432	88.4	2590	95.0	107.4
12.1	2291	83.3	2440	89.5	107.2
1924年					1923-1924年平均为114.5
1.1	2293	83.3	2390	87.6	105
2.1	2269	82.5	2530	92.7	112.1
3.1	2187	79.5	2650	93.5	117.4
4.1	2089	76.0	2420	88.7	116.5
5.1	2034	74.0	2380	87.2	117.6
6.1	2013	73.0	2430	89.0	121.8
7.1	2021	73.5	2450	89.8	122.0
8.1	2033	74.4	2480	91.0	122.2
9.1	2009	73.0	2480	91.0	124.6
10.1	1986	72.2	2430	89.0	123.0
11.1	1971	71.7	2440	89.5	124.6
12.1	1953	71.1	2400	88.0	123.7
1925年					1924-1925年平均为120.3
1.1	1939	70.5	2359	86.1	122.0
2.1	1926	70.0	2320	85.0	121.3
3.1	1906	69.4	2290	84.0	121.0
4.1	1906	69.4	2270	83.2	119.8
5.1	1908	69.5	2250	82.5	118.6
6.1	1898	69.0	2220	81.4	117.8
7.1	1898	59.0	2190	80.3	116.2
8.1	1903	69.2	2210	81.0	117.0
9.1	1927	70.0	2270	83.2	118.7
10.1	1949	70.8	2390	87.5	123.4
11.1	1964	71.4	2450	89.8	125.5
12.1	1976	71.9	2510	92.0	127.8
1926年					平均为125.7
1.1	1982	72.1	2480	91.0	126.2
2.1	1996	72.5	2480	91.0	125.5
3.1	2000	72.6	2490	91.3	125.7

表 1 工业指数的批发价和零售价的变化

(以 1923 年 10 月 1 日的两种指数为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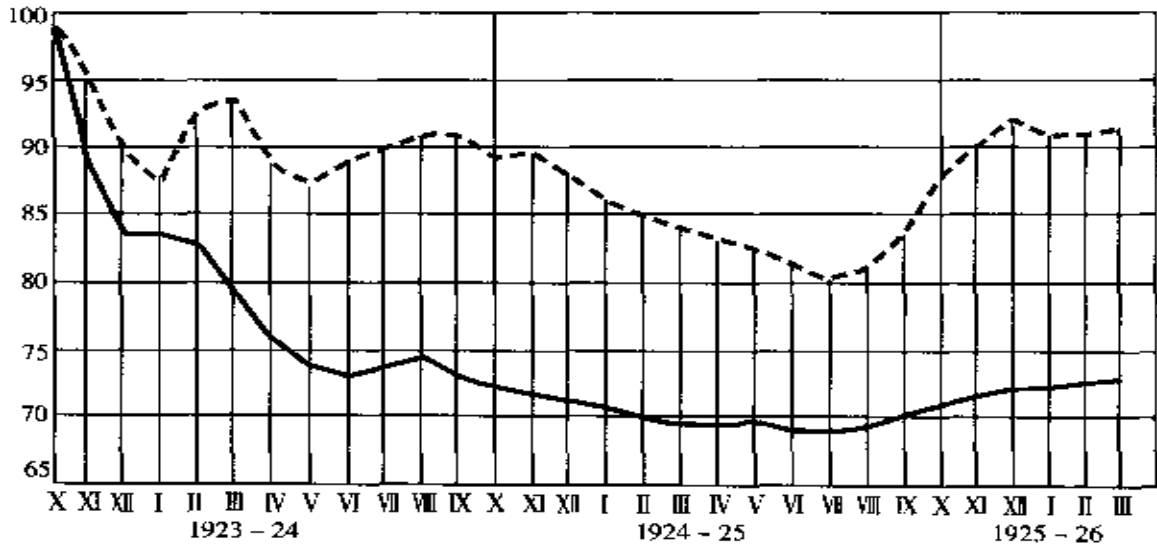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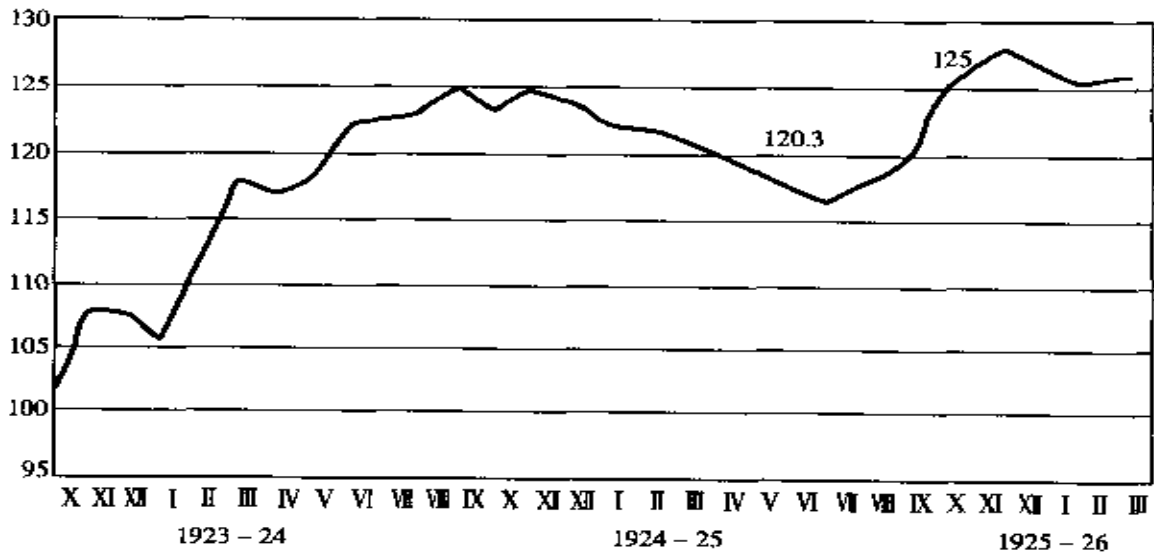


表 2 零售指数比批发指数增加的百分比

(以各月批发指数 100, 1923 年 10 月 1 日的零售指数也为 100)



总之，我国切尔文的购买力在两年内明显的下降^①（从1924年1月1日到1926年1月1日由7.5%降到13.3%）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我国货币贬值了：货币贬值的典型特征是此时货币失去了某些功能——储蓄手段、支付手段和价格尺度的功能，变成了最狭义的流通手段。我国切尔文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因为其购买力下降的幅度太小，而价格上涨又没有普遍性（主要是某些农作物的价格上涨了），并且涨价不是持续不断的，而是呈波浪式地进行的。

因而卢布购买力下降的结果表现得最严重的不是在我们的国内市场上，而是在国外市场上：切尔文与外汇的比率呈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被所谓的外汇干预暂时抑制了。事态复杂化的原因还有，世界市场上黄金的购买力提高，而且无疑在近期还将继续提高。战后世界黄金市场还远远没有回到多少正常状态：现在世界黄金购买力还不到战前的65%。就是从战后阶段全世界黄金生产均无利润这一点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黄金购买力的这种水平完全是不正常的，而且根本不是黄金与其他商品比价变化的结果。我国则只处于这个时期的开始阶段，即大量黄金由于大多数国家改用纸币而退出流通并充斥世界黄金市场，但随着向硬通货回归，开始枯竭，黄金的“商品价格因而开始接近其价值”。我们将来该如何对待导致现在集中世界黄金储备的那些国家大发其财的这种现象——这不属于

^① 在这里要顺便指出一点，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完全不等于通货膨胀。比如说沙皇金卢布的购买力从1895年到1914年下降了37.5%（见科赫诺《俄国物价指数》一书第158页表1），但谁也没有想要断言，这就是通货膨胀。回想起货币贬值时期，印象还是那么深，当时通货膨胀的变化掩盖了其他所有变化，以致“紧缩银根”和“通货膨胀”这两个词立即变得毫无意义了。前不久我还曾听说过“工业价格上的通货膨胀”这种说法。也不难引申出“纺织业通货膨胀”、“制糖业通货膨胀”等等，就是说价格的任何变化都反映在货币的波动上。要记住，即使用硬通货，指数也首先反映行情，只有在指数不断急剧地上升时才能被认为是货币贬值的特征之一。——斯米尔诺夫注

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之列。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国内切尔文购买力下降的同时，黄金的购买力在提高，^①我国卢布的购买力与其黄金平价拉开了距离。

不过既然我们在支持着这种黄金平价，那么就会出现今年特有的第三种现象：我国大宗商品的出口无利可图。事实上，比如按照高出战前一倍的价格在国内收购这些商品，而这些商品在国外才卖到高出国外战前价格 60%^②，再把所得外汇按现在（即战前）平价兑换，我们的出口商明显要亏损。因此就出现了我国报刊不止一次提到的各级经济机关讨论出口问题时常说的“没有出口的决心”。由于没考虑到、也没能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今年的出口计划看来有一种完不成任务的自发倾向^③。相反，尽管收取关税，进口倒是特别有利可图，大有超计划进口的趋势。对外贸易垄断制自然给这一趋势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但无论怎么说，今年收成虽然不错，但我们今年的贸易平衡在外汇储备少于往年的情况下仍有出现入超的倾向。还有一点：工业自身发展的规模小于去年（去年工业的发展比前年几乎高出 54%，今年按计划来说仅高出 33.5%）^④，而为准备下一个 1926～1927 年度的发展则需要更多的基本建设费用

① 还要补充一个在这方面起作用的现象。在邻近我们的德国发生危机，其全面的危机性降价对我国的影响是德国马克购买力的提高。——斯米尔诺夫注

② 这些数字都是约数，也只是为了举例说明。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也没有掌握可以更准确地判断这个问题的进出口商品价格涨落的指数。——斯米尔诺夫注

③ 我们总是把计算错误说成是目前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但此时人们却忘记了，不但今年有这个情况，而且去年也有。尤其是在粮食出口方面去年的计算糟得多，本来计划出口粮食，我们却吃上了进口粮食。但由于有其他几类农作物和工业品的出口，这种错误计算得到了弥补：与最初预定计划相比，1924～1925 年度实际出口为 118.5%，与后来落实了的计划相比为 112.6%。较为优惠的进口条件在这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斯米尔诺夫注

④ 见《计划经济》1926 年第 2 期第 48 页《国家计委控制数字的修改》。——斯米尔诺夫注

(1924~1925年度的基本建设费用为近3.5亿卢布,明年则确定为8亿卢布,而最初预算为10亿卢布)。尽管这里所预测的产量增长无疑不能满足市场,但拟定的费用数额会引起工业本身的资金、信贷和预算的极度紧张。

最后,还未消除工业品的商品荒。批零差价(见表2)从7月份起很快加大,到12月份创近两年来最高纪录。特别是需要指出的明显特征已不是某些日用品的商品荒,而是生产资料的商品荒。今年是燃料短缺,而去年建筑材料的价格则猛增了36%。

显然,所有这些现象集中出现在1925年秋天不是偶然的。只是黄金购买力的提高更加剧了这些总的不利后果,但这与我国国内经济并不相干,也毫无联系。除这一复杂的情况外,其他所有现象均与我们正经历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一时期,与我们执行的这一经济政策密切相关。

这一时期就是从所谓恢复时期到所谓改造时期的过渡时期。如果在此之前把扩大生产所必须的费用主要用在原料、燃料、辅助材料和劳动力(即流动资本的物质要素)上,如果我们去年储备有相当丰富的未利用设备,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不但不用计算新设备的费用,就连折旧费用也不用完全核算,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只要扩大生产,就得先投入大笔基本建设费用,而为了弥补以前的失误,还应加大设备的折旧,因为在有些情况下(例如在煤炭工业中)不但扩大生产,而且维持生产原有的水平都要求更新设备,投入基本建设费用。

从国民经济观点来看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改变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的比例——与后者相比要加强前者。这就是说,与用于消费的那部分总产品相比,必须相对增大用于积累的那部分总产品(用于恢复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除外),这是第一。第二,有必要把这部分积累集中

用于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对固定资本物质要素的消耗量更大的部门。

总之，生产单位越小，其资本的有机构成就越小，其扩大所需的投资也就越小，在其发展之初从国民经济中得到的作为生产资料的产品和作为消费品返还给国民经济的产品数量之间的比例就会更好。相反，假如资本的有机构成高，固定资本持续周转，那么，从国民经济中得到的生产资料要过好几年才会返还给国民经济。^①所以这些部门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需要在本部门内进行更大的积累或者吸收其他经济部门的积累。当前调整这一积累的任务应成为我们经济政策的基本任务。

现在再来看看我们目前的情况如何。只要草草地看看我们的经济政策就可以说，我们根本不重视这个问题。我们仍受 1923 年秋危机（顺便说一句，尽管发生了危机，但研究得很少、很肤浅）的影响，^②受担心再出现销售危机的影响。所以我们的全部政策是从日用消费品降价的观点制定的。但日用消费品降价也要关注燃料钢铁等生产资料的降价。尽管我们承认“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超过供给”这件事已近 2 年，但降低所有工业品的价格以避免“农民罢购”成了我们主要的任务。最低的折旧费用，最低的基本建设费用，最大的资本周转速度——这是决定我国工业企业工作的基本指

① 许多人以为向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投资“赢利”高，非常诱人。人民委员部在这方面错误尤其严重，忘记了追求这样“高赢利”的投资实质上是掠夺性地利用国家的生产力，不可避免地会对近阶段产生影响。煤炭工业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1923—1924 年度顿河煤矿的矿工为追求低成本高赢利，靠压缩基本建设费用、把全部资金都用于纯经营性支出来最大程度地提高生产率。大家大概还记得，当时为了避免发生煤炭销售危机，不得不进行提倡所谓燃料平衡矿化的宣传鼓动，可今年压缩基本建设费用导致我们不能充分发展煤炭生产，于是煤炭销售危机变成了燃料危机。——斯米尔诺夫注

② 顺便说说，明年肯定要消灭的“国家计委控制数字”的主要缺点是从未试图处理我国国民经济积累的规模及其调节的问题。奇怪的是，尽管批评意见颇多且不乏吹毛求疵，但至少我至今还未得到任何指示。——斯米尔诺夫注

令。市场行情不景气这一幽灵使我们视而不见国民经济从更广阔前景来源的需求。

这个政策对轻工业各部门的不良反应最小。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由于这个政策促使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增长造成了“商品荒”，即正是在轻工业领域出现了提价的倾向，所以轻工业用了许多方法，像降低产品的质量、强行搭售、缩短对销售单位的贷款期限来对付这个降价政策。相反，只是从去年年中市场才开始复苏的重工业（运输业也包括在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广阔的市场工作，而是为我国的国有企业工作，在相当程度上处于毫无保障的境地。随着固定资本恢复期的开始，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就应迅速增加，而且已经在增加。^① 我们接近于这样的关头：由于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曲线将迅速上升，而我们却根本没有对改变我国以前的价格政策作好准备（现在在决定各部门的发展方向时，价格仍起重要作用）。

因此，消除“商品荒”这一问题就要比我们平常所想象的复杂得多。问题决不在于加速业已出现这种情况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这样就意味着只能遵循现今行情的指数。我们非常清楚而且要时刻牢记一点：在当代生产技术条件下持续几年的再生产过程十分复杂，日新月异，这些行情指数不会为生产发展应取的方向提供正确的指南。所以只遵循这些指数的资本主义生产才出现周期性危机。我们比资本家更清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内在机制，把绝大部分大工业，也就是再生产过程最复杂的那个国民经济部门集中在国家手中，应该不仅看到行情，而且要看得更远，应该善于看到当前

^① 例如，参看交通业对冶金工业下的订单。一年前还要强制交通人民委员部提出对钢铁的订单。现在却相反，不得不强制冶金工业部门接受交通人民委员部的订单。

还没有在市场表层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的那些深得多的过程。我们不但要从价格变动或目前对某些产品需求增加的情况出发，而且要从国民经济远景规划（哪怕不是根据国民经济内部的价格关系，而是物质关系的概算作出的规划）出发来研究各个生产部门的积累和发展。这里就包含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由于生产资料国有化使我们无产阶级国家可能采取的和必须采取的新观点、新方法。而实现这个远景规划的主要手段应该是在我国工业经济核算的结构条件下执行的价格政策。但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我们迄今为止是从另外的角度来执行这个政策的。

我们暂时仍停留在“恢复”过程的范围内，就是说由于利用了现有的设备，这个过程的再生产周期相对简单，这一政策还未产生特别消极的后果。但现在，在向“改造”阶段即更复杂的周期过渡的阶段，这些消极的后果已开始表现出来——首先表现在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普遍不足；第二，重工业以至一切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不够（一部分表现在今年，以后几年将表现得更好突出）。

迄今为止工业已多少走出了困境。正如前面说过的，主要是由于工业成本核算只限于成本的计算（同时在许多情况下对折旧考虑不足）再加上最低利润。显然，这个利润略超出我们的价格政策规定的范围，但总的来说依靠这个利润只能进行规模不大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无论如何也跟不上工业实际发展的速度，尽管去年的速度是前年的54%。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工业的因素是提高劳动生产率（1924~1925年度一些主要工业部门人均日工资为5.74战前卢布，而1923~1924年度为4.06战前卢布），^①利用所谓的呆滞资金和进行所谓加快流动资本的流通，即相对减少后备品的生产，其中

^① 见《计划经济》1926年第2期第52页《国家计委控制数字的修改》。——斯米尔诺夫注

部分是靠生产过程合理化，但也有一部分是靠极度消耗。但就是这部分资源也不够，所以不论意愿如何，工业不得不依靠别的来源——预算，而主要是信贷，其中包括发行纸币、债券。

由于在发展商品流转的同时对货币商品的需求也要扩大，发行债券也可以被用来加强国有经济中的资金，这是毫无疑问的。由于我国经济货币化的不断发展，对这种货币物（至少是迄今为止）需求的增长应比物质财富生产的增长快些——这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应该承认，工业^①的贷款规模比国家总的商品流转发展所允许的规模要大，而且银行除了正常发展商业信贷外还投入相当大数量的资金作为投入的资本来加强流动资金（即长期后备），甚至用于固定设备。只要举出国营制糖工业托拉斯作例子就足够了，这个托拉斯在未降低产品成本、产量比1923~1924年度增加了1.5倍的情况下仍使其法定资本保持在原有水平。显然，这就是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引起其他一系列不良后果的我国卢布购买力下降的原因。

但也许是没有别的出路，也许是国民经济内部的积累太少，以致只有人为地降低卢布汇率，即类似向所有货币持有者征税，我们才能够进行必要的从我国经济内部比例的角度来说可能是力度不够的发展。这是一个相当合理的问题，因为我们每次即使自觉对经济进行指导仍不得不从生产力的现状出发，试图使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在生产现状基础上可能具备的劳动生产率不相一致，这样的速度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败，而在我国目前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则会导致经济危机。

如何决定国家积累规模的方法问题根本没有得到全面细致的研究，就连国民收入这一简单得多的问题也变得复杂起来，以致在确

^① 这里还应加上很大程度上依靠银行资金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社。——斯米尔诺夫注

定这一问题时某位作者主观特点和情绪所起的作用几乎比他所依据的客观资料还要大。所以我们不准备确定国家积累的整体规模，只是要考虑一下，在我国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里，是否已经形成并正在形成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任务的和通过某些渠道能够加大工业发展资金的那些收入来源。

如果这样提出问题，那么我们的思路自然会转到批零差价上，商业资本尤其是私人商业资本将由于这种差价的增大而得到“不应得的利润”。把资金集中到这个部门是徒劳无益的，这无需证明。因而防止零售加价过高是我国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之一。

我们将以工业品批零价格的变化为例依据国家计委和市场行情研究所的指数来确定这个差价——“批零剪刀差”的变动——我们之所以选择市场行情研究所的指数，是因为列入其中的商品目录与我们惟一的批发指数——国家计委指数所列的商品目录接近。我们先要指出：（1）国家计委指数统计的不是我们商品的出厂价，而是国家机关、合作社和个人批发价的平均价^①。当然，这一平均价要比出厂价更依赖市场行情，即零售价的涨落，所以平均价与零售之间的差价比零售价与出厂价之间的差价要小，（2）国家计委指数统计的，除市场行情研究所指数所列入的日用消费品以外，还包括生产资料（石煤、石油、铁型材、硫酸等）的价格，所以在里很难说是批零差价。如果我们从国家计委的指数中只挑出消费品，那么平均价与零售价之间的价差相对地就会更大，（3）正如我们一再指出的那样，市场行情研究所的指数对农村及小城镇的价格反映不足，那里的加价已达到最大限度。因此以后对批零差价的统计结果至少是少算了，而不是多算了。

批发价和零售价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在附表（1）中，把1923

^① 见博勃罗夫《国家计委统计指数》第38页。——斯米尔诺夫注

年10月1日（即危机爆发之前，众所周知，当时的加价相当高）的两种指数当作100，列出了1926年3月1日以前指数的百分比变化。到1925年7月为止，批发价几乎不断下降（先急后缓），降至起始点的31%。此后批发价略有回升，到1926年3月升至起始点的72.5%。零售价的情形则截然相反：在10月~1月危机时期急剧下降（但比批发价下降速度略缓）后，1923~1924营业年度的其他时间内均在90%的水平上下波动。在随后的1924~1925年度到6月为止零售价一直下降，甚至比批发价下降的速度还快，在最低点时（也是批发价的最低点）是起始点的80%多。此后零售价重新迅速回升，从12月份开始已略高于1923~1924年度的水平，如不考虑该年度头3个月危机月份，则达到91%以上。我认为，这个表格非常直观地描绘了我们的零售价与批发价的变化互不依赖的情况。某些价格同时（没有任何比例）变化的迹象只是说明批发价（但不是出厂价）紧随零售价变化，尽管程度非常小。

两条曲线相应点之间的距离表明，批发价加价超出1923年10月1日的加价数量之大小。未必有人想断言，当时批发价加价太小，做买卖要亏本。但只要看看当时通篇抱怨私人资本发财致富的书刊就够了。决不能以国民经济的利益来证明加价的增加是对的。为确定增加的幅度我们来看看表（2）。

该表与表（1）不同的是，把批发指数一律当作100，因而用直线表示。把1923年10月1日的零售指数当作100，其后的变化用于批发指数变化的百分比变化来表示。因此，批发指数与零售指数相应点之间的差别就表示从1923年10月1日起零售价比批发价增加了多少百分点，换句话说，批发价加价在与零售价的百分比中有多大。现在我们来看看结果。

在整个1923~1924年度加价增加，到本年度末几乎达到批发价的25%，每年平均加价14.5%。在1924~1925年度中加价幅度

下降一直到7月为止，但此时的最低降幅仍高于去年的平均水平——14.2%，为16.2%。此后又迅速回升，年末达到23.4%。本年度平均加价为20.4%。最后，今年到12月为止继续提高，达到创纪录的27.9%，2月1日前略有下降，几乎降至25%，3月1日前又略有回升。6个月的平均指数几乎达到125.7%。这三级台阶——14.5、20.3、25.7说明了商业资本“不应得收入”的增长，这与我们防止零售加价的全部措施是背道而驰的。

现在我们试匡算一下这些“不应得收入”的数额。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1924—1925年度计划提供的最新资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生产计划规定销售的工业产品的出厂价，1923—1924年度为24.25亿卢布，而1924—1925年度为35.7亿卢布。从这部分产品中我们几乎把全部纺织工业（95%）食品工业（100%），大部分皮革工业（87%）、硅酸盐业（玻璃—44%）的产品都算作日用消费品。从森林工业划走了26%，指的是生活用木柴和木制品。从冶金工业划走了21%（五金制品；冶金工业和农具根本没有列入，尽管有一部分像瓦楞铁、金属丝、小型农具在零售加价的数量上起很大的作用），从造纸工业划走了20%，从采矿工业划走了12.4%（石油制品，主要是煤油）。没有列入的有酿酒业（因未列入现有指数）和电机工业。这样分配的结果是，在已销售的全部产品中日用品约占60%。这种统计方法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统计方法毫无二致，该委员会的统计方法是把一些生产部门的产品完全归为日用品，而把另外一些部门的产品归为生产资料。就这些统计结果是否准确而言，可以说这些结果是低估了，而不是夸大了日用消费品的作用。

我们作了这些统计之后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果，1923—1924年度日用消费品额共计 $\frac{24.25 \text{ 亿} \times 60}{100} = 14.55$ 亿卢布。在今年零售

加价平均增加 14.5%（指批发价加价，而不是出厂价加价）的情况下，我们再把这个差价算到出厂价上，我们就要犯低估日用品作用的错误。我们就会得到 $\frac{14.55 \text{ 亿} \times 14.5}{100} = 2.1$ 亿切尔文卢布商业资本的补充利润。1924~1925 年度的统计得出 $\frac{35.7 \text{ 亿} \times 60 \times 20.3}{100} = 4.35$ 亿卢布。最后，假设头 5 个月工业销售了预期销售的 51.22 亿卢布的 35%，即 17.9 亿卢布，我们就会得出 $\frac{17.2 \text{ 亿} \times 60 \times 25}{100 \cdot 100} = 2.76$ 亿卢布。如果批发价和零售价在一年内不接近，那就有增加到 8 亿卢布危险。

最好用局部统计来核实全面统计。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1924 年 4 月 1 日前的资料（没有更早一些的资料）对棉纺织工业主要产品之一——印花布的加价为出厂价的 31%。1925 年 10 月 1 日这种加价已经为 62.6%，而到 1 月 1 日已经是 73.6% 了，即这一年第一季度平均为 68%，换个说法就是与 1924 年 4 月相比，出厂价增加了 31%。这一年的棉纺工业产品应为 85 亿卢布，头 5 个月的产值应不少于 35%，即 2.95 卢布。假设这 5 个月 1 个季度的加价平均为 37%，再从 2.95 亿这个总数里刨去 37%，我们就会得到 $\frac{295 \times 37}{100} = 1.02$ 亿卢布，或者是已被我们刨去 5 个月产值的商品资本额外利润总额的 39.5%。注意到棉纺织工业产品占日用品产量的近 23%，这个部门加价最大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与我们总的计算相符，大概说明了我们的计算结果过低了。

这些数字的准确度如何。由于对现有资料研究得不充分，准确度自然不会很高。统计出这一超额利润结果的一位同志得出这样的结论：去年超额利润的数字将近 6 亿，而不是 4 亿。如果在我提供的统计结果中考虑到我指出的这些低估的因素，那么超额利润完全有可能达到这个数字。另一方面，当然会有人提出异议，说部分在

我们国营零售商店和合作社里出售的商品加价并不高^①。大概很难否定也很难肯定应该增添还是减少 1 亿卢布。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去年商业资本超额利润为好几亿，而今年将超过 5 亿。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现在该把这个问题作为我们国家机关而不是个人认真而有条不紊地研究的对象。

只要把去年商业资本的超额利润 4 亿卢布与同年工业基本建设费用总额 3.5 亿卢布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对这些数字的值有一个概念。今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起先把工业基本建设费用确定为 10 亿多卢布。后来，由于削减计划，市场行情研究所提出了 6 亿卢布这个数字，因此，今年商业的超额利润大约为 8 亿卢布——这几乎是两个极端方案之差的 1 倍。

从发展我国工业的观点看，超额利润只是局部的问题，但超额利润对我国的经济有其不利的影响。由于这部分利润落到了私商手中，他们把相当一部分利润用于积累。当我们准备限制其市场业务时，他们就用这部分利润来购买外汇和黄金作为最可靠的保存方式。毋庸置疑，我们近期卖出的外汇在相当程度上实际上是在收回私商积蓄的、在此时又派不上用场的闲置资金。另一方面，商业资本利润率高同样无疑也会促使私人贴现率变得极高，这种贴现率往往达到每月 10%，3~4% 已被认为是很低了。

其次，当工业因吃不饱而不得不通过生产合理化，压缩后备生产和非生产性开支的规模等手段厉行节约时，我们的商业组织，尤

^① 在此有一点不容忽略，即零售指数也考虑到这些价格，这是其一；其二是，在国营零售商店和合作零售商店购买的商品经常又以更高的价格转手再出售；其三，合作社，尤其是基层合作社加价非常高。最近一段时间我系统地询问了我碰到的所有农村来的同志，那里印花布价钱多少。回答相当一致——合作社小店以每米 70 戈比、80 戈比、90 戈比的不等价格出售，而出厂价为 30 戈比。有时商品到达基层合作社之前中间商就几易其手，这是商品加价的原因。——斯米尔洛夫注

其是基层合作社，却有可能靠广泛加价来抵补其商业费用。合作社机构过于庞大，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抱怨，说在私商只要一个人管理的地方，一个合作小店却要用4~5个店员，可我们却没有精简这种机构的刺激因素。

这种膨胀的合作社机构以及更大程度上不是用于积累，而是用于消费的私商的那部分超额利润造成了对日用品额外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样一方面加剧了商品荒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始终“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消除商品荒为目标而加强了市场向我们发出的警告，即必须最大限度地发展消费资料的生产。这发生在真正的生产资料商品荒也渐渐向我们袭来的时期，而这种生产资料的商品荒现象是由我们必须从所谓的恢复型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向正常型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转变所决定的。

* * *

如果现在把所有这一切同我们所说的从国民经济整体的观点看绝对必然的工业发展中出现的所有这些困难对比一下，情况就清楚了：当工业为了自身的发展只能去争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时，加大非生产性居民阶层有支付能力需求的资金却集中在我们国民经济的商业部门里。如果通货膨胀的汹涌浪潮冲击工业，那么工业中就会造成“水灾”并由此波及整个货币流通领域。当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大多是接近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人士）断言通货膨胀是由工业贷款过多引发时，他们说得完全正确，而与他们持相反观点的一些人则想说通货膨胀是所谓我国经济特有的比例失调造成的。但如果他们以为靠压缩工业贷款可以有所成效的话，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的价格政策是替商业资本从工业中抽取资金的水泵，即使停止靠发行债券向工业注入资金，商业资本仍会运作的。所以也要人为地支持对工业的供养，如同价格政策人为地从工业中抽取资金那

样。如果我们只局限于停止人为的供养，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只是工业消耗殆尽，却没有除去我们商业领域已经形成的和正在形成的通货膨胀脓肿。应从另一方面抓起：改变价格政策以保证向工业注入足以维持其正常扩大再生产规模的资金，这样我们也就无需人为地供养工业。

反对这个建议的一种流行的意见认为，不能保证提高工业品的批发价不会引起零售价的上涨，而工业品零售价格的上涨也不会使农民对农产品加价，因此我们这时不会取代整顿出现普遍提价即通货膨胀的现象。存在这种反对意见只说明有人对市场机制还一窍不通。

首先，凭经验对批发价涨落的观察表明，在两年期间零售价与批发价没有任何直接的依赖关系，恰恰相反，批发价不管我们政策如何，以和缓的方式反映出零售价的涨落。其次，这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

“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7页）。^①

我们忽略了马克思这鞭辟入里的结论。

实质上采取使价格与成本一致的政策也是消除价格与价值在数量上不一致的一种尝式。马克思在这方面也特别提醒我们说，只要存在商品生产（而我们在日用消费品方面接触到的是无组织的农民经济这一庞然大物，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这种生产所具有的商品性质），价格偏离价值就不是什么缺点。这意味着什么呢？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49页。

这意味着，在不同种类的众多商品（粮、布、铁、煤等等）的比例已定的情况下，这些商品的价格已经确定，而且不取决于商品的价值。但同时这种价格与价值的偏离就提供了可能（刺激，但主要是可能），使价格高于价值的那些生产部门的发展速度比价格低于价值的那些部门的发展速度快，从而由于众多商品形成新的比例而使价格与价值趋于一致。既然现在我们打算并有可能自觉地影响生产的进程，正像我曾说过的那样，我们的价格政策应当立足于使价格与我们所需要的那些生产部门的发展速度相一致的原则之上，而不是每时每刻都使价格与价值（或和我们所说的成本）相一致。使价格与价值一致的原则只会使我们失去实施我们既定计划的可能性，因为只有计划是不够的，也需要实施计划的资金。由于我们在价格领域未取得任何重大成果（参看我国反零售加价斗争的历程），所以我们只是提供可能，把那些我们可以用于发展工业的资金投向我国经济的寄生领域。我们的任务是利用客观形成的有利于工业及其发展的市场行情，但这方面与资本主义经济不同，我们不仅应该遵循市场行情指数，而且应该遵循对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更为深刻的分析，有计划地而不是自发地对我国的经济进行调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市场的自发性服务于我们，并最终克服它。我们只有通过改变众多商品的比例关系才能真正改变价格，而只有依靠此时形成的价格水平才能改变众多商品的比例关系。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不再采用从我国货币流通角度看有害的靠发行债券来支持工业的做法，制止我国切尔文的贬值，同时不要阻止整个经济形势所要求的工业的发展。而这件事情恰恰要在现在做，否则向正常的扩大生产过程过渡（与“恢复过程”不同，这个过程不需要扩大固定资本的费用）只会给我们带来极为难堪的后果。

涨价当然要小心谨慎。如果我们仅仅是统计出，哪些商品的加价超出正常加价多少多少，同时还提高出厂价，那我们就犯了大错

误，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没能把这种统计工作做得十分精确。市场相当复杂，任何一个聪明的学者都算不出哪些价格现在是正常的，即使他有全部的计算资料，因为那道著名的数学题（在相互引力影响下运动的三个物体）与这道题相比简直就不算什么难题了。只有通过逐步摸索、逐步涨价，加价大的地方多涨些，加价合适的地方少涨些，注意观察结果，我们才能解开这个难题，才不致引发我们预料不到的市场震荡。但这种小心谨慎的做法不应妨碍我们坚定地执行这条路线，否则我们将走进死胡同。

如果我们能及时地解开这个难题，那么消除目前存在的，本身尚未构成特别威胁的那些不良现象的问题，像使我国卢布的黄金平价与其国内购买力一致的问题、结束我国出口亏损局面并建立良好的结算平衡表的问题就只是技术性问题了。如果需要，我们以后再谈这个问题。最后还要说一点：我们面临的所有这些困难相互之间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只有采取一整套措施，而不是单独解决个别现象的一个个办法，才能彻底消除这些困难。

弗·米·斯米尔诺夫

1926年4月2日

№02782

托洛茨基为在中央四月全会上发言所作的札记

(1926年4月7日)

1. 日丹诺夫同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修正案还是决议。这一点上周六我在政治局已谈过。制定决议和通过决议的情况。

2. 日丹诺夫同志坦率地提出了主要问题，因而也很有意义：我们1923年所说的，现在还应该说。有些人说：那是1923年的事（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阶段），可现在是1926年——工业化阶段。日丹诺夫却说：那时说过的现在还要说。这样一来，新阶段就会化为乌有。但这较接近现实。

3. 许多人在这里说，错误的、过于膨胀的工业化方针导致了去年工业的过热局面。我始终坚持认为，这些失误实际上是对过于收缩的战略方针的反弹。企图从我的路线里推论出这些失误简直太可笑了。如以此为基础进行攻击，恐怕我的防护决不会比别的人差。

4. 加米涅夫同志认为，他本人一转变，向工业化的转变也就停止了。从过去来看我并不认为这两个过程是完全吻合的。至少1924年春天起就出现了商品荒。我认为，本可以更早地预见到这种情况。

因此，加米涅夫同志就有几乎2年的时间来作出必须更坚定地执行工业化方针的结论了。

5. 雅柯夫列夫^①同志阐明了手工业在缓和比例失调现象方面

^① 雅柯夫列夫，雅·阿·（1896—1938）——191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2—1923年任党中央鼓动宣传部副部长，后历任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等职。

的意义。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提法，它证明雅柯夫列夫同志尚未完全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领会事态的全部进程。日益加剧的比例失调现象表明存国有工业在某种程度上丧失在市场上的地位这种情况。以为在这种条件下国有工业可以通过合作社来控制手工业，那是大错特错的想法。合作社不是能产生奇迹的独立自主的经济因素，它只是一种能够满足小商品生产者需求的灵活的社会组织形式。合作社的社会内容不取决于贯串其中的那些经济因素。国有工业和市场比例失调的加剧反倒为手工业的复苏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为其转向社会主义轨道设置了障碍。

6. 关于收成问题我在第 12 次代表大会上说过下面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收成会怎么样，我们都希望丰收，但丰收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落后的话）竞争者会增加，因为丰收对国有工业和黑市都意味着市场容量的增加。”对此大家说我对收成过于担心了。我不同意这种意见，不是我过于担心，我是在从社会主义观点进行评价。企图把事情说成是我害怕丰收，这简直是太愚蠢了。我是担心我们对丰收没有预见和准备。

从生产力发展的观点来看丰收无疑是件好事；从社会主义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就具有了双重性——由于我们缺乏准备，丰收可能会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

去年的情况也是这样。靠我们自己的生产（纺织业）进行的干涉不仅为时已晚而且糟糕透顶。

7. 李可夫在提纲里只字未提未来收成的问题。因此，最初的结果已经有了。

1926 年 4 月 7 日

№02783

托洛茨基在中央四月全会上的发言

(1926年4月6日)

同志们，由于时间不够，我只能回答几个最突出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我本来根本没打算说，但捷尔任斯基同志却出人意料地迫使我对此作出解释。他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落后和冒进哪个更好。不错，许多同志都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别人都是以最泛泛的方式，依我看差不多是幼稚的方式提问的。我当然并没说过“冒进”好，但我说过近几年来采取的都是我们必然落后的方针。由于受总的最低纲领方针的影响，我们的运输业和冶金业就实施了使我们1930—1931年才能达到现有水平的纲领。就拿向国外订购的那批机车来说，由于发生了党内争论这场灾难，竟有人毫无根据地把这件事扯到我的头上。当时有人说，1931年以前订单订的这批机车不会完全派上用场。但既然我不像争论中编造神话所说的那样对机车订多负有责任，那我现在也不能把购得这些如此有用的机车的功劳记在自己的账上。我举出这个例子就是为说明我们在某些主要经济问题上存在过分收缩的倾向。我说的是这层意思，而不是什么冒进。可捷尔任斯基同志却问我冒进和落后哪个更好。不仅如此，他问得还相当具体，问去年（日历年度）起跑过快以致不得不后退的做法对不对。我不知道捷尔任斯基同志为什么偏偏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米高扬提出类似问题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未必清楚事情的原委，他完全可能把秋天“轻率”的起跑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产物。可捷尔任斯基同志应该知道，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在去

年6月12日就提出警告要防止轻率起跑。我不知道包括米高扬在内的其他同志是不是这样做的。至于说到我，去年6月12日我就说过，尽管形势很好，但由于我国某些工业部门盲目冒进使我们面临金融信贷危机。我逐字引用过的这段话：“金融信贷危机有可能演变为尖锐的工商业危机。我不想被人误解，尤其是在早就有人议论什么‘乐观主义’、‘悲观主义’等等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既然预见到危机必然要爆发，就可以采取一些能缓解其影响和后果的措施。可是却反其道而行之：日前在经济工作人员中流毒甚广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报刊支持的那种盲目乐观可能会加重这场必然爆发的危机的影响，因为这场危机会使我们猝不及防。”这是6月12日的事情。我自然只要需要就千方百计地坚持这一点：今后必须把国民经济资源向工业转移。但同时我绝对清楚必须量入为出，要按已拨出的那些不足的资金来办事。一条战略斗争路线是把资金向工业转移；另一条战略斗争路线是工业自身内部的财政平衡。6月24日我还说过：“有某些迹象表明，工业至少是工业的个别部门的发展没有量入为出。这样做的后果再过一年或半年左右就会相当尖锐地表现出来。这个问题应予以特别重视。或早或晚都应在小范围内集体讨论这一问题。”这是6月24日的事情。我不知道别人在这个时候都说了些什么。但我决不想让别人以不应该“冒进”、不理智的冒进是有害的来教训我。现在，也就是事后，把我当时而不是出现失误后表达的想法拿来反对我，这样做大家都该认为有点可笑吧。说什么不应该盲目冒进。可要知道这是我在6月12日和24日说的，这是我的预见，而不是现在，不是今天，不是事后说的。（加里宁：那就是说，您是位很不错的实践家，但却是个糟糕的理论家了。）是的，就是说……但这还不是全部情况。6月28日，我们一家经济类报纸登出了一篇文章，其主要口号印成了黑体：“近期内不用生产规划来梳理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口号是：尽最大的可能和

力量发展。”看，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但我当天说的是：“这种疯狂的提法意味着公然号召我们用如下办法来执行我们的生产政策，这种办法不可避免地（在半年左右）会使我国脊椎尚未挺直的工业爆发随着固定设备危机而来的最严重的工商业危机。”这是我6月28日说的。（李可夫：这登在哪张报纸上？）不是登在报上，而是写在给捷尔任斯基的信里。两周写了三封信。所以捷尔任斯基同志比起其他任何一个人来更没有理由来责问我盲目冒进的作法好不好。（捷尔任斯基：我们6月份原地不动时您说要起跑，可是我们起跑了，您又说再跑快点。）不，捷尔任斯基同志，这都是不值一提的东西。我为不得不引用这些信感到非常遗憾，但这是您的过错。当我给您这位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负责领导人写信的时候，是希望在经济方针上帮帮您，当然我也没想到您会逼着我在这里引用这些信。现在，当您为时略晚地指责我，说我不清楚起跑不是始于6月而是始于9月时，这只能证明您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缺乏批判的态度。由于这些“历史”原因和错误，工业所拥有的资源相当不足，然而我们不得不以这些资源为准。您，捷尔任斯基同志，却没有认识到早在6月（也许更早些）就可以预见到出现财政困难的危险并且应该（正像我建议的那样）召开搞经济工作的共产党员开会核实一下工业的起跑在财政上能得到多大的保障。遗憾的是，您没有召开这个会议。的确，失误一点也没有给我们造成大灾难。也不要夸大事实。但现在如果有谁企图转而把失误拿来指责我，那么我得说这是“用我的拳头来塞我的嘴”。不合适！因为如果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政治局有人在6月就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危险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我！我召集了工业银行和一些托拉斯的工作人员。当然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作出了几点重要的预见，我认为比例失调的起跑正威胁着我们。遗憾的是，您捷尔任斯基同志没有预见到这一点，也不重视屡次提出的警告，可米高扬同志现在，几乎

快过了一年，却把失误归罪于我。（米高扬：失误是我们的错，而您还在继续提您的建议，这是您的错。各有各的账）正是如此：各有各的账。

日丹诺夫同志曾经问过，我的修正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称作是修正案。他说这是一个独立的决议。安季波夫同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说不知道我修正的是哪几条。这里还有人纲领等作了不恰当暗示。李可夫同志本可以扼要地介绍这个决议的形成过程，给大家解释清楚所有这一切。建议政治局为下一次全会，即这次全会，制订关于经济状况的决议的是我。这个建议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对，是一致通过的。在代表大会上出现种种情况之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并感到有必要制定这个决议。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三个月。由李可夫的委员会制订的那个决议草案我是上星期三收到的。（莫洛托夫：是星期二。）不，决议是星期二晚上寄出的，我是星期三收到的。现在你们连几个小时也争来争去，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你们把我们提交必要的修正案的时间卡得太紧。我星期三收到决议，却要求我星期四早晨提出修正并交付表决。我在代表大会后立即召开的新一届的第一次全会上谈到形成党的领导核心时曾经说过，不要把政治局委员置于两难的境地——不是被迫对背着你商量好的现成草案提出相反的意见，就是不得不保持沉默、被迫同意和屈从你所不同意的东西。如果这个决议比较正常地通过政治局讨论，那么在这里激化的许多问题就会通过比较正常的途径得到解决，对此我毫不怀疑。可星期三收到的这份内容极为重要的决议，星期四就要交付表决，我出于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尊重只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参加表决。当时把此事推迟到星期六。由于考虑到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我并不指责制定决议的时间过长。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决议（已经商定的）到我手上时是星期三，即政治局开会的前一天，而推迟也只推迟到星期六早晨。星期五这天我得起草将在星期

六提出的对建议的修正意见。安季波夫同志说，不清楚这些修正意见修正的是什么。这不对，不应该人为地激化矛盾，也不要蓄意歪曲。我在李可夫同志委员会里已十分明确地指出过，我对哪一点提出哪些修正意见，李可夫草案中哪一条不经任何改动我就能够接受。所以，当某些人在这里提出：李可夫的决议里有什么什么，可托洛茨基的却没有，他们这样说是无的放矢：我之所以没有这一点是因为我同意李可夫的有关提法，我在委员会里就这样声明了。耗费时间作这些解释我感到很懊恼。错误的不正常的工作方式在不可能发生冲突和对立的情况下也会挑起冲突和制造对立。（有人大声喊叫。）请原谅，你们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其实，同志们，你们还想要什么呢。当如此重大的一般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发生转折之际，如果我们党内不出现实际的综合性的分歧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不过不必人为地夸大这些分歧。否则党又如何能生存并向前发展呢。否则就会出现莫洛托夫发言中提到的现象：以各种口实从左边和右边来指责半托洛茨基主义。为什么指控者轻易变成了被告呢？因为在我们这里任何问题都被置于机关剃刀的刀刃上，即使偏离这一刀刃千分之一毫米，也要被机关神话编造者说成是骇人听闻的倾向。需要借助托洛茨基主义的幽灵来支撑这种机关制度。而这种机关制度会自动导致出这样的情况：不久前还指控别人犯了托洛茨基主义错误的人，今天他自己却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

（插话：出于本人的愿望。卡冈诺维奇：存在决定意识。）

托洛茨基：可我认为，目前哈尔科夫的存在非常悲惨地决定着某人的意识。

斯克雷普尼克：这暗示什么？

托洛茨基：如果您给我15分钟，我就可以详细说明这暗示着什么。但我认为，这里的大多数人仅凭简单的暗示也会心领神会的。

日丹诺夫同志不知为什么提起了 1923 年的争论。于是别人也毫无缘由地谈起了 1923 年这场争论。我并没有也不准备指望这场争论帮忙。现在谈的是今天和明天。我谈过去丝毫没有同“行动纲领”矛盾的意思。现在，尤其是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我们面临着新形势，这次代表大会批判了道威斯计划、农业倾向不是偶然的。要依靠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确立的这一新形势，从这一新形势出发。所以我也不准备回答加米涅夫同志的问题，尽管他说他不是抽象地，而是出于经济的具体需求来对待工业化的；我也不去研究经济转变的需求在多大程度上与主观转变相符的问题。

关于收成问题。我知道，机关又开始就这个题目编造神话了，这是米高扬同志开的头。米高扬同志，您该知道如果您仍旧打算像以前那样进行争论的话，我甚至可以跟您一起去库班哥萨克那里争论一番……

米高扬：我们是在中央全会上，可不是在库班哥萨克中间。

托洛茨基：但您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就像向库班哥萨克揭发我一样。我也就以牙还牙，而且有更充分的理由。我要说，米高扬当然是最支持结合的了。但他是怎么理解结合的呢。他在这儿教会了我们什么呢。大家知道，他说过，该怎样给羊剪毛。要上下前后左右从各个方面均匀地剪、不能剪肉，不能剪出血。米高扬就是把结合理解为剪毛者与被剪毛者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结合的工具就是工农业价格的剪刀差。（笑声。）而这一切则被称之为无产阶级与农民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进行的结合。不，太谢谢了。我不同意这种牧羊式的对结合的理解……

该驳斥这种蛊惑性的观点，应该老老实实在地理解我对收成的说法。我已经以书面声明的形式要求把我对米高扬同志错误引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文字的批驳列入会议记录。其实应当说，我这里所说的是对我国收成所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社会主义的评价。有人说托

洛茨基害怕丰收，而莫洛托夫则不怕丰收，这太荒唐了，因为丰收是一种不受我们监督和影响的因素。这是否意味着我在作祈祷，求老天停止丰收，而你们要求扩大丰收。这是什么意思。这没有什么政治意义。问题就在于我国的工商业为丰收和为了社会主义利用丰收作准备的方法。我在修正案里说过，消极地坐等李可夫决议中只字未提的丰收就意味着我们坐失时机，工业品不足及我们对丰收没有作好准备，而丰收意味着市场容量的扩大并从而导致比例失调加大，由于没有持有工业品的国家承办人，丰收就推动了私人资本主义的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经济力量对比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可能变得不利。难道这一年来的经验还没让我们学会什么吗？

我要问：尽管总的来说国家富裕了一些，但此时此刻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领导地位这一点上的状况是不是不如一年半以前了。为什么？因为比例失调加剧，因为对去年的丰收没有准备。这里是否有什么东西说明我们“张皇失措”了呢？不，没有理由要张皇失措，更没有理由视而不见。而把合理的社会主义的忧虑说成是“张皇失措”那就错了。如果再出现今年这样的变化，哪怕百分之一、二重复今年的状况，那么尽管生产力全面发展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速度仍然会是负增长。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比将占上风。我说过而且现在还在说，大丰收本身是作为一切发展基础的创造性因素。但我还要重复一遍，在丰收的基础上可以有两种发展：向资本主义发展和向社会主义发展。一台好机车是个好东西，跑得越快越好；但如果指针没有及时转过来，那就有翻车的危险，而且机车开得越快，翻车的后果越严重。丰收犹如一台正在疾驰的机车，如果工业这个指针不能很好地摆正，那么翻车的危险性就很大。

这就是我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表述过的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现在我不得不重新来加以论证。你们说，我的修正案的提法不

适当。那咱们就一起来找到另外的提法。问题难道在这里吗？但当你们转而去进行蛊惑煽动的时候，当你们开始大喊大叫，说有人害怕丰收的时候，那么我要重申：这种做法对孤陋寡闻、糊里糊涂的库班哥萨克也许倒挺合适，可对中央全会来说这绝对不合适。

我归纳一下我的话。我和皮达可夫同志对比例失调及其变动的问题的看法没有被驳倒。我关于在资本主义包围下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速度的问题以及决议中对这个问题错误提法的看法也没有被驳倒。决议里对发展出口（和进口）的要求与“不依赖”世界市场的提法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我们的论据也没有被驳倒。我认为在改造固定资本的新时期里计划因素具有创造性内容，这一看法也没有被驳倒。决议里没有计划因素这一内容。决议既未阐述，也未说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有关工业主导地位方面的指示。李可夫同志的决议规定的1926—1927年度的指令性任务完全是一笔糊涂账。某些同志不顾整个讨论的过程，说我的修正案十分之九在李可夫同志的决议里已经有了，而剩下的那十分之一则是有害的（他们打算以此来对我引用的斯大林的那些活作相应的解释），这足以使人想起穆斯林的哈里发欧麦尔，他说：“凡是超出古兰经的，那不是在重复古兰经，因而是多余的，就是反对古兰经，因而是有害的”。然而，李可夫同志的决议并不像马克思主义的古兰经。

我认为对提交表决有重要的决定意义的修正案意见是：（1）比例失调的变动，（2）工业化速度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受国际制约的，（3）工业对农业的主导作用，（4）计划因素的新任务，（5）李可夫同志对工资这一条胡乱解释以后，我认为这个修正意见也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我所有主要的修正意见均未被采纳，所以我不得不投票反对整个决议。

我认为加米涅夫同志修正案的不足之处在于，其中在某种程度上把农村分化说得似乎与工业无关；然而，农民的分化及其速度的

意义和社会比重取决于工业与整个农村相比的增长和速度。我要对加米涅夫同志的修正案重复一下我在委员会里说过的话：加米涅夫同志的修正案向索柯里尼科夫同志作了一定的让步，但李可夫同志的决议所作的让步要大得多。所以，既然我的修正案未被采纳，我就不得不在这两个文本之间作选择，那我就赞成加米涅夫同志的修正案，并保留我在这里所说的意见。

№02784

托洛茨基对李可夫关于苏联经济状况的 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

(不早于1926年4月)

一、工农业比例失调和经济政策的任务

新经济政策主要的同时也是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恢复农民对发展自己的经济的兴趣，从而保障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在与农业密切联系的情况下解决发展工业的任务。根据这一联系的市场形式，新经济政策包含了“学会做生意”和“他把每个闲置的戈比投入工业”的口号。同时党还提出了实施电气化的宏伟计划。

无产阶级与农民结合的问题确定了这一政策的基本经济内容。国家经济政策体系的任务是在生产力增长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成分取得对资本主义成分越来越多的优势的条件下保障工农业之间的动态平衡。十分明显，在两种主要情况下可能出现对这种平衡的破坏：如果国家利用国库政策、预算政策、工商业政策及其他政策从整个国民经济中抽出不成比例的大笔年积累以至一切资金，并转而投入工业，其结果是工业发展过于冒进，脱离了国民经济基础，首先是农业基础，并遇到有支付能力需求不足的问题；或者相反，如果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一切杠杆从国民经济资金及其年的增量中抽出不足的份额，其结果是工业品的供应落后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这两种情况下均可能出现对结合的破坏。工业过分加速自身发展，使农民负担过重，也在破坏农业。但是当工业不能适当地满足

实现收成的需要从而导致批零价格剪刀差时，农民承受的损失也不会小。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国家工业化方针这一基本指令。实施这个指令的途径、方法和速度不但对我们今后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前途，而且对苏联工人阶级政治统治的前途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目前我国经济状况的主要矛盾，同时也是城乡关系的主要矛盾就在于国有工业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业产品不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就制约了农产品中商品部分的销售及出口，这又极大地限制了进口，制约了工业的发展壮大，甚至可能使基本比例失调加剧。所有资料表明，我国的工业对1926年的丰收在商品后备方面未作任何准备，这可更加剧了目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丰收即潜在增长的农业商品余量可能不会成为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而相反，会成为破坏经济、激化城乡关系以及城市内部消费者与国家间关系的因素。实际上，在工业商品荒的情况下丰收可能意味着把更多的粮食用于酿酒和加剧城市的排队现象。在政治上这将意味着一场农民反对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也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工业的斗争。对这一危险估计不足，将产生严重的后果，这或者发生在最近的将来，或出现于各种经济因素的比例关系继续发展下去的情况之下，这种比例关系会保持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失调，或使对这种比例失调的克服过于缓慢。出路就在于，真正按照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为我国经济的工业化制订的方针来保障正确的经济政策的基本路线。

* * *

只有根据我国经济政策的基本战略方针才能正确地评价去年末今年初出现的所谓经济失误，其中包括迫使我们予以削减的进出口计划、工业发展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

近年来的经验证明，我国的工业计划总是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进程和需求，并且在市场的直接压力作用下中途改变，有时一个经济年度内就一改再改，而且几乎总是扩大计划。同时正像工业方面主要沿袭的新经济政策初期的口号——为了不脱离农民经济不要冒进——一样，事实上，工业一直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实际资金、需求和能力，这就导致了要经常破坏和改变工业计划。

党在评估我国工业计划的实施历程时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业计划的主要缺陷是对经济发展总的潜力估计不足，首先是对作为主导因素的国有工业的潜力估计不足。只要想一想，预计在1930年达到的那个水平，1925年已经在两个经济部门——交通和冶金工业——达到了这一点就足够了。工业问题上采取的小手小脚的方针是现今商品荒极其严重的最重要原因。

* * *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向党提出了坚定的工业化指令，同时指出了工业在每一种情况下不能也不应超越的界限。决议指出这些情况是：**市场的实际容量和国家的财政资金**。这两个因素，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财政资金在每一特定时刻都限制着工业的发展，但是两个因素显然不是不变的或不取决于我们政策的。十分明显，国家的财政资金受整个行政措施、国库措施、预算措施、生产措施和商业措施的制约，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借助这些措施对国民经济积累进行分配。国家尚未摆脱工业商品荒的局面无疑证明，国有工业与其他经济之间对国民经济资金和积累的分配不仅没有达到必要的平衡，而且在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在丰收的情况下，有更加远离必要平衡的危险。

如果去年下半年的工业计划和进口计划在当时与国家库存现金不符，那么有必要进行相应修改这一事实决不是降低整个工业发展

速度的理由，相反这个事实要求我们在经济政策方面采取措施，国家投入工业的资金因而应在全民资金中尤其是在全民资金年增量中占据比迄今为止更大的份额。换句话说，进出口计划和工业计划方面经常出现的失误，是长期以来影响工业和农业的对国有工业的潜力和任务采取紧缩方针造成的反应和偶发性结果。由于商品荒，尤其是零售价使农民们失去的钱（私人资本因此得利）比降低农业税得到的要多得多。

因而产生主要的经济困难的原因是：无论是对农业来说（农民的个人需求和生产需求），还是对工人阶级需求的增长来说，工业的容量都显得过小。消除这种不协调的状况不应通过限制农业的增长或遏制工人阶级需求的增长，而应通过使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消灭这种不协调来实现。

以上任务务必完成，因为在目前状况下，工业尚未完成所面临的其他重要任务，首先是为工业自身生产生产资料的任务、为国家的运输业和国防服务和发展的任务。

有鉴于此，全会责成政治局：

具体制订与农业发展前景密不可分的最近一个经济时期（5~8年）工业发展和新工业建设的远景规划。

在制订1926~1927年度一切规划和计划时，要制定一个能够保障在1926~1927年度在消除我国经济内部不协调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的指令。

为此远景规划应从大约5年内（或在另外一个期限内）基本消除比例失调这一工作设想出发，以便假定到1931年，在始终坚持降低物价政策的条件下能够确立工业品供求的相对平衡。当然我们并不奢望把这种规划订得尽善尽美、准确无误，但这种规划应是我国全部经济政策的重要指针。

* * *

基于上述形式和目标，1926～1927年度规划和计划应以如几点为出发点。

1. 向农村上层征收的农业税应是对国民经济积累正确再分配的重要杠杆之一；据此，农业税控制数字的提高必须考虑到从财政上保证工业的主导作用并符合农业的实际增长及其内部的分化。

2. 不允许提高零售价，相反，要大力争取降价；批发价方面要在不同的工业部门执行更灵活、更专门的政策，目的是使国家和合作社得到比迄今为止更多的一部分零售加价。

3. 1926～1927年度的预算应该这样制订：要把实际上作为工业自身通过预算再分配的资金以外的相当数量的资金都投入工业。工业的纯结余额无论如何也不应少于1.5亿～2亿，同时应集中全力增加纯结余额。

要记住，我们尚未走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所以应该通过大力压缩或至少是将来不再继续扩大各种非生产性开支来达到上述目的。

4. 必须根据已有的经验重新研究伏特加酒的问题，经验证明，国家出售伏特加酒在使农村资金注入重工业（这是我们的目的）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却占据了工人工资中很大的一块。

5. 从1926～1927年度起就应保障真正向新工业建设增加长期贷款的可能性。作为长期贷款基金的应有：

(1) 不少于25%的折旧提成；

(2) 50%的准备金，并免除工业必须把这些资金投入国家债券的义务。

(3) 10%的纯利润；

(4) 出售所谓呆滞资产所得收入的 50%。

6. 应建立折旧提成制度，以使工业有可能在已有的水平上自动地保持自身的生产能力，而其余的补充资金都应用于工业今后的发展。

7. 1926~1927 年度进出口计划的制订应保证扩大工业的生产能力及其相当规模的技术改造，包括新工厂的建设。

8. 整个经济政策的制订应保证今后（1926~1927 年度）有可能实现不少于 10 亿卢布的工业基本建设规划，而 1925~1926 年度为 8.2 亿卢布（即增加不少于 20%）。

9. 为增加保证工业流通不断发展的中央工业准备金，应增加工业银行的资金。

10. 现在要对即将收获的庄稼制定并切实准备一套销售措施——首先，要紧急增加进口原料（棉花、丝绸、橡胶、皮革和金属）以增加可在秋天向农民供应的商品后备，其次，准备进行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商品干预，这种干预是以适应我国内部商品流转并完全符合国有工业利益和潜力的国外贷款为基础的。

11. 保证国家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实施电气化计划。

二、速度问题

过去几年的经验无可辩驳地证明，剥夺非生产阶级（贵族、资产阶级及君主派和享有特权的官僚）、土地国有化、废除债务并把工业、运输业及整个信贷系统的收入集中在国家手中——这一切保证了我国经济内部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明确无疑的优势。

但正是把我国经济越来越纳入世界市场链条的这些巨大成就进而把我国今后的成就，首先是我国工业化的速度，置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监督之下。以为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下可以以随意的

速度走向社会主义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只有在我国工业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产品数量、成本、质量方面的距离明显缩小而不是扩大的条件下，才能保证我们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在这种条件下，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武装力量才会得到能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技术基础。

三、工业的主导作用与农业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国有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主导作用。党的任务就是充分认识这一指示并根据这一指示作出相应的切实可行的结论。在国有工业落后、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条件下发展农业会不可避免地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国有工业的主导作用就在于，国有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是农业的普遍提高及改革其技术和社会形式的主要因素。纺织工业的发展是产棉区发展的强有力杠杆和种棉业逐步实现工业化及公有化的前提条件。制糖业对甜菜种植业、制呢工业对于养羊业、麻织业对于种麻业、罐头工业对于蔬菜种植业、养猪业和渔业，最后，全部工业对于提供原料和为工业职工提供食品的整个农业来说都具有这样的意义。

另一方面，既然农业在简陋陈旧的生产技术基础上已接近战前水平，那么只有逐步对农业实行工业化，即大力发展农机制造业、电气化、人造肥料等等才能使农业真正得到进一步发展。国家帮助农民经济最有效的形式就是在优惠贷款的条件下大量销售国有工业生产的必要的农具，这又要求紧密结合主要农业区特点的农机制造业蓬勃发展。

四、计划原则及其新的任务和方法

计划原则的意义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失败和失误中都能体现出来。把某些失误当作反对计划原则的理由，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集中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提供了及时发现并设法纠正这些失误的可能，而这种体制如果不把经济管理的基本要素（如国家行政管理要素、市场要素）有计划地结合起来则是不可思议的。

我国经济的增长不仅要求全面加强计划原则，而且还在这方面提出了全新的任务。迄今为止，计划工作主要是要尝试对一年内基本经济要素的变化情况进行预测并灵活地将其结合起来，也就是以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所阐明的那些职能为限。在所谓恢复时期（工业在过去遗留下来的技术基础上发展的时期），这样对目前业务任务灵活地制定计划也许已足够了。但现在随着恢复时期的结束，更新和扩大工业及运输业的固定资本的必要性，除了老任务还向党和国家提出了计划领导方面的新任务。如果说以前拥有相当数量闲置设备的工业能够根据市场的要求在短期内大大超出计划的预测来发展生产的话，那么最近几年工业在这方面的能力将取决于工业每年可能生产出那些基本建设费用。国家应最严格最周密地规划这些基本建设费用的使用数量和方向。建设新工厂、建造发电站、铁路，改良广大区域的土壤，在适当的期限内培训各类必需的技术熟练的劳动力，把这些新的建设项目与现有经济以及工业计划和全部经济计划结合起来——所有这些事情不可能在一个经济年度内做完。需要对需几年完成、其经济后果会在以后若干年内反映出来的大型设施和大工程进行规划。对年度计划应作为五年远景计划的一个确定部分来加以研究。一方面，年度计划的相应部分应完成五年计划规定的那些任务；另一方面，五年计划应根据例行业务计

划对该计划提出的变化每年进行修订。

显然，这种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属性本身制定的超前计划不可能制定得能彻底预见到5~10年内各个经济因素的发展变化。其实问题就在于提出目标性任务并在计划阶段和实施过程中创造性地加以协调。只有认识现代工业所蕴藏的巨大潜力及其改革力量、克服经济问题上存在的舍本求末习气和尾巴主义、真正掌握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对国家工业化所作的基本指示，才能正确对待这类问题。

* * *

为了简化程序并使最高计划机关，首先是国家计划委员会，集中注意一些大的计划问题，目前编制和通过计划的程序应作根本改变。为此要：

1. 正确发展经济建设的主要因素，主要是新建项目中的主要因素并使之与工农国家的任务和不断增长的潜力完全协调一致，应该成为我国最高计划机关计划工作的中心。

2. 最高计划机关必须避免对下级机关所作的技术核算进行斤斤计较的核查，以便集中精力处理那些最高档次的问题，让下级机关对它们的工作承担更多的责任。

3. 应大大减少在经营计划方面制订详细计划的现象，要把这项工作及其责任集中于业务机关，最高机关只负责对计划之间及计划与整个国有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之间进行协调。

只有彻底简化编制和通过计划的程序才能使制订的计划质量更高，及时被通过和被批准，真正地使计划领导机关集中精力于进行大规模经济设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工作上。

五、工 资

经济上的困难使得我们目前不能采取大幅度提高工资的方针。党在承认工资尚未达到应有水平的同时应在工资方面提出下列任务：

- (1) 近期不得降低实际工资；
- (2) 为今后提高工资创造物质前提，即
 - (1.1) 充分扩大 1926—1927 年度工业规模，使货币工资有相应的商品保障（工业品，可满足工人收支计划 40% 的需求）。
 - (2.2) 坚决地有步骤地对工业进行技术改造，这就足以保障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地有计划地得到提高。

附录：关于后备问题

（不是对决议的修改意见，而是为决议提供的材料）

（1926 年 4 月 12 日）

后备问题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提得更具体。从后备动用的角度可以确定下列后备范畴：

1. 广义上的**保险后备**，其必要性是由我国整个农业生产经济的重大意义及农业生产对自然现象的依赖性所决定的。这首先是：

- (1) **粮食后备**，因为我国的出口主要取决于农业经济中的不稳定产品，
- (2) **外汇后备**保证我们有得到世界产品的权利。

2. 我国经济中的**生产后备**，用于某个生产部门有必要迅速扩大而在一个年度的生产范围内又无法筹措为此所需的后备时。其中包括原料后备、设备后备等等。

3. **机动后备**，这已非后备的本义，只是我们的计划要留有余

地，可以在出现我们制订计划时未能考虑到的一些情况时，在计划中增添不同的内容。因此，机动后备的问题就是我们计划硬性执行的程度问题。

此外必须指出一种错误的后备种类，即用于国内的所谓货币后备。如果这一问题不属于积累纸币的储量这一狭隘的技术方面，那么货币后备其实就意味着货币流通领域实行如下政策：我们在一定的时期内提高我国卢布的购买力和汇率，以便在另一个时期通过比较宽松的货币流通政策再把购买力和汇率降至原来的水平。如果我们坚持（这是毫无疑问的）保留硬通货的观点，那么通过提高然后降低我国外汇汇率作为后备是不能允许的。硬通货体制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执行这样的货币政策：任何时候都不能降低汇率。这就是说，我们这方面不可能有任何后备。

* * *

。从这一经济情势出发来具体谈谈。

1. 粮食后备的积累在相当程度上是补充上一歉收年度所消耗的后备，这种积累是在农民经济的内部完成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是粮价高的原因。但这是把这些后备集中到国家手中的障碍。在我国粮食出口没有利润的情况下（只有东南部地区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价格保持一致）为国家后备积累而进行的粮食收购工作就更加抬高了价格，打击了我国的出口，即我国的外汇后备。这项任务只能对明年提出，而且只应在收成令人满意的情况下才能提出。

2. 尽管从我国外汇基金枯竭的观点来说需要积累外汇后备，但这也不可能是我们今年所要提出的任务。只有在加强我国出口的条件下，我们也许有可能部分地实现这个任务。

3. 我国经济的生产性后备。在我国国内商品荒的条件下，在

我们用于发展工业的后备薄弱的情况下，无论是压缩生产以形成后备的方针，还是把额外增加支出用于获得额外后备的方针都是完全错误的。只有当市场上需求减少以及我们生产不是为消费而是为后备时才能提出这个问题。这里惟一的一个问题是众所周知（与设备更新有关）的生产过程合理化，生产不间断运行所必需的原料、燃料等等的相对数量会因此而减少，这样就会有原料、燃料的后备。

4. “机动后备”——根本不能说我们硬性执行计划的程度过大，这方面的压力大部分来自我们计划上的最低纲领主义，尤其是在工业方面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有害的倾向。

总而言之，后备问题与我国整个经济，尤其是经济各部门中的积累问题密切相关。只有在我国经济中的积累扩大的条件下扩大后备才有可能具体落实，而扩大积累又与提高生产技术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为形成这些后备创造前提条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这项任务推迟到无法确定的时间去完成。比如说，既然此时的农业经济相对亏损，那么后备的积累在近期内，尤其是在明年就是可能的。同时，这样的后备作为预防各种不测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略好的条件下积累必要数量的粮食后备和外汇后备将是明年的重要任务之一。

1926年4月12日

№02786

埃利钦的便条^①

(1926年4月)

应该把这段引文给列·达·〔托洛茨基〕看看。这段引文与对〔托洛茨基〕《论列宁》〔1924年版〕一书中谈红色恐怖那部分的批评有直接关系。也许列·达·会认为需要把这段话收入《1922年书信选》的新手稿之中。

B. 埃利钦

1926年4月

“马尔托夫妄谈什么我在为恐怖主义辩护。单是这一句话就说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离我们是多么远，而同第二国际是多么近。其实这里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气息，而是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来到了，人们却又向我们宣传资产阶级的旧观点。我没有替自己辩护，我只是说有一个由战争所造成的特别的党，即军官的党，这些军官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指挥作战，在这次战争中被提拔起来，他们懂得什么是实际的政治。”

弗·伊·列宁

《人民委员会的报告的总结
发言》^② (1919年12月6日)”

^① 托洛茨基在左上角写道：“谢尔穆克斯同志收”。

^② 《列宁全集》第37卷第398页。

№02788

托洛茨基：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 计划原则、工业化速度及无原则性

(1926年5月2日)

1. 从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积累规律的相互作用（斗争与合作）来分析我国的经济，原则上是卓有成效的，确切些说是惟一正确的。这种研究只能在封闭的苏维埃经济范围内开始。但是现在这种方法论观点变成“一国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完整的经济前景的危险在增长。可以料想同时也让人担忧的是，那些拥护这种哲学的人们迄今为止依靠的是被他们曲解的列宁的引文，现在却试图利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分析，把这一方法论观点变为对这一假独立自在过程的总结。必须坚决反对这种剽窃和篡改的行径。要把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相互作用置于世界经济的背景下。这样就会清楚，在新经济政策这一有限的范围内的价值规律要靠来自外部的在世界市场上得到不断加强的价值规律不断加大的压力来补充。

2. 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首先是工业化的速度问题因此具有决定性意义。对外贸易垄断是为社会主义积累服务的强大因素，但强大因素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因素。只有在苏联产品的价值逐年接近于世界市场产品价值的情况下，对外贸易垄断才能控制并调节来自外部的价值规律的压力。当然，计算苏联产品的价值时要注意到社会立法规定的附加费用。但在世界各种经济制度竞赛的范围内上述要求仍然有效：苏联工业的速度应能保证苏联产品以工农明显感觉到的速度逐渐接近世界市场的产品。

3.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市场的购买力和国家现有的财力是工业化的极限。这一极限不是惟一的，也不是主要的，而只是其他极限的市场货币的经验体现。这样来提出问题的话，我国工业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就表现为商品荒和批零价格的剪刀差。古谢夫等人为了回答这一看法提出了两个毫不相关，其实是互相对立、至少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反对意见：（1）那些主张工业不能落后、要保证其主导作用的人是超工业化主义者；（2）说那些根据市场来确定工业发展程度的人是害怕农民，并且忘记了生产资料的生产不能看市场行事。

4. 因此，那些现在〔回答〕有关更新固定资本问题的人会经验地碰到社会主义积累和计划原则问题，会以其新发现与工业化主义者抗衡，而工业化主义者会因此专门从超工业化主义者变为向农民市场投降的农业主义者。

5. 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积累方面的门外汉们在计划原则问题上仍然坚持旧的，实际上是市场的观点。近年来计划原则主要地（如果不是惟一地）是在本年度内在市场的基础上运用了各经济成分相互配合的方法。现在，由于有必要更新和扩大固定资本，复杂的建设性的计划任务就变得刻不容缓了。在这方面，对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提法也应得到其最明确的体现。与此同时所作的相应修改也就被否定了。

6. 苏联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作用的问题从各种观点来看都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前面阐述价值积累规律以及经济的速度时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对所谓的苏联经济独立性问题来说，对外贸易有着不小的意义。必须全面分析这个问题，并尽可能根据对我国进出口的基本要素的研究来进行。必须在这方面制定大约5年的前景规划。必须表明，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的的增长如何辩证地为工业的“独立性”作好准备。

7. 必须把农业和工业积累、私人和国家积累的分配与再分配问题同消除认为农村就是“殖民地”的神话联系起来。

8. 全会根本没有说明，经济与党的制度之间的联系。其实这种联系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代表大会和决议非常突出地提出了经济问题。但根本没有说明为什么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经济问题虽然被如此突出地提出来（各级地方党组织、各级苏维埃组织、工会组织向经营企业索要贡款，发表一些毫无意义的声明等等），却并未取得必要的成效。显然，国家，首先是党，如不积极参与并监督舆论就不会取得任何成就。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

选拔经济工作者也要出于实事求是的考虑。经济工作者应感觉到党和工人等舆论对自己的监督。

官僚制度的特点是，经济工作者只对机关、首先是对书记们负责。从正确选拔经济工作者和制定正确的经济制度的角度，首先是从最严格的节约角度来说，这种状况都是有害的。

列·托洛茨基

1926年5月2日

No0278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决议：关于国民党的协定，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办法和在国民党的工作问题^①

(1926年5月15日)

1. 各其他政党（共产党）应该下令让自己加入国民党的党员懂得，国民党的基础是三民主义，因此不得批评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创立者孙中山。

2. 其他政党应把其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主席。

3. 加入国民党的其他党派的党员可以成为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及其他高层组织的委员，但这样的委员数量不应超过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总数的1/3。

4. 来自其他党派的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5. 未经国民党的党务机关批准，国民党的所有党员均无权召集党的会议。

6. 未经上级批准所有国民党员均不得成立任何组织并开展活动。

7. 其他政党向其加入国民党的党员下达的一切通令应与联合委员会商定，如不能商定应提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批准（直译为“承认”）。

1926年5月15日

^① 看来本文献是从外文译成俄文的。

№10848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6年5月24日)

你好!

我于星期天傍晚到达这里。近两天天气不太好，北高加索一带的庄稼长势不错。我这里一切正常。

别连基讲了两件事：(1) 托洛茨基星期三早晨就到莫斯科了；(2)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到柏林去找过他（去会面？）^① 有意思。

祝一切顺利!

约·斯大林
星期一至索契

^① 1926年莫托洛茨基和妻子在柏林治病。

No02791

托洛茨基就民主等问题致政治局

(1926年6月6日)

请注意以下情况：

6月2日乌格拉诺夫同志在莫斯科河南岸区区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报告。根据《真理报》对这一报告报道，我必须谈谈乌格拉诺夫这位莫斯科组织的领导人是如何理解和定义党内民主的，对这一报告的其他方面我将不在此涉及。

什么是“民主”？

我逐字逐句引用与此有关的地方（《真理报》1926年6月4日第127号）：“党内民主的本质是什么？”乌格拉诺夫同志作了明确的回答：“在于及时正确地把党和国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交给党组织去完成，在于吸引广大党员群众参加讨论并解决这些问题，在于及时正确地向无产阶级解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根据工人阶级及其各支队伍的情绪来检验我们的政策正确与否并在此基础上对方针加以调整”。

被报道十分公正地说成是“明确的”这一定义显然具有彻底的纲领性质。实质上这是对作为一种体系的党的官僚主义的理论定义，党在这一体系内仅仅是机关手中的材料。实际上不难确认，在所有被乌格拉诺夫同志统统称作是党内民主的那些行为和关系中，只有党的机关在起积极的作用，这个机关要在每一个特定时刻作出

决定，应以怎样的形式和在怎样的范围内对全体党员群众“施加影响”。

我们来逐一分析如下。

(1) 民主就在于，“及时正确地向党提出任务”。报告人十分清楚并先已认定，机关，也只有机关才能向党提出任务，如果机关“及时并正确地”提出任务，而且是否是及时正确，要由机关本身来确定，那么这就是“党内民主”。

(2) 接下来说民主就在于，“吸引广大党员群众参加讨论并解决这些问题。”这里的“吸引”这个词本身就说明了整个思路。党员被说成是消极的群众，不推它就不动，不得不“吸引”它讨论那个党的机关向它提出的那些任务。而且如果这个机关正确及时地提出任务又正确及时地吸引它参加，那这就是“党内民主”。

(3) 接下来我们得知，民主在于“及时正确地向无产阶级解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也就是机关向党提出又吸引党参加讨论的这些问题。机关与党之间片面的官僚主义关系在这里已扩大到阶级。

(4) 民主在于“根据工人阶级及其各支队伍的情绪来检验我们的政策正确与否”。那个提出问题、吸引党员参加对问题的讨论、向无产阶级解释这些任务的机关，也正是由它来根据工人阶级的“情绪”检验自己的政策，以便“在此基础上对方针加以调整”。因此，调整方针的也正是那个制定方针的机关。是这个机关“正确及时地”提出任务，就是说，需要提出什么样任务的时候就提出什么样的来。是这个机关在它认为正确及时的范围内吸引党员群众参加讨论问题。是这个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就通过党向工人阶级解释。是这个机关根据工人阶级的“情绪”来检验这项工作的成果，还是它，这个机关，根据这种检验和对情绪的考虑“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方针。

乌格拉诺夫同志没有指出党内民主的其他任何特点。我们知道，报道把他对民主的定义说成是“明确的”。我再重复一遍，这一定义具有彻底的纲领性质。这一定义是党的制度及党的意识形态发展中的新成就。1926年6月2日以前党不止一次地对被叫做党内民主的这一制度下过定义。党内思想在这一问题上发展的最明确的几个关键是：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1921年）和1923年12月5日经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后来又为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批准的决议。党的最近一次即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只谈了必须“走上彻底的党内民主的道路”。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之所以没有解释党内民主的概念，是因为以前几次党的代表大会对此已做得很充分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如何对党内民主下一个新的纲领性定义，而在于真正实现党内民主。而莫斯科组织的领导人乌格拉诺夫同志则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他提出：“党内民主的实质何在？”乌格拉诺夫同志向自己提出这个纲领性问题时并未去看党以前所下的民主的定义。他自己又下了一个新定义，这我们刚刚已介绍过了。

乌格拉诺夫同志在确定民主的“实质”时实际上把他的纲领性定义与迄今为止党提出的并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定义对立起来了。例如，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认为民主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1923年12月5日一致通过的决议指出：“工人民主制就是全体党员有公开讨论党内生活中最重要问题的自由，有对这些问题展开争论的自由，同时，自下而上的各级领导人员和领导机构都应由选举产生”。其三个特点是：（1）全体党员自由讨论一切最重要的问题，（2）党对其领导机关进行经常的监督和（3）自下而上地选举公职人员和领导机关——所有这三个特点在乌格拉诺夫对党内民主的“实质”所下的定义中都没有谈到。他说的是由机关检验党，但只字未提党对机关的监督。

他说的是由机关及时提出问题并“吸引”党员讨论他们认为是提得及时的问题。他根本没提及党要对所有问题进行自由讨论。最后选举领导人的问题则完全被他从党内民主的实质中一笔勾销。

1923年12月5日的决议指出：“不论在党顺利地克服新经济政策的影响方面，或是在提高一切工作部门中党的战斗力方面，党的利益都要求认真改变党的方针以便切实地有步骤地贯彻工人民主制原则”。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对这种提法表示赞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重申贯彻1923年12月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改变党的方针的必要性。各级领导同志多次承认，在有关党内民主的决议和具体实践之间存在差别，有些人认为这个差别是骇人听闻的矛盾，而有些人则认为是暂时的不协调。然而大家至少是在原则上或是在口头上和形式上认为，实践应逐渐与作为党的制度的民主制的原则性定义靠拢，党的制度的实质首先是讨论一切问题的自由，党内舆论对各机关的经常性监督和所有公职人员及机构的选举制。

乌格拉诺夫同志第一次公然试图通过把纲领大大降低到实践的水平来克服民主制的纲领性定义与实际制度之间的矛盾。他宣称党的机关拥有无限的统治权是民主的实质，它提出吸引、检验和纠正。1926年6月2日党有了一个基于机关拥有无限权力的最完备的关于制度的定义。乌格拉诺夫同志在试图给民主制的实质下定义的同时，也给官僚制的实质下了定义。诚然，在乌格拉诺夫同志的定义里此官僚制不单是发号施令，而且还向群众提出问题，吸引群众纠正路线。但这只意味着，乌格拉诺夫同志提供了一个关于“开明的”官僚制的定义。而这里却压根儿没提民主。不言而喻，党首先是一个行动的组织。全部制度应保证党作为一个整体有可能及时地统一行动。由此得出结论：既要有真正的党内民主，又要在每个特定阶段历史情势的具体条件下对党内民主加以切实的限制。这一切我们都清楚。党不可能变成一个争论俱乐部。党在第十次代表大

会上以及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都没有忘记这一点。但是党为了保证在新的更复杂的条件下能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1921年起就坚持不懈地提出并重申这一思想，即随着党内无产阶级成分的加强，随着全党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党的制度应通过自由讨论、集体决定、对机关的监督及自下而上的选举制的办法来不断克服官僚主义和机关作风。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从国内战争向经济和文化建设过渡到现在已过去5年多了。党内民主的方针自然是根据从国内战争向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过渡这个条件宣布的。从1923年末中央自己宣布有必要“认真改变党的方针”时起已经过去两年半的时间了。在这5年期间，尤其是后两年半我们没有打仗。我们的经济增长了。无产阶级恢复了元气。党的构成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党的水平和经验都提高了。所有这些条件看来都大大加强了向民主方向“认真改变党的方针”的必要性。但这种改变并未出现。相反地，党的制度从未像现在这样染上了十分严重的任命制、发号施令、乱怀疑、压制一切的作风，也就是无所不在的机关作风。在党内民主的纲领性定义之间，在已经宣布并一再重申的实行党内民主的方针与党的实际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是触目惊心的矛盾。党意识到这个矛盾已日益尖锐，令人痛心且无法容忍。对于革命政党来说，没有什么比表里不一和言行不一更痛苦的事情了。这种表里不一超过一定程度就变成了明显的弄虚作假。于是乌格拉诺夫同志就主动修改了党在党的制度及工人民主制上的原则方针。乌格拉诺夫同志大胆地提出了民主的“实质”问题，并揭示了此实质就体现在及时而正确地工作的开明官僚制度上。假如没有任何其他现象，那么单凭这一个特征就可以说：我们党正处于发展的转折时期。目前这种表里不一不可能持久。要么是完全按照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党的制度开始作认真改变，要么是党应该改变自己的方针，即从列宁的立场转向乌格拉诺夫的立场。

官僚主义产生的阶级关系上的原因

党的制度具有独立自在的性质。它一方面取决于整个形势，另一方面，政策的总方向要通过制度来体现。尽管经济形势有所好转，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党的制度在最近一段时期却不断向官僚化方面转变，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仅仅用国家文化程度低，我们党是执政党这些原因来解释这件事无论如何是解释不了的，这首先是因为国家文化程度在提高，而党的官僚主义却增多了，其次，如果党的执政作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党越来越官僚化，那么就有亡党的危险。但现在还谈不上这种前景。文化程度低即不识字和缺乏必要的最简单的技能，更多地会导致国家机关产生官僚主义。但党是由劳动者，主要是无产阶级中最有文化和最有首创精神的先锋队组成的。这支先锋队数量上在壮大，质量上在提高。所以，既然谈到党内的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就必然要民主化。事实上这个制度却官僚化了。很清楚，一味提及文化程度低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首先不能说明发展的趋势及其进程。而官僚化达到其极限时也要为自己寻求理论上的光环。这就是乌格拉诺夫同志尝试的根本意义所在。

要在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上寻找官僚化的基本原因。在农村中苏维埃民主有了一定发展的同时，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却发生极端压制的现象，对此不能视而不见。民主不是独立自在的因素。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文化等领域中要实行这样的政策，使这一政策的体现者——无产阶级先锋队能够通过自由讨论、对机关的监督及机关的选举制来不断地加以实现。显而易见，如果工业即社会主义专政的基础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如果对国民经济积累的分配不是建立在保证社会主义趋势超过资本主义趋势而进一步增长的

基础上；如果由此产生的困难首先要由工人阶级来承担；如果在国家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工人工资的增长滞后；如果像伏特加酒这样特殊国库手段的重担也越来越要由工人承担——那么党的机关就越来越不会以党内民主的方法来执行这个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官僚化体现了有损于无产阶级的、已遭到破坏和正遭到破坏的社会平衡。这一平衡的破坏通过党压制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最强大的无产阶级中心，在党的主要基地出现了日益加剧的压制行为。乌格拉诺夫同志抛弃了自由讨论、集体制订任务、对机关进行监督及机关选举制，把任务归结为根据无产阶级的“情绪”来检验党的政策，也就是用机关的经验方法来探索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准备承受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承受来自党领导的一切经济方针和社会方针的压力。因此才要用开明官僚制的方法来代替民主制的方法。

思想中心的削弱是造成党内压制的又一原因

任何一种制度都在发挥其内在逻辑，而官僚制度对内在逻辑的发挥则比其他任何制度都要快。国家最大的工业中心和文化中心是抵制经济政策及补充经济政策的党的制度中出现的错误的源泉，这是完全自然的。这一抵制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有所体现也是自然的。任何分歧在机关体制统治的条件下都有演变成封闭的派别集团斗争的趋势，这也完全是必然的。而执政党在革命专政的条件下不能与存在对立派别的制度妥协则完全是无可争议的。只需补充一点，机关体制必然会从自身产生派别。不仅如此，在这种只发号施令而不接受监督的封闭的机关体制内，出现集团一般说来是纠正机关政策的惟一可能性。1923年12月5日的决议也非常明确地阐明了这一点，它谴责了官僚制度，因为这一制度“把任何批评都视为

派别活动的表现”并因此“把忠诚的守纪律的党员推上搞小圈子和派别活动的道路”。从这个决议得到一致通过之时起已过去两年半的时间，机关制度扎得更深，表现更突出，因而由机关制度产生的派别集团倾向也更加加强了。其后果是党的干部四分五裂，拥有相当丰富经验的可贵的党员被有步骤地挤出党的领导部门，领导核心逐步缩小，思想日渐贫乏。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都深信不疑这个过程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其破坏活动还远未结束。由于拥有无限权力的党的机关集中在人数越来越少的领导核心手中，才产生新的极其尖锐的矛盾：机关势力不断增强，领导核心的思想力量日趋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对各种倾向的恐惧感也会不断加强，由此出现的后果是作出所谓经组织结论，这又使能担任领导工作的人更少，更使他们走上使党的制度官僚化的道路。

在分裂领导干部的每一阶段，机关的领导人都抱着种种幻想：只要扫除新的障碍，然后就可以顺利地“提出问题”、“吸引群众”、“检验”并且“指引方向”。但事实上，在党的领导人官僚化的情势下，机关每次粉碎反对派都必然会引起新的分裂和产生新的危险。列宁格勒集团的这一过程尚未结束，这是显而易见的。领导核心内部的分裂也并不是公开出现的，因为机关要继续与老的反对派（1923年）和新的反对派（1925年）进行斗争。在某一并不遥远的阶段，机关的某一部分人又会不可避免地随事态的发展变成反对派，并带来相应的后果。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一点。

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

上一次全会上又挑起了（诚然，只是顺便地）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党专政的争论。如果只是抽象地提出问题，那么这场争论就可能轻而易举地变为经院哲学。当然，我国制度的基础是阶级专政。但

因此就要求，这个阶级不但是“自在的”阶级，而且是“自为的”阶级，也就是说，这个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即通过党达到了自觉。没有这一点也就不可能有专政。如果把事情说成是，党只是教师，专政由阶级进行，那就是粉饰现有的一切。专政是阶级最集中的职能，所以党是主要的专政工具。从本质上说，阶级是通过党来实现专政的。这就是列宁不但谈阶级专政，而且谈党的专政并在一定意义上把两者等同起来的原因。

把两者等同起来的这种做法对不对？这取决于过程本身的实际发展。如果专政的发展使党内以至一切工人组织内的民主方法得到发展，在工人民主和农民民主之间保持必要的“比例”，那么把阶级专政与党的专政在政治上和历史上等同起来这一点就会完全被证明是对的。如果在农民以至私人经济和工业之间比例失调；如果比例失调加大，如果比例失调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即农民民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工人民主，那么专政就必然具有机关官僚的倾向。在这种条件下，机关就会控制党并企图通过党控制阶级。前面引用的乌格拉诺夫同志的提法就是这种制度最充分的体现。谁若说阶级专政不是党的专政，那么看来他就要先搞清楚，阶级专政不是党的机关的专政。如果工人民主制度得到越来越大的发展，那么党的专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但与阶级专政相矛盾，反而是阶级专政的体现。相反，机关越来越严重的恶劣影响（这也是对立的阶级倾向的压力所造成的后果）就会不可避免地使党面临越来越偏离阶级路线的危险。可机关体制却掩盖了这一危险，因为它企图使自己等同于阶级专政。党对机关来说只是用来探索工人阶级“情绪”，以便“在此检验基础上”“纠正路线”。因此，乌格拉诺夫对党内民主实质所下的定义与对党的专政的否定这两者之间就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官僚制度竭力要在理论上固定下来。官僚主义理论一贯非常贫乏。官僚主义一贯倾向于：“国家就是我”，党就是我这样的提

法。乌格拉诺夫的这种提法实质上就是取消党，使党消失在工人阶级的“情绪”中并被集中化的独立自主的党的机关所取代。斯大林提出所谓与党的专政对立的阶级专政，必然导致机关专政，因为先锋队涣散的阶级（不进行自由讨论、不对机关进行监督、没有选举制就意味着先锋队涣散）充其量不过是集中化机关领导的对象，而这个机关也与党疏远，越来越受到敌对阶级力量的压力。

结 论

我们描绘这种倾向时当然根本不认为，它会变为现实。工人阶级内部、党内及党的机关内部存在抵制官僚主义必然产生的这种历史倾向的强大力量。党对这一危险倾向认识得越早越充分；党的机关中心优秀分子越勇敢越公开地帮助党认识这一危险并拨正航向，那么产生的震荡就越小，党的制度的改变就会越平稳、越少痛苦。综上所述，十分清楚，制度向工人民主方向的改变与经济方针向真正工业化方向的改变以及党的领导路线向真正国际化方向调整是密不可分的。

官僚制继续发展必然导致独裁，也必然削弱思想领导。党的制度的民主化不但容许、而且要求在更高的政治文化层次上恢复集体领导。因此，工业化方针，保证无产阶级在国家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拥有应有地位的方针，工人民主首先是党内民主的方针以及党的集体领导的方针就会成为统一的任务。

列·托洛茨基

1926年6月6日

No02792

托洛茨基就速记记录发表的声明

(1926年6月9日)

机关散布的谣言已在我们党内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有步骤地散布的说我“害怕”丰收的无稽之谈就是此类谣言之一。处于同样思想政治水平的是机关散布的新的谣言，说我认为英国共产党有点像反动组织和工人阶级道路上的绊脚石，云云。如果有谁哪怕看过一次我的《英国向何处去》这本书，就不难理解，这种说法是多么荒诞无稽，其目的不是澄清问题的实质，而是不惜任何代价把我同英国共产党对立起来。英国爆发重大事件的前夕我曾致信政治局表示忧虑，我担心英国共产党会像保加利亚共产党那样在群众性行动的关键时刻采取过于消极的立场或观望的立场，那样，它就会遭到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舆论和工人阶级一切旧机关的强烈反对。我由此得出了什么结论呢？我的结论是：“帮助英国共产党领会并思考这一前景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之一”。我说，要帮助英国共产党选拔那些“能够理解进行阶级大搏斗的必要性，不怕斗争，敢于斗争”的分子，并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这就是我从自己的担忧和警告中得出的结论。这难道是反对英国共产党吗？从何时起在爆发大搏斗前警告要反对消极情绪这一危险、建议选拔更积极的党员竟成了反对共产党了？这样提出问题不是太荒唐了吗？这可是在列宁的党内啊！

有些英国同志在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曾警告不要对英国资

本主义的危机性质估计过高。这样做暴露了他们对危机的深刻性及迫在眉睫的社会动荡估计不足。我认为，就连出版我那本由布雷斯福德作序的书这一微不足道的事实也表明一部分英国共产党员的思想不够坚定。他们还没有领导群众性行动的经验。所有这一切理当使人产生这样的担忧：工人阶级一切旧的领导组织由于机关的强大阻力会变得谨小慎微、彷徨犹豫甚至产生消极情绪。然而不是由于英国社会生活中可怕的保守主义作祟，年轻的英国共产党才需要以十倍的坚定性、十倍的批判、十倍的力量来抵制来自英国舆论及其“工人”机关的压力。旧的上层组织会抵制、阻止并暗中破坏将要举行的罢工，而共产党却对此彷徨犹豫，难道起码的革命理智还没有提醒我们在这种条件下要强调、重申和故意突出这一危险吗？我认为，我们党在共产国际中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行动前提出警告，而不是事后大发议论，采取官僚主义的办法事后谴责。

英国共产党在报告信中说：

“遗憾的是，在我们某些区级组织中可以发现，党内还存在宗派主义的残余，这些组织尚未深深扎根于工会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造成这些组织在罢工期间落后于群众的原因”。（1926年5月21日斯图亚特同志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信）。

可以根据英国共产党员的这些话得出结论：缺点恰恰在可以担心而且应该担心的那方面暴露出来。因此说我认为英国共产党是运动的绊脚石，这种说法如果不是为了毒化党内气氛，也是荒唐、无知和愚蠢的。值得庆幸的是，党的革命积极性总体说来是相当高的。这是我们共同的成果，然而这根本不是说不需要提出警告。如果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不回击这些英国同志、如果不给予友好的、但坚决果断的警告，那么消极分子和动摇分子会比实际上的（万幸不是这样）还要多。但现在认为英国共产党能胜任所有任务

也是错误的。英国共产党的力量、措施和手段与要完成的那些越来越临近的客观任务不相称，事关重大，要公开说明这一点，而不要用机关的种种谣言和诡计来取代革命教育。

列·托洛茨基

1926年6月9日

№10849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

(1926年6月15日)

莫洛托夫：你好！

布哈林：你好！

我于今日（6月15日）回到索契。在梯弗利斯闹上了胃病（吃鱼中毒），现在勉强在康复。今天读了你的来信（无日期）和布哈林的来信（也无日期），我的意见如下：

（1）你们的提纲很好。还应当抓住波兰问题揭露格里沙，是他自己把瓦爾斯基拉进来的，可现在又企图把他推给你们。格里沙真是无耻到极点了。

（2）不要说提纲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获得一致通过。一致只是形式上的，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一致。现在掩盖同格里沙的分歧就是给他的反党活动帮忙而使自己陷入愚蠢的境地。

（3）如果拉舍维奇在召集秘密会议，格里沙·季诺维也夫在安排路·费舍往德国跑^①，派索柯里尼柯夫去法国参加代表大会，^②那就是说，他们和托洛茨基都想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来破坏党。我不大相信党会被破坏掉，但是发生大的动荡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如果我们想防止党发生不测，那就必须而且应该努力使反对派的人重新组合。你们对付拉舍维奇的办法是对的。要是能想办法对季诺维也夫也提出问题就好了。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由政治局就特

① 指路特·费舍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许可的情况下赴德国治病。

② 指1926年6月召开的法国共产党第5次代表大会。

别案卷问题向全会作报告，在全会讨论过程中回顾一下政治局内部争吵的整个情况，让全会来表态。

(4) 如果托洛茨基对布哈林说，他指望很快在党内赢得多数，那就意味着他想吓唬和讹诈布哈林！他对布哈林的了解是多么肤浅，对布哈林的评价是何等之低啊！我想，不久党就会揭露托洛茨基、格里沙和加米涅夫的丑恶嘴脸，使他们成为像施略普尼柯夫^①一样的背弃党的人。

(5) 应当马上把索柯里尼柯夫从法国召回，并通知法国中央委员会：无论是联共中央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都没有委派索柯里柯夫去处理法国事务。

(6) 经济工作吓不住我。李可夫能胜任这项工作。反对派在经济问题上一点儿也占不了上风。

(7) 布哈林决定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作报告，^② 这非常好。再见！

握你们的手！

约·斯大林

1926年6月15日

附言：鲁祖塔克和米高扬建议全会延期到7月20日召开。我不反对。^③

约·斯大林

① 施略普尼柯夫，亚·加·（1885～1937）——十月革命后任劳动人民委员、全俄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党中央委员等职。1933年被开除出党。

② 1926年6月8日和6月11日布哈林先后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和列宁格勒积极分子会议上作报告。

③ 联席全会于1926年7月14日召开。

№ 10850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李可夫和布哈林等

(1926年6月25日)

1926年6月25日于索契

莫洛托夫、李可夫、布哈林及其他各位朋友：

关于“拉舍维奇^①事件”的问题我考虑了好久，一直犹豫不决，我把这个问题同整个反对派集团的问题联系起来，几次得出的意见都不相同，今天总算形成了如下几点意见：

1. 在季诺维也夫集团出现之前，反对派（托洛茨基，工人反对派等）还算是比较规矩，比较克制；

2. 随着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出现，反对派变得猖狂起来，不再守规矩了；

3. 季诺维也夫集团成了反对派一切分裂活动的鼓动者和党内分裂派的实际首领；

4. 季诺维也夫集团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是因为：（1）它比其他任何集团都更熟悉我们的方式方法，（2）它总的说来比其他集团都强大，因为代表着强大力量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掌握在它手里，（3）因此，它表现得比其他任何集团都更加猖狂，为其他派别树立了“勇敢”、“坚定”的榜样；

^① 拉舍维奇，米·米·（1884～1928）——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员、副陆海军人民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党中央委员等职。在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积极分子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

5. 因此，季诺维也夫集团是目前危害最大的集团，在全会上应当打击的也正是这个集团；

6. 不仅要把拉舍维奇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而且要把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同时还要警告他，如果他继续进行分裂活动，就要把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①

7. 要么是现在就进行这种打击，以期托洛茨基等人重新变得规矩起来；要么冒把中央委员会及其机关变成丧失工作能力的机构的风险，不久的将来在党内就会闹出危害事业和统一的大乱子；

8. 季诺维也夫在此后可能会呈请辞去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担任的职务。我们应当接受他的辞呈。把季诺维也夫从政治局除名后，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担任主席职务了，关于这一点，各个支部都会明白，而且他们自己也会作出必要的结论。那时我们就可以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制改为书记处制。^② 这样就可以解除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武装，并肃清猖狂制造分裂的季诺维也夫路线（请想想代表大会上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言论吧！）^③

9. 请你们相信，我们这样做，在党内和国内都不会遇到任何麻烦，因为人们深知季诺维也夫其人，不会为他惋惜；

10. 我原来曾想在全会上搞一个广泛的关于统一的决议。现在我觉得还是把这样的决议留到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上去搞更好一些（作一些原则性论证等等）。在全会上可以而且应当只搞一个简短的决议，引证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统一的决议，结合拉舍维奇事件从狭义上论述一下统一问题。这个决议要指出，季诺

① 1926年7月联席全会决定把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解除拉舍维奇中央候补委员职务。

② 1926年11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决定解除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职务，并撤销主席建制，成立新的领导机构——政治书记处。

③ 指1925年12月20日克鲁普斯卡娅在联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维也夫被开除出政治局，不是由于他同中央委员会有分歧（托洛茨基同中央委员会有着同样深刻的分歧，但并不存在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的问题），而是由于他（季诺维也夫）执行分裂政策。我想，这样做可能好一些，这样会得到工人的理解，因为他们珍惜党的统一；而对其他反对派来说这将是一个严重警告。可以让捷尔任斯基进政治局取代季诺维也夫。这个方案在党内也好接受。或者是把政治局委员人数扩大到10个人，让捷尔任斯基和鲁祖塔克都进政治局。且不说如果在全会上搞一个广泛的决议（这是过去的方案），就会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正式合为一个阵营；这种做法目前可能为时过早，从战略上看也不合适。最好是把他们各个击破。让托洛茨基和皮达可夫去为季诺维也夫辩护好了，我们洗耳恭听。在现阶段这样做总归好一些。日后会见分晓的。

等我回莫斯科后再与你们详谈。

我打算在全会召开前大约3~4天回到莫斯科。你们意下如何？

附言：不知你们是怎么想的，我却认为，季诺维也夫分子被拉舍维奇事件搞得处境艰难，如果把把这个事件与古拉利斯基^①事件联系起来，他们的处境会更难。应当联系起来。

握手！

约·斯大林

^① 古拉利斯基，A.（1890—1960）——1918年入党。1926年为共产国际机关工作人员。1927年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院研究人员。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分子被开除出党。

No 02793

共产国际的几个问题

——托洛茨基致联共（布）代表团

（1926年6月28日）

绝密

官僚主义是产生机会主义的根源

1. 机会主义，尤其是其变种玩弄外交手腕的中派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随时都准备通过针对其他国家的激进的决议。机会主义以此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自己却不承担任何义务。这种两面派的表现充斥于工人运动尤其是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中。工联主义者在马克思时代就提出了有关爱尔兰和印度的问题。如今独立工党拒绝与英国共产党合作，提出了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合并的问题。英国工联总理事会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结成联盟旨在使全世界的工会运动统一起来，而在罢工的关头英国却拒绝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提供的资助。这类事例，大大小小，不胜枚举。

2. 由于机会主义倾向出现在共产国际内部，其表现特征是：随时准备通过针对别人的决议，无情地声讨各国的“右倾”，尽管始终（尤其是紧急关头）打算屈服于本国的资产阶级舆论。不用说，布尔什维主义是这种“激进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共产国际的任务是通过与形形色色的假激进主义、政治上的两面派行为等进行不懈的斗争来培养真正革命的政党。问题就在于共产国际的制度

在多大程度上促进这场斗争。

3.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共产国际内存在潜在的、经过伪装的真正机会主义的十分重要根源之一，就是共产国际本身及其领导党内存在的机关官僚制度。在苏联，官僚主义是非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压力的表现和工具，在有了1923~1926年的经验后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由于欧洲的共产党，主要是其领导机关在组织上向联共机关变动和改组上看齐，因此外国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首先是联共内官僚主义的反映和补充。这就是产生前面提及的令人深恶痛绝的两面派行为的根子。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共产党选拔干部的标准主要是看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认可联共这一届的机关配置。外国党中比较独立比较负责的领导干部如不赞同以单纯的行政手段进行调整，就或是被驱逐出党，或是被赶到右翼（往往是假右翼），或者最终陷入“左”倾反对派的立场。因此，基于共产国际领导的无产阶级斗争的选拔和团结革命干部的有机过程就停滞不前、发生变化甚至扭曲变形了，在某种程度上简直被来自上面即来自莫斯科的官僚主义行政压力所取代。自然，那些比较愿意通过现成的决定、签署任何决议的共产党领导人往往胜过那些革命责任感强、更革命的人。本应选拔坚定的百折不挠的革命者，却常常选出趋炎附势的官僚。

4. 我们看到，共产主义的（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波兰等国的）官僚化分子正以在共产国际的一般问题，首先是在联共内部问题上的保护色作掩护，不受惩治地采取十足机会主义的步骤。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而且是越来越多地发现，共产国际的政治活动家们公开正式地持一种立场，而背地里（却是真正地）偷偷持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立场。这一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

全会就坚决谴责了马斯洛夫一路特·费舍^①集团所谓的“两面派”伎俩。但显然，无论形式上的谴责有多么公正，却不仅不解决问题，甚至没有提出根本性问题：为什么最负责的共产党人，各大党的领导人，耍两面派手法呢？答案只能是：假使任何一位外国领导人与联共中央发生分歧，哪怕是暂时的分歧，那么有无限权力的机关制度就会向他提供三种可能：立即被指控为右倾分子甚至开除出党；投向“左”倾反对派或暂时耍两面派手法以保住其在党内的地位。

5. 由此自然无论如何也得不出结论，说共产国际里的右派集团和左派集团代表了正确路线，只因为他们都与正式的中央对抗。无疑，右派集团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而左派集团则不乏“幼稚病”。而认为正式的领导干部全是些无思想的官僚也不对。事实上尽管许多真正的革命者越来越对占统治地位的制度感到不满，但对苏联命运的责任感使他们没有越出这一制度的范围。但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为使共产国际摆脱机关那种缺乏思想、机械死板的作风影响，必须在共产国际内部彻底进行改组，而这又与联共制度的改变密切相关。

所有富有生机的共产国际成员（不管他们属于现在哪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集团）在提出这项任务时速度越快、范围越广、态度越坚决，这项任务完成时带来的震荡也就越小。

^① 马斯洛夫，阿·（1891~1941）——德国共产党内“左派”领袖之一。1918年加入德共，1924年当选中央委员，1924年当选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1926年被开除出党。费舍，路特（1895~1961）——德国共产党内“左派”代表人物。1923年5月当选中央委员。1924年“左派”掌握领导权时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1924年出席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当选执委会候补委员。1926年被开除出党。

苏联与共产国际

1. 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这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至少每一个多少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发展基本问题提法的革命者来说是越来越清楚了。从政治上看，这个理论是不加批判地对苏联现有的一切以及暴露出种种矛盾和自发倾向的一切的掩饰。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会使党放松对国内外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和势力的警惕性。这一理论滋养了消极的听天由命的乐观主义，而这种乐观主义又掩盖了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国际革命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

2. 这一理论如果在共产国际中得到合法化，那就会产生不小的宿命论作用。如果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看做是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看做是不能脱离世界革命的一个过程，那么各国共产党的比重、作用及其独立担负的责任就会增加并被提到首位。相反地，如果认为不管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什么情况，只要苏维埃共和国能防止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依靠工农联盟就能建成社会主义，那么各国共产党的作用和意义马上就会降到次要地位。不管其他国家的革命进程如何，都要保证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全面胜利，这就意味着在最近一个历史时期欧洲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即足以使社会主义胜利的任务就不是夺取政权，而是抵制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因为非常清楚，只要保证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胜利，就足以保证社会主义进一步扩张到全世界。整个前景因此就改变了。充分利用每一个真正革命形势的问题成了次要问题。出现了认为时间本身“对我们有利”这样一种骗人的错误理论。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正处于喘息时机的条件下，而决不是处于自动保证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条件下。要全力利用喘息时机。要全力延长喘息时

机。但如果忘记这一喘息时机是 1917 年革命和即将在某一资本主义大国爆发的革命之间这样一段较长的时间，那就意味着放弃共产主义。

3. 极“左”分子指责统一战线政策，说统一战线政策使外国共产党从独立的革命立场，退到通过在各国内部建立强大的“左”翼来协助苏维埃国家的立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完全迎合左派的这一批评，滋养这一批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种批评。“左”倾始终表现为“幼稚病”，现在获得了新的养分，因为他们的领袖维护各国共产党独立的革命作用及对本国命运和苏联命运所负的责任，反对认为只要不去“干扰”苏联，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自然会有保障的官僚的乐观主义。左派的斗争必将日趋扩大，成为一种进步的因素，相应地也会改造左派集团的优秀分子。

关于共产国际纲领

以上所述又一次决定性地肯定了如下思想：只有从世界经济出发，苏联的政策，每一个共产党乃至整个共产国际的政策才可能有正确的方向，而世界经济，尽管存在着使其四分五裂的矛盾和壁垒，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正是由于这些矛盾和壁垒才是一个世界性的整体。

对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提供标准分析的共产国际的纲领不可能按照旧的社会主义纲领的模式来构建。必须具体分析作为有内在联系过程的世界经济的各种联系和关系以及欧洲、美洲、亚洲等相互制约的前景。这样的惟一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同时也给一国社会主义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致命的一击。

法国工人运动的若干问题

1. 法国共产党中的派别集团不是在法国工人运动基础上产生的，而是联共党内斗争的反映，这一点表现得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要突出。法国在为夺取政权而争取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出现的政治问题相当于苏维埃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带来的问题。

2. 1923年，在与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时俄共党内问题就被公开提到法国各派别集团的中心。现在共产国际好像不再讨论俄国问题。可外国党的派别集团，尤其是法国党内的派别集团又走上了俄国党内争论的道路，只不过这一次是秘密地、暗中进行的，没有公开的思想斗争，从而彻底暴露了纯机关依附关系的性质。

3. 作为反作用，这一切必然人为地在各国共产党中引起对“莫斯科”保持更大独立性的意向。这一意向必然而且已经反映了一些相互矛盾的倾向：（1）一贯导致削弱国际联系的机会主义倾向；（2）革命的无产阶级派别，它会凭自身经验认清官僚制度的危险性（在这种制度下各国党的领袖像官吏一样由上面来撤换）。不必说反对官僚集中制的斗争不能也不应向机会主义联邦制作任何让步。由于共产国际中各国党与本国工人阶级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些党的独立性也随之增强，这必然意味着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和官僚主义的派别的瓦解，各派成员将按照更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新路线重新组合。

4. 法国的客观政治局势（矛盾增多，出现大动荡的前景）提供了在党内重新组合的主要标准——根据法国政治发展提出的任务，当然也要紧密联系整个共产国际的任务。如果每一个原来的集团及其中的每一个成员现在仍未认识到党内力量彻底重新组合是必然的、必要的，那就必然会被以后发展所淘汰。

5. 识别党内进步派别最起码的标准是力求实事求是地认识目前的一切情况，即党的实际力量如何，党员实际数量有多少，党员是否真正联系群众，工厂支部这一改组后的党的基本细胞是否真正具有生命力，统一工会的实际人数有多少，他们是否确实参加罢工，是否确实发行共产主义报刊等等。应该从澄清目前的一切情况入手与官僚主义展开斗争。只有毫不留情地揭发假象、自欺欺人的做法，才能使法国党的领导人养成在组织问题上严肃认真，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态度，使他们认识到组织工作是革命的工具。要绘制一份法国党政组织及工会组织分布示意图，其中要标明一切说明所有工人组织和各地工人运动分支机构的实际情况的资料。为什么我们在一些地区力量强，而在另一些地区力量弱，通过这张示意图就能一目了然。这种务实的批判的方法将是检验我们的策略及其是否具有革命现实性、是否能争取群众的十分重要的方法之一。应根据定期收集到的最新材料修改和补充这张示意图，党依据这张示意图来为自己提出具体任务：如何通过无产阶级十分重要的中心和地区集中自己的优秀力量，落实自己的斗争口号和方法来夺取这些中心和地区。

6. 被资产阶级搞得破了产的城乡小资产阶级分子不论对党有多么重要，但如果党是以损害争取无产阶级这一重要斗争为代价来完成这一任务的话，党的性质显然在某一阶段上就有蜕化变质的危险。对于我们来说在北部省份争取到 100 名工人要比在巴黎和马赛争取到 1000 个官吏或小店主更重要。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个说法理解成是削弱我们争取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斗争士气的愿望。只不过要使这场斗争与巩固和团结党的无产阶级骨干这项基本工作同步进行。我们如果没有能够掌握政权和改造社会的无产阶级，早晚就会失去那些急于投向法西斯阵营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

7. 党在工团运动方面的保守主义具有全球的性质。以工会脱

离阶级为代价达到工会与党的接近，这不可能有什么价值。要坚决抛弃把工会变为党的略为扩大的版本的倾向。工会与群众运动的联系如何，与实际展开的罢工的联系如何等等是评价工会的主要标准。只有在此基础上党在工会中的巩固才是重要而有意义的。

8. 德国和英国改良主义工会拥有数百万工人。法国改良主义工会和我们的工会一样很薄弱。所以法国争取统一战线的重大斗争首先就意味着扩大工会对尚未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影响：要准确考察每一次罢工，切实研究罢工发生、发展的条件，争取与领导罢工的临时组织取得联系，等等。详细记录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一切表现，切实加以研究并制定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的方法是工会工作的基础。

9. 党内口号是在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的基础上集中一切力量的口号。尤其是1923年反对派必须在提出革命运动任务的基础上彻底划清界线，清除真正的机会主义分子，架设起通向其他派别革命分子的桥梁。

10. 要对莫纳特^① - 罗斯梅尔集团采取正确的立场。错误地把罗纳特和罗斯梅尔开除出党使他们理所当然地向工团主义发展并在他们周围形成新的革命工团主义集团。仅一味批评工团主义而不切实改变党的工会工作，将一事无成。不管在近期恢复莫纳特和罗斯梅尔（或罗斯梅尔一人）的党籍是否合理可行，都要让莫纳特及其集团清楚，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必然和共产党一起站在街垒的一边，所以他们应据此制定自己的政策。只有坚持这样的总方针才能争取那些支持莫纳特的宝贵的革命工人。

^① 莫纳特，比·（1881~1960）——法国工团主义者。1919~1921年任法国总工会少数派革命工团主义委员会书记，1923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4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创办《无产阶级革命报》。

11. 要团结真正的革命分子，同时还要在现实经验的基础上选拔革命分子。培养党的干部最主要的是看每个党员在罢工中、在游行示威中和在与警察及法西斯分子的冲突中的表现。过去由于机关的奉公守法，我们常常犯这类大错误。在这些问题上党必须培养党内舆论具有极高的警惕性和不妥协精神。

12. 对法国党来说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舶来品。党仍然靠响应联共内部理论斗争及其他斗争来维持，而且这些响应往往是走了样的。必须帮助法国党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法国现阶段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主要问题。例如，要集体写作《法国向何处去》这本书。

13. 必须使法国党及其他任何一个外国党有可能有权对联共党内的争论作出独立自主的判断。如果外国共产党难以对唯一的无产阶级执政党的道路和方法发表正确的意见，那么决不能由此就认为外国共产党不应介入俄国的争论。这只能产生打着表面“中立”的幌子，暗地里（如前所述）进行机关选拔。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扩大全会拒绝提出俄国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不认真了解问题、不事先在各党内对问题进行研究就作出决定纯属走形式，这对联共，对共产国际不起任何作用。正因为如此，认真、全面、详实地讨论联共当前的形势才显得更为重要。

列·托洛茨基

1926年6月28日

№02794

马列茨基^① 论热月

(1926年6月)

1. 在热月问题上的反对派的前辈是孟什维克（达林、马尔托夫、考茨基）和乌斯特里亚洛夫^②。

2. 列宁“从未在任何场合谈过热月”。

3. 热月理论是我国革命必然失败的理论。这个理论否认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取得胜利。

4. 布尔什维克与雅各宾派的区别是“法国大革命的彻底性是革命小资产者的彻底性，这种彻底性必然受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限制。相反地，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彻底性是无产阶级这一最先进阶级的‘极端’彻底性”。

5. 热月处在经济破坏，物价飞涨，纸币暴跌的时期。而我们正处于经济增长时期。

6. 雅各宾专政与农民水火不相容。

7. 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专政没有经济命脉体系。

8. 热月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与革命的动力”之间的矛盾。

9. 与吉伦特派相比，雅各宾派代表低级经济类型。

① 马列茨基，亚·摩·（1879—1937）——社会民主党人。1922—1925年为《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秘书，1926—1935年在高等院校任教，后为列宁图书馆哲学部学术顾问。

② 乌斯特里亚洛夫，尼·瓦·（1890—1938）——立宪民主党活动家。十月革命后曾领导高尔察克政府的出版局，后逃往哈尔滨。1921—1922年为《路标转换》文集撰稿，是路标转换派思想家之一。1935年回国。

10. 热月 9 日前发生过残酷的阶级斗争事件。

11. 罗伯斯比尔的明显特点是他当时掌权。他不是反对派。

12. 认为热月不可避免就意味着认为十月变革归根结底不是社会主义变革，而是世界大战的悲剧性产物。

13. 尽管热月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它不是蜕化，从社会经济角度看是一种进步（当时的小资产阶级已资产阶级化，这不是蜕化，而是正常的发展，是社会经济进步）。

[无法确定作者]

[1926 年 6 月]

№02795

托洛茨基：论平等

(1926年7月11日)

实行新经济政策前夕，在列宁领导下的中央曾强调指出：“我们必须一再提醒全党注意争取进一步实现平等——首先是在党内，其次是在无产阶级内部以及一切劳动群众内部，最后是在各个主管部门和各个工作人员集团之间，特别是在专家和负责工作人员同群众之间”（摘自俄共（布）全国代表会议决议。1920年9月）^①。

当然，实行新经济政策使经济和日常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产生了与实现平等相抵触的条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党可以在这方面及其他方面默认新经济政策中的资产阶级倾向。

所以，1925年底（实行新经济政策的5年后）当中央打算将大平等问题再次提上日程时，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对此采取了敌对态度，这种现象非常令人担忧。

漠不关心乃至敌视那些技术不熟练和不太熟练的工人阶层，把他们看做达不到我们官僚的“高”水平，因而才向往平等的“愚昧无知的群众”，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了（乌格拉诺夫同志的有关讲话尤其错误）。这样对待低收入的工人阶层是机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典型特征，这种现象与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仍不愿意切实提出有步骤地实现大平等问题如出一辙。

列·托洛茨基

1926年7月11日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38页。

№02796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声明

(1926年7月11日)

我们恳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些行为，首先是《真理报》编辑部的行为，他们曾多次重申，中央和党都不想挑起争论，但他们的实际做法却明显自相矛盾。布哈林同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他的有关英俄委员会问题的报告，以极其歪曲的形式介绍了政治局内的不宜外传的辩论。布哈林同志虽未指名道姓，却想方设法让听众和读者明白，他到底在和谁进行辩论。向党员大会，尤其是向报刊披露政治局的辩论情况就是在进行争论，至少是想挑起争论。虽未指名道姓，但不是引章摘句就是种种“暗示”，伪装得也太幼稚、太不像样了，简直不值一提。无独有偶，捷尔任斯基同志（他在这场辩论中也出尔反尔）的讲话也把政治局内部的这场辩论广为传播，弄得国内人人皆知。

最后，《真理报》针对梅德维捷夫^①同志大概在1924年初写的那封党并不知晓的信发表的编辑部评论，很明显表明他们极想引发一场争论或单方面进行争论，如果《真理报》评论援引的这封党并不知晓的信的文字属实的话，就得承认，这封信中的思想极其错误，应该加以谴责。但奇怪的是，《真理报》编辑部把这封信藏了两年多，现在才抛了出来，并且附上一系列明显针对特定的几位政治局委员的政治诬陷，所以这除了要迫使这些委员参与政治争论外

^① 梅德维捷夫，谢·巴·（1885—1937）——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1922年任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后从事经济工作。

没有别的目的。同时《真理报》编辑部及一些实际上已开展争论的负责工作人员还不断声称，“党不想进行争论”。首先应该坚决彻底地谴责这些尝试，因为这样做是想让党身不由己地卷入争论，同时把挑起争论的责任推给形式上居少数的，并未挑起也不打算挑起争论狂热的那部分党员身上，因为他们希望半年来经济政治领域的雄辩事实会促使大多数党的现任领导人起来纠正党的方针。

因此，如果说《真理报》编辑部在争论问题上的做法严重背弃了它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职责即保证党的正常发展，不要引发争论震荡，那么《真理报》的行为，就其实质来看，就更加恶劣了。

两年多以前梅德维捷夫同志在党不知晓的那封信中是否谈到过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问题，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梅德维捷夫同志是在有限的读者圈里传播了绝对错误的思想。但《真理报》编辑部不可能不知道，去年底今年初加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23个工会已修改了自己的章程，删除了其中有关它们隶属于红色工会国际的条款，代之以有关它们隶属于国际工会联合会的条款。由于国际工会联合会只有两个：红色工会国际和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因此在章程里以国际联合会取代红色工会国际，只能说明持这种主张的人正在为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作准备。我们认为，党中央机关报责无旁贷应捍卫工会的思想路线，不可能不知道章程中这些极其重要的修改，也不可能不了解修改的意义和目的。那么《真理报》在以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取代红色工会国际一事上保持沉默，甚至这种做法被果断地指出后仍保持沉默，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这里说的可不是个别同志一封反映其绝对错误意见的私人信件，而是印数达数百万份、应按照一定的方向教育千百万工人的正式章程。他们的这种做法自然使人们想到，《真理报》从档案库里抛出梅德维捷夫同志这封两年多以前背着党写的信是为了掩盖他们在原则上纵容工会领导人用阿姆斯特丹国际取代红色工会国

际的错误。

《真理报》称，“决不能同阿姆斯特丹的叛徒们、麦克唐纳之流及考茨基之流联欢，同时也不要向施瓦尔茨、达林和阿布拉莫维奇^①之流伸出手去。俄国的孟什维克究竟比他们‘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同道坏在哪里呢？”对于这个说法可以表示同意，不过它过于简单化，因为英国工会加入了阿姆斯特丹国际，因而是阿姆斯特丹派，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基础上与之“联欢”，建立英俄委员会。有人说这样做的不是党而是工会，这种说法也于事无补，因为《真理报》自己也与阿姆斯特丹的叛徒们、与麦克唐纳之流、与考茨基之流及阿布拉莫维奇之流沆瀣一气了。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在揭露梅德维捷夫两年多以前写的那封无人知晓的信里的错误思想时，《真理报》是过于激进了。就是这个《真理报》却支持我们同阿姆斯特丹派中那部分刚刚背叛了总罢工的人联欢，因为无论《真理报》编辑部在这个问题上怎样诡辩，英俄委员会都是一个政治同盟，也就是与一些阿姆斯特丹分子特殊形式的联欢反对另一些阿姆斯特丹分子。总罢工的经验表明，总理事会在总罢工期间出于总罢工的种种目的不去与俄国工会结盟，还号召麦克唐纳和托马斯的议会党团代表来共同领导罢工。总理事会的此举表明，对于总罢工来说，把经济与政治、工会工作者与政治家对立起来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背叛总罢工的过程中麦克唐纳以议员的身分出现，托马斯也是以议员和工联分子的身分出现，正如波赛尔和其他总理事会成员一样。要向群众解释，说我们不能和麦克唐纳建立任何联盟或签订任何协定，因为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政客，而我们可以继续与齐特林维持英俄联盟，因为齐特林是工联分子，对波

^① 阿布拉莫维奇，拉·（1880～1963）——崩得领袖之一，1923年参与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任国际执行委员会常务局委员。

塞尔的叛变行为应从工会的角度，而不是政治角度去评价——搞这样的烦琐哲学，那就是要搞乱群众的思想，使共产主义思想彻底声誉扫地。

有人认为我们布尔什维克应留在英俄委员会里，因为总理事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反映，这种说法更为荒唐（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提法集中反映了政治尾巴主义的全部实质。其实这种哲学就是说工人阶级该有什么领袖就有什么领袖，因此，反对领袖或与领袖决裂就是反对群众或与群众决裂。总理事会当然是英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定阶段。但总罢工及对罢工的背叛行为却震撼了这一阶段。英国工人阶级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有些人就打算取消这个阶段。总理事会背叛总罢工后有这种打算的人就更多了。我们的任务并非是听天由命地去观察各个“阶段”，而是要以实际言行（在这一次则是要用榜样）来帮助英国工人阶级中最革命分子，对于他们来说总理事会不是一个阶段，而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绊脚石和敌人。这就是不同于尾巴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提法。正是因为《真理报》编辑部在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栽了一个比谁都大的跟斗，它现在才在梅德维捷夫同志过去写的那封无人知晓的信里搜罗错误，叫嚣决不容许与阿姆斯特丹的叛徒们、与麦克唐纳之流和考茨基之流联欢。试问，工人群众会不会把这理解为要退出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呢？这会不会是鼓励召回主义呢？如果不容许我们与阿姆斯特丹上层人物（这一回《真理报》把他们与麦克唐纳和考茨基之流的政策扯到了一起）结盟，那是不是说也不容许工人留在阿姆斯特丹工会里。抑或《真理报》想对实际上是被迫加入历史上形成的工会和自愿同这些工会的领袖们（他们起的政治作用与麦克唐纳和考茨基起的政治作用一样）结成政治联盟这两种情况加以区别。可这样一来，《真理报》岂不是彻底揭露了布哈林同志那套烦琐哲

学的理论了吗？正是布哈林的这些理论在英俄委员会破坏了总罢工之后，在煤矿工人罢工遭到暗中破坏之后仍主张保持英俄委员会。《真理报》越是在对工人运动的革命领导的这些基本问题上乱了套，人们就越会想到抨击梅德维捷夫过去写的那封无人知晓的信无非是要用种种谣言、暗示和叫嚣来迷惑党、蒙蔽党、给党的思想制造混乱，从而掩盖他们自己思想上的破产。

如果梅德维捷夫同志两年多以前真的说过要把我国工业整个或其主导部分租让出去，那么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应该予以谴责。我们不清楚《真理报》的报道在多大程度上是属实的（我们不得不声明，这种情况并非一贯如此），但至少现在（1926年7月）《真理报》应该能找到它认为应予抨击的意义更重要、分量更重、内容更新的事实。我们知道，农业人民委员斯米尔诺夫^①同志曾正式建议要保证把农业合作社的领导权掌握在“生产上实力强的”中农手中，实际上是说把合作社从农村下层收过来再转交给农村上层以实施布哈林提出的“发财吧”的口号。我们知道，斯米尔诺夫同志曾建议要为农村上层的存款保密，好不让他们戴上富农的帽子，而我们的任务是及时弄清富农的周转额以便相应地收取他们应缴的税款。我们知道斯米尔诺夫同志曾建议修改现行立法以便可以出售不能如期偿债的人即贫农的最需要的农具。我们知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条例已扩大了小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减少无产阶级的选举权。我们知道苏维埃近期的改选结果表明，实行上述政策后，我们到底在向什么方向发展。苏维埃改选无疑以统计数字向我们发出了警告，如果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无产阶级专政就要蜕化为小

^① 斯米尔诺夫，亚·彼·（1877～1938）——1896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十月革命后历任副内务人民委员、副粮食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书记等职。

资产阶级局限性的王国。

《真理报》编辑部对斯米尔诺夫同志（农业人民委员）、农业合作社会领导人卡缅斯基同志的建议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条例等中表现出的种种倾向不置一词。相反，《真理报》编辑部却向中央委员会中那些及时提出警告、及时揭发和及时提出改变方针的同志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出于这一斗争的目的，《真理报》还从档案库里翻出了梅德维捷夫同志的那封无人知晓的信，从中引用了（引得对不对，我们不清楚）根本错误的观点并利用诡辩、烦琐哲学、暗示和谣言的手法试图把事情说成是，梅德维捷夫同志这些根本错误的观点与某些同志的观点有某些相似的地方，这些同志认为，“发财吧”这一口号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内某些因素发展的一定“阶段”（不是向上的阶段，而是向下的阶段），这个口号与粮食人民委员的建议、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与对工业化问题的态度、与对工资问题的立场有密切联系，这一口号与这些建议和批示等等构成一个虽尚未完全定形，尚未完全确定，但与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体系。

我们还是可以毫不费力地对《真理报》编辑部的全篇评论逐行加以分析，揭穿它错误百出、装腔作势、空话连篇、一味诡辩的种种丑态。虽然这场争论明显是《真理报》编辑部通过暗示、造谣这种半遮半掩的手段一手挑起的，但我们仍认为，党不应追随《真理报》编辑部的做法，必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通过正常的途径来解决一些至为重要的问题，首先就是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不要再干扰党，也不要错误的方法把党卷入争论的狂热中去。

格·季诺维也夫

列·托洛茨基

1926年7月11日

No 10851

斯大林就解除加米涅夫职务问题致莫洛托夫

(1926年8月3日)

8月3日(星期二)

莫洛托夫：

(1) 加米涅夫在政治局讨论进出口计划问题之前提出了辞职申请，并建议由米高扬代替他的职务。

(2) 政治局研究了进出口计划问题，认为情况“不妙”，成立了以鲁祖塔克为首的委员会，以期改进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3) 我们将于星期四(8月5日)接受加米涅夫的辞呈并在征询中央委员的意见后任命米高扬担任此职。^①

(4) 准备把加米涅夫派往日本，把阿拉洛夫^②派往中国(中国政府要求撤换卡拉汉，得把他撤下来)，可能要把柯普^③派往意大利，把克尔任采夫召回莫斯科，他在意大利工作不顺利。^④

(5) 总的来说情况不错。西方的所有大党(包括法国和捷克斯

① 1926年8月5日政治局解除加米涅夫在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任命米高扬担任苏联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② 阿拉洛夫，谢·伊·(1880~1969)——1918年入党。1921~1925年任俄联邦驻立陶宛、土耳其、拉脱维亚全权代表，后为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6年12月30日被任命为苏联政府驻中国国民政府代表。

③ 柯普，维·列·(1880~1930)——1908年入党。1923~1925年为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5年4月起任苏联驻日本全权代表。1927~1930年任驻瑞典全权代表。

④ 1926年8月12日政治局任命柯普为苏联驻意大利全权代表，解除其驻日本全权代表职务，任命加米涅夫为驻日本全权代表。1926年9月2日此决定被取消。

洛伐克)都表示支持我们中央委员会,反对反对派。

(6) 布哈林还没有回来^①。政治局现在有6个人:李可夫、鲁祖塔克、加里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加米涅夫也投了票,因为莫斯科再没有其他候选人了)。

(7) 任命古比雪夫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任职的事你已经知道了^②。反对派在政治局里表现平静。

向在索契的各位朋友问好!

握手!

斯大林

尽快把你发言的速记记录寄来。我们准备在下一期上公布“拉舍维奇事件”,也就是对这一事件的讨论情况。

① 这时候布哈林在列宁格勒。

② 1926年7月29日政治局任命古比雪夫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No 10852

斯大林就解除季诺维也夫职务问题致莫洛托夫

(1926年8月30日)

莫洛托夫：你好！

(1) 事情的发展使我们不能不提出免去格里戈里在共产国际的职务问题。一些西欧党（英国、德国）关于解除格里戈里职务的决定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即将举行的）代表会议的第一项日程（“国际问题”）也说明了这一点。在整个形势已提出这一问题，而两个西欧党已明确建议解职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联共）还“回避”这个问题，就会令人不解和不合情理了。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作出决定，承认关于解职的建议是合适的。^①

(2) 至于正式解决这个问题，要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扩大全会来做。如果所有的党或者绝大多数党都赞同解除格里戈里的职务，那么就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种意见体现了所有党的真正意志，即整个代表大会的真正意志。可将最后的决定转告代表大会。

(2)^② 现在已该考虑关于工会和经济形势的提纲草案或初稿（草稿）了。书记处有这类初稿了吗？也就是说，书记处收到这类“草稿”了吗？如果没有，要抓紧。

(3) 你不认为应该在工会中甚至在产业工会各分会中也许在各

^① 1926年10月联共（布）（布）中央联合全会通过决定，认为季诺维也夫“不可能继续在共产国际工作了”。

^② 原文如此。

行业中实行工会积极分子“制度”或“机制”吗？如果还没有实行这个“制度”，那么应当着手实行了。因为这样做既有利于选拔新人，又有利于密切工会与生产的关系，还有利于活跃工会的工作。在这里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积极分子（纺织业的、石油工业的、煤矿业的及其他行业的）要有广泛性，不要只是工会干部，不要只是共产党员，也要有非党人士（比例大约一半对一半）等等，你对此有何看法？

（4）你是否认为有必要在中央全会上提出加米涅夫的问题？安排加米涅夫去日本之事，外交人民委员部是否在办？

祝一切顺利！

约·斯大林

1926年8月30日

附言：斯捷茨基论新反对派的文章^①我看过了。是一篇好文章，但其中个别地方使文章减色不少。斯捷茨基认为，我们不应当去争取“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在苏维埃中的绝对优势”。这种看法不对。我们同反对派的分歧不在于此，而在于下列方面：第一，在无产者非常少的那些地区，无产者在人数上不可能占优势；第二，对优势要从政治上理解（而不要仅仅从统计学的角度理解）；第三，我们根本不同意反对派向我们推荐的那种夺取优势的办法。非常糟糕的是，我们没能帮助斯捷茨基改正这些不足之处。

^① 斯捷茨基的文章《新反对派是怎样走向托洛茨基的》刊载在1926年8月26日的《真理报》上。

No 10853

斯大林就奥尔忠尼启则的 任命问题致莫洛托夫

(1926年9月4日)

9月4日

莫洛托维奇：

谢尔戈前两天到我这里来过。他对中央委员会关于召回他的决定的提法大为恼火。^①他认为关于召回的提法是中央委员会对他的无端惩处和侮辱。他认为，调谢尔戈到罗斯托夫去“替代米高扬”这句话是在暗示米高扬比谢尔戈高明，谢尔戈只配作米高扬的副手，等等。他知道，中央委员会没有也不可能有委屈他、侮辱他、把他排在米高扬之下一类的意思，但是他认为，那些收到中央委员会决定抄件的人会把这项决定理解为是对谢尔戈的打击，因此应当把决定的提法改得更恰当更准确一些。我想应当满足谢尔戈的这一要求，因为从客观上看，由于我们在提法上的偶然失误，谢尔戈确实受了委屈。是否可将决定的提法大致修改如下：

(1) 尊重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关于解除他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的请求，驳回外高加索各组织（中央委员会和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各民族组织）关于让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留任的要求；

(2) 鉴于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坚决拒绝马上去莫斯科工作，任命

^① 1926年8月30日政治局通过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关于把奥尔忠尼启则从外高加索召回建议，并决定任命米高扬为北高加索第一书记。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为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问题暂缓几个月决定；

(3) 接受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关于任命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为该党委第一书记（征得本人同意）的建议。

这件事办得愈快愈好。同时要把新抄件分送给得到过旧抄件的每一个人。

你可能会说，这是小事一桩。也许是这样的。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对这桩小事不予纠正，它可能严重危害事业。

纳扎列强^①在这件事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刺伤了谢尔戈的自尊心，又从中挑拨，真不明白他到底想干什么。

祝一切顺利！

约·斯大林

^① 纳扎列强，A.M.（1889～1937）——1905年入党。1924年起任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外高加索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No 10854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6年9月16日)

莫洛托夫：你好！^① 9月12日的来信收到了。

(1) 同谢列布里亚科夫和柯普的误会彻底清除了，^② 这很好。不然我们就会断送自己的政策，这两个人就会成为张作霖和日本人的俘虏，我们则会成为他们两人的俘虏。顺便说一句，张作霖之所以不可一世是因为他现在知道（这是柯普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告诉他的）我们不会进行军事干预，知道即使半年前我们也没想过进军哈尔滨，因此他可以无所顾忌，蛮横无礼，以“此表现”换取日本人或者（特别是）英国人的某种援助。这就是奥秘之所在。柯普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由于饶舌把我们的外交秘密透露给了张作霖，告诉他说，我们只是吓唬他一下，不会因为中东铁路的问题去跟他打仗。他们两人竟想以姑息纵容和透露秘密来收买张作霖和日本人！且不说他们还另有派别目的，这是在李维诺夫的帮助下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系统搞的……

(2) 现在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在现阶段，张作霖只能搞些挑衅活动，他不至于去强占中东铁路。张作霖以及日本人（通过张

① 信的左上角有批语：“已阅。莫洛托夫、布哈林、乌格拉诺夫、鲁祖塔克。”

② 1926年9月7日政治局讨论了中国问题并通过决定：“鉴于柯普需要继续治疗的报告，取消政治局今年9月2日的决定。”9月9日政治局取消9月2日关于派谢列布里亚科夫去中国的决定。

作霖)和英国人都在试探我们的反击能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在不应该把卡拉汉召回来。^①但仅仅是由于这个原因,因为我觉得,从我们对华政策的实质来看,完全中了冯玉祥分子和其他中国“将军”们的奸计的卡拉汉,是一个不可取的人。我们将在近期内把中东铁路和张作霖的问题统统提出来。

(3) 在上一封信里我没有跟你详谈谢尔戈的情况。但是现在应当告诉你,谢尔戈,特别是纳扎列强在从外高加索“召回”这件事上,给我的印象很坏。我同谢尔戈吵翻了,说他气量太小,不再见他(他现在在新阿丰)。关于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书记处的人选问题要专门讨论一下。纳扎列强目前不适合接替谢尔戈在书记处担任的职务(他还年轻,不够认真,有时还不诚实)。

(4) 关于控制数字问题,我的意见是现在就要自上而下地对人民委员部机关和经济核算机关的编制进行精简和压缩^②。否则厉行节约就是空话。工业的比重一定要增大。

(5) 现在同克鲁普斯卡娅谈话不仅不合时宜,而且从政治上看有害。克鲁普斯卡娅是个分裂分子(请看她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发言)。如果我们想保持党的统一,就要打击她这个分裂分子。不能同时提出两种相互对立的方针——既反对分裂分子,又要与之和平共处。这不是辩证法,而是十分荒唐、毫无办法的办法。不排除季诺维也夫明天会宣布莫洛托夫和布哈林“不讲原则”,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通过克鲁普斯卡娅)向他“建议”结成“联盟”,而他季诺维也夫“愤怒地拒绝了这种不能容忍的调情”等等,等等。

^① 1926年8月27日根据契切林的建议召卡拉汉回莫斯科述职。9月21日要卡拉汉迅速返回莫斯科,不去广东,也不去日本。

^② 1926年9月20日政治局通过决定:“研究把行政管理机关经费……至少削减15%。”

(6) 关于“八月联盟”，你的意见完全正确。应当重新发表伊里奇的文章，不是一篇，而是几篇，同时还要谈谈这个联盟产生的过程。一定要让索凌^①上阵。你和布哈林务必发言。这件事意义重大。^②

(7) 关于商业和工资的事进展顺利，这很好。这非常重要。

(8) 对涅恰耶夫一伙毛孩子不妨狠狠地打击一下。

(9) 杰米扬的诗不适用，写得不够生动。我写信跟他谈了我的看法。

(10) 我的身体稍有好转，但是手还疼。

(11) 布哈林是蠢猪，或许比蠢猪还蠢，他竟认为，简单写一下自己的访德印象有失身份^③。我得教训教训他。

暂且就写这些。握手！

约·斯大林

1926年9月16日

对信的补充

报刊上（特别是经济学报刊）接二连三地报道的合作社及地方和中央的采购单位普遍违抗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和党的命令的情况令人难以容忍。一些明目张胆的犯罪分子在帮耐普曼和工人阶级的其他敌人的忙，实际上却得不到制裁，这对整个经济机关和苏维

① 索凌，弗·戈·（1893—1944）——1917年入党。1920—1925年任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局委员。1924年起在列宁研究院工作。

② 1926年10月5日《真理报》发表了莫洛托夫在县级党的工作者学习班上的讲话。莫洛托夫认为党内出现了反对派集团，并把它同1912年的“八月联盟”相提并论。1926年第18期《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列宁论“八月联盟”的文章和索凌的文章《八月联盟》。

③ 1926年8月12日政治局同意库西宁关于派布哈林去德国5天的建议。

埃机关起着瓦解作用，我们的命令成了一纸空文，我们的党变成了一个空架子。如果我们不想被那些表面上“接受”党的命令而实际上却对这些命令百般嘲弄的恶棍所左右，那就不能再这样容忍下去了。我建议责成商业人民委员部（和工农检察院）：

（1）立即开除破坏收购价格政策的人，把他们交付法庭审判，并公布其姓名；

（2）立即开除破坏日用工业品销售价格（降低零售价）政策的人，把他们交付法庭审判，并公布其姓名；

（3）发一个党内通报，指出这些破坏分子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同他们的斗争要毫不留情。

我将想尽一切办法坚持自己的这些建议，也请你们大家采纳这些建议。要知道，如果不采纳这些措施，我们就会吃败仗，盘据在我们的收购机关和合作社机关的耐普曼分子就会得利。不采取这些措施，我们就要倒霉。

盼复。

约·斯大林

1926年9月16日

№10855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6年9月23日)

莫洛托夫同志：

你9月20日的来信收到。

(1) 工资的事看来解决得不错^①。要紧的是使基层群众得到一点实惠。若能给石油工人也加点钱就好了(他们的收入总的说来不算少)，但是如果目前没有这种可能，那只好作罢，也顾不了巴库工人的牢骚了。^②

(2) 如果托洛茨基在“盛怒”之下想“孤注一掷”的话，只能对他更不利。现在就把他开除出政治局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取决于他的表现。^③ 现在的问题是：要么他们服从党，要么党服从他们。显而易见，如果党容许后一种(第二种)可能性，党就不成其为党了。

(3) 关于斯米尔诺夫，在对他提过警告之后，现在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把他开除出党，哪怕是开除一段时间。^④

① 1926年9月20日政治局批准政治局下设委员会关于工资的建议。委员会建议仅提高从事生产的工人(煤炭、采矿、五金……)的工资。

② 1926年9月30日政治局认为可以提高石油工业某些工种工人的工资。

③ 1926年10月联席全会通过决定，因从事派别活动，解除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④ 1926年9月8日，斯米尔诺夫因从事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1926年11月26日承认错误后恢复党籍。

(4) 我认为，全会不可能“绕过”梅德维捷夫的问题^①。或许你有“绕过”的办法，那就说说看，是什么办法。

(5) 看来你是对的，关于反对派联盟的问题应该等到代表会议上提。其实，用不着仓促行事，最好是先看一看它们现在的表现再说。

(6) 你和布哈林关于“八月联盟”问题的发言要抓紧准备，我看没什么好等的。

(7) 我写信跟杰米扬说了，他的寓言“不够生动”、“不适用”（或者诸如此类的话）、“不应出版”。我这里没留抄件，不然就可马上寄给你看。至于说这个寓言中的不良“征兆”反映了杰米扬的立场在倒退，我对此表示怀疑。这个问题待我回去后再谈。

(8) 不能让卡拉汉在中国问题上自作主张，他会把整个事情搞糟，真的。他那一套已经过时了。因为他当全权代表的时候正值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他现在仍然停留在那个阶段；在当前中国和国际出现新形势下，在发生了一系列新的事变的情况下，他根本不合适作领导者，因为他对新的事变不理解，而且将来也不会独立地理解，他这个人极端轻率冒失，局限性很大（就革命眼界而言）。可是论蛮勇、放肆、自信和高傲，他却绰绰有余。这一点尤其危险。卡拉汉永远也不会理解，汉口很快就会成为中国的莫斯科……

握手！

约·斯大林

1926年9月23日于索契

我的身体有所好转。

^① 在1926年10月全会上原“工人反对派”首领梅德维捷夫、施略普尼柯夫因反党活动而受到谴责。

附言：我对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公开呼吁总委员会联合抗议炮击万县的作法是否正确没有把握。这样做会过分刺激总委员会和保守党。有这种必要吗？最好能选择另外一些更有效的办法。

№ 10856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6年11月7日)

莫洛托夫同志：^①

既然我们大家（包括我在内）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讲话都不经过预先审查，不知你为什么不把讲话按原稿发表，而非要让我来作修改。我现在才明白，我的不妥之处就是没让任何人看我的报告。你如此这般地坚持要我修改你的讲话，这难道不是在说，我没有把自己的讲话拿给朋友们看是错了吗？前天那场争论之后我就感觉到这种不妥了。可你现在一再地坚持要我审查你的讲话，是想以自己的谦逊态度来使我无地自容。不，我还是不这样做为好。最好是你认为怎么需要就怎么发表。

约·斯大林

11月7日

^① 左上角有莫洛托夫的批注：“关于我在党的第15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10857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6年12月23日)

维亚切斯拉夫：你好！

你不用急着回来，可以超假，自由自在地多呆上一周（甚至更长一点儿时间）。

我们这里的情况总的来说不错：

- (1) 征购和出口工作进展顺利；
- (2) 国家预算收入的完成情况目前不是太好；
- (3) 切尔文卢布的情况不错；
- (4) 工业在缓慢发展；
- (5) 决定降低一些畅销商品的出厂价格；
- (6) 我们正在紧急制定降低零售价格的具体措施（要狠压商业合作社系统）。^①

工会代表大会^②开得“正常”，正像托姆斯基说的那样，代表大会保留了全部原有的东西，但是没有给自己的思想武库增添任何新内容。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扩大全会^③开得不错。第15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被一致通过（意大利的一个博尔迪加分子弃权）。我们的反对派是一些愚蠢的家伙，竟鬼迷心窍，硬要较量一番，结果受到

① 1927年2月中央全会通过“关于降低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决定。

② 苏联第7次工会代表大会于1926年12月6~18日召开。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7次扩大全会于1926年11~12月在莫斯科举行。

沉重打击。鉴于加米涅夫的流氓言论，我不得不在总结发言中向他提起给米·罗曼诺夫^①发电报的事。加米涅夫“反驳”说“这是谎言”。^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加和费多罗夫^③向政治局递交了一份“反驳声明”，并要求把它公布。我们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这篇声明，同时还刊登了中央委员会的答复和足以在政治上致加米涅夫于死地的文件。我们认为，加米涅夫已经失去作用，他不能再呆在中央委员会里了。

暂且就写这些。其他问题留待面谈。握手！

柯巴^④

1926年12月23日

-
- ① 罗曼诺夫，米·亚·（1878～1918）——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弟弟。
- ② 1926年12月15日加米涅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上发言，否认斯大林14日讲话中提到的下列事实：1917年二月革命后加米涅夫曾给米·罗曼诺夫发过电报。
- ③ 费多罗夫，Г.Ф.（1891～1936）——1907年入党。国内战争结束后在工会、党和苏维埃担任领导工作。1927年在党的15大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积极活动家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1934年再次被开除出党。
- ④ 斯大林早期革命时用的化名。

No 10858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7年6月23日)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

(1) 我（粗粗地）读了一下处理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案件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记录》。给我的感觉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十分尴尬。进行审问和起诉的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而是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奇怪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些委员竟躲了起来。谢尔戈在哪儿？他躲哪儿去了，为什么要躲起来？真丢人！我坚决反对把起诉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委员会变成指责中央及共产国际的讲坛，并把“事件”的矛头对准斯大林，他现在不在莫斯科，因此可以对他百般指责。难道可以把这个《记录》交给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让他们去扩散！真是岂有此理。

(2) 请注意有关《劳动报》的文件。应当对《劳动报》进行清洗。

1926年6月23日^①

^① 斯大林写的日期有误，应为1927年6月23日。

№10859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7年6月24日)

1926年6月24日^①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

信使刚刚送来了你的最近一封来信。关于资助中国的问题，我考虑可以从1000万卢布的账上先寄去300万~400万卢布，至于资助1500万卢布一事等等再说。要我们再提供1500万，看来其目的是，如果我们拒绝提供这1500万，他们好以此为借口放弃立即讨伐蒋介石。

至于神圣的三人小组（P. + Op. + B.）我暂且不谈，因为以后有的是机会谈它。Op. 是个“好小伙”，但却是个冒牌政治家。他始终是“幼稚的”政治家。B. 或许只是“心情不好”。至于 P.，他在“耍手腕”，以为这就是“真正的政治”。

敬礼！

约·斯大林

^① 斯大林写的日期有误，应为1927年6月24日。

No 10860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

(1927年6月27日)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和尼古拉：^①

1. 你们的最近(6月24日)的来信以及政治局关于英俄团结委员会的决定收到了。^② 该好好教训教训“他们”(我指的是总委员会),不是单纯的斥责,而是认真地教训。他们可能要闹分裂,以“证实”自己“不依附”于莫斯科,从而得到张伯伦的赞赏。但是闹分裂将使他们比在煤矿罢工时期输得更惨,因为现实出现的战争危险触痛了,而且是深深地触痛了所有的工人。他们试图利用枪决事件^③来捞一把,但这并不能维持多久,特别是如果你们能就此发表理由充足的声明的话。应当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挑明。他们这是在帮助自己的主子发动和进行战争……

2. 关于冯玉祥的情况我的密码电报已经谈了。看来关于他的报道是属实的。我担心,武汉因为怯懦而屈服于南京。我们当然犯不着因为鲍罗廷而与武汉发生冲突(如果武汉想解除他的职务)。但只要有可能,就要想方设法使武汉不受南京的控制,因为一旦失去了作为独立中心的武汉,就意味着失去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工人

① 信的背面有布哈林的批注：“已阅。布哈”

② 1927年6月24日政治局通过政治局委员会的下列建议：召开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并在会上通过谴责导致同团结委员会决裂、支持保守党政府政策的总委员会的决议。

③ 1927年6月9日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的决定，枪毙了从事恐怖活动的20名白卫分子。

就不可能进行自由集会，共产党就不可能公开存在，革命刊物就不能公开出版，总之，无产阶级和革命就失去了公开组织的条件。请你们相信，为了这个原因值得再向武汉提供300万~500万卢布，只要武汉不向南京投降，我们的钱不白花就行。

3. 近日我收到了汪精卫的来电，并给了他非常长的答复。请你们看一看并简单谈谈你们的意见。

4. 关于洛佐夫斯基我没有异议。

5. 对“明确”与蒋介石的关系的可行性问题我表示怀疑。按同张作霖的关系处理不合适。我们是在3年前承认张作霖的。要是现在，我们就不会正式承认他了。现在（马上）承认蒋介石就是对武汉的打击（因为武汉还存在），就等于向张作霖挑战（别忘了中东铁路）。与蒋介石的关系最好放一放，暂且维持现状。

6. P. 投向“左派”不足为奇。这就意味着他暂时失去了“配合”，“机动”等的可能性。而米高扬在政治上则还是只雏鸭，是有才能的雏鸭，但毕竟是雏鸭。他会成长并成熟的。

握手！

约·斯大林

1926年6月27日^①

^① 斯大林写的日期有误，应为1927年6月27日。

No 10861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7年7月初)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①

我病了，躺在床上，所以简单写几句。

(1)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宣言不错^②，李可夫的答复很糟^③。

(2) 托姆斯基的报告差劲。^④

(3) 我赞成对伊先科^⑤ 和瓦连廷诺夫^⑥ 提出警告。^⑦

(4) 该让托洛茨基去日本。

(5) 如果需要或是全会延期，我可以出席全会。

(6) 布哈林关于中国的文章写得很成功。^⑧

敬礼！

约·斯大林

① 右上角有布哈林的批语：“已阅。布哈”

② 指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就托姆斯基与总委员会代表关于英俄委员会问题会谈发表的宣言，宣言于1927年6月28日得到政治局批准，其中有批评总委员会的内容。

③ 指李可夫对英国工会活动家抗议枪毙20人的电报的答复。

④ 指托姆斯基1927年6月28日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上的报告。

⑤ 伊先科，A.Γ. (1895~1937) ——1917年4月入党。1919~1921年和1924~1927年任水运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1935年被开除出党。

⑥ 瓦连廷诺夫，尼·(沃尔斯基) (1879~1964) ——1898年参加革命运动。十月革命后任《工商报》副总编，后在苏联驻巴黎商务代表处工作。1930年移居国外。

⑦ 1927年秋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几次会议上讨论了伊先科和瓦连廷诺夫反党派别活动问题，两人被开除出党。

⑧ 指布哈林的文章《中国革命的目前局势》，刊载在1927年6月30日的《真理报》上。

№10862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7年7月8日)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

(1) 在我关于中国的密码长电发出时，我既不知道唐生智所施的诡计，也不了解武汉政府在这件事上的表现（我也没有关于武汉工人赤卫队被解除武装的材料）。显然，你们有了这些材料，就有根据作出新的指示。我们曾及时地利用了武汉的上层人物。现在甩开他们了。要设法争取国民党的地方组织以对付国民党现在的上层人物。由于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受军阀的迫害，争取工作是有基础的。因此，如果有可能，暂时不要把退出国民政府（目前退出是必要的）与退出国民党（不久必将退出）联系起来。

(2) 我不担心小组的情况。为什么不担心，我回来后再解释。

(3) 我该什么时候回来。

敬礼！

斯大林

26年7月8日^①

^① 斯大林写的日期有误，应为1927年7月8日。

No 10863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

(1927年7月9日)

1926年7月9日^①

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②

你们俩真不像话，使我有点儿为难：你们既要征求我对（关于中国的）新指示的意见，却又不提供具体的新材料。新指示草案中虽然提到了唐生智的问题，提到了解除工人武装的问题（“实际解除”，唐生智“实际上已成为反革命分子的工具”等），但是，第一，草案中没有列举任何具体的事实，第二，无论是报刊，还是密码电报（这些电报当时我手头都有）均没有指出存在这些事实。这样就不光是你们使我有点儿为难，我这封既长又尖刻的密码回电或许也使你们为难。

我收到你们的新指示草案后决定：这么说布哈林和莫洛托夫招架不住反对派的大量新“提纲”，最终屈服于这种讹诈；这么说克利姆^③会很高兴，因为他终于不用再向武汉提供资金了，所以极痛快地投票赞成新指示。如此等等。现在我明白了，所有这一切并不是那么回事。昨天一整天我都在读信使送来的新材料。我现在所

① 斯大林写的日期有误，应为1927年7月9日。

② 信上有批注：“已阅。布哈。已阅。李可夫、安德列也夫、托姆斯基、伏罗希洛夫、米高扬”。

③ 伏罗希洛夫。

担心的不是新指示已发出，而是发布晚了。我并不认为，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后共产党的处境就会有所好转，就能“站稳脚跟”。相反，退出只会使共产党人更易受到杀戮，造成新的意见分歧，并有可能酿成诸如分裂的危险。但是别无选择，反正我们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因为这个时期该经历，而且不可避免该经历。

然而目前的主要问题并不在此。主要问题在于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光荣地渡过这个新时期（地下状态、逮捕、枪杀、自己队伍中的背叛行为、自己队伍中的奸细活动等等），从而变得强大起来，得到锻炼，不会发生分裂、分化、瓦解、堕落成一个人或者若干个小集团。绝不能认为这种危险已不存在，同样不能排除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与未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之间可能有一个间隔时间，就像我国1905年与1917年（二月）革命之间有一个间隔时间一样。此外，我认为，这种危险性（我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发生分裂的危险性）比中国目前存在的很多貌似现实的东西更现实。为什么？因为很遗憾，目前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也可以说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如果抛开那些是很好的战斗材料，但毫无政治经验的普通的党员，那么现在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又算是个什么呢？它除了讲一些东拣一点、西拣一点的与任何路线、任何指导思想毫不相干的“一套套”空话外，什么实质性的工作也没干。我并不想过于苛求中共中央委员会。我知道不能过于苛求它。但有一个简单的要求：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命令。它执行了吗？没有。之所以不执行，或许是它对命令不理解，或许是它不想执行并欺骗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许是它不会执行。这是事实。罗易就此指责鲍罗廷。这是很蠢的，因为在中共及中共中央的眼里鲍罗廷不可能比共产国际更重要。罗易本人曾指出鲍罗廷没有出席中共代表大会，因为他不得不躲起来……另一些人（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由于同国民党结盟造成的，结盟束缚了中共的手脚，使其不能独立行事。这种解释同样不对，因为

尽管任何一种结盟都会对加入同盟的成员有所约束，但并不是说我们因此就应反对任何结盟。就拿蒋介石统治的从广东到上海的5个沿海省份来说，那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共合作的同盟。但是蒋介石的走狗们在瓦解共产党的“军队”方面，却远比共产党瓦解蒋介石的后方来得成功，对此该如何解释呢？还有，许多工会纷纷脱离了中共，而蒋介石还在继续稳坐江山，这难道不是事实？这就是中共的“独立性”吗？……我认为，原因不在这些方面，虽然它们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原因在于，现在的中央委员会（它的上层人物）是在全民族革命时期锻炼出来的，它经受的是这个时期的洗礼，因此它完全不适应新的、土地革命阶段。中共中央不理解新的革命阶段的意义。中央委员会中没有一个人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头脑，能够了解所发生事件的背景（社会背景）。中共中央不能利用与国民党结盟的宝贵时期大力开展工作，以便公开组织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组织革命军队，使部队革命化，使士兵起来反对将军。整整一年中中共中央靠国民党资助，他们虽然享有工作自由，但却什么也没有干，没能把被错误地称之为党的乌合之众（诚然，挺能战斗）变成一个真正的党……当然，基层工作还是做了。这点我们应当归功于普通党员。但值得注意的是，不是中央接近工人和农民，而是工人和农民在向中央靠拢，然而他们越是靠近中央，这个所谓的中央就越是远离他们，因为这个中央更喜欢把时间消磨在与国民党首脑及将军们的幕后交谈上。有时共产党中央也侈谈什么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这里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它对何谓领导权一窍不通（确实是一窍不通），它扼杀工人群众的主动性，瓦解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将中国的阶级斗争变成一种关于“封建资产阶级”的空谈（现在终于查明，原来这个术语是罗易发明的）。

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的命令才没能得以执行。

正因为如此，我才害怕过早地将这样一个党放入“海洋”中自

由航行（它还没来得及壮大就会被击打得粉碎……）。

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根本问题是党的问题。

怎样整治好这群被错误地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乌合之众呢？召陈独秀或谭平山来无济于事，当然我也不反对把他们找来教训一番。需要采取另外一些措施。应当用中文出版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即出版那种有分量的东西，而不是“宣传品”，为此要毫不犹豫地马上提供必要的款项，决不能拖延（可以向克利姆说，这比在半年之内养活他的100个反革命官吏寄生虫要省得多）。还有，我们在中国军队中建立顾问制花得精力太多了（再说这些顾问政治上并不合格，因为他们从没能及时向我们报告过自己“上司”的反水行为）。现在该在中共中央、中央各部门、每一个省的地方组织、这些地方组织的各个部门以及共青团、中央农民部、中央军事部、中央机关报、中国总工会中真正建立党的顾问制。应当把鲍罗廷、罗易及所有妨碍那里工作的反对派清洗出中国。通常应当派往中国的不是我们不需要的人，而是优秀的工作人员。要让所有党的顾问在自己的工作中形成一个整体，由中央委员会的总顾问（他也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领导。鉴于现在的中央软弱、组织涣散、政治上不成熟，这些“保护人”在现阶段是必不可少的。中央将向党的顾问学习。党的顾问将弥补中共中央及其下属的各地方领导层的重大缺陷。他们（暂时）是将当前的乌合之众组建成一个党的关键。

如此等等。

随着革命及党的不断发展，对这些“保姆”的需要将逐渐消失。

暂且就写这些。

握你们的手！

约·斯大林

附言：接到此信后请告知。同时说一下你们的意见。如你们认为有必要，可将此电交其他政治局委员阅读。

约·斯大林

№ 10864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7年7月11日)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

(1) 季诺维也夫《未来战争的轮廓》一文收到了。你们难道准备刊登这种无知的下流货？我坚决反对。

(2) 政治局关于退出中国国民政府的指示我已读过。我想，很快就会提出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原因是什么，等我回来后再解释。据说有人对我们实施的对华政策表示忏悔。如果这是真的，就太可悲了。我到达之后将尽力说明我们的政策过去和现在始终是惟一正确的政策。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信，无论是我们的对华政策，还是对英俄团结委员会的政策，都是正确的。

(3) 我应该什么时候回莫斯科。

约·斯大林

1927年7月11日

№ 10865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7年7月16日)

1926年7月16日^①

致莫洛托夫

(1) 关于中国问题我回来后再谈。你没明白我信中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不排除有一个间隔时间，但有间隔时间并不意味着近期内就不会出现新的高潮。总之，等我到达后再谈。你们好像已决定把反对派的文件^②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可你们又准备用什么来反驳这些东西呢？难道只有布哈林最近的那篇文章^③？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分发文件是不利的。

(2) 你们急于确定与蒋介石的外交关系，这给人一种不好的印象。是出于对张伯伦的过分谦恭，还是其他诸如此类的原因？为什么这么着急？

(3) 我将于23日星期六早晨回到莫斯科。我原打算晚两天再回来，但这儿的天气开始变坏。

敬礼！

斯大林

① 斯大林写的日期有误，应为1927年7月16日

② 指反对派关于中国问题的声明。

③ 布哈林的文章《中国革命处于急剧转变关头》，刊载在1927年7月10日的《真理报》上。

№10866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9年7月29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

并转中央政治局星期一会议

我坚决反对在政治局对沙茨金^①的文章提出批评后没过几天又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与该文相似的斯滕^②的文章（见《共青团真理报》第169号）。^③这样做或许是《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在干蠢事，或许是对党中央的公开挑战。^④斯滕认为，共青团员（包括党员）服从党的总路线是在“照章办事”，这种观点等于号召修改党的总路线，破坏党的铁的纪律，把党变成争论俱乐部。我们的任何一个反对派集团都正是这样开始自己的反党活动的。托洛茨基是这样开始自己的“工作”的。季诺维也夫也是由此开始的。布哈林也为自己选择了这条路。走上这条路的还有沙茨金、阿

① 沙茨金，Л. А. (1902～1937) ——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委。

② 斯滕，Я. Э. (1899～1938) ——1914年入党。1924～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鼓动部处长，1927～1928年任联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28～1930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副院长。

③ 斯滕的文章题为《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大旗》。

④ 沙茨金的文章《打倒党内的庸俗作风》（《共青团真理报》1929年6月18日）受到政治局7月22日决议的谴责，而沙茨金本人被解除《真理报》编委的职务。7月25日政治局建议《共青团真理报》编委会发表文章，阐述沙茨金文章错误之所在，而共青团中央常务局则讨论加强编辑部的措施。

韦尔巴赫^①、斯滕、洛米纳泽^②集团，他们要求（实质上）拥有修改党的总路线的自由，削弱党的纪律的自由，把党变成争论俱乐部的自由。为此沙茨金、斯滕集团正努力使《共青团真理报》成为（如果还没有成为）自己的战斗机关报。为了这一目的，这个集团也在努力将《青年近卫军》杂志变成自己的理论刊物。为了这一目的，他们让《共青团真理报》与《真理报》相对抗，让《青年近卫军》杂志与《布尔什维克》杂志相对抗。该结束这种荒唐的局面了。该整治和控制一下这个集团了，因为它正在，或者说已经从列宁主义的立场滑到了小资产阶级的（托洛茨基的）激进主义立场上。应当采取行动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这些年轻的同志并为党保住他们。

应当：

（1）立即改组《共青团真理报》和《青年近卫军》杂志编辑部，由党内受过考验的同志主持其工作。^③

（2）对沙茨金、斯滕、阿韦尔巴赫、洛米纳泽集团思想上的动摇不定提出尖锐的批评。^④

（3）指出，斯列普科夫之流^⑤和沙茨金之流是一路货色。

我认为，这个问题越早解决越好。晚了就会把事情搞糟，而且会使党因此失去一批将来也许能成为宝贵干部的年轻同志。晚了将

① 阿韦尔巴赫，Л.Л.（1903～1939）——1919年入党。1929年任《在文学岗位上》和《外国文学通报》杂志编辑。

② 洛米纳泽，B.B.（1897～1935）——1917年入党。1925～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5～1926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30年任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后自杀。

③ 1929年8月15日政治局批准了《共青团真理报》新的编委会。

④ 1929年8月8日政治局批准共青团中央关于《共青团真理报》的决议。建议《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文章，阐述与斯滕和沙茨金的文章中的错误有关的问题。

⑤ 指支持布哈林观点的一批青年理论家，斯列普科夫是其代表。

意味着纵容这批误入歧途的年轻同志分化和腐化我们光荣的革命青年。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约·斯大林

1929年7月29日

№10867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9年8月9日)

莫洛托夫同志：^① 你好！

我和伏罗希洛夫（谢尔戈早已去了纳尔奇克）讨论了你的来信并得出了如下结论。

1. 关于英国。如果韩德逊^② 不再提供新的理由作出让步（这不太可能），那么最好将英国问题放到粮食收购最高潮时，即10月中旬或月底，届时将可以召开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例行会议，届时将听取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并大致通过如下决定：

“（1）同意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做法；

（2）认为没有根据去违反初步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的通行原则，而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今后协调解决一切争议问题、要求和反要求的必要的法律基础；

（3）责成苏联人民委员会一俟互换大使后即组成出席苏英会议的代表团。”

我认为这是我们惟一可以接受的决定。而我们如果接受韩德逊的建议就会搞乱自己并落入别人的圈套。接受韩德逊的建议就意味着：

（1）将使不带任何先决条件承认我国的意大利、德国、法国等

^① 信上有批注：“已阅。米高扬、鲁祖塔克、雅罗斯拉夫斯基、卡冈诺维奇。”

^② 韩德逊，阿·（1863～1935）——1911～1934年任英国工党书记，曾任不管、内政、外交大臣。

感到困惑，并促使它们与我国断绝关系；

(2) 将使美国国内不愿承认我国的势力得到加强；

(3) 将证明与我国断绝关系的保守党人的做法是对的；

(4) 将有助于杰捷尔金格^①之流及张伯伦^②之流将重心由正常的经济关系转向债务、个人要求及宣传问题；

(5) 默认我们不仅要偿还欠英国的，同时还要偿还欠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债务，因为同意韩德逊的建议，就等于开了先例，其他国家势必群起仿效；

(6) 将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反苏阵线。

最糟糕的是，即使我们采纳了韩德逊的建议，我们也达不到恢复关系的目的，因为我们在一切有争议的问题上反正不能都达成一致，同时一切情况均表明，麦克唐纳是想严重违背1924年的协定^③并强迫我们接受一些完全不能接受的条款。

目前韩德逊和麦克唐纳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鄙视他们，因为他们竟想成为一个比意大利法西斯和法德资本家更资产阶级化的政府，而这些国家已不带任何先决条件承认了我国。反过来（如果我们采纳了韩德逊的建议）我们就会被他们攥在手里，因为他们将瞧不起我们，他们就会说，我们并不珍惜和平事业。所以不愿就有争议的问题作出让步，也不认为可以承认苏联。

接受韩德逊的条件就等于钻进敌人为我们设置的圈套。

我认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决定草案是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政府”中的走狗的欺骗行为的惟一可行的答复。

2. 关于布哈林的问题（公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等

① 杰捷尔金格——1929年是英国荷兰一家石油托拉斯经理。

② 张伯伦（1863~1937）——1924~1929年任英国外交大臣。

③ 指1924年8月8日签订的英苏条约。

等)，我们完全赞成你的意见。^①应当把拉柯夫斯基打发到更远的地方去，让他今后没法再在报刊上诽谤布尔什维克。^②我认为布哈林的两封信都是在骗人。看来这位立宪民主党的副教授还不清楚，靠这种骗人的手法是骗不了布尔什维克的。典型的立宪民主党辩护士。

关于《共青团真理报》，情况还不错。

暂且就写这些。握手！

约·斯大林

1929年8月9日

① 1929年7月3~19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0次全会同意联共（布）4月中央全会关于撤销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职务的决定，决定解除布哈林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的职务。

② 1929年8月1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

“1. 指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邮电人民委员部不准发放拉柯夫斯基等人的反苏电报，并建议今后一直不得发放。

2. 建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把拉柯夫斯基流放到中伏尔加河区域或其他区域的边缘县份。此措施也适用于不停止活动的其他著名托洛茨基分子。”

№10868

斯大林就粮食收购问题致莫洛托夫

(1929年8月10日)

莫洛托夫同志：你好！

联共中央关于粮食收购的决定我已读过。^① 尽管这一决定优点不少，但我觉得还很不全面。目前粮食收购工作中的主要危险是：(1) 在粮食市场上或粮食市场周围存在着一大批城市投机商，他们从国家手中抢走农民的粮食，而更主要的是，在粮食持有者中造成惜售气氛；(2) 各粮食收购组织间的竞争，使粮食持有者能摆架子，不出售粮食（为了等一个好价钱），或是将粮食藏起来不及时上交；(3) 许多集体农庄想隐瞒余粮，非法出售。这些因素使我国的粮食收购工作现在（和将来）不能顺利开展，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这些因素会愈来愈增加。因此我们要想在1~2月份结束收购工作并取得这场运动的胜利，就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来消除这种危险。中央的决定首先应该指出这一点。但中央的决定回避了这个问题，即使有所涉及，也只是一笔带过，而且所谈的内容在这个冗长的决定的数不清的其他（次要的）条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担心，这么办我们很难收集到足够数量的粮食。

我提议：

(1) 立即向国家政治保卫局各机构下达立即公开镇压城市（与城市有关的）粮食投机商的命令（即将他们逮捕驱逐出产粮区），

^① 斯大林指的是“关于粮食收购”决定草案，1929年8月15日政治局最后批准，并吸收了斯大林的所有意见。

以使粮食持有者（从粮食收购运动一开始）马上就意识到不能指望投机商，只有将粮食老老实实（无损耗）上交给国家机构和合作社机构。

(2) 立即命令合作社、粮食联合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及司法机构的上层领导查明被揭发出的抢购粮食的粮食收购员，并将其作为偷偷混入我们组织、蓄意破坏工人国家事业的异己分子和耐普曼（我不排除有“共产党员”）立即送交法庭审判（并立即免职）；

(3)（通过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党组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集体农庄实行监督，将那些被揭发出的扣留余粮或是非法出售粮食的集体农庄领导人立即免职，并以欺骗国家、从事破坏活动的罪名送交法庭审判。

我认为，不采取这些及类似的措施，我们的事情就办不了。

否则我们就只是在作口头宣传而缺乏任何具体的粮食收购措施。

请将此信交米高扬一阅。

我希望在这件事上我们之间不会出现意见分歧。

我在第一封信中忘了答复有关“不间断工作周”的问题。^①毫无疑问，应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不要理会乌格拉诺夫^②及其他牢骚满腹的人的不同意见。这将是我们的生产政策及实践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① 政府打算借助于不间断工作周（浮动节假日）强化设备的利用。但这种做法有其消极面，1929年7月22日劳动人民委员部在乌格拉诺夫主持下召开会议，讨论了此问题。次日，乌格拉诺夫给人民委员会送去报告，指出目前不可能施行不间断工作周。

② 乌格拉诺夫，尼·亚·（1886～1937）——1907年入党。1924～1929年任中央书记，1924～1928年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28～1930年任劳动人民委员。1923～1930年任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

暂且就写这些。
握手！

约·斯大林
1929年8月10日

完全同意。

伏罗希洛夫

No 10869

斯大林就经济等问题致莫洛托夫

(1929年8月21日)

莫洛托夫同志：^① 你好！

1. 关于英国。李维诺夫是错误的。李维诺夫不愿弄明白韩德逊用关于解决（而不仅仅是谈判）有争议问题（所有有争议的！）的问题替代了程序问题。如果允许其这样做，就意味着把我们在外交方面取得的成绩一笔勾销，就意味着武装敌人来反对自己，把我们自己赶进了死胡同。在韩德逊发表声明、外交人民委员部作出答复^②之后，不管多夫加列夫斯基^③进行了什么样的谈话，它们（这些谈话）都会被当作是在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从而使我们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我认为，没有必要将这一问题由主席团移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处理，因为，如果韩德逊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主席团自会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不放弃，我们直接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即可彻底解决问题（用不着再经过主席团），“主席团全体会议”就等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这点大家心照不宣。这样一来，你的“强调将问题由主席团移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解决”的提议也就失去了意义。

^① 左上角有米高扬的批语：“已阅。阿·米·”

^② 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苏英恢复外交关系谈判的声明于1929年8月2日在苏联报刊发表。

^③ 多夫加列夫斯基，B.C.（1885～1934）——1908年入党。1928～1934年任苏联驻法国全权代表。

2. 关于阿塞拜疆。^①应当全力支持吉卡洛^②，因为他基本上是对的（从地方老干部中保留一批还有工作能力的人）。与沙茨金把党对右倾分子的胜利看做是他对斯列普科夫之流的胜利一样，阿尔塔克^③和沙图诺夫斯卡娅^④把米尔佐扬^⑤被联共中央委员会解职看成是他们的胜利。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应当把沙图诺夫斯卡娅、阿尔塔克调回莫斯科共产主义科学院（以前他们曾在此工作，后根据“巴库积极分子的决定”返回巴库）。他们在巴库干不了好事。他们能干些什么从克拉斯内发表在《共青团真理报》（《共青团真理报》又一次卷进了与己无关的事情中！）上的那篇蠢话连篇的文章中即可看出。应当留住布尼亚特扎德和阿塞拜疆人民委员会主席。因为作为工作人员，沙图诺夫斯卡娅之流和阿尔塔克之流合起来都抵不上一个布尼亚特扎德。必须任命巴吉罗夫为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主席（尽管他过去犯过错误），因为目前他是惟一能够对付阿塞拜疆农村中气焰嚣张的木沙瓦特分子及伊季哈特分子的人。这是件大事，开不得玩笑。卡苏莫夫可惜了（太可惜了！）。他是我们优秀的工作人员之一，将来极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人才。我请求，在我没参与的情况下对他的去向问题不要作任何决定。

① 1928年底阿塞拜疆共产党拜洛沃-比比-埃巴特区委书记斯塔姆波尔江（党内外号阿尔塔克）和该区委组织部长沙图诺夫斯卡娅反对以米尔佐扬为首的巴库党委，指责他反右倾不力对自己批评估计不足。两人被解除职务。他们向联共（布）中央提出申诉。这一冲突在莫斯科被利用来对阿塞拜疆领导进行清洗。

② 吉卡洛，H.Ф.（1897~1938）——1917年入党。1925年起任党的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书记。1934年起任联共中央候补委员。

③ 阿尔塔克（斯塔姆波尔江），A.A.（1895~?）——1926~1929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拜洛沃-比比-埃巴特区委书记。

④ 沙图诺夫斯卡娅，O.Г.（1901~1990）——1916年入党。1927~1929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拜洛沃-比比-埃巴特区委部长。

⑤ 米尔佐扬，（1897~1939）——1917年入党。1925~1929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书记。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3. 关于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不领导各民族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它没有这个能力。应当认真整顿并改组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可能要推迟到秋天再处理。

4. 伊·尼·斯米尔诺夫的“声明”很卑鄙。我们决不能向这些企图逃避第 58 条的惩罚，然后在莫斯科立足从事破坏“活动”的先生作任何让步。^①

5. 你说得对，布哈林正在堕落下去。这令人痛心，但却是事实。有什么办法，也许这就是“命”。我只是奇怪，他居然想用这种“小把戏”来欺骗党。他是一个带有立宪民主党辩护士倾向的，政治上没有脊梁骨的、书生气十足的草包的典型代表。随他去吧……

6. 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粮食收购的提案。这很好。但我认为还不够。现在的问题是执行政治局的决定。毋需证明，所有收购组织（特别是乌克兰的）都会回避执行这项决定。其次，我担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对政治局的决定一无所知，这项决定卡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部”。因此应当要求各收购组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等机关：

(1) 提供发给各下属机构的执行政治局决定的指令抄件；(2) 每两星期（最好一星期一次）定期汇报执行决定的结果。还应吸收工农检察院—中央监察委员会参与此事。不知你对粮食收购的情况和前景是怎么看的（可能米高扬以为，既然已经作了决定，他的粮仓里就会有 1.3 亿普特的紧急储备粮）。我却认为，我们的粮食收购工作目前并不顺利。你想吧：8 月份的头 10 天我们才完成了计

^① 1929 年在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和斯大林的政策朝左倾之后，许多被流放的托洛茨基分子发表悔过声明，要求恢复党籍，其中就有伊·尼·斯米尔诺夫。1929 年 10 月 30 日政治局接受了斯米尔诺夫的声明。

划规定的15%。即使在剩下的20天内我们完成的不是15%，而是20%，也同样没达到我们目前所应当完成的数额。我担心这样低的速度会影响今后的收购工作。而今年粮食收购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如果失败了，一切都将受到影响。您要是再不狠抓执行中央决定一事，那么这项工作失败的危险性还会增加。^①

7. 请你认真关注乌拉尔的石油开采情况。现已查明，每年提供的钻井设备只有10部。而且钻井工具大部分都是冲击式，而不是旋转式，也就是说掘进速度极其缓慢。这表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乌拉尔油田管理局的“支援单位”——阿塞拜疆中央石油管理局和格罗兹尼油田管理局对在乌拉尔开采石油的态度与诺贝尔对乌赫塔的态度相似。这简直是胡闹，是在犯罪。我认为，应当（1）立即建立专门的托拉斯乌拉尔油田管理局——以使乌拉尔摆脱打算压制乌拉尔采油产量的“支援单位”的控制；（2）派一名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石油工作者主持“乌拉尔油田管理局”的工作，把由“支援单位”——格罗兹尼油田管理局派来的破坏分子多布伦斯基（好像姓多布伦斯基）赶出乌拉尔（把我们没有用的东西给你们吧）；（3）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今年提供40~80部旋转式钻井设备。如果我们不采取类似的措施，开采工作就将受阻（甚至会被扼杀），而我们在乌拉尔也将无法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勘探。^②

暂且就写这些。

握手

约·斯大林

^① 斯大林的所有指示都被吸收进了1929年8月29日的《关于粮食收购进程和贯彻政治局指令的决定》。

^② 1929年9月5日政治局通过“关于乌拉尔油田管理局”的决定。

附言：关于棉花委员会。有消息说，棉花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计划委员会工作人员（特别是棉花委员会工作人员）不相信政治局关于扩大棉花生产五年计划决定^①的正确性，并试图在实际工作中加以破坏，以证明自己是对的。如果情况属实（我认为极有可能），应当说，棉花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想法”是一种最卑鄙的破坏行为，应受到严厉的惩罚。总之，马马耶夫大概不会长期主持棉花委员会的工作。也许他能摆脱棉花委员会旧的因循守旧的传统，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因此中央打算立即将新的、能力强的工作人员增补进棉花委员会是完全正确的。富什曼大概可以做这项工作。哈里东诺夫如能忠于职守也许同样适合。沙敦茨也是非常好的人选，可惜谢尔戈坚决反对。因此最好派赖因霍尔德代替沙敦茨到棉花总委员会工作。派能力相当的其他工作人员顶替富什曼和哈里东诺夫去工农检察院任职。

约·斯大林

1929年8月21日

^① 1929年7月18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棉花总局的工作”的决定，大大提高原先五年计划规定的棉花生产指标。原五年计划规定1932年生产59.4千吨皮棉，而新的指标为78.72万吨。

№10870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9年8月23日)

1929年8月23日

莫洛托夫同志：你好！

(1) 请特别重视建立新的(黑色)冶金厂。我指的是在捷利别斯、马格尼托戈尔斯克等地。有材料表明，这一部门工作进展不顺利。领导黑色金属工业总管理局的是洛卡茨科夫(好像是)。但他只有乌拉尔的经验，即因循守旧的经验，因为乌拉尔冶金工业(黑色冶金工业，高炉生产等等)的管理方式十分落后。他们或者不吸收美国和德国的专家们参与管理，或者只是象征性地准许吸收极少数人参加。而实际上正是这种复杂的工作最需要国外的技术援助。要让古比雪夫和洛卡茨科夫振作起来，并要求他们(开始时这样，以后视情况定)以书面形式报告有关这一部门的情况以及技术援助的性质和规模等。^① 比如说，为什么当时不签订合同让“奥斯丁公司”或其他公司参与新厂的建设？如此等等。

(2) 我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布哈林的决议。决议写得不错。只是发表得似乎晚了些。

(3) 刚刚读了贝斯特良斯基关于同布哈林谈话的报告。我早就料到，布哈林在跌入机会主义泥潭后，肯定会散布谎言，弄虚作

^① 此后关于在黑色冶金工业中使用外国顾问问题曾在政治局多次讨论过。1930年1月10日政治局通过了李可夫提交的“关于在黑色冶金工业中吸收外国技术援助”的决定草案。

假，进行讹诈，因为他找不到其他的论据。关于“文件”、“土地国有化”的说法都是由这个在“实践”中一败涂地的卑鄙的辩护士一手捏造的。如果说布哈林与本届中央存在分歧是由于斯大林的“个性”造成的，那么在列宁生前他与当时的中央间的分歧又是由于什么造成的呢？是由于列宁的“个性”吗？但是为什么现在，在列宁逝世后，他又如此称赞列宁？他与托洛茨基之类的所有叛徒称赞列宁（在列宁逝世后！）是不是都是出于同一目的呢？我们这位辩护士全然搞糊涂了……

（4）我看了沙茨金的来信。这封信写得既怯懦又虚伪。沙茨金将继续自己的“事业”。^①

（5）能否任命克里尼茨基为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事先将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的旧包袱清除干净），同时又让奥拉赫拉什维利留任第一书记的职务呢（没有他的帮助克里尼茨基将很难工作，因为克里尼茨基对当地的语言一种也不懂）？以后会清楚的。

暂且就写这些。

握手！

约·斯大林

附言：李可夫什么时候到？^②

^① 指1929年8月17日沙茨金给联共（布）中央的信，沙茨金在信中抗议共青团中央常务局的决定以及《真理报》就其文章《打倒党内庸人》提出的指责。8月22日政治局批准了共青团中央常务局的决定。

^② 1929年5月16日政治局决定给与李可夫3个月的假期。

№ 10871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9年8月29日)

莫洛托夫同志：你好！

8月27日的来信收到了。

(1) 关于英国。我们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政治局就李维诺夫的提议所作的决定是对的。^① 问题实质不仅在于要争取得到承认，同时又不束缚自己的手脚。问题的实质还在于，我们以揭露“工人政府”为核心的立场是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的呼吁，发动无产阶级对“工人政府”进行革命的批判，有助于对各国（首先是英国）工人进行革命教育的事业，协助各国共产党人以反改良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工人。如果不利用这一“天赐”良机，就是犯罪。李维诺夫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且对此也不感兴趣。但政治局必须考虑到这一切。

(2) 关于中国。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问题不仅仅在于要设法结束“冲突”。问题还在于要以坚决的态度彻底揭露蒋介石政府，动摇其威信，因为蒋介石政府是帝国主义走狗政府，梦想成为殖民地及附属国的“民族政府”的楷模。无疑，蒋介石政府与苏联政府的每一次冲突，同蒋介石对我们的每一次让步（而他已经开始让

^① 1929年8月26日政治局讨论了李维诺夫关于英国问题的建议。政治局委托李维诺夫向英国政府代表声明，如果韩德逊发表谈话，表示愿意同苏联政府的全权代表讨论恢复外交关系的程序问题，苏联政府在谈话中将说明自己过去的立场。

步)一样,都是对蒋介石政府的打击,都是对蒋介石政府即帝国主义走狗的政府的揭露,也是对殖民地工人(首先是中国工人)革命教育事业的推动。这一点李维诺夫和卡拉汉(还有某些人)并没有看到。这对他们很不利。

(3) 总之应当指出,我们应当通过对“工人政府”及蒋介石政府采取的坚定不移的立场来揭露(我们已经揭露了)一连串十分有意思的幕后勾当,从而暴露了(连瞎子也会认清)这些所谓的“人民”政府是直接依附于“自己”(“本国”)以及国际帝国主义的最反动的势力的。这是一项极其重要和必要的革命事业,它将提高苏联政府在各国工人阶级(首先是苏联工人阶级)心目中的威信。不考虑到这一因素,就是对苏联的犯罪。

(4) 反对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沙茨金等人)的运动进展顺利。

(5) 反对右倾分子的思想家,即布哈林的运动同样进展顺利。《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布哈林的文章很精彩。^①

(6) 关于米尔佐扬我同意你的意见。

(7) 最好能将鲁勉采夫^②从巴库调到乌拉尔油田管理局来领导工作。他懂行,能推动工作。^③

(8) 我已往政治局寄去给米高扬的贺信(作为给他的回信),因为你们成功地揭露了格罗曼之流、维诺格拉茨基^④之流以及其他隐藏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统计局等部门的资产阶级政客。应当将他们赶出莫斯科,让年轻人、我们的人、共产党员接替他们的位置。

① 《真理报》1929年8月24日发表题为《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和倾向》的文章,指责布哈林是“倾向分子的主要领袖和鼓舞着。”

② 鲁勉采夫, K. A. (1891~1932) ——1916年入党。20年代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1925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③ 政治局通过斯大林的建议,9月5日鲁勉采夫获得任命。

④ 维诺格拉茨基, H. H. (1900~?) ——1919年入党。1930年为苏联国家计委交换与分配部副部长。

(9) 粮食收购工作进展顺利。对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巴什基尔要实行强硬政策。对试图推卸重大责任的埃赫及其他同志不能作任何让步。如果我们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而不是空谈家，我们就应当并且能够征集到1亿普特的紧急储备粮。至多可以减少5~7百万普特，但不能再多，而且这部分还要从其他地区补回来。如果我们在粮食收购上获得了胜利，那么我们将在一切方面，无论是在对内政策，还是在对外政策，都取得胜利。

(10) 我在纳尔奇克得了病，现在索契开始恢复。

就写到这里。

握手！

约·斯大林

1929年8月29日

附言：刚刚收到（我国）对中国照会的答复文本。看来由于你有点畏怯而让中国人钻了空子。其实当时已经是胜利在望了。中国人关于撤换叶姆沙诺夫和埃斯蒙特的要求被写进了宣言，这样一来就等于说错的是我们，而不是中国人。而我们撤换督办的要求等于说对的是我们（而非中国人），但这一点并未被写进宣言（只是“口头通知”了季尔克先）！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份不顾任何事实说我们不对，而中国人全对的文件（宣言）上签字！这就叫将自己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手下败将。由此我领教了李维诺夫和布哈林的“聪明”。要是中国人在（我们签署的）宣言发表后不同意撤换督办又该怎么办呢？而他们有权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我们所签署的宣言对任命新的督办一事只字未提。到那时你打算怎么办？看来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吞下这枚苦果。可悲，太可悲了。

约·斯大林

No 10872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9年9月1日)

1929年9月1日

莫洛托夫同志：你好！

(1) 从报刊上发表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通报^①上看，我就中国问题提出的责备（见我上一封信的附言）是不对的。看来我没有认真领会这份密码电报的内容。我倒是希望是我错了并准备就责备错了一事道歉。但这并不意味着李维诺夫、布哈林、卡拉汉不再是机会主义者。决非如此！

(2) 我看了关于订购合同制的决定。^② 内容不错。但我想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很快就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将农村中收购的东西全都交给农业合作社（粮食中心等单位），不让消费合作社和粮食中心去从事收购工作，而是将粮食中心变成接收收购来的粮食的单位。这在订购合同制获得成功后的非常必要的。不实行这种改革。竞争及其后果是不可避免的。这事等我到莫斯科后再详谈。

(3) 粮食收购进展顺利。这很好。如果再加上另一个事实，即为第三期工业化债券已收集了4亿多卢布，那么可以有把握地说，工作搞得确实不错。现在最主要的是不能满足于现状，要将工作继

① 通报发表在1929年8月31日的苏联报刊上。

② 1929年8月26日政治局通过“关于谷物订购合同领域工作的基本总结和当前任务”的决定。

续推向前进。

(4) 莫斯科组织在干什么？鲍曼为什么要那样蛮横地敲打波隆斯基？这种不光彩的个人争斗有什么意义呢？

再见！

握手！

约·斯大林

No 10873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9年9月6日)

莫洛托夫同志：你好！

1. 现寄去我刚刚收到的米尔佐扬的来信。你知道，从党的利益出发，我不主张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实行“姑息”政策。但是应当说，将米尔佐扬置于死地并不符合党的利益。^①

似乎你在日前给我的来信中正是从这一角度谈论米尔佐扬一事的。要重视他的来信并满足他的请求。

我考虑不妨让米尔佐扬担任彼尔姆（乌拉尔）区委书记，并对其委以发展乌拉尔石油事业的重任。他熟悉石油业务，他和鲁勉采夫（我提议让鲁勉采夫担任乌拉尔石油管理局局长）合作一定能搞好乌拉尔的石油工作。乌拉尔的石油开采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这一点我们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人却不愿搞清楚。

2. 在祖巴列夫的问题^②上我之所以赞成卡巴科夫和奥什温采夫的意见，出于两点考虑：（1）乌拉尔对苏联来说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但那里却极缺乏负责工作人员，决不能“没完没了地抢劫

^① 1929年9月30日根据政治局的决定米尔佐扬被派往乌拉尔担任党的负责工作。

^② 祖巴列夫原先被任命为乌拉尔北边区组织委员会主席，1929年9月12日根据莫洛托夫的建议，政治局决定把他留下。

乌拉尔”；(2) 祖巴列夫是一位农业专家，但严格地说，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没有农业。

再见！

约·斯大林

1929年9月6日

No 10874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9年9月9日)

莫洛托夫同志：

9月6日的来信收到了。

(1) 对英国问题不要操之过急。韩德逊目前比我们更需要恢复关系。现在危险的不是已被我们逼到墙角的韩德逊，而是过于相信怀斯等坏蛋的李维诺夫。尤为危险的是奉劝我们给韩德逊以“真诚”答复的“我们的”巴黎“顾问”。这是一群韩德逊的代理人，他们为英国政府通风报信，同时又用假情报欺骗我们。简而言之，我们决不放弃自己的立场。请注意，我们不只是在同一个英国作斗争（与敌人谈判就是一种斗争），而是在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作斗争，因为麦克唐纳政府是各国资本主义政府的急先锋，它用一种“新的”、更“巧妙”、更隐蔽，从而也更“有效的”方式来“损害”和“扼制”苏联政府。麦克唐纳政府想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证明，它能从我们这里得到（借助于“温和的”办法）比墨索里尼、彭加勒、鲍德温更多的东西，它能成为比资本主义的夏洛克更厉害的夏洛克。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本国（而且不仅仅是本国）资产阶级的信任。如果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地对这伙厚颜无耻之徒说“你们休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任何东西”，那我们就真成了最无用的人了。

(2) 要坚决制止鲍曼将组织拖进无原则的斗争中，拖进“个人之间”的斗争中。正因为如此（至少暂时），不应当触动波隆斯基。

关于日丹诺夫、波斯特舍夫和鲁勉采夫，最好等到秋天再说。

(3) 如果雅罗斯拉夫斯基开始作为（据说已经开始）《真理报》实际责任编辑进行活动，可不太妙。这对我们的事业来说是危险和有害的，因为虽然他有许多非凡的才干，但在政治领导方面很弱（他喜欢跟着“群众”情绪随波逐流）。千万别弄成实际上领导《真理报》的不是雅罗斯拉夫斯基，而是像季诺维也夫一类或是季诺维也夫的一个门徒那样的人，因为他们对雅罗斯拉夫斯基极尽奉承之能事，而对列宁格勒组织则心怀不满。请注意，这种危险并非是完全不现实的。不管怎样对列宁格勒组织的议论已引起人们的怀疑。^①

(4) 关于李可夫的决定是对的。

握手！

约·斯大林

1929年9月9日

附言：差点忘记说了。必须拒绝斯米尔诺夫、瓦加尼扬、姆拉奇科夫斯基^②等人的新声明（新的！），因为这个声明不仅不能为我们所接受（那还用说！），而且它还是利用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软弱和对他们的信任进行反党活动的厚颜无耻的反革命分子的文件。应当禁止雅罗斯拉夫斯基与这伙无耻之徒接触，这些人利用他的软弱用“新的”、“章程的”原则来组建反革命派别。我们党内不需要这样的人。你们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呢？

^① 1929年9月1日《真理报》发表关于列宁格勒党组织压制批评的材料。这以后列宁格勒开始了自我批评运动。

^② 姆拉奇科夫斯基，C.B.（1888～1936）——1905年入党。1920～1925年任乌拉尔军区司令，以后是西西伯利亚军区司令。1927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缝纫机管理局局长。1927年因从事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

另外，我坚决抗议不顾政治局的决定^① 而让季诺维也夫担任《真理报》的一个常任编辑（和领导人？）。难道就不能停止这种荒唐行为吗？这是谁的过错？是不是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为什么你能容忍这种政治上的腐化行为？

约·斯大林

^① 1929年5月9日政治局审议了关于5月8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和《共青团真理报》上的文章问题，并决定：“就发表季诺维也夫同志关于柏林事件的文章警告《真理报》和《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未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不得发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文章。”

№10875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9年9月9日)

9月9日

维亚切斯拉夫：

(1) 务必将波柳多夫^① 开除出交通人民委员部。这个家伙在新的铁路建设方面总是把中央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弄糊涂，他身上没有一点（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他现在交通人民委员部负责（新的）建设项目。可他算是什么建设者？难怪西伯利亚与欧俄之间铁路复线的建设毫无进展。一定要把这个一贯违背中央决定并经常嘲弄中央政治局的反党分子清除出交通人民委员部。^②

(2) 其次，为什么让乔尔内^③ 呆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里？干吗不把他调去干别的工作？^④

约·斯大林

① 波柳多夫，E.B.（1887~？）——1907年入党。1927~1931年任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31年10月起任俄联邦财政人民委员部处长。

② 1929年12月30日中央组织局决定解除波柳多夫的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职务，调任苏联驻柏林商务处委员会委员。1930年1月5日政治局取消此决定，把他留在交通人民委员部。

③ 乔尔内，B.H.（1891~？）——1918年入党。1929年3月起任科研管理局局长，1930月起任水运联合管理局局长。

④ 1929年9月18日书记处决定乔尔内任培养科学工作者委员会副主任。

No 10876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和奥尔忠尼启则

(1929年9月13日)

莫洛托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你们关于自我批评的密码电报收到了。你们的建议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一来各级党组织就有可能将中央的专门决定和莫洛托夫的发言理解为（一定会理解为！）一种向后倒退的新方针，即号召“在自我批评方面向后倒退”，自然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而且必将破坏中央（及莫洛托夫）在优秀党员中的威信，从而有利于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

在《真理报》上发表反对列宁格勒领导人（即反对基洛夫、科马罗夫）^①的文章（特别是文章的形式）是个大错误。有人（即党的敌人）想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列宁格勒的上层领导不愿改正缺点（毫无根据！），抵制自我批评，不接受这种形式（毫无根据！）。而《真理报》的糊涂虫们竟相信了。于是他们为了博得党的敌人的欢心而“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忘记了，列宁格勒组织不是索契或者阿斯特拉罕或者巴库组织。他们忘记了，攻击作为中央的可靠支柱的列宁格勒组织的上层领导就是攻击中央的心脏……中央的失误就在于一时放松了对《真理报》编委会常务委员会的控制，忽略了在常务委员会中还有一位具有目光短浅这一特长的、抵制自我批评的

^① 科马罗夫，H.И.（1886～1937）——1909年入党。1926～1929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和列宁格勒执委会主席。1930～1931年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31年起任俄联邦公用事业人民委员。1921、1923～1934年为联共中央委员。

干将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于《共青团真理报》及各地方刊物中。

中央书记处应当**重新掌舵**，应当对《真理报》及《共青团真理报》实行监督，应当**改变**这些报刊上自我批评的调子和精神，这样一切才会步入正轨。

祝一切顺利！

握你们的手！

约·斯大林

1929年9月13日

№10877

斯大林就李可夫的讲话致莫洛托夫等

(1929年9月30日)

致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①

(1) 李可夫的讲话你们看过了吗？我认为，这是一个假装“忠顺”和“同情”苏维埃的非党苏维埃官员的讲话。只字不提党！只字不提右倾！只字不提党的成就（李可夫现在无耻地把这些成就算在自己的账上）是在同包括李可夫在内的右倾分子的斗争中取得的！我们所有发言的负责工作人员一般都认为自己有责任谈一谈右倾分子，有责任号召同右倾分子作斗争。而李可夫竟像没有这个责任似的！试问，这是为什么，有什么理由？你们怎么能容忍（也就是包庇）这种政治上的伪善态度呢？你们是否明白，你们容忍这种伪善态度，就会造成李可夫已脱离右派的假象，从而使党产生错觉？而众所周知，李可夫过去和现在都不想脱离右派。今后是否应该让李可夫作出抉择：要么公开地老老实实地同右派和调和派划清界限，要么失去代表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讲话的权利。我认为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是中央不能拒绝的最起码的要求，要是中央不想冒否定自己的危险的话。

(2) 听说李可夫仍然每星期一和星期四在你们那里主持会议。

^① 左上角有莫洛托夫的批语：“完全同意所述的一切。李可夫的讲话我没有读，仅浏览了标题。打算去读。不过，现在我也看到，斯大林是正确的。只有一点不同意，即说我们‘包庇’李可夫。不过，还是应当按照斯大林的意见改进。维·莫洛托夫。10月3日”

这是真的吗？^① 如果是真的，那你们为什么容许这种闹剧？谁需要这样做，为了什么？不能结束这种闹剧吗？难道还不到结束的时候吗？

（3）我打算在索契再住一个星期。你们的意见如何？如果你们要让我回来，我可以立即返回。

敬礼

约·斯大林

1929年9月30日

^① 指李可夫主持政治局会议。

No 10878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9年10月7日)

莫洛托夫：你好！

10月4日的来信收到了。

(1) 英国问题处理得确实不错。韩德逊输了。李可夫、布哈林以及李维诺夫也都输了。他们看不到苏联的影响和实力在加强，看不到目前国际关系中所发生（以及将要发生）的变化。

(2) 中国问题有点麻烦。我认为我们应当转向在满洲组织起义的革命运动的观点。我们将一些部队派到满洲去完成某些局部性任务当然是件好事，但这还不够。我们现在应当抓更重要的事。我们需要组建两个以中国人为主的、编制各为两个团的旅，向他们提供一切必需品（如火炮、机枪等），让中国人任旅长，将他们派往满洲，并交给他们如下任务：在满洲军队中策划起义，将满洲军队中可靠的士兵收编入队（其余的遣送回家，提前将指挥人员处理掉），将旅扩编为师，占领哈尔滨，积蓄力量，推翻张学良，建立革命政权（打倒地主，争取农民，在城市和农村建立苏维埃等）。必须这样做。这一点我想我们能够并且也应该做到。这件事与任何“国际法”都不矛盾。所有的人都明白，我们反对同中国进行战争，我们的红军战士只是在守卫我国的边界，并不想进入中国的领土，而如果满洲内部爆发起义，则都是张学良统治下完全可以理解的结果。你考虑一下这件事。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3) 工业学院支部的速记记录我看过了。不得不把问题提到中

央全会去。应当考虑将布哈林赶出政治局。

(4) 我看了政治局关于李可夫的决定。决定很正确！当然我们要对这个决定承担责任。关于这一点等我回来后再谈。

(5) 收购工作进展顺利。但不能满足，应当继续抓紧，否则将前功尽弃。

(6) 总之应当承认，你们的工作（也就是我们的工作）目前开展得不错。这很好。

过几天我将回到莫斯科。

握手！

约·斯大林

1929年10月7日

№10879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不晚于 1929 年 11 月 17 日)

莫洛托夫：

应当在即将颁布的（关于控制数字的）主要决议中加上一条，
即宣传或维护右倾观点与党员身份不相容。

№ 10880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9年12月5日)

莫洛特什泰因：你好！

你怎么像熊钻进窝似的毫无消息？你那儿情况如何？是好是坏？盼告。

我们的工作暂时还算顺利。

(1) 粮食收购工作在继续进行。今天我们决定将应急储备粮增加到1.2亿普特。我们提高了像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哈尔科夫等工业城市的供应标准。

(2) 集体农庄运动发展迅猛。当然，机器和拖拉机不够用（肯定不够！），但只要把农民的农具简单地联合在一起就能使播种面积大大提高（有些地区提高了50%）。下伏尔加边疆区60%的农户正在走上（已经走上！）集体农庄的道路。我们的右倾分子惊得目瞪口呆……

(3) 关于我们的对外工作或许你已经知道。中国的问题应当能处理好。看来我们远东军队的小伙子把他们着实吓了一跳。我们刚刚收到了张学良关于他“完全赞成”蔡与西马诺夫斯基^①“协商结果”的电报。美、英、法的干涉企图被我们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布尔什维克！我想中国的地

^① 西马诺夫斯基，A.A.（1874～？）——1917年入党。1921～1926年任苏联驻瑞典大使馆一秘。1926～1930年任苏联外交部驻远东代表。1930年起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副主任。

主们是不会忘记远东人给他们的深刻教训的。我们决定在我们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从中国撤军。请读一下李维诺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①，讲得很精彩。

(4) 有关新的任命想必你已从报上知道了。其中新的任命有：任命托姆斯基作古比雪夫的副手（古比雪夫认为这样做肯定会有好处——这看来不无道理）；任命施瓦尔茨^②为煤炭“联合企业”主席（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

(5) 右倾分子（三人团）还在工作，而且暂时不管闲事。李可夫想调雅柯夫列娃做自己的办公厅（“品茶协会”！）主任，但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把戏”。^③

暂且就写这些。

握手！

约·斯大林

1929年12月5日

① 1929年12月4日李维诺夫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次会议上的报告。

② 施瓦尔茨，H.H.（1879～1951）——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30年任全苏南方煤炭联合企业经理。1924～1934年为联共中央委员。

③ 1929年12月20日雅柯夫列娃被任命为俄联邦财政人民委员。

No 10881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9年12月25日)

维亚切斯拉夫：你好！

你的第一封来信当然早已收到。我知道你心里在骂我不给你回信。你当然有权这样做。可是请你设身处地想一想：我忙得不可开交，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真是这样）。总之，我会及时给你回信的。

(1) 《真理报》编辑部情况不妙。好像那里的一切都被科瓦廖夫^①和瑙莫夫（两人过去都是托洛茨基分子）及几个工作人员（机关人员）所控制。波波夫^②已被科瓦廖夫拉了过去。而克鲁敏^③仍然在“随波逐流”。或许这种情况还可以再忍上一段时间，但问题在于科瓦廖夫为人“愚昧”、“古怪”，不完全是我们的人（据说他对季诺维也夫分子有好感）。施略普尼柯夫的文章没卡住登出去了^④；再早些时候弗鲁姆金的文章也放出笼了；而现在又是瑙

① 科瓦廖夫——《真理报》党务部主任。1929年6月10日起为该报编委，1929年7月28日起当选《真理报》党支部书记。

② 波波夫，H.H.（1891～1938）——1919年入党。1922～1932年任《真理报》编委。1933～1937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1930年起为联共中央候补委员。

③ 克鲁敏，Г.И.（1894～1943）——1909年入党。1919～1928年任《经济生活报》编辑。1928年起任《真理报》编委。1930年起任《消息报》编辑。

④ 施略普尼柯夫的文章《拥护工业化——拥护社会主义》刊载在1929年12月16日的《真理报》上。

莫夫的文章^①！他们还打算让皮达可夫最近的一篇文章出笼，幸亏我和卡冈诺维奇及时抓住了这件事并及时（在深夜）对皮达可夫的文章中某些“含糊”之处作了修改^②。今天我们将处理施略普尼柯夫的问题。至于弗鲁姆金，这是很早以前的事，我认为可以等到有更合适的时机再求解决。恐怕得把科瓦廖夫一伙人解职……

(2) 关于军事问题（工农检查院关于炮兵部的通知）近日内我们将根据陆军人民委员部已采取的关于消除缺口的措施通过一项政治局决定。^③ 我们认为这件事用不着过分宣扬。决定将以特别案卷渠道下达。

(3) 卡冈诺维奇答应促一促为米哈伊洛夫（列宁格勒人）这类人办培训班一事。

(4)（杰索夫、科马罗夫）反对基洛夫的坏事反而有助于加快肃清列宁格勒组织中的官僚主义分子。^④ 真是有祸必有福！据目击者说，列宁格勒州委痛快地接受了中央的决定。这是事实！在这件事上科马罗夫的官僚主义、中央的威信以及看米基洛夫最近一段时间在列宁格勒赢得的组织的极大尊敬都起了作用。科达茨基、阿列克谢耶夫、洛博夫、谢尔加宁（虽然不像其他人那样坚决）马上与杰索夫、科马罗夫划清了界线。列宁格勒人想推举科达茨基当主席。^⑤ 中央的这项决定也将以特别案件渠道下达。

(5) 中国问题想必你已经知道了。美国对中国的干预有点自讨没趣。

① 施瑙莫夫的文章没有在《真理报》上发表。

② 皮达可夫的文章《拥护领导》刊载在1929年12月23日的《真理报》上。

③ 1930年1月15日政治局通过决议，责成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本改善军队的技术装备和更新装备。

④ 指列宁格勒领导内的冲突。

⑤ 1930年1月7日政治局通过列宁格勒州委的建议，解除科马罗夫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和州执委会主席的职务，由科达茨基接替。

(6) 我们打算在近几天内通过关于集体农庄建设速度的决定。^① 雅柯夫列夫的委员会提出了一份草案。我觉得这份草案不太合适。你手头大概也有一份。请电告你的意见。

再说一遍：我答应按时写信。

紧握你的手！

约·斯大林

1929年12月25日

^① 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措施的决定。

【专题说明】

伊斯特缅《列宁死后》 一书引起的政治风波

(1925年6月至8月)

1924年列宁逝世后围绕所谓列宁遗嘱问题在俄共上层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当时党的多数领导人不同意发表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即所谓列宁遗嘱，但其内容已经在相当范围内传开。

麦克斯·伊斯特缅是美国记者、美共党员。他精通俄语，其妻是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柯的姊妹。他根据在莫斯科搜集到的资料，写作并于1925年在美国出版了《列宁死后》一书，其中涉及列宁逝世前后俄共上层展开的党内斗争，介绍了列宁1922年12月24日及1923年1月4日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基本内容。由于其中许多内容涉及托洛茨基，俄共政治局多数派要求托洛茨基写文章予以驳斥。据此，托洛茨基写了《关于伊斯特缅〈列宁死后〉一书》，同时克鲁普斯卡娅也奉命发表了《致〈Sunday Worker〉报编辑部》。下面刊载的是一组有关文件。

(本专题文件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刘尔勋和夏风)

№11876

斯大林致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 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

(1925年6月17日)

今年5月8日政治局收到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声明是写给《星期日周报》“埃里克·维尔涅”，回答他的下述问题：出版了伊斯特缅的《列宁死后》一书，被资产阶级报刊广泛引用，其中托洛茨基同志被描绘成“阴谋的牺牲品”，而此书的读者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他托洛茨基对民主和贸易自由怀有好感，为此埃里克·维尔涅请求托洛茨基作出相应的解释供该刊发表。

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发表在1925年5月9日《真理报》第104号上。我个人那时没有注意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因为对伊斯特缅的书没有概念。

1925年5月9日，英国共产党中央由英克平同志签署就上述伊斯特缅的书向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质询，请求托洛茨基同志对伊斯特缅的书发表看法，因为如英克平同志对托洛茨基同志所说，共产国际的敌人在利用您对俄共的立场。

下面是英克平信的全文：

“1925年5月9日。致列·托洛茨基同志。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英国共产党中央委托我给您随信寄去一本麦克斯·伊斯特缅的书《列宁死后》，以及刊有该书书评的《新领袖》、《Лэнсберис Уикли》、《工人杂志》。这些书评显示，在我国的共产国际敌人是如何利用您对俄共的立场的。

我党中央认为，如果写出对这些评论者的答复并寄给我们，那是大有好处的。这样的文章还会有益于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我们会尽全力使之广泛传播。致共产主义的敬礼！总书记英克平。”

托洛茨基同志回答英克平同志如下：

“亲爱的英克平同志：您5月9日的信，看来是在伦敦收到我给《星期日周报》的答复之前写的。

我希望，我的小册子《英国向何处去？》充分回答了和平主义、费边社分子、议会生意人、市侩和麦克唐纳们利用我党所发生的这一那一事件，去证明改良主义压倒共产主义、民主压倒无产阶级专政的所有企图。

一俟我的小册子通过我党中央的审查，我立即把手稿寄上。

致共产主义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5年5月21日”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同志于1925年5月19日给斯大林并政治局一封信，信中没有给英克平同志提出的问题以直接的答复，仅限于引用其小册子《英国向何处去？》中的与英克平同志的问题毫无关系的引文。

下面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信：

“致斯大林同志。尊敬的同志：为避免误解，我认为有必要就英文书籍麦克斯·伊斯特缅的《列宁死后》（我刚收到，只来得及浏览一下）一事向您通报如下：

我认识伊斯特缅是在共产国际的一次早期国际大会上，他的身份是美国共产党人。

伊斯特缅在3~4年前请求我给予他写我的传记以协助。我拒绝了他，建议他从事其他较有普遍意义的工作。伊斯特缅给我写了

一封信，证明用传记，而不是通过对理论或者历史的阐述来使美国工人对共产主义发生兴趣；他和其他美国作家想使某些俄国革命家的传记成为共产主义宣传的武器。伊斯特缅请求我给他提供必要的资料，并在以后读一读手稿。我回答他说，鉴于他的解释，我没有理由拒绝向他提供必要的资料，但坚决拒绝阅读手稿，以免因此对传记承担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后来我向伊斯特缅提供了涉及我头22年的生平资料，即到1902年我到达伦敦的时候。我知道，他访问了我的亲友和学校同学，收集那一时期的资料。看来，这些资料使他得以写成《列·托洛茨基。青年肖像》一书，关于此书的广告印在《列宁死后》的封面上。

我最后一次见到伊斯特缅应在一年半以前，此后就再也不知道其情况了。关于他打算写涉及我党争论的书，对此我一无所知。而且他为收集关于我青年时代资料见到我的时候，他本人当然也没有这种念头。

无须多说，他不可能从我这里或者通过我获得任何党内文件。不过伊斯特缅的俄语读说的能力都很好，在我们党内有很多朋友，不久前有人告诉我，他还娶俄罗斯的女共产党员为妻，因此能自由接触到我党的所有出版物，看来，其中也包括在各地分发的文件、分发给党的第13次代表会议代表的文件，等等。他引用的这些文献是否准确，是否听来的，我没有核对过。

英国孟什维克的报刊企图利用伊斯特缅的书来反对共产主义（英国共产党书记给我寄伊斯特缅的书的时候，还寄来3期孟什维克出版物评论此书的文章）。那时候《星期日周刊》应当刊出我的电报（关于此事《每日先驱报》曾提及）。我想，我的小书《英国向何处去？》在目前情况下是非常及时的，可以消除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报刊散布许多幻想和是非。我准备对英文版作必要的补充。

伊斯特缅《列宁死后》一书引起的政治风波

我在私人谈话中对您说过，我已经将近半年没有收到共产国际的文件了。例如，我就不懂特伦向我提的“质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把罗斯梅尔和莫纳特开除出党，不知道他们同党发生了什么意见分歧，不知道他们出版了什么东西，到底出版了没有。

致共产主义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5年5月19日”

只是在托洛茨基同志的这封信之后，只是由于托洛茨基同志顽固地不对英克平同志提出的关于利用伊斯特缅的书反对俄共的问题作出直接回答的情况下，我才清楚，必须立即了解一下此书的内容。

读了伊斯特缅的这本书，使我坚信这本书写得不简单，它的目的是败坏苏联政府和俄共中央的声誉，为此目的伊斯特缅进行了一系列造谣污蔑，利用了托洛茨基的威望及自己同他的“友谊”，以及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公布过的某些机密文件。使我特别吃惊的是伊斯特缅关于他同托洛茨基同志就所谓列宁“遗嘱”及关于“中央主要人物”问题“谈话”的声明，还有他关于所谓列宁“遗嘱”的真实性得到“俄国3个负责共产党人”的证实的声明，我（即伊斯特缅）同他们分别谈过，他们不久前读过此信，记得最重要的语句。

我开始明白，得知这一切以后，如果对托洛茨基同志同伊斯特缅及其《列宁死后》一书的关系表示沉默，那不仅不能容许，而且简直是犯罪。

为此我同中央书记们商量之后，采取措施把伊斯特缅的书翻译成俄文，把译本分发给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听取他们的处置意见。

对我来说下列事实是值得注意的，这时候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和

社会民主党已经开始在国外的出版物上利用伊斯特缅的书来反对俄共和苏维埃政权，他们利用这个机会依据“共产党人”伊斯特缅，托洛茨基同志的“朋友”和“交谈者”，提供的“证词”来污蔑苏维埃政权领导人，说统治俄国的是一小撮篡位者和骗子。

对我来说毫无疑问的是，伊斯特缅的书是一本谤书，它会给世界反革命势力带来（已经带来）极大的好处，而会给整个世界革命运动造成严重的损失。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托洛茨基同志对伊斯特缅的书不能保持沉默的原因，伊斯特缅在自己的书中污蔑俄共和苏维埃政权领导人的时候往往援引托洛茨基同志的东西。

在目前时刻我不建议托洛茨基同志就伊斯特缅书中涉及的原则问题，即构成我们分歧的原则问题，在报刊上发表实质性意见。谁对，谁的政治立场正确，是中央的立场还是托洛茨基的立场，关于这一切让党和共产国际去评判。

但托洛茨基同志作为一个党员、一个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有最起码的责任和道义义务，这是托洛茨基同志不能也不应当推卸的。这起码的东西要求托洛茨基同志在报刊上毫不含糊地反对对众所周知的事实的歪曲，反对伊斯特缅在书中旨在败坏俄共威望的歪曲。因为很清楚，在目前情况下托洛茨基同志的沉默只能看做是证实或掩盖这些歪曲。

我认为，托洛茨基同志至少应当驳斥下述歪曲：

1. 伊斯特缅的小册子中“对老近卫军的攻击”一章中说，“托洛茨基的信（指因中央政治局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而于1923年发表的告各区书。——斯大林）以及小册子形式的某些文章实际上被政治局停止传播。”

其次，伊斯特缅小册子第9章说，“在他们（即俄共政治局。——斯大林）确信自己的手法能取胜之前，托洛茨基的书（指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和《十月的教训》。——斯大林），实际上被政治局禁止了。”

最后，伊斯特缅书的第14章中说，“托洛茨基的原文没有在公众中出现以驳斥他们（即中央。——斯大林）的声明。这些文本是由那些面对国家刺激和支持的普遍的歇斯底里保持勇气和远见的人凭良知秘密刊印的。”我想，托洛茨基应当驳斥伊斯特缅的这些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恶毒污蔑。因为托洛茨基同志不能不知道，无论在1923年争论期间，还是在1924年争论期间，不论在任何时候，中央都没有阻拦托洛茨基文章和书籍的出版。

其中，托洛茨基同志不可能不记得，在1923年争论期间他本人在其著名的声明中表示拒绝在报刊上回答党内多数派代表的不同意见。他也不能不记得党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下述《编者按》的声明：

“一些同志问，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不回答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批评，《真理报》编辑部谨通告，迄今为止编辑部没有收到托洛茨基或者其亲密的志同道合者任何回答对托洛茨基主义批评的文章。”（见1924年12月13日《真理报》第284号）

2. 伊斯特缅小册子第2章说，俄共领导人“隐瞒了列宁本人的文章”，第9章还说，他们，即党的领导人，“给他（即列宁）最后留给党的最后遗言套上书报检查的笼头”。

我想，托洛茨基同志也应当驳斥伊斯特缅这种污蔑党的领导人，污蔑中央及其政治局的这些说法。因为他像全体中央委员一样，清楚地知道，伊斯特缅的说法同实际情况完全对不上号。

3. 在小册子第2章中伊斯特缅说，“所有出席政治局会议的人，包括书记们，不仅反对列宁建议的政策，而且还反对他的文章”（指列宁的文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斯大林）。

我想，托洛茨基同志也必须反驳伊斯特缅的这种显然污蔑之

词。因为，他不能不记得，第一，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所发挥的计划，那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讨论；第二，列宁文章中有谈到中央可能分裂的著名语句，这可能引起个别党组织的误解，为此政治局那时召开了会议。托洛茨基同志不会不知道，政治局那时决定在刊印列宁文章的同时向各党组织散发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的一封信，说明列宁的文章不应引起中央有分裂分子的想法。托洛茨基同志不会不知道，刊印列宁的信的决定，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关于中央内部不存在分裂的事实的信，是一致通过的，说什么政治局关于公布列宁文章的决定似乎是在托洛茨基同志的压力下通过的，这是可笑的胡说八道。

此信是这样说的：

“给省委和区委的信。亲爱的同志们：1月25日《真理报》第16号刊载了列宁同志的文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这篇文章中有一部分谈到我党中央的作用以及采取组织措施，以排除如果由于新经济政策发展起来的新的条件，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出现复杂化，中央出现的分裂的可能性，或者使分裂变得极其困难。某些同志请政治局注意，列宁同志的这篇文章可能被地方同志解释为，似乎中央最近的内部生活中出现某种分裂的倾向，所以促使列宁同志提出文中所说的组织建议。”

No 01105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5年8月1日)

1925年8月1日于索契

莫洛托夫同志：

1. 我听说曼努伊尔斯基故意把托洛茨基文章的初稿交给《人道报》发表。如果属实，那就太不像话了。如果属实，那就不是你来信所说的那种“错误”，而是不知何故不愿发表托洛茨基文章定稿的某些人的政策。这是毫无疑义的。这件事不能就这样放下不管。我建议把问题提交七人小组^①并谴责曼努伊尔斯基的不能容忍的行为，因为他的行为使俄共和《人道报》都处于尴尬的境地，同时必须查明究竟是谁唆使曼努伊尔斯基干这种卑劣行径的。为使你知道情况现告知一些必须知道的事实：(1) 文件是根据曼努伊尔斯基的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在中央档案库）并经七人小组同意（向曼努伊尔斯基提供文件是季诺维也夫在七人小组中提出的）交给他的；(2) 文件交给他时，托洛茨基的文章还未最后定稿；(3) 文件交给他是为了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层了解情况，而不是为了发表（顺便提一下，请看看曼努伊尔斯基的书面申请）；(4) 发表文件即发表我关于伊斯特缅的书的便条的问题七人小组讨论过，而

^① 七人小组——1924年8月俄共多数中央委员召开会议，宣布自己是领导集体，把托洛茨基排除在外，从政治局委员中选出执行机关“七人小组”，其成员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七人小组”定期在政治局会议之前召开会议，事先决定所有原则问题。

且我们全都认为我的便条应在托洛茨基的文章的定稿发表后再发表，这一点曼努伊尔斯基是知道的；(5) 在曼努伊尔斯基动身赴德国之前（7月初或6月末），我请曼努伊尔斯基把全部文件交还中央书记处，他表示同意，却不但不还，反而随身带走。事实就是这样。恳请七人小组将此事一抓到底，从而杜绝这种卑劣行径在我们党内发生。

2. 我不同意七人小组关于只发表托洛茨基文章的定稿的意见，第一，还应当发表克鲁普斯卡娅的文章^①。第二，在发表托洛茨基的文章后完全可以发表某些文件（其中包括我关于伊斯特缅的书的便条），以证明托洛茨基只是由于俄共的压力才写的文章（否则托洛茨基倒成了挽救党的威望的英雄）。

3. 最后请告我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有关伊斯特缅的文章的情况，文章是否已在英国发表。我问了三次也未见回音。

4. 你至今尚未答复我关于第聂伯工程的信。你可将答复口头转给托夫斯图哈，——由他写信给我。

5. 我不相信托洛茨基“没有读过”你分发给政治局委员的伊斯特缅的文章。托洛茨基在装腔作势。

6. 托洛茨基对德国代表团的“回答”我读过了^②。我不完全赞同他的谈话。《真理报》赞同他的谈话吗？这是托洛茨基集团的纲领。

7. 我的身体逐步好转。马采斯塔温泉的泉水（索契附近）对于治疗硬化、神经紧张过度、心脏扩张、坐骨神经痛、痛风、风湿

① 指克鲁普斯卡娅的文章《致〈Sunday Worker〉报编辑部》，载《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16期第71~73页。

② 1925年7~8月德国工人代表团访问苏联。7月25日代表团访问了租让总委员会，在这里会见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对代表团提问的回答刊登在1925年7月19日的《真理报》上。

病效果很好，你最好把妻子送到这里来。

握手！

约·斯·

№01106

斯大林致“七人小组”

(不早于1925年8月1日)

七人小组：^①

七人小组曾经作出决定，等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关于伊斯特缅的文章和信在国外刊物发表之后即在国内刊物上予以发表。鉴于文章和信已在国外发表，而我们不知为何却未发表，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下。在目前时刻，当曼努伊尔斯基把一切全都搞乱了，不由自主地提出了托洛茨基文章的真假问题的时候，发表上述文章和信尤为重要。如果我们发表了这篇文章，那么真假的问题自然就消失了。而这对党，不光是对我们的党，而且对外国共产党，尤其是对英国和美国共产党，都将是有利的。

约·斯·

^① 右上角有莫洛托夫所写的：“1925~？”。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01107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5年8月9日)

1925年8月9日于索契

把信读给布哈林听。

莫洛托夫同志：

你8月5日的来信收到了。

1. 看来，在你收到我关于任命什维尔尼克或其他什么人为组织分配部部长的信之前就已经任命了格伊^①。对于格伊我们确实有过争论，但后来我改变了自己的意见，并通知了你，但遗憾的是为时已晚。也好，让我们看一看格伊的表现。两次通过的决定现在根本没有改变的必要。

2. 关于第聂伯工程。我感到有些不安，因为对这样一个耗资数亿的事情，人们打算轻率地作出决定。应当趁为时不晚采取预防措施，同时应努力使这件事的利益不受到损害，不因捷尔任斯基和托洛茨基可能会有些不快而止步不前。问题应由七人小组来决定。

3. 至于曼努伊尔斯基，那么这里存在着某种误解，甚至讹诈。我再次声明：(1) 把文件交给曼努伊尔斯基是根据七人小组的决定，是为了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层了解情况，而不是为了发表；(2) 我对曼努伊尔斯基说过，在发表托洛茨基文章的定稿之后，在国外发表一些文件，具体发表哪些文件——这应当（只能够）由

^① 关于任命格伊为组织分配部部长一事政治局于1925年7月27日和8月3日讨论过。

七人小组来决定；(3) 我没有也不可能向曼努伊尔斯基下达任何有关发表托洛茨基文章未定稿的指示，因为我过去和现在都主张等托洛茨基文章改好后再发表，而不是未改好就发表；(4) 我根本就不可能给曼努伊尔斯基下达这样的指示，因为我要求他在出国前把所有文件还给中央委员会（对此他表示同意，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履行许诺）。问问曼努伊尔斯基——他为什么没有在出国前交还文件？^①

4. 发表克鲁普斯卡娅的文章是七人小组决定的，责成我、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审读。我同布哈林和李可夫审读了文章并表示赞同。季诺维也夫缺席。人们尤其是布哈林简直太健忘了。

5. 七人小组决定托洛茨基的文章和克鲁普斯卡娅的信在国外发表后即在国内刊物上发表，无论如何不要为此事挑起争论。可能七人小组现在已取消这个决定。这当然是它的事情。但如果决定未被取消，文章和信就应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情况可以告诉我？

6. 至于发表我关于伊斯特缅的便条一事，可等我休假回来后再说。没必要着急。

7. 请转告布哈林，《真理报》既然不同意托洛茨基的答问，那就应当为其加上按语。

8. 伏龙芝的身体如何？

9. 科托夫斯基是在什么情况下遇害的？真可惜，这是个出类拔萃的人。

握手！

别骂我，这封信写长了。

约·斯·

^① 见 1925 年 8 月 12 日季诺维也夫给曼努伊尔斯基的信。

№09641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

(1925年8月11日)

用对缺席的七人小组成员征询的办法，对出席的七人小组多数所反对的布哈林和莫洛托夫的下列议案进行表决：“为回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质询，准许俄共（布）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转交政治局有关伊斯特缅的书的印刷材料，作为供外国共产党党员阅读的可信资料。”

№09642

季诺维也夫致曼努伊尔斯基

(1925年8月12日)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

鉴于《人道报》把托洛茨基声明的初稿当作定稿刊载的错误具有重要意义，请您作较为详细的回忆：

1) 我是否对您说过，应当先公布斯大林的信（第一封），然后过一些时间发表其他文件，采用摘录的形式并加上评论。

2) 我是否对您说过，还没有托洛茨基声明的定稿本，因为还在继续同他进行谈判和通信。

3) 我是否让您到中央书记处去取全部文件。

4) 我是否对您说过，主管此事的同志们的决定是要让人看到，托洛茨基是怎样写出他的最后文本的，即如何迫使他同伊斯特缅划清界限的。

我是否对您说过，刊登有《人道报》评论的托洛茨基声明的最后文本等等需在英国报刊刊登最后文本之后。

我是否同时对您说过，决定用英语出版英国共产党人加拉赫和波立特反伊斯特缅的书。

No01108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5年8月18日)

8月18日

莫洛托夫同志：

迟复为歉。

曼努伊尔斯基的信既怯懦又狡诈。

尽管有些同志不满意，但我仍完全坚持我关于欺骗和卑劣的说法。

加米涅夫声称斯大林首先力争发表自己关于伊斯特缅的便条，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光明正大。他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

你和布哈林做得不对，不该投票反对有关伊斯特缅的文件的提案。不能阻断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获得有关伊斯特缅的文件的途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想造成使托洛茨基必须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前提，但他们做不到，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托洛茨基以自己对伊斯特缅的书的回答预先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即挽救了自己。

握手！

约·斯大林

【专题说明】

对车臣的军事行动

(1925年7月至9月)

车臣问题由来已久。1859年沙俄通过武装征战兼并了车臣。十月革命后，1921年1月20日车臣—印古什加入戈尔斯科自治共和国，1922年11月30日成立车臣自治区，1924年7月7日成立印古什自治区，属俄罗斯联邦。1934年1月15日合并成立车臣—印古什自治区，1936年12月5日改为俄罗斯联邦内的自治共和国。1942—1943年共和国的部分地区被德军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以车臣有人投敌为由，于1944年3月把全体车臣—印古什人强行迁走，取消了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直到50年代车臣人才得以返回故乡，恢复自治共和国的建制。车臣人为谋求独立不断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1920年纳吉穆金·戈辛斯基领导了达吉斯坦和车臣山地人的大起义，直到1923年才被平息。1925年车臣显然又出现了动乱，7~9月苏军假借军事演习，进军车臣，实施解除车臣武装和消灭盗匪的战役。这次战役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作为民族问题的车臣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本专题文件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吴能、夏风翻译)

№03244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约·斯·

温什利希特致俄共（布）中央

（1925年7月7日）

绝密

致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1925年7月7日

第014783/CC号

定于8月27日至9月10日由北高加索军区的部队在戈尔纳亚车臣地区解除上述自治共和国居民的武装并清除盗匪居民，此前该部队将进行军事演习。

为了参加解除武装行动，动用下列部队：

步兵第28师，其编成：2288人、36门火炮、480匹马；

步兵第13师，其编成：1900人、36门火炮、410匹马；

骑兵第5师，其编成：2225人、12门火炮、2270匹马；

以及特种部队，总人数884人、2门火炮、498匹马。

鉴于地区的特点——距离遥远、居民贫困、军队工作难度大——需要大量花费。计：

用于军队输送 54277 卢布 36 戈比

用于以现金替换食物给养 21300 卢布—戈比

用于支付运送费用以弥补辎重车辆不足 20237 卢布—戈比

用于出差补助 13072 卢布—戈比

用于赔偿庄稼损失 1500 卢布—戈比

用于装卸工作 500 卢布—戈比

共计 111108 卢布 36 戈比^①。

无论是根据今年的演习预算，还是动用其他款项，军事主管部门均无力筹集用于如此大规模的演习和作战的费用，因此即使全部动用拨给今年演习的费用，也只能解决上述数字的一半。

在批准实施上述演习和解除武装的作战的同时，请求将上述花费的一半计 55545 卢布 18 戈比列入专项拨款或规定动用其他款项。

关于最后一项望尽快通知。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温什利希特

文件上有批注：“7月10日20时收到。托夫斯图哈^②。”

① 计算不准确，旁边有手写的准确数字：110886 卢布 36 戈比。

② 托夫斯图哈，И.П.（1889～1935）——俄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的助理。

№03245

俄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书记

阿·伊·米高扬致俄共（布）中央

（1925年7月23日）

绝密

密码电报

禁止复制

发自顿河罗斯托夫。发报时间：1925年7月23日7时45分。
送俄共中央机要室译解时间：1925年7月23日9时30分。

收报第1709/III号

莫斯科 俄共中央 致莫洛托夫同志，

抄送：伏龙芝同志、捷尔任斯基同志。

车臣政治局势更趋尖锐，不久前发生攻击和杀害2名红军战士的事件。为巩固苏维埃政权，经全面讨论边疆区委员会与司令部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取得完全一致，决定实施解除车臣武装并清除盗匪战役。设想把军区原定的军事演习同车臣战役结合起来进行。斯大林亲自认可实施此战役的必要性。在向中央报告这一切的同时，请求按军队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系统发出相应指示。为了协调计划，请求立即在军队系统召唤乌博列维奇^①和在国家政治

^① 乌博列维奇，伊·彼·（1896~1937）——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国内战争期间在南方面军、高加索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任集团军司令。1922年任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后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37年被处死，后平反。

保卫总局系统召叶夫多基莫夫^①来莫斯科。之所以不得不紧急实施此战役，是因为必需赶在复员前结束，因此，开始时间不晚于8月25日。第60/ш号。

米高扬

文件上有批注：“确实应当这样做。不像话的事情太多了。不过还得由政治局通过。建议今天就这么做。米·伏龙芝”；“亚戈达同志完全支持。托夫斯图哈。”

^① 叶夫多基莫夫，E. Г. (1891～1941)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北高加索边区全权代表。

№03246

伊·巴·托夫斯图哈致尼·巴·布留哈诺夫

(1925年8月11日)

绝密

1925年8月11日

第7735号/C号

致布留哈诺夫^①同志

亲启

送去温什利希特同志关于车臣的报告，请您速作决定。材料请和您的决定一起退回。

中央书记办公室主任

托夫斯图哈

文件上有批示：“速送卡达茨基同志执行。8月11日。尼·布留哈诺夫”；“秘密。致普托耶夫同志。1. 需要11万1千吗？2. 既然军事部门自己请求使用节余，那就规定其用途。由布留哈诺夫同志签署报告中央。C. 卡达茨基。8月11日。”

^① 布留哈诺夫，E. П. (1878--1943) ——时任红军供给总管理局局长，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

№03247

约·斯·温什利希特致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5年9月5日）

份数号：第1号
亲启
绝密

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5年9月5日

第148C/C号

致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政治局决定实施的解除车臣自治区的武装和清除反革命和盗匪首领战役，正由北高加索军区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关执行。军队在该州境内的结集是在参加预定的演习的名义下进行的。这次战役的要点是：军队在车臣的北部、东部和西部边界结集后，同时向该区中心地带前进，同时解除居民武装和清除盗匪。该区南部边界由高加索红旗集团军派出专门的拦截部队加以封锁。参加作战的军队分编为4个集群和2支部队。北高加索军区参加作战的野战部队总人数为：步兵4840人，骑兵2017人，重机枪130挺，轻机枪102挺，山炮14门，轻型火炮8门。此外，还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几支部队计341人，8架飞机和高加索红旗集团军防区内的拦截部队（野战部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队共307

人，10挺机枪)。整个车臣区，按照盗匪和反革命势力首领及帮伙集团的分布，划分为6个区。战役开始前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系统进行了切实的准备。战役于8月23日开始。按照最初设想，只对该区山区采取行动，但目前作战已波及平原地区，因为据最新消息得知，那里也有许多武器和盗匪。根据工农红军司令部手头的最近一次作战汇报（8月31日），军队已到达图上所标示的各地区。

目前已收缴约2500支步枪，不过这一数字远远不够完全，因为由于通信条件困难，作战部队的消息很迟才能到达。在许多山村中，居民曾试图对军队进行武装反抗。有不少场合，军队因居民顽强抵抗而使用了炮火（克列特、梅列焦伊-别列姆、别奇克、达伊等山村）和轰炸（祖姆索伊、达伊）。盗匪抵抗最为激烈的是第3号地区。在某些地方居民自愿交出武器，甚至志愿协助军队作战，从而得以在沙托夫斯克民族区组建车臣骑兵部队，不仅协助军队作战，而且在军队撤离后可成为地方苏维埃政权的支柱。在作战的同时，军队还开展政治工作，清除苏维埃机关中的盗匪，并建立由同情苏维埃政权的居民代表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在最后一项工作方面，军队工作中与车臣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地方党组织保持合作。

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司令部认为，这次战役在目前这一发展阶段即已获得一定的积极成果。居民的情绪开始向忠于苏维埃政权方向转变。居民自愿交出武器，用面包和盐欢迎军队，积极协助军队行动等事例，随着战役的进展而不断增加。当地司令部预计，战役最终将导致车臣区居民的情绪彻底转变和肃清主要的盗匪集团。

根据先前在其他地区（突厥斯坦战线、乌克兰）同盗匪作战的经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只有同时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方面的措施——实现边疆区的苏维埃化，以可靠的工作人员加强苏维

埃和党的机关，最后，从经济上支援居民，在车臣区施加的军事压力才能获得牢固的效果。不实施上述一整套措施，军事行动只不过是一剂治表的缓解药，仅能保证暂时的平静。

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温什利希特

文件第1页上有莫洛托夫的批示：“托夫斯图哈同志。询问北高加索边疆区：（1）对现今形势的总的评价（战役进行情况如何？）；（2）信末所说的苏维埃化、经济及政治援助等等实际上指的是什么？（3）将此报告及地图分发各政治局委员，作为通报。维·莫洛托夫。9月8日”。在文件最后有批注：“打印2份。第1份交收件人，第2份留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存档。”

№03248

约·斯·温什利希特致维·米·莫洛托夫

(1925年9月8日)

绝密

亲启

致俄共（布）中央 莫洛托夫同志

1925年9月8日

第 00304 / CC 号

送上在车臣消灭盗匪过程的补充报告和所索 20 份标有消灭盗匪地区的地图。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温什利希特

№03249

约·斯·温什利希特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①

（1925年9月8日）

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5年9月8日

9月7日收到北高加索军区军队司令部关于擒获车臣重要匪首戈钦斯基、安萨尔延斯基和阿塔比·沙米列夫的报告。与此同时，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通报说，计收缴1万支步枪、约800把手枪，并可望于9月12日前结束整个行动。

擒获戈钦斯基、安萨尔延斯基和阿塔比·沙米列夫这样的匪首，无疑是整个战役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的形势如下：戈钦斯基位于沙洛耶夫斯克区，这个区按照作战分界划入第4号战区。在这一地区行动的，是由骑兵5师师长阿帕纳先科同志指挥的我军第1集群，其编成包括骑兵师第3旅、步兵第13师的步兵第38团、步兵第28师的步兵第82团和第84团。该集群共有480名骑兵和1922名步兵，并配备有39挺重机枪和6门山炮。

该地区为戈钦斯基的主要基地，也是向格鲁吉亚方向发动袭击的立足点。戈钦斯基和阿塔比·沙米列夫均隐藏在这一地区。此外，这一带还有其他著名匪徒盘踞其间。当地地形复杂，难以接近，而

^① 本文件以及1925年9月5日约·斯·温什利希特的报告曾作为“通报”分发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检监察员会主席团委员以及中央组织局委员。

其南部尤其如此。这也是居民人数最多的地区。在 100 个极其分散的居民点中共有近 23000 居民。

阿帕纳先科的部队在从格罗兹尼地区前进时遇到当地居民很不相同的态度。一方面，所有能拿武器的人都进入山区，在村庄里只留下老人、妇女和儿童。另一方面，也受到面包和盐的欢迎，而在某些山村部队遇到的无声反抗阻碍了解除武装的行动，因此不得不采用炮轰和轰炸的办法。反抗得最为顽强的是祖姆索耶夫会社。通过作战行动取得一定转折之后，军区司令部提出在规定时间内交出戈钦斯基的要求，同时将有名望的老人作为人质。按期交出戈钦斯基的这项要求未能得到实现，不得不加强镇压，实施炮轰和轰炸（2 天内投弹 22 普特）。直到这以后，9 月 5 日才交出戈钦斯基。

第二个集群由 28 师师长科济茨基同志指挥，其编成包括第 5 骑兵师的 1 个旅（缺 1 个骑兵连）、第 28 步兵师的第 83 步兵团（计骑兵 500 人，步兵 816 人、重机枪 34 挺、山炮 2 门）。该集群在第 5 号战区行动，这个地区的匪首为村长安萨尔延斯基，他在匪徒卡伊姆·霍吉的伴随下隐匿在达伊山村一带。这个地区的匪徒也向达吉斯坦方向扩散。该地区居民比上一个地区少，只有 15000 人。第 2 集群在实施作战中在达伊地区遇到最顽强的抵抗。那里几乎一直需要动用炮火，而对于达伊村又不得不进行轰炸，据悉炮击和轰炸都造成伤亡。

8 月 31 日，乌博列维奇同志报告说，在达伊村一带已出现巨大转折，并且预计在 9 月 1 日前会把村长安萨尔延斯基交给我们。事实上是安萨尔延斯基自己于 9 月 2 日宣布投降的。

从汇报看，处境最困难的是在第 3 号战区行动的弗拉季高加索部队。这个部队由布里琴科同志指挥，下辖民族骑兵学校、弗拉季高加索步兵学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弗拉季高加索大队和第 28 师的 1 个骑兵连（计骑兵 308 人、步兵 150 人、重机枪 12 挺、山

炮2门)。

这个地区的特点是根本没有苏维埃政权，是匪徒向格鲁吉亚方向进行袭击的基地，也是戈钦斯基和希普舍夫的根据地。这里地形极难接近，给军队造成很大困难。居民约8500人，分散在59个居民点内。这支部队的各路纵队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行动的。红军部队几乎在任何地点都遇到居民的抵抗：在解除下基伊村的武装时，执行任务的部队受到来自周围山头的射击；在克列特地区我部队曾被合围，是及时赶到的骑兵排解救出来的。被合围部队指挥员和红军战士一起不得不一面射击一面拼力突围出来和自己人会合。在实施解除武装时到处都不得不开火，而由于地形复杂又不能使用火炮。只好进行轰炸。部队在行动中得到在1号战区行动的集群的支援。阿帕纳先科同志也予以援助。经过共同作战，可以认定这个地区的南部已经解除了武装，其他地方的战役还在进行。以第3号地区和第1号地区为依托的匪徒希普舍夫至今尚未得到清除。

由步兵第66团团长科罗利同志指挥的我军第4集群（其编成包括1个步兵团，即第66团，共有步兵807人、重机枪11挺及火炮2门）在第1号战区行动。这个地区是车臣盗匪向捷列克河和松日河方向进行袭击的基地和匪首希普舍夫的根据地。从地形看，这个地区可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较便于军队行动，南部地形较复杂。有居民约15000人，居民点不多。

这里的作战行动是从解除阿契霍伊马尔坦、沙拉日和梅列焦伊别列姆三个山村的武装开始的。解除阿契霍伊马尔坦和梅列焦伊别列姆武装的行动是在机枪和炮火的压力下进行的。这一带的解除武装行动在主要方面已告结束。

舒瓦诺夫同志（步兵第13师代理师长）的集群（其编成包括步兵第13师的2个团、骑兵第5师的1个骑兵连和1个轻炮连，计步兵1145人、骑兵65人，重机枪17挺、山炮4门、野炮6门）

最初受领的任务是解除阿克塞伊河和北达吉斯坦边界之间一带的武装，后续任务是向西面和南面延伸。

这个地区的特点是，存在若干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反动集团，而在靠近达格斯坦那一片还残存着原纳伊布·戈钦斯基（基别尔季耶夫）的地方政权。同时，这里还是车臣民族主义匪徒的根据地。我军集群成功地解除了阿克塞伊河东一带的武装，其间采取了以炮火施加压力的做法。

目前这一集群正在对阿克塞伊河和呼尔库拉雅之间一带，以及对维捷诺地区实施解除武装的行动。这里仅占尔达雷一个村庄就缴获 3050 支步枪。作战行动是在何种条件下进行的，目前尚无消息。看来，实施作战的条件仍和以前一样，在局部地方不得不施加炮火压力。这个集群的任务尚未结束。

这一带可称是以富农集团和地方宗教势力为支柱的匪区。地形便于军队行动（有格罗兹尼——沙托伊公路穿越其间）。居民人数近 16000。那里的解除武装的行动刚刚开始。在西北部以及沙托耶夫斯克区已经开始行动。作战行动情况如何，尚不清楚。

由此可见，整个解除武装的行动目前已取得显著成绩。除希普舍夫外，重要的匪首均已擒获。从行动开始至今缴获的步枪目前已超过 11000 支，尚有一批数量不明的手枪（可能在 1000 把左右）。

在评价战役结果时，可以明确地说，强大的军事压力取得了明显的有利成绩。在清除了 3 名重要匪首和一大批匪徒并缴获大量武器之后，居民的抵抗已被摧毁。前面已经说过，在许多政权真空的地方正筹组革命委员会，地方的党的机关正开展工作，做好居民工作的最初步骤已经开始。

但是，如果不在军事压力之后随即广泛开展实现政权苏维埃化、改善经济状况和提高文化水平方面的工作，军事压力取得的积极成果也会付之东流。正如在突厥斯坦同巴斯马奇分子作斗争、在

乌克兰，以及在坦波夫省及其他地方同盗匪作斗争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只有随即采取上述措施，军事压力才能使原先反革命势力和盗匪盘踞的基地完全平静下来。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温什利希特

№03250

约·斯·温什利希特致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5年9月12日)

绝密

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致莫洛托夫同志

1925年9月12日

第014596号

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最近一次报告指出、解除车臣武装的战役正在顺利进行。到9月9日以前，收缴的步枪已达21000支、手枪3000把（大部分为左轮手枪），此次作战行动可望于近日结束。

但是，地方工作人员认为，如不将印古什和达吉斯坦邻近车臣的一些地区解除武装，车臣有可能重新出现武器泛滥和盗匪丛生的现象。根据此种意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认为，还必须将印古什和达吉斯坦解除武装。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对印古什和达吉斯坦地区实施解除武装是必须的，但是认为使用部队解除这些地区武装并不可行，其原因如下：

1. 目前1902年出生的士兵的复员工作已经开始，为此部队必须撤回原先固定驻地。1902年出生士兵退伍后，部队实力将大为减弱，已不可能派出足够兵力实施大规模行动。

2. 为了解除印古什和达吉斯坦邻近车臣一带地区的武装，所需动用军队的数量将大大超过参加车臣解除武装行动的兵力（那里地区面积更大，地形更难行动）。由于上述 1902 年出生士兵的复员，派出完成这一行动的足够数量的军队是不可能的。

3. 印古什和达吉斯坦西部地形条件，对于军队的行动要比车臣更加困难，而秋季即将来临，这将使解除武装的行动拖延很长时间。军区只能派出少量军队，这会使行动的持续时间更长。

除此以外，在车臣和达吉斯坦实施长时期作战必须花费大量钱财，而军事主管部门并无此种款项，必须向政府申请拨款。

根据以上所述，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最适当的做法是不进行大规模战役，而把解除印古什和达吉斯坦武装的任务交给各该地区的地方政权，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军队和军警的协助下完成，而不动用野战部队。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温什利希特

原件。在文件上有铅笔画的着重号。

№03251

叶夫多基莫夫致苏联人民委员会
所属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1925年9月10日)

发自格罗兹尼的电报

电报

莫斯科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密码

顿河罗斯托夫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

抄送：巴塔尔申斯克市政治保卫局

车臣的作战行动即将结束；车臣反苏维埃盗匪活动的所有原先的重要领导人——戈钦斯基、阿塔比-沙米列夫、安萨尔延斯基、吉别尔季耶夫、埃斯特米罗维伊、别洛哈克等均已就擒。尚未清除的只有一个卡巴尔达人捷米尔汉-希普舍夫。最后缴获步枪 20000 支、手枪近 3000 把、子弹近 50000 发。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车臣山区和山前地区反苏维埃的盗匪控制的局势是有人支持的，车臣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成员中有人致力于此，他们是：(1) 加苏莫瓦·巴苏尔盖波维奇，车臣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一个狂热的民族爱国主义分子。他和他的父亲舍伊赫·苏加普（他一直在进行着反共宣传并像阿利米塔霍鲁夫一样树立了很高的威望）一起反对一切共产主义事物。解除武装行动期间他和他父亲一起鼓动不交出武器藏匿地点，最后还送来请愿书，要求释放被捕人员中有威望的人士；除此政治倾向外，还犯有刑事罪。(2) 舍里波夫·达尼尔别克，车臣中央执委委员，州法院院长。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犯有刑事罪。和他哥哥扎乌尔别克·舍里波夫一起参与奖赏提出释放阿

利米塔夫的人，利用宗教势力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从证人塔雅斯基的证词确知，戈钦斯基政府名单中曾将他定为司法部长，他试探表示同意。解除武装行动期间，9月9日，他曾恳求特拉莫夫在审讯中不要出卖他，说他将努力使名单不落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手中。有材料证明，他与阿塔比·沙米列夫保持有联系。第172/III号。于1925年9月10日发出。

续第172/III号。

(3) 舍里波克·扎乌尔别夫，车臣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于9月8日召唤法律顾问特拉莫夫到办公室，请求他审讯时不要交待出他的弟弟达尼尔别克，说是他把戈钦斯基政府的名单告诉其弟的。还有证人证词证实，他也支持并警告阿塔比-沙米列夫，其中说祖姆索伊军队即将到来，劝阿塔比躲藏起来。舍里波夫兄弟和加苏莫夫都是车臣中央执行委员会政策的领导人。他们设法抵消区里关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措施，同时却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基地，甚至不惜扩大某些地方的盗匪势力，他们还妨碍清除戈钦斯基、阿塔比-沙米列夫和吉别尔季耶夫。

(4) 哈姆扎托夫-马赫姆特，土地局局长，车臣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据供认，他曾警告阿塔比-沙米列夫说，祖姆索伊军队即将到来，劝他躲藏起来。形势要求立即首先逮捕加苏莫夫，重复一次，加苏莫夫，和达尼尔别克·舍里波夫，重复一次，舍里波夫，作为车臣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得到您的批准和指示以前对后者暂不逮捕，因为同时还存在成立车臣的区政权问题，其组成另报。问题要同司令部协调。已通知罗斯托夫的卡乌利转报区委和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及巴塔尔申斯克转报米高扬，皮亚季戈尔斯克转报捷尔任斯基。第HP/III号，1925年9月10日。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 叶夫多基莫夫

№03252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
亨·格·亚戈达致维·米·莫洛托夫

(1925年9月11日)

绝密 亲启

致俄共(布)中央 莫洛托夫同志

1925年9月11日

第96023/C号

随函附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北高加索全权代表的第172—173/III号密码电报的复制件，其中请求批准逮捕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舍里波夫、加苏莫夫等人。我已同时询问我全权代表，边疆区委员会对此问题作出何种决定。

附录：上述文件。^①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
亚戈达

^① 见本专题№03251文件。

№03253

约·斯·温什利希特致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5年9月17日）

绝密

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致莫洛托夫同志

1925年9月17日第00339号

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于今年9月11日来电报告，解除车臣武装的战役已经结束，目前部队正乘车撤回原常驻地。

与此同时，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报告，关于解除印古什武装的问题已在当地获得解决办法。解除武装的行动以执委会的名义通过各地苏维埃机关在红军部队的协助下进行。为此目的，从参加解除车臣武装的部队中派出1个骑兵旅和1个步兵团前去印古什。

在报告以上情况时，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应当指出，车臣战役无疑极其顺利并已取得相当彻底的成果。

战役取得如此顺利的结果，其原因在于实施战役的突击性。当地居民，自然以不可靠分子为代表，甚至来不及采取任何对付解除武装的反措施。而军事压力又使所有人确信实施决定是坚定不移的。

目前在印古什已不可能形成这种突击的局势。应当考虑到，不稳定分子毫无疑问已处于戒备之中，因而目前，在车臣采取行动之

后要想在印古什实施行动而取得完满的结果，是没有根据的。

至于解除达吉斯坦的武装，那么，鉴于在今年 9 月 12 日第 014596 号函中陈述的看法，以及考虑到参加解除车臣武装的军队已开始返回驻地，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动用野战军部队实施这一行动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因此仍持原先意见，即由地方政权机关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军队和民警的协助下解除达吉斯坦的武装。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温什利希特

【专题说明】

联共（布）与英国总罢工

（1926年3月至9月）

在所谓资本主义“暂时的相对稳定”时期，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仍然对欧洲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抱有希望。1926年2~3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6次全会确认了共产党人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针。代表们在全会上仔细讨论了英国爆发总罢工的前景。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在英国我们看到工人阶级在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他得出结论说，“革命首先摆在欧洲的日程上，其次是东方。”

1926年5月1日，英国矿工为反对削减工资和抗议英国煤矿企业雇主同盟歇业举行罢工，在全国其他工业部门产生广泛影响。英国工会总委员会宣布全国总罢工，参加的人从150万发展到500万，全国经济生活陷于瘫痪。5月5日共产国际发表宣言，号召支持英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联共（布）中央以及苏联的各工会组织也采取具体措施，支援英国的罢工工人。但领导罢工的英国工会总委员会却同英保守党政府秘密谈判，并于12日发表告罢工工人书，劝说工人停止罢工，以换取政府采取有利于工人的方法解决劳资纠纷，结果全国罢工基本停止。这里发表的多数档案原存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特别卷宗”。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邢艳琦、夏风翻译）

№ 1088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向英国
罢工矿工提供物质援助的决议**

（1926年3月4日）

第 13 号记录

（特别记录第 9 号）

听取：第 19 点。关于英国矿工（季诺维也夫同志）。

决定：第 19 点。委托托姆斯基同志认真关注行将到来的英国矿工的冲突，了解形势，告诉英国的同志们，倘若斗争激化，他们可望得到苏联工人组织为数约 100 万卢布的援助。

抄送：季诺维也夫同志，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维·莫洛托夫
（签名）

№ 1088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和
苏联各组织为英国矿工罢工而采取措施的决议**

（1926年5月4日）

第23号记录

（特别记录第17号）

听取：英国事态（洛佐夫斯基、皮亚特尼茨基、李维诺夫、契切林等同志）

决定：

1. 认为必须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拨出25万卢布，作为供英国工会总委员会支配的首笔费用，并见报。

2. 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出面，着手开展宣传鼓动，以响应国际工人援助会^①呼吁书。如果斗争将继续下去，则暂捐职工日工资的1/4（扣款）。委托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组织国际工人援助会本地分部发动工作。

3. 委托莫斯科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及其他大省省委会从召开大型全市大会人手，开始在工厂展开解释运动。

4. 委托鲁祖塔克、舍因曼^②、弗鲁姆金、多加多夫^③同志组成小组，拟定必要措施，在政治局通过新决议以前，使我装载煤炭

① 国际工人援助会——工人阶级的国际性组织。1921年9月在柏林成立，在共产国际领导下活动。1935年停止活动。

② 舍因曼，A. A.（1886～1944）——1903年入党。1926～1929年任副财政人民委员，苏联国家银行行长。

③ 多加多夫，亚·伊·（1888～1937）——时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

和石油的轮船不驶入英港口。小组的建议分送政治局委员。小组由鲁祖塔克召集。

5. 党和苏维埃报刊现采取的调子是，心平气和地进行解释，适当地批评右翼。俄报刊文章审阅事宜，由契切林（由季维诺夫代替）、季诺维也夫、莫洛托夫和古谢夫^①等同志组成的小组负责。该小组由季诺维也夫同志召集。

6. 共产国际宣言应心平气和地进行解释。委托同一小组（按第5点）审阅宣言。

7. 英国共产党应以适当形式，着手把罢工转到政治轨道上，适时提出下列口号：打倒保守党人政府，拥护真正的工人政府，即以实现工人要求、使煤炭工业国有化并使失业者有工作等为己任的政府。

8. 必须准备以地方工会、行动委员会，并视可能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向英国陆海军发出呼吁书。

9. 采取最有效的措施，以便在欧洲（法、德、比、捷、波、意）建立行动委员会，以援助英国罢工，组织好不出口煤炭等工作。为此目的，有关共产党和工会应立即向改良主义工会发出呼吁。

10. 红色工会国际应立即呼吁阿姆斯特丹国际，建议为捐助英国罢工，组织共同行动。

11. 建议国际工人援助会负责在可能的情况下，承担向罢工者提供食品的组织工作。委托皮亚特尼茨基和洛佐夫斯基同志把此事弄清楚。

12. 委托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再次就援助罢工者问题向合作社联盟和改良主义合作社发出呼吁。

^① 古谢夫，谢·伊·（1874—1933）——时任联共（布）中央报刊部部长。

13. 欧洲各国国会的共产党党团开展一场禁止把煤炭运进英国各港口或经其他国家港口输入英国的运动。和红色工会联合推进这一运动。

14. 立即在巴黎组织一个委员会，由托姆斯基、洪堡^①、塞马尔^②、布劳恩^③、蒙穆索^④和一名捷克人组成，委员会享有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广泛的全权委托。派汤姆·曼^⑤去英国。

15. 如果需要，委托这些同志召集各共产党和红色工会国际会议。

抄件送：全文送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莫洛托夫等同志；第1.2.4点送多加多夫同志；第2.6.7.8.9.10.11.12.13.14.15点送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第3点送乌格拉诺夫和基洛夫（用密码）同志；第4点送鲁祖塔克同志；第5点送契切林、李维诺夫和古谢夫同志；第10.11.13点送洛佐夫斯基同志；第13点送柳比莫夫^⑥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签名）

① 洪堡（1886～1937）——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人员，英国事务专员，1925～1926年为共产国际驻英国共产党代表。

② 塞马尔，P.（1887～1942）——1924～1930年为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法国工会领导人之一。

③ 布劳恩，阿·（1890～1959）——1925～1929年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6年起为共产国际执委会驻英国共产党特使。

④ 蒙穆索（1883～1960）——法国工会活动家，1926～1937年为工会国际执委会委员。

⑤ 曼，汤姆·（1856～1941）——英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20年代中期英国工会少数派运动领导人。

⑥ 柳比莫夫，И. Е.（1882--1937）——苏联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主席。

No 1088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向英国工会提供财政援助并使对罢工者的支持具有国际性的决议

（1926年5月6日）

第24号记录

（特别记录第18号）

听取：英国事态（季诺维也夫和洛佐夫斯基同志）。

决定：

1. 委托多加多夫同志给英国工会总委员会发明码电报，内容大致如下：

（1）“请告25万卢布是否收到，并告你们认为进一步援助以何种形式为好，钱还是食品”；

（2）台尔曼^①同志参加托姆斯基同志小组；

（3）认为必须在柏林举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紧急会议，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副主席台尔曼和塞马尔负责发起。就此问题，征求托姆斯基同志以及台尔曼和塞马尔同志的意见。

（4）认为季诺维也夫同志赴柏林是可取的；

（5）批准政治局英国问题小组的下列决定：

①认为最近不宜刊载政治局委员的署名文章。

②请求政治局委员们向报刊提供不署名文章。

（6）采取一切措施，以便使在莫斯科的外国（德、法、英、意

① 台尔曼（1886～1944）——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德国共产党主席。

等)共产党的代表马上在《真理报》上发表一批关于英国事态的署名文章。

抄送：第(1)点送多加多夫同志；第(2)、(3)、(5)点送托姆斯基同志；第(2)、(3)、(4)、(5)、(6)点送季诺维也夫同志；第(5)点送政治局各位委员；第(2)、(3)、(6)点送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全文送契切林和李维诺夫同志。

听取：第9项。多加多夫同志声明。

决定：第9项。(1)责成工业银行采取各种措施，把援助英国罢工工人的捐款汇给英国工会总委员会。

(2)禁止通过全俄合作股份公司^①汇款。

(3)委托舍因曼同志对工业银行经办寄给工会总委员会汇款情况进行监督。

抄送：多加多夫、克桑德罗夫^②、舍因曼同志 [……]。

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于1926年5月5日征询

听取：14. 英国事态(政治局1926年5月4日，第23号记录第1点第4款)(鲁祖塔克同志)。

决定：批准政治局英国问题小组今年5月5日的建议(见附录)。

抄送：鲁祖塔克、多加多夫、伊先科^③(水运工会)、契切林、

① 全俄合作股份公司，是克拉辛等于1920年为苏俄和英国开展进出口业务而建立的机构。

② 克桑德罗夫，B. H. (1877~1942)——苏联工业银行行长。

③ 伊先科，A. Г. (1895~1937)——水运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李维诺夫同志。

听取：15. 英国事态（托姆斯基同志）。

决定：15. 接受托姆斯基同志下列建议：（1）为迅速地解决有关英国事态的各种问题，在英国罢工期间，设立一个小组，由洛佐夫斯基、多加多夫、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契切林和莫洛托夫同志组成。该小组由洛佐夫斯基同志召集。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为小组秘书。

（2）委托该小组审阅文章和宣言。

抄送：洛佐夫斯基、多加多夫、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契切林、莫洛托夫和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10885

政治局英国问题小组会议记录

(1926年5月5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记录第24号第14条
附录第1号

听取：1. 关于英国工人罢工期间我煤炭和石油在英各港口停止卸货的措施。

决定：1. 采取下列措施：

(1) 水运工会宣布实行局部罢工，并宣告：对我国发往英国的货物，将不予装货，惟英国各工会委员会同意卸货的除外；

(2) 在其他国家港口，对那些有转运英国之嫌的燃料，我水运工会将不参与装载；

(3) 水运工会建议，现顺道驶入英国的我一切船只，一旦获悉工会局部罢工的消息，即加入罢工；

(4) 注意到石油辛迪加组织有这样的消息，即由于石油燃料在英国诸港停留和未能卸货而可能亏损，现正在途中的这批货物将改运其他国家。

№ 10886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代表团关于英国罢工问题的决议

（1926年5月6日）

联共（布）代表团会议第9号记录

听取：1. 英国问题。

决定：1. （1）向主席团提交最终经政治局英国问题小组批准的致英国共产党人书文本。^①（2）建议主席团通过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关于援助斗争中的英国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宣言草案。建议委托季诺维也夫和洛佐夫斯基同志对宣言进行修订定稿。^②（3）建议主席团以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名义给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联席会议拍发电报，提议共同组织对英国工人的援助。电报指明，这些国际可和谁就此举行谈判。为了举行谈判，必要时得指派塞马尔、蒙穆索、伊列克、台尔曼、多加多夫等同志。委托季诺维也夫和洛佐夫斯基同志起草电文。^③（4）建议主席团委托季诺维也夫同志起草给英国共产党的秘密信。[……]

听取：3. 舒宾^④同志关于改善英国事件报道的建议。

决定：3. 推举马努伊尔斯基、舒宾和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组成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致英共中央的秘密信经7月5日主席团讨论并于次日发给英共，斯大林参加了讨论。

② 宣言于1926年5月7日通过。

③ 5月9日发出电文。

④ 舒宾，A. Г.（1878～1937）——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鼓动部副部长，报刊部部长助理。

小组，以研究这一建议。[……]

格·季诺维也夫

征询联共（布）党代表团成员结果

（征询过斯大林、马努伊尔斯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

听取：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建议给英国共产党汇2万金卢布预算外经费，供罢工特别开支之需。

决定：采纳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的建议。

格·季诺维也夫

№10887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代表团会议记录第9号

（1926年5月7日）

第3点附件

致季诺维也夫、曼努伊尔斯基和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提出如下建议：

1. 为英国事件在柏林《红旗报》下建立报道和报纸鼓动中心。
2. 材料自伦敦传至《红旗报》时按本报记者（塔斯社工作人员）电办理。次日从柏林用电报把材料传至莫斯科在苏联报纸上以《红旗报》讯的名义发表。

3. 当夜从《红旗报》社用电话把材料传至巴黎、布拉格、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

传递机关已有初步安排。

4. 《红旗报》同时成为分类资料中心，这些资料从这家报社编辑部发出，或用电话、或用特别快件传送各国首都。《真理报》在显著位置开辟“国际共产主义报刊”专栏，详细引用各种共产主义报纸的材料。

5. 《真理报》刊登社会民主党各报的消息和反应。

6. 指示性文章及宣言在适当情况下刊登于《红旗报》，由此处传至欧洲，也传至莫斯科。在技术不大紧张的情况下，基本上可从莫斯科指导《红旗报》的整个操作。

7. 瓦尔加^① 编辑英文简报（报刊上对英国大罢工经济后果的反应等等），简报从柏林直接送给最主要的几个部门，否则会延误的。

П. 舒宾

^① 瓦尔加，叶·（1879～1964）——共产国际驻柏林情报中心领导人。

№ 10888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秘书处主任助理 B. 波格丹^①
致联共（布）中央秘书处处长伊·帕·托夫斯图哈^②
(1926年5月7日)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主席团代表团会议 1926年5月14日第10号记录第8点^③附件。

托夫斯图哈同志：

季诺维也夫同志收到明岑贝格^④来电，内称：“菲缅^⑤来电称，由国际工人援助会汇给英国工人1万英镑一事至为重要。您能垫付这笔款项吗？到处在募捐。”季诺维也夫同志请求把下列建议付诸表决：委托克利斯廷斯基^⑥同志把这笔钱交给明岑贝格，并约定偿还条件。寄钱事在柏林公布。

波格丹

-
- ① 波格丹，B.B.（1897～？）——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秘书处主任科长、助理。
② 托夫斯图哈，伊·帕·（1889～1935）——斯大林私人秘书，联共（布）中央机要部部长。
③ 议程第8点是“为英国罢工工人募款”。
④ 明岑贝格（1889～1940）——德共党员，青年共产国际创始人之一，国际工人援助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
⑤ 菲缅（1875～1942）——阿姆斯特丹工会书记，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书记。
⑥ 克利斯廷斯基，尼·尼·（1883～1938）——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

No 1088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向
英国罢工者提供补充拨款的决定**

（1926年5月7日）

第25号记录

（特别记录第19号）

听取：26. 英国事态。

决定：通过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多加多夫三同志建议，立即汇200万卢布，并给英国工会总委员会拍发如下电报：“为帮助正在罢工的英国兄弟，今天苏联给你们汇上200万卢布。这是从苏联已募款项中提取的第二笔款项。募捐在继续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多加多夫”。电报发给工会总委员会主席皮尤^①和书记西特林^②并见报。

抄送：多加多夫，舍因曼同志 [……]

1926年5月8日决议摘抄

听取：28. 多加多夫同志声明（政治局1926年5月6日会议，第24号记录第9项）

① 皮尤，阿·（1870~？）英国工会总委员会主席，参加英俄委员会。

② 西特林（1887~？）——英国工联代表大会副秘书长，1926~1946年为书记。

决定：28. 对政治局今年5月6日决定第9点措词作如下修改：

“（3）委托舍因曼和克桑德罗夫同志监督本决定的执行”。

抄送：舍因曼、克桑德罗夫同志 [……]

1926年5月10日决议摘抄

听取：31. 关于英国事态

决定：31. 李可夫同志参加政治局英国问题小组。

抄送：李可夫、洛佐夫斯基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10890

斯大林致托姆斯基电报

(1926年5月9日)

莫斯科，1926年5月9日

紧急优先

密码

巴黎

致托姆斯基

你出发后，5月6日多加多夫接到菲缅致托姆斯基电如下：“我认为，至为重要的是，俄工会能速汇大笔款项给英国工会，并公布于众”。我们理解事情是这样的，菲缅发此电报系受英国工会之托。为复来电，多加多夫给英国工会总委员会汇了200万卢布。现在我们获悉，总委员会拒绝接受。这真是岂有此理，但这是事实。结果是，或者是菲缅使俄工会难堪，或者是总委员会使菲缅和俄工会难堪。出个主意吧，如何摆脱这种状况。速复。

斯大林

1925年5月9日

№ 1089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否决的季诺维也夫的
决议草案并表示不同意托姆斯基致
英国工会总委员会电的决定**

（1926年5月14日）

第 26 号记录

（特别记录第 20 号）

听取：1. 英国事态（季诺维也夫、契切林、皮亚特尼茨基、洛佐夫斯基四同志）。

决定：（1）否决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决议草案（见第 1 项附件）。（2）给小组拍发斯大林同志建议的电报，电文如下：政治局不能同意由托姆斯基和洪堡签署的小组委员会今年 5 月 12 日电。我们认为，那不是妥协，而是叛卖。当工人们正在罢工并希望罢工时，不能听命于总委员会。对总委员会及其领袖们应予以批评，并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应以工会总委员会领袖们的错误去教育群众。我们建议小组委员会立刻撤销指示，代之以体现我们来电精神的指示。在执行本决定以后，小组委员会工作就会是十分完善的了。（3）邀请塞马尔同志暂搁置。

抄件送：电报于 5 月 14 日发托姆斯基同志（经皮亚特尼茨基同志转）决议全文。

送托姆斯基和季诺维也夫。

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附件：

第26号记录第1项附件之一

托姆斯基和洪堡同志给英国共产党的指令（服从总委员会结束罢工的决定，并将此做法通知总委员会）极端错误，原则上是不正确的。

总委员会的无条件投降，甚至在工人们缺乏返回生产岗位之保障的情况下的投降，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空前的背叛行为。倘若英国共产党自愿服从这个可耻决定，并且急于向总委员会表示忠顺，那么，它本身就会成为这种背叛的同谋者。

英国共产党最重要而且最起码的任务是，擦亮英国无产阶级的眼睛，使之看清总委员会官方领袖所扮演的角色。这些官方领袖事实上是跟随托马斯^①、麦克唐纳^②及工人事业的其他叛徒们跑的。英国共产党反对总委员会的叛卖行径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托姆斯基和洪堡同志的建议“认定”罢工的结束意味着保守党人的失败和无产阶级道义上的部分胜利，这同样是不正确的。承认这一点，意味着承认不公正，意味着重复总委员会领袖们已经破产了的伪善词句。

托姆斯基和洪堡建议的第3点“在对无产阶级胜利斗争最为有利的时刻达成妥协”的说法同样是不正确的。没有“妥协”，而只有投降和叛变。

有鉴于此，政治局认为必须：

1. 撤销托姆斯基和洪堡同志的指令；
2. 责成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共产国际主席团建议，

^① 托马斯（1874～1949）——英国工党和工联领袖之一，铁路工会书记。

^② 麦克唐纳（1866～1937）——英国工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

速电英国共产党，撤销托姆斯基和洪堡同志的指示，并告知上述撤销理由。

格·季诺维也夫

1926年5月13日

№1089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把全苏工会中央
理事会资金转交给英国矿工联合会的决定**

（1926年5月15日）

第27号记录

（特别记录第21号）

听取：26. 英国事态。

决定：26. 为回答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年5月14日电，拍发电报如下：“英国矿工联合会主席史密斯^①，联合会总书记库克^②：今天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把苏联工人为援助英国工人而募集的260万卢布划归苏联矿工工会中央委员会支配。现正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矿工例行大会决定，把这项款子汇给英国矿工使用。等候你们示复。致兄弟的问候。

受苏联矿工第5次代表大会委托（两人签名）”。

电文于5月15日交给施瓦茨^③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① 史密斯——1926年任英国矿工联合会执委会主席。

② 库克（1889～1931）——英国工联左派，1921～1924年为矿工联合会执委会委员，1924年起为联合会总书记，1926年领导了7个月的矿工罢工。

③ 施瓦茨，И. И.（1879～1951）——苏联矿工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

№ 02790

托洛茨基：英国工人运动问题

（1926年5月18日）

1. 英国工联总理事会拒不接受苏联工会的援助，这不能不激起苏联工人群众的义愤。在最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国报刊和报告人都把总理事会说成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亲密盟友。英俄委员会的存在就是这个同盟的直接体现。而我们的报刊根本没有对理事会及其领导人进行批评的迹象。

成立作为统一战线政策一个组成部分的英俄委员会是正确的，对于这一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争议。但我们对待这一组织设施的政治态度是不正确的。只有在统一战线政策不剥夺我们对同盟者、半同盟者、同路人等等进行完全自由的革命的批评权的条件下，我们才能接受一切种类和形式的统一战线政策。然而我们在对待英国总理事会方面却自愿地背离这个准则，把统一战线政策归结为半外交谈判、妥协、谨小慎微并一贯模棱两可的声明，等等。我们的报刊对这些步骤也从未作过坚定、明确和清晰的批评性评价。因此，就会不可避免地在苏联工人群众中，包括在我们自己党内，散播幻想。

这一在很大程度上以外交组织原则为基础的妥协没有经受住斗争的考验，这猛烈地冲击了毫无思想准备的工人群众，如总理事会出人意料地拒不接受我们援助，而后又公然背叛罢工。对国际工人运动中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采取纯组织的、机关的和外交的做法，其错误在这方面已暴露无遗。

2. 这个错误在英国必然会更深刻地表现出来，对于这一点即

使没有掌握必要的实际材料也可深信不疑。英国共产党仿效我们，在有些问题上受到我们的直接暗示，实际上并没有批评总理事会及其拥护英俄委员会的领导人的政策。我们通过这种处事方法解除了英国共产党对工联领导人应采取十分明确立场的责任。我们似乎使英国共产党产生了如下想法：联共会通过英俄委员会和其他途径在这方面做一切必需做的事情。

需要注意的是，英国党在政治上尚不成熟，刚在摆脱极左翼宣传小组的状态。在这种条件下，英国共产党还必须发展自身的基本革命素养和作风，培养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领袖不妥协的精神。如果党不对国内，首先是工人阶级中所发生的一切不断作出积极明确的反应，这种教育与自我教育是不可能的。当然，这种批评工作不应具有封闭的宗派主义的性质。相反，这种工作应和目前英国党在群众运动局势下能拥有的全部积极性结合起来。现在我们还没有任何有关英国共产党在总罢工中表现的材料。但可以有把握地作出这样的猜测：英国共产党人（和我们）此前对总理事会的作为尚未使他们作好准备，他们在不断发展的事态中不能占有真正革命的、积极的、揭露形形色色工联分子不彻底性的立场。

我们对总理事会采取的行政外交式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不但使我国的工人造成了错觉，而且还提高了目前这样的总理事会在英国工人，包括他们中间的左派的心目中的威信。所有这一切无疑一方面使总理事会放开了手脚，另一方面使英国国内外工人群众难以确定正确的方针。结果，英国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在总罢工中所能取得的成果要少得多，而如果他们能执行我们党在这方面的一切传统所要求我们采取的更正确的，即讲原则的公开的政策，则取得的成果要大得多。

列·托洛茨基

1926年5月18日

No 10894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6年5月26日）

再一次向你问好！

由于你们总是忙于抓大事，一些小事可能就忽略了，因此，提醒你们注意几件必须办的小事，我想不会是多余的。

（1）应当提醒布哈林写一篇反对“工人反对派”的文章。这件事不能再拖了。要尽快把文章写出来。让布哈林写这篇文章比让格里沙^①写对我们有利。格里沙一拖再拖，令人不能容忍。让布哈林写，在战略上有利。布哈林完全有这个权利，因为格里沙对政治局的委托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态度。

（2）要尽快用西欧的所有主要文字全文出版我国（各地区的）工人支持英国罢工者，特别是采煤工的决议。我认为，应该出小册子，并由布哈林或托姆斯基写个前言。不用格里沙，也不用洛佐夫斯基。前言应当由布哈林或者托姆斯基来写。这个问题极为重要，决不能退让。出版事宜可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或国家出版社负责。用共产国际的牌子不合适，用这个牌子会把事情搞糟。最好是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牌子。

（3）请通报一下乌格拉诺夫和亚戈达报告的那件令人担心的事的情况。如情况顺利，就电告：“健康”，如不顺利，则电告（用明

^① 指格·季诺维也夫。

码)：“生病”。

暂且就写这些。天气好起来了。

约·斯大林

1926年5月26日

№ 1089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为英国罢工 开展宣传运动的决议

（1926年5月27日）

第28号记录

特别记录第22号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问题；（1）关于英国。政治局1926年5月20日会议，第27号记录第1点（洛佐夫斯基和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决定：（1）推迟讨论，列入今年5月31日（星期一）政治局会议头号日程。

（2）委托托姆斯基和契切林同志立即制定苏联工会援助英国罢工计划，同时起草关于援助的总结报告。将小组决定分送政治局全体委员。

（3）建议皮亚特尼茨基和洛佐夫斯基同志利用国外报刊公布苏联各工厂关于支持英国罢工并为之提供物质援助的决议。

抄件全文送洛佐夫斯基和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第（2）项送托姆斯基和契切林同志。[……]

№ 10896

征询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1926年5月27日)

听取：40. 英国事态（托姆斯基同志）。

决议：40. (1) 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出面汇出为英国矿工募集的40万卢布，并电告他们，数周内可望汇给两笔款子，约10万英镑。(2) 第二笔款子计30万卢布，过3天汇出；再过4天（如果罢工继续下去），再汇其余30万卢布。

抄件送：多加多夫和舍因曼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维·莫洛托夫

№ 1089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支持 英国工人罢工的决定的决定

（1926年5月31日）

第29号记录

（特别记录第23号）

1. 关于英国。

听取：政治局1926年5月27日会议，第28号记录第1点A款（季诺维也夫、洛佐夫斯基和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决定：1.（1）关于英国形势的总体问题推迟至下次会议，今年6月3日（星期四）讨论。

（2）认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会必须继续给予英国矿工罢工以最有力的支持和物质援助。

（3）认为在政治局决定总体问题以前，关于英国问题的发言必须遵循英国问题小组和政治局原先通过的指示，包括赞成英国共产党的路线。

（4）托姆斯基同志的声明知悉：他将在今年6月3日（星期四）向政治局全体成员分发关于政治局英国问题小组的书面工作报告。

（5）接受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建议，政治局下次会议关于英国问题的讨论须作速记记录。

（6）建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以政治局所交换的意见为基础，就停止给在巴统的两艘英船装货事起草一份给英国政府的复照，指

出由于苏维埃政权存在本身，苏联政府不可能干预工会所组织的罢工斗争。^①

(7) 委托托姆斯基同志保证从明日起在报上刊载表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关于支持英国罢工的指示已经得到实际执行的文章。

抄送：(1)、(3)、(5)项送季诺维也夫同志；(2)、(4)、(6)、(7)项送托姆斯基同志；(2)、(6)、(7)项送多加多夫同志；全文送契切林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维·莫洛托夫

^① 5月26日英国驻苏使团发出照会，要求调查停止给在巴统的两艘英船装货的原因。6月4日苏联政府照会英国政府，说5月初苏联工会宣布举行局部罢工，声援英国工人的大罢工，并按照此决定行事。两艘英船在5月19、30日卸货后离开巴统。

No 10898

莫洛托夫和布哈林致斯大林

（1926年6月1日）

5月28日，莫洛托夫给你寄去一封信，详细谈了季诺维也夫关于英国罢工的教训的提纲。我们认为，你务必马上读一下提纲并将自己的意见告我们。季诺维也夫改变了对稳定的估计和共产国际的策略，对共产国际迄今所执行的政策大放厥词，与此同时采取以前《时代哲学》^①的手法影射联共和个别中央委员，而且实际上倡导立即与总委员会决裂。托洛茨基也主张大张旗鼓地与总委员会决裂。我们认为这是召回主义的蠢举，中央委员会应当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应当揭露“左”的词句掩盖下的机会主义。必须摒弃季诺维也夫的提纲并代之以中央政治上明确的提纲，这一提纲应规定我们有对右倾分子和总委员会的所有“左”倾分子进行无情批评和揭露的权利和义务，但不应提倡与总委员会决裂。在我们中间意见基本上完全一致。布哈林认为最好不要提出反提纲，而是对季诺维也夫的提纲作相应的修改。关于英国的教训的讨论我们推迟5天，我们打算琢磨琢磨自己的提纲。盼迅速回复。季诺维也夫按自己提纲的精神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学员作了讲演。托洛茨基也随声附和。布哈林不点名地批评了他们。

莫洛托夫、布哈林

^① 《时代哲学》是季诺维也夫的著作，1925年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出版。

№10899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

(1926年6月1日)

布哈林正在写针对季诺维也夫的反提纲。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正合伙拼命逼我们。我认为，我们的提纲应当具有对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从根本上（尽管是怯懦地）改变现行路线的图谋进行坚决反击的性质。我们的提纲应当旗帜鲜明地捍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联共和全苏工会中央事理会的正确路线，同时要像列宁教导的那样，不仅要揭露极左派，而且要揭露披着伪装的极左派即共产国际中的“左派”。要揭露在同总委员会决裂问题上的冒险主义、召回主义。同时我们应当：1. 强调指出，稳定是相对的，资本主义各国孕育着革命的那些麻烦在增加，尽管仍然存在着两种革命前景；2. 右派的叛变和总委员会中左派的投降，而且客观上对此负有主要责任的是左派，因为他们在总委员会中占多数；3. 指出我们过去参加现在仍可参加英俄委员会，为的是能够同英国工人群众保持联系，但丝毫不要限制自己对总委员会的任何做法进行批评和支持英国工人运动革命派的权利。坚决维护英国共产党，批驳托洛茨基5月26日在《真理报》上将其称作“非革命的阻碍”因素的责难。你务必立即拿出意见来。你最好到莫斯科来，那样的话我们就把对英国问题的决定推迟到6月7日作出。

盼复。

莫洛托夫

№ 10900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6年6月2日）

莫斯科

中央委员会 莫洛托夫

今天收到了密码电报。莫洛托夫的来信还没有收到。我马上将提纲看完并告知我的意见。我不明白你们拥有多数他们怎么能逼你们。把问题再推迟一个星期，让他们见鬼去吧。关于提纲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应当好好地琢磨一下，不要着急。看来，他们想在英国的问题上捞一把，把过去的所有损失补回来。应当让他们放明白些。

斯大林

No 10901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6年6月3日)

立即解码

联共中央，莫洛托夫同志

格里沙的提纲实际上是根据下述考虑提出来的：1. 稳定正在或已经结束，2. 我们正在或已经进入革命爆发时期，3. 积聚力量的策略和在反动工会中的工作正在失去意义和退居次要地位，4. 统一战线的策略已经过时，5. 我们应当依靠少数人的运动来建立自己的工会。因此格里沙的建议倡导公开与总委员会决裂。

在当前的历史形势下，我认为这整个方针是根本错误的，因为这一方针是在帮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①和第二国际的忙，使我们共产党走上宗派主义的道路。

我认为：

(1) 稳定没有结束，尽管这种稳定过去和现在都不牢固。

(2) 英国保守党人挑动罢工表明资本企图建立牢固的稳定，也就是说，这一回发起进攻的不是革命而是资本。

(3) 这一企图不会也不可能使稳定得到巩固，但也不会使工人的革命斗争得到胜利的发展和破坏稳定，而且某几类工人甚至会由于罢工而难以保持原先的劳动和斗争条件水平。

(4) 因此现在不是革命猛烈进攻的新时期，而是持续的稳定，

^① 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1919年7月成立。苏联工会没有加入。

尽管是暂时的、不牢固的，但毕竟是稳定，这时资本家一再试图向工人发动新的进攻，而工人仍不得不进行防御。

（5）任务是继续实行积聚力量和统一战线的政策，并训练工人阶级去反击资本家的新进攻，把防御变为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广泛的、革命的进攻，转而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6）因此必须加强共产党人在反动工会中的工作，以达到从内部改造并控制这些工会的目的。

（7）因此要同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推行分裂工会运动、反对统一战线这样一条有利于乌达格斯特和扎先巴赫的路线。

（8）因此要同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把英国工会运动推向阿姆斯特丹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怀抱。

（9）因此要坚决反击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路线，这条路线使各国共产党同群众隔离开来并将群众置于改良派的独家领导之下。

（10）因此要坚决地反击一切倡导全苏工会中央事理会同英国工会运动决裂的图谋，因为在目前条件下同总委员会决裂不能不意味着同英国工会运动决裂从而有利于阿姆斯特丹。

（11）同总委员会决裂必将导致法德两国工会运动统一政策也遭到破坏，因为法国和德国的改良派丝毫不比英国改良派好。

（12）应当加强红色工会国际^①和少数派的工作，提高它们的威望。

（13）应当将英国共产党置于无条件的保护之下，反对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对该党的诋毁。

（14）应当接受洛佐夫斯基同志的一系列实际建议以及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之间达成完全的一致。

^① 工会国际（红色工会国际）成立于1921年，1931年结束，是左翼工会的国际组织。

(15) 对中派和总委员会中的左派进行无情的批评是绝对必要的。

(16) 这种批评不排除而且也不能排除保留英苏团结委员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17) 不应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提纲，而应以专门决定的形式通过一项决议，责成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关于五月罢工的总结报告通过一项决议，对右派的背叛行为和左派的优柔寡断提出批评，将通过广播播送这一决议并送英国共产党和少数派、总委员会周知。

(18) 英国的工会少数派和共产党应当开展一场要求改选工会执行委员会和总委员会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以便把托马斯之流的叛徒及其走卒从左派中驱逐出去并推举出新的革命领导人。

(19) 布哈林的提纲应当以政治局和政治局英国问题委员会^①就有关英国罢工问题通过的决议为依据，注意到季诺维也夫在他的提纲中背离了这些决议。

(20) 应当完全推翻季诺维也夫的取消主义的提纲并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提纲。

(21) 不用格里沙的提纲可能会导致以辞职相要挟，对此决不应惧怕。

(22) 我认为不需要前来^②。

(23) 如果仍然需要通过直达电报交谈，那么请发来电报，我将答复。

6月3日拍发。

约·斯大林

^① 1926年5月5日政治局决定成立英国问题委员会。由皮亚特尼茨基任委员会秘书。5月10日李可夫参加该委员会。

^② 原文如此。

№ 10902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6年6月3日）

莫斯科

联共中央，莫洛托夫同志

立即解码

密码№结束^①

布哈林的提纲务必清算季诺维也夫在英国罢工、皮尔苏茨基和中国革命等问题上十分严重的错误，并通过某种形式对这些错误提出严厉批评，因为这些错误有市场并得到了共产国际右翼派别的支持。

（1）在英国罢工初期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就向政治局提出了给英国共产党人的指示草案，这份草案是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中同情反对派的个别工作人员的参与下制定的。每一位政治局委员都很清楚，草案只字不提必须将总罢工引导到政治斗争的轨道上来，也根本不提打倒保守党人政府、工人政府万岁的口号。这一新指示和新口号是政治局的多数委员对季诺维也夫的草案所提的修改意见，季诺维也夫不得不接受了这些意见。这种忘记提英国罢工运动的最重要口号的做法不是偶然的，这是在帮托马斯的忙。无法保证季诺维也夫及其追随者在工作中不再重犯这样的错误。为了保证党不犯这样的重大错误，提纲必须清算季诺维也夫的错误。

^① 原文如此。

(2) 在大约一个月以前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向政治局提出了关于共产党最好退出国民党从而有利于国民党右派的这样一项纯粹取消主义的建议。政治局多数委员认为季诺维也夫的建议是一条取消中国革命运动的路线，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仍试图坚持自己的建议，实在坚持不住才被迫答应收回建议并接受了政治局关于加强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和集中火力打击国民党右派的建议。由于无法保证季诺维也夫的错误不再重犯，因而提纲务必清算这个错误。

(3) 在有关皮尔苏茨基占领华沙的最初消息传来的当天，季诺维也夫即在政治局波兰委员会的会议上当着温什利赫特、捷尔任斯基、多姆斯基、韦涅茨基^①及其他许多人提出了给波兰共产党人的指示草案，草案说共产党人决不能在皮尔苏茨基反法西斯分子的斗争中保持中立，草案把皮尔苏茨基说成是反法西斯主义者，把皮尔苏茨基的运动说成是革命运动，但草案却只字不提共产党人更不能支持皮尔苏茨基。

委员会的多数人提出了关于不允许支持皮尔苏茨基的一项主要修改意见，季诺维也夫被迫接受了这一意见，对自己的整个指示草案作了修改。我相信，季诺维也夫如今津津乐道的波兰共产党人的错误，完全是由于季诺维也夫认定皮尔苏茨基的冒险行为具有革命性这一极端机会主义立场所致。由于无法保证这些错误不再重犯，布哈林的提纲务必清算这些错误。我告诉你所有这些情况，同时请你将本件分送给最亲密的朋友们。

斯大林

6月3日21时

^① 文件有误，应为瓦列茨基。

№ 10903

托夫斯图哈致斯大林

（1926年6月3日）

1926年6月3日发自莫斯科

6月3日收到并解码

梯费利斯 外高加索党委奥尔忠尼启则立即解码交斯大林同志

昨天将署名布哈林、托姆斯基和莫洛托夫的英国问题反提纲分送给了政治局委员们。其他人完全赞同。^①今天政治局根据季诺维也夫的要求讨论了英国事务并作了速记记录。会议期间收到了你的来电。我们认定你是绝对赞同我们的，包括细节在内。政治局会议上斗争激烈——进行了6个小时。托洛茨基表决时支持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的提纲被否决。三人提纲基本通过并送交委员会。季诺维也夫要求允许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政治局没有接受他的要求。托洛茨基在表决时也反对这样做。详情见信……三人提纲今天发给谢尔戈。

提纲也给索契发去。

托夫斯图哈

^① 原文如此

№ 10904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6年6月4日)

莫斯科

联共中央，莫洛托夫同志

立即解码

密电收到。我早知道将会完全吻合的。请继续按此精神办。

敬礼！

斯大林

6月4日11时译成密码并拍发。

№ 10905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关于全苏工会中央
理事会谈英国总罢工教训宣言内容的建议**

（不晚于 1926 年 6 月 4 日）

为制定英国罢工教训提纲而举行的政治局英国问题小组
1926 年 6 月 4 日会议记录
（政治局第 31 号记录）附件。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宣言^①（应在两天内见报）应包括：（1）毫不留情地批评“左倾分子”并把“左倾分子”的行为（归根到底）看做是招致罢工失败的罪魁。当然，批评应当不避重就轻或避而不谈，等等，要让每个普通英国工人都能明白。不但“右”的而且“左”的叛徒的政治作用，尤须以鲜明的笔墨详加描述。（2）总委员会的整个破产应视为总委员会的“8月4日”^②。（3）宣言应含对英国工人的直接建议：改选总委员会，号召把至今起领导作用的工联“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撤职。

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

①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宣言《告全体国际无产阶级》是联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会起草的。最后由布哈林、洛佐夫斯基和托姆斯基修改定稿。1926年6月6日政治局批准，最后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体会议正式通过。6月8日在《真理报》发表。

② 这是把英国工联上层在罢工问题上的立场比作第二国际在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所持的立场。

№10906

托姆斯基关于为英国大罢工
赴巴黎之行的报告

(不早于1926年6月5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6年6月5日会议

第31号记录附件

绝密

在执行政治局5月4日决议过程中,我按政治局1926年5月4日指示(见特别卷宗),于5月5日前往巴黎。5月8日晨抵达柏林,在那里会见下列同志:布劳恩、明岑贝格以及两位德共中央委员。为执行政治局指示第11点,我建议明岑贝格同志是否可能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国际工人援助会为英国工人安排食品援助。明岑贝格同志告诉我,他同菲缅同志通过话,菲缅向他请求火速由国际工人援助会向英国罢工者提供1万英镑。援助会当然没有这笔现金。担任翻译的克拉夫特同志说,他手头有共产国际的一笔资金,他可以从中拨出所需款项,但必须由我这个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担保。我既不知道拨出的这笔钱的下落,也不知道英国人拒绝接受(此事于5月9~10日公布),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政治上和实际工作上确有必要为这笔款子作保,还从秘密基金中拨500美元给明岑贝格同志,供他前往阿姆斯特丹,以弄清同对他的委托相关的问题。

后来，正如已经弄清了的，明岑贝格同志把这件事搅得很乱，在共产国际自莫斯科中止了我所做的安排之后，他没得到钱，既把自己，也使国际工人援助会处于很难堪的境地。

我在柏林收到一项指示，建议在柏林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把台尔曼同志补充到小组中去，并就召开会议是否妥当一事，征求我、台尔曼、塞马尔和洪堡的意见。可惜，我在柏林未能见到台尔曼同志。只是到了巴黎，我和洪堡同志交换了意见以后，我们表示反对这一建议。稍晚，塞马尔同志也表示反对此建议。

在柏林同布劳恩同志谈话时，我已弄清，他们已经开展宣传鼓动运动。德共中央工会委员会3名委员已赴鲁尔，在鲁尔逗留时，他们号召莱茵运输工人罢工，但未奏效。布劳恩同志把德国工人的情绪表述为同情而不积极。募捐搞得很没劲，整个运动募捐不到5万马克。我清楚，德共对开展大规模突击宣传运动，在重要地方调集数十数百名宣传员的方法还不适应，他们甚至还没这样的机构，我建议同志们要关心设立这样的机构。

我于5月9日晨抵达巴黎，5月10日晨得以和洪堡同志会面。塞马尔和蒙穆索同志没在巴黎，他们到几个区去了。5月11日，布劳恩同志和共产国际代表扬一起来了，而塞马尔同志只是5月12日晚或13日晨才从地区返回巴黎。捷赫根本没来，但我们不得不等他。直到5月13日我们才得以成立小组，但12日晨在巴黎已经得知罢工结束了，我们把小组的会议移到了16日，（附简短记录）。

我在巴黎期间，每天都同洪堡和扬见面，虽则从秘密工作的观点看，这对洪堡有一定危险，对大使馆也可能不大好。

洪堡同志一直同伦敦保持联系，虽则有时通过间接途径。看来，他很艰难地在履行其领导英国共产党的职责。当然，洪堡同志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告诉我，就工作过程中所碰到的各种问题进行商

量。我不记得我们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分歧。例如，经洪堡同志建议，并得到我的同意的一项计划，主张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经济方面，加深和扩大罢工者的要求，办法就是使参加罢工时没有独立地提出要求的其他工业部门（工人）加入冶金工人的经济要求。我们建议，提出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的要求，同工贼作斗争，抵制他们，更加关注军队。据我所知，洪堡同志提出的指示一次也没有遇到英国共产党的反对。

5月12日午后，我正和洪堡同志在一起，得到第一批简短的消息，似乎罢工是在这样一些条件下结束的，就是恢复谈判，政府补助金发放到谈判完结，总委员号召结束罢工，恢复生产。有了这一消息，而且只有这一消息，我们便立刻起草给英国共产党的指示，并把它寄到莫斯科，请求指示。我们12日发的第一份电报是完全基于虚假消息的。但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你们报告来自英国的最初消息以及拟定相应的采取的措施。刚收到另一项（正确的）情报，我们同样不等政治局答复，主动地向英国共产党发出指示，此指示同晚收到的政治局的答复不差丝毫，就是：（1）竭力支持矿工；（2）千方百计地支持所有坚持罢工的工人；（3）无情地揭露所有暗中破坏者；（4）加强行动委员会。所以，我认为，散布有关“托姆斯基电报”的流言蜚语，为派别目的而在苏联，甚至在国外四处散布流言蜚语，是闻所未闻的可耻行径。

其次，季诺维也夫同志关于5月13日《人道报》文章的声明说，那篇文章似乎“不是没有托姆斯基的影响的”。与此相反，我同此文毫不相干，在5月15日以前我们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位法国同志。我从洪堡同志的话中得知他曾提议修改此文，但因技术条件所限没这样做。

除了报纸上的消息以外，我从 11 日到巴黎的罗森霍尔利茨^①同志和 16 日到巴黎的博戈莫洛夫^②同志得到过资料。他们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就写在他们的日记里。菲缅同志于 15 日抵达巴黎，16 日同我在一起。我们共同讨论了这天发表的托马斯宣言^③，要求博戈莫洛夫同志速往伦敦，以我和菲缅的名义，要求斯伟尔斯^④和希克斯^⑤等“左派”：（1）在报刊上载文反对托马斯宣言，（2）支持矿工。看来由于博戈莫洛夫的努力，出现了两份“三人”宣言，两份极糟糕的东西。从报纸上看，他们并没表现多少一点支持矿工的积极性。不得不就明岑贝格同志造成的难以置信的混乱对菲缅作长长的解释。

菲缅有关英国罢工的观点写在他的札记里。在柏林，应我的请求，他把札记给了我，并由我分送政治局委员。同他的其余谈话涉及他的巴尔干之行，《青年》杂志在德国、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安排等问题，同英国问题没有直接关系。

5 月 15 日，小组举行了首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蒙穆索同志没出席，台尔曼和捷克人没来巴黎。应塞马尔同志的请求，多里奥^⑥同志参加了会议。在小组内，同我的结论并没分歧。这些结论是：德、法共产党缺乏积极迅速地开展活动的准备，缺乏一个把各党中央的口号变成群众行动的机构，罢工期间工作节奏太慢——

① 罗森霍尔利茨，阿·巴·（1889～1938）——1905 年入党。苏联驻英全权代表处参赞、代办。

② 博戈莫洛夫，B.（1890～1937）——苏联驻英全权代表处秘书。

③ 大概是指托马斯发表的公开宣言——如果总罢工成为政治罢工，他将反对这种罢工。

④ 斯伟尔斯——领导机器制造联合会，工联工业委员会主席，负责调节煤矿工业内的冲突。

⑤ 希克斯（1879～？）——英工联领袖之一，建筑工人联合会主席，总委员会成员，工联工业委员会成员。

⑥ 多里奥（1898～1945）——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对此全体一致同意。

是否归咎于西欧各共产党，或者此间应负较大的责任，这是另一个问题。

对英国共产党的行为，小组成员中谁都没产生怀疑。大家都认为，这个年青的、党员人数不多的共产党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基本任务。（附1926年5月15日小组会议简短记录）。

5月15日我们收到了斯大林同志阐明政治局14日决议的电报，并立即复电（见特别卷宗）。同时收到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密信副本。我们再也没收到别的任何指示。

菲缅和博戈莫洛夫于17日晨启程。18日晨我乘车赴莫斯科，在柏林逗留了8小时（不是由于我的原因），将近12时，菲缅和帕斯尔^①来我这儿。帕是在阿姆斯特丹和菲缅相遇的。帕斯尔不但替自己和总委员会辩护，而且完全符合逻辑地也替托马斯辩护。第一次谈话持续了1个小时，大约4点又恢复谈话。总是几乎他一人独白，因为帕斯尔很急躁，时时打断我的话，解释条件、章程和传统等等。他的辩白，可归纳如下：

1. 罢工只能在经济旗帜下举行，否则就完全不能举行；后来赋予罢工以政治性质便导致分裂和罢工失败。

2. 罢工必须在极盛之时结束，否则就有从山上掉下来的危险，那时就会完全崩溃。

3. 他们光荣地结束了罢工，因为罢工的目的是在不事先决定降低工资的条件下恢复谈判。

4. 矿工们使问题复杂化了，因为他们的要求不明确，没有纪律，拒绝服从总委员会，而总委员会是为他们而号召全体工人罢工

^① 帕斯尔（1872—1936）——国际工会联合会主席，英俄委员会创始人之一，主张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在五月罢工期间持保守立场。

的。

随后他谈了传统和章程等。但他承认，在提出第一个托马斯计划时，他们犯了错误。他许诺过支持矿工（执行得不好），坚持要求赦免因参加罢工而被捕的工人，对身体受到伤害的工人及其家属提供物质补偿。他认为，同苏联工会的关系依然不变。在他看来，拒绝接受苏联工会的援助是错误的，他要我相信，此事如果过两天在他参加下表决，就会被接受了。

5个半小时谈话结束了，因为，他急于赶火车。整个会晤带有冷淡和正式的性质。帕斯尔给我留下很不舒服的感觉，此人正处于政治上醉后头疼的状态，害怕承认自己所做的一切错误和不像话的事。菲缅的印象也是这样。过了1小时，我离开了柏林。我对英国大罢工的总评价以及这次罢工的教训，将在专门文件中叙述。

米·托姆斯基

№1090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批准给
苏联矿工工会代表团的指示草案的决定**

（1926年6月14日）（征询通过）

第33号记录

特别记录第25号

听取：11. 给苏联矿工工会代表团指示草案（政治局1926年5月8日会议记录第33号第6点）。

决定：11. 接受托姆斯基、洛佐夫斯基和施瓦茨同志提出的指示草案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同志的修正案（见附件）。

抄送：托姆斯基、洛佐夫斯基、施瓦茨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维·莫洛托夫

给苏联矿工工会代表团的指示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6年6月14日批准

第33号记录第11点附件

[早于1926年6月14日]

1. 会议^①应从讨论有关罢工的事务性问题入手，大致上是这样的：

^① 指讨论继续给予罢工工人以援助的英苏矿工会议。

(1) 库克做关于罢工进程的报告；

(2) 施瓦茨做关于在苏联，尤其是在矿工中开展声援运动的报告。此报告稿委托洛佐夫斯基同志起草，由多加多夫、布哈林和契切林同志终审。（此报告要写得以后可供报刊发表）。

2. 应局部授权代表团以谨慎的方式宣布，募捐正在进行，英国人可望近期得到 30~40 万卢布。以后还可能得到大致同样的数目。

3. 建议英国人签署双方工会致各国矿工和全体工人书，呼吁援助英国矿工的斗争。

4. 建议英国人缔结英苏矿工工会兄弟友好条约（或宣言）。

5. 该兄弟友好条约应包含：

(1) 相互帮助的义务；

(2) 通过召开国际矿工团结代表大会，为争取建立统一的矿工国际而共同斗争的义务；

(3) 加强苏英工人阶级之间的兄弟联系，巩固并振兴英俄委员会；

(4) 谴责一切对矿工斗争实行怠工、不支持他们罢工的人，即首先尖锐而鲜明地谴责总委员会的叛卖行为，既谴责其右翼领袖（托马斯），也谴责其左派领袖（帕斯尔和希克斯）；

(5) 指明英国矿工不但为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而且也为保持全欧洲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斗争。有两条路线：一是资本家推行与工资水平极低的工人取齐的路线，也就是把欧洲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二是与较高的工人工资水平取齐，提高低工资的路线。

(6) 资本对工人的经济进攻已经变成了资本的政治进攻，因为资产阶级动员了国家政权的全部力量，用这些武器来进行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

(7) 矿工和整个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相互支持是工人阵线的真正基础和反对沙文主义腐蚀与战争挑拨的可靠手段。

6. 代表团应坚持的方针是，通过建立委员会（英苏矿工委员会）在组织上巩固兄弟友好条约，委员会将把共同通过的决定付诸实施。

7. 苏联矿工代表团应正式邀请英国人在罢工结束后派代表来苏联。最好能当场邀请库克本人。

8. 预计在这次会议前夕，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革命矿工代表将到柏林。代表团可酌情决定，组织一次示威，以显示革命矿工同英国矿工的团结一致。

9. 国际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国际革命矿工会议^① 应按行将达成的英苏矿工协议的路线进行工作。

10. 在国际共产主义的一切报刊上，应把加强对英国矿工的援助运动同英苏矿工会议^② 联系在一起。

① 会议于6月15~16日在德国埃森秘密举行。与会的有欧洲8国的矿工代表以及工会国际和德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号召全体矿工停止向英国供煤，用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支援英国矿工。

② 英苏矿工会议于1926年7月7日在柏林召开。会议仅达成为维持联系而成立英苏委员会的决定。

No 10909

**托洛茨基在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主席团代表团
会议上就英国矿工罢工问题提出的建议**

（1926年6月18日）

绝密

1. 认为英国采煤工人罢工是现今国际工人运动的基本事实，它的结局将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决定无产阶级斗争的命运。
2. 应以比迄今为止更为广泛的规模，从物质、组织和政治各个方面提出给英国采煤工人以援助的问题。
3. 吸引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所属的一切组织，包括在它们领导及影响下的各种组织，参加支援煤矿工人罢工的工作。
4. 应给自己提出目标，至少使无产阶级先锋队意识到，自己是英国罢工的直接或间接的参加者，这场罢工的结局将决定，或者资产阶级制度得到巩固，或者革命发展得到加快。
5. 在有共产党员的一切会议，一切机构和一切组织内（党的、工会的、合作社的、国会的及其他组织的集会和会议上），共产党员们必须为英国采煤工人呼吁。
6. 应在全世界大大加强争取停止向英国出口煤炭的斗争。
7. 英国共产党应当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到罢工斗争上，按“战时”方式动员党员。
8. 这整个运动应当提高并巩固采煤工人的士气，粉碎叛变了的领袖们关于罢工很快会因疲倦而结束的指望。所以，运动必须无

情地加以揭露的，不只是叛变了的领袖们，而且还有动摇不定的领袖们。

9. 罢工的政治锋芒应当对准保守党政府。采煤工人的罢工无疑将动摇由于取得了对总罢工的胜利而得到巩固的保守党政府的威望。国际上对罢工的支持当更加动摇保守党政府的权威。

10. 整个运动良好的，即更广阔而有效的发展预示着这样一种前景，即采煤工人的罢工发展成更广泛的罢工，甚至发展成总罢工。英国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方针应当如此。我们工作的性质、力量和速度取决于这一方针。但号召举行新的总罢工问题本身，只能根据运动的进一步变动和发展过程，方可提出和决定。

11. 为领导运动，需要有一个规模不大，但内行而有权威的在欧洲的参谋部，参谋部内有一个处于良好状态，即首先具有创新精神的政治领导。

列·托洛茨基（签名）

№ 1091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向英国矿工
总罢工参加者提供补充财政援助的决议**

（1926年7月8日）

第39号记录（特别记录第29号）摘抄

听取：3. 外交人民委员部问题。（2）英国问题。（洛佐夫斯基、皮亚特尼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多加多夫同志）

决定：3.（2）认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有必要向英国采煤工人提供为数105万卢布的补充援助。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名义，速汇37万卢布，并将此事通知施瓦茨同志。余数在3天内分次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女工委员会的名义寄出。

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No 10911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6年8月27日)

致莫洛托夫 (并转朋友们)^①

(1) 英国采煤工代表团如果现在还没有到达苏联的话, 可于近日内到达。对代表团的接待工作要“完全照规矩”进行, 并要多给采煤工筹集一些钱。据说, 美国人答应给100万美元。我们得尽快筹集并寄出200万卢布左右 (不能少于美国人), 甚至300万整。英国的形势严峻。我们不得不作重大“牺牲”。

(2) 我认为应当通知安德列耶夫, 要他坚持禁运。^② 禁运问题现在已经迫在眉睫。英国共产党人掀起了强大的运动支持禁运。不能允许总委员会光号召筹款了事。这样做现在已经不够了。现在应当竭尽全力支持禁运。顺便问一句, 安德列耶夫的情况如何?

(3) 我看, 无论是我们的报刊还是英国共产党的报刊都没有利用托马斯和韩德逊逃避在“工党”和“工会总委员会”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这一事实 (“他们去休假了”, 一个去了加拿大, 另一个去了澳大利亚)。我国的和英国的报刊应大张旗鼓地揭露这两个叛徒是在逃避责任, 以便在讨论罢工问题时由于他们缺席而不会触及他们。还要揭露, 是总委员会和工党执行委员会帮助了这两个人逃避监督, 因此它们理应对这两个人的丑恶行为负责, 等等。奇怪的是, 英国的 (和我国的) 报刊对此却沉默不语 (我看英国共产党的

^① 左上角有批语: “已阅。布哈林、占比雪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

^② 指禁止向英国输送煤炭。

报纸，知道它们没有对这些事实加以揭露）。

（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你关于开展运动要求解散国会和重新选举的信反应如何？英国共产党人对此事有何看法？

（5）出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周刊（《共产国际》）之事不能拖延。你和布哈林都要抓这项工作。它对于改进和改革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整个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布哈林对此有何看法？

（6）经济方面的情况如何？征购工作进行得怎样？出口情况如何？请有空时简单告诉我一下。

祝一切顺利！

约·斯大林

1926年8月27日

在斯大林8月27日信上写的意见

关于第一点。（a）托姆斯基答应今天安排发表矿工中央委员会就英国采煤工罢工4个月给他们的公开信。公开信中说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矿工中央委员会相信，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关于百分之一的愿望定会实现。这件事现在至关重要，因为罢工的采煤工9月2日要举行代表会议。^①

（b）赶在工联代表大会召开之前（9月6日之前），在工会举行的有矿工代表团参加的隆重集会上解决200万卢布的汇款问题。政治局还要对这个问题（b项）进行讨论。

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我完全赞成。仅作一点补充：应该掀起一场运动，特别首先是在英国，宣传解散国会、“打倒保守政府，

^① 1926年9月4日政治局以征询的方法通过托姆斯基提出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告英国矿工联合会书。

支持真正的工人政府”等政治口号。

维·莫洛托夫

9月1日

(1) 施瓦尔茨和我都同意发致敬信，9月1日2时还要同莫洛托夫商量一下。

(2) 赞成援助，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

(3) 我不反对揭露托马斯和韩德逊，但是不认为这样做在政治上会有什么显著的作用。

米·托姆斯基

9月1日

No 10912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26年9月8日）

9月8日

来信收悉。

（1）我们的代表团在柏林表现得确实不错。^①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总的来说是好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呼吁书也是好的。托姆斯基的答记者问很精彩。关于给总委员会或采煤工联合会提供借款的问题，我不坚持己见。我想借款问题可以暂时缓一缓。我当初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向“欧洲”表明，我们的共和国不是“钱袋子”，我们的人是节俭的，善于节省每一个戈比，我们现在把钱借出去，将来还要把它收回来，等等。但这个问题可以暂时缓一缓，也许就根本不再提了。

（2）关于中国的问题，我已经发了密码电报。我相信，柯普和谢列布里亚科夫是不会执行我们的政策的，他们只会给张作霖提供钻我们空子的机会，并断送我们的事业。如果再把柯普派回日本，实际上等于推翻政治局关于柯普和加米涅夫的决定。一部分政治局委员没有充分根据就改变另外一部分政治局委员作出的决定，这样不好。现在你无疑看得更清楚，但不应当因为张作霖

^① 1926年8月2日在柏林召开的英俄委员会会议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建议开展广泛的运动支持英国矿工的斗争，直至对英国实行煤炭禁运。英总委员会代表团拒绝了这一建议。

(他受柯普的鼓励) 要对我们进行讹诈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祝一切顺利!

握手!

约·斯大林

【专题说明】

农业集体化问题（一）

（1926年4月至1930年7月）

这是有关实行全盘集体化之前的苏联农业和农村情况材料。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农民来信，它们反映了当时苏联农村的部分情况。另一部分是一些农业问题和经济学家对苏联农业发展道路的看法。1927年10月，联共中央就农村的发展问题发函征求专家的意见，其中有恰亚诺夫和康德拉季耶夫。尽管时间非常仓促，他们都赶写出了报告，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得到的回应是斯大林1929年12月27日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对恰亚诺夫等人观点的批判。

（本专题文件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孟韵怡、吴安迪、周绍珩、李树柏翻译）

№05306

农民扎科特诺夫关于 农村状况给《农民报》的信^①

(1926年4月7日)^②

我思绪翻腾，不得安宁，疾病缠身，老是头疼，对各种非法行径忍无可忍（酗酒、流氓行为、各种丑事、诈骗、兽行、偷税漏税等等）。亲爱的兄弟们，如果哪怕有一个可靠的搞政治工作的同志来到我这里，我就会把敌人从1917年直到现在所做的全部欺诈行为和有害的地下活动统统揭发出来。亲爱的弟兄们，我从1916年就开始斗争了，那时候莫斯科和博戈罗茨克城在暴动，巴甫洛夫镇的莫洛佐夫工厂和俄-法工厂的工人们在暴动。我那时还和工人们有联系，而且我恰好在那里干活。亲爱的同志们，我从那时起一步都没有后退过，真心实意地与不公正的资产阶级法律作斗争，工人和农民一直受这些法律的压制。同志们，我无法容忍，总是怀着不容忍的心情进行激烈的愤怒的争论，我不能控制自己，再加上我们这里有些人是那么富有和傲慢。我受到的正是这种压制，那些觉悟很低的人，亲爱的同志们，从各方面竭尽全力压迫我，用各种各样

① 这是1926~1928年间《农民报》收到的农村来信，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苏联农村的现实状况和农民的心态。本卷共收这样的来信5封。

《农民报》1923年11月23日至1939年2月28日在莫斯科出版，双日刊。由于通俗易懂，拥有广大的农村读者，发行量达300万。农民们也经常给报纸写信，反映各种情况和要求。从1923年到1933年这10年就收到500万件以上的农村来信，当然多数信件没有发表，这5封信就是未曾发表的众多来信中的几封。写信者文化水平较低，某些语词很难读懂，只能揣摸其意思翻译。

② 编辑部登记的日期。

的手段威胁要打死我，批我等等，还不断侮辱我，妨碍我种庄稼。亲爱的兄弟们，我是一个干农活时非常热情，而在不公正面前非常激愤的一个人。所有我的这些敌人，从革命一开始就迫害我母亲，我母亲就每天拿大棍子把他们从院子里赶出去，并准备打死或毒死他们。我很想文明地种庄稼，可我的内心又一刻不能停止斗争，在我的内心——不公正，这是头等重要的事，而经济又比什么都宝贵（真理），因为受苦受难的人们斗争了几百年才获得无产阶级专政的真理。而我这个庄稼汉，亲爱的同志们，坚定不移地证实，这是人民的意志，在人和机器〔……〕的意义上，共产主义灯塔是非常有能力、非常光明、非常科学的东西，而机器——就是手茧和劳动的手。所以，亲爱的同志们，多少次我急不可耐地跑到新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那里，到各种联合会、座谈会、劳动组合、社会团体去，可是毫无结果。为什么？你看，我还没有到那里，不管我说什么，别人就取笑我，想尽各种办法骗我。党支部书记也是这样取笑我：“是列宁把什么东西塞进你脑子里了，你怎么变傻了呢？”。支部从来都不开座谈会，在会上什么都听不懂，总是逗弄和嘲笑别人。就这样，我亲爱的同志们，把我弄得头昏脑胀，不能工作，头总是痛得厉害。

北高加索边疆区沙赫特州卡缅斯克区普列沙科夫村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扎科特诺夫

为生产创造，为新的机器和永动机向亲爱的兄弟，国民经济的劳动专家致以衷心的敬意，向全俄农业机械和农具辛迪加的兄弟们致敬，我在内心深处，深深地怀念着全世界的兄弟们和劳动群众。我的亲兄弟们，劳动人民的思想更英明，在思想自由的国家，整个机器更加牢固结实，不弄虚作假。大家在工作中都更诚实，自由之路把机器联结得比人更好。我肯定，自由的工人的道路在打断资产

阶级技术和尾巴理论，因为资产阶级临近了，逼近了，它庞大无比，进行疯狂剥削，发财，压迫工人阶级，吸工人的血。这资产阶级千百年来一直掌握政权，全副武装，压迫工人，它用工人的血做成武器来消灭工人阶级。现在，亲爱的兄弟们，应该倒转枪口对准他们，偿还我们兄弟们的血债。这是我们亲爱的领袖列宁的真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扎科特诺夫

No 05307

农民库利科夫关于住疗养院给《农民报》的信

（1926年12月6日）

天 堂

我不知道我这个贫农罪人有什么福分竟到了乌索利耶疗养院这样的天堂，现在我要用自己多智慧的知识哪怕简单地写一点这座疗养院。当我这个满身污垢、衣衫褴褛的罪人，一个刚刚放下犁的农民在狂喜中被拉到这个天堂的大门口时，我眼前呈现了下面一幅画面：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位天使，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白衣服，领着我这个穷罪人去经历难免的苦难。第一个苦难：把我的头发全都剃光并且把胡子剃光。我乖乖地服从一切。这之后，另一个天使把我领进了一个暖和明亮的房间，在那儿给了我一块肥皂和一个软乎乎的东西，告诉我要在热水喷泉下洗洗干净水淋浴，我也听从了，之后我感到非常舒服。过了这一关，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干净漂亮的白色天使，她让我跟着她走，我也听从了。她把我领到一个清洁明亮的房间，这里为我准备好了床位。我在这里看到几个人，同样也是贫农罪人，和我一样。天使给了我一套干净衣服，给我安排了同样干净软和的床铺，临走时对我说要保持清洁，不要往地板上扔烟头，这一点我也服从了。因为天已经黑了，我便躺下来睡着了。噢，我在这么软和的被窝里睡得多么熟，多么香啊！第二天，另一个天使把我带到一个干净的饭厅里，人们给我送上早茶、白面包、鸡蛋、香肠、火腿和黄油，我喝了点茶，就表示感谢，可连自己都

不知该感谢谁。然后由这个天使把我介绍给另一个更有风度的天使，她马上命令我把衣服扣子解开，我照做了，她开始给我听诊，检查我有什么病，想帮我解除我身体的沉重的病痛。检查之后，给了我一个小本子，命令另一个天使领我到能治病的水池中去，我也听从了。在治病的水中洗完澡之后，有人把我领到花园里。在花园里，在一个干净的房间里，放着好几排铺着白色桌布的桌子，这种奇妙的环境使我惊奇不已。突然有一个天使走到我面前，他长着一头卷发，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他向我推荐了几种小本子上写着的食物，但我没讲话，不知道怎样回答他，过了几秒钟我才对他说，让他给我端来我喜欢的俄国红菜汤，他听从了我。这之后我看到了：这天堂里有着棵生命树和一棵善恶树。在生命树上长着各种果子，而在善恶树上挂着许多瓶子，但我决定不去动它们，因为我这个贫农罪人认为这是不行的。

我在这里还看到许多东西，我不想描述它们，因为我对这些不大感兴趣。不过我倒对一点很感兴趣：9年前哪些人有机会在这个天堂里享乐。我从一个天使那里得知，那时只有大腹便便、装着一袋袋金子的上流人才能在这里享乐，我们这些穷苦人甚至连靠近这个奇妙天堂的篱笆都不许。得知这些以后，我好像都晕过去了，可是当我清醒过来之后，我想起一个天使对我说过的话，他说我在这个天堂里只住一个半月，然后……以后呢……以后我这个贫农罪人只好回到老家农村的地狱里去，又去住那间破旧的小木房，幼小的孩子们穿着破烂肮脏的衣服，以后我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这样的天堂。但我知道，贫苦农民在自己生活中会等到、看到地上天堂曙光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而对我来说，再没有比给《农民报》写文章这件事更使我高兴的了。

叶尼塞斯克省坎斯克州乌斯季扬斯克区尼古拉耶夫村

瓦尔拉姆·库利科夫

№05308

农民梅利尼钦科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的词义给《农民报》的信

（1927年2月18日）^①

寄往《农民报》编辑部。请编辑部将我的文章刊登在报纸上。

寻找社会主义

首先，请原谅我文化水平不高，又不是什么编辑方面的内行，但不管怎样，我想对我们国家政治制度方面的认识谈一点看法。我是国家管理系统中最小的一分子，因为我们共和国的政权是人民的，而我就生活在这个共和国之中。事情是这样，我们这些公民们是一批无知的群众，当遇到某些问题时，我们看不清它的实质。虽然，也许，这不重要也不太相宜，但我仍然这么想，我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别的我不会写。我们这些文化不高的农民是这样理解的。我碰到我们国家名称的四个字母——CCCP——并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分析，这些字母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叫，给每个字母做出结论。一个字母C指的是联盟。这是因为有一些共和国联合在一起，这是对的。另一个C指的是苏维埃的，这是因为在这些共和国内，政权属于苏维埃，这也名副其实。还有一个C，意思是社会主义的。这一点我不能确定，而且好多农民也无法明白。你看，

^① 编辑部收文日期。

我们和千百万同样的农民在一起，和政权的代表者们在一起，也许因为我们是无知的农民，看问题有很大错误，不过我还是怎么都不能确定，这个社会主义到底在哪里。我看到有个农民走进小店铺，穿着破旧的衣服和靴子，戴着破帽子，买半俄磅糖，一俄磅盐，勉强能凑够钱来交款，于是我想，社会主义就在这里吗。我得出结论：不，社会主义在这里支持不住，因为它在这里被剥掉衣服，社会主义会冻僵的，而且这样的购买力，社会主义无法生存，这里没有社会主义。这里来了另一个公民，穿得很体面，很好的半短皮袄，皮靴和胶皮套靴，买10俄磅糖，5俄磅李子，5俄磅樱桃，3俄磅葡萄干，10俄磅鱼，1俄磅花生酥糖和一块香皂，于是我想，也许社会主义在这里，可我又得出结论：这里没有社会主义，它穿着这样的衣服虽说会暖和起来，但这样买东西它会撑坏的，会垮台的，这里没有社会主义。又看到路上有个公民赶着车，拉着一车东西，是用马车拉货的人，到了山前马不拉了。他不住地鞭打，感到苦恼，四周张望，我想，也许社会主义就在这里，我考虑了一会儿得出结论：不，在社会主义下要像这样工作就得患心脏病，也会垮台，社会主义也不在这里。又有一个公民带着妻子奔驰而来，马车夫赶着好几匹马。我瞥了他一眼，噢，社会主义应该在这里，我又得出结论：不，社会主义在这里要睡着，因为它坐在车上游手好闲，在四轮马车上昏昏欲睡，睡着了就会迷路，这里也不会有社会主义。我又看到：在城里坐着一些没有工作的雇农——我是不是在这里找到了社会主义？我得出结论：不，在那样的环境下，破衣烂衫，忍饥挨饿，社会主义在这里也坐不住。你看，一个富有的油坊老板一边跑一边说：“我那里有三个人工作，到我那儿去洗井台，快走吧，我赶快去拿东西，再过一小时我就得去州里”。于是我想，也许社会主义在这里，又得出结论：不，在这种不安宁的生活里社会主义生活不了，它要跑累，跑垮，这里没有社会主义。

我就是找不到，“社会主义的”这个词究竟适用于何处，我暗自想，是不是不知不觉地出了错：把 K 错写成了 C。把苏维埃资本主义共和国联盟错写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想，就是这样，是个错误。不过，要是比我聪明的人有什么说法，也许我会同意他们的意见的。

编辑部恐怕很难把这篇文章刊登，因为它编写得没有文化水平，完全是农民的特性，农民的教育水平。

因为在报纸上大多刊登那些由有文化好的作者编写的文章，而没文化的农民的文章，要不是不着边际，就是离题太远了，特别是“社会主义”这个非俄语名词，不过，我还是请求编辑部把我这封信一字不差，一字不漏地刊登在报刊上。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季诺维耶夫
斯克州博布里涅茨区别列斯拉克斯克镇
农民梅利尼钦科

№10913

**联共（布）中央全会讨论米·萨夫琴科
来信速记纪录摘抄^①**

（1927年2月11日）

“加里宁：……我现在就再给你们读一封信，它不是打印的，这封信是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萨夫琴科的胞兄，我的老朋友写给他的，我同写信人1900年在梯比利斯流放时曾在一起，他那时是社会民主党人，此后在斯摩棱斯克省务农。我认为，这封信具有重大意义。他是一个感情十分外露的人，一生都在同不公正的事情进行斗争。

托洛茨基：他不是党员吗？

加里宁：他早已不是党员了，但是他当然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参加过小组的学习，坐过三四年牢。

斯大林：生活过得不错吗？

加里宁：过得不借。

托洛茨基：有文化吗？

加里宁：是的，有文化，他的声音有很重要的意义，不过不管怎样，还得说一下，他同地方当局关系搞得不好。按他的思想气质，他必然要批评；批评他所看到的每一个失误，他必然义不容辞地向社会揭露这个失误，并且该揭发谁就揭发谁。

① 1927年2月11日加里宁在联共（布）中央全会讨论《关于苏联和俄联邦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时宣读了米·萨夫琴科的信，引起了一番议论。这是有关部门的速记纪录。

米高扬：这是反对派分子的特点。（笑声）

加里宁：是的，是反对派分子的特点。

季诺维也夫：现在最好不要往下读了，米哈依尔·伊万诺维奇。

托洛茨基：不然，会指责你同情他了。

加里宁：‘人们完全陷在富农的事情上了’（当然，这封信不是用来发表的）。‘现在，我要同自己的黑帮苏维埃进行顽强的斗争’……（笑声）。

托洛茨基：开头还不错。

加里宁：……‘它为了逃避我的批评，就把我划成富农并剥夺了我的选举表决权。这伙人同乡执委会主席米哈依洛夫沆瀣一气，他的鬼把戏我知道，实际上，说他是像中国皇帝那样的共产党人。所有这一切我必须证明并将斗争到底，但在他的关系网中，这件事办起来并不容易，但已经发出挑战，战火已经燃起’（笑声）。‘我觉得，不是他们一伙坐牢，就是我……’（笑声）。

托洛茨基：也许两者一道。

加里宁：‘……因为诽谤’。

插话：小小的差别！

加里宁：‘沙皇的监狱我很熟悉，也许，我还不得不去熟悉一下苏维埃监狱。但是，这将成为永远放弃任何企图同现代的恶进行斗争的教训：究竟是些什么事，我不给你写（要写就得写很多），而我也不想连累你，不想求得你的任何同情。要知道，我了解你们的共产主义道德，它主张不仅要抛弃兄弟，还要抛弃父母’（笑声），‘如果他们是资产者或富农的话，那样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而我，兄弟啊，要知道如今已成了“富农”了（他们把富农加上引号），虽然条例中的第14、15和17款说明，剥夺我的选举权和把我划为富农是错误的，因为我的经营并没有越出劳动经营的范围，我和我的妻子，虽然劳动能力不强，但我们不停地劳动，但

不幸的是我现在雇了一个工人，我不打算交出土地，而地方村苏维埃指出，我不劳动，雇了一个男工和一个女工。但这是无中生有。我雇女工时，没有雇男工。这正像俗语所说，蜗牛暂时还在爬，而当它将要爬到时，选举已临近眼前，那这帮好汉又可以当选了，因为他们把积极分子拉到了自己一边，而我本应为落后群众说话的，因为我知道他们出卖灵魂和一切卑鄙勾当。但我甚至被剥夺了出席选举会的权利。你可以想像，这是多么大的侮辱；我，一个老政治工作人员，在沙皇时代是无权的，而现在仍然如此，虽然我同苏维埃政权是完全一致的，但却不得不为恢复自己的公民权而奔走，为的是不成为一具政治僵尸。我只在一个方面同意反对派……’（哄堂大笑）。

应该说，同志们，你们感到好笑，但无可怀疑的是，他对所有问题的分析不亚于共产党员。他有点信心十足的派头，但他分析问题却不亚于任何一个共产党员。

李可夫：读吧，读吧！

加里宁：‘我只在一个方面同意反对派，即多数农民是敌对分子。如果不是这样，那他们就会对我拥护政府的行动表示欢迎并把我拉出去，而不是扔到富农的火坑里。我从侧面听到人们嘲笑说：“你热心过了头，你保卫政权，那就让这个政权也把你掐死吧！”要知道，事情就是如此。兄弟，不论你怎样去解释这类历史必然性的丑恶现象，但要我去吻打我的棍子是令人痛苦的’（笑声），‘我本要给加里宁写信’……我就读到这里吧。但我认为（笑）是不必要的。

众人：读吧，读吧，读吧！

托洛茨基：全读完吧！

李可夫：加里宁同志不是邮政局长，而这里毕竟也不是《钦差大臣》中的最后一幕。（哄堂大笑）

加里宁：同志们，我只是想节省时间。请吧！只有托洛茨基同志才善于把每个字母要么藏起来来，要么不读完，要么改头换面地读……

托洛茨基：干嘛把我扯进来，我与此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加里宁：你们知道，我是个老实人，只是想节省时间，不过我还是把全信读给你们听吧：‘我本要给加里宁写信，但很难指望他收到信，而我现在又很难到莫斯科去，因此我请求你，如果你什么时候有机会同他谈谈的话，那你就说我请他看在老交情的份上把我从富农的火坑中救出来。要知道，我们过去曾经是朋友；对他来说，这是区区小事。当然，如果他忘了我，这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我就只能安于现状了。’

因此，你们可以看到，我这里没有任何政治用意。要是你们愿意，我就连附言也读了吧：‘考虑到党对农民的态度决议，许许多多农民的处境十分困难，例如：有土地和生产设施，但没有劳动力——就等于没有家当一样。比如，我暂时还有一部分劳动能力……’他已经56岁了，他的妻子患病，三个孩子还小，从2岁到6岁……‘但就连我劳动，我也被划成了富农，而当这最后一点劳动力也将丧失时（家里也没劳动力），那时怎么办呢？只有两条出路：一条出路——去找“土地局”，另一条出路——去讨饭，请人家“看在上帝的份上”给点施舍，但对我而言，第二条出路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不信神的。那我就必须请人家“看在苏维埃政权和未来社会主义的份上”……而庄稼人是不会为此而施舍的。就是说，出路只有一条——去找“土地局”。根据现有的原则，我一点儿也没有言过其实。也许，今后，国家将对此作出规定——我们将期待着’”。

№02428

古巴诺夫^①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们

（1927年4月18日）

急件

秘密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

亲爱的同志们：

鉴于全苏第四届苏维埃代表大会^②上已开始工作并将就农业问题作出决定，我出于党员的职责提请你们注意农业政策问题。我认为，党的农村政策问题一向是，并且特别是在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下仍然是必须立即着手全力以赴地去抓的基本环节。

李可夫同志在第13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③的政府报告中已简明扼要地谈及农业问题，但在经过讨论和读了递上的条子后，他不得不在总结发言中详尽地说明这些问题。而这些并非偶然。这说明我们对农民问题应当给予最大的关注，农民经济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解决。

我们不应忘记，在缺少本国资金和广泛的外来贷款、在各工业

① 古巴诺夫，A.Г.（1892～？）——1917年入党。1926～1927年任中央消费合作社原料部主任。

② 苏联第4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18～26日召开。加里宁在会上作了《由国民经济和国家工业化的普遍发展而提出的农业的基本任务》的报告。

③ 第13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10～16日举行。李可夫于4月10日在会上作了《俄罗斯联邦政府工作报告》，11日作了总结发言。

国家没有爆发革命的条件下，我们以国家工业化为基点的整个政策总会遇到我国农业问题这个障碍的，因为我国工业所需技术装备的进口和我国工业的发展有赖于农业的发展。

我们不应忘记，我国出口的主要项目是农产品和原料。我们同样知道，目前这些产品和原料的出口还不及战前出口量的一半，我们还知道，只有增加我国的出口，我们才能够加强需要进口技术装备的我国工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农业的发展问题乃是我们政策的基本环节。

为解决发展和加强农业问题，我们是否已做了一切呢？对这个问题必须回答说，我们除了对贫农和部分中农（我说部分中农，是因为在地方上大部分中农被视作富农）实施若干加强和发展农业的措施外，没有利用甚至反而束缚了中农和富裕农民（或富农）的农业生产能力。

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加强贫农阶层的集体经济组织，也由于通过限制雇用劳动力和土地出租来束缚农村中农和富裕农民阶层的生产能力，结果我们面临着：

1. 农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工业无法吸收的失业人数增加。
2. 整个农业发展疲软。
3. 农产品和原料出口量不足。
4. 用于我国工业的技术装备进口不足。
5. 我国整个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且
6. 农村分化，在相当数量的农民中（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反苏维埃的情绪增长（我们对此不能视而不见）。

这种情绪不能不影响红军的情绪，为数极多的红军成员都是农民。由此必然得出的结论是，在外部形势可能复杂化的条件下，我们的农民这个大后方是没有保障的

同志们，这些可能产生的后果还不足以使我们对其产生的原因

给予最严重的关注吗？

我觉得，农民问题——党在农村的政策应该毫不拖延地立即重新加以考虑。

一方面要通过组织集体农庄和合作化、增加信贷和其他一些措施继续加强对贫农发展其经济的帮助，同时，必须解放中农和富裕农民，发展其生产力。必须扩大农民经济中雇用劳动力的权限和放宽出租土地的最高限额。

我觉得，在存在对外贸易垄断、国家银行系统、农村合作制商品流通、税收政策等等的条件下，我们无需担心“富农”经济会加速增长，因为它在运作上是纳入国家轨道的。

要利用居民的所有阶层来加速发展农业，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国家不向富裕阶层（富农）提供物资，而只允许它扩大其生产能力，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能够加快我国生产基础的发展速度，能够卓有成效地巩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结合。

我认为，这些问题需通过党的程序迅速予以解决，并提交第4届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播种运动前加以实施，这无疑在今年就会在农业中显示出成果来。

同志们，如果我提出这个问题是错误的，请你们指出我的意见的错误。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A.Γ. 古巴诺夫

1917年起联共（布）党员

党证号码：№0012567

地址：莫斯科——中央联社

1927年4月18日

№02429

萨夫琴科致斯大林

（1927年5月10日）

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秘书处机要室
1927年5月31日第1322号
莫斯科，老广场第5/3号

亲收
绝密

联共（布）党员 K. 萨夫琴科致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约·维·斯大林同志报告

报 告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我不能避而不谈，不能不向我们的党和您，我党的化身，报告我对我们的经济状况和某些缺点的观察结果、感受和实际想法，据我所见，这些缺点是我们造成的，而且可能给我们各共和国带来不良后果。

我不是从书本上的经济学出发，而是从实践经济学和我们国民经济的现实政策出发的。在我们贫穷、愚昧、文化水平低下的共和国里，有的地方还有半野蛮的民族，没有交通设施，没有道路，劳动生产率低下，特别是在农业上，它落后于各资产阶级邻国，只及它们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土地贫瘠，使用陈旧的农具和耕作习

惯，存在难以置信的失业现象，农村没有工作者不下 1500 万，还有 2400 万单独农户，它们大多是自给自足的，没有进行商品交换的多余产品，缺少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的刺激因素，也没有发展技术作物的刺激因素，而这是向我国的被帝国主义列强的强盗们的包围圈所围困的工业提供原料的主要基地。

为了带动我国经济的整个链条，我们必须抓住的列宁所指的那个环节在何处呢？我认为，这个链条中主要的和唯一的环节——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是提高农村中低下到野蛮程度的劳动生产率。

不解决这个基本问题，就不可能走上通向社会主义的广阔大道。水不流动，不流淌，也会变成一潭死水，也会发霉。我们的经济，尤其是农业也是如此。农业上出现了腐蚀农村的污泥浊水和导致停滞、劳动生产率更大幅度的下降，出现死气沉沉的冷漠局面和更多人的失业的巨大危险，而大量的失业会使人意志衰退，失去希望，不思进取。

我们的工作极多，而地球正如哥白尼所说的在不停地转动。国外的劳动生产率在迅猛增长，对提高生产率的刺激和资本榨取血汗的活动正交织在一起，逼迫着并驱赶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资本主义各国存在巨大的矛盾，但劳动生产率，其中也包括农业劳动生产率至今仍在增长。世界市场的竞争，为生存而斗争，重新开始一日千里地发展。列宁说过，“谁战胜谁”^①？

是的，“谁战胜谁”呢？谁战胜谁，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世界性的竞争，仅此而已。而在我们这里，这个基本环节十分糟糕，糟得不能再糟了。

^① 看来是指列宁在第 11 次党代会上（1922 年 3 月 27 日至 4 月 2 日）所作的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见《列宁全集》第 43 卷。

即使在工业中，劳动生产率也比西欧和北美工业低，只及他们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我国工业品的成本高于资本主义产品1至2倍，而且质量也比它们的次（米高扬在联共（布）中央二月全会上的报告^①），但在这方面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鼓励提高劳动生产率，它正在不断提高。但我们在农业中看到的是什么呢？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某种野蛮状态。

与各西方邻国相比，我国农业战前的状况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悲、野蛮和原始。1908年至1913年战前这五年的比较数字就很说明问题（每俄亩的平均产量）：

德 国——140 普特

英 国——150 普特

荷 兰——162 普特

比利时——165 普特

丹 麦——195 普特

旧俄国——每俄亩 45 普特。

这就是我国农业的悲惨状况。

将这些数字加以比较，在帝国主义战争开始的时候可以有把握地说谁将战胜谁。

让我们来看看，在此情况下我国农业处于何种状况。

按绝对值计算，1926年的耕地面积已达到1913年的96.1%。但如果按农村居民人口平均计算，则只有1913年的90.5%。

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把牲畜折算成大牲畜其绝对数字达到战前的91.8%，而按人口平均则只达到86.8%；马匹达到战前的80%，而按人口平均则只有75.6%。农业的总产量仅达到战前的

^① 指米高扬于1927年2月7~12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作的报告《关于降低出厂价和零售价》。

85.5%，而其商品部分按农村人口平均仅及战前的63.9%。这就是我国农业与战前相比的状况。

在与战前作比较的时候，是否还有必要去说明，战前的农业是处在什么样的灾难条件之下的呢？

诚然近两年来，每俄亩的产量有了提高。但这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恩惠。我们能否在今后仍然依赖它的恩惠呢？当然不能。我们应该对新的歉收有所准备。这一点我们不应忘记。我们已经领受过歉收的可怕教训。我们是否还记得此事呢？不记得了，再说一次，不记得了。

耕地面积的增加，牲畜的增加，近两年的丰收，使我们的头脑发昏。我们忘记了不要对庄稼人发号施令的口号^①。我们放弃了面向农村（不是纸上的，而是事实上的），所以农业萎靡不振，农业陷入了危机，社会公正受到了侵蚀。

人们会说我是悲观主义者，——要知道，1922年我们距离这些可怜的数字还遥远，要知道，我们在迅速发展，我们正在迅速崛起。的确，这是神圣的真理——这我明白。口号是不要发号施令，口号是面向农村——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脚踏实地，做应该做的事，所以包括整个1925年在内农业得到了迅速增长。

被沙皇制度的历史所摧残的，在战争中被毁坏的农业曾一度获得迅速振兴。现在，刺激振兴的因素薄弱了，它正失去活力。

农业的迅速发展使一部分党员（反对派^②）惊恐不安，他们羞于承认患了狂犬病（恐水症），在恐惧农业发展的同时，他们披着同富农阶级斗争的斗士的外衣，大喊幽灵来了，在患恐水症的情况

^①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1页。

^② 指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

下向农业发起进攻，打着与富农斗争的幌子，开始向国民经济的这个部门进攻。诚然，党击退了对农业的公开进攻，但他们散发的窒息性毒气已渗进党员中，并毒害了振兴中的农业，有些地方的农业又得病了。表面上被粉碎了的反对派的攻击，实际上是得到证实了，而且有些地方现在还是百分之百地得到证实。下列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最主要的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的增长 1925 年相当于 1924 年的 125%，而 1926 年只相当于 1925 年的 94%，其中亚麻由 125% 减至现在只有 100.4%（这只在消费地区，而在商品生产地区缩减了 3.7%）；大麻从 1925 年的 120% 减至 1924 年的 98%；葵花子由 120% 减至 80%；烟草由 152% 减至 80%；甜菜由 163% 减至 111%，只达到 1913 年的绝对产量的 86.8%；棉花由 132% 减至 112%；玉米由 166% 减至 83%；更不用说，这些作物的收获量比贫穷的战前产量更低了。

然而，所有这些作物乃是我国工业的基础，是它的原料基地。而牲畜类原料基地又怎样呢？它也同样令人不安——1926 年已上升到战前的 108% 的牛羊类牲畜也同样减少了：在中央各区，母牛减少 0.6%，一岁口以上的小牛减少 23.2%，不足一岁口的减少了 14.1%，生猪减少了 3.3%，而且远未达到战前数量。牲畜数量的减少是一个危险的征兆，它证明农业水平的低下，它证明我们在农业产量上丝毫也未提高；农村无法喂养数量多于战前的牲口，牲口数量因缺乏饲料而下降，而对奶制品价格的调整以及对部分税收的调整，加之还存在因有多余的牲口而成为富农，从而被剥夺选举权的危险，这一切都导致牲口的减少。难道这是我们需要的吗？

而毛纺工业的原料基地也不好。美利奴羊在战前约有 500 万头，而现在只有 50 万头，减少了 9/10。

发展中的工业得不到足够的原料，工业开工不足，从而提高了本来就高的成本，而需求在增长。这就是去年反对派的活动所造

成的某些结果，某些反响。但我担心去年的后果将继续产生影响，——要知道，农业在一两年内是无法改造，无法提高的，尤其在它现在所处装备条件下。我们的产量说明了我国战前农业的装备情况，它仅为西方的1/4—1/5，而现在能得到的牲口和农具只及贫困的战前的77%，而农业装备只及67.4%（《经济生活报》第82号，A. 斯米尔诺夫的文章^①）。

我所引用的数字全都来自报刊，而这些数字没有被任何人推翻。它们也许不准确，但基本上是可靠的。

所有人都承认，农业有病了。即使对农业的病症作出正确诊断，治疗它也需要很久，需要好几年时间。除了党、党中央和您这位党的领导人，谁也不能作出诊断，而没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诊断，任何微小的治疗，往机体的这个那个部位打几针——即使是疗效极好的资金，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病根在于反对派吹出的那种看不见的气息，即害怕农业的普遍高涨。

1924、1925、1926年这几年我国国民经济中的经济部门是由以加米涅夫为首的反对派领导的。我们的国家为这个计划和调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下面就是几个例字：1924年的限价将1.5亿普特粮食给了富农和投机商，1925年春，他们比限价多加上两个戈比，就用贫农的粮食赚了几个亿；限价是58戈比一普特，他不用转手就在当地以每普特5~6卢布售出（干旱地区和中部黑土地地区）。在1925年，他们凭空想像地计算了收成，给我们苏联造成了大量灾难和损失，而所有这一切他们不是归咎于自己愚蠢的头脑，而是归咎于富农——说是富农作了手脚^②。加米涅夫甚至提议到富农那里抽取。抽取的口号同样也不是毫无代价的：殷实的当家人认

^① 《经济生活报》1918年11月开始出版（1961—1989年为《经济报》）。

^② 指加米涅夫在联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为，不值得去生产，因为人家要抽走的，而且还要把你划成富农；而贫困的当家人则想，干嘛费劲去生产呢，也许别人会抽给我的。这是库尔斯克省、奔萨省、斯摩棱斯克省的农民亲自对我说的。这被称之为刺激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能想出更愚蠢的事吗？而在1926年他们又开始调整各种农产品的价格，而且都是以同富农斗争和帮助贫农作为最神圣的借口进行的。他们帮助贫农就像狼帮助马，最后只留下马尾和马鬃了。

他们调整了鸡蛋的价格，而投机商收购了这些鸡蛋，它们调整了油的价格，结果1926~1927年秋天和冬天工人们不得不为一俄磅葵花子油排12个小时的队。1926年夏季由于没有给农民付足钱，大家都吃奶油，而且主要是投机商和城市居民，因为奶油的价格只相当于整整1俄磅的肉的价格。结果是农民不得不少养奶牛，以免遭损失。加入合作社的贫农（因为大多数贫农和中农已加入合作社，但不收殷实农民，而受调控的主要是合作社）分化了，合作社解体和破产了，因为按照规定的价格无人出售奶油，而市场却需要它，于是投机商就操纵市场，大赚特赚，因为他不受控制，而不让人社的富农则以比入社的贫农和中农贵一倍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奶油——这就是所谓的帮助贫农和促进生产与合作化。

亚麻也受到控制，正如农民所说的那样，它就剩下一口气了。现在不得不注入几百万剂量的货币吗啡，以维持病人的脉搏，而衰弱的亚麻脉搏已经遏制着工业，而大麻的脉搏也危在旦夕了。而葵花子呢？不仅用于工业、涂料业、制皂业的葵花子油没有，制皂业也同样削减了，而制皂业的削减和价格昂贵将危及最贫困的居民，让他们身上长虱子，还可能染上伤寒病，而葵花子油甚至连食用也不够。

这些作物的减少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是工业的原料基础，是劳动密集型的作物，它们可以解决失业问题，可以使农村消除瓦解和

瘫痪的可怕现象，可以提高土地产量和振兴我国的整个经济。

除了农业本身吸收和利用多余劳动力的措施以外，一切解决农村失业问题的措施，如迁徙，离开农村进城，都是空想的和无根据的；只有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作物，如亚麻、大麻、葵花子、甜菜、土豆、蔬菜，饲料作物、苜蓿、块茎植物和乳用畜牧业及类似的经济，方可解决农村的失业问题——它可以使用比我国现有粮食作物多四倍的劳动力，但为此就必须既有相应的政治，也有相应的经济，而这些迄今为止仍然缺乏。糟糕的地方不在于我们现在缺少这种政治和经济，而在于人们认为它是多余的，在于许多党员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有些地方许多党员对农村的态度是蛮横无理、官气十足，在上级面前低声下气，故作革命、以反富农为时髦，盲目乐观，而没在农村呆过和不知道农村的涣散和分散的人害怕农村，对农村居民达数千万而感到恐惧。

因此，在理论上反对派的进攻被击退了，而在实践上，他们的原则——平均主义的原则、限制的原则，却在同富农阶级作斗争的幌子下得到充分的实行。我们在纸面上大力宣传文化工作者，为他们唱颂歌，而实际上呢？实际上，在地方上，最有创造力的农业工作者却遭到了最恶毒的、最令人反感的、无耻的诽谤。有些地方农村的生产者的首创精神受到税收的限制，尤其是遭到改选运动的压制，农村士气涣散，劳动生产率下降。

我们党最大的不幸在于，人们害怕大声说出这一痛苦的真相，为的是不至于有人把他看做是不革命的人，不至于认为他有保护富农的情绪和非共产主义倾向，——许多同志对“军事共产主义”仍心有余悸。

我斗胆告诉您——我们党的领导人，农村的气氛不健康。看到这一点的党员，就像《皇帝的新衣》的童话那样，害怕说出皇帝是一丝不挂的。

在农村里很沉闷：有首倡精神、有创造性思想、有人的需求的人，在农村都喘不上气来。在农村，停滞、衰败、匪患、盗窃和杀人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一切好的东西正从农村消失，青年中的所有有能力人都从农村奔向城市，因为平均主义令人不能容忍。

关于贫农，我们说的多，做的少：我们没有帮助贫农的计划，我们拨给贫农的资金被化整为零了。人人都想照顾贫农。照顾贫农成了时髦，尤其是在嗅到要拨款的气味时。就帮助而言，这里发生了一股真正可以说是关心和热爱贫农的狂热。互助委员会说，只有他们才负有做这件要事的使命，向孤苦伶仃者施舍的神圣权利只属于他们；集体农庄说：我们是孤苦伶仃者的收容所，钱应该拨给我们；而农业合作社则说：我们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我们热爱贫农，把钱给我们吧；而手工业合作社也喊道：我们能拯救贫农，把钱给我们。这不是说笑话，而是实际情况：谁更善于响亮地大声疾呼，给谁的钱也就越多。我们不是按计划，而是按喊声拨款；除了贫农基金之外，我们还发放买马的钱，发放木材、种子、机器。而在地方上经常是怎样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呢？他们按人头平均分掉。人人有份：按一匹马的价值的12~15%分掉（坦波夫省土地管理局关于恢复中部黑土地带的报告）。钱不是用于加强生产，而是用来买长袍和鲑鱼。把钱吃光的同时还养成一种进一步乞求的胃口，当然，这种胃口是无法满足的。连种子贷款也常常是这样发放的。像这样发放的还有木材——按人头发原木。而这些木材以后或者被投机商从分到木材的人手中收购去了，或者乱扔在分到木材的人的院子里，任其腐烂。资金用完了，而效益却丝毫没有（1927年3月斯摩棱斯克农业会议），这一切都因为我们不是在搞生产：我们不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最重要的，而认为廉价的社会保障才是最重要的。正如我已说过的，地方上搞的是平均主义。在发放分到的资金时，常常以善良的老爷的姿态，为追求廉价的声誉

而施以小恩小惠，谁喊的声音大些，（既为自己，也为发放资金的人喊）就给谁多一些。说这种事令人痛苦，但必须说。这些资金常常落到诡计多端的人——流氓无产者贫农手中，不论我们给他们多少帮助，他们永远是贫穷的，他们总是死气白赖地乞求。而所有还有一块面包的人，都被冠以富农的光荣称号。他们叫嚷富农在苏维埃，在合作社中得势了；他们擅长巴结党支部，使农村失去创造性的首创精神。党支部看到这种情况时保持沉默，为的是不让人们认为他们是不革命的人。

1926年4月，在奔萨召开的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一位农民在讨论省执委会的工作报告时发言说，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下，许多从国家得到马匹的农户，必须要么把马卖掉，要么让马死去，因为他们无利可图，他们连自己都无法养活。

1927年3月，在斯摩棱斯克省执委会全体会议上，关于播种运动的报告指出，经过普查，有繁殖能力的公牛只能满足9%的需求。剩下的母牛都是没用的货色，有的根本不能产犊；从经济上说养公牛是不合算的，而从社会角度说是危险的——因为好的公牛是划为富农的凭证。

正如我们说过的，农村大多是在自给自足的。然而，国家需要商品化的农村。列宁同志说过：我们不怕私人生产者的产品，我们只应该把它纳入国家的轨道^①，而我们的同志轻率地搬弄书本，大吹大擂，常常在一些地方的农民中急于搞什么合作化、集体化、共产主义化、机械化、工业化、电气化、拖拉机化、以及其他什么“化”和“富农化”，而农民则感到莫名其妙，他们在想，当明天你就要成为富农时，干嘛还要这些“化”呢？

比斯克区一位农学家在全西伯利亚农业代表大会上说，当地强

^① 见《列宁全集》，第43卷，第222页。

烈地指责他的高产工作，说他用自己的工作创造了一批批“富农”村。

现全文附上我哥哥科隆·杰米扬诺维奇·萨夫琴科来信的原件^①（不是米隆的信，他的信已在中央全会上宣读过^②）。我哥哥是位老人，已年届七十，是一位老革命。在黑暗的反动时代，他保存过党的武器，使自己的生命危险不测。他救过许多同志免遭沙皇逮捕，掩护他们和为他们提供证件，他好像也掩护过您，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免遭沙皇鹰犬的逮捕。他是无产者，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退休金生活。他现在住在斯摩棱斯克省农村他的侄子——一个农民的家里。

他在结束对农村情况的描述时说：为农村的未来感到害怕。但

① 随萨夫琴科信附有他哥哥的以下信件：

“杜布罗瓦，1927年4月2日。

我向您致以衷心的问候。库齐亚（库齐亚是库齐马的爱称，即指库齐马·萨夫琴科。），你的信已收到，信中你谈到了土地问题。杜布罗瓦人已得到了它；契约早已在执委会，但没有机会去那里取回，待取回后就给你寄去。说实在的——在杜布罗瓦已没有一个干活的庄稼人了，有的只是废物。而造成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农民正在解体，几近于无。长期贫困的农民广泛地利用了它（无所事事），但十分勤快的人，特别是在自家的地里十分勤快的人，已经十分地习惯于粮食税加上极不光彩的名字“富农”，这使得许多人不敢勤于劳作，为的是不被当成富农。农业技术的援助很普及，人们也在学习，但很多人害怕在自己的耕作中广泛地应用，为的是不被划成富农。就连最勤快的人也害怕超过中农，但贫农却感到如鱼得水，它们是长期贫困的农民，也就是说成了寄生虫。但偶然落入贫困的农民却尽力地想翻身。

库齐亚，农村的未来真是会令人不寒而栗，但请原谅，我已说得太多了。

我们这里其他方面一切照旧；现在兔子已不再猖獗了。我的身体不太好，要经常看病。

关于我的札记——《红色编年史》，大概注定是不能问世了。我写过两次，但都白费了，我再也不写了，而且很多事已经遗忘了。

向你全家致意！

萨夫琴科

又及，库齐亚，谢谢，退休金领到了”。（签名）

② 见前面的文件№10913。

这里他似乎是为道出了真相而感到害怕，他请求原谅，他说：请原谅——我只是胡言乱语而已。他，一位老人，曾30年肩负革命工作，却为道出真相而感到害怕，他怕我这个党员，怕我会认为他有富农思想，认为他身上已没有革命精神。这就是农村的状况，而这种状况几乎到处都是，也许确实到处都如此。

我们的好朋友，他们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劳动人民的事业曾不惜自己的生命，就是现在也会为此而不惜生命——但却害怕对我们说出真相。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不能不把这个情况告诉您和我们的党。

且不说富农，不说那些靠不幸的邻居养肥了的狠毒的剥削者，我们必须放开庄稼人的双手，建立鼓励创造、鼓励首创精神的机制，把劳动效能、劳动生产率置于党的崇高保护之下。

是什么提高了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呢？是党对劳动生产率的高度关怀，是对劳动生产率的刺激。每个工人都懂得，只有他自己能得到他所付出的劳动的报酬，不会因为他的高劳动生产率把他划入富农范畴，只会对他的劳动付给优厚的报酬，而且还会表扬他，让他成为别人的楷模。也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能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正如在工厂所做的那样。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即使是工厂里的工人，其能力也不是一样的。即使在同样的条件下干同样的活，一个工人也会比另一个挣得多些，而这被当作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这方面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气象条件，都不会妨碍生产；一个人比另一个人能干，一个人比另一个人聪明是得到认可的。为什么在农业上我们不允许这样做呢？这里需要比在工厂操纵同样车床多得多的机智、创造性的开拓精神、各种各样的设想，——这里既有土地的影响，也有气象的影响；既需要耕作，也需要种子；既要注意耕作期，而且在能力上、理解力上，在技能和成绩上可能比在工业

中有更大的差别。

但在农业中，有一点没有引起注意：一个人不好好当家，不好好干活，不善于干活，因而他的收入也少，这就是说，他是贫农，因而他是好样的。这种人挺多，而且他们总是挣得少；而你干活干得好，干得巧，不误农时，收成很好，收入很多，却不会得到赞扬，他已经成了富农，是危害社会的分子，于是在改选苏维埃时要剥夺他的选举权，剥夺他表现开拓精神的权利，剥夺他对我们的错误提出正当批评的权利，无论谁谈起他们，都说是富农耍阴谋诡计。富农暗中破坏，这是既简单而又容易的回答，比对错误负责和为错误辩解容易多了。

我们中间有人常常模仿黑帮分子，他们把国内的不满情绪、暗中的怨气都归咎于犹太佬，说所有的犹太佬都在煽动不满；或者像英国的保守党人那样：他们的煤矿工人是否起义了，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是否起义了——一切罪过都在莫斯科，都在布尔什维克。应该汲取这些教训，不要归咎于富农。必须倾听农村有创造性思想的声音，必须研究农村，必须提高它的劳动生产率，必须使它成为商品化的农村。只有以农业中高度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农村才能富足安康，才能有文化的振兴，只有在高度的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农村才能成为工业的原料基地和工业品的良好消费者。高劳动生产率是由经济刺激——对个人利益的关心所创造的，其余一切都是废话。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必须创造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刺激因素。否则，我们将被臆想中的富足安康弄得麻木不仁，而列宁所说的“谁战胜谁”将不是我们胜利。当在即将到来的搏斗中解决这个大争论时，必须有计划地帮助贫农。迄今为止，我们说的比做的多，而且把资金挥霍掉了。

全俄和全苏代表大会上一切顺利也同样引起某些思考：从村

苏维埃到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各地对大会代表进行了筛选，——对改选所作的指示就像个断头台，在把一切可疑的东西都砍掉了，其中包括一切不带官方正式观点的一切务实的、最无恶意的批评、意见或建议，它们事先就被宣布为富农的观点，是富农的阴谋诡计。早在改选之前，一切都已按指示进行过筛选，如果谁想发言，想说说和提出建议，他事先就要知道，即使最诚恳的发言也早已被公文认定是来自魔鬼的攻击。我们是否需要这种官家的顺利呢？

农民对我们的政治和经济保持沉默，他们宰杀自己的牲口，不再播种什么国家和他个人需要的作物，因为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不鼓励他从事这种生产，而由于这种状况，我们无法预见危机，而只能事后碰上危机。

我们没有把刺激劳动生产率当做生产上的头等重要大事，而总是绕着走——围绕着贫农、集体农庄、公社大发议论，为它们陶醉或常常把它们理想化。的确，未来是属于它们的，但却像蜗牛慢慢爬行，不知道什么时候达到，而生活却不等待——它要我们满足要求，它要得到农产品，而且这些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而我们有义务、有必要满足生活的要求，满足历史时刻的要求，不然生活将与我们失之交臂，而我们将落在它的后边。集体生活将由机器来创造，将由电气来创造，而不仅仅是我们的、哪怕是火一样热烈的愿望所能创造的，这有历史为证：由思想而不是由经济所产生的公社已经消亡。如我们许多同志所做的那样，把增长缓慢和公社垮台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公社的成员没有文化是不行的。对此我们能看到许多明显的证明。我们以“伊里奇之家”公社为例，在那里不存在争吵的主要原因——既不会为了生产，也不是为了分配所生产的价值，那里聚集了一批同志——共产主义思想的精英，而他们却争吵得不亚于农村的饶舌婆娘。

工业品的价格：我不谈它们——它们的价格很高，但采取了降低价格的措施，而农民目前还在等待，他们对降价还未丧失信心，虽然降价工作目前已经产生了许多相反的效果。但在此情况下，对外贸易垄断保护了我们工业品的昂贵成本和我们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免得外国工业把我们的工业吃掉，但我们不能用贸易垄断去保护我们农业的低劳动生产率，因为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农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去。我们必须同各方面训练有素的外国农民的高劳动生产率竞争，而在国际市场上由于我们劳动生产率低，质量低劣，我们仍是竞争力薄弱的对手。我们输出的农产品只有战前出口量的42%，而对农产品的需求即使在国内也在迅猛地增长，不仅对工业原料的需求增长了，而且我们不断增长的城市以及不断增加的农村人口对消费品的需求也在增长——农村消费也同样在增长，人口在迅速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缺乏竞争力这一情况姑且放置一边不管，为了满足国内的需求，我们也必须特别努力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必须把国家的供应渠道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让私商突破我们的防线，就像我们这里一会儿在这种商品，一会儿在另一种商品上被他们所突破的那样。

亲爱的同志，我不是作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反对派给您写这一切，不是为了批评，我写这些只是为了引起您对我们国民经济部门之一的真实状况加以注意，这一状况尚无人过问。它实际上不像我们党的反对派官员所想描述的样子。我非常了解农村，了解它的病症，了解农业，了解它的实情，而不是官方公布的情况，我是作为党员，向您报告这方的情况的。

我们的农村党员同志大多数变成了冷漠的、官气十足的（如果不说得更严重的话）农村官吏，他们不寻求解决农村失业问题的办法，不寻求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的办法，不寻求提高农村福利的办法，不去巩固国民经济的基地，巩固工业的基础（通过向工业

提供原料和巩固工业品销售市场)，而是去寻找富农，他们把找富农当成了角逐的工具，有些地方几乎把每个殷实的农民都当成了富农，认为富农是对共产主义构成威胁的人，他们把农村的贫穷和愚昧无知看做共产主义；有党票的官员为自己小小的职位而担忧（失业的幽灵使他害怕），他们一个赛一个地竞相努力寻找更多的富农，因为常常按照找到富农的数目来评价他们的工作。

布哈林同志在1925年4月17日莫斯科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25年4月24日《真理报》^①）中说得对，殷实的当家人在埋怨，贫农也在埋怨，因为尽管我们有强烈的愿望也不能帮助所有的贫农，而要知道两个丰收年已经过去了。

第一个歉收年会使我们在各共和国都遇到极大的困难，不仅在供应居民口粮、供应工业原料上，而且我们也可能在工业品销售上遇到深刻的危机，因为即使在现在，例如，在两年连续丰收的情况下，还有近两百万双靴子积压下来，而我国却是个半赤脚的国家（瞿鲁巴^②委员会的报告）。

必须活跃农村的创造性力量，必须重视劳动生产率，消除失业现象，停止讥笑创造性的首创精神和热情，停止讥笑有文化的农民的主动精神和用笨拙的限制价格来扼杀农业生产的某些部门，因为纠正我们在农业上所犯的错误非常困难——纠正其中的某些错误需要好几年：例如，1924年被宰杀的生猪数量至今仍未恢复，为了恢复被扼杀的（诚然，不是我们扼杀的）细毛羊养殖业需要几十年。

^① 指布哈林1925年4月17日在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见《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

^② 瞿鲁巴，亚·德·（1870—1928）——1927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对外和国内贸易人民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更加关注我们的农村吧。

只有农村的巩固，才会有工业的巩固和社会主义的巩固。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您的 K. 萨夫琴科

№02380

亚·瓦·恰亚诺夫^① 致莫洛托夫^②

(1927年10月6日)

致联共(布)中央莫洛托夫同志

为回答您通过卡明斯基^③交给我的问题,现送上一份简短的报告。

遗憾的是我总共只有几个小时写这份报告,这就使我不能具体陈述自己的论点,也不能给它们增添具体的例证。而且,约有一年半的时间,我完全脱离了实际经济工作,只能根据我们学院的科学考察来判断农村情况,这种情况也使报告写得比较抽象。

然而不管怎样,如果您认为需要,我能增加必要的细节来展开我的任何一个论点,并补充足够的事实依据。

① 恰亚诺夫,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1888~1937)——俄国和苏联农业经济学家,毕业于彼得罗夫农学院。1918~1929年是该学院农业组织教研室教授。1922~1930年担任农业经济与政策科学研究所所长。曾任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农业组成员。1930年被捕,1932年因所谓“劳动农民党”案件被判刑。1987年恢复名誉。著有:《劳动经济理论概要》,莫斯科,1912,1913年版第1、2集;《农民合作组织的基本思想与形式》,莫斯科,1919年版;《农民经济组织》,莫斯科,1925年版,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农业企业的最佳规模》,莫斯科,1928年版等等。

② 1927年10月1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决定,为准备党的第15次代表大会讨论的农村工作问题提纲,成立由莫洛托夫为首的委员会。在准备提纲的过程中,委员会向一些著名的农学家和经济学家征询他们关于农业发展道路的设想和建议。恰亚诺夫的报告是其中之一。

③ 卡明斯基,格·瑞·(1895~1938)——191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5年起为候补中央委员,1922~1929年任全苏农林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农业合作社联合会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主席。

请原谅报告编写得有点潦草，时间太少了。
致同志的敬礼！

恰亚诺夫教授
1927年10月6日

№02381

亚·尼·恰亚诺夫关于苏联农业现状的报告

(1927年10月6日)

战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类型

为了更加突出地显示苏联农业发展现阶段的特点，需从演变发展的平面上进行考察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发展作对比，从战争前的那个时期开始我们的分析。

考察战前世界农业状况，可从中揭示两个极端的类型：1) 以众多的农场主经济为基础的美国农业，这些农场主在自己的产业中亲自从事体力劳作，雇有2—3个雇工。其产业规模中等，经营粗放，机械化程度高，以所谓纵向集中化的形式牢牢扎根于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之中。

各种农业信贷和其他信贷银行、各种粮食公司、土壤改良公司和商贸公司，牢牢控制着这种农业经济，从中吸取可观数额的资本主义利润。

廉价的土地，昂贵的劳动，粗放的、低劳动耗费的耕作，并带有巨额资本投入和机械化的广泛推行，这就是此种类型农业经济的基础。

2) 我们在东方国家——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见到的情况与美国形式截然相反。

在尚未铲除的封建社会制度下，极度过剩的农业人口，决定了这些国家里家庭经营形式的发展，土地耕作的极大劳动耗费和租

赁、信贷和劳动雇佣领域广泛存在着奴役关系。

昂贵的土地，廉价的劳动，超集约的和最大劳动耗费的耕作制度，不仅没有机器，甚至没有马匹，不是资本主义关系而是封建关系，这就中国土地经营形式的国民经济基础。

战前的俄国农业

不管说来多么自相矛盾，战前俄国的农业是这两种类型的地区性混合，或更准确地说，是这两种类型发展趋势的混合。

俄国农村仅在几十年前才脱离地地道道的封建制度，尚未铲除这种制度的许多成分，战前处在从封建制度到商品制度的过渡的极其剧烈的转折时期。我国农业经济不同于别国，例如不同于美国的基本特点在于，美国的土地经营几乎从最初几年起就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进行，与此相应的是，居民的地域分布随集约程度不同的地区而有不同的密度，整个是由市场行情决定的。至于我国的居民分布，则在实物经济的封建制度的几百年内，大部分居民的分布不受市场地区的影响，而是向往土地肥沃而且战略上多少安全一些的地区。这种早在17世纪便已基本形成的居民分布情况，保持到19世纪末开始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初期。

发展起来的商品关系对居民的分布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在我国地图上出现了一些对黑海和波罗的海港口具有商品吸引力的地区。结果，“历史形成的”现有居民分布状况显得与按市场要求而应有的状况不相称。可以看出明显突出的农业人口过剩地区和整块整块农业人口不足地域，它们之间的矛盾并非近来的人口流动潮所能缓和的。

我国农业人口过剩地区的上述历史过程造成的结果是，我们遇到某种类似中国土地经营制度的情况：家庭经营形式，廉价的劳

动，哄抬的土地价格，奴役关系以及前资本主义的形式的农户分化的盛行。

北部工业地区的农业危机趋于缓解，与此同时也可以感觉到，居民改搞手工业和地方手工业得到广泛发展，这种手工业模糊了典型的纯产业无产阶级的分出，从农村吸走高于中等水平的一切因素。与此相反，在粗放的、人口不足的南部、东南部和东部地区，我们见到的是向美国经营形式的迅速演变，迅速排除前资本主义形式的家庭经营，有着机械技术的农场类型的成分不断增长，不断增长着的真正资本主义分化迅速取代前资本主义的奴役性的分化形式。

甚至在国民经济方面，这些地区的经济制度也逐渐接近资本主义的美国：高商品性、大量来自信贷的投资，资本主义形式和合作形式的纵向集中化的发展，一句话可以概括：构成美国农业经营组织实质的全部要素的初级阶段。农业人口过剩地区则与此毫无共同之处，那里坚持的是实物家庭制的前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商品关系和合作关系的发展困难重重。

从上述战争前夕的形势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农民本身还是农学界，都存在两种基本趋势：第一，走向“纯种的美国”，在我国的农业中竭力发展农场成分（哈尔科夫集团，索卡尔斯基，马采耶维奇等等）。^①

第二，试图依靠中农群众，建立纵向集中化经营的合作形式，并通过这种合作形式，使农民经济合理化并组织起来，尽可能避免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占领农村，将销售渠道和资金投放渠道控制在

^① 指哈尔科夫出版的《农学杂志》周围的几位农学家。K. A. 马采耶维奇，Л. П. 索卡尔斯基是农业问题著作的作者，曾参加1913年于基辅举行的第一次全俄农业代表大会。

组织起来的合作化群众手中（1911年代表大会上的莫斯科农艺学派）。

战争爆发时这两种流派刚刚起步，在文献中尚处在针锋相对的阶段。

这就是十月变革前的情况。我国历史的苏维埃时期给所有这些带来什么变化？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国家里又发生什么相应的变化呢？

当代美国农业的发展趋势

让我们从国外开始。在美国型的国家里，我们见到信贷合作和信托合作的迅速发展，几乎把私人商业资本完全排挤掉，而其本身又陷入金融资本强有力的影响和监控之下。

按合作原则组织起来的农场主，通过与银行相结合，进入按资本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经济体系，这就是南北美洲、澳大利亚和南非农业的风云人物。

关于这一运动的颇为混乱的思想，可根据所附阿根廷教授阿拉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文章的译文作出判断。美国还给这种农业组织体系加上了技术改良的重大冲击：培育出以超级 монитоба 为首的新粮食品种，从苏联运去的草木樨可望给饲料问题带来重大的变革，奶牛中世界创记录的产奶量超过 1000 普特，等等。与此相反，在农业人口过剩的国家，除日本外，在经济组织方面的情况仍然和战前一样。

苏联农业的现状

现在说说苏维埃政权十年后我国的农业状况。为了能够清楚地

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问题分成两个部分。

苏联农业生产机构的变化

第一，农业生产机构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第二，被视为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组成部分的农业制度整体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首先谈第一个问题。组成苏联农业现代结构的最大要素之一，自然是1918~1920年消灭已经衰亡的地主经济残余的农业变革。这一变革的具体结果自然在不同的地区各不相同。在地主经济曾经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变革在一些地方使农民经济完全改观。例如，1926年我们农业经济研究所重复进行了A. 申加廖夫^①当年在沃罗涅日省两个村庄里进行的调查。1906年申加廖夫根据土地严重缺乏的理由，把这两个村庄说成毫无指望的“濒临死亡的村庄”。1926年，尽管有国内战争的破坏和饥荒的冲击，两个村庄都由于份地的大大增加而成为十足的“复兴的村庄”。然而大部分地区的变革只不过是把早先农民付给土地所有者的2000万俄亩土地的租金留在农民手里。复活土地村社的重分土地和消除农村的农场因素的剥夺富农几乎可说有着更大的意义。

结果是高商品性的企业从农户的总量中消失，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农产品的商品量及其出口的可能性。农产品的产量无疑可以恢复甚至可以超过，但只有通过大大提高大量农户商品性的途径。地主经济被消灭得如此彻底，以致国家手里保留的只是为数不多的不分散的农业土地面积，这是令人遗憾的，因而不得不承认，我们现有的国营农场和完全的集体农庄并不具有大规模生产的意义，而

^① 申加廖夫，A.И.（1869~1918）——俄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土地纲领制定者之一。《濒临死亡的村庄》（1906年）一书的作者。

1918~1919年“由农户通过公社走向国营农场”这一旧口号显然已失去了其现实意义。我们国营农场的面积在1921~1923年的某种取消主义时期被搞得凌乱不堪甚至供辅助性农业企业（实验田，育种场，种子养植场，苗圃）之用都不够，假如农民经济开始大规模发展，就需要有这类辅助性农业企业为它服务。我们农业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发展显然应该走另外一条道路。

总之，我们农业的生产机构消灭了大型地主经济和大部分战争开始时组成的农场，和过去相比，在更大程度上是由尚未过时的前资本主义家庭农户组成，而且由于贫困化在出租和租用农具与役畜方面存在着尖锐的奴役关系，我们农业经济研究所在亚麻产区和向日葵产区进行的考察明显展示了这一情况（参看所附书中有关统计）。

然而自1921年起，在发展着的商品经济压力下，在这块消灭了差别的农户中，又开始呈现出前资本主义分化和资本主义农场型分化的退化过程。这一过程波及战前就已累积农场要素的地区。例如，据苏联中央统计局1926年8月的统计数字，每百户中雇用年工、定期工和月工者，北高加索为11.8户，第聂伯罗彼得夫斯克为9户，克里木为22.7户，而在农业人口过剩的黑土带为3.2户，乌克兰右岸地区是6.2户。我们毫不怀疑，假如没有革命，那么，这些地区的美国化过程会更加深入农民群众。甚至在我们的条件下，如不是我国的社会政策措施扼制了这一过程，则其影响会更为深远。

与此同时，深入得多地进行着我们所指出的战前农业的另一过程，就是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我们将在后面谈及。

由此可见，从表面上看，革命以后农业生产机构从私有经济的角度看其农民基础仍与战前一样，有着中农户向农场发展和向合作化集中发展这样两种发展趋势，这自然是与现在存在的各种不同思

想流派相对应的。然而如果说，农业生产机构在类型上依然如故，那么我们毕竟能够指出其中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我们并不认为对农民经济生产资料遭到破坏（特别是畜拉车和农具的破坏）的担心有多大意义，尽管这种现象无疑存在，但我们认为并不构成威胁。

首先，无耕地者和无马者的百分比应有大幅度降低，因为统计数字把手工业和去城市打工的都算进去了，而这不是失去马匹的农户，而是干脆无需用工具的农户。

其次，不仅在农业人口过剩的地区，甚至在整个北部地区，由于分成许多小农户，在战前马匹和工具成为经济的负担，以至很少使用，所以它们的减少并不意味着整个农业生产潜力的削弱，而是仅仅导致这些生产资料租赁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只具有社会后果而非生产的后果。

仅仅是农业人口过剩的东部各州存在绝对的欠缺，而且尚未消除。

一般而言，由于我们的战前经济资本集约性甚小，生产资料的某种破坏并不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资本易于恢复，正像我们从许多被1921年饥荒所摧毁的地方的实例中所见到的那样。

更大的的是良性变化。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农户的领导人员普遍而相当全面的更换。15年前的战前当家作主的老年人一部分离去，一部分“被打倒”。农民经济中“掌权的”，半数以上是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原士兵，经受过革命和前线的教育。较之1906~1915年的当家人，他们的视野要广阔得多。这些农户的新“人员”比旧人高出两头，对待农业的改良态度更加灵活和能够接受。也许这样的农民能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质，然而无疑已经脱离了祖辈传统的支配。

其次，我们已经能够教给这种新的“经营主体”新的农业技术。我们在战前最初起步的英雄时代的实验和地方农学，现在他们已经有所知晓。十年研究工作的结果现已大多成熟，而且我们在经济合理化方面掌握了不少东西。农业经济研究所按照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授意根据实验田和农艺辅导的材料编制的统计地图草图，使我们对提出技术性建议有一个地区性的蓝图。这种技术性建议是我们能向在重组方面进行探索的农民们提出的（参见附表）^①。把新型农民同农学新进展给合起来，在这方面我们已有实现我们农学成就的大量实例。

顺加村和乌格列希村^② 每亩 2000 普特马铃薯的收成已普遍为人所知，莫斯科省和许多其他省的牧草栽培法也同样为人所知并得到迅速推广。库罗沃村^③ 和其他村的作物达到了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的实验田水平，但名气较小。可能完全鲜为人知的是，几个月前，沃洛科拉姆斯基奶牛竞赛会上年产奶 200 维德罗的奶牛均无奖而返，因为获奖奶牛的产奶量比这高出许多。像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好几百。总之，农民经济摆脱了停滞状态开始自动推进。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我国农村对扩大农户的刺激因素太弱，这一潮流会具有更大的群众性。可以有把握地说，对扩大农户的刺激是我国经济最起码的要素之一，生产也是如此。

问题与其说在于价格政策，不如说在于捐税极端加重，它对扩大农户来说，有时具有禁止的性质。经济上得到扩展的农民企业能够支付极高的税额，但从心理上说，如此条件下获得的收益，在企业主人的心目中不能抵偿扩展经济所付出的辛勤劳作。这就是农业

① 档案中无此附件。

② 科斯特罗马省的农村村名。

③ 图拉省的农村村名。

生产机构本身的状况。

苏联农业社会经济组织的变化

有人可能向我们指出，我们列举的一切变化都不包含社会主义成分，与战前情况相比，没有任何新的社会内容。

还是那种小资产阶级自发性，加上前资本主义形式的家庭农户蜕变的明显趋势，即在许多地区变成资本主义农场。但我们不会因此窘迫不安，因为处在农业建设的现阶段，问题远不是要摧毁这样的农民经济，而是要以完全不同的形式促使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它不仅要抵消农场成分的增长，而且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农业结构的根本性社会改造。在发展的现阶段，应在农业纵向集中化领域里寻找社会主义成分。这里，主要是这里，正进行着社会主义成分的当前决定性积累。

就像武装的人群并非军队一样，农业也不单纯是农户的总和。农业也和军队一样，只有当它有了组织，有了一定的社会联系的总体，这些社会联系推动各农户并对它们实行监督，这时的农业才有了自己的面貌并变成能动的机构。

这些社会联系几乎并不体现在物质上，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现代农村的观察者们可能会根据外表把它看做专制俄罗斯的没有任何变化的农村。事实上这些联系的结构在许多方面与战前的联系结构截然不同，正是它完全改变了我国农业的内在本质。而在发展的现阶段，正是要在它们身上寻找不同于过去的特点。我说现阶段，因为我认为，在下一个阶段这些特点就传递给生产机构本身了。

我们看到，在美国农业的最新发展形式中，资本主义是以对有组织的农场的合作体系的金融控制方式，和在农场经济中间推行各种资本主义辅助企业（加工厂、粮仓和冷藏库及其他）的方式来控

制美国农业的。

从实质上看，在苏联我们也经历着同样的过程，惟一的不同是，不是由金融资本，而是由正在按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建设的国家的组织力量和资本来实行控制的。

66839 个初级农业合作社，联合了 7369000 农户，16942 个奶油制造、马铃薯磨碎、手工业以及其他合作企业，经中央农业银行系统沿合作社渠道发放的数亿贷款，近 500 个育种农场和国营农场，9800 个配种站，农具租赁站、谷粒精选站，700 万普特改良种子储备，这就是 1927 年我国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在数量上的表现。如果再加上国营采购机构在农业原料市场和对外贸易中的接近垄断而对许多产品来说是完全垄断的地位，那么，尽管我们的农业有着 2000 万小农户的自发势力，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怎样对这种自发势力实行国家监督，而是这种监督引向什么方向和走向什么目标。

在这些成分和这些联系形式进一步增长的情况下，关于农村中农场成分增长的问题自然没有失去它的社会意义，但将差不多完全失去组织—生产的意义，因为在必不可免地将农场成分也纳入我们所说的监督系统的情况下，这样的成分归根结底在生产上应担任国家对经济体系进行调节的技术代理人的角色。

在某些粗放地区（伏尔加左岸，阿赫图巴）和特殊作物区（克里木等地），农场型经济甚至可能成为能胜任当地生产任务的惟一机构。面对这样的生产任务，一两匹马的中农经济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在目前的农村条件下几乎不可能组织生产合作联合体。

这种处于受监督的农业体系中的农场型经济的存在，在有限的地域下，在集体经济成分平行增长的情况下，将是完全没有危险的。

以上所述足够明确地回答了所提出的这样的问题：我国新旧农

村的区别何在？我国农村和美国型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村区别何在？

现代农村在其农民部分的家庭组织生产机构还是旧的情况下，有了新的社会联系体系，沿着这种社会联系体系的轨道，农民经济中间逐渐积累合作成分和集体经济的其他成分，而且这种新的社会联系体系逐年巩固，有机地进入国家计划经济体系，从而把农业变成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着的苏联国民经济的环节之一。

在美式农业的国家也发生社会联系的更替，然而在这种体系中它的合作部分与银行金融资本结合，从而使整个农业服从资本主义中心的控制。

在我们看来，各有源头的历史过程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此。

苏联农业的演变问题

现在苏联农业的基本问题是生活尖锐地提出的两个问题：

1) 农民经济演变为“农场”的危险

首先，在存在着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型的全部联系的情况下，前资本主义的家庭农户会不会迅速演变成农场型的经济？这样一来，我们对农业生产的全部监督系统的社会基础和控制会不会起变化？这种演变的危险无疑是存在的。许多力图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的现代活动家，也许认为这种演变是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率的最理想的方式之一。然而我们认为，这样的演变方向而且予以促进，这种做法如果不是例外，而成为一种常规，那么，沿着阻力最小路线的运动就接近于取消运动。

我们确信，以一种更加深入的方式，而不单纯是中介控制的方式，在我们的土地经营中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成分的量的积累正像现在出现的情况这样，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认为，合作社和集体经济成分，能够通过资本主义在加工工业领域内所通过的那些环节和阶段。

逐渐扩大公有经济成分应该沿着这样的路线进行：信贷—收购—销售—农业辅助性企业—组织初级加工—共同组织运输和共同耕耘土地以及一系列农业部门社会化为大型合作企业。

我们农村中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成分积累形式才能抵抗农场趋势的发展。

在电气化、各种技术设施、库藏和公共场所系统、完善的道路网和合作信贷网等的平行发展的情况下，集体经济成分量的不断增长，将使整个体系发生质的演化，由农户体系变为农村社会合作经济体系，这一体系建立在资本社会化的基础之上，同时按技术委托原则，将某些技术执行程序交由自己成员的私营经济去完成。

在这样的农业组织体系中，自然没有农场经济的立足之地，而且这个体系本身也未必可以称之为农民小资产阶级类型的体系，因为它经历了深刻的演变过程，应该把它划归彻底公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而在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用较大型的、按农业生产机构最佳规模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庄型企业，取代残留的个人小块土地。

以上所述全部带有某种抽象的和概括的性质，然而，在我们访问顺加、库罗沃和许多地区时，根据亲眼所见我们确信，有着这样一种虽然尚未充分发展然而无疑确实存在的发展趋势。

2) 农业在苏联国民经济工业化系统中的地位

另一个与消除农场经济形式发展同样尖锐的问题，是农业在苏联国民经济现在经历的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问题。

在我们把苏联国民经济工业化作为经济政策当前任务中最主要的一项提出时，我们可能应该更加详尽地界定工业化这一概念的内容。认为工业化仅仅是一种加工工业和动力装置的发展是不正确的，因为没有与工业相关的农业其他部门的同时变化，孤立的工业是不能发展的。因此，我们在谈到工业化时，时刻都要想到按照更加工业型的结构方向来改组整个国民经济。这里工业比重的发

以该工业农业基地的巨大形态变更为前提，具体说，在我们发展工业时，我们应彻底改变作为原料提供者的原料基地的结构，应该通过地区间的农业分工，通过使用买来的种子和肥料，千方百计发展农业的商品形式，应该发展作为未来工业其他产品市场的农业的机械化。

国家工业化无疑应从工业开始，而且在工作头几年正是应向工业投入极大量的物资。在一定时期内，迅速发展的加工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动力设施，在旧的农业基础上无疑能够生存，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几年之后，在已经改造的工业和与它对应的农业基础之间，必不可免地会发生某种脱节。那时，应该认为这个“那时”甚至在最近五年之内可能到来，就要把大部分努力和资金用来组织工业化经济的农业部门，而这个农业部门也应保证它的工业成分的稳定存在和发展。

因此，在最近几年内将主要资金用在加工工业、交通运输和能源开发的同时，我们现在就应在计划中预见到我们指出的转折，并提前制订我们随时必须实行的措施。

在我所能支配的几个小时内就您提出的问题可能发挥的思想就是这些，由于时间短促自然不能进行什么研究，甚至无法挑选出实际材料来。

A. 恰亚诺夫

1927年10月6日

于拉祖莫夫斯科

№02450

尼·德·康德拉季耶夫^① 致莫洛托夫

（1927年10月8日）

尊敬的莫洛托夫同志：

副农业人民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② 将您的信转交给我，要我有关现代农业发展条件的问题陈述自己的想法。

给予我完成这项任务的时间绝对不够（总共一昼夜要写完），这就妨碍我采取本想采取的仔细态度完成您的嘱托。虽然我也写完了要求我写的报告，但距离完善太远，因为我来不及引用全部需要引用的数据材料，不能把它们组成一个足够规整的系统，不能把全部论点阐述得在一定程度上无可挑剔。报告中引用的某些材料带有概约性。

现寄上我的报告，同时我认为，所有这些附加说明都是必要的。

致同志的敬礼！

忠于您的

尼·康德拉季耶夫

1927年10月8日

① 康德拉季耶夫，尼·德·（1892～1938）——俄国和苏联经济学家，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十月革命后任以季米里亚泽夫命名的莫斯科农业科学院的教授、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所属行情研究所所长。1931年被捕，因所谓“劳动农民党”案被判刑，1987年恢复名誉。

② 斯维杰尔斯基，А.И.（1878～1933）——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8年先后任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俄罗斯联邦副农业人民委员。

№02451

尼·德·康德拉季耶夫：论苏联农业 发展条件的特点及其意义

(1927年10月8日)

一、问题的提法

对于应予研究的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

第一，必须指出，“与革命前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相比，苏维埃制度（它在苏联已经形成并正在发展中）下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还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的条件相比。而且，由于农业的发展，部分是在国家措施有意促进的影响下进行的，所以在回答提出的问题时，显然必须说明这些和那些条件相互组合时的特点。

第二，必须指出，以上提到的那些条件在我国农业发展中与革命前俄国农村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已表现出怎样的不同。

第三，必须指出，所提到的条件的影响在哪些地方只是刚露头角。

最后，第四，必须谈谈对我国农业以后发展前景的看法。

应以下列原则作为分析基本问题的主导，即应从现代条件对于农业生产力提高和增长速度的意义，对于提高农业技术和生产率的意义，对于国营农业和集体农业增长的意义这些角度来分析问题。

在着手分析所提出的问题时，我认为必须指出，给我的时间太

少（写完报告的时间总共只有一天），使我不能较为系统地、充分地、深刻地分析问题。

此外还必须指出，将我国农业发展的现代条件同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的条件进行对比是相当困难的。除事实材料（统计数字）驳杂造成的困难外，困难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众多，其农业发展条件多种多样。这种情况在时间短的条件下，迫使我们只限于将我们的农业发展条件同某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条件进行对比，即与具有较大世界意义而且事实材料相当详细的国家进行对比。

二、苏联经济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对农业的国家调节的方向和作用

苏联的经济政治组织对农业的发展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包括革命前的俄国的经济政治组织有着深刻的不同。苏联经济政治组织不同于包括革命前俄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组的最本质的特点，是以革命所产生的下列设制和现象为基础的：

1. 旨在按社会主义的原则改组社会的无产阶级专政。
2. 土地国有化。
3. 工业生产的工具和资料以及交通工具的国有化。
4. 信贷国有化。
5. 对外贸易的垄断。
6. 国内商品流通过程逐渐置于国营和合作商业机构的影响之下，个别情况下达到对商品流通的实际垄断。

无需证明，苏联经济政治体制的上述特征深刻地而且从根本上不同于包括革命前俄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而且它们是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其中包括农业，发展条件中新的根

本性特点的基础。

第一，由于革命影响下的上述进展，我国对国民经济和对农业的国家调节作用，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大得多。这一点最清楚地表现在苏联克服自发经济势力的竞争，沿着建立计划经济的道路前进，逐渐将计划原则从国营经济部门推广到私人经济，其中也包括农业。

第二，我国对国民经济和农业调节的方向，与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调节有着质的深刻不同。我国对农业实行调节的方向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特点可以归结为：1) 竭力促进农村基本群众的发展，首先是最贫困阶层，然后是中间阶层；2) 扼制农村资本主义阶层的增长，从而限制农村两极分化进程；3) 促进集体农业和大型国营农场增长；4) 促进农业合作化；5) 通过机械化、工业化和电气化，有意识地改造整个农业的技术基础。自然，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德国、法国和别的国家，也在进行机械化，特别是拖拉机化、工业化和电气化。然而此刻我们说的是国家经济政策的方向。在这方面，我国政策的方向无疑也有许多特点。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论是机械化、工业化和电气化过程或是其他经济过程，都不是按计划实行国家政策的结果，而是经济利益和经济核算的自发竞争的结果，在我们这里则都是国家的计划任务。

以上所述表明，既然农业的发展取决于国家经济政策的方向，我们农业发展的条件便极其独特。然而，即使是在我国，农业的发展也不仅仅依赖国家有意识的促进，还有赖于客观的历史环境。因此，农业发展的具体条件的形成，是这种客观历史环境的作用和国家调节措施的作用相互结合的产物。

三、与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条件相比 苏联农业发展的具体条件

让我们看看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具体条件是什么，它们与战前俄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发展条件有何不同。这里我们要考察以下一些基本条件：1) 国民经济和农业的生产力总的发展水平；2) 土地利用条件；3) 农业的市场条件；4) 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条件；5) 农业资金提供条件；6) 农业合作化的措施；7) 农业的赋税和费用。

1. 国民经济和农业生产力总的发展水平。现代农业发展的具体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整个国民经济和农业本身的生产力总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因此，不考虑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时代之后，以及恢复过程的年代之后国民经济和农业本身的生产力处在什么水平，便不可能理解农业发展的条件。

苏联属于农业—工业国，农业生产占有很大的优势，总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从以下对比可以看出，苏联在其他国家中间多大程度上属于农业国：（见表1）^①

由表可见，苏联在农业手工业比重高度上，占位最前，反之，在居民从事工业生产的相对发展程度上，占位最后。

苏联（战前俄国也一样）主要是个农业国，其技术生产资料和完善的交通工具特别是铁路的保障很不发达。由于这缘故，也由于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期间国民经济遭到破坏，尽管我国有巨大的自然财富，而且近年来生产有很大增长，但苏联的生产力仍处在极低的水平。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高低是国民经济生产力

^① 依据 1927/1928 年《控制数字》和德意志帝国 1927 年统计年鉴的材料。

发展比较水平的最准确共同指数：(见表2)^①

表 1

国家名称	最后一次统计年份	从事下列生产的独立居民百分比	
		农林业	工业
苏联	1926	81.6	7.6
芬兰	1920	70.4	13.1
西班牙	1910	56.2	14.6
意大利	1911	55.5	27.5
法国	1911	40.7	35.8
捷克斯洛伐克	1921	40.3	36.8
挪威	1920	36.8	29.4
丹麦	1921	35.6	28.1
德国	1925	30.5	41.4
美国	1920	26.3	34.4
英国	1921	7.8	51.5

表 2

国家名称	统计年份	人均国民收入(以金卢布为单位)
苏联	1925/26 ^②	75.7
俄罗斯	1913	101.4
英属印度	1923	27.6
葡萄牙	1923	77.7
保加利亚	1923	97.2
罗马尼亚	1923	114.3
意大利	1923	165.2
德国	1923	223.0
比利时	1923	249.9
法国	1923	348.3
英国	1923	413.5
澳大利亚	1923	505.3
加拿大	1923	518.2
美国	1923	625.8

① 依据《国家计划委员会 1926/1927 年控制数字》和行情研究所编写的《世界经济》文集的材料。

② 这里和以下的均指经济年。在 1921 至 1930 年间,苏联的经济年从 10 月 1 日算起。

由表可见，苏联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占最后一位。它的人均收入水平目前低于战前。

与生产力总的发展水平高低和人均国民收入多少完全一致的是，苏联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也相当低。美国按农业人口平均的农业的国民收入接近 250 战前金卢布，德国和英国为 160~180 卢布，而我国 1925~1926 年农业收入水平约为 56~60 战前卢布，革命前俄国农业收入水平为 68 卢布。换句话说，无论是革命前还是现在，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都特别低，因此才会在国民经济和农业的生产力不够发展的基础上出现农业人口过剩，这种农业人口过剩又反过来阻碍了国民经济和农业的发展，在某些地区尤其如此。

生产力发展的低水平、低收入以及农业人口过剩，使得苏联发展的条件接近革命前俄国的条件，并与大洋彼岸和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发展条件截然不同。

显而易见的是，上述国民经济生产力低下的状况，对于发展农业的成效来说，有着头等重要的然而却是负面的影响，下面我们将予以确证。然而另外一些条件对于农业发展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这就来分析这些条件。

2. 土地使用和土地政策

由于革命特别是农业革命的结果，土地使用的条件和我国土地政策发生了极深刻的变化，从而使我们的土地制度根本上不同于革命前俄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制度。农业革命将绝大部分私有土地以及部分国有的、官营的、皇室的和其他的土地交给农民使用，这就明显地扩大了农民的土地使用面积。如果计算新转交的土地以及早先农民租用的份地以外的土地，则全苏联农民扩大土地使用面积约 5000 万俄亩。结果是提高了农户的土地保障程度。

表3 每家农户的土地

单位:俄亩

	俄罗斯联邦 不计自治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 不计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自治共和国
	革命前	14.20
革命后	15.47	11.79

与此同时,农民使用的土地也进行了重新分配,分配时下层群体扩大了土地使用面积,上层群体减少了土地使用面积。给与新土地和重分原有土地的结果是,明显增加了无地和少地的下层群体的土地使用面积,这样一来,这类群体的比重大大缩小。

毫无疑问,土地革命摧毁封建制度残余和大土地使用制度,扩大了农民的土地使用面积并对它作了重新分配,这就使苏联农业发展条件跟革命前俄国的条件相比,朝着积极方向发生了根本变化。

如果我们现在拿苏联的土地保障程度与某些其他国家的土地保障程度相比较,可得出如下的画面:

表4

国 家	适合农业使用的土地数量	
	每户平均	按农业人口数平均
苏 联 ^①	15.5	2.9
俄 罗 斯 ^②	14.2	2.4
德 国	4.6	1.6
美 国	28.9	3.6

此表引用平均土地保障程度的比较数据,没有划分不同的农户群,因为关于农村分化问题下面将专门谈到。

① 其中俄罗斯联邦不包括各自治共和国。

② 指俄罗斯联邦领土范围,但不包括自治共和国。把农户计算在内。

由此可见，苏联同美国这样的农业强大而且比较粗放的国家相比，所拥有的土地保障面积少得多。与像德国这样的农业发达且高度集约的国家相比，它反而有着更大的土地保障定额。不言而喻，在决定农业进一步发展的道路时，应把土地保障程度作为极重要的条件考虑在内。引用的数字表明，像美国和加拿大那种走粗放经营增长道路的扩张农业，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

然而革命不仅仅是扩大农民的土地使用面积。正像前面提到的，它还导致土地国有化。土地国有化首先消灭了绝对地租并相应地正常降低农产品价格。然而这种降价的幅度极难确定。

而且，我们的土地国有化意味着土地完全脱离土地周转，这种周转表现在土地买卖和抵押中。刚才指出我们的土地制度的特点与革命前的俄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制度有着根本不同。诚然，我国也存在租赁形式的土地周转。然而我国只容许土地的劳动租赁，而且其施行范围要比我国革命前和资本主义国家里能见到的要小得多。下面的数字可说明这种想法^①。

表 5

国 家	租地农户百分比	被租赁的土地百分比
俄罗斯联邦(1926年)	7.2	5.3
俄国(战前)	33.0左右	14.4左右
德国(1925年)	25.9	12.4
美国(1920年)	38.1	27.7

土地国有化还给我们推行的现行土地政策提供了基础。我们的

^① 系根据地方机关、中央统计局和德国、美国官方统计的材料计算。对俄国的计算是概约性的，而且只有俄国欧洲各地方省的材料。俄罗斯联邦的计算系以租赁的耕地为依据。然而现在材料表明，割草场的租赁不会给所引数字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土地政策有着与资本主义国家土地政策截然不同的特点。在这方面必须专门指出：第一，在苏联只容许劳动用地，而借助雇佣劳动耕耘土地则只在雇佣劳动具着辅助性的情况才被允许；第二，国家政权机关在规划土地和划拨土地时，首先照顾集体经济，并以此鼓励它们发展；第三，国家政权机关在规划土地和划拨土地时，给与农村贫困阶层许多优惠（工作顺序，根据离村远近选择土地，支付条件），以此促使其经济相对向上发展。

革命前俄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政策与这些特征是格格不入的。它们的土地政策里没有集体经济的设制，而且实质上对这种经济形式怀有敌意。这种政策把希望寄托在强者身上（斯托雷平的政策），或者对农村各个不同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漠不关心。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就是这样。在这方面像法国、德国等个别国家的立法有些例外，它们的立法规定祖传的财产和庄园是不能分割，不能转让的。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借助名为自耕农场（Homestead）的设制，防止农村贫困阶层迅速无产化，但它的作用比较有限。

3. 农业的市场状况

前面已经说明，我国农业的市场条件是在工业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形成的。不仅如此，它们还是在工业设备破旧和过时的情况下，在为全国工业化而紧张斗争的情况下，也由于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因此也是在从国外进口工业零部件极受限制的情况下形成的。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农业的现代市场条件有以下特点：第一、市场上工业产品不够丰富；第二，工业产品的价格相对地高，或者反之，农产品的价格相对的低。这些特点都给我国农业的市场状况带来（自然是暂时的，但在此时是很重要的）一些不同于革命前俄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方。资本主义国家通常不存在市场上工业品匮乏现象，他们倒是苦于工业品相对过剩。与此相反，我国农村现在从市场上得到的工业品只是战前的70~80%左右，至于工业品和农业品

价格的差异，关于这一点可以说，这种差异在资本主义国家也部分存在。然而我们农业的现代市场状况与资本主义市场状况不同之处在于这种价格差异的程度不一。以上所述可用下面的图表说明：

表 6 农产品价格指数对工业品价格指数的比例
(按总指数计；设战前指数比率为 100)

年 代	英 国	德 国	美 国	苏 联 (批发价)	苏 联 (零售价)
1922	78.5	83.9	77.5	80.9	76.0
1923	89.5	57.2	82.8	45.7	46.3
1924	99.2	78.0	87.0	71.4	71.0
1925	110.7	93.9	93.6	89.1	86.6
1926	110.1	100.2	84.5	83.7	80.5

由此可见，我国的工业品和农业品价格差异的程度最大。仅在 1926 年我国的价格比差不多与美国持平。的确，由于我国取消绝对地租，苏联农产品某些部分的相对降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自然的。但在某些场合，或者无疑是多数场合，这种较大幅度的相对降价，应该说是工业品价格昂贵和商业机构工作的费用昂贵造成的。实际上，按照市场行情研究所的更仔细的计算，如果设战前俄国和苏联的工业品价格水平为 100，则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品价格水平对我国工业品价格的百分比可见以下数字：

表 7 国外工业品平均价格水平与俄国和苏联同类
商品平均价格水平的百分比

日 期	英 国	德 国	法 国	美 国
(俄国和苏联的价格为 100)				
1913	63	55	67	59
1925(1.1.)	44	45	42	40
1926(1.1.)	40	41	40	42
1927(1.1.)	46	33	43	39
1927(7.1.)	41	34	36	40

我们看到，外国工业品价格对我国工业品价格的之比，和战前时期相比，各国都有很大的降低。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品价格与战前相比有所提高，然而显然我国涨价的程度更大，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外国工业品价格水平对于我国工业品价格水平的比例降低了。

至于商业机构工作费用高昂，这一点可用以下粮食出口贸易的周转费用数字来说明。

表 8 粮食出口贸易费用

单位：普特、戈比，含利润

年 代	黑 麦	小 麦	燕 麦	大 麦	玉 米
1909~1913	30.80	30.90	33.70	30.20	29.50
1923/1924	78.80	77.40	78.40	78.10	80.60
1924/1925	66.35*	69.50*	—**	74.60	72.20
1925/1926	63.20*	64.10*	61.40*	62.55*	64.70*
1926/1927 上半年	81.50	85.30	55.85*	75.30	57.00

* 这一年的出口是亏本的，所以现引数字代表这年实现价格和收购价格差不反映全部费用。

** 1924/1925年几乎没有出口燕麦。

表 9 出口费用指数

(对 1909~1913 年的百分比)

年 代	黑 麦	小 麦	燕 麦	大 麦	玉 米
1923/1924	255.8	250.5	230.6	257.6	233.2
1924/1925	215.4	224.9	247.0	244.7
1925/1926	205.2	207.4	194.0	207.1	219.3
1926/1927 上半年	264.6	276.1	176.5	249.8	193.2

表 10 除以战前基数批发价指数的出口费用指数

年 代	黑 麦	小 麦	燕 麦	大 麦	玉 米
1923/1924	150.5	147.4	136.8	152.1	160.7
1924/1925	120.3	125.6	……	138.0	136.7
1925/1926	110.3	111.5	104.3	111.3	117.9
1926/1927 上半年	148.7	155.1	99.2	140.3	108.5

由此可见，我们出口贸易的费用比战前上涨了许多，比批发价总水平涨得更多，所以这是出口业务的实际提价。其他部门的出口贸易，如油脂和亚麻出口，也会显示同样鲜明的画面。

亚麻出口费用在 1925/1926 年提高到战前的 473.6%，仅 1926/1927 上半年降至 221.6%。同期油脂出口费用的相应指数分别为 301.5% 和 192.6%。

我们的商业周转费用昂贵的情形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多大差别，这一点可以用下列生产者价格与国际市场销售价格的百分比数字表明：

表 11 小麦生产者价格与国际市场销售价格的百分比

年 代	俄 国 和 苏 联	美 国
1913	75.6	79.0
1923/1924	49.8	78.7
1925/1926	72.6	72.9
1926/1927(上半年)	55.9	73.4

由此可见，只有在粮食价格暴涨和我们的出口亏损的年代（1925/1926 年），我国生产者价格所占百分比才达到美国标准。一般年代大大低于美国标准和战前标准。

以上在说明农业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比例时，我们依据的是总指数。然而总指数是根据城市价格的数据得出，不是根据农村市场价格的数据得出。在我们刚才指出的商业周转的高昂用费中，这

种总指数不免提高售出的农产品价格并缩小买进的工业品价格。

因此，如果我们采用农业售出和买进商品的价格，如果这时我们是为了每个生产地区而把注意力投向该地区最重要的商品产品，那么农产品情况的真实面貌就显得多少不如依据总指数所看到的那么美好了。

表 12 农业主要商品产品价格指数对于
买进的工业品价格指数的比例

日 期	亚麻产区 (亚麻)	马铃薯产区 (马铃薯)	牛奶产区 (牛奶)	小麦产区 (小麦)
	(设战前比例为 100)			
1925(10月1日)	71	65	—	—
1926(1月1日)	58	91	—	—
1926(10月1日)	52	56	56	50
1927(1月1日)	52	60	75	52
1927(9月1日)	64	70	64	61

由此可见，最重要的几种农产品的市场状况在所分析的这段时期内确实不好。

以上所述表明，我国农业的市场情况目前比革命前过去的情况和资本主义国家现在的情况都要差些。从理论上和从实践上看都很清楚，农业市场状况的相对变坏，对于提高农业的集约程度，对于农产品量的增长，对于农业收入总水平的提高，因而对于缓解农业人口过剩，都是一个障碍。苏联政府无疑充分考虑到市场条件对于发展农业和巩固工农联盟的全部意义，从 1927 年起满怀热情地为降低工业生产成本，为降低工业价格水平和降低商业机构的费用进行斗争。从引用的最后一份表格可以看出，从 1927 年开始，农业市场状况有所好转。

4. 生产资料的供应

我国农业发展条件中另一个本质特征在于农业生产资料的供

应，即有生命工具、无生命工具和播种材料的供应。

在资本主义国家和革命前的俄国，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的有代表性的特点，是把这个问题交由市场力量的对比、农业本身的主动及其经济潜力去解决。对这一法则能作某种修正的，是资本主义国家里那种萌芽形式的国家对农业生产资料供应过程的干预（例如，战前地方自治局的农业机械贸易），以及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的干预。然而由于国家干预还处于萌芽状态，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合作社首先要服从经济核算，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生产事务根本上是由市场力量对比来决定的，自然没有任何计划性。

我国安排此事的独特之处，是对农村居民供应生产资料的事务服从计划原则。从这几年的经验看，此计划以下列原则为基础：第一，在保证供应生产资料的事务中，最大限度地协助农村的集体经济和贫困的个体经济（供应的先后，结算的条件）；第二，促使分散的农户合并扩大，途径是将它们组织成以使用农业机械特别是复杂农业机械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因此，特别注意采用如像拖拉机这样的农业机械。

然而，在指出向农村居民供应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当前政策特点时，我们同时也应注意到，在数量方面我们向农业供应工具和生产资料特别是农业机械的程度仍是很低的。如果在这个方面拿现在状况与战前俄国农业状况进行对比，那么按照农业人民委员部的统计我们得出如下图景：

由此可见，统计中向农业供应的各种工具和生产资料是增长的，但没有达到战前水平，足见向现代农业供应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程度目前仍低于战前。

为对比我国农业的工具和生产资料供应程度与外国农业的工具和生产资料供应程度，我们只能使用美国的数据：

表 13 俄罗斯联邦—农户资本的价值
(按战前价格估价)

资本种类	1913年	1925/26年	1926/27年	对1913年的百分比	
				1925/26年	1926/27年
建筑	462.6	396.1	406.2	85.6	87.8
农具	67.4	42.5	45.4	63.1	67.4
运输工具	47.6	28.4	30.6	59.7	64.3
全部工具	115.0	70.9	76.0	61.7	66.1
牲畜	285.6	232.7	237.0	81.5	83.0
合计	863.2	699.7	719.2	81.1	83.3

表 14 一户工具和生产资料的价值
(按战前金卢布计算)

	无生命农具	牲畜	建筑	合计
苏联	76.0	237.0	406.2	719.2
美国	278.5	621.5	885.5	1785.5

这里引人注目的不仅是美国农场生产资料装备程度的绝对值大，而且美国农业在建筑比重相对小的情况下，其机械和牲畜相对充足。这对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农业总收入而言，是美国农业的有利条件。将我国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程度与德国、法国、瑞士的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程度相对比，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5. 农业的资金提供条件

从苏联农业资金的提供条件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不同于革命前俄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特点。资本主义国家里，农业资金提供首先依据的是私人经济的商业原则。按照这个原则，谁的偿付能力大，谁就能多得到资金；而且是按市场利息获得资金。毫无疑问，这样将使农村中贫困阶层处于不甚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是整个农业受到利息变动所反映的行情摇摆的影响。此外，资本主义条件下

有两种基本的信贷形式，以土地为抵押的农业信贷（抵押贷款）和短期信贷。由于前面提到的市场行情摇摆，抵押债务对农业会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在农产品价格上涨而且农业赢利高的时期，农村在扩展自己的经济时，也会增加抵押债务。当经济危机到来或经济不景气时，当农产品价格下跌而且农业失去自己的利润时，农场和农民必不可免地会陷入极其艰难的境地。他将被迫按照他在高价位和低货币购买力时期欠下的债务支付利息。现在物价下跌，他的收入减少，而货币的购买能力提高了，按债务付息对他来说成了不能避免的而且极其沉重的负担。这种资本主义的行情变换，通常会给农业造成重大的震荡和危机，使农民破产者增多，乃至沦为赤贫。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美国表现得最明显的最近一次农业危机的历史。在战时行情高峰时期（从战前农产品价格指数从100起，涨至1920年的209），农场的抵押债务急剧增长。至1920年，从17亿美元增至40亿美元。从1920年起开始了农业危机。美国农产品的价格对战前水平的百分比从1920年的209跌至1921年的116。收入降低了，货币的购买力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沉重的抵押债务将各农场置于极其艰难的境地。我们看到其中破产者大量增多。

表 15

年 代	破 产 数	年 代	破 产 数
1921	1363	1924	7772
1922	3236	1925	7872
1923	5940		

美国在我们描述的这个时期内的情况，足够鲜明而且典型地显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在信贷方面的特点。

我国农业信贷条件则有另外一些特点。我国农业的资金提供按

计划原则行事，只是在银行系统的活动能得到经济补偿的情况下，才根据商业核算行事。我国没有抵押信贷，而且在我国也见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常有的那种贷款利率的被动。最后，我国的信贷不是由最有支付能力的人来安排，而是由农村某个阶层来安排，国家机关首先就是为提高这些人的福利而工作的，这就是农村中的贫困阶层和中等阶层。这一情况可用以下数字来说明。^①

表 16 截至 1925 年 10 月 1 日的贷款余额
(以每农户 100 卢布的私有生产资料贷款的卢布为单位)

群 体	中部黑土区	伏尔加区	乌拉尔区	西伯利亚
不足 2 俄亩耕地	6.3	4.0	6.5	6.4
2.1 至 4 俄亩耕地	6.6	5.1	4.2	4.9
4.1 至 6 俄亩耕地	4.3	3.9	2.7	3.7
6.1 至 8 俄亩耕地	3.8	4.4	3.0	3.4
8.1 以上	2.3	3.5	2.4	2.8

可见在下层社会经济群体中，对贷款的需要紧迫得多，而转到上层群体时，贷款额迅速降低。

然而在指出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农业信贷政策方向的特点的同时，还必须指出这些国家和我国农业信贷在数量上的特点。这方面的情况对苏联农业不大有利。

以下数字表明我国和某些外国信贷的规模。

我国提供的农业资金来自预算拨款，然而其主要部分要经过农业信贷系统，来自农业信贷系统本身的资金。根据收支余额确定，农业信贷系统于 1927 年初共投放各种来源的资金将近 49000 万切尔文卢布，即大约 29000 万战前卢布。这给每户提供约 12.1 战前卢布。

^① 参看《农业信贷》，1926 年，№3。

俄国农业贷款的数量，其性质与我们的资金提供（抵押贷款除外）多少有些类似。其战前规模大致可用以下数字表示：战前农业欠各小额贷款机构的债务总额为6亿卢布，每户约33卢布。

类似的情况是，德国农业只由信贷合作社提供资金，1925年接近55000万战前卢布，每户约110卢布。实际上德国农业也从银行获得一定数额的信贷。

最后，美国农业欠银行短期信贷债务1925年数额巨大，共40亿~50亿战前卢布，每个农场约615~770卢布。

不管这种对比的准确性是否有限，但从中可以看出，在农业资金提供的规模方面，我们远远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6. 发展农业合作的措施

必须指出，国家赋予农业合作社的功能，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的国家权力机关，力求依靠群众的主动精神，加强在集体原则上改组农业的前提条件，故而采取了一切措施促进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为此目的，无论是向农业供应生产资料的工作，还是信贷发放、农产品销售与加工等工作，国家政权机关都竭力完全地或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农业合作社进行。与此同时，还极力使合作社在成长中首先依靠农村中的贫困阶层和中间阶层。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合作社也得到推广。合作社得到政府一定的保护和支助。但西欧和美国的合作社的基础是农业企业主的自由协议，这些人追求的是自身的个体经济利益。因此可以断言，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合作社，不仅不会动摇农业的单干制度，不仅不谋求按集体原则对它实行改造，反而天经地义地肯定这种单干制度。

7. 农业的赋税

农业发展的下一个重要条件是它的赋税和义务支付问题。通过收税和其他收费的方式从农业中抽取一定数额的资金，以及这种或那种赋税系统，无疑会对农业的发展进程产生严重的影响。我们首

先谈谈农业赋税和交费的规模问题。

战前除了直接和间接的税收外，农业还交付了很大数额的土地租金和买地款，现在租金已经微不足道，买地款项则根本不存在了。

当前农业（1925/1926年）的全部税额（按每个农业人口平均）约7.78卢布，即大约5个战前卢布，约占农业假定纯收入的9.2%。

战前俄国税额按农业人口平均约为6.36卢布，同样约占农民经济假定纯收入的9.5%。如果将非税收交费与税收算在一起，那么，现在的税收和非税收交费合计，按农业人口平均约为8.14切尔文卢布，即大约5.6战前卢布，而战前支付每人平均为10.4卢布。

由此可见，不管是只计税收的绝对数额，还是税收和非税收交费的合计绝对数额，现在都低于战前。1925~1926年对于假定纯收入的百分比低于战前，税款所占百分比的大小与战前接近。

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农业赋税高得多。1924年和1925年美国农业税大约人均53战前卢布，约占农场收入15.7%。但在评估此赋税水平时必须懂得，美国人均农业收入约为250战前卢布。

除以上指出的赋税规模问题外，税收系统本身对于农业发展也有极重要的意义。我国的税收系统在这方面与革命前俄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税收系统有着深刻的不同。它的基本特点在于，它在相对较大的程度上把税收重担压在农村的上层身上，因而相对地减轻了下层的负担。

8. 小 结

这就是我国、革命前俄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的基本特点。我们知道，这些条件是多种影响相结合的产物，一部分是我们所继承的历史背景的影响，一部分是革命产生的变化和苏维埃政权推行的那些政策措施的影响。对这些条件的简短概述表明，我们的历史遗产特别沉重（工业发展的低水平，国民经济生产率的低水平，农业人口过剩）。这些条件一部分由于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

破坏而深化。然而从另一方面看，革命带来了有利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农业制度全面变革。此外我们看到，国家的经济政治措施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其发展方向是促农村下层的最大限度发展，制止农业中的分化过程，促进农业的合理改组，促进农业合作社及农业集体形式的发展等等。

四、苏联农业在现代条件下的发展

我们现在看看，在农业发展的实际进程中，这些条件怎样表现，也就是说，怎样作用于发展的速度和方向的。

1. 苏联农业的发展速度

农业发展速度最好是用农业总产量或农业提供的国民收入的增长来测算。最近几年我国农业发展速度远远高于战前农业发展速度，甚至高于美国这样在继续发展的国家的农业发展速度。这一点可以从农产品年增长百分比的水平看出。

表 17 苏联和美国农产品的实物量指数对比
(1913=100)

经济年度	苏联农业总产量 指数(以战前价格 百万卢布为单位)	年增长 百分比	日历年度	美国农业总 产量指数	年增长 百分比
1921/1922	47.2	—	1921	102.4	—
1922/1923	64.6	36.6	1922	114.0	11.3
1923/1924	68.8	6.5	1923	114.0	0.0
1924/1925	70.4	2.4	1924	114.9	0.8
1925/1926	86.7	23.2	1925	119.8'	4.3
1925/1927	92.8	7.0	1926	123.1'	2.8

* 类推数

在被调查的这段时间内，我国农业总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接近

10~15%。美国农业总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约为3~3.8%。我们发现战前俄国农业总产量年增长速度约为2.7%。

从这里我们看到，我国农业发展速度确实既超过战前俄国农业发展速度，也超过现代美国农业发展速度。然而必须指出，我们的农业发展速度有减慢的趋势，而美国农业的发展速度仍相当稳定。对耕地面积和牲畜头数的变动进行分析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

我们的农业发展速度非常高，这一点可用以下情况来解释，这就是迄今为止我们经历了所谓的恢复时期，这时早先耕种过的土地和国民经济破坏时期废置未耕的土地，都被纳入农耕的范围。但发展速度高还要归功于农业革命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方面的一系列措施。我国农业发展速度减慢首先与恢复时期即农业总产量粗放增长时期即将结束有关，而且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要求以新工具和生产资料大量流入的方式扩大基础。这就是我们的任务，然而极复杂的任务。发展速度的减慢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前面谈到过的市场条件不太有利。以下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技术作物、养猪业和奶畜业的市场条件急剧恶化时期（1925~1926年），正是这些产业部门出现了发展停滞现象。1926~1927年形成了不太好的谷类粮食市场情况，同样造成了1926~1927年这类粮食耕地面积扩大的速度减慢，粮食生产地区尤其如此。

农产品产量的发展和农业出口发展的特征可以证实最后几个论点。

如果说，我们农业总产量增长的速度相当快，使我们接近了战前水平，那么与此相反，农业商品率的增长和农业出口的增长却不够快。农业的商品率，特别是农业出口，都远远低于战前水平。据《国家计划委员会控制数字》的材料可以断定，1926~1927年的农业商品率甚至低于战前近23个百分点。至于农业出口，则1926年仅为战前水平的24%。在这些方面我们无疑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

的农业发展。世界农业贸易额在一些产品上高于战前水平，另一些产品接近战前水平，只有某些产品仍低于战前水平。所述论点可用以下数字证实：

表 18 苏联农业出口变动情况
(与世界农业出口比较)

	1909~ 1913	1921年	1922年	1923年	1924年	1925年	1926
小麦							
世界出口对 1909~1913 百分比	100.0	131.5	124.4	118.9	138.1	119.9	124.5
苏联出口对 1909~1913 百分比	100.0	0.01		8.0	6.0	9.4	24.7
苏联出口对世界出口百分比	24.4	0.0		2.1	1.3	2.5	6.4
黑麦							
世界出口对 1909~1913 百分比	100.0	83.6	126.1	87.1	108.9	100.5	75.7
苏联出口对 1909~1913 百分比	100.0		0.5	182.5	97.0	26.7	34.0
苏联出口对世界出口百分比	34.3		0.2	52.2	31.7	12.2	20.3
大麦							
世界出口对 1909~1913 百分比	100.0	91.4	76.0	87.7	119.3	102.2	95.9
苏联出口对 1909~1913 百分比	100.0			5.9	6.1	13.0	19.4
苏联出口对世界出口百分比	63.3			10.4	8.1	18.1	21.8
燕麦							
世界出口对 1909~1913 百分比	100.0	60.9	70.1	45.9	73.7	79.3	57.0
苏联出口对 1909~1913 百分比	100.0			9.8	5.5	1.1	1.5
苏联出口对世界出口百分比	31.7			9.0	3.3	0.7	1.2
玉米							
世界出口对 1909~1913 百分比	100.0	127.6	126.3	91.6	105.9	100.3	106.0
苏联出口对 1909~1913 百分比	100.0			5.0	28.2	12.0	33.7
苏联出口对世界出口百分比	11.1			0.7	3.2	1.6	3.5
亚麻							
世界出口对 1909~1913 百分比	100.0	52.0	54.0	54	81	88	88
苏联出口对 1909~1913 百分比	100.0	4.0	14.3	11.1	15.2	12.0	23.9
苏联出口对世界出口百分比	52.9	8.5	22.9	18.2	17.9	13.1	28.7
油脂							
世界出口对 1909~1913 百分比	100.0	127.0	168.0	149.0	162.0	179.0	169.0
苏联出口对 1909~1913 百分比	100.0		7.3	32.9	39.9	36.6	
苏联出口对世界出口百分比	27.4			1.6	7.1	7.2	7.6
鸡蛋							
世界出口对 1909~1913 百分比	100.0		166	187	192	139	176
苏联出口对 1909~1913 百分比	100.0			2.8	14.5	27.0	13.2
苏联出口对世界出口百分比	67.8			3.0	13.8		

农产品量增长的落后状况是由许多重大原因造成的：农业社会结构的改变，农村的同一化，农业人口的农产品消费提高，农村中对向市场销售产品的强制因素削弱。然而在所有这些条件中，必须把上面指出的不太有利的市场条件摆在应有的地位。

2. 农业技术基础的改造

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农业发展速度与新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大量注入有着极密切的联系。新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大量注入意味着农业及其改造的技术基础的加强。

我们从上面引用的数据中看出，在国内战争期间，农业工具和生产资料的供应量下滑，然后再度上扬。然而至今我们仍然处在低于战前而且大大低于国外的水平。在技术基础的改造方面，农业生存和发展的现代条件尚未产生多少明显的影响。

不过，在农业技术基础的改造方面，现代条件的促进作用，以及承认这个问题意义重大的现代方针措施，毕竟显露出某些结果。

例如，第一，我们看到最近几年来农业机械的供应速度大大加快：

表 19 苏联的农业机械供应
(以百万卢布为单位，按牌价计)

年 代		年 代	
1913	87.0	1924	21.2
1920	5.1	1925	62.3
1921	14.4	1926	102.3
1922	8.7	1927(计划)	109.0
1923	14.2		

可见从 1925 年起，农业机械供应具有相对可观的规模，到 1926 年已经超过战前水平，尽管跟国外增长幅度相比仍然微不足

道。

第二，近几年来，特别在农业拖拉机化方面无疑显露出某些结果，截至1927年6月1日，已有27700台拖拉机投入农业。这些拖拉机可耕耘土地2500000~3000000俄亩，也就是全部耕地面积的3%左右。上述数字所显示的农业拖拉机化，无可争议地是农业发展现代条件的作用在这个方面显露的结果。然而毋庸置疑，这仅仅是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最初几步，而且暂时只是普普通通的几步。我们在这方面远远落在资本主义国家后面，这些国家由其农业的性质决定，对拖拉机有着广泛的运用实践。据1920年的调查，美国229300家农场，即全部农场的3.6%已拥有拖拉机。

最后，第三，在改造农业技术基础的道路上，在农业电气化事业中也显露出某些初步结果。1917年以前，俄国总共有103座为农业服务的发电站，动力为5200马力。供电农户数为36300户，即总户数的0.2%左右。从1917年到1927年，新建发电站376座，共29800马力。现在供电户多达35万户，即总户数的1.5%左右。然而这方面我们也只迈出最初几步。美国早在1920年，供电农户已超过全部农场的7%。在加拿大和某些西欧国家，我们也能见到农业电气化的迅速进步。

3. 农业的分化

在目前农业恢复时期，我们农村是否存在分化过程？如果存在着，那么达到什么程度？要说明这类问题是极其困难的。现有材料不容许我们对这个时间跨度相当大的问题作出足够确切和足够系统的回答。我们只能多少粗略地回答这个问题，把耕地面积和牲畜拥有数作为群体划分的标志。现按耕地面积划分群体如下。

首先引用1917年和1920年俄罗斯联邦22个省的材料：

表 20

年 代	占农户数的百分比				
	无耕地	2 俄亩以下	2~4 俄亩	4~10 俄亩	10 俄亩以上
1917	10.6	30.4	30.1	25.2	3.7
1920	4.7	47.7	47.9	31.6	15.3

下一个时期我们取俄罗斯联邦 48 个省的材料：

表 21

年代	占农户数的百分比						
	无耕地	2 俄亩以下	2~4 俄亩	4~6 俄亩	6~8 俄亩	8~10 俄亩	10 俄亩以上
1920	7.5	39.2	28.7	12.7	5.3	2.5	4.1
1922	6.7	51.3	27.3	9.2	3.2	1.3	1.0
1923	3.2	47.3	29.7	11.4	4.5	1.9	2.0

最后，我们引用俄罗斯联邦的材料来说明最近两年的情况：

表 22

年代	占农户数百分比										
	无耕地或 有 0.09 俄亩 以下耕地	0.1~ 1.0 俄亩	1.1~ 2.0 俄亩	2.1~ 3.0 俄亩	3.1~ 4.0 俄亩	4.1~ 6.0 俄亩	6.1~ 8.0 俄亩	8.1~ 10.0 俄亩	10.1~ 16.0 俄亩	16 俄 亩 以上	合计
1925	4.7	12.4	21.9	19.8	14.2	15.6	6.2	2.5	2.0	0.7	100
1926	4.5	11.6	20.5	19.9	14.8	16.2	6.5	2.8	2.4	0.8	100

我们从中看出，在资料涉及的这三个时期内，农村中无疑出现了农业全面高涨的过程，与此相应的是，一些农户从下层群体转入较高群体，因而最贫困群体的百分比在减少。至于上层群体，则在 1923 年前的两个时期内急骤减少，在土地革命时期即 1917~1920 年减少尤其显著。只是从 1923 年起他们才有很小的增长。一般说

来，按牲畜头数划分农户也能显示同样的图景。

然而按耕地面积和牲畜划分群体来说明农村动态过程的演进毕竟不够充分。我们可以用有关租赁、雇用和不雇用劳力的材料分群体说明最近两年的情况。用这些材料说明分化过程就精确多了。

如果说，前面的数据材料只表明农村一般生活福利的提高，却不表明分化过程，那么，这些数据材料更能说明分化状态，使画面更复杂，更深刻。

表 23

群 体	承租土地 (在该地带合计中占%)		雇用短工和年工农户 数的百分比	
	1925年	1926年	1925年	1926年
消 费 地 带				
无播种地或耕地面积 不足 0.1 俄亩	2.0	1.6	0.6	0.4
耕地面积 0.1~1.0 俄亩	13.7	10.8	7.5	7.5
耕地面积 1.1~2.0 俄亩	25.6	22.1	28.4	25.7
耕地面积 2.1~3.0 俄亩	24.3	23.7	26.2	25.2
耕地面积 3.1~4.0 俄亩	13.9	15.7	15.2	17.8
耕地面积 4.1~6.0 俄亩	13.5	16.6	16.2	15.5
耕地面积 6.1~10.0 俄亩	6.3	8.6	5.0	6.9
耕地面积 10.1~16.0 俄亩	0.6	1.0	0.6	0.9
耕地面积 16.1~25.0 俄亩	0.1	0.2	0.3	0.1
耕地面积 25 俄亩以上
生 产 地 带				
无播种地或耕地面积 不足 0.1 俄亩	0.1	0.1	0.5	0.4
耕地面积 0.1~1.0 俄亩	1.0	1.1	1.9	2.0
耕地面积 1.1~2.0 俄亩	3.0	2.2	7.2	5.1
耕地面积 2.1~3.0 俄亩	4.1	3.4	11.3	8.4
耕地面积 3.1~4.0 俄亩	6.1	4.6	11.8	10.9
耕地面积 4.1~6.0 俄亩	16.1	13.4	19.8	19.8
耕地面积 6.1~10.0 俄亩	30.0	26.5	27.4	26.6
耕地面积 10.1~16.0 俄亩	23.6	24.6	13.3	17.3
耕地面积 16.1~25.0 俄亩	10.9	13.8	4.9	6.3
耕地面积 25 俄亩以上	5.1	10.3	1.9	3.2

我们看到，较少耕地面积的群体中，通常承租地和雇用短工和年工的相对比重减少，而与此同时，较多耕地的群体中这个比重增加。只有在生产地带排名第二的较低群体是这一常规的某种例外。但很清楚，这里租赁和雇用的局部扩大，跟较高群体内的扩大相比，有着另一种不同的（粮食的）意义。如果说，从前面的表格可以看出，较高群体的承租和雇佣劳动的比重增长，则下面的数据表明，较低群体反而出租土地并提供工人使之成为雇农。为叙述简短我们只取生产地带的的数据：

表 24

群 体	出租土地数 (占地带合计百分比)		提供雇农的农户数 (占地带该农户数百分比)	
	1925年	1926年	1925年	1926年
无播种地或耕地面积 不足 0.1 俄亩	6.2	9.2	6.5	11.1
耕地面积 0.1~1 俄亩	15.9	17.2	16.2	18.7
耕地面积 1.1~2 俄亩	20.4	18.0	21.7	20.0
耕地面积 2.1~3 俄亩	19.7	16.9	17.4	15.5
耕地面积 3.1~4 俄亩	13.2	12.4	12.5	11.5
耕地面积 4.1~6 俄亩	14.3	19.5	13.4	12.6
耕地面积 6.1~10 俄亩	8.0	9.4	8.8	7.9
耕地面积 10.1~16 俄亩	1.9	2.8	2.4	2.1
耕地面积 16.1~25 俄亩	0.3	0.4	0.8	0.5
耕地面积 25 俄亩以上	0.1	0.2	0.3	0.1

从引用的数据（以上两表格）可以清楚地看出，愈向较高群体过渡，租赁和雇工比重相对愈大，反之，在较低群体中，出租土地和部分外出打工的则有相对大的分量。在较高群体中租地和雇工在此时间内增长的同时，在较低群体中却在下降。出租土地和外出打工的反而在较低群体中增长。诚然，在最高群体中出租土地也有增

长。但这类群体出租土地显然不同于较低群体，而具有另一种经济意义：这倒是说明较低群体对较高群体的依赖关系。

总之，以上引用的一切数据都能证明，虽然可以见到农村生活福利总的高涨过程，但在这种总的高涨的背景下，农村的分化过程仍在进行。

然而这种分化是在一个极其狭窄的范围内进行的。上层群体的比重仍然不大。我们还可以用以下的事实更加确定地支持最后这一论点，那就是革命前俄国经济资料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材料，都反映出更加强劲的分化过程。

我们不拟停留在战前的俄国，我们认为针对它所提出的论点是尽人皆知的，所以我们要列举某些有关美国的材料：

表 25

农场等级群	占农场总数百分比		每个等级群土地百分比	
	1910 年	1920 年	1910 年	1920 年
不足 20 英亩	13.2	12.4	1.0	0.9
20~49 英亩	22.2	23.3	5.2	5.1
50~99 英亩	22.6	22.9	11.7	11.1
100~174 英亩	23.8	22.5	23.4	20.4
175~499 英亩	15.4	15.6	30.2	29.0
500~999 英亩	2.0	2.3	9.5	10.6
1000 英亩以上	0.8	1.0	19.0	23.1

低等级群不仅不增长，甚至有些减少，这无疑与美国农业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有关。50 至 174 英亩的中等农场群，尤其是 100 至 174 英亩这一级，确定无疑在减少。在最高等级群中有所增长，但比重各个不同。

因此，对于我国农业分化过程和外国农业分化过程的比较分析

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现代条件，据我们所见，其走向是限制农村分化过程和促使农村中贫困阶层和中等阶层经济上升，在这方面将产生足够确定的良好效果。那就是，我国农村的分化相对而言不大明显，速度缓慢，贫困户和中等户的基本群众正向更高的经济实力等级攀升。

4. 农业生产的社会化进程

以上我们见到，由于农业发展的现代条件取决于国家经济政策，因此这些条件在刺激农业生产集体形式的发展。

但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中看到，最近四年来，集体农业生产一直占整个农业生产的0.8—0.9%。诚然，集体农庄的数量在增长，其组织也在改善，但其比重目前仍然很小。

从这一点着眼，我们可以说，就农业生产集体化的过程而言，它只是刚露头角。农业生产集体化的成绩微不足道，不仅因为集体经济组织本身是新事物，很复杂，还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集体经济迅速发展所需要的足够的技术前提和经济前提。毫无疑问，从社会的角度看，集体经济形式作为最高发展形式，只有在能够显示其优于个体经济的一切积极方面时，才可能具有增长的坚实基础。只有在集体经济有了高技术基础和完善的组织时，集体经济优于个体小经济的积极方面才能显示出来。而且我们看到，我国农业机械的供应程度目前还很低。因此，农业集体化的增长水平，对于工业的发展和用完善的机械供应农业，有着最密切的依赖关系。既然目前我们不具备这些，集体化过程也就进展缓慢了。

此外，目前农业中有些条件在或多或少地刺激农业的分散经营，从而阻碍农业通过集体化道路大型化。这方面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是革命前和现在关于分家的材料。战前每年分家的百分比维持在不高于2%的水平。革命初期（1917—1920年）提高到3—4%。第二时期有所降低，但仍处在2.6—3%的高水平。关于这一点有

关户数增多的材料可以证明。战前每年平均约 2%。现在维持在 2.5~3% 的水平。西欧和美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低于我国现在的水平，而且低于我国战前水平。德国约为 0.5%，美国甚至约为 0.2%。

5. 农户合作化的增长

然而如果说，农业生产的合作化过程，更确切地说是集体化过程，进展缓慢而且刚露头角，那么，与此相反，农户的合作化过程，在农民经济产品的销售和加工范围内，以及在向他们供应工具、生产资料和贷款方面，却有巨大的成就。

这一点可从以下的数字中看出：

表 26

日 期	低级农业合作社合计		社员人数		合作化农户的百分比
	绝对数	百分比	绝对数(千为单位)	百分比	
1924 年 1 月 1 日	24217	100	1547	100	7.8
1924 年 10 月 1 日	31315	129.3	2598	168.0	11.7
1925 年 10 月 1 日	33520	138.4	5301	342.8	22.3
1926 年 7 月 1 日	35148	145.1	6416	414.9	26.3

由此可见，无论是合作社的数量，还是入股者人数以及农业居民合作化程度，都有迅速的增长。

诚然，对合作社现代计算法的分析表明，由于同一户的家庭成员分属不同的合作社，故此统计往往会重复计算社员，因而必然会夸大其数量和农户合作化的比率。这种夸大的程度据某些统计几乎平均达到 30%。因此，需要把所引用的数字看做概约性的。但它们极可靠地反映了合作社建设动态的方向和速度。即使合作社员数和合作化的比率有以上指出的概约性，并且要给它打很大的折扣，农业合作社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仍然是巨大的。

农业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取得巨大成就，其中包括美国、丹麦、德国、荷兰和某些其他国家，它们农村人口合作化的百分比无疑并不低于我们。但如果考虑到我国合作化的成就是在总共几年时间内获得的，那么我们的合作社增长速度最大这一点就清楚了。这里体现了我国农业发展现代条件的影响。

6. 大型国营农场

国营农场体系无疑是农业发展的现代条件的直接产物。国营农场网经过一系列削减之后，现在已经稳定下来，其组织无疑得到明显改善。但它们在农业生产中的比重仍然很小，占全部农业总产量的1.4~1.5%。由于现代国营农场是通过改造部分前地主经济的道路产生的，所以其进一步增长问题与建立和组织新的国营农场密切相连的。

7. 小 结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认为革命后的农业发展条件的作用明显表现在：

- 1) 农业（直到最近几年）增长的高速度；
- 2) 农业合作社增长的速度；
- 3) 阻止农村的分化过程；
- 4) 相对提高农村贫困群体的生活福利水平。

农业发展新条件的影响表现在：

- 1) 提高农业的商品率和增加农业的出口；
- 2) 农业的技术改造，特别是电气化和拖拉机化；
- 3) 农业生产的集体化；
- 4) 组织大型国营农场。

五、关于苏联农业发展的前景问题

如果看到前面一部分中谈到的发展农业的路线，那么，关于第二部分所述现代条件下它的发展前景问题，可以提出以下几点：

1. 我国农业发展总速度无疑将比过去几年要低。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我国农业发展的总速度实际将是怎样，比前几年低多少，这将取决于：第一，市场条件，第二，对农业的工具和生产资料，特别是农业机械的供应量，相应地，取决于农业的技术改造。

改善农业的市场状况首先要加强对农村的工业品供应，提高地方市场对农产品的购买力（主要依靠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和降低商业周转的费用），也要发展农业出口。如果农业的市场情况相当好，如果对农业的工具和生产资料供应发展得相当快，那么，我国农业以后的发展速度就会比战前高一些。

2. 至今进展较慢的我国农业商品率和农业出口的发展，在农业产量接近战前水平的现在，主要取决于农业的市场情况。如果说农业商品率和农业出口的增长对发展我国的工业具有首要意义，那么它们对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的意义也不在其下。没有通向世界市场的宽阔通道，农业发展的高速度是没有前途的。因此，为发展农业出口而斗争，为提高农业商品率而斗争，同时也是为农业发展的速度而斗争。

3. 向农业供应技术完善的工具和生产资料，并在我们的条件下对农业进行相应的改造，都要求发展农业工具和农业机械的国内生产，进口缺乏的机器，降低农业工具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并增加对购买这类工具和生产资料的项目的农业贷款。必须让这些条件一齐得到保证。如果不保证产品完全可以接受的价格，如果不保证信贷有充分的发展，本国机器生产的发展只会导致我国农业机械

制造业的危机。反之，在上述条件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指望，向农业提供完善的工具和机械，以及在现代条件下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将有可能以足够的力度向前发展，从而支持农业发展的高速度。

4. 农业的现代发展条件为防止农村社会分化的急剧推进提供了足够的保证。这些条件同样保证了农村贫困阶层的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在这种条件下，维持农业发展的足够速度，提高其商品率和发展农业出口等任务，都要求以特别谨慎的和鼓励性的政策对待正在发展的高商品性的劳动农户。

5. 可以认为，农业合作化近期内在农产品销售和加工领域内，以及向农业供应工具和生产资料的领域内将继续下去，不过这种发展的扩大同样会放慢一些。

6. 集体农庄在现代条件下将继续发展，但在现有的农业技术基础上，这种发展将放慢速度，而且在多年时间里，集体农业生产在我国农业产品的总构成中还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加快健康的集体化对农业的发展速度要求农业有极高的技术基础和居民有很高的文化水平。

7. 可以认为，国营农场逐渐立足于足够牢固的基础之上。然而国营农场的进一步增长是同组织新的国营农场相联系的，要求国家大量投入。由于国营农场在全国农业产量中的作用目前尚微，还因为难以指望为组织新国营农场而大量投入新的资金，所以以后它们在全国农业总产量中的作用虽然有所提高，但长时间内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8. 以上所述表明，在可以预见的近期内，农业发展问题仍像早先一样，首先是个个体农户的发展问题（就比重而论），尽管他们在农产品销售和加工的基础上，在向农业供应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成合作社。

鉴于农业发展对于向工业提供原料和发展我国出口因而也对发展进口有着重大的意义，前面陈述的论点迫使我再一次强调，有重要意义的是提供条件，让农业小生产者有足够的兴趣去发展农业生产并提高其商品率。

尼·康德拉季耶夫

№05309

农民斯科罗霍德^① 关于 共产党员言行不一给《农民报》的信

(1927年12月28日)

从1918年开始直到现在，各个报纸和杂志的编辑部一直在讲，如何把各民族各阶层非党农民劳动者吸收到公社、劳动组合、集体或某种农民团体，以共同耕种土地，共产党员演说家，都在农民大会上不遗余力地谈论这个问题，讲得口沫飞溅。可不知怎地这些组织就是成立不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农民们不同意，难道不好吗！既然共产党员们演说家都说好，那就是说，在劳动组合里生活和工作会容易一些，俗话说，如果我们一起干活，就不会饿肚子。这是对的，但问题就在下面：写文章、演讲，说赞扬话都可以，这样做很容易，但我们农民们实际上没有看到过，劳动组合里的共产党员是怎样生活的，而下列例子以前和现在都有，请看：

1. 有些农民共产党员，说服了一些非党农民，割出了一块好地交给集体，由劳动组合共同耕种，可是你看，他们说：共产党员们背痛，你们农民们把自己的和我们的地都以劳动组合形式在集体主义原则上耕种起来，而我们共产党员们去干脑力活，也就是去做服务工作。于是，这个集体里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像蜜蜂围着蜂窝那样围着区执行委员会、信贷合作社理事会、合作社和其他各机关转。

^① 斯科罗霍德是萨马拉省萨马拉县乌捷夫斯克区波普拉夫斯克镇的农民。

2. 在离我们镇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几个共产党员给自己划了一块地，由几个过去掌权的人组成了一个集体：其中有乡执行委员会主席、乡贫农委员会主席和乌拉尔战线机枪连指挥官。结果怎么样？他们被开除党籍，而且原区执行委员会主席一次都没到自己的集体去过，而在乡被撤销以后，他便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一个女人姘居在一起，去了另一个村子，如今在一个小铺里卖杂货，而原乡贫农委员会执委会主席，当他在执委会工作时曾经用两支转轮手枪和四颗炸弹装点门面，在集体中干了几年农活，然后就在集体里闲逛，之后便离开集体，说什么：“谁爱干活，就请便吧”，就到萨马拉县城去了，现在他在那儿开了一个肉铺。其他几个人还留在集体里，但每个人都是单干。原乌拉尔战线机枪连长，今年撤销前线后，就扔掉农活，锁上家门，到村委会当上了秘书，每月拿 18 卢布的薪水。正是这些同志，竭力称赞公社、集体和共同耕作土地，他们在讲台上发表演说，他们说得不仅口沫飞溅，而且口水四喷，不停地赞扬并教导非党农民，怎样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共同耕种土地，而他们自己却不想按任何原则耕种土地。古书（历史）说得千真万确，他们只说不做，搞了一付沉重无比的重担，放在别人肩上，而他们自己连手指都不愿意动一下……

K. 斯科罗霍德

№05310

工人库兹涅佐夫^① 关于自己对
苏维埃国家的贡献给《农民报》的信

(1928年3月15日)

4年以前，我曾在莫斯科—白俄罗斯—波罗的海铁路工作，在29段道路服务部当钳工。后来裁减人员，我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既然集体耕种对集体的参加者本人有好处，那为什么农民还不联合成集体呢。于是我自愿解职，把职位留给了一个被裁的人。我从来没有在农村住过，现在决定到农村去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社会主义事业。为了社会主义，在1919年高尔察克进攻时，我不顾家中的情况，第一个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自愿离开伊热夫斯克工厂，于2月15日到了前线。伊热夫斯克人，响应号召吧。1919年4月18日，红军撤退时我在读《贫农报》时被白匪军打伤。1919年4月19日，逃回红军那里。响应1919年4月25日的《红色军人报》的号召。1920年，一开始在特维尔特种任务政治委员萨科斯同志那里担任工厂卫队长。谁第一个自愿到波兰战线，萨科斯同志响应了。谁在西方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1920年和1921年从明斯克城撤退时供养了政治工作人员，谁肩上 [……]^② 扛了几百普特的货物，以便不让波兰地主军使用。政治工作人员们，响应号召。1921年8月5日，带着自己的文章——诗——请了长假，要把诗写完。1924年和一个农民说好到特维尔省勒热夫县帕宁斯克乡克

① 库兹涅佐夫是特维尔省勒热夫县帕宁斯克乡克利斯特村的工人。

② 无法辨认。

列斯特村他家里，去教他的两个孩子手艺，条件是收入对半分。这个农民很高兴这样的分配。我就住在农村了，我所干的活：1) 制作各种农业工具和手工业品的铁匠，2) 缝纫机、钟表、打字机和其他手工艺活的修理工，3) 铜匠，4) 洋铁匠。我在社会生活中是有用的，农民生活中需要我的手艺。在整整三年中我努力建立集体，可这个农民不去参加，只顾自己。很多人叫我到他家干活，我向他们建议组织信贷和土壤改良合作社，他们都不听。我在谁家干活别人就羡慕他，说什么：“你的主人真有福气”。在很大的地区里，我在居民中获得了声誉，我在村苏维埃当了两年委员，我家有7口人：4个劳动者，3个小孩子。我还会对所有劳动人民有用，我发公民的誓言，至死忠于工农的国家。谁需要我，我便响应号召，哪怕到西伯利亚去。

尼古拉·米海洛维奇·库兹涅佐夫

城乡结合。列宁遗训

衷心向保卫全世界，保卫社会主义的红军致敬，同志们，我们这些分散在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各地的老红军战士也要保卫共和国，我们没有忘记手中的枪，如果需要，我们将勇敢战斗。

尼古拉·米海洛维奇·库兹涅佐夫

№12367

农民库·马·马托夫^①致特维尔省工农检察院
请求恢复其选举权的申请书^②

(不早于1929年4月24日)^③

在克谢姆乡选举委员会会议上，依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4号决议的条款，通过了第7号会议记录，根据该选举委员会决定，我从1928年12月8日起被剥夺了选举权。此项决议不当，我认为我是无辜的，理由如次：我，马托夫，在父亲死后成了孤儿。十岁时，母亲送我去皮捷尔念书，学做买卖。不到21岁，我就在几个东家手下经商，此后我应召入伍服现役。从1903年到1907年，我参加对日作战。退役后，我又在皮捷尔几个东家手下当了3年买卖人。后来，在1910至1911年和1912年，我在电车上当售票员，1913年在科祖欣劳动组合做临时工，1914年5月摆摊做生意，1915年在城外新村租了个小售货亭，没有雇人。1915年6月22日被动员上前线参加作战部队，直至1918年2月22日复员。此后，我又于1920年被召到红军部队。1923至1924年我曾任瓦西里科夫农业社米哈列夫分社主任。1925年我组织了米哈列夫消

① 库·马·马托夫是维谢冈县克谢姆乡第二米哈列沃村的农民

② 以下发表的几个文件是红岗区档案馆保存的集体化时期的文献。20年代末，在那时已划入莫斯科州的红岗境内，总计有近14000户小农。在联共（布）中央《关于加速集体化和国家帮助农庄生产的措施》的决议于1930年1月5日通过之后，该区即广泛开展起“全盘集体化”运动。该区在集体化速度方面居全州首位，因此而荣获莫斯科州执行委员会颁发的“红旗”。

③ 卷宗里有第二米哈列沃村民全体会议1929年4月24日作出的关于必须恢复库·马·马托夫选举权的决定（决议）。

费合作社，1926年任黑公施吕瑟尔堡水运村七号商店主任。在那儿从1926年干到1927年，后于1928年7月2日返回家乡，米哈列夫村委会推选我组织合作社并任命我为米哈列夫村委会中心店主任，我任此职直至现在。在任职期间，我一直忠于职守，没犯过任何错误，不论是盗用，还是侵占，也从未说过反对政府的话，没做过反对政府措施的事情。根据如上所述，我请求特维尔省工农检察院命令克谢姆乡选举委员会，重新审议并恢复我的选举投票权。

我的家庭成员为2人，我现年47岁。我的财产计有：木屋1座，院子1处，马厩1个，板棚两间，谷仓、打谷场、干燥棚各1个，母牛2头，小马1匹（两岁），耕地1俄亩66平方俄丈，草场3俄亩54平方俄丈。

签名：

库兹马·马尔丁诺维奇·马托夫

№03133

红岗区执行委员会关于纠正 1930 年 5 月 15 日
集体化过程中过火行为的材料

(1930 年 5 月 18 日)

没收富农资产：

预定没收	457 户
已没收	219 户
取消没收	140 户
尚〔未〕被没收	79 户

剥夺选举权：

已被剥夺选举权，	
其中，城市〔里〕	1036〔人〕
重新恢复	217
尚余	819

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书记 沙巴林

№03134

农民莫列夫^① 被没收的财产清单

（1930年7月7日）

沙发三只——8卢布，
普通桌子两张——8卢布，
白铜茶炊一只——3卢布
无玻璃罩灯两盏——2卢布，
有盖儿抽屉柜——10卢布，
内衣柜——8卢布，
铁床——3卢布，
镜子——50戈比。

按财产清单作价移交市消费合作社并卖掉，得款29卢布50戈比。

大桌子一个——5卢布，
维也纳式椅子一只——1卢布
衣柜一个——10卢布

以现钱交易方式卖给区兵役局，得钱用于偿还自愿捐款和粮食收购的欠款。

豌豆卖给亚麻厂，收现金，麦芽和黑麦面卖给市消费合作社。
也就是说，尚未卖掉的只有一辆雪橇车。

区财政局职员
（签名无法辨认）

^① 莫列夫是乌里扬诺夫村苏维埃棕熊镇农民。

【专题说明】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几个文件

(1922年10月至1935年11月)

这是涉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格勃乌）的活动的档案资料，揭示了格勃乌在宗教、地方苏维埃、工业部门等方面的活动。格勃乌所提供的关于东正教的活动、关于地方苏维埃工作总结中群众情绪的报告给读者提供了当时社会状况的一个侧面。冶金专家格鲁姆-格尔日迈洛的辞职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沙赫特案件的真相。现已查明，1928年的所谓沙赫特案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工程技术人员的一桩假案。收入本专题的个别文件同格勃乌无关，但因内容相近，也一并收入。

(本专题文件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周绍珩、王希礼、王伟文、温耀平翻译)

№04563

远东共和国政治保卫总局

关于东正教活动的通报

(1922年10月29日)

对1922年10月29日第905/III号通报的补充和说明

绝密

通报

致上乌金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国家政治保卫局州分局局长，斯列坚斯克、阿克沙、涅尔琴斯克、涅尔琴斯克工厂——国家政治保卫局支局局长

最近数月以来，东正教教会的历史上出现了一起重大的事件——宗教界出现分裂，形成了一个名为“新生教会”的宗教教会派别。

“新生教会”思想诞生的时间应追溯到1905年初，那时，十月十七日宣言促使俄国社会政治生活舞台上出现了解放运动，随后彼得格勒宗教界的一些代表，属于自由派和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公开提出教会生活必须进行改革的主张。

例如，在十月十七日宣言之后，(主教)纳尔夫斯基·安东尼在举行弥撒时，不再重复宗教的惯用语“全能的主”，认为由于十月十七日宣言，沙皇已经放弃了专制制度，成为立宪制君主。安东尼因此被解除了神职。

这时候，宗教界由30人组成的联合组织要求正教院召开高级

神职人员会议，指出正教院本身反教规的实质，[没]有能力管理俄国教会。这个问题使教会的杂志上出现了一系列论战性的文章。因为，在管理教会事务方面违背宗教规定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教会的现状对革命以前的国家政权来说是有利的，因为教会的管理机构都是以世俗政权的名义，而不是以教会的名义委任的，这样，国家对教会的监督是完全的，还因为，教会的下级官员们几乎是在无偿地履行公民的义务，例如，主办婚事，超度亡灵，统计服兵役的人员名单，等等。正教院被迫对教会解放运动作出了让步，并召集所谓的宗教大会预备会议，同时无限期地推迟全俄高级神职人员大会的召开。所有的教区、宗教界和非宗教界的人员都参加了宗教大会预备会议，会上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希望教会进行改革的报告。预备会议听取了所有报告，它的记录和决议都刊载在《教会公报》上。在30个小组和一些思想一致的人坚决要求改革的时候，在各种各样的借口下，高级神职人员大会被拖着迟迟不开。

自1914年起，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欧洲战争上时，改革者的呼声也渐渐消失了。人们几乎停止了谈论改革和召开高级神职人员大会的事。

二月革命使改革者又看到了希望，由于正教院新总监，曾是临时政府成员的利沃夫^①的努力，解放运动终于使全俄罗斯高级神职人员大会于1917年8月15日召开了。

^① 利沃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1872—1934）——大地主，“十月十七日同盟”党员，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事务委员会主席。1917年3月2日，作为正教院总监参加临时政府。自1920年1月起，移居国外。1922年承认苏维埃政权并返回祖国。1927年以前在最高教会管理局工作。1927年2月2日，因刑事案被捕，并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委会的决定被流放到托姆斯克。1929年获释，并留在托姆斯克。

利沃夫在担任国家杜马委员期间多次做演讲，揭发和批判正教院的政策和正教院的总监们，揭露教会的混乱、祸害以及掌握教权的人滥用职权的现象，要求改革以及教会同国家分离。

其他的著名的教会人员还有主教安东尼，神甫韦坚斯基和拉斯尼茨基。

大会在开展自己的工作过程中，坚持异己政策，努力恢复在实质上仍然是以俄罗斯东正教为基础的那些教规、历史和日常风俗方面的东西。其中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恢复大牧首制，彼得一世为了使教会的管理服从于自己的统一政权，取消了大牧首制度，通过由他所委派的对他有利的人组成的正教院来管理教会^①。

革命的时代促使大会的绝大多数人在工作中小心谨慎行事，每走一步都慎重思量，对待改革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要进行全面考虑。由于这原因大会被拖得很长，但利沃夫和他的同道（新生教徒）坚持立即进行改革，没有达到此目的，就退出了会议以此示威，不久十月革命就驱散了会议的剩余人员。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大会不能存在了。

随着吉洪^②大牧首的被逮捕，在莫斯科成立了由主教安东尼领导的教会最高管理机关，其成员有神甫韦坚斯基、拉斯尼茨基以及其他一些人，世俗代表有利沃夫。

这个机关就是名为“新生教会”的正式组织的最初形式，他的成员还包括 30 名以前的彼得格勒人。

① 大牧首阿德里安于 1700 年去世，彼得一世借此机会取消了大牧首制，并把教会变成了自己统治机构中的一个部门。大牧首制于 1721 年被正式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正教院。

② 吉洪（别拉温），瓦西里·伊万诺维奇（1865~1925）——1917 年 11 月 21 日在东正教大会上当选为大牧首。在审判抗拒没收教会珍宝的神职人员案中吉洪作为证人出庭，并于 1922 年 5 月 9 日被软禁。

这样，“新生教会”就成了东正教内部分裂的开端。

但事情并不限于此。

今年的8月，根据新生教会教徒的倡议而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白衣僧侣代表大会，使教会分裂一事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新生教会”又产生了一个以安东尼为领导的新的教派——“教会复兴派”。当“新生教会”派站在世俗一方，清除修道院和僧侣，面向普通的神甫时，“教会复兴派”却极力保存教会设施，指靠信徒中的自由主义分子和城市僧侣。与之并列的又出现了第三个派别——“新生教会左派”，该派的目的是：同神甫的欺骗和萨满教作斗争，建立神职人员的选举制度。

莫斯科事件不久就在西伯利亚出现了结果。索福罗尼主教试图使托姆斯克的西伯利亚教会管理所摆脱“新生教会”的纲领，号召后者对实施自由主义思想采取妥协的态度，这些尝试没有取得成功，但由于该主教的倡议在新尼古拉耶夫成立了第二西伯利亚教会管理所，它赞同“教会复兴派”的纲领，由于索福罗尼主教的威信，这个教会管理所在形式上已经很稳固了。令人担心的是，这个西伯利亚教会管理所以忠诚于苏维埃政权作掩护，实际上却用君主政体的宗教思想教育群众，从而达到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目的是。

但是，如果说莫斯科事件很快在西西伯利亚宗教生活中有所反应的话，那么后者却使远东共和国内的宗教分裂迟迟不得实现，这一点，依我们的观点，原因是：一方面，国家政治保卫局机关在分裂上无所事事，例如，直到现在为止，他们之中没有一个部门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哪怕是暗示过教会的分裂运动，甚至连分裂运动的迹象也没说过，另一方面就是由于因循守旧，文化落后，紧密团结以及在远东地区宗教界中缺乏有足够威信的大人物，可以指望在存在主观上反对吉洪（莫斯科大主教）的派别的情况下，信教的群众和宗教界的低层人物会追随他们。

如果在远东地区宗教界中有革新派教徒，那么由于害怕落入孤单境地，这种担心可能阻止他们发表公开言论来反对溶入了每一个教徒的血液中的古老的、日常的教规。除此而外，应该承认我们的党和国家新闻媒界是有错误的，他们也许是因为对宗教生活漠不关心，也许是因为缺乏信息资料，直到最近为止，也没有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有关宗教问题的文章，更没有谈宗教分裂的文章，而诸如国外白卫分子的报纸，他们极为关注反动的僧侣们在政治上的统一和团结，他们用倾向性极其鲜明的文章向我们的神甫人员的头脑中灌输被歪曲了的“新生教会派”的概念，向“新生教会派”的积极活动家头上泼脏水，一有机会就散布说，教会分裂事件是“异教徒共产党员”一手制造的事件。不管怎么样，教会的分裂最终会在远东地区发生的，况且，最近一段时期，地方的宗教界，最起码是外贝加尔地区，都收到了《新生教会》的最初几期杂志，根据所得到的信息，一部分进步的神甫已经开始思考以同样的名字来实施《新生教会》的思想，而另一部分人，对他们则抱有同情的态度，并等待时机，当其内部出现丝毫变动时，就公开行动。

鉴于上述情况，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向各州和各县的分局下发了如下指示：

1. 尽可能多地注意东正教，必须给自己创造条件，从他们之中招募几个（越多越好）提供情报的人。
2. 首先从教会里的执事开始，根据私人案件的程序来注意整个宗教界。
3. 准确地确定每一个神职人员对“吉洪分子”、“教会复兴”派以及新生教会的两翼的好恶。
4. 在修改第 905III/号密令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认为不需要过多地敲打宗教界，因为这样做会使“吉洪分子”得到加强，并使信教群众回到黑帮宗教界里。

5. 在“吉洪分子”拥有领导权的地区要做到：1) 积极给那些忠顺的僧侣（通过情报员）提出任务，让他们无论是在报界，还是以宣传的方式开展反对吉洪拥护者的有力行动；2) 追查反动的僧侣，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对他们实行隔离，用各种合乎法律的借口将他们强制迁出。

6. 出现进步思想的地区应支持“新生教会左翼”，这是我们最能接受的派别，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同神甫的萨满教以及该教派所保护的神职人员选举的条件作斗争。在没有“左翼”时可以指靠“新生教会派”本身，而只有在弄清楚，在地方宗教界和非宗教界中“新生教会派”或者是它的“左翼”还没有得到承认时，才能去支持“教会复兴派”（安东尼分子）。“教会复兴派”处在最后一位，因为尽管它是“吉洪分子”的反对派，但它加强了对宗教的信仰。在全面支持以上教派之中的某一个教派时，绝对不要全力以赴，也不要忘记在宗教和我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之间存在着对立。极力加剧农村僧侣和城市僧侣的关系，使前者倒向“新生教会派”，因为此派的方式和思想符合他们的利益。密切监视在各教派的竞争之中力量对比的变化，要考虑各教派本身的阶级成份和人员数量以及非宗教界对他们的态度，也就是他们的势力增强还是减弱，还有他们遵循的目标，了解他们真实思想的详细和具体内容，对发生的现象作出反应。

7. 在“教会复兴派”统治的地方如果出现“新生教会左派”，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新生教会派分子”，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调和组织起来，以使他们的势力相对于“教会复兴派分子”的势力不被削弱，不能加深“新生教会派分子”中的分裂，不要妨碍他们把与他们观点相同的世俗人士吸引到自己的一面而进行的活动。而在“新生教会派”的地位可以认为非常牢固的地区，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新生教会派”内部的提供情报的神甫人员，来组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几个文件

织“新生教会派的左翼”，使左翼与神甫时萨满教做斗争并分裂世俗人士。在出现其他某种教派的时候，要保持中立态度，并立即将他们的纲领、人员组成和数量报告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请通报执行结果。

第 7164/C 号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 奇比索夫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要处处长 阿尔尚斯基

1922 年 11 月

№02364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列宁格勒军区
全权代表处关于列宁格勒苏维埃工作
总结运动的情况汇报（一）

（1926年4月12日）

致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

从今年4月2日起，列宁格勒苏维埃在市区和各工业企业开展了向选民作工作总结的运动。

据已作工作总结的各企业送来的材料可以确定以下几点：发言和对列宁格勒苏维埃的批评反映出工作总结运动进行的形势是严重的：经济陷入困境，生活动荡不安。在这个基础上突出地显示出“捣乱”分子和反苏分子较为活跃，而基本工人群众较为消沉。此外，地方工会组织和党组织对工作总结大会准备不足，造成了某些企业选民情绪消极和到会人数很少……然而对工作总结运动态度消极的主要原因，看来是工人对严重的经济状况普遍不满，他们不相信大会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也不相信大会将带来直接的实际好处……

如果说工人没有公开说出离开会场的理由，那么，毕竟在所有的企业都能看到这样的场面：报告开始时就已不是所有的人都到会，报告过程中大多数出席者陆续离开会场，而到报告将结束时最初出席者中只剩下半数，有时是少数。如在“红色曙光”工厂（2500工人），到会的总共400人，会议临近结束时，剩下的总共150人……

在“红色普梯洛夫人”工厂（开会时工人 9500 人，而在报告进行中走掉 5~6 千人）[……] 比平常提前 1 小时放工，而且工厂警卫接到命令，4 点钟以前不放任何人离厂。采取这些措施的结果正如上面所说，最初到会的约有 9 千多人，然而入口处发生了极具代表性的事故。从 3 点半起，工人开始在过道聚集，要求放行，而警卫执行命令拒绝放行。据未经核实的消息，当出口处聚集了大量工人时，人群中有人在会计室的会计师弗里德的怂恿下喊了一声：“揍这帮寄生虫！”随之群众击败警卫，出了厂门。此外，工人群众中还有人将铁门扔投向一名警卫人员，只是侥幸没造成伤害。

在两个企业里，列宁格勒苏维埃的工作总结大会因未达到法定的选民人数而未能举行……

基本工人群众出席会议人数不足所表现出来的对待列宁格勒苏维埃工作总结运动的消极态度，在那些留下来直到会议结束的人们中间也能见到。除罕见的例外，会议进行得很不活跃，讨论时发言者极少。如“红色普梯洛夫人”工厂在讨论时谁也没发言，给主席团递的条子总共 5~6 张。北方造船厂发言者总共 3 人，冶金厂和电力厂同样，发言者共 3~4 人。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会上发言或是递的纸条都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示自己对现有事态的不满，或夸大存在的缺点；而且应该指出，这种尖锐的批评得到与会者的支持。

“红色普梯洛夫人”工厂的 5 张纸条中有这样几张：1) “为什么‘红色普洛夫人’工厂的工资低于别的工厂？”而且，从报告后电力车间工人们谈话中了解到，报告人科马罗夫回答说，苏维埃无力调整工资，而且这不是它分内的事，工人们对这一回答仍不满意，有些工人说：“他（科马罗夫）是在推卸责任，是说应由工会和工厂党委会承担罪责。”2) “请问什么时候归还以前的存款？”3) “什么时候会有秘密投票选举的广泛的真民主？”有消息说，科马罗

夫同志在回答这最后一个问题时说，“红色普梯洛夫人”工厂不是提此问题的人应该待的地方。电力车间工人们对这个问题也有过谈论，而且工人库德里亚采夫还指出：“瞧，他恼了，甚至气得发抖了。”

应该指出报告人工人斯米尔诺夫（来自“液压设备”厂的列宁格勒苏维埃代表，原联共（布）党员）失去分寸的讲话。他在回答向他提出的有关合作社缺点的问题时说：“合作社里没有一个诚实的人，全都是贼。”这甚至在出席者中也引起一些不满。

会议发言中有两点值得注意：1) 拿工人艰难的处境和似乎过于奢侈的“上层”生活相比较；2) 农民倾向 [……]

无签名

№02365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列宁格勒军区
全权代表处关于列宁格勒苏维埃工作
总结运动的情况汇报（二）

（1926年4月16日）

在列宁格勒苏维埃的工作总结运动进程中，在4月8日至15日过去这一周内，4月2日至8日第一个工作总结周内显示出的那些主要迹象同样表现出来，那就是基本工人群众的消极情绪占优势，不满分子表现活跃，其次，发言人按农民倾向和按对物质条件良好的“上层人物”的攻击分为不同层次〔……〕

然而看来，工人出席工作总结大会人数不足及其消极情绪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基于对经济的普遍不满，有时是对缺乏“民主”的不满。

如在以托洛茨基命名的第15国家木器厂，会前工人们交谈时说，我们这就在会上发言并“大骂”苏维埃的工作，但会上谁也没发言。他们解释工人的消极态度说：“喏，有什么好说的？共产党员是对的，要信任他们，你就住嘴吧，因为马上会把你的嘴封上。”

4月7日，“无产者”工厂5000工人中，到会的总共600~700人，临近会议结束时，剩下不过250人。会前工人们交谈：“如果事先一切都决定了，会上还有什么可做的，我们只需举个手。没必要白白受累……。”

列宁格勒苏维埃成员和联共（布）党员在会上和会前发表了一

些不妥当的言论。如在“飞人”工厂第一剪裁部，报告人列宁格勒苏维埃成员科罗特科夫在谈到托拉斯里盗窃公款者时，似乎面带微笑地说：“当然，法庭会审理和判处，然而，当然会考虑他们的无产阶级出身”[……]这话招来出席者如下的反应：“当然，会判刑5年，但一年后就会放出来。要是我们这种人，枪毙。”

在“红色纺织工人”工厂，联共（布）党员雷谢夫和布京会前对工人说：“会上有什么鸟事好干。只是闲磨嘴皮子。让那些工资多的人去说吧！”显然，因此到会者总共150~200人，而在工厂工作的有2200人，其中联共（布）党员400人，共青团员300[……]

在卡尔·马克思医院，主要组织者谢罗夫辩论时发言，他说：“他们只说增加工资35%，可市场上食品价格涨了2倍多。将来就会这样，职工拿到工资交给房屋管理员，而买面包的钱一点也没有。”

正像上面指出的，参加辩论的大都是些夸大现状阴暗面的“捣乱分子”。在他们的发言和提问中主要是农民情绪和拿工人艰难的经济状况与“上层”生活比较。

如在“斯维尔德洛沃”工厂（280名工人），报告人似乎宣称，列宁格勒市的工业和合作社没有利润，合作社里“除了亏本和浪费外别无所有”。辩论时发言的农民工人列米索夫说：“农民们得到地主的土地，但为此土地付的钱比以前付得更多。我初次来到这个工厂，关于列宁格勒苏维埃和省的预算，我不想反对报告人。但我想问他：难道列宁格勒苏维埃看不到，它的政策会有什么结果，合作社亏本，生产也一样，而耐普曼提供列宁格勒省和市全部进款数额的35%，耐普曼不拿农民和工人的又拿谁的。现在纺织厂没有原料（亚麻）了，可农民有亚麻储备，但不拿亚麻来抵农业税，而想按农业机械的价格出售，可是国家不给他们这个价。”

在“伊里奇”工厂 70% 是农民工人，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国家秋天买进粮食是 80~90 戈比一普特，而春天卖给农民是 1 卢布 50 戈比至 2 卢布一普特？”辩论中发言人提及农村中合作社工作的弱点，合作社的价格高抬，并指出：“农民被盜匪吓倒，而法律对罪犯惩罚不力。”（工人科皮耶夫）〔……〕

此外，会上发言人谈论最热烈的问题是：经济困难、盗用公款者、新住房建设的缺点等等。

据我们现有的材料，类似的发言和纸条子，几乎在列宁格勒苏维埃工作总结运动展开的所有工厂都同样明显的存在。

№02366

列宁格勒省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给
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团的
1927年工作报告
(1927年)

(一)

[……]引起特别突出的自我否定的态度和造成某种不安和担心的有以下种种因素。

首先，应该指出几个涉及苏联国际形势和军事力量的有趣的问题。有人对苏联面临“即将到来的与资产阶级战斗”的准备程度，对威胁列宁格勒的危险表现不安，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没有军事技术我们将怎样抵抗？”

有人无比深刻和直率地提出与国内总的政治形势有关的问题。在有些场合问题提得（在纸条上）极为刺耳和放肆。许多给报告人的纸条和问题是谈不久前党内争论的：“为什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不作出我们正在建设和一定建成社会主义的结论”，“为什么不问问工人的意见就撤去季诺维也夫苏维埃主席的职务”等等。

有几个（纸条上的）问题涉及“平等的，秘密的民主”投票选举（“现在为什么不像早先许诺的那样实行这样的选举”，“为什么执政党不用秘密投票方式改选苏维埃”）。

最后，某些（书面）发言带有某种反革命印记，多半是蛊惑人心或简直是流氓腔调（“什么时候你们停止掠夺我们。”等等。见无

产者工厂等的纸条)。

反犹主义偶尔冒头 (“只送犹太人去疗养地”，“多少犹太人从事生产”，等等)。也有人对工人参加苏维埃的百分比太小怀有不满 (“两千人中只有 600 人参加”)。

失业问题处处引起严重关注。多数情况对失业增长表示惶恐不安，有时表示谴责 (“你们对失业者说得多，做得少。从业可以吃饱，失业只能挨饿。失业者无处安身，只有死路一条。”人们强调必须禁止一家数人工作，必须控制农村的失业者涌入城市，必须慎重裁减工人和职员，必须取缔兼职。

有些时候人们对公开宣布的失业劳力和就业劳力的数字表示不信 (“如果我们的一切都在改善，哪来的失业”，“报告人说吸收了 75000 工人，可这些工厂一年内又解雇了多少工人”。“工业稳定，可为什么我们工厂裁减工人”。(“红色普梯洛夫人”工厂)

有些纸条谈到职业介绍所任用私人：“为什么职业介绍所为卖身的姑娘提供工作”，“为什么介绍所劝人抹口红”。(哈尔图林工厂)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担心我们推行的劳动合理化会导致失业增长，“因为国外失业人数的增多也与合理化有关”。

作为制止失业者从农村涌入城市的措施，有人提议减少向农民征税：“为什么不能这样做”。有趣的说法是：“我们同意向工会交纳百分之三而不是百分之二，以便给失业者更大的帮助”。(“电力厂”)

与失业问题同时提出的是停止向国外订购工业品的问题：“自己的失业者一大帮，为什么把电车车厢的定单交到国外”，“为什么列宁格勒苏维埃很少注意我国工程师的设计方案，却用外国的”。下面这种荒唐的问题也表露出对“外国”的这种不友好的态度。“说是莫斯科藏着两个大工厂，它们赚的钱都汇往国外，这是真的

吗？”

对于有关压缩工厂的任何流言表现出不安的关注：“听说要关闭普梯洛夫工厂，这话可信吗？”，“为什么要关闭私人工厂！”

在一些工厂里，以相当尖锐的方式提出了工资问题。这里进行两种对比，一方面是与战前时期对比，另一方面是与主管人员的工资额对比：“工资低于战前，而战前工资也少得可怜”，“为什么主管人员工资很高，可物价飞涨对所有的人来说都一样”，“小卧车归他，可对女工毫不关心”（“苏维埃之星”纺织厂），“第11次会议能不能削减负责人的工资和减少乘坐小汽车”。

引起强烈的指责的是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我们说得许多，但官僚主义没被铲除，需要动用铁扫帚”）和节约制度的扭曲（“为什么它只管工人，对职员就是另一回事”，“制度牺牲体力劳动者”）。节约制度常和“汽车”问题联系：“厂长们有多少汽车”等。

可以听到对企业劳动保护不够的尖锐指责：“开了许多会，收效甚微”，“女工们受折磨，倒在机器旁”等等。

相当大量的问题涉及与侵吞公款和渎职罪的斗争。工人们要求更加严厉的镇压，并对提前释放侵吞公款者表示气愤、惊讶：“为什么对侵吞公款者判处得如此温情，甚至为他们抱屈”。

与犯罪特别是与酗酒和流氓行为作斗争的问题也受到同样的关注。有人问：“为什么苏维埃不关闭啤酒馆和酒吧？”他们指出：“食品卖到晚上九点，酒却卖到十二点。”他们谴责“用40度烧酒毒害工人”，并且指出，如果这样做是为了取得资金，那么这种方法是不妥的。

许多人主张更加严厉地打击流氓行为。一些人认为对楚巴罗维茨们^①的案件判决太软弱，但也有一些相反的说法：“判处很严

^① 主要是由青年人结成的犯罪团伙。

房”，“为什么这样严酷地镇压楚巴罗维茨们”。几张纸条着重指出民警队对待公民态度粗鲁。

多数选民在必须加强对犯罪、流氓行为和酗酒现象作斗争这一点上意见一致。也有人责备苏维埃在这方向的政策过于软弱。

各次会议对苏维埃的住房政策给予很多关注。对于新房租法的指责，特别是对在计算房租时不把负责工作人员和专家应承担数考虑在内提出谴责，均带有群众性。指出工人平均支付有时多于负责工作人员这一点时，往往颇为激烈。

许多人认为，提高房租主要是工人多付，专家们的支付减少。希望为了工人的利益对房租作一些修改。

有人指出新建房屋质量不能令人满意，建议修理旧房而不建新房。房东将带家具的房间租给“有声望、有知识的住户”，出租住宅时要收入住费和修缮费，这些做法引起强烈的愤怒。有人建议取消房东出租房间的权利，把出租权转给住宅租赁合作社；房屋不归还搞房屋投机的房主；不对多余的住房面积征收双倍的税，而是转给特困户。

在城市公用事业方面，多数意见是提高电费引起的，有人说，这也许是沃尔霍夫水力发电站建筑工程失败造成的。

至于商业和合作社，会议着重谈到许多主要食品和纺织品供应不足，其中包括油脂，说是“被运往国外”。物价上涨与向私商征税过高有关。也有人指出合作社获取利润过高。他们要求严厉惩治那些不听从降价指示的机构。

在卫生保健方向，有人指责苏维埃说，被送往疗养地和疗养所的主要是负责工作人员和党员。工人获准去疗养地似乎困难重重。有人指出在某些医院里医疗事务安排得很糟。

对于国民教育，有人指责二级学校教学大纲内容太少，学校传授实践知识不够。一般说来，在国民教育领域和卫生保健领域，尖

锐批评或不满的情况是个别的。

最后，应该谈谈涉及农村的纸条和问题：关于贫农的纳税负担增加（“过去贫农交纳2卢布税款，现在交纳4~5卢布”）；关于农村需要的工业产品涨价（“一付犁或一米呢子的价格比去年贵3~4倍”）；关于不合理使用为农村需要筹集的资金（本可以实际支援农民的钱积压在银行里”）。

大量类似的尖锐抨击基本上是针对比去年变得更坏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满：1) 最必需的物品涨价；2) 新房租的沉重负担；3) 住房面积投机的发展；4) 裁员的威胁；5) 节约措施增加工人的负担；6) 电费提价以及其他。从这一组为数最多的对苏维埃的指责和抱怨不难过渡到下一组数量同样很多的问题，属于这一组的首先是：1) 形式多样的官僚主义和“对人的恶劣态度”激起愤怒，工人们在门诊所、医院、社会保险收款处、职业介绍所等处经常碰上这种官僚主义和待人态度；2) 对于在雇用劳动力事务中、派人去疗养地、疗养所上风行的徇私舞弊和拉关系的严厉谴责；3) 国家机关和合作机构对人民资金的挥霍浪费，如热衷于广告宣传，机关里比阔气、讲排场，出差费以及其他形式的附加开支；4) 对侵吞公款者尤其是其中的高级负责人惩罚不力（如“帕萨热姆”工厂）；5) 指责管理机关、企业和苏维埃机关的部分行政人员（特别是工人出身的行政管理人員）脱离工人群众；6) 应归入这一组的还有对日益发展的流氓行为、酗酒、犯罪、卖淫、行乞等等的悲观批评。这样，由于社会反差对比的加强，这一组纸条和问题充满愤怒和不安：一方面是私人资本累积的一定增长，官僚主义的挥霍无度和腐化，专家和负责工作人员的生活的比较有保障；而另一方面是与许多反常生活现象泛滥相联系的失业人数增长。然而在这一组问题中，从整体上说还看不出对苏维埃和党的根本敌对态度，更谈不上形成某种反苏潮流，但是这一部分发言无疑受到近来反对派的

悲观结论、对我们的革命推动力的不信任以及悲观情绪的影响。

但如果仔细察看第三类大多带有诬蔑、歪曲或危言耸听性的攻击和指责，就不能不触摸到背后有反革命分子和反苏分子某种程度的蠢动，他们不仅向小市民们，而且向工人中最守旧的目光短浅的阶层灌输恶毒的流言蜚语和进行地下宣传鼓动。这种“工作”的结果在如下内容的发言中得到反映：1) 相信大量资金被用去资助东方和西方的革命组织（如给英国矿工罢工基金的捐助被看作“对工人的掠夺”）；2) 确信日用必需品供应不足以及涨价，主要是由大批商品运出国外造成的（像“把手榴弹运往德国”这样的传奇故事在这里也得到响应）；3) 有一些意见受反犹主义情绪增长的影响，连某些党员也不能免受感染（例如，“红色维堡”工厂的党员的发言：“犹太人到处往上爬。在帕尔戈洛夫斯基医院，只有犹太人肥得流油，应该跟他们斗”）；4) 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即平等的秘密投票（“曾经这样许诺过”），指责破坏民主，“随意撤销经工人选举的季诺维也夫的苏维埃主席职务”；5) 个别明显反革命性甚至猛烈攻击性的抨击；几张威胁性的纸条，内有一组甚至使用“匪徒”和“刽子手”这类恶毒咒骂，“工人的敌意和仇恨正在增长”之类的恫吓（无产者工厂，“红三角”工厂）。当然，对这类直言不讳无需认真对待，但必须看作敌对分子“选举前宣传鼓动”的结果。顺便讲一件事，在一个递上一些这类纸条的工厂里曾进行过某种地下“准备活动”，事情已发展到散发反苏传单的地步；6) 发出故作惊慌的疑问和叫嚣无疑是企图在工人中间散布对苏维埃和党的不信任。“普梯洛夫工厂要关门，这是真的吗？”“为什么要消灭无线电爱好者协会？”“饥荒即将来临，是真的吗？”，等等。

然而第三类发言的总数极少，它们一律是用书面形式表达的。

改选本身证明，劳动群众的社会政治积极性是朝着更加信任党及党所提出的候选人的方向发展，并为进一步活跃苏维埃的活动创

造有利的基础。目前的运动真正是在广泛的无产阶级民主原则上进行的 [……]。

(二)

绝大多数发言者对苏维埃工作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批评，实际的愿望和建议。然而某些问题引起了发言者的强烈不满并受到了尖锐的批评。

属于这一类问题的首先是：

1) 住房问题——工人的房租负担沉重，房屋投机，房东独断专行，新住宅的分配（以乌萨切夫命名的第二国家烟草工厂，阿尼西莫夫工厂，“工人”工厂，莫斯科—纳尔瓦区特种武装部队）；

2) 合作社商品供应不足（第四粮食加工厂，以哈尔图林命名的工厂，“红旗”工厂）；

3) 失业（“红帆”工厂，以马尔蒂命名的工厂，以沃洛达尔斯命名的印刷厂，此外参看失业者大会）；

4) 不熟练工人的艰难物质状况，低工资及其他（“工人”工厂，“十月”工厂，纺织厂，“红旗”工厂）；

蛊惑性的发言：

除否定性蛊惑发言的绝对数量有所减少外，还可看到它们十分明显地反映出反对派的显著影响，此类发言可分以下几种：

1) 否定内外政策的总方向，主要是围绕沙皇债务等等进行蛊惑（彼得格勒区第二粮食加工厂，“普罗梅特”国家机械厂）；

2) 确信“上层”蜕变和工人利益被忽视（十月铁路“无产阶级工厂”，“红旗”工厂，莫斯科—纳尔瓦区特种武装部队，十月革命五周年医院）；

3) 确信工人景况变坏——“纸上的八小时工作制”，“剥削加

强”（“红帆”工厂，“印刷官”印刷厂，以列宁命名的工厂，“工人”工厂，第四电站，“红旗”工厂，波罗的海铁路交通服务社，以加里宁命名的烟草工厂，以索科洛娃命名的印刷厂）；

4) 利用紧迫难题搞投机：房荒、失业、流离失所、卖淫（以马尔蒂命名的工厂，冶金工会第一工厂，以沃洛达尔斯基金命名的书写纸厂，“红帆”工厂）；

5) 怀疑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特别是怀疑工业成就（“红旗”工厂，以马尔蒂命名的工厂，十月铁路无产阶级工厂委员会）；

6) 孟什维主义式地埋怨没有出版自由、“党员享有特权”，等等（“红旗”工厂，“红色普梯洛夫人”工厂，“红帆”工厂）；

7) 利用个别消极现象（商品不足和官僚主义等）为政治目的服务（以库拉科夫命名的工厂，第一电站，莫斯科—纳尔瓦区的邮电器材修配厂，哈尔图林工厂，博特金医院）；

8) 对农村政策的反对派评价——“富农坐在苏维埃里，向贫农和富农征收税额一样”（“工人”工厂，中心市区建筑工会第一组委员会）；

9) 企图用“别有用心”的问题刁难报告人（“庆祝十月革命节花多少钱”，“为何要建列宁纪念碑，难道我们会忘记他吗”（以拉季谢夫命名的皮革加工厂，以哈尔图林命名的象牙加工厂，十月铁路无产阶级工厂工人委员会）。

根据总结报告运动的汇报材料得出的关于反苏和对立情绪总的结论是：这种情绪没有在工人中广泛流传，但在某些工厂的小圈子中日益尖锐和严重，变得更加突出。从蛊惑性的发言中可以感觉到某种共同的路线显示得相当明确。

(三)

苏联政府同意偿付一部分沙皇欠法国的债务，我认为这样便偏离了自己的原则，而这样做是不合适的。不是吗？（列宁格勒国家冲压厂）。

当一位同志离开机床去担任某种负责工作，便立即给他提高工资，你们说，为什么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让他唱得更好听（十月铁路无产阶级工厂委员会）。

还有一种怪现象：没有出版自由。痛斥反对派，可为什么不反对派说话（“工人”纺织工厂）。

堵住了列宁格勒苏维埃代表们的嘴（以库拉科夫命名的工厂）。

潘科夫同志。我们的苏维埃在十月革命十周年前给我们送礼了——降低了啤酒价格；小酒馆遍地都是；拿住房面积投机，过去这样，现在还这样（“红帆”工厂）。

苏维埃政权是不是快要消灭表现为党员对非党人员的特权的阶级差别了？（“红色普梯洛夫人”工厂）。

我建议所有以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命名的机构和地方更换名称，以后不为活人而只为死去的人建造纪念碑，否则某人建了什么功勋，就马上会把他的名字为工厂命名（十月铁路无产阶级工厂委员会）。

巴德罗夫同志表示：不要再为十月革命庆典的装饰花钱，应把这些钱用在免费午餐上（“斯杰潘-哈尔图林国家纺线厂）。

为什么要为列宁新建大量纪念碑呢？你们是不是认为，没有纪念碑我们就会忘记我们亲爱的导师呢？（以拉季谢夫命名的制革厂）。

失业的人很多，而我们遭奴役，在三台机床上干活。我们使产

品价格更便宜了吗？没有。合作社的货架是空的，什么纺织品也没有。这方面的优惠我们享受不到。铁路职工还可免费乘车。他们可以带来自己需要的东西（“工人”工厂）。

为什么列宁格勒苏维埃不让私营企业家发挥作用？他们开设自己的工厂，岂不能减少失业？（马尔蒂工厂）。

苏维埃根本不想改善工人状况。应该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多少，工资就提高多少（瓦西列－奥斯特罗夫斯基区制管厂）。

革命十个年头了，还要排队购买食品（彼得格勒区以库拉科夫命名的工厂）。

物价刚降马上又涨了。降价的是不畅销的商品（邮电器材修配厂和莫斯科－纳尔瓦区第一电站）。

住宅法对工人不利（莫斯科－纳尔瓦区乌萨切夫第二国家烟草厂）。

为什么列宁格勒苏维埃不关心工人的住房？修公园、林荫道，建丝绸托拉斯工厂，可工人无处可住（“工人”工厂）。

以税收压榨农民（中心区第一建筑工人小组）。

№03148

格鲁姆－格尔日迈洛^① 的辞职书^②

(1928年9月23日)

我最最恳切地请求解除我所担任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黑色金属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理由如下：

1. 自政权转入布尔什维克手中之后，我就真诚地，勤勤恳恳地同他们一起工作。费奥多罗夫斯基教授可以证实，早在1918年3月，在回答萨韦利耶夫同志的询问时我就真诚地指出，乌拉尔－西伯利亚盛产原料，一旦乌克兰分离出去（当时有此种危险）可以保证大俄罗斯拥有铁，并曾建议政府对乌克兰采取强硬立场。

2. 我的思想意识仍然是原先那样而没有变化：政权一旦不容争辩地转入某些人手中，这一事实就决定了新政府的合法性。这样，新政府就承担了在其他民族中捍卫俄罗斯人民的利益的责任，而我作为一个诚实公民的责任就是在这方面予以帮助。

3. 布尔什维克宣布，他们打算在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基础上建

① 格鲁姆－格尔日迈洛，弗·叶·（1864～1928）——俄国著名冶金学家，俄国冶金学原理创始人之一。1911～1918年和1920～1924年先后任彼得堡工学院和乌拉尔矿业学院教授。后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冶金和热工结构管理处的创建人。1927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② 1928年春，苏联报刊广泛报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在工人的直接帮助下，揭露了顿巴斯赫特区‘专家’的阴谋”。据报道他们不仅进行暗害活动，还建立同莫斯科和国外中心有联系的地下组织。1928年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判决。苏联冶金专家、科学院通讯院士格鲁姆－格尔日迈洛以辞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职务的方式对此表示抗议。辞职书立即在莫斯科甚至国外传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找他谈话，但他表示不收回辞职书。辞职书于1928年12月1日在巴黎出版的《为俄国斗争》周刊上发表。

立国家……后来他们又改变了自己的政纲，转而采取国家社会主义的立场，并邀请知识分子和他们一起工作。

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尽管我绝对相信卡尔·马克思的学说是一种已经丧失了任何根基的过时的学说。它是在体力劳动发展时期创立的，那时在工业中几乎不存在技术知识。现在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完全相信，50年以后不会再有任何无产阶级：古代所必需的那种奴隶劳动已由蒸汽和水力所取代，而无产阶级的劳动也将由电力来代替。我们工程师的理想（在美国的轧铁厂里我们已经看见了这种理想的曙光）就是没有工人的工厂。这会给人们创造出无穷无尽的生活资源，以至于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意义。资本主义能很好解决培植这种未来文化的任务。北美合众国政府现在已经比俄国政府富有11倍，拥有的生活资源也多11倍。从以上所述就可以清楚看到，由长满老茧的手实施的专政多么令人反感，但是俄国的政权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这是事实，应当容忍。布尔什维克想要进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试验，这种试验将花费昂贵的代价。不过，鞑鞑压迫的代价更加昂贵；但是，只有经历鞑鞑的教训，俄罗斯人才形成一个国家民族。民族的暂时衰落却从这个教训中得到充分的补偿。而布尔什维主义所醉心的事业能使俄罗斯民族变得和美国人一样强大。布尔什维克对贸易和工业中个人首创精神的镇压、工业和整个生活的官僚化，将造就一个具有首创精神的，拥有无限自由的民族。布尔什维克将医治好俄罗斯人的民族劣根性——无忧无虑，以及随之而来的挥霍浪费。为此值得付出代价。因此我欢迎这一试验，不管它的后果对于当前这一代人有多么惨重。

但是，试验应当从两个方面诚实地进行到底。只有真诚地进行试验才能使它可信而有益。这就要求：（1）不是因恐惧而工作，而是为良心而工作；（2）对于自己试验的结果进行诚实的评价，有勇

气看到自己的缺点，而不是透过于人。

那么，我们是否看到在当前条件下真诚地进行试验呢？没有！有这样一批道德败坏的人，他找到一种办法向原工业企业主敲诈钱财，这就是让这些人犯错误，说他们为布尔什维克服务，却从事暗害活动。人人都清楚，这只不过是一种骗取别人钱财的不正当方法而已。真正的破坏活动只不过是神话，而实际存在的只是一种诈骗方法。布尔什维克对待这种情况采取什么态度呢？若无其事？把这看作是简单的诈骗手段？没有。他们夸大沙赫特事件，把它说成是有摧毁整个工业的危险，怀疑所有知识分子，逮捕了许多工程师，制造了大批案件。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布尔什维克如此惊恐不安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1. 布尔什维克害怕背叛，于是真的惊慌失措，开始做蠢事，不过我坚决反对这种说法。

2. 在工业战线上布尔什维克遭到第一个，也是肯定无疑的一个失败，但是他们不承认这是他们采用的工业管理体制的失败。他们还没勇气承认这一点，于是他们抓住沙赫特事件不放，以便有可能为自己的失误开脱罪责。

面对物价上涨、劳动生产率徘徊不前，民族并没有富起来，甚至连粮食也没有了，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过错，布尔什维克就开始为自己的失败寻找替罪羊，抓住一伙小骗子的勾当来为自己辩解。

他们宣布所有知识分子进行破坏是造成工业战线失败的罪魁祸首。虽然正式否认了这种说法，但事实上却是另一回事。这种透过于人的做法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是不难预测的。它将造成工业彻底完蛋，造成其后果无法估计的灾难。这不难证明。既然专家的任何活动都要从检察官的角度加以审查，既然所有的技术专家都处于被怀疑之中，那么行政管理机器的瘫痪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确实如此，假如我们研究某一件事，它可能有两种解决方法：采用第一

种方法，我们有可能获得好处，但也要冒受到一定损失的风险；采取第二种方法，我们可能取得另一些好处和可能损失另一些利益。经过思考和盘算，我们决定采取其中的一种方法，结果运气不好，我们失败了。这项决定造成了损失。“您知道您的决定会造成损失？”“知道。”“最后还是采取了这个决定？”“是的。”“您是破坏分子。我们会收拾您的。”失败了，对于检察官来说，这样的结论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您采取哪一种决定，不冒险工业就不可能存在。这样，专家还能干什么呢？最好，为了个人安全，什么决定也不作，不给政府机关发任何明确的规定，不进行坚强的领导。要写，就写一些官样文章，然后组建委员会，调查、讨论，总之保证自己不承担任何责任。结果则是：工业瘫痪，甚至造成饥荒。

我很清楚我们正在向哪里去，我又该怎么办呢？我是一个诚实的人。写出来，说出来，没法出版？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出版自由……只好沉默不语，装出像在服务的样子……我们，要知道，是小人物……只有等待不可避免的灾难到来。

布尔什维克粉碎了资本主义，消灭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人们这个阶级。在沙皇制度下，拥有土地的贵族、商人和工业家，是所谓自由职业者，他们是完全自由和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他们敢于拥有自己对事物的评价，于是就存在独立的社会舆论，而沙皇政府也能够倾听。现在俄国已经没有独立的人了。所有知识分子被变成为第20等的人，饥饿迫使他们成为驯服的奴隶。所以大家都沉默不语……

从我自己来说，作为黑色金属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既然深信这个机构只有在得到政府机关充分信任才能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相反地，如果把不信任变成一条原则就不可能有效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沉默不语，并且继续担任黑色金属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这难道是诚实的吗？

当我知道我的工作人员没有坚持自己的言论、思想、建议的可能性，为了谨慎安全起见不得不发表模棱两可的说法，并且一天到晚想的是千万不要让检察机关指控自己在搞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我能领导这个机构吗？

十分清楚，一个真诚而独立的人是不应当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的。既然他相信，如果得不到信任，这个机构的任何健康的活动都是不可能进行的，那他就应当辞去自己的职务。

这就是我辞职的理由。我将继续在冶金工业技术委员会技术局工作，在那里人们把定单交给我，这说明客户是相信我的。我将做必要的和有益的事，这样，面对把负责工作交付给我的政权，我将不感到自己负有罪责。

矿业工程师 格鲁姆-格尔日迈洛

1928年9月23日

№03329

亚戈达就斯拉晓夫^① 将军被暗杀案

致联共（布）中央斯大林

（不晚于 1929 年 6 月 25 日）

1929 年 1 月 11 日，原白军将军雅·亚·斯拉晓夫（从国外归来，获苏联政府赦免，死前为高级步兵学校在编教员）在其住所（高级步兵学校大楼内）被人用“巴拉贝伦”式手枪连打数枪致死。

暗杀雅·亚·斯拉晓夫系公民拉扎尔·利沃维奇·科连贝格所为。此人 24 岁，尼古拉耶夫市人，非党员，红军预备役指挥员。

据拉·利·科连贝格解释，暗杀雅·亚·斯拉晓夫的动机是，1918 年白军在尼古拉耶夫市（根据雅·亚·斯拉晓夫的命令）枪杀了拉·利·科连贝格的哥哥——在尼古拉耶夫市从事地下活动的格里戈里·利沃维奇·科连贝格。

据侦查材料获知，拉·利·科连贝格的哥哥，格里戈里（格尔什）·科连贝格系共青团员，在尼古拉耶夫市原科甘鞋厂任职员，确实列在 1918 年 11 月 20 日被原斯拉晓夫将军枪杀者名单之内。

对拉·利·科连贝格进行的精神病鉴定查明，此人患有严重精神失常，因而对其所犯罪行为应认为属于无责任能力行为。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认为拉·利·科连贝格一案应停止侦讯，并

^① 斯拉晓夫，雅·亚·（1885～1929）——俄将军，毕业于参谋学院。国内战争期间率领白卫志原军的师团。1919 年 12 月起领导克里木的防务。1920 年因反对弗兰格尔而被解职。1921 年秋经苏维埃政府批准和一批军官返回苏俄，在军事学校任教，1929 年遭暗杀。

将其释放。

附：鉴定书副本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 亨·亚戈达

附件：

专家委员会鉴定书
(1929年4月29日)

副本

我们，文末签字人员，于1929年4月29日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任侦查员的建议对公民拉扎尔·利沃维奇·科连贝格（25岁），进行了检查，发现目前他表现出性格畸形（精神变态）的特点，可能出现固执、任性、自我中心、对某种对他有决定性的印象长久滞留、特别眷恋家庭（表现为社会好感仅限于家庭关系）。此外，被检查人智力生活存在某种贫乏和受限制的现象。像科连贝格这样的人，某种外界的印象可能得到决定性的发展，并充斥整个个体，使之完全屈从于这种互不联贯的思想。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发生了指控科连贝格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应当视之为病态行为。因此，公民科连贝格应当视作为对所作行为无责任能力者。

鉴定委员会成员：甘努什金教授、吉里亚罗夫斯基教授、克拉斯努什金教授、切利佐夫医生、弗奴科夫医生。

经查核签名与原文无误。（签名无法辨认）

№03360

**亚诺夫斯基就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①
死亡情况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

(不早于 1935 年 11 月 22 日)

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

对贵院 1935 年 11 月 22 日第 445/C 号来信^②，兹说明如下：关于枪决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的材料可以在基辅十月革命史与党史研究委员会获得。如果这个机构已不存在，那么当时在佩利亚斯拉夫利并参与此事的一些党员也能证实此事。他们是：米哈伊洛·米哈伊洛维奇·别兹佩奇内同志，在基辅工作；伊萨克·卡涅夫斯基同志、雅科夫·布拉斯拉夫斯基同志、彼得罗·格罗巴同志，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基辅州分局工作。

枪决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的情况如下：

佩列亚斯拉夫利的修道院有一幅圣母像，每年 5 月 2 日送往 3 公里外的一个村子，5 月 9 日送还。

当 5 月 9 日一些狂喊大叫的女人们等待圣像送还时，那里自然挤满了许多人。但是，根据佩列亚斯拉夫利县革命委员会的决议，恰好

① 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格·斯·（1877～1919）——律师助理，初为无党派人士，1906～1909 年加入孟什维克。1905 年任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1906 年被流放。1909 年脱党。十月革命后支持盖特曼斯柯罗帕茨基和佩特留拉。

② 1935 年 11 月 9 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收到亚诺夫斯基来信，信中指出《列宁全集》第 12 卷所写赫鲁斯塔廖夫的死亡日期不确（1918 年）。1935 年 11 月 22 日研究院给亚诺夫斯基发去下列内容的信：“请告知，从何机关可以得到关于枪毙赫鲁斯塔廖夫的正式资料。如果这一文件没有保存下来，那么请告知还有谁能够证实您所说的日期。此外，请告知您所知道的枪决赫鲁斯塔廖夫的情况。”

有一个为医院选择用房的委员会来到这座修道院。参加委员会的有一些俄国人和一名犹太医生舍夫杰利。僧侣们散布谣言说“一批犹太佬共产党人来抢修道院的钥匙。”这得到一名姓沃尔科夫的医助随声附和（他是现在一名党员沃尔科夫的父亲，名字不知道，因为他不在佩列亚斯拉夫利住，本人是医生，曾在基辅市任边疆区卫生局局长）。

这个沃尔科夫开始鼓动人们屠杀犹太人，并率领人群前去那个大部分居民是犹太人的城堡。这时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就出现了，他出面领导了这件事。当红军战士们到来时，他就开始鼓动说，你们听命于“犹太佬共产党员，他们骑在你们脖子上”，等等。不过，我们党组织还是制止住了这次屠杀。还在此之前，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进行过地下活动，组织各村庄的富农反对贫农委员会，捣毁贫农委员会、杀人。在这以后，他更加猖狂地把所有的落后分子拉拢在自己的周围。他的弟弟也从白军来到这里，开始从事反革命活动。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肆无忌惮地反对苏维埃政权和党。党的委员会决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伙敌人，由伊万·伊万诺维奇·克拉多任担任主席的革命委员会也通过了同样的决定。沃尔科夫、赫鲁斯塔廖夫的弟弟、白军军官叶夫盖尼·诺萨尔是我亲自枪决的，并丢入第聂伯河。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是在佩列亚斯拉夫利市内，西蒙诺夫的房子，由切尔尼戈夫人组成的那个支队枪决的，支队指挥员的姓名我不记得了。不过，米·米·别兹佩奇内同志知道。但是，是由我、伊萨克·卡涅夫斯基、彼得罗·格罗巴运送到第聂伯河的。这就是枪决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的全部细节。

1918年入党的党员（党证号码：0685454）

A.B. 亚诺夫斯基

奥德萨州，瓦尔基诺邮政支局，齐布列沃镇，“社会改造者”
国营养猪场政治处。

【专题说明】

布尔采夫通信选

(1919年9月至1938年2月)

布尔采夫，弗拉基米尔·李沃维奇（1862—1942）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参加19世纪80年代的革命运动。1885年被捕，从流放地逃往国外。布尔采夫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他认为，在俄国的条件下，要获取政治自由就得搞个人恐怖，他因宣传恐怖活动而被英国判处18个月苦役，被法国和瑞士驱逐出境。在流亡期间曾出版报纸《自由俄国报》、《共同事业报》、《未来报》；创办杂志《民意党人》和《往事》。还出版过几本政论性的文集，如《打倒沙皇！》（伦敦，1901年），《拿起武器！》（伦敦，1903年），《“民意”万岁！》（巴黎，1907年），号召复兴民意党运动。布尔采夫在革命运动史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撰写了俄国革命运动史方面的宏篇巨著《百年间》（伦敦，1897年）；是俄国第一份革命史杂志《往事》的创始人。布尔采夫揭露了革命运动中的“大奸细”叶·阿捷夫，继而又揭露出不同党派内的一批奸细——茹琴科、日托米尔斯基、卡普林斯基等人，因此名满欧洲。他甚至在巴黎创建了独特的革命侦探所。布尔采夫欢迎二月革命。七月事件之后，又成为反布尔什维克运动的急先锋之一。他在《共同事业报》上，公布了取道德国回俄的159名侨民的名单。但他关于布尔什维克与德国统帅部有联系的论断，纯属逻

辑推理，缺乏事实根据。1917年10月25日，在布尔什维克武装起义的当天，布尔采夫出版了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我们的共同事业》报，反对十月革命，他撰写的社论头一句话就是：“公民们，救救俄国……”报纸被托洛茨基下令没收，而布尔采夫则于当日被捕，成为新政权逮捕的第一个“政治犯”。1918年2月，布尔采夫获释，逃到芬兰，后来定居巴黎，重新出版《共同事业报》。要求同盟国尽快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1920至1930年间，布尔采夫致力于联合反苏侨民。

30年代，布尔采夫对反犹主义发起了进攻。他作为证人出席了1933年至1935年的伯尔尼审判，法庭证明臭名远扬的“锡安哲人记录”是伪造的，是在沙皇“暗探局”里编造出来而后来又为希特勒党徒利用的。和布尔采夫一起充当控方证人的还有帕·尼·米留可夫、波·伊·尼古拉耶夫斯基等。1938年，布尔采夫在巴黎出版了《“锡安哲人记录”——被证实了的伪作》一书，该书有一个明确无误的副标题《拉奇科夫斯基伪造了“锡安哲人记录”，希特勒使其名闻世界》。为此布尔采夫成了纳粹国内宣传机关迫害的对象。1942年布尔采夫因血毒症死于巴黎贫民医院。

本专题选收的是1919年至1938年布尔采夫同不同人之间的通信。

(本专题文件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李树柏翻译)

№03117

安德列也夫^① 致布尔采夫

(1919年9月9日)

[内沃拉], 1919年9月9日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弗拉基米尔·李沃维奇！

我去了赫尔辛基，在那儿见到了您的信使，见到许多人物和角色，谈了许多，听的更多。我的希望实现了：在赫尔辛基，一般说在这里没有我的工作。在信里，我不想谈什么是西北新政府^②，但我对它的态度是完全否定的。其在外部的粗暴压力下产生的历史本身，擅自（违背高尔察克的声明）承认爱沙尼亚独立，^③最后，有诸如尼·伊万诺夫这种不光彩的人在内的平庸无奇的人员构成，^④这一切会给未来造成很大危险。我还是不能决定，是否详谈和发挥我的思想，但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和他们一起工作，即使他们有工作能力。不过，这一点眼下还看不出来。顺便说说，他们提议让约·盖森^⑤任宣传部长，但他拒绝了；赫尔辛基人都有点怕我，大概

① 安德列也夫，列·尼·（1871～1919）——俄国著名作家，著有《关于七个绞刑犯的故事》、《我们生活的日子》等。十月革命后移居国外。

② 西北政府是尤登尼奇于1919年8月11日在雷瓦尔（今塔林）建立的政府，于同年12月垮台。

③ 西北政府在“初步宣言”中承认了爱沙尼亚独立。

④ 西北政府里有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内地形形色色的党派参加。尼·尼·伊万诺夫革命前是彼得堡的律师，传言同拉斯普京有关系。在国外创建“人民实践党”，被选为驻雷瓦尔的领事。认为必须立即承认爱沙尼亚独立。

⑤ 盖森，约·弗·（1865～1943）——革命前是国家杜马代表，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

像许多人既和您友好又怕您一样——怕您的直率和卓越。当我读您气势恢宏、一针见血、直言不讳地揭露同盟国的文章时，我边笑边想，有多少胆小鬼在心惊肉跳地读这些字句，在窃窃私语，议论桀骜不驯的布尔采夫的胆气！协约国在供养我们。协约国也许在什么时候会来帮助我们，可他却对可敬的协约国说这些，甚至提要求！^①最令人痛心的是，我看到和感觉到，许多人，甚至一些正人君子，都奴颜婢膝，一付摇尾乞怜的样子。

我想到，在我们与协约国的友谊葬身之地，将建起一座雄伟的陵墓。我真想把大天使们痛哭流涕的无望祈祷，献给陵墓的一些石头，以使英国军队别叫他们死亡和牺牲，而是领走英军。假如不是邮局出错，我恐怕早把有关这一切的文章，登在《共同事业报》上了；像不久前一样的意外事故很少发生，都是突然出现的。从这儿写东西发出去，根本不可能。

所以我最后决定漂泊到美国去，^②我正在四处寄信拍电报，查询。目前尚无回音，但我会满怀期望地等待。伦敦的尼·康·列里赫给我写信谈到某种工作；这位奇才是我的执友，但我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在去美国的路上，我无论如何要在伦敦逗留几天，如果可能（签证）我将去巴黎，纯粹是为了与您晤谈和协调行动。

对您，亲爱的朋友，我想说的话太多，但五花八门的检查使我苦恼不堪。因为不知道能写些什么，我感到十分困惑。所以我急不可耐地等候好歹可以自由交谈的时刻，而旁边没有片刻不离的监视。我想，现在这个时刻不会叫我们等待太久了。顺便说说，对迅速拿下圣彼得堡，我不抱希望。当然，可能有完全出乎意料的偶然

^① 如同安德列也夫，布尔采夫号召同盟国对俄国进行新武装干涉，指责它们太消极。

^② 安德列也夫打算去美国游说，要美国更积极地干预俄国事务。

情况，但又怎么能指望偶然性呢？当然，布尔什维主义是两个头的小牛，是个丑八怪，怪胎，它非死不可，但是什么时候？人，尤其是俄国人，其适应能力特别强；他的皮伸缩性极大；如今布尔什维克扒下这张皮绷鼓面，擂鼓召人，召一些笨蛋来，但这鼓什么时候才会破呀？

一旦布尔什维克下台，俄国将会是什么样子？想一想叫人害怕。最使我害怕的是人口大量减少。一方面，为保全自己，布尔什维主义会吞噬掉工人和民主势力中最优秀、最有力、最具天赋的那些人，致使他们在数不尽的战线上，在无休止的撕拼和屠杀中率先牺牲，过去和未来都是如此。反之，最怯懦的、低劣的和丑恶的，则留在他们那个后方，滋生繁衍，住在地球上——他们摧残、掠夺并厚颜无耻地彻底毁掉生命。另一方面，它贪婪地吞噬掉大量有教养的人，从肉体上清除他们，又用其整套收买和笼络的办法从道德上消灭他们。就这个意义讲，长着狐狸尾巴的卢那察尔斯基在这群凶残的魔鬼中，是最可怕的和最坏的。他是个胆小鬼和有洁癖的人，他想保持体面的样子，尽可能地迷惑人们，因为他知道，每一个新“名字”，每一个教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或者只是一个正派人，都能相应地减轻他个人的责任。如果说许多人甚至称赞尼禄热爱艺术，那么他卢那察尔斯基怎么能不为艺术家和导演们创造一个“黄金时代”和天堂；与黑暗地狱形成如此鲜明对比的这个天堂，将赋予卢那察尔斯基一派绅士风度。他大概自以为是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因为他只是一个卑俗的和智力有限的人。（您知道，他们也试探过我吗？提议以优厚条件出版我的全集，并且断言“那里什么都有”，我没有理由拒绝。^①）

^① 季·伊·格尔热宾和阿·尼·吉洪诺夫代表高尔基找安德列也夫，提出以200万卢布购买他的文集出版。

在俄国，知识分子、有教养的人，少得可怜——现在他们还剩多少啦？想一想确实可怕。别忘了那些数不胜数的被枪杀的军官、中学女校长、神父、某些议员、地方自治会工作人员、教授和其他天晓得怎么称呼的人。每个有文化的人都像一棵树，成长起来需要一定时间；把我的别墅烧了，我一年就能盖一座新的，烧死旁边的一棵桦树，再等它长这么大得二十五年！如果想想，每个有文化的人值多少钱（就其直接意义讲），那么俄国杀掉这些人所损失的资本就太大了！

谁是这场“淘汰性”屠杀的胜者？是广义的黑帮。有贪婪残暴的人、卑躬屈节者、吃人者和小爬虫。我想，这可以部分说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寿命”何以如此奇怪的长久。对这种人口减少，我们会看到什么反应？反应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消除的，因为这种反应将具有近乎生物学的论据——民族退化。大家都在谈论立宪会议，但现在谁来召集？会议反映谁的意愿？欧洲人这样无休止地延长这场斗争，到底打算干什么？欧洲社会主义者是否发现，死亡比率最大的是民主派，而比率最小，微不足道的是大小资产阶级。有储备的资本家、饿不着的人和对直接斗争袖手旁观的人？他们是否明白，让俄国承受这种可怕的反应，他们自己也将成为这种反应的牺牲品？与其让高尔察克向立宪会议宣誓，莫如保住一个有教养的俄国人的性命！

好啦，啰嗦够了。热烈地吻您和握手！赴美期间将写信给您。顺便告诉您，我的新地址是：木斯塔米亚基，法尔科夫斯基别墅。这儿离边境地带太近，生活艰难：飞机丢炸弹，还有战争带来的其他不便。《共同事业报》寄到哪儿都能引起极大的共鸣。

您的列昂尼德·安德列也夫

方才收到您的电报。您瞧，美国！我试着在这几天为《共同事

业报》写篇短文，但不知能否写成。我不会写小东西。写罢此信，夜里飞机来了，感觉十分强烈。在瓦梅尔斯，离我家近在咫尺，丢下三颗炸弹。

№03118

邓尼金^① 致布尔采夫

(1920年5月12日)

最近几天，巴黎和伦敦的报纸，特别是后者，大肆颂扬波兰：人为煽起的仇俄情绪，这被认为是合理的；波兰是自己(?)摆脱俄国压制的“高贵的”国家；波兰从俄国夺回的是“理应”属于它的东西；如此等等。法国报纸往往以同情的态度，把波兰人今天的进攻，看成是摆脱布尔什维克压制下解放出来的行动……

我认为，“解放委员会”和《共同事业报》应发起解释波兰政策的运动。

基本论点

1. 俄国政府自愿赐予波兰以自由。

2. 波兰在重犯我们的历史错误，而且错误程度更加严重：在被占领的俄国土地上实行波兰化，疯狂迫害东正教。在详述华沙城堡的历史时（第十室），只字不提克里姆林宫和格尔莫根大牧首。^②

3. 波兰报纸极力散布厚颜无耻的观点：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西方，东方腐化了，在最好的情况下过几年将变成许多软弱的相互

① 邓尼金，安·伊·（1872～1947）——沙俄将军。1918年起先后任白卫“志愿军”司令，“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后流亡国外。

② 华沙城堡第十室在专制时代曾关押政治犯，其中包括死刑犯。格尔莫根是1606～1612年俄东正教大牧首。在波兰占领莫斯科期间持爱国立场，占领者把他关押在狱中饿死。

攻击的小国，因此现在就应当在东方解决自己的“历史任务”……

4. 波兰政府不愿和南俄武装力量共同进行解放战争。谈判拖延了好几个月。战略分界线被他们拒绝了。随着我们占领基辅，进攻立即停止了，而在南俄军队失败（暂时的）后，进攻又马上恢复了。

5. 波兰人现在进攻，其意图昭然若揭：不是和布尔什维克斗争，而是乘俄国人民暂时无力之机，占领和夺取俄国土地。

6. 从与彼得留拉签订的条约看，这是在完全重复德国肢解俄国的政策。

7. 结果：

(1) 让布尔什维主义死而复活（布鲁西洛夫等人的信）。^①

(2) 掠夺俄国。

(3) 甚至在对波兰人有好感的人中都会激起对他们的敌意。某些盟国显然一点也不反对这样做。

(4) 俄国倾向于和德国人结盟。

8. 波兰必须走上正确道路——不是占领俄国，而是和俄国反布尔什维克力量一道解放俄国。这不是效劳，而是自保。现在决不会解决领土和边界问题。

否则，波兰最近几年就将彻底崩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将永远灭亡。

^① 阿·阿·布鲁西洛夫写给全俄总参谋部参谋长尼·约·拉泰尔的信，建议在参谋部召开有“战斗和生活经验”的人会议，以“讨论军队的供应问题”。关于召开有布鲁西洛夫主持的特别会议的命令在1920年5月5日的《真理报》上公布。

№03119

布宁^① 致布尔采夫

(1921年9月30日)

巴黎，1921年9月17(30)日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李沃维奇：

4日我去您那儿，但您正和什么人忙着，我把想对您说的话转告了B. B. 托波罗夫^②。事情是这样的，我非常需要钱，所以请您尽快付给我您应付的钱，即使是一小部分，即使是每月200或每月100法郎。在任何一份报纸不仅每月，而且每天都有大量周转金的情况下，这点钱根本不算什么——每天才约合3法郎。但是不管怎样，报纸终归要办下去，终归有人给别的撰稿人付钱，甚至给不靠薪金生活的人，例如亚布洛诺夫斯基^③、库普林^④。可我为什么这么不招人喜欢，甚至不给我刊登关于我的书的书讯，我请求刊载书讯，从欠我的账里扣钱。只登了一次就完了。与此同时，报纸整年，乃至每天，都要登载大量免费的书讯，甚至给和报纸毫无干系的人登。

希望您记住我的请求。

致崇高的敬意！

伊·布宁

① 布宁，伊·阿·(1870—1953)——俄作家，1920年侨居国外，1933年获诺贝尔奖金。

② 托波罗夫，B.B.——革命前是《言语报》通讯员，《共同事业报》撰稿人。

③ 亚布洛诺夫斯基，亚·亚·(1870—1934)——批评家、小品文作家，在侨民作家中有“玩笑之王”的称号。

④ 库普林，亚·伊·(1870—1938)——俄作家。1917年移居国外，1937年回国。

№03120

弗兰格尔致布尔采夫

(1922年6月27日)

卡尔洛维察，1922年6月27日

最尊敬的弗拉基米尔·李沃维奇：

今天在贝尔格莱德收到第565期《共同事业报》，读过之后，我迫不及待地向您表示衷心感谢，感谢您给予军队的道义支持和坚定不移地捍卫它的利益。

《共同事业报》始终忠于它的战斗口号，一如既往地充当反布尔什维主义报刊的勇敢先锋。

它一直勇敢地大声揭露布尔什维克及其同伙，号召广大侨胞在与祖国敌人的共同斗争中团结起来。

可是，我也不能不谈谈您的社论《大家都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引起的几点疑虑。

在号召大家起来与布尔什维克斗争时，您写道：“我们需要一个从左翼民主派到民族委员会的反布尔什维主义阵线。”

这样，您就抛开了保皇党，然而他们尽管政治思想体系与上述集团不同，但却无疑是反布尔什维克人士。

您建议成立的统一战线既然不包括国外的所有反布尔什维主义势力，自然就会产生与之并列的从民族委员会到右翼保皇党的另一条反布尔什维克战线。

结果将不是期望的联合，而是与事业有害的分裂。

我想，我们应当全力实现真正的普遍团结，而这并不是毫无希

望的。

今天在君士坦丁堡、贝尔格莱德和芬兰存在的联合，就是个例子。

我想，巴黎最终也会这样做。

俄国报刊杂志和俄国舆论的一致抗议，终于唤醒了至今一直顽固地保持缄默的保加利亚政府，使之做出正式解释。

6月21日的一期《时报》发表了保加利亚通讯社的正式通告《弗兰格尔军队问题》，从头至尾满篇都是别有用心的谎言。

必须进行有力的驳斥，要求提供证据，进行全面调查。我在致部长会议主席的信中提出过，许多俄国社会组织和部分俄国报刊也一再要求调查，但眼下毫无成效。

请您相信我的真挚敬意和忠诚！

[签名]

№03121

邓尼金致布尔采夫

(1925年12月11日)

布鲁塞尔，1925年，12月11日

最尊敬的弗拉基米尔·李沃维奇！

一月份，我按您指定的地址，转寄了报纸。

关于俄国境外知识分子间的意见纷争，一向如此，大概今后仍将如此。这个问题我知之甚详：在一年半的当政期间，我看到许多在“现实民族政策”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尝试，但都功败垂成。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我们还不成熟，要么时候还没到。

假如命运能使我们相遇，我很高兴和您会面和交谈。只是我很少动地方。

尊敬您的安·邓尼金

No03122

库斯柯娃^① 致布尔采夫

(1936年9月29日)

布拉格，1936年，9月29日

亲爱的凶神，弗拉基米尔·李沃维奇！

我也想和您大吵一架（因为：“我是个革命者……”）。但同时也一块儿回忆一下（不骂人，而是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往事……怀旧……回忆您，回忆我亲爱的瓦西里·雅可夫〔列维奇〕^②……还有那些时期，那些直接地，一点弯儿不拐地导致布尔什维主义的时期。不，亲爱的凶神，民族委员会里没有我和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③的立足之地。您想知道事情的隐秘（仅指我们的原因）方面吗？似乎只有您这位研究俄国革命的人，才应当和能够了解这一点。这方面的情况是这样的。很小的时候，他和我（十四岁，在萨拉托夫）就进入了左翼革命小组。从那时起，开始与他们，与革命者斗争，在他们的巢穴里。我不知道，是谁给我和谢

① 库斯柯娃-普罗柯波维奇，叶·德·（1869~1958）——俄经济主义思想家，《信条》的作者。1905年革命前夕参加解放社。1906年同谢·尼·普罗柯波维奇一起出版《无题》周刊。十月革命后反对布尔什维克。1922年，因全俄饥荒救济委员会案被捕，与她丈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一起被判枪决，后改判为驱逐出境。

② 雅柯夫列夫-鲍古查尔斯基，瓦·雅·（1861~1915）——革命运动历史学家、政论家，1906~1907年和布尔采夫一起编过《往事》杂志。

③ 普罗柯波维奇，谢·尼·（1871~1955）——叶·德·库斯柯娃的丈夫。俄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经济派代表人物。1917年任临时政府工商业部长和粮食部长。1922年被驱逐出境。

[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注入了内在文化。他有文化是可以理解的：他是一位非常聪明和很有文化的母亲的儿子。而我，我生来无依无靠，由于父母（父亲用枪自杀了）的家庭悲剧，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然而，我们俩都热爱文化，迷恋知识，喜欢纯正的认识，讲道德，醉心于今天看来是愚蠢的其他东西。于是，从我们自以为登上的文明之塔来看，革命的环境就是与我们俩深刻对立的了。造谣撒谎，挑拨离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偶尔（只是偶尔）有点勇敢精神。我们亲眼目睹了许多革命者，对他们有深刻透彻的了解。十分熟悉普列汉诺夫、切尔诺夫以及俄国两大派的其他栋梁之材。您读一读普列汉诺夫的书信……您就会明白，我们为什么像被烫着了似地从那儿跳开。但也没跳进另一派。在我看来，那边还要坏些。就这样找不到安身之所地生活到解放社成立。这里的环境不同：可以“从事革命事业”，不必担心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即不怕被“党专政”的任何污秽弄脏。这是我们政治生涯中惟一的一个亮点：您知道，我们竭尽全力地工作。与此同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我们清楚了解这个阶级，甚至其上层即立〔宪〕民〔主〕党的政治生活和心理状态。我们也了解俄国资产阶级。得出的结论是：这伙人在精神、目的和习惯上，与我们格格不入，他们不理解民主派的真正任务。由此得出另一个答案：尽管革命者们有许多消极方面，但这些人同我们亲近得多。如果俄国平民注定会提高，会把俄国引向民主，那么成就此事的非他们莫属。他们将穿过泥泞和鲜血。但要知道，地下革命者也穿过来了：命该如此。但我们始终是民主派，站在民主一边。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待白党运动的立场，决定了我们留在俄国，而决不低头，虽然我们每一分钟都有掉头的危险。关于他们的肮脏作为，我们毫不客气地告诉了明仁斯基、加米涅夫和当时的其他布尔什维克。1921年，当列宁想和老社会活动家举行宴会时，我们（作为合作社工作者）拒绝与他交谈。我们请

人（B.M. 斯维尔德洛夫还在世，通过他进行谈判）转告列宁：一旦我们摆脱嘴被封住的奴隶状态，不再感到自己是专政的囚徒，即一旦除了新经济政策之外也把自由还给俄国人民的时候，我们将共设庆宴。

关于这个可怕时期的事情，要讲的还很多。但没时间写回忆录。一句话，我们无法忍受这群侨民，除了其中的极少数，他们全都反动，都想复辟。例如彼·别·司徒卢威，过去曾是我们的朋友，现在打算与德国人和日本人去俄国。而我们则和俄国心心相连，为它而活，在那里寻求自我净化。因为我们深信，染上布尔什维主义传染病是民众自身，而不仅仅是他们的领袖。我们同样深信，人民将会自我净化，已经在净化，而且将做得更深刻、持久和可靠，而无需民〔族〕委〔员〕会的帮助，尤其不需要“民族法西斯主义”救主们的帮助。应当承认，“民族思想家”大都同情法西斯主义。我们和他们走的不是一条路。我们将和平民在一起，因为我们清楚了解他们的各种病根和令人讨厌的创伤。但还要同他们在一起。只要有一线光明，一点点在那里工作的可能性，我们的永久性工作——文化工作、国务活动、合作社工作的可能性，我们就会总在那里。我们并不幻想骑着白马到那里去。我们老了。可能死在这里，但始终不会诅咒革命：毕竟有“好人”（“我是革命者”），他们追求革命，向往革命，呼唤革命，期待革命。革命到来了——面目狰狞，但又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但我们将和革命为伴……我们自己为它出了不少力，不愿也不能与它断绝关系：我们一直处于地下状态，或围绕地下活动而工作，很了解这种工作，知道自己往哪儿走，也知道地下工作胜利并不会立即给俄国带来幸福。民众必须经历事物的全过程，经受专制政权的罪恶，走过这个地狱……通过经验认知一切，为新生活打扫干净。如果来自《我的奋斗》的坏蛋没有卡住初愈病人的脖子，我相信会有新生活的。如果卡住了，那我

们就像您曾经干过的那样干，而且不可能不这么干。

这就是对您的简短自白和对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汇报。请相信，我们对布尔什维克卑劣行径的仇恨并不比您少。但是……我不相信来自“民族联盟和民族委员会”的哭哭啼啼的洗衣妇能洗净这污秽：她们的手办不到。

就这些。我们和俄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那里还有一些人活着，他们会像我们一样坚信能够复活，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鳞片会脱落。

不久前听说，瓦西里·雅可夫列维奇的大批档案，让邦奇-布鲁耶维奇工作的革命博物馆“得到了”。我不认为这是留在埃米利亚·文采斯拉沃夫娜^①手里的档案（数量不大）。显然，这是瓦西里·雅可夫列维奇曾经转交给已故的斯列兹涅夫斯基^②的那些档案。您怎么看？埃米利亚·文采斯拉沃夫娜写了关于自己丈夫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今天未必能出版。她本人住在列宁格勒，工作很忙：给一些急着学语言的个人和工人班讲英语课。她非常满意这份工作。她靠精神支撑着，常去沃尔科沃公墓，她有一颗美好的童心——在那儿。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写了一部论述俄国经济并批判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巨著。45个印张。这本书本应由这里的斯拉夫学院出版。但不幸的是，现在还办不成此事。这个小国不愿和“伟大的俄国”发生争吵……法国人和英国人也愿意出版维伯夫妇的作品，而不愿出版批判性著作。

祝您健康，非常感谢您的来信和问候！

① 雅柯夫列娃-波柯尔尼，埃·文·——鲍古查尔斯基的遗孀。

② 斯列兹涅夫斯基，弗·伊·（1867~1936）——俄文学史家、传记作家，科学院通讯院士。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向您致良好祝愿。紧握您的手。

忠实于您的叶卡捷琳娜·普罗科波维奇

怎么可以这样盖邮戳，弄得看不清地址！！18 还是 13？只能猜着认。

№03123

布尔采夫致邓尼金

(1938年2月25日)

巴黎，1938年2月25日

最尊敬的安东·伊万诺维奇：

给您寄上我刚出版的关于“锡安人记录”的书^①。我知道，您希望反布尔什维克侨民出版其他题材的书。近几年，我几次准备就引人注目的现实问题出版足本的《共同事业报》和《Ла Коз Коммуна》^②，但一次也没能成功地把事情办成。最初几期没有出版。材料已然过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就现实题材出版点什么新尝试又开始了，但仍功败垂成。我又不能向右的或左的方面寻求妥协：脖子弯不过来。而关于所发生的可怕事件是有话可说的。现在我又要做新的尝试了。不知这次我能否如愿以偿。我们生活在荒唐时代。最光辉的思想被随手乱丢。面对岂有此理的事，只能缄口不语。不过，若是我能在近日出版几期，那么这将是炙手可热的几期。

至于说到俄国生活中的可怕问题（犹太人问题），即关于“纪录”的既可怕同时又十分愚蠢的问题，那么您可能不赞成我的观点，如果不是不赞成我得出的那些结论的话，也是不赞成我对这个问题过去和现在的意义的看法。

我坚信，不正确地提出的犹太人问题，给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解

^① 布尔采夫《锡安哲人记录——得到证实的伪作》，巴黎1938年版。

^② 《共同事业报》的法文版。

放运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愚蠢的“记录”虽然微不足道，但它在俄国，在我们与布尔什维克斗争的志愿军时期，在德国乃至在其他国家，都曾起过并且还在起着巨大作用。必须顽强地与之斗争。出版我的书的意义即在于此。我们首先必须摆脱为其承担的任何责任。谈及过去，必须讲真话，即讲明我们对“记录”的态度。而现在则应明确表明视其为犯罪行为。我深感遗憾，格洛巴切夫将军在说出尼古拉二世对《记录》的态度的真实情况后，又竭力否认自己的话。我能揭穿他的面目：他是伪作的掩护者之一。我乐于在我的书里引证以前关于和“记录”斗争所讲过的一切，我也乐于终止反犹主义者的荒唐行为。我们应当摆脱这些桎梏。布尔什维克正利用它们在俄国和境外与我们做斗争。

我很遗憾，我在我的书对反布尔什维主义者与反犹主义者及其“记录”的斗争的情况谈不出很多东西来。在我能到的每个地方都提出了这个请求。

目前我正准备将我论“记录”的书翻译成外文。在这些不同语言的版本中，我要把我收到的有价值的东西都补充进去。我首先向您提出请求，并通过您请求所有能帮忙的人，对我这部用各种外文出版的书进行充实。

我很高兴在和外国读者交谈之前，能先出版我这部书的俄文本。

感谢您在您最近就我对揭露国外奸细的态度的发言中所讲的那些亲切的话语。我可以跟您说说一件令人伤心的事实。自从最后一期《共同事业报》出版，自从我的小册子《请同格勃乌斗争！》出版，我再没遇到在此事上帮助过我（即使是金钱上的帮助）的任何人。顺便说说，必须用俄语和外语就这个问题敲响警钟。应当像《共同事业报》和《Ля Коз Коммуон》那样重视这个问题。

请看，法国在米勒一案上所发生的事情。凡是当局里该给的

人，我都给了出色的材料：关于直接参与绑架米勒的人的材料，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别列茨基、格·（此人在逃）、曾经安居在此地的柳巴斯基；还有关于充当布尔什维克的工具的人的材料，例如扎瓦德斯基及其组织、萨温（今天人们才告诉我，他逃到意大利去了）、拉林（原德罗兹多夫斯基分子，自愿回归者的头头）、比利时的格勃乌头子，同时也活动于巴黎俄国人中间的格里戈里耶夫，众所周知的作家克雷莫夫^①（他是靠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发财的百万富翁，与阿列克塞·托尔斯泰关系密切，曾经策划绑架库普林或把法国作家纪德诱骗到俄国去），等等。这些题目不仅需要发表，而且需要不断重申和大胆陈述。不仅应当让俄国人，而且应当让法国人乃至全世界，都听到我们愤怒的抗议。我找不到完成这项任务的人选，他们哪怕能在金钱上帮忙也好。为办成此事，我为出版自己的几本书而费尽心机所搞到的那点钱，当然就太少了。

需要有一个战斗的民族委员会，有权力的、强大的委员会，而不是我作为其副主席之一的那种委员会。

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委员会？

什么时候能为组织这样的委员会开个头？为使您了解我的想法，我再次把我的某些出版物寄给您。

政治形势很可怕。不过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与布尔什维克进行真正需要的斗争。

总之，需要的只是我们有同布尔什维克展开真正斗争的愿望。

^① 克雷莫夫，弗·皮·（1878～1968）——俄作家。同阿·托尔斯泰交好，写有关于托尔斯泰的回忆录。

【专题说明】

关于作家索洛古勃的问题

(1920年6月至1921年5月)

费奥多尔·库兹米奇·索洛古勃（捷捷尔尼科夫）（1863～1927），俄颓废派作家，其长篇小说《谄媚》描绘了俄外省市侩生活的图景。在第一次革命期间，其诗歌对工人起义表示了同情，在以后时期其创作显示了悲观主义。其妻阿安·尼·切博塔廖夫斯卡娅（1876～1921）是女作家，翻译家，写过剧本，出过杂志《作家日志》（1914）。十月革命后其生活日益艰辛，其妻患病，著作出版得很少，偶尔翻译所得，难以维持生活。为此，索洛古勃不得不向有关当局申请出国。1921年7月1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准许费·索洛古勃出国。”这就是说，其妻不能随同出国。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9月其妻投河自杀。妻死后，索洛古勃放弃出国，留在苏俄，甚至担任了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

（本专题文件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乌传袞翻译）

№03208

索洛古勃致列宁

(1920年6月5日)

1920年6月5日，彼得格勒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前几天我在莫斯科，听人说您曾在文学处^① 查问，为什么我领不到口粮。我为您的关怀深受感动，但我还是要告诉您，这一份口粮我至今尚未拿到。回到彼得堡以后，我尽力到处奔走打听，这里根本不知道我在莫斯科听说的关于指定给彼得格勒的那25份作家口粮的事。^② 在莫斯科时，我又一次申请让我和我的妻子出国3个月，哪怕去一下爱沙尼亚也好，因为我妻子和我的身体都衰弱不堪，还要安排一下我的著作事务。在这里3年来我什么也不能出版。国家出版社不选印我的一本书，尽管还在一年以前我妻子就向约诺夫^③ 同志指出过哪怕只出一本短篇小说《老屋》，托洛茨基同志曾评价该小说是近年来优秀的革命文艺作品；但约诺夫同志不赞赏它，不予采用。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弄蛇女巫》，尽管我在其中尽我之所能歌颂一名工厂女工，并表现剥削

① 指教育人民委员部文学处。

② 1919年12月20日在有列宁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索洛古勃出国的请求。出国的请求被否决，但政治局责成改善学者生活条件委员会把索洛古勃列入其拟议中的50名大诗人和文学家名单之中。

③ 约诺夫，伊·约·（1887～1942）——诗人，时任国家出版社彼得格勒分社社长。

者蛇窟的崩溃，可我奔忙了2年仍无法在这里印行^①，而与此同时国外却有出版商愿意出版这部小说和我的作品的译本，这样还能保证我过上小康的生活并从事我的本行专业——诗歌和文艺散文，既能发挥我的全部创作能力为人民服务，而且又不必费神于报酬菲薄的翻译工作。尽管我明确声称我不为自己的旅程请求花费人民的一戈比钱，而只寄希望于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但却不允许我出国，而这期间巴利蒙特^②和库谢维茨基^③都已拿到了出国护照。这就是说，当局对我的态度与对其他人不一样，虽然我从来没有从事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任何行动，而且我从来不曾参加任何政治党派，而只想从事自己的艺术活动，以及尽可能参加创造性的社会活动。

我作为诗人和小说家的劳动成果在这里得不到使用；我的健康，特别是我妻子的健康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而完全垮掉了；日用消费品价格日益上涨，我的收入无论如何望尘莫及；冬季将更加令人难耐，我不知能否经受得住。

因此，我恳切请求重新研究关于我和我妻子短期出国的事。

致以衷心的敬意！

费奥多尔·索洛古勃

信上有两批语：“送加米涅夫同志并转全体政治局委员，请发

① 索洛古勃的小说《弄蛇女巫》于1921年由国家出版社出单行本。

② 巴利蒙特，康·德·（1867～1942）——俄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于1920年6月出国。

③ 库谢维茨基，谢·亚·（1874～1951）——俄指挥家、低音提琴手。1920年起移居国外。

表意见。莉·福季耶娃^①”“送政治局委员。我不相信索洛古勃出国后不会向我们泼脏水。建议在这里给他一份口粮，去疗养院，出版《老屋》（这确实是好东西，非常好！）1920年6月21日，列·加米涅夫”

^① 福季耶娃，莉·（1881~1975）——1918年起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同时担任列宁秘书。

No03209

阿·尼·切博塔廖夫斯卡娅致

柯伦泰^①

(1921年4月22日)

[1921年]4月22日，彼得格勒

亲爱的亚历山大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我给您写信只是为了想把已经积累了很多的令人伤心的事向您诉一诉苦。首先是，当我们在莫斯科张罗时，这里把我们现在来看很大一批物品、衣服等盗窃一空，至今为止我们连被褥也要不回来，只好随便找点破烂的东西盖着睡觉。其次，在莫斯科终于奇迹般地给我们发了出国护照，但当我们一回到彼得格勒，又根据莫斯科外事委员会的命令（由特别处签署）要了回去（包括护照上已办的一切手续）。我们在这里已作了一些转让房屋等等方面的举措，这样，我们又一次坐在了“破烂的洗衣盆”旁边，处于一无所知和手足无措的状况，下一步怎么办？要知道，决不是开玩笑，简直无法生活下去，现在，从4月1日起取消了我们藉以为生的惟一的费多尔·库兹米奇的“作家口粮”，于是我们连一磅面包也领不到，更不要说别的什么了；我只能按师范学院的标准……领半俄磅面包。至今我们已经22天不得不买2000卢布一俄磅的面包，只好像乞丐一样吃饭，而且没有一

^① 柯伦泰，亚·米·（1872~1952）——苏联党政活动家，外交家和政论家。男女平等运动积极参加者。1919年在俄共中央女工和农妇工作部工作，1919年秋至1920年12月领导俄共中央妇女部，1921年6月当选共产国际国际妇女书记处副书记。

线希望，因为除了偶尔的几个晚上以外，没有任何收入。在莫斯科，费多尔·库兹米奇赚了6万卢布（讲了5次课，给的很少），3万卢布用于坐马车回来（有时每6俄里换乘一次），剩下的钱回来后买了一俄磅油！这是值得深思的一笔账。

我为什么要引用这些数字呢？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指责什么人，我是坦诚地向您，一位严肃的人，一位著作家谈话，您应当知道我们这类人现在处于多么可怜和愚蠢的境况之中——因为在没有种子的地方也不会有文艺。因此我们才请求在这困难的几个月里放我们出去，因为确实已再也没有力气了——无论是走路，还是“到处央求”，还是提重东西，都没有力气了。要知道，我们没有回避任何事情，整杯苦酒都是在这里喝干的。费多尔·库兹米奇的心绞痛经常发作，对他的年龄（58岁）来说这是很危险的。医生绝对禁止他走远路和负重，可是没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去央求人，而主要的是这倒霉的口粮一直毫无结果。莫非人民委员会真的要固执下去（或者这事又取决于谁？）非把我们留在这里不可；可是我们在这里对谁都没有用处，而且……对谁也没有危险，我们又算什么政治家，我们只是普通人，我们并不会对别人背后使坏，也不会抢别人的饭碗——而没有这一套现在无法生活。求求您，请问一问加拉汉^①，为什么他们又把我们的护照收了回去……

^① 加拉汉，列·米·（1889～1937）——1918～1920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1年为驻波兰全权代表。

№03210

索洛古勃致托洛茨基

(1921年4月25日)

1921年4月25日，彼得格勒

尊敬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再一次贸然给您写信，并且违心地用枯燥的数字打搅您，但这却能形象地用事实表现文学家的境况。在莫斯科期间，我通过在新闻之家作报告等等在6周之内赚得6万卢布，这笔钱一半用于坐马车回来的费用，剩下的回来以后买了1磅又1/4的油，因为住宅被盗窃一空，食品和衣服已荡然无存。目前，自4月1日起，我不知为什么又失去了我惟一的一份口粮（作家口粮），同时连最低等居民起码的面包份额也领不到了。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夫娜也失去了她那一份微薄的寄宿学校口粮，于是我们只好去买2000卢布一俄磅的面包，但却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只能有时变卖物品，有时偶然作报告度日。我的健康完全崩溃了，心绞痛不时发作，医生禁止我走远路和负重，但是又不得不时常这样做。

鉴于有可能做生意，我们出现了一种念头：开一家小书店和出版社，但为此也需要力气，要先把病看一看。

Г. Л. 洛津斯基^①教授也同样处于这种完全无法忍受的状况之中。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为他向卢那察尔斯基、波克罗夫斯基以及

^① 原文如此。看来是指米·列·洛津斯基（1886～1955）——俄苏诗人，翻译家。当时在彼得格勒“世界文学”出版社工作。

谢马什科^① 提出请求，因为他本人患有肺结核，用拐杖走路，不可能亲自去莫斯科申诉。他是一位语文学家，请求准许去法国工作和治疗，如果去法国不可能，他也可以为此到意大利去。我还应当补充一点：国外人们知道他，他曾在那里学习过，人们也重视他，对他抱有很大期望，万一他在这里毫无意义地死去，必然会为人们所注意。

苏维埃共和国有什么理由不放我们和他出国呢？我们是绝对忠顺的公民，公开要求有可能短期出国，目的恰恰是回来以后继续在这里从事自己的专业活动——而这类专业活动又是任何别人，我想，所无法提供的。同样完全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2月2日发给我们出国护照以后，又在2月22日不作任何解释地将它们收回？我不知道，还需要用什么样的话，才能使人们相信：我们想出国只是为了安排著作事务和治疗，而不抱有任何政治目的。为了公正起见，我还要补充说明：我们根本不曾想过要把我们的贫困说成是布尔什维克“蓄意制造的”。我们也曾看到一些把自己算成“街垒那边的人”的许多卑鄙勾当，但您会同意，总不能老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诸如失去惟一的口粮、衣物被洗劫一空等等都去找政府，正是这种情况迫使我们认真寻找一种处境，以免遭受一些偶然人员（并且根本不是共产党员）的随心所欲。在国外，我可以出版和再版我的一些书籍，买一些新书，回来后从事独立的书籍和出版事业。对于这样的打算，苏维埃俄国有什么可反对的呢？我们坚信，只有您，具有干练求实精神和国家一级的气魄，才能够帮助我们，如果您愿意的话。

近日流传一个风声说您将来这里，我想，这会及时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有益的一步。

^① 谢马什科，尼·亚·（1874～1949）——1918年起任俄联邦卫生人民委员。

我本想去莫斯科亲自作一些说明，但是又为栖止何处而有些为难，恳求您听听我的要求，并使我有可能在将来以自己的劳动为生。

致以敬意！

费奥多尔·索洛古勃

№03211

柯伦泰致卢那察尔斯基

(1921年4月22日~5月10日之间)

莫斯科

亲爱的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

给您寄去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夫娜·索洛古勃的信，该给他们做点什么吧，不让他们出国，他们会饿死的。

致以衷心的共产主义敬礼！

亚·柯伦泰

№03212

卢那察尔斯基致俄共（布）中央

（1921年5月10日）

1921年5月10日，莫斯科

第5011号

致俄共中央组织局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次又一次提出过有关作家费·索洛古勃和他妻子出国的问题。各种官方人士，其中也包括托洛茨基同志，曾征询过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我曾明确地表示，索洛古勃的政治情绪对我们是否定的，他在国外毫无疑问对我们是有害的。

与此同时，我又说过，我可没有任何款项可以供索洛古勃和他的一家人能够获得令人满意的生活条件。像亚历山大·布洛克^①这样的人，他完全靠向我们，而且无疑比索洛古勃更加珍贵，也因吃不饱而患败血病。像列米佐夫^②这样的人，尽管富于荒诞的幻想，但也靠近我们（接近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③一派），因患多种疾病生命垂危。这一份名单，如果加上一些最可贵的青年无产阶级作家，还可以扩大。科研人员口粮不足，分发又很混乱；稿费的支付也一再拖延；因此我不怀疑，尽管高尔基同志按照我的请求给了索洛古勃各种预付款，安排工作等等，但他看来确实非常贫困。指出

① 布洛克，亚·亚·（1880～1921）——俄象征派诗人。

② 列米佐夫，阿·米·（1877～1957）——俄作家。1921年移居国外。

③ 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伊万诺夫），拉·瓦·（1878～1946）——文学研究家、社会学家。十月革命后追随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我不可能让他获得令人满意的生活条件之后，我在信中向托洛茨基同志写道，从我这一方面不准备反对他出国，因为索洛古勃到了国外毫无疑问会喋喋不休，但归根结蒂，对于现在在那里已经形成的那帮心怀不满的人的大合唱，他的喋喋不休也增加不了任何东西。我不想为索洛古勃在俄国处于极度贫困的状况承担责任。结果，出国护照就发给了索洛古勃，但当他变卖了所剩无几的家底之后，又把护照收了回去，这就使他和他妻子又一次濒临死亡的边缘。这是亚·米·柯伦泰告诉我的。

请求中央组织局一次敲定地决定问题：索洛古勃能走还是不能走，如果不能走——是否能给他钱让他过正常的生活，还是让他，譬如说，没有权利出国而注定饿死。在这种情况下，请把责任从教育人民委员部转到党中央。像托洛茨基、柯伦泰等等这样一些同志不断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令人不快的，因为我完全意识到这件事是我力所不及的。

教育人民委员 阿·卢那察尔斯基
秘书 弗拉克谢尔曼

【专题说明】

技校学员布洛欣和斯大林的通信

(1924年7月至9月)

这是一个普通工厂技校学员布洛欣同斯大林的通信，信中布洛欣提出打算改姓斯大林，以“表示对列宁宠爱的学生斯大林同志的敬仰”。信中还汇报了他的工作和学习的情况。斯大林给他回了信，表示“不反对改姓斯大林”。

(本专题文件由郑异凡编辑校注，
温耀平翻译)

№03336

布洛欣致斯大林

(1924年7月29日)

1924年7月29日

您好，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您当然不认识我，甚至也没有听说过我，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在苏联数以百万计，而我则从报纸、杂志上认识您。

在我订阅的《接班人》杂志上读到，说您是伊里奇宠爱的学生，我为之深受鼓舞，我本以为伊里奇没有宠爱的学生。

我以共青团的名义请求您在《接班人》杂志上写文章谈一谈作为导师的列宁，因为这本杂志是青年工人的指路人。希望这个请求能够得到满足。

现在我对您提出一项私人的请求，不过在说明这一请求的实质内容之前，我要说一说自己的经历。

我1907年10月3日出生于切列波韦茨省，切列波维茨县，乌西谢夫斯克乡，拉夫罗沃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亲从12岁开始就从事裁缝手艺。在农村住了几年以后，把我送到彼得格勒市，我在那里住过5年左右，把我送回农村，从那里又到了巴巴耶沃镇。当然我不是一个人来去，而是跟着父母亲一起。在巴巴耶沃镇人们向我们谈到尼扬多马。说那里很好，于是，很自然，父亲就带着我和母亲去了。到了尼扬多马，我们定居了下来，一直住到现在。父亲开始工作，积攒了一点钱，买了一幢不大的房子，如今一直住着。

我读完了统一传统制小学的7年级，转到8年级，但我已不愿在二年制学校学习，因为它教不了许多东西，我转入尼扬多马的工厂技校。

下面我谈谈我的政治活动：尼扬多马的共青团是1919年建立的，但我当时甚至并不知道。到1921年从同伴那里知道尼扬多马有共青团组织以后，我很感兴趣，想打听这个组织的宗旨和任务，决定参加。回到家里我说：“我可以申请参加共青团了。”我还没有讲完，母亲就骂了起来。她的原话是这样的：“每天夜里像流氓一样游逛，又不上教堂做礼拜，这就是共青团教出来的人。在我家里你敢，看我怎么揍你。”这就是我想参加共青团得到的结果。父亲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讲话，不过他一般话很少。于是，我决定先通过看书研究共青团，同时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摆脱父母亲枷锁的那一时刻的到来。

又过了2年，而我还是未能加入共青团。但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那是1923年3月30日，在复活节之前。俄罗斯共青团区委委员到二级中学召开大会，讲解共青团的宗教和他们如何过复活节。我和一个同伴写了张纸条，要求二级中学组建共青团支部。他回答说可以，并且宣布愿意参加共青团的会后留下来。

会后有13个小伙子留了下来，但谁也不走近桌子去。我决定报名，便毫不胆怯地走了过去，说了自己的姓、名和父名。其他12个人也在我之后跟了过来。

随即选举支部书记，结果我当选。

回家后我示威性地扬言：“我已报名参加了共青团，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反正我不会退出。”

开始骂我，并决定不给靴子，不给面包，以为这样我就会清醒过来，而在3月里光着脚是无法走远的，但我并不泄气。早上该上学了，我不起床，等着来喊我。果然，母亲终于走过来说：“懒鬼，

起来吧，想睡一整天，不上学了？”我说，“给我靴子，我就去。”给了靴子，但条件是一定要退出共青团，而且不给吃任何东西。到了学校我向同学要了面包，吃得很饱。有几个同学跟我讲了和我相同的遭遇。有3个人真退了团，但3天以后又偷偷来参加，他们至今还担任团的工作。到学校以后，我们以为谁也不会再触犯共青团，但是多数年轻人开始骂我们，还编唱嘲笑共青团的歌。

回到家里，问我退出了没有。我坚定地回答说：“没有，也不会退出。”当然又是一顿责骂，而且3天不给吃喝，但仍要我上学，我就在学校吃饭。不过最后还是父母亲让了步，我开始不受干扰地开展团的工作。担任了7个月支部书记，5个月墙报编辑，等等。有时不得不放弃学习搞团的工作，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升到了二级制的三年级，在这一年级我几乎不学习了。目前，在镇上的工厂技校学习。

这里的工作也多得不可开交。我现在担任以下工作：

1. 工厂技校团支部委员；
2. 政治学习小组秘书；
3. 联系农村委员会主席；
4. 列宁主义学习小组秘书；
5. 联系海军小组秘书；
6. 航空之友协会会员；
7. 国际革命战士援救会会员；
8. “青年建设者”墙报通讯员。

不过，我想写得够多了，言归正传吧：我是一个年轻的列宁主义者，前几天举行了政治测验，我通过了第3级，这是最强、最好的一级。作为列宁主义者，我学习列宁的遗训，参加第3级的列宁主义小组。

作为列宁主义者，我也希望纪念列宁，为此在家里设了一个

“列宁之角”，安放有一些书籍和宣传画。不过没有文章。

列宁去世以后我本想把自己的姓布洛欣改为列宁，不过考虑以后，认为自己不配有这样的荣幸。

于是，我决定把自己的姓改为您的姓，即斯大林。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您改姓斯大林？”我将回答说：“为了表示对列宁宠爱的学生斯大林同志的敬仰。”

为此我想请问您对此有无反对意见。如果没有，请您向我说明，我该到哪里去办和能否改姓。

我曾向一名党员说过此事，他说要到18岁以后，小于18岁不行，而我只有17岁。

请快答复，因为学习就要结束，我也许要到别处去。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地址如下：

尼扬多马镇，铁路北，工人村，第38号工厂技校学员

布洛欣

№03337

斯大林致布洛欣

(1924年9月3日)

致布洛欣同志

副本

1924年9月3日

(尼扬多马镇，铁路北，
工人村，第38号)

亲爱的同志，我不反对改姓斯大林，相反我会十分高兴，因为这样可以使我有了一个弟弟（我没有兄弟，而且从来也没有过）。

只要一有可能，我将设法写一篇文章。至于改变姓氏的手续，要找省委会行政管理处询问。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约·斯大林

№03338

布洛欣致斯大林

(1924年9月12日)

最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前天收到了您的信，为此非常非常感谢，希望今后能不时写信来，同米尚科兄弟交谈生活问题。

今天准备寄一封信，附上您的信，去沃洛戈达，省执行委员会（关于改姓一事），结果如何将在下一封信告诉您。

我已结束了第一级，现在在工厂技校第二级工作。我通过了第三组考试，也就是不再拿13个卢布，而是拿13个卢布。^①

9月7日，我和一位同学到受我们辅导的支部去了一次，我赠送了一面写有口号的锦旗。口号是：

“共青团一定能完成列宁的遗训。

城乡结合万岁！

共青团尼扬多工厂技校支部赠”

我还作了《苏联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我的同学讲的是《论少年日》。

9月7日，尼扬多马镇共青团向党输送了11名最好的同志。

有时间请写来信。

^① 原文如此。

致以共青团的敬礼！

布洛欣

1924年9月12日于尼扬多马

地址：尼扬多马镇，工厂技校，布洛欣。

致以共青团的敬礼！

布洛欣

1924年9月12日于尼扬多马

地址：尼扬多马镇，工厂技校，布洛欣。

致以共青团的敬礼！

布洛欣

1924年9月12日于尼扬多马

地址：尼扬多马镇，工厂技校，布洛欣。

致以共青团的敬礼！

布洛欣

1924年9月12日于尼扬多马

地址：尼扬多马镇，工厂技校，布洛欣。

致以共青团的敬礼！

布洛欣

1924年9月12日于尼扬多马

地址：尼扬多马镇，工厂技校，布洛欣。

致以共青团的敬礼！

布洛欣

1924年9月12日于尼扬多马

地址：尼扬多马镇，工厂技校，布洛欣。

致以共青团的敬礼！

布洛欣

1924年9月12日于尼扬多马

地址：尼扬多马镇，工厂技校，布洛欣。

致以共青团的敬礼！

布洛欣

1924年9月12日于尼扬多马

地址：尼扬多马镇，工厂技校，布洛欣。

致以共青团的敬礼！

布洛欣

1924年9月12日于尼扬多马

地址：尼扬多马镇，工厂技校，布洛欣。

致以共青团的敬礼！

布洛欣

1924年9月12日于尼扬多马

地址：尼扬多马镇，工厂技校，布洛欣。

致以共青团的敬礼！

布洛欣

1924年9月12日于尼扬多马

地址：尼扬多马镇，工厂技校，布洛欣。

致以共青团的敬礼！

布洛欣

1924年9月12日于尼扬多马

地址：尼扬多马镇，工厂技校，布洛欣。